

1848年



欧洲革命史

OUZHOU
GEMINGSHI

韩承文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1848年欧洲革命史

主编 韩承文

河南大学出版社

001633

(豫)新登字 09 号

1848 年欧洲革命史

主编 韩承文

刘小敏

责任编辑

侯惠娟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2.375 字数:57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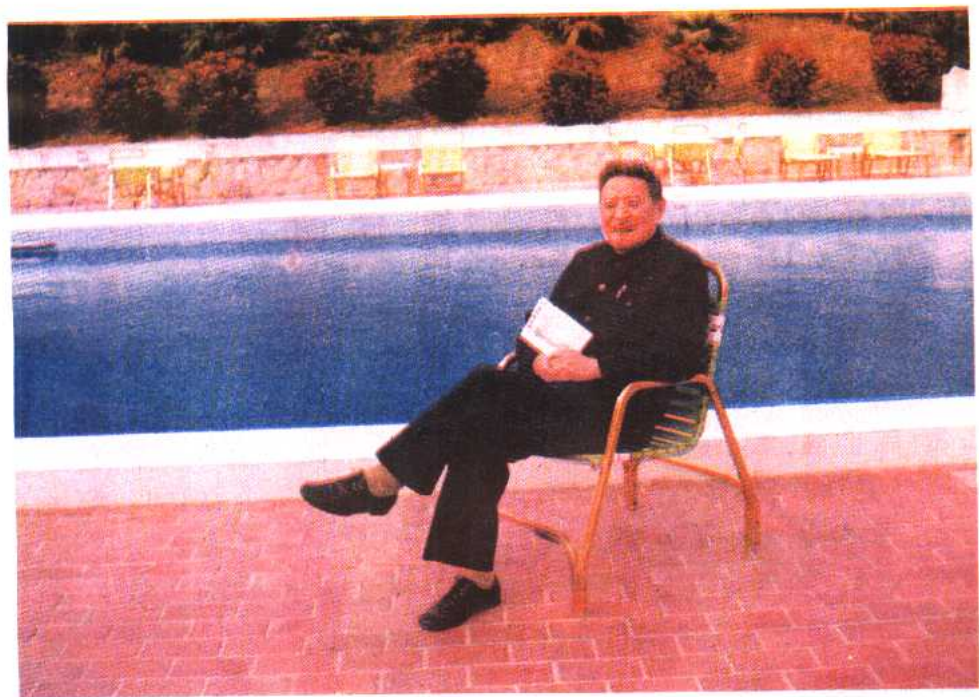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 精装 28.00 元
平装 25.00 元

ISBN7-81041-104-7/K·127



韩承文先生遗像

主 编 简 介

韩承文,1926年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市。1949年考入长春东北大学历史系,1954年东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为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1978—1983年任河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并先后任河南省史学会理事、河南省历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顾问,中华美国学会理事。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任第一届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二届副会长兼秘书长。自1958年至今一直任《史学月刊》编委。撰写和主编的主要著作有:《1848年法国革命》(被译为朝鲜文和蒙古文)、《世界近代史诸问题》、《世界史·近代史》、《世界近代政治思想史》、《世界近代政治制度史》等,并撰写论文70余篇。

说 明

《1848年欧洲革命史》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为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编著的教学参考书。

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史》编著的有(按撰写字数多少为序):河南大学教授韩承文、河南大学副教授徐云霞、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姜德昌、河南大学教授赵克毅、山西大学教授程人乾。

承担本书的定稿人为韩承文。各章撰稿人韩承文:导言、第一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二章、结束语。

徐云霞:导言、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十一章、结束语

姜德昌:第二章

赵克毅:第四章

程人乾:第七章

大事年表由韩承文执笔。

插图由韩承文、徐云霞编选,开封博物馆张继中同志拍照。

1848—1849年欧洲革命简图,1848—1849年的匈牙利地图由河南大学历史系绘图室冯爱华同志绘制。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1848 年法国革命	(17)
第一节 七月王朝的危机	(17)
七月王朝时期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17)
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人运动	(20)
社会主义流派	(23)
反对七月王朝的政治斗争	(30)
革命形势的成熟	(33)
第二节 巴黎二月革命	(36)
二月革命的爆发	(36)
二月革命的经过	(39)
二月革命的胜利	(42)
第三节 临时政府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44)
临时政府及其阶级实质	(44)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成立	(46)
争取红旗和争取“劳动权”的斗争	(48)
国家工场及其性质	(51)
3 月 17 日示威及 4 月 16 日事件 制宪议会的选举	(53)
第四节 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	(57)
起义的准备与领导	(57)
6 月 23 日的战斗	(59)
6 月 24 日的战斗	(61)
6 月 25 日的战斗	(64)

6月26日的战斗	(66)
第五节 1848年6月至1849年6月法国的阶级斗争 ..	(67)
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	(67)
1848年宪法	(70)
共和国总统的选举	(71)
巴罗内阁	(75)
6月13日事件与山岳党的失败	(78)
第六节 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81)
秩序党的议会专政	(81)
路易·波拿巴与秩序党的斗争	(85)
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准备	(88)
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2日)政变	(91)
第二章 1848年德国革命	(94)
第一节 革命前的德国	(94)
德意志联邦的建立	(94)
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96)
德国工业化的开始	(100)
30年代“统一和自由”运动	(103)
40年代的“统一和自由”运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 激进派的形成	(107)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10)
革命形势的形成	(112)
第二节 德国三月革命	(115)
南德各邦的革命运动	(115)
柏林3月18日革命	(119)
康普浩森—汉塞曼内阁	(123)
第三节 法兰克福议会	(124)
德意志预备国会的召开	(124)
法兰克福全德国国民议会的召开	(126)

帝国政府的成立及其各项政策·····	(129)
第四节 三月革命后德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	(132)
巴登共和党人起义·····	(132)
普鲁士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	(134)
普鲁士议会的召开与康普浩森—汉塞曼内阁的辞职·····	(137)
九月危机和九月起义·····	(140)
普鲁士反革命政变·····	(145)
第五节 维护帝国宪法运动 ·····	(148)
大德意志道路和小德意志道路 帝国宪法·····	(148)
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开始·····	(150)
莱茵省起义·····	(152)
普法尔茨的运动·····	(153)
巴登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155)
普鲁士对南德革命的镇压·····	(156)
第三章 1848 年奥地利革命 ·····	(159)
第一节 多民族奥地利末日的开端 ·····	(159)
多民族奥地利君主国的形成·····	(159)
30—40 年代奥地利经济的发展 ·····	(162)
梅特涅与“梅特涅体系”·····	(164)
民族压迫与民族解放运动·····	(168)
人民的悲惨状况·····	(172)
革命形势的成熟·····	(174)
第二节 奥地利的三月革命 ·····	(177)
革命的开始·····	(177)
维也纳 3 月 13—15 日革命事件 ·····	(179)
三月革命的阶级实质及特点·····	(183)
第三节 奥地利的五月革命 ·····	(184)
3 月—5 月的政治形势 ·····	(184)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活动·····	(187)

5月15日革命事件	(188)
奥皇逃往因斯布鲁克	(190)
5月26日革命事件	(191)
第四节 1848年五月革命后的奥地利	(193)
5月—7月的奥地利	(193)
奥地利议会的组成与召开	(196)
反革命转入进攻	(198)
第五节 维也纳十月起义	(201)
起义前夕奥地利的政治形势	(201)
塔包尔桥战斗 袭击武器库	(203)
斐迪南一世再次出逃 反革命力量的集聚	(205)
保卫维也纳的战斗准备	(208)
奥地利外省和国外对维也纳的支援	(209)
维也纳的战斗	(212)
第六节 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的奥地利	(217)
维也纳的白色恐怖	(217)
奥地利议会迁往克列麦尔日 弗兰茨·约瑟夫即位	(218)
1849年3月4日宪法与议会的解散	(220)
第四章 1848年意大利革命	(222)
第一节 革命前的意大利	(222)
意大利被重新肢解和奴役	(222)
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	(224)
经济发展与各阶级状况	(226)
“青年意大利”马志尼和加里波的	(228)
自由派的运动	(231)
第二节 革命的酝酿和爆发	(233)
革命形势的形成	(233)
巴勒摩人民起义和各邦的立宪运动	(234)
米兰起义	(236)

威尼斯起义·····	(239)
三月反奥怒潮·····	(241)
第三节 反奥独立战争 ·····	(243)
查理—阿尔伯特在反奥战争中的叛卖行为·····	(243)
萨伏依王朝的领土兼并·····	(245)
反革命势力的反扑·····	(247)
意奥战局的变化·····	(249)
库斯托查战役与米兰陷落·····	(250)
第四节 革命的新高涨与最后失败 ·····	(252)
革命斗争的新阶段·····	(252)
罗马共和国的成立和它的社会经济措施·····	(255)
罗马共和国的阶级斗争·····	(258)
反奥战争的再起与皮蒙特国王的再背叛·····	(259)
托斯坎纳和西西里革命的失败·····	(261)
外国的武装干涉与罗马共和国的倾覆·····	(263)
威尼斯的陷落·····	(267)
第五章 1848 年罗马尼亚革命 ·····	(269)
第一节 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 ·····	(269)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270)
沙皇俄国的入侵·····	(271)
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	(273)
贵族与资产阶级·····	(274)
农民与无产阶级的状况·····	(277)
1848 年前的革命运动·····	(279)
第二节 摩尔多瓦革命 ·····	(280)
革命的开始 自由派的纲领·····	(280)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 斯图尔扎的反扑·····	(283)
摩尔多瓦流亡者的活动与各县农民起义·····	(286)

革命的失败·····	(288)
第三节 瓦拉几亚革命 ·····	(290)
革命的爆发 伊兹拉兹宣言·····	(290)
临时政府的建立·····	(294)
人民为保卫革命成果而斗争·····	(298)
农民为土地问题而斗争·····	(302)
沙皇俄国与土耳其的反革命武装干涉·····	(305)
第四节 特兰西瓦尼亚革命 ·····	(310)
革命前的特兰西瓦尼亚·····	(310)
革命的开始·····	(313)
布拉日人民大会·····	(315)
反奥斗争·····	(319)
争取革命力量的联合·····	(322)
沙皇俄国的反革命武装干涉·····	(324)
第六章 1848 年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 ·····	(326)
第一节 奥地利统治下的捷克 ·····	(326)
资本主义的发展·····	(327)
30—40 年代的阶级状况与革命运动·····	(329)
第二节·捷克的 3 月与民主运动的高涨 ·····	(335)
第一次请愿书与圣瓦茨拉夫委员会·····	(335)
第二次请愿书与民族委员会的成立·····	(340)
捷克资产阶级与德国资产阶级的分裂·····	(343)
第三节 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 ·····	(345)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准备·····	(345)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纲领·····	(347)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召开·····	(349)
第四节 布拉格起义 ·····	(352)
革命运动的高涨·····	(352)
文迪施格雷茨的挑衅行为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354)

6月12—17日起义	(356)
第五节 布拉格起义失败后捷克的民族运动	(362)
起义失败后的捷克政治状况	(362)
奥地利议会的召开	(364)
1849年“五月密谋”及其失败	(366)
第六节 斯洛伐克革命与民族运动	(368)
遭受双重民族压迫的斯洛伐克	(368)
1848年匈牙利革命对斯洛伐克的影响	(371)
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及其政治纲领	(373)
斯洛伐克军团及其活动	(375)
第七章 1848年波兰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	(380)
第一节 俄、奥、普占领下的波兰	(380)
波兰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概况	(380)
波兰社会各阶级状况	(384)
40年代革命形势的形成	(385)
第二节 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和加里西亚农民起义	(390)
克拉科夫起义的爆发 起义政府的革命措施	(390)
克拉科夫起义的结局	(393)
加里西亚农民起义	(395)
第三节 1848年波兰革命	(399)
欧洲革命运动中的波兰问题	(399)
1848年波兹南起义	(402)
米洛斯拉夫战役 波兹南起义的失败	(407)
1848年西里西亚的革命运动	(409)
1848年加里西亚的革命运动	(413)
第四节 1848年欧洲革命与波兰革命战士	(416)
波兰在欧洲革命中的敌人与盟友	(416)
法、意、德、罗、匈等国革命中的波兰人	(418)
波兰革命的历史地位和成果	(422)

第八章 1848年匈牙利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 (426)

- 第一节 革命前的匈牙利 (426)
 - 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426)
 - 资本主义的发展 (429)
 - 社会阶级关系 (430)
 - 30—40年代争取改革的斗争 (434)
 - 革命形势的成熟 (437)
- 第二节 佩斯三月革命 (438)
 - 3月15日革命 (438)
 - 为保卫三月革命成果而斗争 (442)
- 第三节 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 (446)
 - 耶拉契奇的入侵 (446)
 - 匈牙利人民的浴血奋战 (452)
- 第四节 沙皇俄国的反革命武装干涉 (457)
 - 沙皇俄国的武装入侵 (457)
 - 匈牙利人民奋起抗战 (464)
 - 匈牙利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特点 (470)

第九章 沙皇俄国与1848年欧洲革命 (476)

- 第一节 1848年革命与俄国的阶级斗争 (476)
 - 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 (476)
 - 农奴制危机的加深 (479)
 - 农民解放运动的高涨 (482)
 - 俄国各社会思想流派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反响 (484)
- 第二节 沙皇俄国对1848年革命的镇压 (496)
 - 尼古拉一世对欧洲革命形势的估计与反革命计划 (496)
 - 沙皇政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及其反动的加强 (498)
 - 尼古拉一世武装干涉的延期 (501)
 - 沙皇俄国武装干涉的准备及对革命的镇压 (503)

**第十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革命中的活动及其
理论总结** (510)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参加 1848 年革命是其生平事
业的突出的中心点** (510)

革命开始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510)

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与《新莱茵报》的创办 (514)

马克思恩格斯为团结工人阶级而斗争 (519)

马克思到达维也纳 (523)

《新莱茵报》被迫停刊 (524)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的理论总结
..... (527)

第十一章 1848 年欧洲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编纂学
..... (534)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1848 年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 (534)

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法国革命的研究 (535)

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德国革命的研究 (539)

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奥地利、意大利革命的研究 (542)

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东南欧民族解放运动的研究 (545)

**第二节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研究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历
史编纂学** (549)

1848 年法国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549)

1848 年德国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555)

1848 年奥地利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559)

1848 年意大利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561)

1848 年捷克民族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编纂学 (566)

1848 年波兰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编纂学 (569)

1848 年罗马尼亚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572)

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576)
第三节 苏联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584)
革命民主主义者关于1848年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584)
列宁斯大林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	(588)
苏联史学家关于1848年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595)
第十二章 1848年欧洲革命在中国的反响	(598)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反响	(598)
康有为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论述	(598)
梁启超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论述	(603)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评述	(616)
鲁迅的评述	(616)
茅盾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论述	(621)
史学界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论述	(625)
刘镜园等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著作的翻译 和介绍	(641)
第三节 建国以来研究和评介1848年欧洲革命 的概况	(643)
50—70年代研究的新进展	(644)
7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概况	(647)
结束语	(651)
一、革命的任务与性质	(651)
二、革命的动力	(654)
三、资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	(656)
四、革命失败的原因	(659)
五、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成果	(665)
大事年表	(669)
主要参考书目	(682)
增订版后记	(697)

导 言

在欧洲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主义制度的胜利,基本上经历了三次革命大风暴。1848年欧洲革命是继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革命大风暴。1848年欧洲革命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欧洲政治、经济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深化,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它再一次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继续完成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的革命任务。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确立了英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时代进入到新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继英国革命之后,法国于18世纪末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次规模更大的、比较彻底的革命,它废除了法国国内的封建秩序,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德国和意大利仍处于封建分裂状态,沙皇俄国处于农奴制统治之下,东南欧诸国: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不仅承受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而且遭受着异族压迫。

19世纪30—40年代是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不同,其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即基本完成或开始了工业革命,如英、法、德、俄和意大利等国;另一种是封建农奴制经济解体,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如奥地利、罗马尼亚、捷克、波

兰和匈牙利等国。

英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较早，所以首先开始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这时在英国主要是机器生产，而不是手工生产，受贵族地主奴役的英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已不复存在，英国已经是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在法国，自从资产阶级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以后，法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于19世纪2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到了30—40年代，法国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便从国外招聘了许多熟练工人，输入大批机器，于是，法国的工业革命便大规模地展开了。在工业生产中，纺织品的产量迅速猛增，在出口贸易中跃居第一位，成为英国主要的竞争对手，不过，这时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小生产。德国的工场手工业在19世纪前30年已广泛地发展起来，机器的采用也有所增加。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德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加速了德国工业革命的到来，所以，19世纪30年代，德国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特别是农奴赎金的资本化、国家对机器大工业的扶植、从事长期投资活动的信贷系统的建立、在军事工业带动下较早地把工业发展的重心转移到重工业部门等，都大大加速了德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俄国于19世纪40年代开始由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过渡。俄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封建农奴制时期，它是俄国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而意大利也大致与俄国同时，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时期。

尽管各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与进展的速度和深度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基本过程和后果都是一致的。其基本过程都是从纺织工业开始，尔后扩展到其他轻工业，最后再转移到重工业的发展上。在各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对各国工业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尤其是加速了冶金、采煤以及其他重工业部门的发展。但是，从各国工业发展的总情况来看，重工业都不同程度地落后于轻工业。

在工业革命过程中，资本主义关系在各国的农业中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大机器工业的发展由于需要大量的粮食、原料、市场和劳动力，所以就进一步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农民经济的分化，同时也为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革新农业生产方法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而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大机器工业的迅速发展。

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存在着两条基本道路，即“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前者的主要特点是：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关系，普遍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并在小农经济自发分化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农场。在法国，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便是遵循了这一条道路。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较彻底地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普遍地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这就为农村经济的分化和资本主义农场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革命后，由于法国农民负担着沉重的战争经费和种种苛捐杂税，受着高利贷的重利盘剥，同时法国农民没有遭到英国农民那样大规模地被强力剥夺的命运，所以，小农分化的过程比较缓慢，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因而受到一定影响。后者，即“普鲁士道路”的特点是：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关系；农民通过农奴制改革，用赎买或割地方式部分地摆脱封建义务，而封建地主经营的土地不但被保存下来而且扩大了；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推动下，封建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雇佣半农奴式雇农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从农民经济中缓慢地分化出少数富农；广大破产农民遭受着地主和富农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因此，“普鲁士道路”是一条保留着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在德国东部地区的农业发展中最为典型。俄国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也基本上是遵循了这条“普鲁士道路”。

而在一些封建专制制度仍居统治地位,但封建农奴制经济已经解体,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国家,如奥地利,以及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和捷克,还有处在沙皇俄国和土耳其统治下的多瑙河诸公国以及被俄、普、奥瓜分了的波兰等国家中,其资本主义发展,在速度上虽不能与西欧各国相提并论,但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外国资本的渗透,仍然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奥地利和奥地利统治下的捷克,不仅纺织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而且已开始使用蒸汽机;捷克的铁和钢的产量从1827年至1841年增加了2倍,煤产量从1820年至1850年增加了24倍;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在30年代已成为东南欧商品贸易中心,40年代已拥有875家手工工场;处在沙皇俄国和土耳其统治下的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扩大了耕地面积,出现了纺织、造纸、制蜡、制革等工业,同时,瓦拉几亚的布拉伊拉和摩尔多瓦的加拉茨不仅成了两公国的商业中心,而且成了欧洲商品的集散地,欧洲的数百艘船只都相继开到这里来。就是处于俄、奥、普控制下的波兰,其资本主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波兰王国地区的纺织工场从1830年的4705家增至1844年的9264家,同时出现了酿酒业、制糖业和机器制造业等,并且开始采用蒸汽机和其他新技术。

在这些国家中,不仅资本主义工场,主要是手工工场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封建农奴经济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民的份地制度、农民的人身依附和落后的耕作技术等,也已明显地发生了变化。由于自然经济不再占统治地位,加之国内外市场的不断扩大,欧洲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业原料和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多,所有这些就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国家的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这些国家的贵族地主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增加其收入,便竭力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商品性的农业生产。于是,地主庄园中的农业生产不再是完全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而更多地是为了向市场出售产品,这就使得地主庄园的生产具有明显的

商品生产的性质。而这种为出售而生产的农产品正是旧制度崩溃的征兆。

在这些国家里，地主扩大耕地面积的办法，除利用未耕地和开垦荒地外，主要的是占用和缩减农民的份地，或完全剥夺份地。多瑙河两公国是采取这种办法最为典型的国家。丧失了部分份地或完全被剥夺了份地的农民便被迫脱离农业，流入城市，从事手工业、商业或出卖劳动力。于是，农民经济的家长式的、自然的性质被破坏了。这种对农民的剥夺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农业中已经开始了。

随着自然经济和农民份地制的破坏，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失去了经济意义。一部分贵族地主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意识到雇佣自由劳动要比农奴劳动优越得多，所以在19世纪30—40年代，这些国家已普遍采用雇佣劳动制，于是，农业自由雇佣劳动便逐渐代替了农奴劳动。与此同时，许多贵族地主为了提高产量，适应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还采用了新的农业技术和农业机器。

可见，19世纪30—40年代是奥地利、罗马尼亚、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封建农奴制经济解体，资本主义因素在农奴制内部形成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发展的时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①

从上述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19世纪30—40年代仍然是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时期。但是，它的发展仍然受到种种障碍。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封建反动势力在欧洲重新掌握了政权。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圣彼得堡，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族把持着。法国在沙皇俄国的刺刀保护下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3页。

辟了波旁王朝，恢复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在东欧一些国家，如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等，封建农奴制关系都完整地保存下来，而在俄国甚至还有所加强。西欧的两个大国，德国和意大利仍然处于封建的分裂状态。甚至在英国，资产阶级仍旧不得不与贵族地主分享政权，把行政、军事和外交上的高级职位让给他们。这种封建农奴制的保存、国家政权集中在贵族手中、国家的四分五裂状态，都严重地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时，在国际关系中，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按照自己的利益瓜分欧洲领土后，便在欧洲确立了它们的统治权，而且，为镇压各国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于1815年结成了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神圣同盟。从维也纳会议至19世纪40年代，甚至直到60年代，列强之间的外交关系都是在工业寡头的英国、军事封建的俄罗斯帝国和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享有优势并互相竞争的条件发展的。

这种国内外封建反动势力十分猖獗的形势似乎表明，各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它们的统治已经完全巩固了。但是，正是在这种形势后面却深深地隐藏着那种暂时还不明显，而实际上是决定着历史事件全部进程的力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巩固了各个资产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封建专制制度矛盾的尖锐化。正是这种力量促进了19世纪20—40年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

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和意大利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都遭到了神圣同盟的镇压。为了镇压意大利革命，神圣同盟参加国于1820年秋在特劳波举行会议。会议期间，奥地利皇帝、俄国沙皇和普鲁士国王联名发表了一项宣言，宣布各国君主为了恢复贵族政权和君主专制政权，对任何国家都有进行武装干涉的“权利”。这个宣言的目的在于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和反对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提出的“民族至上”的原则。此后，贵族皇室“干涉他

国内政”的外交原则和资产阶级“不干涉”的外交原则之间的斗争，便成为 19 世纪前半期国际关系的特点。

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武装干涉使神圣同盟内部的矛盾趋于尖锐化。法国统治集团对于奥地利在意大利各国势力的加强，特别是奥军对皮蒙特和那不勒斯王国的占领深表不满。因此，法国没有参加特劳波会议通过的三强宣言。在维也纳会议期间，英国放弃了神圣同盟的政策。它为了同法国争夺比利牛斯半岛的霸权，维护其在西班牙的经济利益，不同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和法军进入马德里。因而，英、法之间的矛盾加深了。

继西班牙和意大利革命之后，希腊于 1821 年举行了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起义。这次起义虽遭到了土耳其的血腥镇压，但赢得了全欧进步人士的热烈同情。同时希腊起义进一步加深了神圣同盟内部的矛盾。在对待希腊的问题上，列强各有各的打算。英国政府希望利用希腊起义巩固自己在希腊的地位和扩大对希腊的贸易；法国打算把希腊变成它在巴尔干半岛势力的支柱；沙皇俄国则决心利用希腊起义，削弱土耳其，巩固自己的势力和新征服的领地。这样一来，神圣同盟各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奥俄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因为奥地利尤其惧怕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强大起来。

1825 年，沙皇俄国也爆发了第一次公开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武装起义——十二月党人起义。它为俄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十二月党人起义爆发后不到五年，法国于 1830 年 7 月又爆发了革命。尽管法国 1830 年的七月革命不是以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以大银行家路易·菲力浦为首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代替了波旁王朝君主制，但是，七月革命却使“正统主义”原则和神圣同盟受到了新的致命的打击，在整个欧洲近代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路易·菲力浦的七月王朝由于极其需要巩固其国际地位，因而百般讨好英国，表示愿作各种让步。这样一来，英国内阁便很快承认了七月王朝，以便同法国一起，共同反对俄国。而俄国原打算

干涉法国革命,但由于英、法的接近,就放弃了这个计划,转而怂恿奥地利和普鲁士进行武装干涉。这个企图也由于奥普之间的矛盾和俄奥关系的恶化而遭到失败,最后,尼古拉一世被迫承认了路易·菲力浦的政权。在对待法国革命的问题上,充分暴露了神圣同盟的四分五裂和日益瓦解。

1830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法国的七月革命不仅给予神圣同盟以致命的打击,而且在欧洲各国引起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同年8月,尼德兰爆发了摆脱比利时压迫的革命;11月,波兰又发动了起义;1831年初意大利的各个地区都举行了起义;德国在1830年以后开始了全国性的暴动;英国在革命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于1832年实行了第一次国会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得以参加国家的管理。而在奥地利,七月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加速了各民族的民族觉醒,引发了一系列的民族运动。就是对封建统治最严密的俄国,法国的七月革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在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别林斯基和赫尔岑所领导的反对沙皇制度的社会运动得到了发展。

法国七月革命以后,在欧洲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新气象,那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共和派的国际联合。1834年,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的秘密组织“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法兰西”、“青年波兰”和“青年瑞士”都在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的领导下结成了联盟,即“青年欧洲”。尽管“青年欧洲”被反动势力所扼杀,但它在欧洲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所以,神圣同盟的核心人物梅特涅不得不承认,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冲破了欧洲列强于1814—1815年在欧洲所设置的重重障碍。

1830年,欧洲进步势力对反动势力胜利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加速了欧洲各国,包括俄国在内的经济发展的速度。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和大机器生产的发展,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现

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里，大机器工业的生产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同时也把他们推向极端贫困的深渊。他们的劳动条件恶劣、饮食粗糙、居住条件拥挤而肮脏。所有这些都加深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和它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不断加深，有力地推动了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在工业革命初期，无产阶级的斗争还是自发的。到了19世纪初，无产阶级开始走上了为争取改善生产状况和民主权利而斗争的道路，出现了工会组织。同时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不满情绪并幻想建立一个消除贫富对立的美好社会的思潮应运而生。这就是19世纪初期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揭露和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奴隶制的种种罪恶，提供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宝贵材料，并描绘了一些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他们的学说包含有不少卓越的见解，因而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制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可贵的思想材料。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认识不到什么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因此，他们所提出和进行试验的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到了19世纪30—40年代，英、法、德各国的无产阶级已逐渐壮大起来，成为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并开始从日常的经济斗争转向大规模的政治斗争。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起义，是欧洲无产阶级最早的群众性武装暴动，它揭开了工人运动史上新的一页。在这次起义中，工人夺取了武器，修筑了街垒，提出了“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起义工人庄严宣布：“1830年7月，资产阶级为自己完成了革命，现在我们也要进行自己的革命。”继里昂起义之后，英国于1836—1848年展开了宪章运动，列宁称这次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

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①。在这次运动中，工人们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斗争。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织工举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工人们高唱《血腥的屠杀》这首战歌，捣毁机器和工场主住宅，烧毁票据、账簿和仓库，并同军警展开了搏斗，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这三大工人运动虽然都遭到了失败，但是，它们却标志着无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证明了一切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已经成为工人运动的障碍。这几次工人斗争的实践不仅使无产阶级加深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同时也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发动这三次大规模起义的同时，无产阶级不仅建立了工会，而且还建立了一系列政治组织，如英国的宪章协会（1840年），法国的“家族社”（1835年）、“四季社”（1837年），德国的“流亡者同盟”（1834年）、“正义者同盟”（1836年）等。这些都充分说明，当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争夺政权的斗争尚未结束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②。虽然这些运动尚不免带有自发性，但仍不愧为无产阶级的独立发动。

工人运动的不断壮大，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思想的发展。19世纪40年代，法国又出现了以卡贝、布郎基、德萨米、皮佑为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和以路易·勃朗、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德国出现了魏特林主义。以德萨米等为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虽较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实行社会革命和建立革命专政，以消灭私有制和镇压富裕阶级的反抗，但是，他们的共产主义仍然是空想的，因为他

^①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选集》第3卷，第811页。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们通常把无产阶级理解为一切没有财产的人，没能把工人同一般劳动者区分开来。他们所想象的专政，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狭隘的革命组织的专政。尽管他们的学说还是粗糙的、纯粹出于阶级本能的，但仍然是反映无产阶级最初独立运动的理论。以路易·勃朗和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出发的幻想和空谈，它对当时法国和后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均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在19世纪30—40年代，当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一些封建君主国的资产阶级都先后分裂为自由派和民主派。各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当革命深入发展时，便逐渐变为保守派，成为反对革命的潜在势力，有的甚至公开与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共同反对革命。至于各国的小资产阶级，虽然他们比较激进，在一定的时期参加了工人运动（例如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曾同工人一起参加了1834年的里昂起义，英国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同宪章派一起发动了争取“人民宪章”的第一阶段的斗争），但是，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妥协性，特别是在革命受挫的关键时刻的动摇性，致使他们对革命丧失信心，甚至脱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便成为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了。

随着无产阶级形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于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了。

在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了他们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革命运动，在总结当时革命运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研究。他们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的深刻研究，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剥削实质，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

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从而建立了严整的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革命理论,形成了崭新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一出现便成了无产阶级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就已经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1848年革命前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国际战斗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朽著作《共产党宣言》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这部伟大著作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正如列宁所阐明的:“这部著作极其透彻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叙述了辩证法这一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学说。”^①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一切与无产阶级根本敌对的和理论的反反复复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前后,同形形色色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派别进行了斗争,特别是同对工人影响较大的蒲鲁东主义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1847年夏,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出版,这部著作是对1846年出版的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回答。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驳斥了蒲鲁东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关系上的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观点,指出了他否定无产阶级进行独立的阶级斗争的危害性。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斗争中,逐渐清除了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页。

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不断兴起,尤其是工人阶级独立的革命发动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爆发作了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使革命形势成熟的重要因素,但除此之外,还必须具备列宁所阐明的三个重要条件,即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列宁所阐明的这些条件,在1848—1849年的欧洲各国几乎都臻于成熟了。尽管在欧洲大多数的国家里仍然保留着封建专制制度,封建贵族仍居统治地位,但是封建统治已成为千疮百孔的病体,摇摇欲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使其不能再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了。1845—1847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以及1847年波及全欧的经济危机,使各国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和农民急剧贫困化,整个欧洲社会也因之动荡不安。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另一方面压制新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当时欧洲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随着压迫的加强、贫困的加深和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普遍高涨起来,各国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工人斗争和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兴起,资产阶级各派别的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这种从社会制度深处产生的动荡,从1814年开始,已经持续了三十余年,最后,终于酿成了波澜壮阔的1848年欧洲革命。

意大利1月12日爆发的巴勒摩人民起义揭开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序幕,巴黎二月革命吹响了这次大规模革命运动的号角。随着响亮的巴黎二月革命的号角声,革命立即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从柏林到华沙、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从布加勒斯特到布拉格的广大地区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在两个主要大国英国和俄国以及爱尔兰、比利时、尼德兰、西班牙、瑞士、希腊、斯堪的那维亚诸国,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革

命,但是,在二月革命的影响下,也都展开了革命运动,掀起了革命斗争。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出后,英国的宪章派便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宪章运动的第三次高潮。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运动迅速高涨,都柏林的革命人民试图在5月28日至29日举行起义,但未能成功。比利时的政治斗争广泛展开,共和派掀起了民主共和运动,企图实行政变,政变虽未成为现实,但却迫使政府进行了选举改革。尼德兰的宪法改革进入高潮,并得以实现。西班牙多次进行了革命发动:3月26日,马德里举行了起义,5月7日又举行了军人起义,5月13日,塞维里亚也爆发了起义,这些起义虽然是短暂的,并遭到失败,但却沉重地打击了统治者。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社会运动也呈现高潮: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于3月18日至20日发生了有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参加的群众性示威游行,酿成了示威者和警察的冲突;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于3月11日—14日发生了群众性的运动;丹麦的哥本哈根也于3月11日、20日和21日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的人民大会。瑞士的革命运动空前高涨,瑞士的激进派巩固了对索得崩德的胜利,纳沙泰尔于4月30日通过全民投票,决定实行民主共和的新宪法,纳沙泰尔成为共和国。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发展了起来,雅典于3月发生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资产阶级要求政府辞职和召开新的立法会议。

从上述情况看,在法国巴黎二月革命的影响下,这些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展开了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有些国家的革命运动还进入了高潮,但是,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都未能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革命。这主要是由这些国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以及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均未达到足以爆发革命的程度。同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甚至背叛:如爱尔兰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影响下所激发的革命积极性,却在反革命进攻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流血冲突中丧失净尽了;比利时资产阶级自由派在革命发展时,因惧怕革命而动摇、

妥协，最后叛变；希腊的资产阶级对革命表现得十分优柔寡断；英国对一些国家革命运动的残酷镇压：如向爱尔兰派遣军队，逮捕爱尔兰革命领导人；公然干涉西班牙的内政；明目张胆地支持比利时君主政府等。所有这些也是使上述国家刚刚开始革命运动便被镇压下去，没能发展成为大规模革命的重要原因。

在英、俄这样两个经济比较发达、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大国里，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为什么也没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革命呢？关于俄国，虽然在1848年没有爆发革命，但是，它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1848—1849年期间，不仅欧洲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① 他不仅遏止了俄国本国革命的发生，而且以武力扼杀了1848年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革命，成为国际反革命势力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的罪魁祸首。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沙皇俄国作为1848年欧洲革命打击的重点，“号召革命的欧洲对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②。正因为沙皇俄国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占有如此特殊的地位，所以本书将列专章全面地论述1848年的俄国。

至于英国，有的著作认为：它在1848年也爆发了革命。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英国宪章运动的第三次高潮与欧洲革命同时发生，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发展成为革命。这主要是因为：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务，工业革命也基本结束。这时英国的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阶段，资本主义关系较所有其他国家都比较发展。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并不像法国资产阶级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②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页。

那样被排斥在政权之外，而是一个掌握政权的阶级。他们不仅在英国工商企业中，而且在殖民地工商企业中，都能获得巨额利润。英国的资产阶级尚没有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所以，这时英国不可能爆发欧洲大陆那样的革命。而宪章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革命。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还适应着生产力的发生。英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对外贸易，乃至人口，都处于增长之中，也就是说，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迅速发展。同时，资产阶级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工人的斗争作了一些让步，如实行10小时劳动日，增加工人工资和降低物价，特别是对有技术的上层工人的收买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无产阶级，无论在自身力量的壮大、阶级觉悟的提高，或者在政党组织的建立等方面，还都没有达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程度。因而，英国尚不具备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条件，英国不可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当时的宪章运动也只能再一次掀起高潮，而不能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革命。

1848年，在发生了革命运动的国家里，革命犹如狂涛巨澜，猛烈地冲击着封建专制制度，迅速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形势。无论在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还是在匈牙利、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革命到处都把旧制度打得落花流水，把一顶顶王冠打落在地；革命以无限的权威宣布了1815年维也纳体系和“神圣同盟”的彻底破产，触动了农奴制俄国的根本利益。1848年欧洲革命虽以失败告终，但是它在世界近代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章 1848年法国革命

第一节 七月王朝的危机

七月王朝时期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1830年7月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波旁王朝的反动统治。1830年8月7日，两院联席会议宣布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法国国王，从此建立了法国历史上的七月王朝(1830—1848年)。七月王朝的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金融贵族手里。尽管如此，这种由资产阶级君主国代替封建君主国的政权交替，仍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七月革命的胜利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时国内外政治局势比较安定，战争的创伤已逐渐平复。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法国从国外聘请了许多熟练技工，从英国输入了大批机器，从而提高了国内工业技术水平。法国的工业革命便大规模地展开了。

纺织工业是法国最主要的工业部门，也是最早普遍采用机器的部门。40年代末，全国已有棉纺织厂566家。在牟罗兹附近，1815年至1850年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工业革命。那里的新纺纱业

到 1828 年已有 50 万枚纱锭,到 1847 年时已达 115 万枚,占法国纱锭总数的 1/3。^①棉花的需求量也由 1831 年的 2800 万公斤增加到 1845 年的 6400 万公斤。在丝织业中已拥有机器 9 万台,毛纺织业中也开始用剪毛机和毛纺机了。所以,这时法国纺织品的生产迅速上涨,在出口贸易中占居第一位,在国际市场上成为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冶金和采矿工业中,由于设备更新和新技术的推广,生产也迅速增长,从下列数字中可以看出冶金生产增长的情况:

1845—1847 年法国生铁、熟铁和钢产量 单位:吨

年 份	生 铁	熟 铁	钢
1845 年	4389690	3422620	123730
1846 年	5223850	3601900	129540
1847 年	6015902	5147310	104504

法国煤炭的产量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尚不能自给,每年约有 1/3 的消费量需要从国外输入。

1844—1848 年煤炭的开采量与需求量 单位:吨

年 份	开 采 量	需 求 量
1844 年	31827000	54858000
1847 年	51532046	76488000
1848 年	40004300	60952000

工业革命大规模展开的标志之一是蒸汽机的迅速增加。1830 年法国只有 616 台蒸汽机,到 1847 年已增至 5853 台了。这时的总功率已达 61630 马力。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的统计,这些机器能够完成 150 万人的工作量。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也发展了起来。1831 年,法国开始修建第一条铁路,全长仅 39 公里,

① [英]克拉潘:《1815—1914 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第 83 页。

到1847年，铁路总长已达1832公里。

工业和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达。对外贸易额从1825年的94500万法朗增加到1846年的177500万法郎。同时，里尔、圣太田、鲁昂、牟罗兹等城市都成为大工业的中心了。

法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工业化的速度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英国。大多数工业部门还沿用古老的手工生产技术，并以手工劳动为主；在冶金工业中，只有1/10的高炉使用焦炭，而其余的仍使用木炭。在铁路建设方面，法国也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特别是1847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波及法国以后，严重地破坏了法国的经济发展。各工业部门的生产不断下降。1847年到1848年，生铁的产量由6015902吨下降到4724429吨，约下降21.5%，钢由104504吨下降到63085吨，几乎下降40%；从1845年到1847年，棉纺织品的出口总额由12770万法郎下降到3906004法郎。经济危机的加深致使小企业主和小商人相继破产。1846年整个法国破产的工商企业有3795家，而到1847年破产的则达4762家。仅巴黎一地从1847年7月到1848年3月宣布破产者就达719家^①，其中大部分是在1847年的最后3个月和1848年的1月，即二月革命前夕破产的。

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一是七月王朝这个“银行家的王国”在经济方面所推行的政策，严重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金融贵族集团专靠掠夺他人财产而发财致富，所以，他们就竭力将资本从工业中吸收到金融信贷——银行、债券投机、高利贷、购买高价证券和国家公债等上面。1832年，在巴黎交易所仅有14种有价证券，而到1847年就增加

^① 见《改革报》1847年7月1日到1848年3月1日，转引自《纪念1848年革命一百周年论文集》，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136—137页。

到198种了^①。这样一来，法国银行资本的迅速增长和工农业发展缓慢的不平衡现象便日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由于银行资本的发展具有单一性，所以，它不符合国内经济发展的利益，而以法兰西银行为首的大小银行却控制了全部工商业信贷。在他们将信贷资本大量投放到有价证券、抵押、债券投机的情况下，法国的工商业便由于缺乏资金而不能迅速发展，甚至被扼杀了。

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另一原因是小农经济的盛行和小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七月王朝时期，从总的来看，法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1846年75%的居民住在农村。为了活命，小农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作为抵押品抵押出去。1848年革命前夕，农民的抵押负债达80亿法郎之多，支付押款的利息约占农民收入的1/5。所以，广大农民不断破产，农业生产也日益下降，这就直接影响了工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大工厂主和大矿山主为追求高额利润而推行的对外贸易和关税保护政策，不仅引起了煤炭、金属和机器价格的上涨，而且直接影响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并导致英国和比利时对法国的酒类和水果的进口实行了禁止性的关税。此外，因重要的煤炭资源缺乏而不得不从外国进口等，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

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人运动

法国工业革命的主要社会后果是，产生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法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果，只是给资本家带来了黄金果和高额利润，而给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带来的则是贫困、饥饿、疾病和灾难。广大劳动人民不仅物质和文化水平得不到

^① 尼·扎斯金克尔：《1848年法国革命》，莫斯科，苏联教育出版社1948年，第14页。

提高,而且,由于机器的采用,更是受到了变本加厉的剥削和压榨。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任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当时各工厂每天劳动的时间,名义上是14—15小时,而实际上则长达17—18小时。同时,各工厂都违犯1841年通过的禁止使用童工的法令,大批雇用8岁以下的男儿童,让他们像成年人一样地劳动。工人,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工资非常微薄,根本无法维持生活。而且,各个工厂还实行严厉的罚款制度,克扣工人的工资。不堪忍受压迫与剥削的工人,便奋起斗争,举行起义。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里昂工人发动了反抗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即著名的里昂起义。

里昂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法国工人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里昂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逐渐从经济方面转移到了政治方面。这两次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里昂起义以后,工人阶级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日趋贫困化了。这时,在法国,不仅失业工人流浪街头,乞食为生,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在业工人也是常年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低廉的工资、长时间的劳动、恶劣的居住条件和难以入口的饮食,使广大工人陷于极端痛苦之中。《改革报》在报道伐木工人的苦难生活时写道:“不幸的伐木工人或者在炽热的烈日下工作,或者在倾盆大雨中劳动,他们从早晨4点一直劳动到晚上8点,但是一星期所得到的工资只有8个法郎。”而一个工人一星期所需要的最低生活费用就为6法郎30生丁,所余下的仅有1个法郎70生丁,而这1法郎70生丁就是他用来养活靠半乞讨为生的子女的费用了。

不堪忍受饥饿与贫困的工人,常常发动反对资本家和政府的起义。1832年6月5日趁共和主义活动家,帝国时期将军拉马克出殡之际,巴黎共和派联合几万名工人、手工业者、学生举行示威

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工人们构筑街垒，树起旗帜，与政府军和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激战。6月6日，最后一批起义者在圣梅里修道院内被全部杀害。

1831年里昂起义和1832年巴黎暴动被镇压后，工人和共和主义者都感到有加强联合的必要。1832年底，巴黎丝织、服装、镀金工人形成自己的组织，不久推广到外省。1833年出现第一批工人生产合作社，有些行业组成全国性联合会，如排印工作协会。这些组织的目的首先是迫使雇主增加工资，在遭到拒绝后即支持罢工运动。1833年全年爆发行业的罢工，波及南特、昂赞、圣太田、里昂、巴黎等城市。工人运动与共和主义运动开始发生联系，“人权与公民权协会”是他们联系的桥梁。

从1837年开始的美国经济危机到1838年也波及到法国，使许多银行破产。加上谷物歉收，粮价上涨，失业工人增多，社会骚动日渐增多。以巴尔贝斯和布朗基为首的秘密组织“四季社”利用政府危机，于1839年5月12日在巴黎发动起义。但这次起义很快被政府军所镇压。

1840年也是工人运动高涨的一年。1840年7月1日，在巴黎的贝尔维尔区举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者聚餐会，有1200余人参加。与此同时，争取扩大选举权的斗争也在积极开展。这次运动在巴黎和法国20多个城市掀起，要求实行普选制和“新劳动组织”。1840年9月，在全国有10万多工人离开劳动岗位，露天集会。工人们要求：1. 减少工时；2. 确定工作日的单价；3. 取缔包工工人和包工者。^①

1846年和1847年，在物价上涨和粮食奇缺的情况下，工人的罢工斗争和革命运动更为高涨。1847年7月，在塔尔纳、牟罗兹、里尔和夏郎德等地都发生了暴动。据《阿尔萨斯邮报》报道，在牟罗

^① [法] 乔治·莫朗热：《七月王朝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第22页。

兹，机器制造业工人组织了和平示威游行。星期六早晨，约有 400 多名工人到市政府要求降低面包价格。到中午，参加这一行列的人们越来越多，纺织工人、童工和流浪儿都参加了这一斗争。当纺织童工和流浪儿打翻市场上的苹果篮和蔬菜篮子时，人群便骚动起来，并捣毁了面包房。这次暴动一直发展到政府动用军队镇压。结果 120 个工人被捕。在北龙扎斯爆发了反饥饿的暴动。在这次暴动中杀死了两个囤积粮食的地主。为此，政府残酷地镇压了暴动者。但是，残酷的镇压不仅没有阻止人民暴动，而且使革命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了。

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政治形势，对法国统治阶级是个莫大的威胁。路易·菲力浦为了避免革命的发生，建立稳定的政权，他决定任用基佐，与他合作。虽然老朽的苏尔特元帅 10 月 27 日已被任命为首相，但内阁的实权掌握在国王和外交大臣基佐手中（基佐于 1847 年正式接替苏尔特为首相），直到 1848 年 2 月革命把路易·菲力浦和基佐一齐推翻。

社会主义流派

在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壮大促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也促进了新的社会学说的产生。七月革命以后的时期内，主要有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十分活跃。一个是空想共产主义，一个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19 世纪 40 年代，法国的空想共产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适应了当时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反映了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公开提出了共产主义纲领。它同以前的空想共产主义相比较，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卡贝、布朗基、德萨米、皮佑等。

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 年）是 19 世纪上半期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卡贝加入了秘密革命团体烧

炭党,属于该组织的左翼,即共和派。七月革命发生后,他积极投入了战斗。1833年,卡贝创办了《民众》杂志,并在这杂志上宣传阶级调和论和非暴力论。他主张不掠夺富人,但要使人富裕;不屈辱统治阶级,但要提高人民的地位;不采取暴力,要进行说服。卡贝因此被七月王朝视为异己分子,反动派把“打倒共产主义”和“打倒卡贝”并提。于1834年对他进行了法庭审讯。卡贝被迫流亡到英国。在那里,他受到欧文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逐渐从一个共和主义者转变为空想共产主义者。



图1 埃蒂耶纳·卡贝

所以,在1839年回到法国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很有声望的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840年,卡贝写成了《伊加利亚旅行记》这部著名的哲学和社会小说。在这部著作里,卡贝描述了他所幻想的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伊加利亚。这是一个消灭不平等、废除私有制和取消货币,而代之以一切平等和财产共有的制度。在这个社会里,一切工厂、土地归大家所有,工业生产是高度工业化的集体生产,农业生产则是个体劳动,教育被提高到了极端重要的地位;实行各尽所能,产品由国家无偿分配,人人平等,人人幸福。在这个社会里,人民是主人,各级领导人都是由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或公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公民轮流担任各种公职。卡贝的这种共产主义尽管还是一种比较粗糙、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即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从而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因而受到了当时法国工人群众的赞扬。到40年代中期,伊加

利亚运动在全国有几万拥护者。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学说和未来目标开始在工人中传播。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是19世纪空想共产主义者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

1835年,布朗基组织了秘密的革命组织——“家族社”,因泄露了暴动计划而遭逮捕。1837年,布朗基被流放到乡村,在流放期间又组织了秘密团体“四季社”。“四季社”在巴黎密谋起义。但起义刚一发动,就被反动军队镇压下去了。

1848年革命发生后,布朗基积极地参加了巴黎二月革命,他和德萨米组织了“中央共和社”俱乐部,并以这个俱乐部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中心。

布朗基深刻而敏锐地观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与弊端,因此,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了仇恨,猛烈地抨击和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和不合理。

布朗基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是由于他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没有认识清楚,不能正确地找到革命的真正动力。他把无产阶级、贫民、人民混为一谈。不能正确地确定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应有的地位,因而不理解无产阶级意识的提高和无产阶级组织发展的意义,更不了解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和群众性的工人政党才能实现社会革命的原理。因此,布朗基虽主张暴力革命,但是,他所说的革命不是阶级的发动,而是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暴动。布朗基主义者虽然多次密



图2 路易·奥古斯特·
布朗基

谋起义,但是,由于他们不去发动群众,不作革命前的准备工作,所以尽管在起义中表现得英勇果敢、刚毅不屈,但结果都失败了。

狄奥多·德萨米(1803—1850年)是19世纪40年代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30年代他就参加了秘密的革命团体“四季社”。1840年,他创办了《平均》杂志。1842—1843年,德萨米出版了《公有法典》一书,这本书较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共产主义学说。1848年,他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加入了布朗基所领导的“中央共和社”,成为1848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

德萨米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充满了灾难和痛苦的时代,无产阶级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生活在赤贫之中。他认为,这些罪恶的根源都在于私有制。为了消除这种罪恶,德萨米主张进行社会革命,建立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财产均为公有,人人都从事劳动,同等地享受自己的劳动产品和一切福利。这个社会是一个团结一致的联合体,人们利害相同,祸福与共。在德萨米看来,公有制中包含着自由、平等、博爱和统一,它是一种最符合人的本性、最符合科学和理性要求的制度。所以,他高呼:“公有制!公有制!一切好的、优美的东西,都在这个名词中概括地叙述出来了。”^①

德萨米虽然不倦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投身于工人运动,但是他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使命,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即不是真正的工业无产阶级,而是指所有贫困不幸的穷人。因此,德萨米没有发现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创造者,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让·雅克·皮佑(1808—?)是19世纪40年代又一位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家。1839年,皮佑开始创办《人民论坛周报》,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学说。当局曾以他有参加1839年5月布朗基起义的嫌疑,将他逮捕入狱,判处6个月的徒刑。出狱后,皮佑继

^① 狄·德萨米:《公有法典》,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页。

续宣传他的共产主义学说。同时，他还写了著名的《既无宫廷，又无茅屋》、《平等人的历史》等著作。1848年革命发生时，皮佑担任一个革命俱乐部的主席。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皮佑被驱逐出法国，流亡到巴西。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后，皮佑当选为公社委员，成为公社著名的活动家。公社失败后，他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苦役，由于残酷的折磨，死于狱中。他的死期至今尚未查明。

《既无宫廷，又无茅屋》一书，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在这本书中，他以鲜明和坚决的态度对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在各民族中间都有两个特权等级，即僧侣等级和贵族等级。他们总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统治人民。在贵族僧侣特权被打倒后，资产阶级变成了新的特权阶级。资产阶级欺压和剥削人民比旧的特权阶级更加残暴，更加无耻。因此，他决心对资产阶级决一死战。

皮佑在分析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得出结论说：这个社会仍然存在着暴君和奴隶、主人和奴仆之分。因此，他断言未来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的革命必须走另一条道路，具体地说，就是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绝对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既没有富人的宫廷，也没有穷人的茅屋，既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在这个制度下，“一切都归众人享用，谁也不许占有它，谁也不许滥用它”^①。

但是，皮佑在论证公有制度时是从唯心主义的“自然法”的观点出发的，即认为大自然本身普遍赋予人类共同享受它的一切财富的权利，而公有制恰好符合自然界中这一条永恒不变的规律，所以它是一种最好的制度。这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条件来阐明公有制乃是历史的必然性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根本不同

^① 皮佑：《平等人的历史或在人间建立绝对平等的方法》，《皮佑选集》，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6页。

的。因此，皮佑所主张的绝对平等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空想。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当时法国的又一个社会主义流派。它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它从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角度，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替工人说话，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其代表人物有路易·勃朗和蒲鲁东。

路易·勃朗(1811—1882年)是法国历史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38年，路易·勃朗创办《政治、社会和文学进步评论》。1840年他的重要著作《劳动组织》出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从1843年起，路易·勃朗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刊物《改革报》的编辑。这时，路易·勃朗在工人群众中已比较闻名了。二月革命发生后，路易·勃朗便积极地参加了革命。二月革命胜利后，他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临时政府。但是参加临时政府以后，他并没有坚持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

路易·勃朗在他的《劳动组织》一书中，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严厉地斥责了资本主义制度给劳动人民造成的贫困。他写道：“谁都知道，贫困把教育局限到可耻的地步，因而使人们的智慧埋在黑暗里。贫困经常使人们牺牲个人的尊严，而且几乎总是由贫困来决定这种牺牲。贫困使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降到从属的地位，因此，贫困就是人类的道德中隐藏着一种新的痛苦，并且把人们内心所具有的慷慨心情变为怨恨。”^①

在这本书中，路易·勃朗不仅谴责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贫困，而且还对资本主义竞争的危害性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对于人民来说，竞争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②在资本主义社会，竞争首先是拍卖劳动力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必然引起工

① 路易·勃朗：《劳动组织》，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页。

② 路易·勃朗：《劳动组织》，第24页。

资的普遍下降,工人生活的进一步贫困化。因此,路易·勃朗得出的结论是,竞争是劳动群众贫困的根源。

为了消灭贫困,消灭竞争,建立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路易·勃朗提出了改革社会的方案。他认为“有效而合理的感化制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一种健全的劳动组织”^①,即社团性质的社会工场。这种工场由资产阶级政府出资来创办,工场的规章制度和管理人员均由政府制定和指定。通过这种工场即可以和平地而不是暴力地兼并私人企业,最后消灭它们,从而消灭竞争和贫困。在路易·勃朗的这种阶级调和论的影响下,“劳动组织”、“阶级合作”等思潮成为40年代工人的流行词汇和理想。1848年革命后设立的“国家工场”就是这种学说的体现和失败的尝试,证明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年)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庸俗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者。1848年法国革命前后,蒲鲁东积极从事资产阶级政治和社会改良活动。革命前,他拥护基佐政府的政策。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后,他向资产阶级共和派靠拢,被选入立宪议会。他追随资产阶级,竭力阻止工人从事政治斗争,鼓吹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改良纲领。

蒲鲁东的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立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察也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立场出发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主要灾难和矛盾的根源是私有财产的高度集中化,是大资本家破坏和吞并了小生产者。劳动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交换条件,在于货币、信贷资本的统治,在于被榨取利息。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公平的交换是万恶之源,而要消灭这一罪恶,就必须改革交换和信贷,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一种可以根据平等条件进行交换的相互关系。为此,蒲鲁

^① 路易·勃朗:《劳动组织》,第47页。

东提出了一个空想的、不用货币的交换和没有利息的信贷方案，作为改造社会的主要手段。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蒲鲁东主张建立互助会和合作社。这些组织应由工人用自己的储金来建立，而国家通过发放低利率长期贷款来帮助这些社团。这样，合作社和互助会将逐步在全法国获得扩大和巩固，那时社会主义——普遍正义的王国就会到来。

1846年，蒲鲁东发表了《贫困的哲学》一书，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学说，反对一切政府、国家、组织、制度、法律，认为国家和政府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强制和压迫。工人的命运不能由革命和取得政权来解决，相反，为了获得自由，“要把政权与垄断一齐打倒”。因为，“就其原则的本质而言国家是反革命的”。所以蒲鲁东主义者有一句名言，那就是“不统治人，也不受人统治”。从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出发，蒲鲁东幻想用和平方法“消灭国家”，而代之以由个人、生产者协会和团体“自由协商”和“自由结合”的社会。实质上就是把国家变成保护和巩固小私有者的工具。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系统地批驳了蒲鲁东的这种理论。

反对七月王朝的政治斗争

统治七月王朝的金融贵族，包括了银行家、交易大王、铁路大王、大矿山主、大森林主以及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在这些人当中，就其出身或致富的主要来源而论，一部分属于高利贷资产阶级或工商业资产阶级，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化的贵族。

国王路易·菲利浦是金融贵族集团的代表。他本人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森林所有者，也是大金融资本家。他直接参加过法国交易所经纪人和银行家的投机活动。以路易·菲利浦为代表的金融贵族集团实行只有利于本集团利益的对内对外政策，成了“剥削

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①。

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极为腐败。当时法国的众议院至少有3/5的议员是内阁的亲朋密友。这些人不是大资本家、大商人、巴黎交易所的投机家、银行家和大工业家，就是他们的恭顺奴仆。当时决定法国命运的不是土伊勒里宫，也不是贵族院和众议院，而是巴黎交易所。“真正的大臣并不是基佐和杜沙特尔这些先生，而是路特希尔德先生、富尔德先生和巴黎其他的大银行家，这些人的巨大财富使他们成为本阶级最有权势的代表人物。”^②他们操纵着内阁，而内阁完全按照金融贵族集团的意志办事。所以，苏尔特内阁（1840—1847年），特别是基佐内阁当政期间（1847—1848年）是七月王朝最腐败、最反动的时期。基佐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君主立宪人物。他既仇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也顽固地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他对内执行有利于金融贵族的政策，对外支持反动的“神圣同盟”，镇压各国革命。在苏尔特和基佐统治的8年中，剥削残酷，赋税繁重，物价上涨，民不聊生。

基佐政府的反动和腐败使工业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更加激烈。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实行社会改革、反对王朝、建立共和的宣传鼓动遍及全国。

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将各个不同的阶级暂时联合在一起。他们虽然都为推翻七月王朝而共同努力，但是由于其政治和经济地位不同，在斗争中形成了各个政治观点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根据各自的阶级地位和政治主张提出了自己的目的和要求。

王朝反对派。以梯也尔和巴罗为首的王朝反对派，由奥尔良分子组成。他们多数是巴黎的大资产阶级，其中一些人是议员。这个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4页。

^② 恩格斯：《法国的政府和反对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0页。

派别只要求扩大选举权，进行社会改革，要求结束高利贷大王路特希尔德一帮人独揽大权的局面，恢复法国在外交上独立而光荣的地位。他们并不反对君主制，所以也被称为资产阶级君主派。

资产阶级共和派。这个派别是由两个迥然不同的集团——以阿尔芒·马拉斯特为首的《国民报》^①派和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改革报》派所组成的。《国民报》派是由一些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等所组成。它反对七月王朝的君主制，极力鼓吹共和思想，捍卫保护关税制度，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国民报》派得到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拥护。《改革报》派多为没有选举权的小作坊主、小店员、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小知识分子。他们不仅要求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国，而且主张实行社会经济改革，改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群众的生活条件，实行普选权。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中比王朝反对派坚决些。但是，共和派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当它遭到金融贵族的打击和迫害而感到痛苦时，便拥护革命，赞成革命，希望通过革命来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处境；当革命深入发展，特别是当无产阶级勇猛地参加革命，并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时，资产阶级共和派便立即感到革命是对自己的威胁，于是他们就害怕革命，阻止革命的发展，甚至公开反对革命。

社会主义派。这个派别包括工人群众、城市贫民和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是七月王朝最激烈的反对者，在斗争中他们坚决要求推翻王朝，建立“社会共和国”；要求实行普选权，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但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他们既没有坚强的革命组织也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加之各种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使他们对自己的目标还认识不

^① 《国民报》是从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40年代它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

清。因此，在二月革命当中，它只是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同盟者。

尽管这些派别的阶级立场和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但是，在革命斗争中，它们却暂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摇摇欲坠的七月王朝。1839—1840年，它们在巴黎和外省纷纷成立了拥护改革委员会，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这些派别的代表人物懂得，只有扩大选民范围，才能保持他们在两院中的席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反对派便掀起了争取选举改革运动的高潮，各派的代表人物联合组织了支持选举改革的示威游行，并且发起了宴会运动。此种宴会并非盛宴贵宾的佳肴，而是法国特有的一种集会形式，人们公开评论政府政策，提出政治见解。在宴会上，各个政治团体公开发表演说，并根据自己的观点提出政治性的祝酒词。工人群众支持这种宴会运动，有时工人群众也举行这种宴会。1840年7月1日工人在巴黎贝尔维尔郊区举行了共产主义者宴会，这次宴会由德萨米主持，参加宴会的工人在祝酒词中提议：“为无产阶级、为剥削者的牺牲品而干杯！”“为平等分配权利和义务，为共同劳动和共同享受福利而干杯！”于是，宴会便成为组织群众的政治集会和宣传改革选举制度的一种手段了。

革命形势的成熟

1847年至1848年初，七月王朝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相当严峻，它正面临着—一个与1788—1789年、1829—1830年相类似的危机时期，它预示着革命即将到来^①。

1845年和1846年发生的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以及1847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法国，使法国的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1847年巴黎的工业生产总值为146300万法郎，1848

^① 参阅E·拉布鲁斯：《1848—1830—1789：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

年则降到 67700 万法郎。严重的经济危机急剧地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成熟和革命的爆发。

在经济危机的笼罩下,财政危机日趋严重,1847 年法国财政赤字达到预算总额的 25%。工厂纷纷倒闭,许多小商人和小工厂主宣告破产,致使金属加工业产品、亚麻织品、毛织品、丝织品以及其他许多产品生产额大为下降,产销锐减。这时巴黎的大商人因无力再在国外市场上经营生意,进行竞争,便不得不转为经营国内贸易。他们在国内所展开的竞争,很快就使许多中小商店倾家荡产。这些破产的小店主和小商人在二月革命中大多参加了革命斗争。

在危机和歉收的影响下,大批工厂倒闭,许多工人失业,有的地区失业工人占 2/3 以上,在业工人的工资也降低了 50%—60%;地主和资本家所进行的粮食投机,使粮价急剧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更是急剧恶化。为了活命,广大劳动人民便掀起了抢粮运动。在 1847 年掀起的抢粮风潮中,不少群众自发地起来捣毁地主的庄园,强占粮仓,打死粮食投机商。饥民骚动事件几乎遍及全国。工人群众也不断地掀起罢工斗争,而且往往是和农民一起,同军警进行流血搏斗。在 1840—1847 年的历次罢工斗争中,特别突出的是里弗——日耶矿工的 4 月罢工(1844 年)和南特市泥瓦工人的 7 月罢工(1847 年)。矿工的罢工斗争延续了约 1 个半月之久,泥瓦工的罢工斗争持续了 3 个月之久。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标志着革命形势的成熟。

在革命即将来临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各个反对派也藉群众运动高涨的形势,积极展开了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又一次掀起了宴会运动。1847 年 7 月 9 日,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宴会。参加这次宴会的有 84 名代表和 1200 名客人。这次宴会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此后宴会运动在全国普遍展开,从 1847 年 9 月到 10 月,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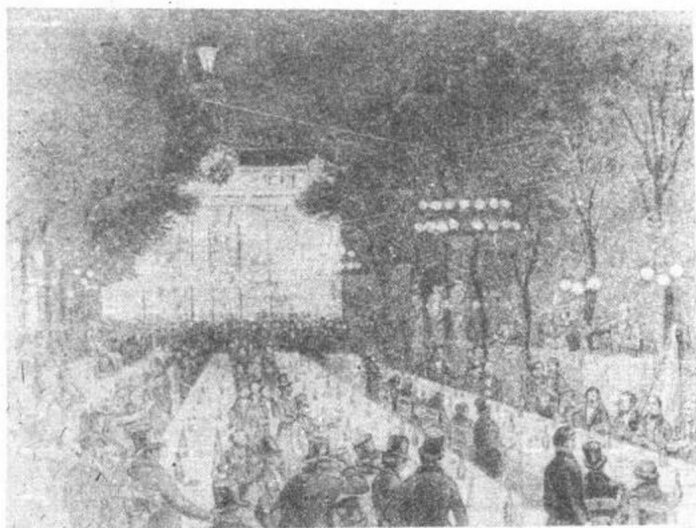


图3 1847年的一次宴会

举行了70多次宴会,共约1.7万人参加宴会^①。

日益高涨的革命斗争使路易·菲利浦和基佐内阁惊恐万状。为了阻止革命斗争的发展,基佐内阁凭空捏造了一个关于共产主义者协会“阴谋反对政府、反对私有制和教会”的假案,以此为理由对共产主义者协会进行了审判。基佐内阁的目的是藉审判恐吓革命者。结果,与反动派的意愿相反,这次审判不仅没有达到恐吓革命者的目的,反而大大促进了工人革命情绪的高涨。正如恩格斯1847年11月在说明巴黎工人的情绪时所指出的:“这里的工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深深地感到必须进行革命,而且是远比第一次更为彻底、更为激烈的革命。……关于革命,他们却谈得不多,因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是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问题;一旦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他们会立刻出现在大街和广场上,

^① 尼·扎斯金克尔:《1848年法国革命》,第26页。

挖断马路,把公共马车、运货的和载客的马车都放倒横在街上,把每一条通路堵死,把每一条小巷变成一座堡垒,并且从巴士底广场突破一切障碍直向土伊勒里宫前进。到那时,恐怕出席改革宴会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大部分都要躲在自己家中最黑暗的角落里,或者像枯树叶一样在人民的狂风暴雨中四散飘落。”^①

恩格斯的这番话在3个月后,即1848年2月革命爆发时完全得到了证实。

第二节 巴黎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的爆发

严重的经济危机加深了法国的阶级矛盾,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资产阶级各个派别反对金融贵族统治的情绪日益高涨;深受失业与物价上涨之苦的巴黎和外省的工人的骚动日趋频繁。这种状况说明,革命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1847年12月28日召开的立法议会表明,金融贵族统治集团不仅不同意对选举改革的要求作出任何让步,而且对资产阶级反对派发动了进攻。国王路易·菲力浦在立法议会上发表了演说,声称反对派为改革而进行的努力和宣传是“敌对的和盲目的热情”^②,并且表示政府决不作出任何让步。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反对派决定利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争取选举制度的改革。为此,他们决定于1848年1月19日,再次举行盛大宴会,展开声势浩大的选举改革运动。

国王路易·菲力浦认为选举改革运动对自己是一个严重的威

^① 恩格斯:《法国的改革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01—402页。

^② 尼·扎斯金克尔:《1848年法国革命》,第29页。

胁，于是命令基佐内阁拒绝任何改革要求，严厉镇压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下令禁止资产阶级反对派预定于1月19日在巴黎举行的宴会活动。反对派的议员激烈地批评了政府的这一禁令。2月13日，反对派的议员又重新集会，讨论当时的形势和以后的行动。与会者一致决定参加第十二区的宴会，并为组织这次宴会成立了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议员、记者和其他政治活动家。

由于政府的阻止，1月19日的宴会改在2月22日举行，同时准备在这一天组织一次和平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破坏集会自由。但政府下令禁止一切政治集会和游行，并且准备必要时使用武力。这时，资产阶级反对派便开始屈服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一切准备均已就绪，餐厅已布置好，正待客人赴宴。当行动时刻到来时，忽然间，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左派胆小鬼，和往常一样，怯懦地退却了。”^①

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不甘心退却的。他们在2月22日早晨，冒着大雨，在指定参加示威游行的地点马德兰广场上集合，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当时的政府新闻：宴会被禁止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退却。

11点钟，约700名大学生唱着《马赛曲》来到马德兰广场。游行队伍迅速扩大。人们随即向波旁宫出发，他们唱着《马赛曲》，高呼“改革万岁！打倒基佐！”的口号绕过七月圆柱，沿着林荫大道继续前进。

从潘庭广场出发的游行队伍也向波旁宫推进。守卫在索格拉西埃大桥的巴黎自卫军试图阻止游行队伍，但是被游行队伍冲散了。这时，示威游行便迅速地向王宫冲去。重新被派来守卫大桥的自卫军把聚集在索格拉西埃广场上的人群撵跑了。游行示威者开始分散在临近的各条街道上，并开始拆毁桥梁，推翻公共马车，

^① 恩格斯：《巴黎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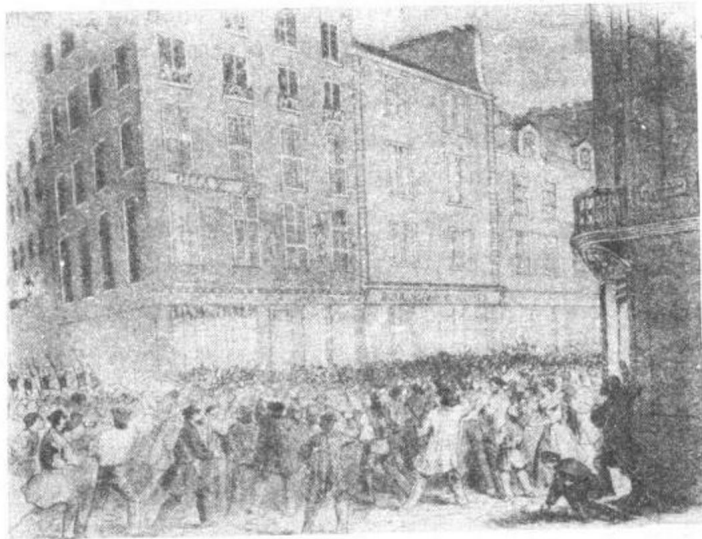


图4 圣安东郊区的人民骚动

修筑街垒。军队遭到了石块的袭击，武器铺也被群众捣毁，他们从那里夺得了枪支和其它武器。

在这一天，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又一次试图推翻基佐内阁。奥迪隆·巴罗向议会主席团递交了书面建议，建议对基佐内阁所犯危害国家荣誉与利益的罪行，追究法律责任。基佐及其部长被弹劾的理由是：在国际上，他们侮辱了法国的民族尊严，危害了法国的切身利益；在国内，他们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推行了“公开贪污的制度”。但是，在议会中只有53名议员有勇气在这份弹劾书上签名，而大部分忠于政府的议员则否决了这一弹劾书。

傍晚，政府仍然深信，当天所发生事件的结局是美好的。随着黑夜的来临，街垒战斗停止了。这时，政府便以事件的主宰者自居，命令部分军队回兵营休息。

二月革命的经过

但是，事件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政府的预料。2月23日早晨，街垒战斗又开始了。街垒战斗的规模越来越大，参加街垒战斗的工人越来越多，起义者与军队之间的对抗情绪也越来越严重了。但是，由于与起义人民频繁的冲突和接连不断地向起义人民进攻，不仅使士兵和军官疲惫不堪，而且也使他们受到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的感染，转变了立场，站在起义者方面。这主要是因为国民自卫军大多数士兵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十分同情选举改革的要求，同情起义人民。因此，2月23日，当政府再次派国民自卫军镇压群众时，士兵的情绪非常低落。不愿同起义者作战。同时，在国民自卫军中也不断地有人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的口号。其中有一个军团向议会递交了要求基佐辞职的请愿书，整个军团都站在起义人民方面。

国民自卫军支持选举改革，同情起义人民的消息传到王宫后，引起了路易·菲力浦的极大惊慌。在这种形势下，国王便决定牺牲其宠爱的基佐，以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于是，路易·菲力浦授权莫尔组阁，希望自由派中这个享有声望的莫尔能够帮助他平息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很显然，基佐垮台而代之以莫尔组阁的消息，在资产阶级反对派中引起了莫大的欢欣鼓舞，因为资产阶级“王朝反对派”所梦寐以求的基佐内阁辞职，很长时间内没能达到目的，而这时，却在片刻之间如愿以偿了。因此，许多资本家的住宅都张灯结彩，认为革命胜利了。以示庆贺。但是，巴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再也不受骗了，他们认为革命并未胜利，无论莫尔或者基佐，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该反对的人物。起义人民并没有放下武器，仍然继续守卫街垒。

2月23日晚，在卡普茨林荫大道上发生的流血事件对战斗进程有着很大的影响。当部分国民自卫军与起义人民共同组织的队

伍向基佐住宅推进时，受到了一个步兵营的阻拦，他们把守了通向基佐住宅的所有入口和街道。在这种情况下，示威游行便派代表与营长谈判。但在谈判时，士兵向群众开了枪，当场6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这一挑衅性的事件立即传遍全城。于是，手持火炬的人群护送着装载尸体的大车，沿着巴黎工人住宅区缓缓地前进。队伍中发出了响彻云霄的呼喊声：“拿起武器！他们杀死了我们的兄弟！”于是成千上万的工人、手工业者、大学生和其他劳动人民满怀对七月王朝的仇恨，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罪恶的七月王朝发动了进攻。由布朗基及共和派左翼秘密协会的领导人所领导的4000多工人，都积极地参加了这次战斗。在整个战斗中，工人住宅区的妇女和儿童不停地制造子弹，男人千方百计地寻找武器和修筑新的街垒。一夜间他们就修起了1500多个街垒。起义者勇猛地攻下了科学院和工业部和哨所，并将其焚烧。土伊勒里宫附近的兵营也被焚烧了。

当起义形势急剧发展时，路易·菲力浦向比若元帅发出了指挥军队的命令。比若是人民不共戴天的仇人，1834年巴黎共和派起义时，他是以血腥屠杀特兰斯诺恩居民而著称的“英雄”。这时，国王选择这样一个残酷而又粗暴的反动分子指挥军队，就说明路易·菲力浦已经决定，将不惜以任何代价，用最残酷的办法镇压起义者了。

为了便于比若镇压起义人民，路易·菲力浦还决定对资产阶级反对派作出一些较明显的让步，以稳定资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的情绪。为达此目的，国王便急于组成新内阁。由于事态的迅速发展，受权组阁的莫尔尚未来得及组成新内阁，国王便又任命梯也尔接替莫尔，并委托他与王朝反对派的领袖奥迪隆·巴罗共同组织了新内阁。2月24日凌晨2时，国王将梯也尔召进宫内，向他解释了急于组成新内阁的原因，国王说道：“我需要你们的声

望。”^①

君主派的领袖们完全同意参与这一反人民的阴谋，并且扮演了国王让他们扮演的可耻角色。梯也尔和巴罗到市区宣布了国王作出的新的让步，试图说服起义者停止战斗，而与此同时，比若却迅速地作出了镇压的计划。计划规定，以塞巴斯吉昂和贝多将军指挥的五支军队必须从四面八方向城市的中心据点同时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拆除道路上的街垒，消灭起义者。比若大言不惭地宣称：“我终于有机会射击这些恶棍了。”^②

从2月24日开始，起义人民对政府的各个主要据点：市政厅、兵营、广场和哨所等，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这时，巴黎的城郊也被起义者占领了。一些郊区的居民占领了哨所，阻拦从外省调来支援政府的军队。他们守卫着通向巴黎的道路，不许援军通过。在巴黎城内，政府的据点越来越少了。从2月24日早晨起，市政厅的兵营周围的大部地区已控制在起义人民手中。政府军队开始撤出巴士底广场和文森城堡。上午11时，起义者又占领了格列夫广场。塞巴斯吉昂将军的纵队非常困难地打开了通向市政厅的道路，而贝多将军的纵队则被圣杰尼大街上的街垒所堵截，受到起义者的沉重打击。各军队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军队的士气越来越低落，比若的作战计划被打乱了。在这种情况下，比若的司令部开始混乱。一些资本家，如大商人法维尔·杰利亚巴尔劝说比若放弃自己的计划，不要再使形势继续恶化。开始时，比若犹豫不决。但是，当起义人民又取得新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比若看见大势已去，以武力镇压起义已不可能，便同意了法维尔·杰利亚巴尔的建议，放弃其计划，命令贝多将军停止战斗并退却。

① 尼·扎斯金克尔：《1848年法国革命》，第36页。

②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52年，第1卷第169页。

二月革命的胜利、

军队已失去作用，七月王朝覆亡在即，梯也尔慌慌忙忙地跑进王宫，企图说服国王路易·菲力浦再作出一些让步。无可奈何的路易·菲力浦只好根据梯也尔的建议，任命以自由主义而著称的拉莫里埃尔将军指挥国民自卫军。当拉莫里埃尔和巴罗又试图说服起义人民停止战斗时，街垒战士表示了强烈不满与反对。革命群众以高昂的“打倒梯也尔！打倒巴罗！打倒路易·菲力浦！”的口号声回答了国王的再次让步。

革命形势的发展，时时威胁着宫廷的安全。宫廷内乱作一团。这时，梯也尔又偷偷地溜进王宫，建议国王将军队、政府和议会从巴黎撤到外省的圣克鲁，然后，利用外省的军队向巴黎反扑。但是，路易·菲力浦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希望能再鼓起军队的士气，来扭转危险的形势。为此，国王决定举行一次阅兵式。阅兵式在卡卢谢尔广场举行。路易·菲力浦骑马到达卡卢谢尔广场后，立即开始了检阅。在检阅队伍时，路易·菲力浦听到“改革万岁！”的口号声要比“国王万岁！”的欢呼声大得多。路易·菲力浦被这种口号声吓得面如土色，不知所措，他情不自禁地小声说：“我已经同意改革，已经同意了！”^①阅兵式刚结束，惊魂未定的路易·菲力浦便迫不及待地回到了王宫。

到此，国王企图拯救七月王朝的一切手法都用尽了，而起义人民的进攻仍在继续着。他们开始了对王宫——土伊勒里宫的进攻。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巴黎郊区市政机关的官员竭力劝阻起义人民进攻土伊勒里宫。但是，共和派秘密协会的领导人起义人民的行动给予了有力的指导。他们在林荫大道上散发传单，告诫起义人民，不要忘记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传单写道：“公民们！

^① 尼·扎斯金克尔：《1848年法国革命》，第38页。

你们又一次以自己的英雄行为战胜了专制制度。但是，你们在1789年的7月14日、1792年的8月10日、1830年的7月29日都战胜过它，可是，你们每一次的胜利成果都被窃取了……最后，让这些例子作为你们的教训吧！……迅速地采取果断的决定。立即进攻土伊勒里宫，夺取它……要特别小心，不要相信那些骗子，不要相信那些胆小如鼠、平庸无能的人……拿起武器，进攻土伊勒里宫！”^①

进攻土伊勒里宫的战斗开始了，它是从射击沙托·德·奥要塞开始的。在这里，起义人民遇到了要塞卫戍部队的有力反抗。因此，在要塞周围便展开了顽强的、流血的战斗。当起义人民逼近王宫、袭击王宫时，路易·菲力浦已经不能再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这时，资产阶级记者埃米尔·日拉尔德向路易·菲力浦论证说，拯救王朝的唯一办法是他自己宣布退位，立其年幼的孙子巴黎伯爵为国王，其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为摄政王。这件事决定后，国王及其家族便乘坐马车，在骑兵连的保护下，逃出巴黎，流亡到英国。

于是，起义人民占领了土伊勒里宫。他们把路易·菲力浦的半身铜像抛到窗外，用刺刀捣毁比若的像片，并撕得粉碎，他们对准苏尔特元帅的像片开枪射击，把写在像片上的名字涂掉，改写为“祖国的叛徒”几个大字。约下午3时，国王的宝座被搬到巴士底广场上的烈士纪念柱前焚烧了。

为了拯救王朝，奥尔良公爵夫人及其子女便留在波旁宫内。她迫切希望承认其长子享有国王的权利，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王朝反对派也希望达到这一目的。因为这样一来，巴罗就可以成为“法定”的内阁总理。于是，巴罗便立即将确立摄政和自己出任内阁总理的消息通知各省地方官吏，并且派遣特使到巴黎郊区市政机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173页。

关,建议他们号召国民自卫军支持新政府。接着巴罗便召开立法会议。在会上他发表了保卫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摄政权利的演说。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议员坚决反对摄政,要求成立临时政府。于是,参加立法会议的代表便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时,武装的起义人民冲进会议厅。他们宣布:“既不要国王,也不要摄政王,共和国万岁!”他们登上讲台,高呼“打倒议会!共和国万岁!”的口号,驱散了立法会议,粉碎了资产阶级保留君主制的阴谋。王室在随从保护下,逃出王宫,前往圣克鲁。不久,国王、王室和基佐先后逃到英国。起义人民取得了二月革命的胜利。

巴黎二月革命的胜利,加速了各国群众运动的发展,促成了各国革命运动的爆发。德国三月革命、米兰三月起义、维也纳三月革命、佩斯三月革命、波兹南三月起义和捷克三月民主运动等,都是在巴黎二月革命胜利的欢呼声中和本国革命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爆发的。

第三节 临时政府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临时政府及其阶级实质

正当巴黎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焚烧王座、驱散立法会议的时候,资产阶级趁机窃取了革命果实。2月24日晚临时政府在市政厅大厦宣布成立。临时政府由11人组成,其中2人为王朝反对派,5人为资产阶级共和派,2人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2人为工人代表,即路易·勃朗和阿尔伯。马克思指出:“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

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①重要的职位都被资产阶级所窃取。主席由杜邦·德·累尔担任，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律师，是参加18世纪末大革命的老社会活动家之一（1848年他已80岁了）。事实上，政府首脑的权力控制在任外交部长的拉马丁手中。他的雄辩的口才加强了政府对人民的影响，他昨天的君主制主张可以抚慰欧洲各强国，而他今天温和的自由主义又可以安慰法国的资产阶级。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阿拉贡任海军部长，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派，由于他常发表关心工人并同情他们困苦处境的演说，因而在人民群众中享有盛名。担任社会工作部部长的是马利，担任司法部部长的是克列米埃。昨天是君主派，而今天又是共和派的商业经纪人加尼埃·巴热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内务部长的位置给了赖德律·洛兰。其他如路易·勃朗、弗罗孔、马拉斯特、阿尔伯均任不管部部长。从参加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领导作用和临时政府职位的分配来看，这个政府的资产阶级实质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

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之所以被资产阶级所窃取，主要是因为当时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农民反对高利贷和反对抵押制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藏在反对金融贵族斗争的外壳之下。王朝反对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反动面貌还没有彻底暴露，它骗取了群众的信任。同时，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加之路易·勃朗和蒲鲁东在工人中间广泛宣传阶级调和及阶级“合作”的谬论，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还抱有幻想，相信不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可以获得解放，认为消灭七月王朝的统治就是消灭资本的统治，因而，它把自己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列在一起，并企图在资产阶级身边捍卫自己的利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7页。



图5 临时政府成员

立者（从左至右）：路易·勃朗、佛罗孔、克列米埃、马拉斯特、阿尔伯、加尼埃·巴热。

坐者（从左至右）：阿拉贡、赖德律·洛兰、杜邦、马利、拉马丁。

益。结果，使资产阶级窃取了革命的成果。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成立

临时政府的人员组成说明，资产阶级不容许二月革命中的同盟者，特别是无产阶级分享一点胜利果实。这引起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许多革命分子的不满和失望。圣安东郊区的战士群情激愤，对直接领导起义的人被排斥在临时政府之外，极为不满。同时，临时政府对共和国问题的模棱两可态度和两种不同的立场，加强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二月革命中，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使资产阶级感到非常忧虑和恐惧，他们希望革命就此结束，不要再继续发展。关于成立共和国的问题，在临时政府中展开了

激烈的争论。临时政府中的右翼温和派阿拉贡、杜邦、马利以成立共和国须交全国人民决定，不能将巴黎的意志强加于整个法国为借口，公开反对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拉马丁实际上支持这一立场，不过他是用漂亮的词句和既能拖延共和国的宣布，又能平息革命人民不满情绪的措辞来表达罢了。参加临时政府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赖德律·洛兰、佛罗孔和路易·勃朗则主张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在讨论临时政府的宣言时又展开了争论，拖延了问题的决定。临时政府这种拖延共和国成立的作法引起了聚集在市政厅和格列夫广场的人民群众的骚动。这时，拉马丁又出头向群众解释，可是这一次，他的漂亮的词句却欺骗不了群众了。工人们坚决要求拉马丁回答问题：“你赞成共和国还是反对共和国？”人群中发出了愤怒的喊声：“你说得已经够多了。”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广大人民群众不允许再拖延共和国问题的解决，而且也不允许再像1830年那样欺骗他们了。他们决心成立一个能给予人民政治自由的共和国。



图6 拉斯帕伊

2月25日早晨，人们又聚集在市政厅前。共产主义者、革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在工人中享有盛名的革命者拉斯帕伊也率领着工人代表团来到临时政府。拉斯帕伊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他宣布，如果这个命令在两小时内不能得到答复，他将率领20万人民到市政厅来质问。当时街垒尚未拆除，工人还保持着强大的武装力量，革命人民实际上还统治着巴黎。在这种形势下，临时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共和制度。在2月25日当天宣布成立了法兰西共和国，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第

二共和国（1848—1853年）。但是，各个阶级、各个派别都按着自己的观点去解释这个共和国。无产阶级要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而资产阶级却要建立巩固其全面统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产阶级窃取政权的情况下，所宣布的这个共和国自然不是无产阶级所要求的“社会共和国”，而只能是资产阶级（包括金融贵族）的共和国，它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制舞衣罢了。

争取红旗和争取“劳动权”的斗争

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革命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共和国的宣布并没有改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和困难处境。这种状况引起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特别是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现象和物价上涨，更使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陷于赤贫的境地。于是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和农民骚动便又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在巴黎和其他城市里，发生了工人捣毁机器、焚烧厂房、袭击粮商的仓库和高利贷者的住宅、攻打征收粮食入城税的税务机关等事件。许多地区都发生农民袭击地主的庄园、痛打并赶走林务官、砍伐国有森林、迫使大地主交还所侵占的村社土地、强令高利贷者交出债据的暴动。巴黎和外省的一些进步人士也出版了几百种报纸，创办了许多俱乐部，其中最著名的俱乐部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尔帕伊领导的“革命俱乐部”，和奥古斯特·布朗基担任主席的“中央共和社”。这些俱乐部猛烈地抨击临时政府，号召人民不要相信临时政府。

在革命继续高涨的形势下，临时政府被迫作了一些让步：在巴黎实行10小时（在外省实行11小时）工作制，颁布大赦，释放一切政治犯，废除政治犯的死刑。废除参加国民自卫军的资格限制（这时工人也可以参加国民自卫军），取消对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限制，规定年满21岁的男子都享有普选权（年满25岁者有资格当选为制宪议会议员），规定议员的薪俸每天为25法郎。选

民的人数从20万增加到930万。这些都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的重大胜利。

无产阶级竭力争取法国国家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可是遭到了临时政府的反对。2月25日，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同巴黎革命工人之间就国旗的颜色问题发生了争执。工人要求临时政府承认代表革命和实行社会改革的红旗为法国国旗。资产阶级反对这一要求，他们把三色旗看作是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象征。经过激烈的争论，临时政府决定保留三色旗，但同意在旗杆上系上红色旗绦（后来旗绦被取消了）。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中，反映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二月革命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性质和任务的理解是不一致的。

但是，当时巴黎无产阶级对于怎样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和国，还不十分清楚。许多工人都错误地认为：只要有工人代表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迫使共和国颁布劳动权利法令，并在政府里设立一个劳动部来保障劳动权，就能够保证社会的根本改造和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巴黎无产阶级接连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资产阶级实现劳动权、成立劳动部、建立工业或农业劳动组织。

2月25日，工人代表团至市政厅递交请愿书，要求立即颁布劳动权法令。拉马丁出面解释，竭力让工人相信临时政府，相信临时政府是关心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的。但是拉马丁的说教却被工人，共产主义者马尔什响亮的声音所打断，他说：“华丽的词藻够多了！诗歌般的语言也够多了！人民不愿意再等待。他们是事情的主人，他们命令你们立即宣布劳动权。”^①路易·勃朗制止了这场争论。临时政府在群众的压力下，根据路易·勃朗的建议通过了劳动法令。在临时政府颁布的法令中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190页。

答应保证工人能用劳动取得生计；答应保证所有工人都能有工作；承认工人们可在他们中间组织团体以享受因他们的劳动而获得的正当权利。”^①

2月28日，巴黎工人又举行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手持旗帜和棍棒，高呼“成立劳动组织！”“成立劳动部！”的口号到达市政厅。拉马丁、阿拉贡和其他政府成员反对示威游行者提出的要求。经过长时间的争论通过了加尼埃·巴热的和解建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常设委员会，要它去探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各手工业同业公会的代表组成，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这个委员会设在卢森堡宫，所以也叫做“卢森堡宫工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它既没有任何经济实力，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力。资产阶级政府把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派去领导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就是藉此机会把无产阶级的代表驱逐出临时政府，把国家的实权和行政枢纽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路易·勃朗明知卢森堡宫工人委员会不能有所作为，但他还是接受了这项新的任命，并且还利用自己的全部威望来破坏工人的革命事业。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使巴黎无产阶级有事可做。……卢森堡宫里在忙着探求点金石，而市政厅里却在铸造通用的钱币。”^②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方面采取欺骗和麻痹无产阶级的手段，另一方面则聚集力量，准备进攻无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了使一部分无产者去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建立了一个对付工人的武装力量。他们用金钱收买了2.4万多个流氓无产者，组成了24营

^① 雷蒙德·威廉·波斯盖德：《1789—1906年革命，文件注释与评介》，波士顿、纽约，豪顿米富林公司出版，1923年，第191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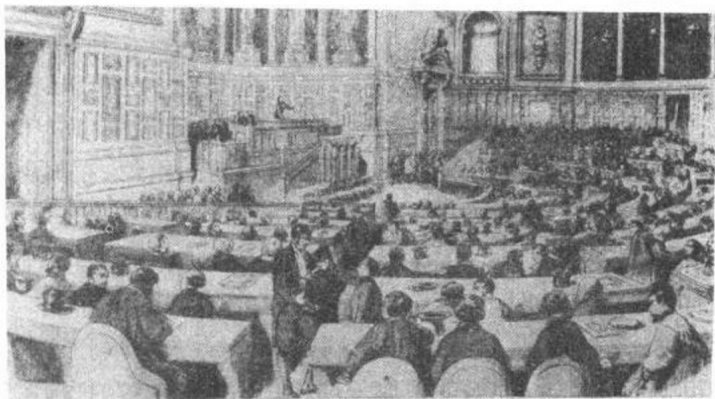


图7 卢森堡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别动队，每营 1000 人。这支别动队能干出最卑贱的盗窃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把它作为反对无产阶级的支柱。

国家工场及其性质

临时政府为了分化无产阶级，企图组织第二支无产者反对工人自己的队伍，临时政府颁布了开办国家工场的法令。临时政府所以同意设立国家工场，并不是实现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学说，因为资本主义方式的劳动组织就是雇佣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前提，所以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时，绝不会允许以其他方式组织劳动。路易·勃朗劳动组织学说的基本观点是政府可以发行公债，用公债的收入创办国家工场。工场的利润分做三份：第一份按工场的人数平均分配；第二份用于对老、弱、病、残者的抚恤以及对其他蒙受损失的工场的支援；第三份用于为扩大生产而购置新的生产资料。从路易·勃朗的主张中可以看出他对资产阶级的妥协。但是，这种妥协也是资产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为资产阶级决不会允许工人分享自己的利润。

临时政府创办国家工场的法令 2 月 25 日就已经颁布了，但到

3月2日才开始接收工人。由于失业工人的人数日益增多,到3月15日进入国家工场的失业工人已达1.4万人;到3月31日增至28350人;4月15日增至64870人;4月30日为99400人;5月15日为113010人;5月31日达116110人;而到6月15日已达117300人了^①。国家工场是一个半军事性质的组织,在国家工场中实行军队编制。每10人组成1个小队;5个小队组成1个分队;4个分队组成1个大队;4个大队组成1个联队。每3个联队由1个长官来统领。“临时政府以为它是通过国家工厂组成了第二支无产者大军来反对工人自己了”^②。同时,临时政府又惧怕这支大军在城市中造成巨大影响,就采取了场长托马斯的建议,把国家工场工人由巴黎市中心迁至郊外蒙梭公园,并且把每个工人的姓名、职业和住址都登记在一张由政府发的卡片上,以便检查。

临时政府为了“惩罚”国家工场的工人,完全安排他们从事单调笨重的劳动。最初,让工人们重新种植林荫大道上的树木,加高巴黎的西站。城内的工作结束后,为了要把他们从城里赶走,又派他们到马尔斯广场去做工。当这些工作完成后,没有旁的工作可做时,就把工人分为有工作和无工作的两部分。前者每日工资2法郎,后者每日工资1法郎,二者轮流做工。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国家工场“在这个响亮名称的后面不过是以23苏的工资雇用工人去进行厌烦单调和效率极低的土工罢了”^③。当工人们由于工资低、生活非常困难而产生不满情绪时,资产阶级就趁机对工人们说:“这就是你们所希望的社会主义呀!这就是劳动权呀!”同时,临时政府为了挑拨工农关系,煽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和社会主

① 埃·拉瓦赛尔:《法国工人斗争史》第2卷,第236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页。

③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页。

义的不满,就以维持国家工场为名,对所有4种直接税(土地税、动产税、营业税和门窗税)每法郎加征45生丁的附加税。对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这时资产阶级使用45生丁附加税来挑拨工农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农民中恶意地宣传说:“这是为了养活工人,工人不但要你们加税,他们还要夺取你们的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一来,农民便把国家工场看成是懒汉避难所,把无产阶级看成是“专靠他们出钱来逍遥享乐的浪费者”。

可见,国家工场是临时政府用来使无产阶级彼此对立、农民与工人对立和破坏社会主义在人们中威信的工具。

3月17日示威及4月16日事件 制宪议会的选举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在4月9日举行制宪议会的选举,以便成立新政府,实现资产阶级清一色的统治。当时,在巴黎工人当中享有较高威信的布朗基所领导的“中央共和社”揭穿了临时政府的这个阴谋,号召人民抵制制宪议会的选举,并于3月17日组织群众示威游行。这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开始向巴黎调集大量军队,企图镇压工人群众。针对这种形势,布朗基派于3月22日发表宣言,揭露资产阶级共和派欺骗人民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宣言写道:“当人们缺少面包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当豪富并列在贫困旁边制造丑事的时候,就没有平等。当女工领着自己饥饿的孩子沿着豪华的宅第乞怜的时候,就没有博爱。”^① 宣言激励着工人们,使他们掀起了新的斗争。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故意制造了4月16日事件。当时在马尔斯

^① 布朗基:《致巴黎民主俱乐部》,《布朗基文选》,苏联科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38页。

广场和跑马场有许多工人举行集会，讨论关于选举问题。突然有一种风声很快地传遍了整个巴黎，就是在马尔斯广场上有大群武装工人由路易·勃朗、布朗基、卡贝和拉斯帕伊领着，打算从那里进攻市政厅，推翻临时政府，成立共产主义政府。这时，临时政府立刻发出总集合警报，在1小时以后调集了10万国民自卫军，所有通向市政厅的道路都被国民自卫军占据了，巴黎全城到处都有人高呼：“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帕伊和卡贝！”于是4月16日便成了临时政府把军队召回巴黎的借口。马克思指出：“3月17日事件和4月16日事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所蕴蓄着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①

4月23日举行了制宪议会选举。选举结果是资产阶级共和派获得胜利。在880个议员中，有550人是资产阶级共和派，212人是君主派，100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工人代表只占18个议席。工人群众的领袖一个也没有当选，布朗基和卡贝等人都落选了。因此，无产阶级对选举结果极为不满，在许多地区驱散选举委员会，与资产阶级政府发生了武装冲突。其中尤以4月27日和28日在鲁昂发生的冲突最为激烈。资产阶级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次工人起义。

5月4日，制宪议会正式开幕，宣布解散临时政府。5月10日，由制宪议会选出一个五人执行委员会，组成共和国的新政府。委员会的成员除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赖德律·洛兰外，其余4人阿拉贡、加尼埃·巴热、马利和拉马丁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右翼分子。工人代表阿尔伯，甚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都被排斥于政府之外。制宪议会和执行委员会不但否决路易·勃朗关于设立劳动部的提案，而且还通过了禁止集会请愿、只准书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页。

面请愿的决议。在对外政策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也日益暴露和加强。当时,德意志、奥地利的革命正在高涨,波兰也爆发了反抗普鲁士反动统治的起义。法国的新政府不仅拒绝援助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反而同沙皇俄国、奥地利的反动统治者勾结起来,支持他们镇压波兰和奥地利的革命运动。

制宪议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措施激怒了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他们在5月15日举行了15万

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反革命措施。布朗基和卡贝代表工人群众向制宪议会提出了给失业者工作、对豪富征收重税、允许工人代表参加政府、成立劳动部和援助波兰革命等要求。资产阶级政府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于是无产阶级便自动推举布朗基、路易·勃朗、阿尔伯、赖德律·洛兰等人组织革命政府。资产阶级共和派立即派出别动队和国民自卫军驱散了示威的群众,逮捕了布朗基、阿尔伯、卡贝和拉斯帕伊等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同时下令解散卢森堡宫工人委员会和许多革命政治团体。

此后,资产阶级反革命进攻步步进逼。制宪议会和反动报刊开始攻击国家工场。5月17日的《国民议会报》诬蔑国家工场说:“谁



图8 制宪议会的小资产阶级
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

不知道国家工场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盗贼的有力后台。”^①该报强烈要求动用国民自卫军镇压工人“暴乱”。同日，执行委员会任命屠杀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刽子手卡芬雅克为陆军部长，调集大批忠于政府的军队进入巴黎。接着又禁止群众集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工场的工人逐渐同革命俱乐部接近。这一情况使大资产阶级极度不安。为了摧毁无产阶级的力量，彻底取消二月革命的民主成果，以法卢为首的反动集团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坚决要求解散国家工场。在他们的威逼下，6月22日，官方报纸《总汇通报》刊载了一项政府的命令，命令规定，凡国家工场里18岁至25岁的未婚男工一律编入军队，25岁以上的工人送到索隆做土木工事或到外省去垦荒。这项命令在工人中间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工人们说：“与其远离家乡到索隆死于寒热病，不如在巴黎的炮火下牺牲。”于是，工人便派代表团到卢森堡宫委员会，抗议解散国家工场，但是遭到了政府的拒绝。执行委员会的马利公开叫嚣说，如果工人不服从政府的命令，那就以武力强迫他们服从。当工人得知政府的这一答复时，骚动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了。“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做了回答——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②

① 尼·扎斯金克尔：《1848年法国革命》，第92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4页。

第四节 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

起义的准备与领导

6月22日解散国家工场的法令公布后，工人们曾派出代表到政府交涉，要求收回这一无理决定。可是，马利代表执行委员会公开威胁说：如果工人不愿意自动离开，我们就要用武力把他们赶出巴黎。这就更加激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愤怒，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在其选出的“队长”和“代表”的率领下，手持旗帜，高唱革命歌曲沿着巴黎的街道游行示威。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决不到索隆去！”“打倒马利！打倒国民议会！”“共和国万岁！”晚9点，千千万万的工人聚集在塞纳河左岸。潘庭广场上聚集着人群，国家工场的中尉，布朗基俱乐部委员会委员皮佑发表了演说。他宣布在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流过血的工人是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的，并号召示威游行拿起武器。皮佑发表演说后，工人群众纷纷表示决不退却，并确定第二天早晨重新集合。

起义虽有一定的计划，但缺乏统一的领导。领导这次武装斗争的是各街垒的领导人 and 互不联系的流动的司令部。在起义的领导人中有工人、小手工业者和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工场的“队长”和“委员”、革命俱乐部的工人、同业公会的活动家以及一些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

领导沃格索夫广场防御工作的是机械师拉卡利，他是“工人平等社”的杰出活动家；领导格兰丝·奥·别尔街街垒的是年轻的机械师巴尔特勒米，他是秘密“四季社”的成员；60岁的鞋匠布扎别尔指挥着普朗什·米布雷街的战斗；第八区的主要领导人是拉科朗日，他是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劳动组织报》的编辑、“圣安东人俱乐部”的主席；此外，这个区的领导人还有国民自卫军第八军团的

中尉杰弗尔和“圣安东人俱乐部”秘书别尔埃等；制帽技工布留伊和雕刻工人列热尼谢尔负责第九区的领导工作；穆弗塔尔区的街垒战斗由布留埃尔指挥；圣马索住宅区的起义领导人之一是布朗基俱乐部的成员科尔；在坦普尔郊区，起义的整个领导权掌握在国民自卫军第八军团的上尉杰斯捷拉特手中；在伯利维尔郊区则由裱糊工范弗尔诺、店员包吉埃等领导；在起义的主要据点之一潘庭区，起义的领导人由国民自卫军第十二军团的军官、5月15日事件的积极参加者洋铁匠索达乌安、印刷工人普里埃尔、裁缝工人列维克、面包师奥日埃等。

这些领导人多数是“人权和公民协会”的会员。这个协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组织，它联合了首都和各省的许多民主俱乐部，积极主张进行武装斗争。所以，在六月起义中，这个协会曾成立了两个“固定的委员会”领导这次起义，但是，没有形成统一领导的中心。

尽管在起义中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中心，不过，这次起义还是有一定的行动计划的。起义工人的军事行动计划是由“人权和公民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退伍军官盖尔索济制订的。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夺取市政厅。这是起义成功的重要标志。为了夺取市政厅，起义者要分四路纵队向市政厅分进合击。第一纵队以蒙马特尔、拉一沙佩尔、拉一维勒特等郊区为作战根据地，由包松涅尔、罗什舒阿尔、圣丹尼、拉一维勒特等关卡向南挺进，占领林荫大道，通过蒙托尔海伊街、圣丹尼街和圣马丁街到达市政厅。第二纵队以工人居住区，由圣马丁运河掩护的坦普尔郊区和圣安东郊区为根据地，沿坦普尔街和圣安东街、沿塞纳河北岸各沿河街道以及沿这两个市区间一切平行的街道，向市政厅前进。第三纵队以圣马索郊区为根据地，沿圣雅克街、沿塞纳河南岸各沿河街道直抵锡特岛。第四纵队以圣雅克郊区和医科学校为根据地，沿圣雅克街到达锡特岛。第三和第四纵队会合后，沿塞纳河南岸前进，从后面的侧翼包

围市政厅。这些纵队由许多游击队配合作战，这些游击队在纵队的侧翼和纵队之间独立进行活动，构筑街垒，占领小街并保持各纵队之间的联系。起义一开始，起义者就是根据这个计划，以无比英勇的革命精神与资产阶级进行了浴血战斗。

6月23日的战斗

工人的街垒和防御工事设计得非常周密，修筑得相当坚固。巴黎城被分为两个军营。从城市的东北部附近开始，即从蒙马特到圣丹尼门，再从这里沿圣丹尼街，经过锡特岛，沿圣雅克街到城关，形成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以东的整个地区都被工人占据着，并筑有工事。资产阶级在西面，他们从西面进攻起义工人，并从西面得到增援。

6月23日清晨，从圣丹尼门到维耶·杜·坦普尔林荫大街聚集着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国家工场的工人声明不到索隆去，不到外省去。他们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仍奋不顾身的继续构筑街垒。从巴黎的东区到东南区（从包松涅尔市区和包松涅尔郊区起）很快地就筑起了街垒，在圣丹尼街、圣马丁街、兰布托街、佛布尔一包松涅尔街和塞纳河南岸通向圣雅克郊区和圣马索郊区的要冲——圣雅克街、拉哈普街、拉·尤舍特街以及毗连的桥梁上都修起了防御工事。街垒上红旗招展，上面写着“全部企业社会化！”“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万岁！”等政治口号。同时，巴黎工人还发表了宣言和张贴了标语，要求解散制宪会议，将议员交付法庭审判，逮捕执行委员会委员，军队撤出巴黎，给予人民以自己起草宪法的权利，保留国家工场，保证劳动权。在宣言和标语中还强调了起义的国际意义，例如：“我们保卫的事业是全世界的事业！”“如果巴黎带上枷锁，那么全欧洲都要受到奴役。”“世界共和国万岁！”等。所有这些充分显示了六月起义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

街垒刚修好，起义工人同政府军就开始了战斗。在朋努威尔林荫路上展开了第一次激战，工人首先占领了这条路上由别动队把守着的哨岗。但是，不久这个哨岗又被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夺回去了。另一队国民自卫军还占据了吉姆纳兹大剧院前的人行道，这是一个能控制相当长一段林荫路的制高点。当国民自卫军向前挺进时，双方立即互相射击，起义者奋勇抵抗。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整条朋努威尔林荫路以及由此直到圣马丁门的街垒全被国民自卫军夺占了。到上午11时，国民自卫军又夺下了坦普尔的街垒，并占领了通向林荫路的要冲。在中午时刻，国民自卫军和别动队又在起义者的猛烈反击下被迫退却了。

在克列里街的战斗也相当激烈。工人们以无比英勇的、视死如归的精神进行战斗。一队强大的国民自卫军由侧面向克列里街进攻。由于寡不敌众，起义者被迫撤退了，只剩下7个男人和2个妇女固守着街垒。其中1个男人手举红旗登上街垒，其余几人进行射击。旗手被击倒了，一位身材高大、衣着雅致、袒露着臂膀的漂亮的姑娘立刻举起旗帜，越过街垒，向国民自卫军冲去。当她走到他们的刺刀跟前时，国民自卫军把她杀害了。接着另一个妇女马上跳了出来，她抓住旗帜，扶起女友的头，当看到女友已经死了时，便疯狂地向国民自卫军投掷石子，进行反击，结果也被枪杀了。这时双方的射击愈来愈烈，起义者从窗口、从街垒后面向敌人射击，打死打伤国民自卫军多人。但由于政府军援兵不断开来，街垒终被攻占。在守卫街垒的7名战士中，只有一个人还活着，其他6人均壮烈牺牲了。

23日下午，在帕拉迪一包松涅尔街、圣丹尼街都发生了流血冲突。反动政府的第7轻步兵团、别动队和国民自卫军向工人们攻来，工人们利用房屋作为街垒进行防御。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双方伤亡100多人，最后政府军取得了胜利。

在圣雅克街起义者同政府军的战斗也相当激烈。圣雅克街被

许多街垒所切断。在这里，只有炮兵才能起作用，卡芬雅克毫不迟疑地使用了炮兵。大炮对着圣雅克街整整轰击了一个下午。到晚上7时，圣雅克街的街垒几乎全被攻占，死亡甚多。

在坦普尔郊区，5个街垒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在这里有600—700人防守。政府军同样使用了大炮轰击。只有在大炮的轰击下，这些矗立在塞纳河右岸的街垒才被占领了。

东北部各郊区，双方的射击都非常激烈。拉—维勒特、邦丁等郊区的群众千方百计地援助起义工人，并不断地修筑新的街垒。23日天黑之前，各处都开始了炮击，并且一直进行到深夜。到夜间11时，双方伤亡人数已达1000多人了。

23日是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第一天，这是巴黎革命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个日子。巴黎工人孤军同资产阶级的各兵种作战：“他们无比英勇地坚持战斗，这种无比英勇是同敌人的无比残酷相应而生的。”^①

6月24日的战斗

为了迅速地镇压起义，资产阶级政府在23日夜调来了大批军队，在各个广场和林荫路上都配置了强大的前哨，准备向无产阶级发动猛烈的射击。

6月24日早晨4点钟，炮声就响起来了。在圣米歇尔一带响得最厉害，因为圣米歇尔桥是左岸起义者和锡特岛起义者联系的必经之地。卡芬雅克下令炮兵用炮弹、榴弹和康格里弗火箭轰击工人街垒和圣米歇尔桥一带地区。工人们在炮火面前毫不畏惧，坚守着街垒，准备迎接更激烈的战斗。

这一天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距市政厅不远的花河沿街。这里著名的“丽人”服装店变成了一座坚强的街垒，由600名起义者占领

^① 恩格斯：《6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41页。

着。军队包围了服装店，并企图以炮击占领它。但守卫者英勇地保卫着它。在这里亲自指挥射击的卡芬雅克要求起义者投降，否则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起义者拒绝投降。于是卡芬雅克下令炮兵用燃烧弹和榴弹猛袭起义者。结果“丽人”服装店被摧毁，有80多名起义者葬身于瓦砾之中。

在圣雅克郊区、在潘庭区附近、在锡特街，工人们都筑起了坚固的街垒，防御敌人的进攻。妇女和儿童也参加了战斗，他们从窗口向扑来的自卫军射击，枪弹如雨点一样地落在政府军的阵地上，使政府军死伤甚多。在起义工人顽强的抵抗下，政府军攻占圣雅克郊区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为了摧毁起义者的反抗，它在这里也同样使用了炮击。

正如参加战斗的一位军官所描绘的那样：“我是在大炮的轰隆声和枪弹的呼啸声中给你写信。在两个小时里，我们占领了巴黎圣母院附近桥头的3座街垒，尔后沿圣马丁街向前推进，穿过了整个街道。当我们推进到林荫大道时，我们看见这里像凌晨2时一样被放弃，空旷一片。我们又沿郊区至坦普尔街，尚未到达兵营时，我们被阻截了，在200步远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宏伟而坚固的街垒，周围有几座街垒环绕着它。这座街垒有2000人守卫着。我们同他们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谈判，但未获得任何结果。约下午6时，大炮运来了，大炮开始射击。射击是极其残酷的，至9时，到处都散落着砖块瓦砾、窗框玻璃；血流成河……到处都是鲜血一片，大桥也被鲜血染成了红色……起义者象猛狮一样地守卫着街垒，我们进攻了20多次，但20多次都被击退了。……至今，射击仍然未停。”^①

这天中午，起义者占了绝对优势。从巴拉诺尔到塞纳河的所有巴黎城郊，以及塞纳河左岸的大部地区，都由起义者占据着。在市中心、在锡特岛和圣马丁南岛，起义者曾冲到市政厅附近。这时，资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540页。

产阶级政府向法国各地发出了要求支援的急电，同时政府当局决定授予卡芬雅克以军事独裁大权。

残暴的卡芬雅克接受这个大权之后，立即宣布戒严，采取最残暴的手段镇压起义者。他不仅开动大炮对付街垒，而且炮轰住宅；不仅使用霰弹，而且使用榴弹和燃烧弹。他的战术是集中兵力，大兵团作战，企图一举将起义者淹没在血泊中。24日这一天，卡芬雅克不断地从外省调来军队，庞图阿兹、鲁昂、穆兰、曼特、亚眠等地的国民自卫军整夜不停地向巴黎开来，其中有炮兵和工兵。

为了攻占圣雅克郊区的街垒，消灭起义者，卡芬雅克指挥的军队设立了3个指挥所：圣丹尼门指挥所由拉摩里西尔将军指挥；市政厅，由杜维维耶将军指挥；索尔邦纳广场，由达梅姆将军指挥。3路军队同时向圣雅克郊区攻来。到中午时刻，通向莫别尔广场的要冲全被国民自卫军占领，广场被包围。下午1点钟，广场被国民自卫军占领。经过猛烈的、长时间的炮击，潘庭区也被国民自卫军攻占了，防守在那里的1500名起义者，经过顽强的抵抗，才被迫撤退。这时国民自卫军沿着林荫路向前挺进，占领了邻近街道上的街垒。在占领过程中，在坦普尔街、布什拉街和林荫路对面的坦普尔郊区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起义者寸步不让，坚守街垒，还击政府军。

晚7时许，从亚眠开来的两营国民自卫军被派到拉摩里西尔将军那里，这些军队立即被派去包围沙托·得奥背后的街垒，起义者被包围在马勒市区的一部分地方和圣安东郊区。到晚上9时，圣雅克郊区和圣马索郊区被敌人占领。

在市政厅由杜维维耶将军指挥的军队，遭受重大伤亡后，才击退了起义者。由拉摩里西尔将军指挥的军队，在起义者顽强的抵抗后，占领了包松涅尔、圣丹尼、圣马丁郊区的街垒。

到24日傍晚，起义者大约还控制着他们在23日晨所占领地区的一半。这一半地区包括巴黎东郊、圣安东、坦普尔、圣马丁等郊

区和马勒市区。巴黎其他地区均被政府军所占领。

在24日的战斗中,国民自卫军表现得特别狂暴。在国民自卫军中,在国民议会中,对起义的工人只有极端憎恨、冷酷的敌意。资产阶级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将起义者斩尽杀绝。但是,广大无产阶级是杀不尽的,他们决意要向资产阶级报仇。

6月25日的战斗

6月25日的战斗愈来愈紧张,愈来愈残酷,愈来愈猛烈了。这时,资产阶级更加残酷地镇压起义者,他们公然宣布“工人不仅是需要加以征服的敌人,而且是需要加以消灭的社会敌人”;胡说工人“只想抢劫掠夺、杀人放火,工人是一群强盗,因此应当像屠杀野兽一样杀掉他们”^①。24日夜,在天文台街,有50名被俘的起义者不经任何审讯就被枪决了。资产阶级妄图一下子要把“秩序的敌人”和共产主义者消灭干净,以解他们对无产阶级的仇恨。

尽管工人们遭到资产阶级的切齿痛恨,被政府军的优势力量逼得节节败退,但是他们毫不怯懦,继续勇敢地进行战斗。这时,政府又把大批国民自卫军从郊区和其他较远的地方调集巴黎。所以,参加25日战斗的常备军比平时的卫戍部队多4万多人。别动队又出动了2.5万人;此外,还有巴黎和其他城市的国民自卫军。25日,进攻起义者的政府军总共不下15万到20万人,而起义者还不到5万人。在双方众寡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工人仍然继续顽强战斗,在每一个街垒中都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街垒才落到资产阶级手中。

在25日早晨,起义者占据了克洛—圣拉查尔、马勒和圣安东市区、圣安东和坦普尔郊区。他们在这里迅速地筑起了坚固的街垒和工事,准备迎头痛击来犯的国民自卫军。为了摧毁这些地区的工

^① 恩格斯:《6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47页。

事,国民自卫军用40门大炮轰击了一整天,但也没有完全把它摧毁。25日下午6点钟,罗什舒阿尔街上有两个街垒被国民自卫军攻下,接着,克洛-圣拉查尔也被占领了。

这天,在坦普尔林荫路上,别动队在上午10时攻占了几幢房屋。起义者为把守自己的街垒与政府军进行了争夺战,因寡不敌众,起义者被迫后退,但一直进行英勇抵抗,战斗非常激烈。经过长时间的激战,起义者被兵力和武器占优势的政府军打败了,街垒被逐一占领。天黑时,不仅坦普尔郊区被攻占,而且政府军还沿着林荫路和运河前进,占领了通向圣安东郊区的各个要冲和这个郊区的街垒。

在市政厅附近,双方战斗也相当激烈。在这里由杜维维耶将军指挥的政府军从沿河的道路前进,包围了圣安东街的街垒,同时用重炮轰击圣路易岛和鲁维叶岛。下午4点钟,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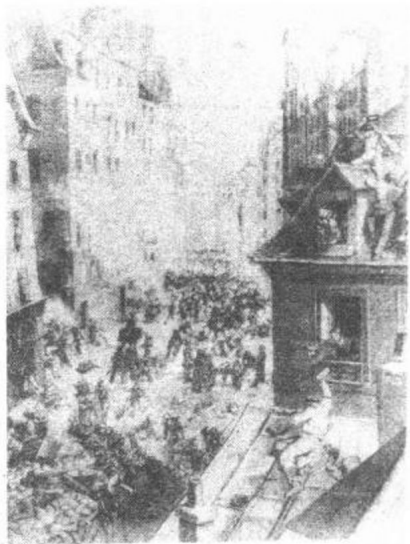


图9 1848年6月巴黎圣安东街的战斗

九区政府及其邻近的道路被占领,圣安东街的街垒一一被猛攻夺下。天黑时,这个区域的起义者被击退,通向巴士底狱广场的各个要冲都失陷了。

到25日晚间,除圣安东郊区外,城内各区都落在资产阶级手中。圣安东郊区成为起义者最后坚守的阵地。在这里构筑了很多巧妙的工事,街垒彼此形成三角形,作战时可以相互掩护,此外还有从房屋里射出的交叉火力来支援。因此,这些街垒成为政府军进攻的巨大障碍,要攻占这些街垒,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6月26日的战斗

6月26日,起义者手中只剩下圣安东郊区、坦普尔郊区的一部分和一些次要的战斗据点了。

在整个法国革命史上素享盛名的圣安东郊区,成了真正的堡垒。这个区的起义者形成了一个强大而有力的防御体系,在这里,每一块石头都是争取自由的光辉战斗的见证。这里的街垒是非常坚固的。圣安东街垒高达4层楼,长约700英尺。它从一个街角到另一个街角,恰巧阻截了通向郊区的道路。这座顶部犬齿交错并筑有炮眼的街垒是凭借着土城墙的墙垛建起来的。有些地方向前突出,其两侧与郊区的高大楼房紧相毗连。这些街垒是采用一种巨石垒砌法建筑的。在这座主要街垒的后面还有19个街垒,它们一个接连一个,形如阶梯。一面巨大而又鲜艳的红旗,在高空中迎风飘扬。

6月26日晨,为了进攻这座坚固的街垒,卡芬雅克首先调来了臼炮和榴弹炮,因为霰弹打在上面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弹孔,对付不了这座街垒。卡芬雅克把臼炮和榴弹炮调来之后才非常谨慎地将自己的军队投入战斗。他命令佩罗将军由坦普尔郊区进攻,拉摩里西尔由巴士底广场进攻,以便从两个地方同时炮击起义者的阵地。尽管炮火十分猛烈,但起义者仍然坚守街垒,屹立不动。后来由于一部分起义者侧面受击,通往郊区的道路才被打开了。5门重炮向圣安东区推进。经过重炮的猛烈轰击,工人起义者的最后根据地圣安东失守,六月起义失败了。

在这几天的战斗中,无产阶级显示出他们作战英勇、果敢、齐心,显示了他们有纪律、有军事素养。他们在没有统一领导核心、没有物资、没有经费和大部分起义者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巧妙地遏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城内的国民自卫军和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的联合势力,同他们英勇地、顽强地战斗了整整五天。无产阶级

在这次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在这闻所未闻的残酷镇压中,有 1.5 万多人被杀,2.5 万多人被判处监禁、流放和各种苦役^①。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手工业者,其中水泥匠 572 人,打短工者 553 人,细木工 505 人,皮靴匠 418 人,钳工 301 人,机械工人 248 人,旋工 185 人。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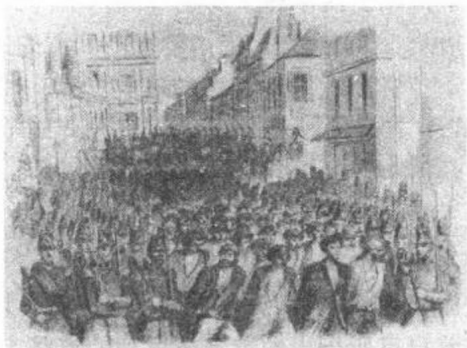


图 10 被俘的六月起义者

第五节 1848 年 6 月至 1849 年 6 月 法国的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

六月起义的被镇压巩固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反动统治。根据资产阶级共和派和资产阶级君主派之间的协议,6 月 28 日,议会选举卡芬雅克为法兰西共和国行政首脑。

卡芬雅克掌握政权后,立即从资产阶级共和派营垒中挑选了最反动的分子充当自己的部长,这些人为镇压巴黎六月起义都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10 页上数字为:起义者被屠杀有 3000 多人,未经审问就被放逐的有 1.5 万人。

下了“汗马功劳”。赖德律·洛兰被任命为内政部长；建议在巴黎实行戒严的发起人巴斯吉德登争得了外交部长的头衔；银行家古德索又重新登上财政部长的宝座；在六月起义中卡芬雅克的得力助手拉摩里西尔和贝多也都加入了部长的行列。在镇压六月起义中屠杀工人的罪魁、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右翼集团掌握了法国的政权。

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右翼集团一上台，便立即放弃能够引起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不安的一切措施，取消了在二月革命中人民群众所争得的一切革命成果。在他们看来，共和国的主要敌人不是君主派及其复辟活动，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因此，当人民群众反对他们时，他们便向大资产阶级寻求支持。于是，君主派和教权派便巧妙地利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反革命情绪，使其沿着自己所指出的越来越反动的道路走去。

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君主派的需求，政府向议会提出了关于俱乐部和出版等法令草案。其中第一个法令于7月28日由议会通过，该法令规定俱乐部必须受政府和警察的严密监视。这一法令的实质就是限制集会结社自由。议会于8月9日到11日又通过了出版法令，该法令部分地恢复了革命前的旧的出版制度。法令规定，要出版一种报纸，必须缴纳高额保证金（在巴黎为2.4万法郎）。可见，这个法令的实质在于取消出版自由，禁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所以，记者日拉金大胆地写道：“我们又落在暴政的屠刀之下了。”^①

同时，在经济政策方面，卡芬雅克竭力实行有利于大资产阶级、打击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们放弃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经济纲领，恢复了七月王朝的财政制度；取消了铁路收归国有的法令草案，恢复了铁路公司的权势。为了摆脱财政的困境，财政部长古德索下令法兰西银行发行新公债，实行新税收，实行抵押贷款和累进

^① 尼·扎斯金克尔：《1848年法国革命》，第115页。

遗产税。制宪议会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提出的延期支付债务、公债和房主租金的要求，否决了“协商契约法”，恢复实行债务囚禁法。

卡芬雅克宣布实行的 45 生丁附加税，立即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反对。法国中部和南部的 23 个省的广大农民，坚决反对实行这种附加税。大约有 1 万多个村庄的农民举行暴动。在这些地区，农民群众赶走了收税人、宪兵和官吏。热尔省米兰德区的农民在赶走税收官吏时大声喊道：“我们不能也不愿意纳税，……强迫我们纳税的人是可鄙的。”^①于是，卡芬雅克便对拒不缴纳 45 生丁附加税的农民横加迫害，政府下令逮捕“叛乱者”。这样一来，就更加激起了农民的愤怒，他们立即用叉子和斧头武装起来，解救那些被捕的农民，结果遭到政府军队的射击，死伤约 20 余人。为了从根本上镇压农民的反抗，制宪议会于 1848 年 9 月 2 日颁布了征收 45 生丁附加税的法令，要求无条件地缴纳。但是，尽管如此，农民反对 45 生丁附加税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

议会对镇压工人阶级采取了更坚决的措施，不仅巴黎，而且外省的国家工场也全部被关闭了。议会反对无产阶级的任何社会要求。他们为了迫害无产阶级，成立了所谓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六月起义和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原因。参加该委员会的大多是君主派。该委员会“调查”的结果，建议将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交付法庭审判。8 月 30 日，议会又废除了临时政府 10 小时工作日的法令，仍规定工人的工作日为 12 小时。总之，二月革命后对工人所作的一切让步都被取消净尽了。

资产阶级共和派和议会为了掩盖其敌视工人阶级的政策，便故作姿态，拨出 300 万法郎贷给工人生产协会，其目的是利用生产协会吸引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散布用和平方法摆脱资本主义剥削的观点。同时，如生产协会破产时，他们便可以利用这

^① 尼·扎斯金克尔：《1848 年法国革命》，第 119 页。

一事实破坏社会主义在工人中的威信。所以梯也尔曾经说：“如果需要的话，不要说 300 万，就是 2000 万，我们也甘心情愿地拨给他们……我们决不吝惜用 2000 万去作这个惊人的试验，因为它可以使极为狂暴的行为恢复正常。”^①

1848 年宪法

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从法律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于 1848 年 11 月 4 日通过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即 1848 年宪法。这部宪法是制宪议会对君主派的又一次重大让步。早在 1848 年 5 月，制宪议会便选举了一个宪法制定特别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虽然多为资产阶级共和派，但是，在委员会中起主要作用的却是君主派。在宪法制定过程中，还在六月起义前，君主派便竭力利用共和派反对革命的情绪，提出了建立两院制议会的建议，但提案未被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派为了组成一种与下院相平衡并制约下院的势力，便提出扩大和加强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权，给予总统以任免部长和其他官吏的权力，总统的活动不受国会制约等，一句话，他们竭力扩大总统的职权，甚至希望总统能握有国王的权力。其目的就是让总统起到与民主机关相抗衡的作用。奥尔良分子焦福尔就反复强调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权，共和国连 6 个月也不能维持。”^② 六月起义失败后，宪法制定特别委员会的反动气焰就更加嚣张了。

1848 年 9 月—10 月，制宪议会讨论了宪法草案。在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上，君主派与具有反对革命情绪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了绝对优势，他们否决了议会中民主分子提出的所有修正案。在会上，以 596 票对 187 票否决了将“劳动权”与“教育权”列入宪法的

^① 尼·扎斯金克尔：《1848 年法国革命》，第 120 页。

^② 尼·扎斯金克尔：《1848 年法国革命》，第 122 页。

建议；否决了关于取消雇佣兵役制而代之以义务兵役制的建议；否决了关于建立“常设民族代表会”的决议等等。虽然君主派提出的关于建立上院的建议被否决了，但却对他们作了某些让步，如决定成立由议会选举产生的政府协商会，并由它负责讨论法律草案等，同时，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庭制度仍然保留不变。总统的职权问题，争论最为激烈，但最后仍然通过了关于由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统不仅拥有全权，并独立于议会的建议。

制宪议会所通过的这部宪法完全是为了维护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宪法中，虽然写上了全民享有的权利，但是与这种权利相并列的则是限制革命和反民主的措施。宪法虽然规定了普选权，但是又以选举人必须在该区居住半年以上的条件来限制这一权利；宪法虽然宣布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教育等自由，但是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必须在保证“社会安全”的范围内才能享有这些自由，所以，马克思在分析这部宪法的实质时指出：“这个文件从头到尾是一大套掩饰极其奸诈的意图的漂亮话。……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① 而这部宪法最主要的弊病则是与国民公会并列的总统的独立行政权。据制宪议会的一位代表统计，制宪会议赋予总统直接任免 36.2 万名官吏和间接任免 10 万名官吏的权力，而且其中不包括对军队军官的任免权。这就使得总统不仅有能力与国会相抗衡，而且有力量压制人民的意志。

共和国总统的选举

宪法通过后，在它尚未宣布生效以前，议会便立即决定进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资产阶级共和派之所以如此慌忙地决定总统选举，是因为他们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候选人卡芬雅克能够获胜。总统

^① 马克思：《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88页。

选举定于1848年12月10日举行。

参加这次总统竞选的共有6个候选人。巴黎的工人提出当时还囚禁在狱中的拉斯帕伊为候选人，小资产阶级各民主阶层的候选人是赖德律·洛兰，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候选人是卡芬雅克，大资产阶级的候选人是路易·波拿巴，脱离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反对派分子推举拉马丁为候选人，而君主派推选的候选人是尚加尔涅元帅。

在这6个总统候选人中，卡芬雅克和路易·波拿巴当选的可能性最大。这主要是因为卡芬雅克当时是政府首脑，在选举运动中，他可以充分地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为自己的竞选服务。而路易·波拿巴在当时却受到大资产阶级中有权势的人物的支持。所以，在总统的竞选中，路易·波拿巴便成了卡芬雅克的劲敌。

路易·波拿巴(1808—1873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儿。他才能平庸，但个人野心很大。他企图学习他的伯父，在法国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因此，他曾两次试图夺取法国政权(1836年和1840年)。不过都失败了。1844年，他在狱中写了一本小册子《论消灭贫穷》。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假惺惺地把自己打扮成为劳动群众的“代表”，其实他在暗地里干着勾结大资本家的勾当，发展其党羽势力。在这次总统竞选中，路易·波拿巴分子十分相信他会获得成功，他在竞选的宣传中，丝毫不吝惜金钱。路易·波拿巴本人为竞选花去了30万法郎。路易·波拿巴在自己的竞选宣言中向所有的阶级提出了带有煽动性的纲领。他首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超党派”的人，是“民族统一”的坚决维护者，是其伯父拿破仑一世的继承人。接着他答应资产阶级“确保社会秩序，免遭一切侵害”；他允许天主教徒“传教自由”；向工人承诺“大赦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向农民保证“一定减轻赋税”和“保护小土地私有制”，安抚小资产阶级以“低息借贷”等等。在经济危机、贫困、破产和失业的情况下，路易·波拿巴关于提高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恢复商业和物质繁荣、人人都能

找到工作等“诺言”，就显得特别有诱惑力。

在卡芬雅克与路易·波拿巴的戏剧性的总统竞选中，君主派反复衡量了自己力量以后，在确认自己的候选人的当选将成为不可能时，便在支持卡芬雅克还是支持路易·波拿巴之间摇摆。这时，“包特埃委员会”^①便分别与卡芬雅克和路易·波拿巴谈判，这个委员会是在六月起义后，以“秩序党”为首联合了王朝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教权派的一个组织。开始时，梯也尔倾向于支持卡芬雅克，因为他惧怕路易·波拿巴的野心，并对他的评价不高，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操纵的白痴”。但是，“秩序党”的莫尔却十分赞赏早已同他取得联系的路易·波拿巴。在同卡芬雅克的谈判中，卡芬雅克公然声称：他当选总统后，将由君主派组阁；彻底封闭俱乐部；在巴黎保留5万军队，并为反对德国的统一和意大利的共和制而坚决斗争，但是，他回避了对天主教承担任何义务。君主派在支持卡芬雅克或路易·波拿巴的问题上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放弃对卡芬雅克的支持，而全力支持路易·波拿巴。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路易·波拿巴比卡芬雅克更敌视共和国，他能为复辟君主制扫清道路。

君主派的支持给路易·波拿巴以巨大的力量。天主教神甫号召自己的信徒投路易·波拿巴的票；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预计波拿巴将结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对抗；另一些人则相信他有能力防止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而在军队中则流传着歌颂拿破仑一世远征和胜利的神话。所有这些都为路易·波拿巴的竞选创造了有利条件。

1848年12月10日，议会进行了总统选举。选举结果，路易·波拿巴得5534520票（占总票数75%），卡芬雅克得1448302票，赖德律·罗兰得371431票，拉斯帕尔得36964票。路易·波拿巴

^① 包特埃委员会因设在包特埃街而得名。它是秩序党、王朝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教权派的一个联合组织。为首的是秩序党，其真正的领导人是梯也尔。

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为法国总统。

路易·波拿巴之所以当选总统，是因为他不仅得到了大资产阶级强有力的支持，而且骗取了部分工人、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信任。大部分工人投路易·波拿巴的票是为了向“六月的屠夫”报仇，推翻卡芬雅克的统治；农民投路易·波拿巴的票是因为当时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广大农民日趋破产，因而反对卡芬雅克的情绪也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路易·波拿巴便利用农民的这种不满情绪，大力宣扬他“要解决农民的困难”。在农民中甚至广泛流传着“拿破仑是百万富翁，如果他能当选总统，他将有能力偿还法兰西的债务和45生丁税”的奇谈怪论，同时，大多数农民认为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儿”，他不仅会维护小农私有制，而且会把他们从银行家、批发商、农产品投机家和收税者的压迫和搜刮下拯救出来。所以，“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到投票箱跟前去，高呼：‘打倒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①《人民之友报》在报道农民群众选举时的情绪写道：“没有一个农民在投路易·波拿巴的票时不是为了他能补偿45生丁税。”^②小资产阶级则是因为不满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各项政策而投了路易·波拿巴的票。大土地所有者与大资产阶级视路易·波拿巴的当选为复辟君主制的开端。而路易·波拿巴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矛盾，乘机从一个普通军官一跃而为法国的总统。路易·波拿巴的当选是资产阶级共和派所推行的政策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专政也随着12月10日波拿巴的当选而告终结。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0页。

^② 尼·扎斯金克尔：《1848年法国革命》，第130页。

巴 罗 内 阁

1848年12月20日，制宪议会宣布路易·波拿巴就任共和国总统。卡芬雅克及其内阁被迫辞职，并将政权转交议会。路易·波拿巴庄严地向议会宣誓。他在誓词中说：“在上帝和人民面前，我宣誓：将永远忠于共和国，并完全恪守宪法所赋予自己的职责。”在简短的誓词中，为了使议会相信他忠于共和国，他又一次地表示：“凡利用非法手段试图破坏共和国所颁布的法令者，均被视为祖国的敌人。”^①

但是，这个平庸可笑而有机会扮演了英雄角色的路易·波拿巴，在玩弄权术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虽然一直表示忠于共和国和忠于宪法，但是，他一刻也没放弃做法国皇帝的野心。他之所以暂时表现得“温顺”和“民主”，那只不过是為了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路易·波拿巴清楚地看到当时人民民主力量还很强大，共和派在制宪议会中仍居优势，特别是在反动营垒中，路易·波拿巴尚未得到可靠的支柱，波拿巴分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大，波拿巴主义的宣传也尚未渗透到军队与官吏中。加之两次政变失败的经验教训，使他不得不小心从事，暂时忍耐。

为了掩盖其恢复君主制的企图，路易·波拿巴便想抬出拉马丁装璜和支撑门面，但是，遭到了拉马丁的拒绝。于是，他便采纳梯也尔的建议，任命巴罗组阁。巴罗是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是奥尔良派的首脑之一。他曾经参加过七月革命，18年来，他一贯以外表的显赫来掩盖其内心的卑鄙和空虚，他的全部“才华”几乎都用在不断的叛变上。路易·波拿巴也深知巴罗内心空虚、毫无原则、贪图禄位、行动卑劣，因此，他也殷切地指望巴罗能成为他恢复反革命君主制的可靠工具。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6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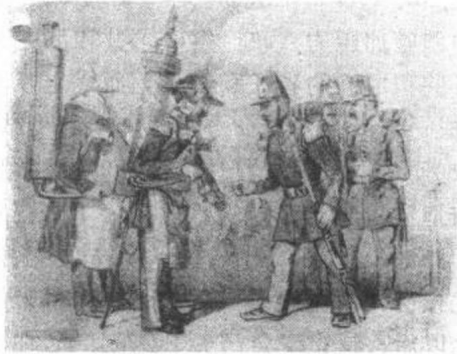
巴罗上台以后，立即恢复了七月王朝时期的政府机构，奥尔良分子又都纷纷登上了内阁大臣的宝座，麇集在巴罗周围：帕西荣获财政部长的桂冠，梯也尔的朋友马尔维尔登上了内务部长的宝座，德卢埃恩·德·路伊斯被安插在外交部长的交椅上，弗什·莱昂被任命为社会工作部长，正统主义者法卢伯爵则荣任国民教育部长。这样一来，就保证了教权派对内阁的支持。同时为了保证共和派右翼分子对政府的支持，巴罗又在他的机构中塞进了卡芬雅克的朋友比克西奥，授予他商业和土地部长的职位，并将陆军和海军大权分送给反动分子留利耶尔和特拉夏将军，而巴罗本人则又兼任了司法部长。巴罗的这一政府机构保证了它能够完成他所肩负的任务，即从资产阶级共和制向君主制过渡。

为了促进这一过渡的完成，内阁开展了积极的活动。首先将共和派所掌握的重要部门，如警察总局、邮政总局、总检察署和巴黎市政局的权力夺过来。接着，巴罗内阁便在国家所有的大小机关里进行了清洗。凡共和派的官吏，不论大小均代之以君主派分子，而且常常是在七月王朝时期担任过相同职务的人物。这种官职的更迭，从省政机关到市政机关直至乡政机关无不如此。事实上，巴罗所组成的这个内阁，是秩序党的内阁，即正统派与奥尔良派的联合内阁。这时，波拿巴派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可怜的附属物”。

12月24日，总统检阅了巴黎卫戍部队。阅兵时，有些连队因受波拿巴主义者宣传的影响，竟然高呼：“拿破仑万岁！皇帝万岁！”这件事虽不是波拿巴分子搞起来的，但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12月27日，当内务部长马尔维尔拒绝路易·波拿巴接触1836年和1840年波拿巴分子密谋政变的档案材料时，路易·波拿巴对此深表不满，于是，马尔维尔坚决要求辞职。这件事在内阁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路易·波拿巴由于同奥尔良党人发生冲突而深感不安，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没有奥尔良派的支持，他就无法掌握政权。在

这种情况下，路易·波拿巴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桂冠，便卑躬屈膝，委曲求全，恳求各位部长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是，马尔维尔坚决离开了政府，与其同时辞职的还有比克西奥。马尔维尔辞职后，弗什接管了内务部。这种情况说明了巴罗政府进一步相对的稳定和巩固，路易·波拿巴仍然处于依附状态。

路易·波拿巴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千方百计在资



产阶级、军队和官吏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寻求可靠的支柱。为此，他对士兵进行检阅，赠以礼品，对军官赠奖金、授奖章；在爱丽舍宫接纳贵宾和举行舞会；亲自拜访旧的显贵和议会代表；接见大投机商；巡视市场、博物馆、军营

图 11 路易·波拿巴收买士兵

和旅社；蛊惑人心地提出要为几百家贫困的法兰西工人捐款，建立投机的慈善机构“城市工人协会”，并亲自认捐 5 万法郎。虽然事实上路易·波拿巴从未拿出过一个生丁，却藉此机会为自己的支持者向社会上的意志薄弱者和甘愿贿赂者索取了大批的捐款。路易·波拿巴在伪装下所进行的上述种种活动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即不仅巩固了他的总统地位，而且也为后来复辟帝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路易·波拿巴总统位置的进一步巩固和巴罗内阁的相对稳定，促使第二共和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马克思所说的

“从共和国建立时期进入到共和国已经建成的时期了”^①。在一个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制宪议会当然就没有什么必要了。于是，迅速解散议会也就成了君主派的迫切要求了。为了尽快解散议会，君主派代表拉托·兰茹奈于1849年1月6日向议会提出建议，要求于3月初进行立法议会选举并确定制宪议会结束其工作的日期。由于左翼共和派的反对，这个建议未被接受，于是共和派与君主派之间围绕着建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君主派竭力利用共和派的怯懦，对共和派施加压力。政府解散了共和派占多数的市政议会，撤换了具有共和情绪的省长和市长，而代之以奥尔良派。1月29日，巴黎卫戍司令尚加尔涅命令军队向中心集结，并包围了制宪议会所在地波旁宫。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共和派屈服于君主派的压力，被迫让步。议会接受了拉托·兰茹奈的建议，决定对它的内容进行讨论。所以，1月29日事件事实上是君主派试图以武力解散制宪议会，只是没有成功。君主派虽未能立即解散制宪议会，但在此以后，制宪议会已濒于死亡。在1849年2月14日的制宪会议上，不仅君主派，而且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也竭力使制宪议会相信工商业的利益要求它解散，而且拉马丁以拯救资产阶级的名义建议议会通过拉托的建议，并以广大劳动人民革命情绪的不断增长和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相威胁。结果，议会以494票对307票通过了拉托·兰茹奈的建议，到此，制宪议会寿终正寝。

6月13日事件与山岳党^②的失败

1849年春，法国掀起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由于工业危机和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4页。

^② 山岳党是1848—1851年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的一派，是聚集在《改革报》周围、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的政党。

农业歉收，无产阶级的处境仍然困苦异常，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破产和贫困有增无已。大资产阶级和秩序党正在积极准备恢复君主制度，他们的地位的巩固使得共和国岌岌可危。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已意识到大资产阶级和秩序党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这就使这些阶级互相接近起来。

1849年5月13日，立法议会举行选举。三个君主主义党派：正统主义者、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在选举中最后形成为“秩序党”，“秩序党”获得了整个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它为了得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选票，便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其选举基金为20万法郎。秩序党发行了57.7万份宣传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对山岳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例如，有的小册子把它描绘成凶恶的共和派，类似暴君等。而山岳党则缺乏遍及全国的组织，小资产阶级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对这次选举极为不利。在一些无产阶级起作用的民主社会主义团体中，山岳党则是比较有力量的组织。例如在巴黎成立了“民主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它领导着山岳党的选举运动。该委员会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委员会要求代表的候选人必须遵循下列原则：共和国高于普选权；如果宪法遭到破坏，代表必须首先出来反对；如果法国使用武力反对他国人民的自由，就是破坏宪法；承认劳动权；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在复辟时期向流亡者支付的10亿法郎必须归还人民^①。这6项要求，后来就成了山岳党的著名的纲领。

参加选举运动的第三种力量是“宪法之友民主协会”，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选举组织。虽然资产阶级共和派按其人数来说，在制宪议会中占多数，但是它在国内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君主派视他们的“革命性”为罪恶；工人阶级把他们看成是将六月起义淹没在血泊中的叛徒和刽子手；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绝不能容忍他们所实

^① 尼·扎斯金克尔：《1848年法国革命》，第147页。

行的45生丁税,因而认为他们是反动派。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深化的形势下,“宪法之友民主协会”的那种只在形式上保卫共和国,而实际上不能解决社会改革问题的纲领,显然是无力的,也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5月13日,在警察监视下进行了选举。选举结果,秩序党获胜。它获得了337万张选票,500个议席,山岳党获得195.5万张选票,180个议席,资产阶级共和派仅获83.4万张选票,70个议席。选举结果证明,资产阶级共和派已被彻底击败。秩序党的胜利和共和派的失败明显地标志着法国革命越来越沿着下降路线进行,预示着君主制的复辟即将到来。

在这次选举中,虽然秩序党获胜,但成绩较大的是山岳党。它不仅在议会中争得了180个议席,而其领袖赖德律·洛兰在5个省,其中包括巴黎当选,而秩序党的候选人却没有一个是同时在3个省当选的。同时,山岳党在农民、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影响较大。例如在塞纳省,参加选举的士兵、军官和居民共9300张选票,而其中有4800张投了山岳党的票^①。因此选举后,山岳党在立法议会中就成了一支能与秩序党相抗衡的新力量。所以秩序党在击败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后,便立即调转矛头来打击山岳党了。

1849年5月28日,立法议会开幕。秩序党和山岳党在对外政策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秩序党主张继续干涉意大利革命,并强迫立法议会通过决议。山岳党便以政府违反宪法为理由,在议会中提出弹劾秩序党的意见书,建议把总统和内阁部长们提付法庭审判。议会断然拒绝了这个提案。山岳党人在议会厅里慷慨激昂,宣布要不惜一切维护宪法尊严。但是,马克思在揭露山岳党人时指出:“山岳党满怀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要迫使人们尊重宪法,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722页。

‘只是不诉诸武力’。”^① 山岳党人在议会内遭到失败后，决定把斗争转到议会之外，并决定组织群众举行和平示威游行，以保卫共和国宪法。6月13日，国民自卫军中赞成民主制度的各个营在巴黎举行示威游行。在3万多人的游行队伍中大部分是不带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其中夹杂有秘密工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抗议远征罗马，高呼：“宪法万岁！”尽管游行示威是和平性质的，但是，秩序党却利用反革命暴力来对付他们，尚加尔涅元帅指挥的军队没有让他们到达立法议会大厦，便把示威游行队伍驱散了。在示威游行队伍被驱散之后，山岳党人才发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并试图在巴黎发动起义，但因为时已晚，终归失败。山岳党人纷纷被捕，赖德律·洛兰逃往英国。6月13日事件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山岳党人没有提出能使群众奋起进行斗争的纲领，没有表现出同秩序党作斗争的决心，同时巴黎的无产阶级由于一年以前的失败而陷于衰弱，元气还未恢复，因此在这次事件中未能发挥重大作用。

第六节 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秩序党的议会专政

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被击败后，秩序党更是大权独揽。马克思指出：“6月13日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一期，……从此时起，国民议会就单只是秩序党的公安委员会了。”^② 他们对法国的一切民主力量进行彻底的摧残和迫害，制订一系列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78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80—81页。

镇压人民的法令，规定任何民主活动，包括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都是完全违法的，一切出版物都必须经过审查，并大肆逮捕、流放和监禁革命者。立法议会未经过讨论于1849年6月19日通过了查封俱乐部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法令；7月27日通过了出版法令和戒严法；12月20日通过决定：从1850年1月1日起重新向农民开征二月革命后取消的酒税。总之，这时法国人民又像在七月王朝时期一样，丧失了一切民主自由权利。

法卢出任巴罗内阁的教育部长以后，便立即提出了改革国民教育的法令。这个法令提出“讲授自由”的口号，实际上是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而代之以宗教教育和确立宗教在意识形态上对学校的领导权。法卢把提出的这一教育法在立法议会中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论，最后于1850年3月15日以399票对237票通过。法卢法令实施的第一年，教会就在法国全境开办了257所学校，其中高等学校13所^①。法卢法令在后来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一直决定着法国国民教育的命运和法国政治发展的许多特点。

秩序党不仅制定了一系列反民主、反人民的反动法令，而且加强了对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迫害。无论在巴黎或外省，无论在行政机关或军队中均进行了“大清洗”。凡具有民主情绪的政府官员和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及士兵，均被清洗了出去；凡参加6月13日事件的国民自卫军均被解散；里昂、洛纳及其东南部的4个省均宣布处于戒严状态。

秩序党的反动政策不仅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对，而且引起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同时，它给了路易·波拿巴网罗亲信、发展自己势力的有利时机，从而削弱了它与总统路易·波拿巴进行斗争的力量。

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对秩序党的不满情绪，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2卷，第132页。

明显地表现在1850年3月10日举行的立法议会的补缺选举中。这次补缺选举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驱逐山岳党的代表,但是选举结果证明,民主社会主义者取得了无可争辩的胜利。虽然山岳党在31个议席中只获得了20个议席,秩序党获得了原来由山岳党占据的11个议席,但实际上,秩序党的3个候选人——外交部长拉伊特、君主派的富阿和邦让落选,而代之以德弗路特、维达尔和卡诺·拉查尔·伊波利特。德弗路特是六月起义的参加者,从流放中大赦回到巴黎,维达尔曾任卢森堡宫委员会秘书,卡诺·拉查尔·伊波利特是18世纪法国革命时期著名活动家卡诺·拉查尔·尼古拉的孙子,临时政府时期曾任教育部长。“这3个候选人代表着3个互相结成同盟的阶级:为首的是一个六月起义者,代表着革命无产阶级;其次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着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最后,第三个候选人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共和党,这个党的民主主义公式在与秩序党冲突中就获得社会主义的意义而早已失去本来的意义了。这是像2月那样的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联合。但这一次是无产阶级居于革命联盟主脑地位。”^① 不管秩序党人如何拚命反对,社会主义的候选人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外省选举的结果是山岳党人也同样获得了多数。所以,3月10日的选举是山岳党人的一次胜利。

3月10日选举的结果,在大资产阶级集团中引起了极度的不安和恐慌。这时,巴黎的股票行情急剧下跌,民主情绪立即高涨。律师达维兹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证明,“革命已开始抬头了”。他建议立法议会迁移到比较安静的省份里去。

民主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的成就也同样引起了路易·波拿巴的忧虑,但是路易·波拿巴却试图以欺骗和贿赂扩大自己的营垒,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6页。

并试图将工人吸引到自己一边。为此，他向工人阶级玩弄欺骗手法，在1850年春季和夏季通过几条表现政府关心工人的法令，如“改善住宅”、成立互助协会、建立老人抚恤基金组织等。山岳党对路易·波拿巴的这些阴谋诡计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而秩序党却没有藉此打击路易·波拿巴。

在这种形势下，秩序党和大资产阶级深感普选权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们非常害怕普选权会影响1852年的共和国总统选举和立法议会的选举，因而便厚颜无耻地要求取消普选权。政府向议会的核心领导、17人组成的议会常务委员会，即所谓的“布卢格拉夫”^①提出建议，提议重新制定新的选举法，“布卢格拉夫”便立即制定了新选举法草案。根据选举法草案规定，只有在某一地区居住3年以上并登记纳税者，方有选举权。这一规定显然是剥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选举权。但是，“布卢格拉夫”不愿意单独承担这一明显的破坏宪法的责任，于是便要求路易·波拿巴同意，以便共同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路易·波拿巴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草案便以政府名义，并经总统同意提交立法议会批准。但是，“布卢格拉夫”妄图以此束缚路易·拿破仑手脚的想法是再天真不过了。因为它不仅没能束缚路易·波拿巴，反而给他以可乘之机。他可以藉此机会毁掉议会。

秩序党与路易·波拿巴取消普选权、公然破坏宪法的行动引起了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强烈不满。虽然山岳党曾大声疾呼“只要他们敢于破坏宪法，就采取革命行动”，可是，这一次山岳党并没有采取任何革命行动，它只是组织“请愿活动”，并要求群众保持“最大限度的安静”。但是，群众的“安静”既无

^① “布卢格拉夫”一词来自德语“Burggraf”，系德国中世纪拥有军事和法律权力的城堡和城市官吏的名称。

助于山岳党，也无法挽救普选权。1850年5月31日，新选举法草案以433票对241票通过。新选举法剥夺了300万人的选举权。

路易·波拿巴与秩序党的斗争

秩序党在镇压和摧毁了民主力量后，正统派、奥尔良派和路易·波拿巴之间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们都认为复辟帝制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了。秩序党结合的基础虽然是复辟帝制，但他们是同床异梦，各有各的打算。复辟王朝党人企图复辟波旁王朝，奥尔良派则企图恢复七月王朝。波拿巴也有自己的野心，想当法国的皇帝。因此，新选举法的通过并没有使资产阶级阵营团结起来，相反，却使他们内部的斗争更加激化。

尽管如此，在他们看来，复辟君主制的道路已被扫清。他们都为达到自己复辟的目的提出了各自的复辟方案，进行各自的活动，竭力想让自己的代表人物爬上王位。

特别是在1850年夏季，各派的复辟活动更加强了。在议会休会期间，正统派的领导人一起拥到维斯巴金，与居住在这里的查理十世的孙子沙姆包尔伯爵勾结，共谋复辟波旁王朝。而奥尔良派则与居住在英国的路易·菲力浦的孙子巴黎伯爵联系，商议复辟七月王朝的诡计。不过，在1850年8月路易·菲力浦死后，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合并的趋向加强了，并且以宣布巴黎伯爵为无子女的“亨利五世”（沙姆包尔伯爵自称“亨利五世”）继承人的办法，停止彼此间的争吵。尚加尔涅表示，军队支持这一方案。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在王位追求者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王朝时期的奴役

手段来补充和加强。”^①而路易·波拿巴却不急于公开行动，他在暗中进行活动。事实上，1849年6月13日事件后，他已经利用有利于自己的形势发展自己的党羽，网罗自己的亲信了。但当时，他却回避尚加尔涅、梯也尔和奥尔良派提出的“颠覆共和国”的建议，他之所以回避这一问题，主要是惧怕共和国被颠覆后，奥尔良派强迫他交出政权，因此，他一直拖延时间，以便在自己羽毛丰满，而时机又有利的时候，再出面收拾残局，以达其复辟帝制的目的。

1849年夏，当议会休会时期，即当正统派与奥尔良派的首脑人物互相排斥、勾心斗角的时候，路易·波拿巴便乘机到各省进行了一次宣传性的游览旅行，目的是安抚居民保持“秩序”和扩大自己在全国的影响。他每到一地不是发表演说，便是举行宴会，而且在每次演说和祝酒词中都强调他忠于宪法和共和国。

路易·波拿巴为了击溃秩序党，独揽军政大权，于1849年秋在巴黎组织了一个特别组织“十二月十日会”。协会的创办人是一些波拿巴的亲信，其中有阿巴土乌奇、留西安·波拿巴、别尔辛伊、沃劳夫斯基、蒙托朗将军、别罗将军和皮阿将军等。他们是一批麇集在路易·波拿巴周围的流氓、骗子、扒手和无业游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②“十二月十日会”表面上是一个相互帮助的慈善团体，而实际上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他利用这些流氓无产者，到处贪污、行贿、网罗坏人；进行笼络人心的煽动和许以诺言的宣传，在路易·波拿巴巡游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64页。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74页。

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成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上，装作欢迎的群众，高呼“皇帝万岁！”当他回到巴黎时，这些人又充当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当波拿巴还未能完全控制军队时，“十二月十日会”成了他私人的军队，他依靠“十二月十日会”来同秩序党进行斗争。在他的指使下，“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殴打秩序党的议员，并指定凶手要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立法议会议长杜邦。但是，“十二月十日会”并不是保证路易·波拿巴完成国家政变、恢复帝制的决定力量，起决定作用的则是1849年他迫使巴罗内阁辞职后而任命的奥普尔—富尔德奈德内阁，因为这个内阁是独立于立法议会中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

正统派与奥尔良派从路易·波拿巴的活动中，看到了路易·波拿巴的野心，同时也看到他是这两派实现复辟计划的主要障碍。于是他们便公开表示不信任路易·波拿巴，没有让一个路易·波拿巴分子参加立法议会的常务委员会。但是，路易·波拿巴对此没有什么表示，他又借游览的名义，到诺曼底和东部各省进行活动，到处鼓吹波拿巴政权是使国内经济繁荣的保证，维护这个政权，就能进一步促使新的经济高潮的到来和资本的无限制的积累。同时路易·波拿巴的报纸大肆鼓吹路易·波拿巴的“丰功伟绩”，竭力使资产阶级相信：“如果不能维护路易·波拿巴的统治……山岳党就会把有产阶级流放到马尔吉兹岛或者送上断头台，……有产阶级的住宅便会成为空的，城堡便会被烧毁。”^①

1850年秋，秩序党与路易·波拿巴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尖锐化。秩序党的报刊公开揭露了奥普尔—富尔德奈德内阁和“十二月十日会”的阴谋活动。1850年11月召开的立法议会预示着斗争的激化。但是，路易·波拿巴回避了这个斗争，他慌忙地让奥普尔辞职，口头上解散了“十二月十日会”，同时向议会递交了正式信函，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史》第2卷，第150页。

向议会表明他完全忠于宪法。路易·波拿巴就是利用这种手腕避免了他与秩序党的严重冲突,从而保全了“十二月十日会”,掩盖了他在军队中所进行的阴谋活动。

路易·波拿巴在与秩序党进行的斗争中,特别重视军队。为了夺取军权,控制军队,他不惜采用最可耻的收买手段。他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军官和士兵。他在圣摩尔和萨托里阅兵时,对军队又采用了同样的收买办法。同时,为了绕过国防部长而进行活动,路易·波拿巴的顾问弗列里于1850年组织了一个隶属于总统办公室的特别“军事小组”。这个小组专门讨论他们在军队中所搜集的情况:军官的不满和牢骚、军官对当前政局的态度、军官对奖励和提升的反映等等,由于弗列里对路易·波拿巴的吹嘘和对军官的收买,到1851年末,他通过这个小组发出了1万多封信件,为路易·波拿巴网罗了一大批军官和将军,其中包括毫无原则的冒险家勒卢阿和德·圣阿尔诺。由于路易·波拿巴及其亲信在军队中进行金钱收买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煽动,他们不仅控制了巴黎的卫戍部队,而且在军队中逐步建立了以危险分子和专门贪图升官发财的人为骨干的支柱。这时在军队中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两个敌对的参谋部,一个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宫,另一个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宫。双方进行斗争的结果,路易·波拿巴根据宪法关于总统有权指挥军队的规定,于1851年1月撤换了秩序党人巴黎驻军司令尚加尔涅的职务。对尚加尔涅职务的免除标志着军权从秩序党手中转移到了波拿巴手中。这样一来,秩序党既失去了内阁,又失去了军队,同时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完全处于十分软弱无力的地位,它再也没有力量同路易·波拿巴进行有力的斗争了。

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准备

路易·波拿巴控制军权后,便积极集聚力量,准备政变。

路易·波拿巴首先将他的军官安插在重要的位置上。圣阿尔诺被任命为巴黎卫戍区一个师的指挥官；马尼雅恩被任命为首都驻军的指挥。1851年1月12日，路易·波拿巴成立了新内阁，巴罗什和富尔德奈德均继续留在内阁中任职。当议会表示不信任这个内阁时，路易·波拿巴为了掩盖其政变的准备工作，便代之以一个完全没有“党派色彩”、由一些不知名的官吏组成的内阁，藉以迷惑议会。事实上，到了4月11日，这个内阁又被有巴罗什、富尔德奈德、卢埃尔和弗什所参加的新内阁代替了。

1851年，法国的经济萧条加强了农民的不满情绪，于是路易·波拿巴便利用“农民运动”和警察关于“青年山岳党”将在法国东南部15个省发动起义的谣言，恐吓大资产阶级，并利用他所控制的报刊鼓吹军事独裁，说什么无产阶级一定会在1852年选举新总统和新立法议会时掀起新的革命起义。罗米埃的小册子《1851的红色怪影》公开鼓吹军事独裁政权，他在小册子里写道：“这个检查官和业主的社会正濒于死亡，只有在军人的拯救下，它才能够免于死亡。”小册子甚至公然祈求沙皇俄国进行武装干涉，藉以摧毁法兰西共和国。小册子的作者叫嚷，“只有大炮才能解决我们这个世纪的问题，虽然大炮需要从俄国进来，但只有它才能解决问题。”^①与此同时，路易·波拿巴所控制的报刊也加强了对议会和秩序党的攻击。它们大肆宣传议会和秩序党是阻碍法国经济发展、造成法国经济萧条的罪魁。由于路易·波拿巴的宣传，立法议会中的君主派代表转向波拿巴阵营的日益增多。

当路易·波拿巴在各方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就要求立法议会修改宪法，主要是取消禁止总统连任的条款。于是1851年夏季，修改宪法的问题便成了各派斗争的中心问题了。路易·波拿巴希望“部分修改宪法”，藉以延长其总统任期，保证将来能够恢复

^① 尼·扎斯金克尔：《1848年法国革命》，第189页。

帝国。正统派主张“全面修改宪法”，以便取消共和国，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在修改宪法的问题上，奥尔良派分裂了，其中一部分主张“全面修改宪法”，借以引诱路易·波拿巴放弃其政变的意图，为奥尔良派以后复辟奥尔良王朝赢得时间；而以梯也尔为首的另一部分奥尔良派则反对修改宪法，他们希望在路易·波拿巴总统任期期满后，可以参加总统候选，并得到总统的位置。但是，根据宪法规定，必须在 3/4 的代表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通过修改宪法的要求。而共和派在议会中仍拥有 215 票以上的多数，他们竭力反对修改宪法，于是修改宪法已成为不可能了，这时波拿巴分子便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发起签名和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修改宪法。他们的目的是企图在修改宪法的要求不能成功时，便可以为发动国家政变找到借口。

当修改宪法的建议被否决后，路易·波拿巴便急于发动政变了。他希望利用议会休会的机会，以利于事态的发展。可是，圣阿尔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选择这个时间发动政变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时立法议会的代表分散在全国各地度假，如果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他们可以在全国各地组织反对派，这样一来，对政变就十分不利。圣阿尔诺的意见得到了路易·波拿巴及其亲信莫尔尼、别尔辛伊、卢埃尔的同意。于是，政变的时间便决定改在立法议会全面恢复工作的时候，因为在这时候发动，便于他们驱散议会，逮捕议会著名的代表。

1851 年 11 月 4 日，当立法议会恢复工作时，路易·波拿巴便向议会提出取消 1850 年 5 月 31 日法令和恢复普选权的建议。结果被否决了。这时，关于政变的传说越来越多了。立法议会的全权代表为了议会的安全，于 1851 年 11 月 6 日提出了应有军队守卫议会的建议。这个建议提出后，路易·波拿巴及其亲信便开动一切宣传机器，防止立法议会通过这一建议，因为这个建议一旦通过，他们的整个政变计划就成为泡影了。路易·波拿巴及其同谋者决

定，如果议会通过这个决议，他们便立即动用军队包围议会，并驱散议会。但由于大多数共和派反对这一建议，建议以 403 票对 300 票被否决了。这样一来，立法议会就完全陷入不能自卫的状态了。

立法议会和秩序党权力的丧失，加强了商人、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对路易·波拿巴的同情，促进了资产阶级与秩序党的最后决裂。在这种形势下，当路易·波拿巴看到并相信自己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支持时，他便不再拖延，决定选择 1851 年 12 月 2 日，即拿破仑一世于 1805 年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的这一天，作为他发动政变的日子。

雾月十八日(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

路易·波拿巴蓄谋已久的政变，于 1851 年 12 月 1 日深夜进行。这天夜里，他们依靠国家机器、军队和警察给立法议会以沉重打击。路易·波拿巴调集了 7 万多军队，占据了巴黎的重要据点，宣布巴黎实行特别戒严，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领导人以及共和派的著名活动家，在当天夜里都在自己的住宅里被捕，其中有梯也尔、莫尔、尚加尔涅、卡芬雅克、贝多、拉摩里西尔和拉兹等，总统命令军队占领了议会所在地波旁宫，并宣布解散立法议会。同时，路易·波拿巴为了掩盖其政变的反革命性质，在 12 月 2 日夜赶印出的《致人民书》中，把这一政变说成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和拯救法国”^①。并且还宣布废止 1850 年 5 月 31 日颁布的限制选举权的法令，恢复了全民选举权，于 12 月 14 日至 21 日进行了全国投票。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路易·波拿巴政变。

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在大部分资产阶级、官吏和军官中迅速地得到了同情与支持，以蒙特兰贝格为首的教权派号召资产阶级站在路易·波拿巴一边；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只局限于“秘密反抗”

^① 尼·扎斯金克尔：《1848 年法国革命》，第 193 页。

政变,但很快被警察发现,立即镇压下去了;以维克多·雨果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左翼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保卫宪法,反对政变,并且组织了“反抗政变委员会”。12月3日巴黎的圣安东区已开始修筑街垒,试图吸引工人参加斗争。12月4日,街垒已布满了由塞纳河到圣杰尼门的整个右岸。但守卫街垒的人数不多,约1200多人,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没有积极地参加反对政变的斗争。这主要是因为共和派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它把工人在二月革命中获得的民主成果剥夺殆尽,所以工人群众对它的号召不可能发出热烈的反应。此外,还因为巴黎工人阶级在六月起义遭到镇压时被解除了武装,并由于起义者被逮捕和流放而力量削弱了。

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领导人莫尔尼和圣阿尔诺害怕斗争拖延下去会形成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于是便调动3万多军队镇压起义。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和军官采取了残酷的手段镇压起义者。他们不仅射击街垒的守卫者,而且放肆地向在林荫路上散步的群众、向咖啡馆的顾客、向居民的住宅和阳台随意射击。因此12月4日流血牺牲者甚多。据英国的《泰晤士报》报道,这次伤亡人数达2000余人,但是,路易·波拿巴政权竭力缩小这个数字,极力证明被杀害者215人,受伤者119人^①。

起义被镇压后,路易·波拿巴便开始了大逮捕,许多人被流放或送进监狱。据路易·波拿巴的官方统计,被镇压者超过2.6万多人,其中约1000余人被流放到阿尔及尔和卡伊努,约千余人被驱逐出法国。

整个欧洲反动派都欢迎路易·波拿巴的政变。沙皇尼古拉一世首先承认法国的政变,接着,英、奥、普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也都急忙承认了波拿巴政权。

1852年1月14日,路易·波拿巴公布新宪法,把总统任期改

^① 尼·扎斯金克尔:《1848年法国革命》,第195页。

为10年。11月21日至22日，路易·波拿巴强迫人民赞成议会提出的恢复帝制的决议。12月2日波拿巴正式宣布法兰西为帝国，路易·波拿巴登上皇位，称拿破仑三世。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

法兰西第二帝国代表银行家、高利贷者和大地主构成的金融寡头以及与宫廷、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大工业家们的利益。这个政权使国家的军事警察官僚机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加强起来。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到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这个国家机器已经发展到拥有55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5万人的军队了。

第二章 1848年德国革命

第一节 革命前的德国

德意志联邦的建立

在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操纵下,成立了由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汉诺威、符登贝格组成的“五国委员会”,负责处理战后的德国问题,包括国家统一,制定宪法,废除农奴制残余等。“五国委员会”于1815年6月8日签署《德意志联邦条例》,决定在原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上建立德意志联邦。《联邦条例》不顾德国人民要求战后统一的愿望,规定德意志联邦是由34个邦和4个自由市组成的联邦的国家^①。《联邦条例》规定,这34

^① 34个邦包括:1个帝国:奥地利;5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符登贝格;1个选帝侯国:黑森;7个大公国:巴登、黑森、梅克伦堡—施维林、卢森堡—利姆堡、奥登堡、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梅克伦堡—施特赖利兹;9个公国:霍尔斯坦—劳恩堡、拿骚、不伦瑞克、萨克森—迈宁根—希尔德堡豪申、萨克森—科堡—哥达、萨克森—阿尔腾堡、安哈尔特—德萨、安哈尔特—柯滕、安哈尔特—贝文恩堡;10个侯国:罗伊斯(新系)、利珀—德特莫尔德、瓦尔德克、施瓦茨堡—鲁道尔施塔特、施瓦茨堡—松德斯豪申、绍姆堡—利珀、罗伊斯(老系)、霍亨索伦—西格与林根、霍亨索伦—黑欣根、利希腾斯坦因;1个伯爵领地:黑森—洪姆堡。四个自由市是:不来梅、汉堡、卢卑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个邦和 4 个自由市都是拥有主权的国家，因此德意志联邦是各主权国家的邦联。奥地利不是其全部领土都属于德意志联邦，只是它的德语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属于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王国的东西普鲁士和波森也没有加入联邦。霍尔斯坦由丹麦国王代表，卢森堡大公国由尼德兰国王代表。《联邦条例》规定，这 34 个邦和 4 个自由市拥有主权的国家结成的持久联盟称为“德意志联邦”。《联邦条例》规定，这个联邦的目的是保持德意志的内外安全，以及德意志各邦的独立和神圣不可侵犯。《联邦条例》规定，联邦所有成员把德意志作为整体加以保卫，不受侵犯，如果联邦宣战，单独成员不能同敌人进行谈判，包括停战和缔结和约。各邦可同外国结盟，但必须保证不反对联邦及其任何成员国。

《联邦条例》规定，联邦各项事务由联邦议会加以管理。联邦议会是联邦唯一的中央机构。奥地利担任联邦议会的主席，它设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联邦条例》规定，各成员国权利平等。但是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联邦议会的会议分两级召开。一级是由 11 个邦组成的“小会议”。“小会议”共 17 票投票权，奥地利、普鲁士等 11 个大邦各 1 票，4 个自由市 1 票，其他 5 票分配给各小邦。一级是“全会”。只有制定或修改基本法时才召开全会。全会共 69 票表决权。奥地利和 5 个王国各 4 票，巴登、黑森选侯、黑森大公、霍尔斯坦、卢森堡各 3 票，梅克伦堡—施维林、拿骚各 2 票，其余各邦和 4 个自由市都是 1 票。这就保证了大邦在联邦议会中的统治地位。

联邦议会第一次会议定于 1815 年 9 月 1 日召开。

《德意志联邦条例》使德意志处于分裂状态。德意志联邦没有国家元首，没有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司法机关，没有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实际上也没有统一的军队。根据 1819 年 3 月 5 日联邦议会的决定，成立联邦军事委员会，成立由 10 个兵团组成的联邦军。其中奥地利和普鲁士各派 3 个兵团，巴伐利亚派 1 个兵团，其他 3 个为混合兵团。德意志联邦对于德意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处

于软弱无力的状态。对于德意志各邦的安全也无力提供保证。

《联邦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在联邦的所有各邦中制定一部邦议会的宪法”。这就是德国历史上的“宪法允诺”，它实际上是一纸空文。“宪法允诺”只是在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形势下做出的一种姿态。1815年后，德意志各邦都恢复了反动统治。君主专制统治一切，官僚政治倒行逆施，警察横行于各邦领土内，全国处于一片黑暗的局面。1815年以后，德意志各邦人民要求实现“宪法允诺”，争取统一和自由的斗争不断高涨。1818—1820年间，首先在南德4邦：巴伐利亚、巴登、符登贝格、黑森—达姆施塔特颁布了宪法。到19世纪20年代，已有29个邦颁布宪法，实行立宪君主制。但是，两大邦—奥地利和普鲁士直到1848年3月革命前，还没有颁布宪法，仍然实行专制统治。政治分裂和专制统治是政治上压在德国人民头上的两重大山，是德国人民进步和发展的主要障碍。

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根据1818—1819年的统计数字，德意志联邦的人口为3000万。1848年达3500万。普鲁士王国1804年人口为1000万，1848年达1600万。到1848年革命前，德意志联邦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约25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0%强。

19世纪前半期，德意志各邦的农业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9世纪德意志各邦的资本主义化是从农业改革开始的，而各邦的农业改革又有不同的情况。

归属普鲁士王国的莱茵兰，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推行法国革命时期的土地法。农奴制在这里被废除了，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小农阶级。

在普鲁士王国本土，国有土地上的农奴制在18世纪就逐步废除了。1807年普鲁士首席大臣施泰因颁布《十月勒令》，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农奴从1810年马丁节（11月11日）起成为自由人。

1811年9月14日，普鲁士首席大臣哈登贝格又颁布《调整勒令》，规定了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条件。1815年以后，普鲁士东部各省加速了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过程。1821—1848年，普鲁士共颁布10项法律、2项命令、5项内阁命令、2项条例和2项规定，规定有关调整和赎买农民封建义务的问题。到1823年，私人庄园农民已有2/3得到调整。到1836年，96%的农民调整结束。到1848年，有世袭权的富裕农民在付现金或租息后得到赎免封建义务的“赎免农民”共289651户。他们不需要割地或割地很少。财产状况较差，需要割地才能解除封建义务的“调整农户”为70582户。可见，富裕农民解除封建义务的比贫困农民要多得多。到1848年，普鲁士王国共有36万农户解除了封建义务。

德国西南部的巴登大公国，早在1783年就宣布废除农奴制度，给农民以人身自由。1818年的《巴登宪法》又废除了新获土地上的农奴制。1820年巴登废除农奴的人身税、丧葬税等人身赋税。1831年取消了农民负担的国家劳役。1833年规定国家贷款给农民，以赎免封建义务和什一税。到1848年，巴登大公国已消灭了农奴制的最后残余。萨克森王国在1823年颁布《赎买条例》。符登贝格王国在1830年以后才允许农奴赎买封建义务。巴伐利亚王国在1808年颁布勒令，规定废除农奴制度，地租可以赎免。在德国的西北部，废除农奴制度的进程缓慢。下萨克森在1833年颁布《赎买条例》，农民可用现金或租息赎买领主的封建权利和租税，农民在赎买后可享有自己的地产。汉诺威王国解放农民最晚，那是德国统一后的事情了。

德意志各邦从自上而下进行的农业改革，同样是使农民脱离土地的过程，是农业从封建农奴制经济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农民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他们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日工或长工。容克地主再不靠农奴，而靠雇佣工人耕种他们的土地。农民的解放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批自由

的劳动力。在德意志各邦的农业改革中，地主不仅掠夺了农民的大批土地，而且也掠夺了农民的大批资金，它又是德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1815—1847年间，农民向容克地主缴纳现金为1854万塔勒以上，农民每年要付利息将近16万塔勒。这同样为德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经过改革，德意志各邦的封建农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在易北河以东，容克地主藉改革之机夺取了农民153万摩根土地，扩大了自己庄园的土地耕作面积，进行资本主义经营。在改革过程中也发生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改革头十年，1/3的庄园土地转移到资产者手中，在德意志各邦形成了农业资产者。下表是19世纪中叶德国的土地占有情况^①：

占有土地数	户数	%	土地数	总面积%	平均
600(摩根)以上	17675	0.9	39200368	43	22/8
300—600	14481	0.7	5992242	7	414
30—300	387741	18.8	35796201	39	92
5—30	588134	28.5	8316927	9	14
5以下	1052120	51.1	2236491	2	2.1
	2060157	100	91542169	100	44.2

从上表看出：第一，占有600摩根以上土地的农户只占总农户的9%，却占有总面积43%的土地。可见，经过改革，土地都集中到少数容克地主和农业资产者手中。广大农民丧失了土地，占总农户51.1%的农户，却只占有2%的土地。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占有30到300摩根土地的农户，是德国占有土地最多的第二个集团。他们的户数占总农户的18.8%，占有土地总面积的39%。这应该说是农业资本家集团。

^① 海恩兹·卡姆尼泽：《1848年革命前德国的经济结构》，国营人民和知识出版社，柏林，1952年德文版，第7页。

在普鲁士王国内部,各省土地占有情况亦不尽相同。请看下表①:

省份	600 摩根以上	300—600	30—300	5—30	5 以下	总共
波美拉尼亚	62	6	28	3	1	10502886
波森	56	4	24	5	1	9930250
西里西亚	52	4	30	12	2	12156702
勃兰登堡	49	6	39	5	1	13487196
普鲁士	42	9	45	3	1	20539552
霍亨索伦	32	4	31	26	7	390273
萨克森	28	7	12	3		7986144
莱茵兰	22	7	34	27	10	973725
威斯特发利亚	17	8	57	15	3	6831961

从上表看出,第一,易北河以东地区,包括波美拉尼亚、波森、勃兰登堡、西里西亚 4 省占有 600 摩根以上土地的农户占土地总面积的 50—60%,而西部这样的大地产只占 10—20%。第二,在西部各省,如萨克森、莱茵兰、威斯特发利亚 3 省占有 30 到 300 摩根土地的农户比例比较大,说明这里资本主义农场比较发达。第三,在西部各省占有 5 到 30 摩根土地小农比易北河以东多得多,说明这里发展起小农经济。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确立,农业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易北河以东,发展起资本主义化的容克庄园经济和富农经济;在西部和西南部则以中农和小农经济为主,西北部同样发展富农经济。随着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农业生产力已有很大提高。耕作方式集约化,三圃制变为轮作制,休耕面积大为减少。在容克大庄园里开始使用英国的农业机械。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使用化肥。他们不仅经营农业,在庄园里还开办酒厂、糖厂。德国的酒和糖在大陆各国和英国销售。

德意志各邦基本上通过改革使农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① 海恩兹·卡姆尼译:《1848 年革命前德国的政治结构》,国营人民和知识出版社,柏林,1952 年德文版。

列宁称之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到 1848 年革命前，德意志各邦从封建的农业向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的过渡已经基本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1848 年德国革命中，土地问题已不是主要问题，但它仍然是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因为，农奴制度虽然废除了，但还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容克地主还保留封建特权。在地主庄园上还保留庄园法庭和庄园警察。容克地主可随时审讯农民，而多数丧失土地的农民同样要为争取土地而斗争。

德国工业化的开始

1783 年，埃北菲尔商人布吕格尔曼在杜塞尔多夫修建了德国第一家机械纺织厂。从此，纺织机逐步进入德国。到 1800 年，德国已拥有珍妮机 2000 台。但是，在德国工业化的道路上真是关山险阻，困难重重。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关卡林立，国内没有统一的市场。农奴制度和行会制度仍然占统治地位，企业家没有经营的自由。现代的公路尚未修建，水路运输也因关税壁垒而运价昂贵。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和 19 世纪初的改革给德国工业带来了一线生机。许多生活必需品不能再从英国进口，因此，诸如人造染料制造业，制糖业，都在德国国内发展起来。施泰因的《十月勒令》，允许财产交易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同英国竞争剧烈的棉纺织业也在德国发展起来了。1800 年，萨克森只有纱锭 432 支。萨克森纺织业主为了同英国竞争，大力引进机械，几年后纱锭已达万支。西里西亚的亚麻布行销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等国，价值达 500 万塔勒。英国煤再不能进口了，煤炭业遂迅速发展。鲁尔煤产量已达 23 万吨，萨尔地区和西里西亚的煤矿也大有发展。

1815 年后，德国不仅在政治上出现了反动局面，经济上也出现了逆转。国家仍然处于分裂状态，行会制度还未废除。更为严重的是，英国商品卷土重来。一些邦的统治者仍然迷恋于英国的自由贸易论，国门对英国商品大开。年轻的德国工业大有被扼杀在摇篮

之中的危险。德国的工商业家们为了拯救德国的工业，到处奔走呼号，发出痛苦的呼救声！1819年，建立德国工商业者协会。协会要求取消各邦之间的关税壁垒，统一关税，保护本国工业。普鲁士首先在1818年实行保护制。1826年建立北德关税同盟，1828年建立南德关税同盟，1829年建立中德关税同盟。1834年终于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开始为18个邦，7.7万平方公里，人口2300万。1835—1836年间，巴登、拿骚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又相继加入，人口达2500万。这为德国工业革命的开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德国工业革命的其他条件也具备了。第一，由于农业改革的结果，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和工矿地区。第二，为工业化积累了相当的资金。一部分商人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由于供应军需品而大发横财。在农业改革中，容克地主从农民手中掠夺的大量财富，一部分投资于工业。在德国的资金积累中，股份公司和储蓄银行的成立起了巨大的作用。1818年柏林出现了第一批储蓄银行，到1828年普鲁士已有储蓄银行31家。1826年普鲁士建成第一批股份公司。同样的公司也在萨克森建立起来，它们搜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投资于工业。第三，在德意志各邦逐渐形成了商品粮销售市场，为工业提供粮食和原料，也开辟了农村的工业品市场。第四，1825年英国取消了机器出口的禁令，德国得以从英国购买机器，招聘技工和技术人员。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德国进行大批固定资产投资，工业革命在德国启动。

德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于棉纺织业的机械化。1825年，米尔德在布勒斯劳修建了第一家机械化棉纺织厂。到1893年，普鲁士已有棉纺厂1780家。关税同盟各邦棉纺织业发展更快，1846年已有纱锭75万支。毛纺织业发展更为迅速，1846年毛纺纱锭为45万支，只有12.5%是家庭手工业，其余都是机械化工业。

采矿、冶金、金属加工等重工业部门也开始了向机械化生产过

渡。19世纪40年代,正是德国煤炭业、冶金业和蒸汽动力大发展时期。1847年,普鲁士石煤产量为357万吨以上,褐煤为1341810吨。莱茵—威斯特发利亚和西里西亚成为主要的煤炭基地。煤成为蒸汽机、火车、轮船、煤气厂的主要原料。冶铁是重要的工业部门。工业对钢铁的需要不断增加。1837—1847年10年间,铁的需要量从124630吨增加到339653吨。同时期,铁产量从154432吨增加到204278吨,钢产量从5197吨增加到5634吨。蒸汽动力有很大发展,1837年普鲁士有蒸汽机491台,7500马力。1846年为1139台,217000马力。从19世纪40年代德国开始发展机器制造业,代替从英国进口机器。1837年柏林修建了机械厂,1841年自产第一台火车头。

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德国工业革命中,铁路建设起了巨大的作用,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德国工业革命是从铁路建筑开始的。1835年,德国第一条铁路——纽伦堡—富尔特铁路建成。这条铁路是纽伦堡商人筹资修建的,第一年利息达20%。铁路投资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因此,30年代在德国掀起铁路投资热。铁路股份公司纷纷建立。1835年成立莱比锡—德累斯顿铁路公司,发行股票150万塔勒,数小时内抢购一空。莱比锡—德累斯顿铁路于1839年建成,全长133公里。1837年成立莱茵铁路公司,资本300万塔勒。这条铁路于1843年通车。1837—1847年10年间,德国铁路投资增长20倍,从2100万马克增加到45500万马克。1845年,全国铁路已达2000多公里。德国的铁路修建,促进了德国工业革命的进行。首先,它方便了国内的交通运输业,降低了运费。其次,铁路投资增长速度快,占国民总投资比例大,一般达22%,最高达25%。就是说,国民投资的1/4投资于铁路。可见铁路投资在德国工业革命中的作用。第三,铁路修建促进了重工业部门,如钢轨、机车、煤炭等工业部门的发展。到40年代,德国不仅铁路有很大发展,公路建设和水路运输也相应发展起来。1806年全国公路只有

240 英里,1848 年已达 1573 英里。1824 年第一艘轮船航行在莱茵河上,不久建立了莱茵河轮船协会,促进了水上运输业。

19 世纪 30—40 年代,德国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工业革命在进行,但只是工业化的初步。德国现代化大工厂还不多。1846 年全德现代工厂工人不超过 70 万。光普鲁士就有手工工场工人 55 万,手工业者 84 万。德国本国的机械制造业刚刚开始。德国工业还落后于英法两国。1849 年,关税同盟各国 70% 的人口还住在农村,农业产值占国民工农业总产值的 70%。

德国工业发展的重重障碍并未消除。关税同盟已经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发展要求结束国家的分裂状态,要求统一的民族市场、统一的工商业立法,统一的货币和统一的度量衡,要求居民的迁徙自由。例如,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纺织品,已经不满足于本地市场,强烈要求全德市场。国内的行会制度还没有完全废除。1815 年后,仅堡、梅克伦堡、奥登堡、汉诺威、黑森—卡塞尔还把行会制度恢复起来。1825 年巴伐利亚政府通过法律,把行会置于政府指导之下,企业经营自由,但行会制度并未正式废除。1815 年以后普鲁士王国实行三种不同的制度:在草茵和威斯特发利亚地区继续推行拿破仑时期的法律;在东部各省,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的法律继续有效;在新占领的东部省份,行会制度还占统治地位。1845 年普鲁士政府取消了 3 个地区的区别,实行统一的法律,但尚存的行会制度并未正式宣布废除。

30 年代“统一和自由”运动

“统一和自由”是 19 世纪德国人民奋斗的目标。这个运动发端于 1817—1819 年的大学生运动。在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和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影响下,30 年代出现第二次高涨,以 1832 年汉巴哈节的召开为其顶点。

30 年代,德意志人民争取统一和自由的斗争是从北德各邦开

始的。1830年9月6—7日,由于不伦瑞克公爵卡尔二世拒绝召开邦议会的要求,人民发动起义,烧毁不伦瑞克公爵的宫殿,并把他赶走。起义人民建立了国民军,召开邦议会,接管了政权,承认卡尔大公之弟威廉为新公爵。1832年10月12日,不伦瑞克颁布宪法,建立一院制国会。1830年9月,在黑森选侯国首都卡塞尔爆发起义,马尔堡和汉瑙两市人民随之响应。各地农民也纷纷举行暴动。选帝侯被迫让步,召开邦议会,承认市民自卫军的合法性。1831年1月5日,黑森选侯国颁布宪法,成立一院制国会,国会有立法、批准预算、征税、弹劾政府的权利。在汉诺威王国,1830—1831年冬,哥廷根市市民和大学生发动起义,赶走了市政府和警察部队,控制哥廷根市达1个月之久。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国王威廉四世不得不让步,召开了等级会议,并委托历史学家和国家法学家达尔曼等人起草宪法,颁布实施。1837年,英国坎伯雷公爵恩斯特·奥古斯特登上汉诺威王位,宣布废除威廉四世颁布的宪法。这引起汉诺威人民的强烈抗议。哥廷根7名著名教授联合签名抗议书。他们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弗·克·达尔曼、历史学家格文努斯、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二兄弟、物理学家威·韦伯、东方学家埃瓦尔德和国家法学家威·阿尔布雷希特。学生们把他们的抗议书制成副本,向全国散发。汉诺威政府把7位教授开除教职。这就是著名的哥廷根“七教授事件”。全德各地都展开了支援7教授的斗争。奥古斯特国王被迫在1840年又颁布一部新宪法。1830年9月,萨克森王国首都德累斯顿和莱比锡都爆发了人民起义,国王被迫让步,颁布宪法并进行资产阶级性质改革,实行两院制议会,议会有批准法律和预算的权利。

“统一和自由”运动在南德各地蓬勃发展。南德各邦除资产阶级自由派外,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更为活跃。南德争取“统一和自由”的中心之一是巴登大公国。1831年,巴登议会开幕。在会上,自由派教授卡·罗泰克和卡·魁克尔提出一系列立法方面的提案。

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决议，废除农村中尚存的什一税和其他苛捐杂税。根据魏克尔的建议，巴登议会通过了新闻法，允许新闻自由。魏克尔对德国统一提出建议。他要求执行《联邦条例》第十三条，在全德确立宪法制度，建立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领导下的真正的民族代表机构—全德议会。关于德国统一的问题，自由派著名代表人物保罗·普菲策尔写的《两个德国人的通信》，第一次提出由普鲁士领导建立德意志联邦国家。他主张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在“统一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上，他主张先统一后自由，而不是先自由后统一。南德争取“统一和自由”的另一个中心是莱茵—普法尔茨地区。这里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茨魏布吕肯的律师弗里德里希·舒勒尔。他是邦议会议员，在会议上对政府的税收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同菲·雅·西本普法伊弗尔和约·格·维尔特组建了全德性组织“新闻和祖国协会”。协会提出下列要求：①普遍的新闻自由；②统一的德意志和民主共和国宪法。维尔特在《致德意志人民之友》中公开要求实现德意志的政治统一和人民主权，建立全国的立宪政府。这份呼吁书印行5万份，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进一步推动德国人民争取“统一和自由”的斗争。“新闻和祖国协会”遭到镇压，他们出版的刊物也被查封。

1832年的汉巴哈节^①使30年代德国的“统一和自由”运动达到高潮。1832年，由西本普法尔和维尔特倡议，由32名学者签名写成呼吁书，邀请德意志爱国者于5月27日在普法尔茨的哈尔特朗德的汉巴哈宫庆祝德意志人民的民族节日。3月27日大会如

^① 1832年5月27—30日，在普法尔茨诺伊斯塔特附近马克斯堡汉巴哈宫举行的政治集会，庆祝巴伐利亚王国行宪一周年。会议的组织者是G·维尔特和J·塞本普法菲尔，来自全德各地的约3万人参加了集会。他们反对暴力统治和君主制，要求实行人民主权，建立统一和自由的德意志以及共和的欧洲。维尔特在会上做了激动人心的发言。德意志联邦议会采取镇压政策，逮捕了维尔特，在大会上的其他发言人也被迫流亡国外。德国人民为了纪念这一象征自由、民主的节日，称这一天（5月27日）为汉巴哈节。

期召开。参加大会游行的达3万人,全国各城市各阶层人民都有代表参加。游行队伍前面飘扬着黑、红、黄三色旗,维持秩序者佩带的三色绶带上写有“振兴德国”的字样。维尔特在庆祝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讲到德意志这块美丽的国土已经遭到蹂躏,遭到抢劫,已经是分崩离析,任人污辱。他谈到德意志国土丰富的自然资源,现在却成为饥饿、悲伤、痛苦的场所。伟大、光荣、强盛的德意志,应属于欧洲强国的前列,现在却受到外国人的歧视。德意志政权本应成为开明的欧洲、自由和国际秩序的保卫者,现在却成为人民自由的镇压者,成为黑暗、奴役、未开化的权力的永久帝国的基石。他在讲演中谈到德意志的改革,谈到德国改革和欧洲改革的关系。他号召德意志爱国者团结一致,为了自由、人民主权和民族幸福而做出大量牺牲!最后他高呼:“万岁!为了德意志成为统一而自由的国家而三呼万岁!为了联邦的、共和的欧洲而欢呼!”汉巴哈节庆祝大会在德意志各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巴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都召开了类似的大会。汉巴哈节的组织者遭到镇压,西本普法伊弗尔和约尔特均遭逮捕。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取消巴登邦1831年的新闻法,对邦议会的权利加以限制,加强书刊检查,禁止集会和结社自由,以维护德意志联邦的法律和秩序。

反动派的镇压,并没有使“统一和自由”的运动消失,反而进一步高涨。黑森大公国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人民继续进行斗争。1834年3月,格·毕希纳在达姆施塔特建立“人权之友社”,出版《黑森邮报》。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给茅屋以和平,给宫廷以战争!”他们号召人民进行起义,建立自由的德意志!“人权之友社”在1833年被解散,毕希纳逃亡国外。1833年4月3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发生暴动。数十名大学生、革命者、知识分子、工人和波兰军官袭击法兰克福市警察总部。他们预计,以法兰克福为起点,推动各地人民起义。但是,由于准备不足,仓促上阵,又没有得到郊区农民的支持,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

从镇压汉巴哈节组织者开始，联邦议会开始第二次政治大迫害。1833年6月30日成立联邦政治调查局，对所谓的“蛊惑者”进行残酷的镇压。1834年6月12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大臣会议上通过决议，强化进行镇压的法律和各项措施，加强对大学、刊物和法院的监督。

40年代的“统一和自由”运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形成

1840年6月7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逝世，45岁的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位。威廉四世生于1795年，是在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环境中长大的，深受德意志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即位后实行一些改革措施，释放政治犯，取消书刊检查制度，给哥廷根7教授恢复教授职务。这引起了普鲁士各界的希望，希望实现他父亲的宪法允诺。这样，在40年代德意志各邦的“统一和自由”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德国形成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在普鲁士，自由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东普鲁士省长泰奥多尔·雪恩。他是19世纪初普鲁士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施泰因的合作者。1840年9月5日，东普鲁士议会在哥尼斯贝格开会。他向新王递交请愿书，要求实现1815年的宪法，允许召开全德议会，遭到国王的拒绝。雪恩为此写了秘密传单《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抨击普鲁士专制制度，要求立宪和出版自由。雪恩为此而被解除省长职务。普鲁士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是约翰·雅科比。他本人是位医生。1830年参加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的起义。1841年2月，他写了著名的小册子《四个问题，一个东普鲁士人的回答》。他提出四个问题：等级会议的愿望是什么？它有什么权利？它能决定什么？它还能做什么？他对这四个问题都做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等级会议完全失去了它的作用，大臣们垄断政府，司法不能独立，警察和书刊检查是普鲁士官僚的两个奴仆，

人民难以参政。他要求颁布宪法。小册子由莱比锡出版商,自由派奥托·维冈德秘密出版,在全国各地散发,送到正在开会的东普鲁士议会每位议员席上,可见它的影响之大。雅科比为此被哥尼斯贝格法院判处两年半徒刑。但是,它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在柏林、莱比锡、布勒斯劳和莱茵省都出现了拥护雅科比的小组。

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中心是莱茵地区。这里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出现了强大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大卫·汉泽曼、哥特弗里德·康普浩森、古斯塔夫·梅维森、赫尔曼·冯·贝克拉特、弗里德里希·哈克尔特等人。大卫·汉泽曼经营纺织业起家,1837年成为莱茵省铁路公司领导人,1838年任亚琛商会主席。1840年8—9月,他上书普王弗·威廉四世,要求颁布宪法,召开全德议会,实行政治自由。哥特弗里德·康普浩森是科伦银行家,1839年任科伦商会主席。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温和派,属于自由派右翼。康普浩森主张同王权妥协,通过小德意志道路统一德国。普王弗·威廉四世拒绝汉泽曼的宪法要求以后,莱茵地区自由派就致力于创办一家大型报纸,作为他们的政治喉舌。为此他们建立“两合股份公司”。《莱茵报》于1842年1月1日正式出版,青年黑格尔派鲁滕贝格任编辑,青年卡尔·马克思经常为报纸撰稿。从1842年8月,马克思担任主编。《莱茵报》的出版,标志着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形成。

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另一个中心是西南各邦。这里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政治上保留宪法,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因此,这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活跃,从理论上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舆论准备。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魏克尔和罗泰克。卡尔·魏克尔的理想是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国家。他是孟德斯鸠思想的崇拜者,但他不主张废除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卡尔·罗泰克是法国路易·菲力浦制度的拥护者,同样主张君主立宪制。罗泰克的政治思想是二元论,一方面承认民主制度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另

方面又承认现时的君主政权是合理的。他们二人在1834—1849年间合编19卷的《国家辞典》。这本书是他们政治观点的集中体现。有人认为它是两代德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教科书，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圣经。

19世纪40年代形成的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认为德国已经不需要18世纪末法国那样的革命了。他们只要求“统一和自由”。他们把统一寄托在某大国身上；把自由寄希望于立宪。他们在理论上提出“法律国家”的主张。哥廷根和海德堡大学教授罗伯特·摩尔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他著《符登贝格王国国家法》和《基于法律的国家原则的政治科学》。他认为，法律不仅决定政治活动的形式，也决定国家的目的。这是公民自由的表现。他反对君主专制，坚持个人参加政府的权利，但他又认为个人权利和君主国家主权之间是可以调合的。

在19世纪40年代的“统一和自由”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是其左翼。他们在政治上追随资产阶级自由派，支持自由派的立宪要求，但也提出了自身的更加激进的要求。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多数知识分子属于这个集团。在南德，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司徒卢威和黑克尔。古斯塔夫·冯·司徒卢威在青年时代学习法律，1832年起在曼海姆任律师。他是巴登激进派领导人，出版《曼海姆日报》和《德意志观察家》报。他的主张比较激进，对巴登自由派政府的各项政策提出批评，要求取消等级制度，改善贫困阶级的状况。他主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采取革命手段而不惜一切牺牲。弗里德里希·黑克尔青年时在海德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学习法律。1838年也在曼海姆任律师。1842年任巴登议会第二院议员，深受司徒卢威思想的影响，成为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诗人和革命家奥尔格·赫尔维格属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他是在巴黎侨民兵团的组织者。他生于斯图加特。从1836年开始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批评符登贝格政府，因而遭到迫害，不得

不逃亡瑞士。1841年他发表《一个活人的诗》，激动人心，从而名声大振。1844年出版他的《仇恨之歌》，表现了革命的正气，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在流亡瑞士和法国时期，力图组织民主力量，在巴黎建立民主委员会，为即将爆发的革命做准备。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属于40年代自由反对派的一部分，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加激进，但终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9世纪40年代，德国无产阶级虽然不够成熟，但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了，它的重要标志是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开始于1840年，那末工人阶级的运动则开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①

在德国反动统治的高压下，在国内成立革命的工人组织是很困难的，因此最早的工人组织是在国外侨民当中产生的。1832年在巴黎成立“德意志工人协会”，后来改组为“流亡者同盟”。1836年“流亡者同盟”发生分裂，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正义者同盟”。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威廉·魏特林是同盟的重要成员。魏特林是空想共产主义者。他批判资本主义，提出一个人人从事劳动、人人待遇平等的理想方案。“正义者同盟”的成立和魏特林思想的传播，标志着德国工人的初步觉醒和组织化。

19世纪40年代德国出现了“真正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德国土壤上产生的小资产阶级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尔·格律恩、莫泽斯·赫斯等人。他们攻击资本主义，但不主张阶级斗争，宣扬德国可以直接向建立在友谊和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新社会过渡。这个集团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页。

1848年革命前夕，马克思和恩格斯已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们积极地参加了德国的阶级斗争，成为革命的左翼。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大约建立了30个支部和小组，开展积极的革命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德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批评真正社会主义者不顾德国的实际情况，硬把法国的情况套在德国身上，而把德国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敌人的错误。1845年，恩格斯写了《德国状况》一组文章，揭露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德国尤其是普鲁士的反动局面。在革命即将来临的1847年，恩格斯写了《普鲁士宪法》和《德国的制宪问题》两篇重要文章。他指出，德国革命即将来临了，由于英国商品的竞争，使普鲁士资本无处投放，商业处于困境，工业生产下降，铁路投机热中断，金融市场现金匮乏，加上物价上涨，国家处于危机边缘。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德国的阶级关系，分清敌我友的界限。他们指出，在德国要打倒的即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贵族，即大土地占有者阶级，以及与贵族独霸局面相适应的封建制度。他们深刻地分析了德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以及某些资本主义化了的贵族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他们认为，当时的德国只有资产阶级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是人数众多的阶级，但他们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或者站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或者向资产阶级投降。德国无产阶级还是一个没有团结一致的阶级，对夺取公共事务的领导权还没有准备。马克思写了《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恩格斯写了《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都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在当前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才会以一个统一的阶级行动起来，打倒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恩格斯指出：“在德国，资产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那

末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随后尽快地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资产阶级同政府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支持自由资产阶级，但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①

革命形势的形成

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各邦的工农群众运动迅猛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政府的斗争日益加强。在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的形势下，1845年和1846年连续发生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灾情尤为严重。农产品价格上涨50%，粮食奇缺。关税同盟各邦不得不大批进口粮食。大批居民逃往美洲。1847年又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从英国开始的，很快波及到德国。1847年德国棉纺织品生产比1846年下降40%。机械制造业也呈倒退状态。银行倒闭，铁路公司破产，铁路股票下降。商店关门，仅汉堡一个城市就有128家商店破产关门。在农业歉收、工商业危机的情况下，投机商人乘机囤积物资、抬高物价。这样一来，物价更加上涨，物资更加奇缺。在柏林，妇女们从一个市场跑到另一个市场，竟然买不到任何东西。于是，1847年4月21日和22日终于酿成了饥民暴动。在这场所谓“马铃薯战争”中，广大群众走上街头，高呼革命口号，捣毁商店，甚至砸碎王宫的玻璃。只是在政府调来了军队以后，暴动才被镇压下去。

但是，就是在这种饥民遍野、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宫廷宴会仍频频举行，狩猎游乐仍有增无已，对没落贵族的赏赐仍日益增加。结果，国库空虚，财政困难。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威廉四世被迫于1847年2月3日下令召开普鲁士8省议会代表组成的联合议会。这个议会虽然没有立法权，但是它有表决借款和征收新税的权力。

^①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4页。

4月11日，联合议会在柏林开幕。出席议会的贵族代表为341人，其中下层贵族自由派代表为70人；贵族执政党代表为271人；市民和农民代表306人。其中反对政府的为多数派，共376人。资产阶级对联议会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他们希望把它变为常设的立法机构。可是威廉四世在开幕式上却公开宣布：他永远不会让“君主和人民之间的自然关系变成有条件的、宪法上的关系，让‘写成字的废纸’来代替自古以来神圣的忠诚。”贵族代表坚决拥护国王的演说，而资产阶级自由派则竭力反对它。于是，双方在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威廉四世提出的两个提案：一是保证银行用于解放农民的贷款；一是保证国家修筑东部铁路的借款，但均被否决了。议员们说，如果不同意实施宪法，不实行代议制，就决不同意借款。威廉四世于6月26日下令解散议会。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 不仅普鲁士的革命形势日益成熟，而且巴伐利亚和巴登的革命形势也日益形成。

从1829年起，巴伐利亚就由路德维希一世统治着。巴伐利亚虽保留了宪法，但实际上仍然是专制统治。路德维希一世沉溺于酒色，很少过问政事。1846年秋国王企图封其宠爱的西班牙舞女洛勒·芒泰为女伯爵，但遭到阿比尔内阁的反对。1847年2月，阿比尔内阁辞职，组成了以奥丁根—瓦雷斯坦内阁。这个内阁唯洛勒之命是从，人称之为“洛勒内阁”。宠姬洛勒任意任免大臣，引起国内各阶层的强烈不满。1847年2月初，首都慕尼黑爆发了市民、工人、学生参加的强大示威游行，在街上发生了战斗。示威学生痛打上街的洛勒，国王采取镇压政策，关闭了大学。这就引起各阶层人民的更大义愤，人民一致行动起来，迫使国王同意大学复课，洛勒亦在2月11日离开巴伐利亚。但是，这并没有使阶级矛盾缓和下来。

1847年春，巴登大公国的革命运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城乡

各地大量散发号召武装起义的传单。有的传单上还提出了具体的革命措施：建立共和国，逮捕并消灭革命的敌人，夺取公国的仓库和银行，实行劳动人民的普遍武装。1847年4月散发的一份传单甚至号召农民消灭官吏和贵族，建立“自由国家”。

在巴登进行革命活动的两个主要派别是自由派和激进派。

巴登自由派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派别，人们称之为“半截子革命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马提、卡尔·西奥多·魏克尔、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巴塞尔曼、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格文努斯等。

巴登的激进派势力比较强大。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团结在他周围的共和主义者有弗里德里希·卡尔·黑克尔、罗伦兹·布伦坦诺、约瑟夫·菲克勒尔等人。

在普鲁士、巴伐利亚、巴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符登贝格和黑森以及其他各邦的革命形势也在发展着。在符登贝格和黑森两个邦的议会里都已形成了资产阶级反对派。1847年五月符登贝格的首都斯图加特也掀起了革命暴动。

在革命即将来临的形势下，德意志各阶级各党派都在聚集自己的力量，表明自己对革命的态度。

温和自由派于1846年11月在杜拉赫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创办自己的机关刊物《德意志报》，由历史学家、海德堡大学教授格文努斯主编。该报主张在自由主义的普鲁士的领导下改组德意志邦联，完成国家统一。

1847年9月12日，激进派在奥芬堡召开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司徒卢威起草的纲领，即奥芬堡纲领。纲领提出下列要求：1. 全民武装；2. 人民自由选举产生全德议会；3. 普选；4. 出版自由；5. 宗教、信仰、教学的自由；6. 陪审制；7. 普遍享有德意志公民权；8. 按收入公平征税；9. 普遍教育；10. 劳动保护和劳动权；11. 调整劳资关系；12. 民众施政、节约施政；13. 所有部长、官吏加强责任心；14.

废除一切特权。

1847年10月10日,在大卫·汉泽曼、海因利希·冯·加格恩、弗·巴塞尔曼和卡·马提的领导下,自由派又在法兰克福附近的赫彭海姆集会。他们反对奥芬堡纲领,只要求在全德实行立宪,各邦成立立宪政府。

总之,到1847年末,德国革命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各邦政府已处于孤立的境地。关于当时的革命形势,恩格斯曾经指出:“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時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①

第二节 德国三月革命

南德各邦的革命运动

1848年初,德国已处于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夜。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激荡在德意志的上空,加速了德国革命的爆发。德国革命是从南德各邦开始的。

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巴登以后,曼海姆市各阶层人民欣喜若狂,马上行动起来。2月26日晚,反对派的领袖们起草了请愿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4页。

书。请愿书包括如下要求：1. 武装人民，军官由选举产生；2. 出版自由；3. 实行陪审制；4. 立即召开全德议会。请愿书最后说：“人民代表们，我们要求你们坚决执行这些决议，我们准备为实现这些决议献出生命和财产。同时我们坚决相信，全德人民都决心同我们一起这样作。”

3月1日，巴登各个城市的代表团都集中在首都，准备举行示威游行，支持由黑克尔起草的人民政治要求：实行普选、责任内阁制和各项政治自由权利以及一些社会措施，如保护和保证劳动、消灭劳资之间的不和谐等。这些要求同1847年9月12日奥芬堡会议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

贝克政府和巴登议会的温和自由派决定采取拖延政策，并根据马提的建议，把这些要求交给专门委员会去审查。

可是，人民已行动起来了。3月1日夜，外交部大楼燃起熊熊烈火。奥登瓦尔德和什瓦兹瓦尔德的农民起义也已开始。在这种形势下，巴登议会只好在第二天就通过决议，接受上述要求。巴登大公也被迫让步，答应满足议会的各项要求，并在3月9日解除了政府大臣特列福德和列根努厄尔以及巴登出席联邦议会的代表布利杰尔斯道夫三人的职务。贝克政府同时宣布，准备实行特赦，废除封建义务。

到3月中旬，巴登大公国的政权已转到自由派手中。但是，革命并没有停止，人民群众要求继续前进，下级军官纷纷集会，弗赖堡士兵发动暴动。激进派也加强了自己的活动。司徒卢威和菲克勒尔公开宣传“专制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进入人民主权的时代了”。

3月19日，激进派又在奥芬堡召开群众大会。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坦诺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会议通过了决议。决议提出下列要求：对政府表示不信任，把常备军同民兵结合起来，实行累进所得税，取消一切特权，学校

与教会分离。会议决定加强各民主党派的力量，从城市到乡村成立政治俱乐部，形成全国的俱乐部网。会议还选出了中央委员会，黑克尔担任主席。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定采取武力镇压。大公请求符登贝格国王派军队来。3月21日，巴登议会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决定采取相应措施，以应付当前的局势，并对贝克政府表示信任。巴塞尔曼甚至提议，要逮捕破坏秩序和财产的罪人。

可是，革命继续向前发展。3月26日，弗赖堡和海德堡都召开了群众大会，会上公开号召成立共和国。黑克尔和司徒卢威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为在全德宣布成立共和国而斗争。

在巴登革命运动爆发的同时，巴伐利亚也掀起了革命高潮。2月26日，首都慕尼黑市民已起草请愿书。纽伦堡市民却抢在前面向国王呈递了请愿书。人民要求取消书刊检查制度，实行陪审制和责任内阁制，军队宣誓忠于宪法。同时强烈要求召开代表会议，讨论和批准人民提出的各项要求。

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大臣来宁根三次晋见国王，要求洛勒的走卒、内政大臣毕尔克斯辞职，并要求尽快接受人民的各项要求。

国王路德维希一世拒不接受这些要求，于是人民便行动起来了。3月2日，慕尼黑街头上贴满了要求毕尔克斯辞职的传单，傍晚，群众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攻击武器商店，捣毁了毕尔克斯的住宅。群众高喊“反对国王——淫棍”的口号。预料到军队可能前来镇压，群众自动筑起街垒。大学生也提出请愿书，强烈要求政府允许成立大学生军团。他们高呼“打倒洛勒内阁”的口号，在街上举行示威游行。

国王路德维希一世无可奈何，只得让步，宣布把召开国会的日期从3月31日提前到3月16日。可是群众继续战斗，请愿书从各地像雪片一样地飞来。军队发生动摇，士兵开始转到人民方面来。

在这种情况下，路德维希一世不得不接受人民的各项要求。3月6日公布了国王的命令，答应取消书刊检查制度，实行责任内阁制，扩大选举范围，实行陪审制。他还罢免了瓦雷斯坦为首的“洛勒内阁”，任命自由派领导人唐—吉特马尔为内政大臣，罢免了毕尔克斯。

恰在这时，3月17日，洛勒回到了慕尼黑。这时群众忿激已极，强烈要求“绞死淫棍——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在3月20日夜宣布退位，由王子马克西米连继位，妄图以此挽救王朝垂危的命运。

此外，其他的小邦，如黑森—达姆施塔特、符登贝格、库尔黑森、拿骚、汉诺威和萨克森等也都先后爆发了革命运动。各个邦的革命群众都根据各邦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并迫使政府当局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在南德各邦的城市掀起革命运动的同时，农村的革命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各邦的农民运动中，爆发最猛烈、规模最大的是巴登的农民运动。

3月4日，巴登公国的奥卡尔省爆发了农民起义。奥登瓦尔德的农民起义声势最大。他们捣毁地主的城堡，砸毁地主的住宅。3月6日，涅卡省的农民以武力迫使海里姆施塔特伯爵以书面形式放弃了一切封建特权。农民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一直扩展到美因河和涅卡尔之间的广大地区。

巴登农民起义的另一个中心是南部的滨湖地区。这里封建剥削十分残酷。它靠近瑞士，共和党人在这里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因此，从3月份起，农民就拿起武器，拒绝向地主履行各种封建义务。在多瑙乌申根、斯图加赫、恩根等地，农民纷纷举行集会，要求地主放弃他们的特权。

巴登政府对农民运动采取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政策。它把兵力部署在农民起义的地区，并从巴伐利亚和符登贝格借军队进行

镇压。在武力镇压的同时，巴登议会又于3月10日通过了废除封建义务的法令，企图以此缓和农民运动。

这时，在拿骚公国爆发的农民运动，规模也比较大，而且目标更加明确。从3月初开始，各地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纷纷要求把公爵家族的领地变为国有财产。3万多农民从各地涌向威斯巴登。农民威胁说，如果不答应他们的全部要求，就毁掉所有城堡。座落在约翰内斯堡的梅特涅庄园只是在政府派出军队保护的情况下，才未被摧毁。

南德各邦的农民运动对德国的封建制度是沉重的打击。但是处于革命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却不敢发动农民进行革命。那些已参加政权的自由派对农民运动采取了欺骗加镇压的政策，最后使南德各邦的农民运动没有进一步发展，到4月初运动就平息下去了。

柏林3月18日革命

柏林是德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革命的中心。革命的火种首先在这里传播，革命的烈火也首先在这里爆发，并从这里燃遍整个德意志联邦。

3月6日，柏林的一些激进青年在动物园里召开会议，拟定柏林青年的特别请愿书，并于3月7日以柏林全体居民的名义发表。这份请愿书的主要要求是：政治自由，实行大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行人民代议制度，尽快召开联合议会等。但是，柏林当局禁止他们向国王呈交这份请愿书。警察局长甚至威胁说：如果举行示威游行，就坚决进行镇压。但是，柏林青年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于3月9日又在同一地点集会，与会者达3000人。他们决定把请愿书提交城市顾问，请他们转交给国王，但也遭到拒绝。

随着青年运动的兴起，工人运动也活跃起来了。他们以巴黎工人为榜样，积极参与政治集会。不少人都参加了动物园的集会，并

在会上发了言。3月10日至13日，柏林出现了一份反映工人要求的传单。传单谈到了工人的悲惨状况，要求消灭资本家与高利贷者的剥削，成立劳动部，改善工人的状况。

这时，以盖拉赫^①为首的军人集团决定进行镇压。从3月7日起，柏林卫戍部队已进入战斗状态，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随时准备出兵镇压。所以，3月13日晚，当两万多人在动物园集会时，便遭到了军队的袭击。当人们从动物园冲出来时，又受到骑兵的袭击。当场死一人，许多人负伤。这时，工人们便在格留恩什大街筑起街垒，并从另一条街的武器店里夺来了武器。次日，政府当局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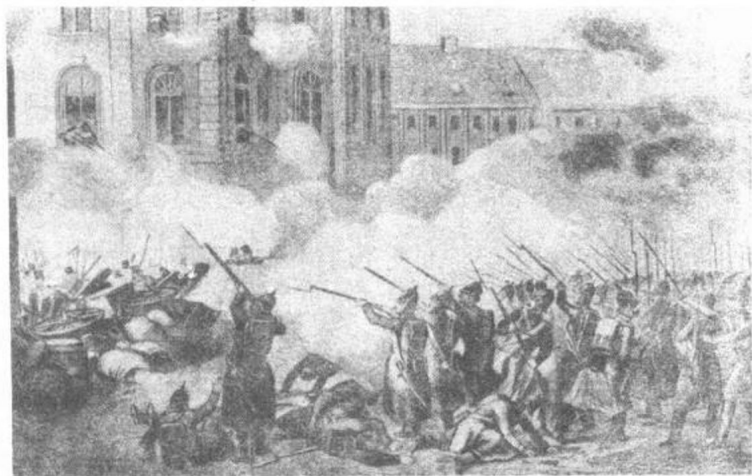


图12 街垒战士与政府军在亚历山大练兵场的战斗
下令禁止一切集会。但是到了晚上，人们又聚集在王宫广场。军警驱散人群时，人们使用石块回击军队，并迅速筑起了两座街垒。16日人民又同军队发生冲突，死亡20人，伤150人。

^① 盖拉赫出身于贵族，属保守派。1844年任普鲁士少将，1848年革命时期任威廉四世的参谋长。

军队对人民的屠杀，引起了各阶层的强烈不满，甚至资产阶级温和派和统治阶级内部也对此不满。内政大臣鲍德尔什文格和阿尔宁都劝国王让步，以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国王被迫宣布于4月27日召开联合议会。

正在这时，先后传来了维也纳革命和梅特涅垮台的消息。消息传来，柏林的革命人民欢欣鼓舞，而普鲁士王宫一片混乱。3月17日，革命人民在康别尔什大街集会，下午又在康别尔什大街的啤酒酒店举行集会，通过了维尼格尔起草的请愿书。请愿书的主要内容是：1. 军队撤出柏林；2. 组织市民武装；3. 出版自由；4. 尽快召开议会。会议经过长时间讨论，决定第二天在王宫广场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国王接见他们的代表团。

当日晚，莱茵省代表团也到达柏林，准备向国王呈递请愿书。

3月18日清晨，威廉四世接见了两个代表团。他对代表团宣布已经签署了两道命令：取消书刊检查制度，尽快召开联合议会。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国王的两道命令表示热烈欢迎。但人民却认为国王是在欺骗，他们强烈要求军队撤出柏林。

为了对付政府的武力镇压，机械工人齐格利斯特领导群众在王宫广场以南修筑了第一批街垒。兽医乌尔邦组织群众在另一条街上筑起街垒。全城各地响起警报。几千武装工人队伍向市中心调动。学生也参加了街垒战。柏林最贫困的居民区——福格兰区筑起了17座街垒。

3月18日起义是自发的，没有领导，没有计划，彼此缺乏联系。有些青年学生企图把群众组织起来，给街垒战士下达命令，但这只是个别行动。政府军队野蛮屠杀，摧毁大批街垒，但不能摧毁街垒战士的斗志，到傍晚起义人民已占领了柏林3/5的地区。

普利特维什将军指挥1.4万步骑兵，配有34门大炮，并打算从波茨坦和其他地区调军队来。他的计划是把起义队伍从市中心赶走，以保证同城外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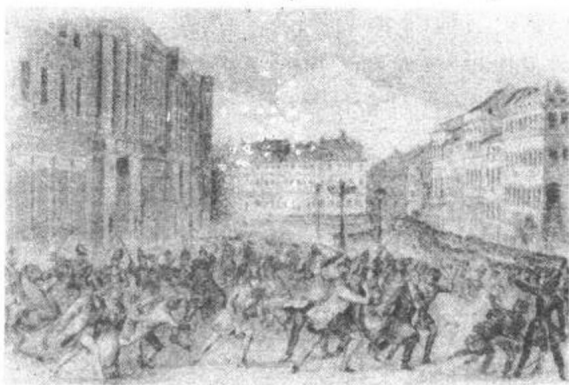


图 13 3月18日柏林起义

夜晚,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城内火光冲天,警报连续不断。亚历山大广场的保卫者夺取了3门白炮,反击政府军。这时政府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广大士兵同情起义人民,他们不听指挥官的命令,不向群众射击。军队的动摇对王室是致命的打击。普利特维什向威廉四世报告说:“陛下,您可以下令砍掉我的脑袋,但军队确实从我手中溜走了。”

王室的命运危在旦夕。格奥尔格·冯·芬克对威廉四世说:“王冠将从您的头上滚到地下去!”^①他劝国王,现在停止流血,为时未晚。而普利特维什则劝国王离开首都,撤走军队,然后再有计划地包围城市。

3月19日清晨,威廉四世发表了题为《致我心爱的柏林同胞书》。他攻击革命人民是“一群和平破坏者”,他说革命是“一小撮坏人,主要是虽然经过搜查但仍然停留一周以上的外国人”挑起的。但他不得不向柏林居民保证:“军队将从所有街道和广场撤走”。军队撤到波茨坦。

^① 马克思:《〈新莱茵报〉审判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8页。

3月20日，王子化装离开首都，逃往英国，沾满人民鲜血的将军们也纷纷外逃，起义胜利了。

康普浩森—汉塞曼内阁

普鲁士国王并没有来得及同军队一起撤离柏林。开始是因为王后有病，后来是因为人民已把王宫包围起来，他也无法离开了。3月19日清晨，街垒战士迫使国王和吓得半死的王后一起走上王宫阳台，向死难烈士致哀。

3月21日，威廉四世发表《告我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书》，他答应承担起德国的统一事业。宣誓忠于黑、红、黄三色的民族旗帜，同意把普鲁士合并于德意志，实行出版自由、陪审制和取消领主法庭。同时，他又在大臣的陪同下，穿上礼服，袖上佩戴着三色绶带，走上街头，表示拥护革命，但3月25日他却又暗中向将军和军官们保证，军队一定要开回柏林。

3月29日，普王威廉四世任命自由派领袖康普浩森组阁。参加内阁的有容克代表阿尔宁—包伊森堡、贵族地主施韦林、政治家阿夫里德·冯·奥尔斯瓦德和威廉·波恩曼、银行家汉塞曼、保守派代表海因利希·冯·阿尔宁伯爵。4月2日，康普浩森召开联席会议。他向代表们提出拟定“未来普鲁士宪法的基础”，并且制定普鲁士议会的选举法。

康普浩森内阁得到旧政府的支柱——贵族、官僚和军队的支持。新内阁对觉醒了群众非常恐惧，所以它便利用整个旧的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旧官僚制度丝毫没有改变，旧官僚一律官复原职。所以，马克思指出：“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①

^① 马克思：《〈新莱茵报〉审判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8页。

第三节 法兰克福议会

德意志预备国会的召开

1848年革命开始后,德意志面临国家统一问题。但如何完成国家统一,在德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各阶级各党派却有不同的主张。在德意志各邦革命已经开始的条件下,德意志联邦议会拼命争夺统一德国的领导权。它在3月29日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它是“德意志民族和政治统一的合法机构”。3月1日,联邦议会向各邦政府和人民发出呼吁书。呼吁书说:“为了对外安全,以及国内的合法秩序、安宁、安全和财产”,应该采取共同的行动。3月10日,它又向各邦政府提议,派代表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来,参加审查联邦宪法的工作。资产阶级则主张走合法的议会道路统一德国。根据南德自由派阿达姆·冯·伊策斯泰因的邀请,3月5日在海德堡召开自由派会议,有51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多数是南德的自由派,其中有巴塞尔曼、马提、格文努斯、魏克尔、罗泰克、加格恩等人。普鲁士代表为汉泽曼、卡尔·施德特曼和加罗维。奥地利只有一名代表阿道夫·威斯纳尔。黑克尔参加了会议,是激进派代表。会议通过《告德意志人民宣言》,建议召开德意志民族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罗迈尔、魏克尔、宾格尔、加格恩、施德特曼、奥古斯特·维利希和约翰·冯·伊策斯泰因组成的七人委员会(也称“海德堡七人团”),负责筹备全德预备国会的召开。3月21日,海德堡七人委员会向德意志各邦社会活动家发出邀请信,请他们参加预定于3月31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召开的全德预备国会。

3月31日,预备国会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大厅隆重开幕。钟楼上敲起钟声,全城悬挂起黑红黄三色旗。出席会议的代表约

500人，普鲁士代表为141人，奥地利只有两名代表。出席会议的其他各邦代表人数是：符登贝格52名、巴登72名、黑森—达姆施塔特84名、巴伐利亚44名、萨克森26名、汉诺威9名。

会议选举自由派、海德堡大学教授米德尔迈耶尔为主席。会议讨论海德堡“七人团”提出的政治纲领，主张在德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共和派代表司徒卢威坚决反对这个纲领。他提出废除世袭君主制，在德国建立美国式的联邦国家。司徒卢威还要求取消常备军和官吏，取消一切封建特权，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实行累进税，教会与国家分离，实行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司徒卢威还提出了一些社会要求，如改善劳动者的状况，建立劳动部，消除劳资之间的矛盾。但司徒卢威的纲领却忽略了土地问题。他的提议因遭到多数自由派代表的反对而被否决。

根据埃津曼的提议，会议讨论了预备国会的权限问题。他提出，它的权限应该限制在筹备全德国民议会。大多数代表赞同这个提议。

会议接着讨论了全德国民议会的选举程序问题。会议决定，选举不单在联邦的领土上进行，而且应该在未加入联邦的东、西普鲁士和什列斯维希进行，比例是每5万人选举一名代表。会议在对待波兰问题上表现大国沙文主义，甚至司徒卢威都主张居住在波兹南的德意志人应该参加选举。

4月1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废除选举资格的限制。会议决定，实行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由各邦政府自行决定；全德国民议会的地点设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会议讨论了由谁来执行会议的决议问题。共和派司徒卢威和黑克尔主张，在自由选举的国会还没有掌握德国的命运以前由预备国会掌权。以使联邦议会不起作用。自由派反对这个意见。他们提议选出50人委员会来执行会议的决议。会议以368票对148票通过了自由派的提议。于是，会议委托50人委员会负责筹备全德国民议会的召开，并

建议它同联邦议会取得联系。

预备国会第三次会议在4月2日举行。在这次会上共和派齐茨、勃鲁特、福格特、依什丁等人竭力促使会议同联邦议会断绝关系。齐茨提议，要求联邦议会废除它以前通过的违反法律的特殊规定，并清除那些促成通过和实施这些规定的人物。可是，自由派巴塞爾曼却主张预备国会可以同联邦议会自由联系，不受任何限制。巴塞爾曼的提议被多数代表所接受。黑克尔和司徒卢威等少数共和派宣布退出会议，以示抗议。

4月3日，预备国会举行第四次即最后一次会议，主要选举50人委员会。50人委员会选举结果，38名是自由派，12人为共和派。黑克尔和司徒卢威等共和派领导人都落选了。同时预备国会还决定，未来德意志的宪法制定工作委托给全德国民议会。

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的召开

全德国民议会的选举于4月末5月初在各邦举行。普鲁士的选举是在5月10日，与普鲁士国民议会的选举几乎是同时进行。波兹南的选举斗争非常激烈。普鲁士政府企图把波兹南并入德意志联邦，遭到波兰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对波兰的再瓜分，因而拒绝参加选举。预备国会决定，每个居民都有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但是，各邦又规定了许多限制。选举的人口统计是根据1818年的统计数字，为3000万人，但1848年联邦的实际人口为4200万。这样，许多工业城市都被排除在外。选举不是按当时的居住地点，而是按出生地点，许多外出谋生的居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巴伐利亚取消了未纳直接税的居民的选举权。萨克森剥夺了家仆的选举权。汉诺威和库尔黑森的工人和家仆也没有参加选举的权利。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剥夺了领救济金者的选举权。巴登的选举是在军刀的保护下进行的。巴伐利亚的选举是打着反对中央集权主义，拥护分立主义的旗帜。只有萨克森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选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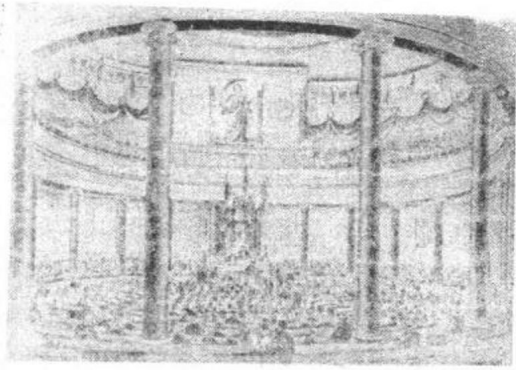


图 14 法兰克福议会大厅

中获胜。奥地利的选举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的条件下进行的。奥地利一方面要保持它在德意志联邦中的霸权地位，一方面又要保持奥地利的独立性。它在给出席法兰克福议会代表的命令中说，全德议会应建立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军队和舰队，但同时要保证奥地利的完整和主权以及奥地利自身代表机构的独立性。在经济上，奥地利认为有责任推行保护关税政策，拒绝参加关税同盟，以保护其工业不受其他邦工业的竞争。

1848年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简称法兰克福议会）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隆重开幕。

全国选出代表和副代表共831名，代表为586名。5月18日，出席会议的代表只有330人，以后陆续到达约500人。普鲁士和奥地利两邦的代表占2/3，以普鲁士的代表最多。出席会议的有自由派和激进派的著名人士或领导人，有许多科学家、教授和文化界人士，还有许多是三月革命前受过冤枉、迫害、坐过牢的进步人士。在1848年的议会辩论中，逐渐形成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的政治派别。根据他们居住地点或集会地点的名称，被人们称呼不同的名称。极右翼有两个集团。一是奥地利的拥护者，约30人，称为施

泰纳派；一是亲普鲁士的，共 122 人，因其在米拉尼咖啡馆集会而被称为米拉尼派。他们都是旧制度的拥护者。其中有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代表冯·芬克、反动将军拉多维茨、上西里西亚大地主里赫诺夫斯基公爵、施韦林伯爵等人。极右翼也包括奥地利股份公司经理洛伊达·布鲁克。而 150 人左右的共和派，属于左翼，其中有维津顿克、奥地利诗人莫利斯·哈尔特曼、自然科学家罗斯麦斯列尔、卡尔·福格特、依什丁、工业家埃津斯迪尤科。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集团，首领是罗伯特·勃鲁姆。勃鲁姆在他主编的《德意志国会报》上号召建立共和国，但他是企图建立联邦共和国，甚至主张在个别邦还可以保留君主制。他们因集会地点被称为德意志宫廷派或纽伦堡宫廷派。极左翼或民主派被称为丹尼尔斯贝格派。属于极端民主派的有政治家劳伦斯·布伦坦诺、路德维希·西蒙、政论家阿尔诺德·卢格、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施略费尔、律师齐茨、特留茨什列尔、著名的维也纳杂志工作者威兹涅尔和历史学家齐麦尔曼。极端民主派实质上也是小资产阶级集团，他们并不主张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兼·沃尔夫也加入了这个集团，但他勇敢地揭露了法兰克福议会中资产阶级的怯懦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左右翼之间还有一个为数甚多的中间派，他们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代表，约 270 人。他们分为四派。一是中右派，被称为卡西诺党。以集会地点而得名。他们又称为教授党，约 122 人，主要是德国的学术界人士，包括达尔曼、法学家约翰·海克谢尔、加格恩、巴塞爾曼、马提、魏克尔、西姆桑等人。他们要求统一和宪法，但反对革命，认为最好是同政府妥协制定宪法。二是兰德贝尔格党，也以集会地点命名。他们力图同右翼联合。三是奥格斯堡宫党，四是威斯丁大厅党。他们属于中左，约 80 人。中左的代表人物有雅克布·维耐杰伊、政治家弗兰茨·拉沃斯和诗人路德维希·乌兰德。奥格斯堡宫党从 9 月份逐渐同卡西诺相结合，威斯丁大厅党则同左派统一。政治派别的划分反映不同的阶级、阶层的

利益和社会地位。南德中小邦的下级官员基本上站在左派的立场上，而高级官员则多为右翼。

帝国政府的成立及其各项政策

5月19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选举南德自由派、黑森首相海恩利希·冯·加格恩为主席、曼海姆律师亚历山大·冯·佐伊龙为副主席。加格恩善于演讲，是在解放战争中长大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主张君主立宪制。在主席台的上方悬挂着：

祖国的伟大，祖国的幸福，

创造它，把它交给人民。

议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央政府的问题。以达尔曼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在根据宪法产生政府以前，成立由法兰克福议会批准的三人执政，对议会负责。而右翼主张把临时政权交给各邦政府任命的统治者。左翼则坚持从议会中选出行政首脑。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异常激烈。议员们不仅在会议上，而且休息时间在走廊里也辩论不休。可是，这时革命形势已经逆转，右翼占了优势。在议会争论中，加格恩发表了激烈的演说。他说：“谁去创立中央政府？先生们，我冒昧地对你们说，我们必须亲自去创立临时中央政府（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他继续说：“未来的中央政府须由一位摄政掌握，同时成立责任内阁。”他提议，这位摄政必须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值得尊敬的人、最高身份的人，是一位皇族。他的提议受到右翼的热烈欢呼。根据加格恩的提议，6月29日，议会以486票的绝对优势（26票弃权）选举奥地利大公约翰为帝国执政。

奥地利的约翰大公在资产阶级当中有一定威信，以梅特涅的反对者著称。他娶了一位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妻子，发表过关于德国统一的演说。7月11日，约翰大公来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第二天就任帝国执政。德意志联邦会议宣布结束自己的工作，把权力

交给帝国执政。但同时又宣布，如果执政履行职务不能令各邦满意，联邦议会将恢复活动。这就为它后来复辟保留了借口。

同时成立了帝国政府。政府首脑是奥地利人，前联邦议会主席安东·冯·施美尔林，他兼任内政大臣。外交大臣是巴伐利亚的卡尔·来宁根伯爵、司法大臣海克谢尔，商务大臣是不来梅商人阿诺尔德·杜克维茨、财政大臣为莱茵银行家海尔曼·贝克拉特，军事大臣是普鲁士的爱德华·配伊科尔。

表面上，德意志中央政府成立了，但实际是空架子。德意志各邦政府都承认了新的中央政府。外国承认德意志中央政府的只有一个匈牙利，而当时的匈牙利还没有被一个国家所承认。7月16日，帝国政府要求它对各邦军队有指挥权时，奥地利根本不予理睬，普鲁士表示要继续掌握它的军队，必要时可支援中央政府。汉诺威，巴伐利亚等邦政府也同样加以拒绝。

帝国政府成立后，成立了宪法、国际事务、海军、陆军、法律和司法、经济事务、教会和教育、财政、内阁责任等委员会，负责起草帝国宪法和国家各方面的立法工作。经济委员会又下设农村经济、工业、商业、银行和信贷、统一度量衡和货币制度、取消限制迁徙自由、工人等专门委员会。1848年10月，通过废除一切封建依附形式的总规定。11月又通过决议，废除内部关税，德意志各邦都统一在关税同盟内。法兰克福议会通过的决议，只是一纸空文。帝国政府既无能力也不愿意认真地执行这些决议。国民议会通过的决议要在各邦执行，还要各邦王公的批准。奥地利政府则坚决反对废除国内关税的协定。

7月3日，宪法委员会起草一份人民的或基本的权利草案，或称“德意志帝国公民权利”。12月28日，这个草案作为法律加以公布，后来列入宪法第6章。它规定了德意志人民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而且规定全德国只有一个标准，各邦无权废除和限制。它规定，每个德意志人都享有德意志公民权，有权选举国民议会的议员。每

个公民都有权在帝国境内的任何地方居住和生活，迁徙自由不受限制。一切贵族等级和一切阶级特权都被取消，宣布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公职对所有有能力的人开放。人身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每个公民都有言论、出版、宗教和道德标准的自由。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教育归国家管理，取消牧师的教职。公民有请愿和平集会的权利，但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和安宁。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征税不能偏袒个别阶级和有产者。全部司法权归于国家，废除世袭法庭，法官独立，审讯公开。允许各邦都有一部宪法和人民代表机构，政府对人民负责。对德意志联邦境内的非德意志居民做了特殊规定，在它们生存的领土范围内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最后规定，每个德意志公民都受法律保护。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帝国中央政府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但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上又表现为大德意志主义。他们对捷克人民的革命抱反对态度。他们认为波希米亚是“德意志领土”。应该派代表参加国民议会。捷克民族没有逻辑根据，性质反动。他们对1848年6月布拉格起义持敌对态度，甚至要求奥地利政府进行镇压。他们对奥地利军队镇压布拉格起义表示欢迎，感到鼓舞。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波兰问题上讨论的更为激烈。预备国会时曾经通过决议，要建立一个自由的波兰。德国革命过程中，普鲁士政府竟不顾波兰人民的反对，将波森省加以分割，大部分并入普鲁士。波兰人把这个问题提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会中左派勃卢姆和卢格都要求重建波兰国家。而议员威廉·约尔丹公开鼓吹强者的权利，征服者的权利。说德意志在波兰征服的领土是自然的需要。结果，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以342票对31票的绝对优势通过决议，赞同普鲁士政府采取的行动。

第四节 三月革命后德国革命 与反革命的斗争

巴登共和党人起义

在巴登三月革命的日子里，共和党人在各种集会上都不断发出建立共和国的号召。此后，共和党人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并准备举行起义。4月2—3日，阿海尔涅、格林茨纳赫、麦尔斯堡、埃门金根等地都举行了群众大会。《滨湖报》编辑菲克勒尔在阿海尔涅的群众大会上号召进行武装起义，并说有5000武装精良的侨民兵团准备渡过莱茵河来参加起义。同时，共和党人还召开秘密会议，选定巴登大公国南部的滨湖地区作为起义地点。

为了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和可能的起义，贝克政府便向联邦议会建议，希望联邦第7兵团支援巴登，还决定调动各邦军队镇压巴登革命。几天内法瑞边界军队调动频繁。骑兵达2000多人。两营黑森步兵已进入拉什塔特，符登贝格和巴伐利亚的军队也向巴登移动。

这时，双方的斗争愈演愈烈。4月8日民主派领袖菲克勒尔被捕。菲克勒尔的被捕，使共和党人认识到“现在需要行动了”。司徒卢威马上离开曼海姆到多瑙乌申根去，准备发动什瓦茨瓦尔德居民起义。4月9日晚，在这里召开共和党人秘密会议，决定采取具体行动，发动滨湖地区的居民。同时黑克尔也离开曼海姆去康斯坦茨，不久，司徒卢威也来到这里。他们在这里准备让以前的军官维利希和济格尔担任武装起义的领导人。

4月12日，黑克尔和司徒卢威向滨湖地区居民发出号召，并组织康斯坦茨居民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他们号召说：决定的时刻

到来了,空话不能保卫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凡能拿武器的男子,要拿起武器,带6天干粮,4月14日在多瑙乌申根集合。

4月13日,黑克尔率领队伍从康斯坦茨出发,开往多瑙乌申根。黑克尔的队伍从康斯坦茨出发时只有60人,在途中队伍不断扩大,最后,达800人。4月14日他到达斯图加赫。黑克尔在这里宣布特殊命令,解散滨湖地区政府,任命共和党人彼特尔为康斯坦茨共和国行政长官。4月15日他率队伍到达多瑙乌申根,同司徒卢威和本市起义队伍相会合。

这时,符登贝格的5000军队已经逼近多瑙乌申根,切断了通往奥芬堡的道路。起义队伍只得向弗赖堡移动,经过赫林塔尔山路,把特罗德纳乌作为会合地点。可是不久就得知,这条路也被政府军队占领了。他们不得不沿着瑞士边界向维津塔尔前进。在距特罗德纳乌不远的别尔纳乌村,黑克尔会见了50人委员会派来的代表什帕兹和维尼杰伊。他们要求,起义队伍放下武器就可以得到特赦。黑克尔愤怒地回答说,如果在14天内国王们放弃王位,就对所有国王实行赦免。

4月18日,黑克尔的队伍到达维津塔尔,19日到坎德尔龙,准备从这里进入莱茵河谷。起义队伍长途行军,没有根据地,造成士兵疲惫,军心动摇。恰在4月20日清晨,起义队伍遭到弗里德里希·冯·加格恩指挥的三营巴登军和三营黑森军的突然袭击。在坎德尔龙附近的小山上发生了决定性的战斗。政府军向起义队伍猛烈开火,起义队伍英勇还击,加格恩当场被击毙。但起义队伍寡不敌众,武器不佳,被迫撤退,向瑞士边境逃散。黑克尔等人也于第二天进入瑞士。

另一支起义队伍由济格尔、斯特卢威、米格林格等人率领,4月15日从康斯坦茨出发,已经到达特罗德纳乌。他们共4000人。黑克尔队伍在坎德尔龙失败后,他们继续向弗赖堡前进。可是,这时由霍夫曼将军指挥的政府军已经占领了弗赖堡地区,以逸代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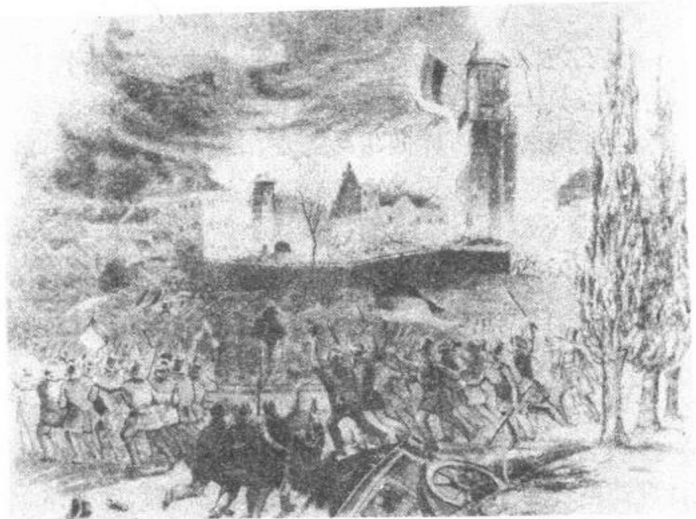


图 15 巴登起义

4月22日,司徒卢威率领先头部队到达弗赖堡近郊,没等主力部队到达,便发动进攻。政府军用霰弹进行射击,司徒卢威的先头部队慌忙撤退,造成济格尔指挥主力部队的混乱。4月24日起义队伍最后被打散,没有被俘的都越过边界逃往法国。

第三支起义队伍是在法国建立的侨民兵团,由著名诗人格奥尔格·赫尔维格率领,共700人。他们驻在莱茵河左岸的斯特拉斯堡,等待进入巴登领土的信号。4月23日夜,他们得到济格尔的通知,让他们越过莱茵河前来会合。他们进入巴登领土后,向南进发。4月25日他们得知济格尔队伍已经失败。4月27日,他们在多辛巴赫同黑森大公的军队遭遇。双方激战的结果,侨民兵团被打败,330人被俘。赫尔维格在当地农民的掩护下,经过艰苦努力,逃往法国。

侨民兵团失败后,巴登共和党人起义就最后失败了。

普鲁士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

三月革命后,普鲁士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西里西

亚是农民遭受压迫最深的地区。三月革命的消息传来后,这里的农民便纷纷举行起义和暴动。他们手执棍棒,冲进地主庄园,要求立即取消封建地租、领主法庭、领主狩猎权,交还“解放”时农民缴纳的赎金,并烧毁封建文契。奥拉乌州的农民捣毁了扎乌尔姆拉斯科维奇伯爵的城堡和啤酒厂、扎乌尔姆—伊尔沙的城堡以及其他地主的城堡。于是,地主纷纷逃往城市,请求政府派军队进行镇压。

同时,农民也提出了政治要求。3月31日在马赫维茨村召开的布列斯拉夫和涅马尔克州的农民会议,通过了对未来立宪机构代表的命令,要求废除封建制度,要求平等的选举权、平等纳税,废除负担不均的国家税收。所以,西里西亚的报纸报道说:“农民暴动与日俱增,威胁极大,长期积压在心头的反抗压迫者的怒火表现为极端可怕的形式。”

在普鲁士,不仅农民运动蓬勃兴起,而且工人和城市居民也积极展开了斗争。在柏林,民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3月20日在柏林成立政治俱乐部,成员包括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工人。俱乐部主席是格奥尔格·荣克。在布列斯拉夫成立了民主俱乐部,首脑是来亨巴哈伯爵。在科伦成立了民主协会。在波恩由两位民主派人物哥特弗里德·金格尔和卡尔·苏尔茨组织了民主俱乐部,并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这些民主组织都是自发产生的,互不联系,但它们都在群众中展开了积极的宣传鼓动工作,对封建势力、对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投降政策给以沉重打击。

3月26日,在柏林申豪兹尔城门举行工人大会。大会组织者是著名的街垒战士、兽医乌尔邦,主席是维尼格尔博士。大会向政府提出下列要求:1. 由工人和企业主组成劳动部;2. 缩减常备军;3. 普及人民教育;4. 收养残废劳动者;5. 廉价政府;6. 召开联席会议。根据马克思·沙斯列尔和施略费尔的建议,在3月29日的集会上决定建立人民同盟,主要由没有财产的人们组成。第二天公布了同盟的宣言,确定同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实行真正的人民代议

制，人民武装，人民的政治和道德教育。同盟还出版《人民之声报》，促进柏林工人的团结。

3月29日建立了另一个工人组织——临时中央俱乐部。会议组织者为盖克谢尔和斯蒂芬·波尔恩。盖克谢尔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出席会议的达150多人。在中央俱乐部领导下，成立了许多地方性的俱乐部。他们利用俱乐部这种组织形式，恢复已处于瓦解状态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4月6日召开中央俱乐部全体会议，由波尔恩主持。根据施略费尔的建议，中央俱乐部和人民同盟组成联合委员会。

中央俱乐部在4月11日再次召开会议。在波尔恩主持下，会议选举了中央俱乐部的中央委员会（共28人，每行业1人）和负责制定章程委员会。4月19日举行新的会议，一致通过委员会提出的章程。章程规定，在柏林和各省建立工人委员会，出版机关报——《德意志工人报》，主编为什米特和贝林德斯。

4月初，普鲁士各俱乐部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普鲁士立宪会议的选举问题。联合议会公布两级选举法之后引起普遍不满。4月10日，柏林青年和工人又在动物园召开群众集会，选出特别委员会，确定要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而斗争。特别委员会在4月13日晋见康普浩森，要求改变选举法。康普浩森拒绝了委员会的要求。这时，特别委员会决定4月20日在王宫广场举行游行示威，迫使国王和政府实行让步。可是，委员会内部对示威游行有不同意见。少数人怕示威游行会引起武装冲突，反对示威游行，并退出委员会。多数人仍然坚持举行示威游行。《人民之友报》主编施略费尔勇敢地号召人民进行斗争，反对妥协。他说：“我们不应抱有幻想，以为能够用某种和平方法达到目的。”

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和康普浩森内阁，以及德国的有产阶级，都十分惧怕4月20日的示威游行。他们深恐饥饿群众的示威会变成武装起义，因而拼命进行戒备。康普浩森内阁下令警察局长和近

卫军司令，要用武力驱散示威群众。4月20日清晨，全城街道戒备森严，骑兵在全城巡逻，资产阶级市民自卫军也子弹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

在政府准备进行武力镇压的时候，委员会的两名委员荣克和盖尔德临阵脱逃。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埃赫列尔和施略费尔先后于4月19、20日被捕。20日的示威游行流产了。

巴登四月起义和柏林四月示威都相继失败了。它标志着掌权的自由派战胜了激进派。这使普鲁士内部的反动势力开始抬头。在普鲁士国王弗·威廉四世周围，形成了以盖拉赫将军为核心的秘密内阁。四月示威失败后，他们公开地进行活动，筹备保守派报纸《十字架报》，请逃亡在外的威廉亲王回国。

普鲁士议会的召开与康普浩森 —汉塞曼内阁的辞职

1848年5月1日和8日，进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选举。选举按两级选举制进行，共选出400名代表。他们多数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容克地主只有3人，手工业者28人，农民18人。在政治观点上，普鲁士国民议会分为4个集团。右翼代表150人，都是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的拥护者，其中有牧师阿道夫·西多夫、莱茵法学家赖兴斯佩格、西里西亚工厂主卡尔·米尔德、波美拉尼亚教授爱德华·鲍姆施塔克和普楞茨劳市长威廉·格拉博。中间派右翼约30—40人，代表人物是汉斯·翁卢。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主张同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妥协。中间派左翼的代表人物为国民经济学家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和新闻记者洛塔尔·布赫尔。他们同样主张在普鲁士建立君主立宪制。左翼约100人，以北德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为主。代表人物为雅克比和贝内狄克特·瓦尔德克。

普鲁士国民议会在5月22日正式开幕，选举米尔德为议长，

老改革家雪恩为名誉主席。普王弗·威廉四世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重弹制定宪法必须同王室相妥协的老调。接着就讨论了康普浩森—汉塞曼内阁提出的宪法草案。宪法草案是根据1830年法国宪章和1831年比利时宪法为蓝本制定的。它宣布普鲁士为君主立宪国家,实行责任内阁制。议会由两院组成。上院由王子、国王任命的人、选出的代表(收入为2500到8000塔勒)组成。下院根据1848年4月8日联合议会通过的选举法进行选举,实行两级选举制。

宪法草案公布后,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普王弗·威廉四世对宪法不表态。议会内左右两派都对宪法草案提出尖锐的批评。广大群众把宪法草案堆在街上烧毁。国内阶级矛盾随之激化。首都居民便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把武器交给人民。政府竭力采取拖延政策,到6月2日才被迫把500支枪交给了工人。同时也把忠于国王的17营市民自卫军武装起来。

6月4日王太子从英国回国,受到柏林反革命分子的热烈欢迎。维尔泽茨城还选他为出席普鲁士议会的代表。6月8日他在议会发表演说,强调议会要同王室的协商制定宪法,说他是国王陛下的第一个臣民,最后高呼:上帝保佑,国王和祖国万岁!

面对反革命分子的挑衅,柏林代表贝伦兹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承认革命的决议案,宣布3月18日和19日战士对祖国有巨大的功劳。可是这个提案被否决了。第二天议会通过了察哈里埃的决议案,这个决议仍然提出制定宪法要同王室进行协商。

这就引起柏林人民更大的不满。6月9日清晨,大批群众集合在议会的周围。他们对外交大臣阿尔宁和牧师西多夫极为不满,几乎要用石块掷打他们。

6月8日—9日事件使柏林政治空气白热化,终于演成6月14日冲击柏林军械库的事件。

6月14日,柏林工人、贫苦手工业者同军警之间发生武装冲



图 16 起义人民冲击柏林军火库

突。傍晚,大批群众包围了军械库大楼,要求把武器交给他们。武装的市民自卫军企图驱散群众,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两名工人战死,两名负伤。工人们开始修筑街垒。愤怒的群众用木头砸开了军械库的大门。卫兵司令纳茨梅尔上尉把军队全部撤走,武装工人控制了全部军械库。

但是,工人缺乏战斗经验,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市政当局马上调来正规军和市民自卫军,很快就把工人赶出军械库,并在全城收缴武器和进行大逮捕。

冲击柏林军械库的失败,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加速了康普浩森—汉塞曼内阁的垮台。马克思指出:“6月14日的事件不过是第二次革命的第一道闪电,而康普浩森内阁就已经处于彻底瓦解的状态。”^①早在6月13日,威廉四世在给拉多维茨的信里就已经公开称柏林为“公开的叛乱”了。容克地主对6月14日事件非常高兴,因为这成了他们要求把军队调回柏林的借口。6月14日夜,骑

^① 马克思:《六月十五日的妥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92页。

兵从马德堡和勃兰登堡调回柏林。

反革命的嚣张,使议会中的左翼甚至包括中间派左翼警惕起来,采取保卫措施。6月16日议会通过议员人身不可侵犯的法令。

康普浩森—汉塞曼内阁已经孤立了。它在议会中遭到左翼和中间派左翼的反对。反革命分子也向它进攻。6月20日,康普浩森向威廉四世提出辞呈,于是,康普浩森—汉塞曼内阁垮台了。

九月危机和九月起义

在普鲁士,康普浩森—汉塞曼内阁辞职后,于1848年6月25日组成奥埃尔斯瓦德—汉塞曼内阁。奥埃尔斯瓦德任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汉塞曼继续担任财政大臣,路德维希·冯·施莱肯斯泰因任陆军大臣,米尔德任商业大臣,吉尔克任农业大臣,洛贝尔图斯任教育大臣,弗里德里希·屈尔韦特尔任内务大臣,弗里德里希·梅尔克尔任司法大臣。这届内阁虽然首相是奥埃尔斯瓦德,但实际领导人却是汉塞曼。人们称这届内阁为办事内阁,或“行动内阁”。

奥埃尔斯瓦德—汉塞曼内阁就职的时候,法国六月起义已经失败了,欧洲的革命形势已经逆转。德国国内的反动势力更加猖獗。但是,奥埃尔斯瓦德—汉塞曼内阁还是按照他们的意图来推进德国的改革。6月26日,内阁在普鲁士议会上发表宣言,同意进行改革。例如,同意在赎买基础上废除封建义务,根据莱茵省的法律改革全国的司法制度,重新制定赋税制度等。6月20日,社会工作部大臣冯·帕托夫发表一份《建议书》。宣布废除领主特权和农民的封建义务。新内阁农业大臣吉尔克根据帕托夫的《建议书》,宣布废除一些不重要的封建义务,重要的封建义务则要赎买。新内阁同时也加强了警察制度,招募宪兵1.6万人,7月中旬颁布出版法,加强对新闻出版事业的检查。颁布新市民自卫军法,规定市民自卫军只能由有产的市民组成,归内务部管理。加强对民主派的镇压,

逮捕民主派和工人领袖，封闭俱乐部，取消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否认集会结社权。

在这种形势下，容克地主开始反攻。5月末，他们就成立了“保卫立宪王国的普鲁士同盟”。8月18日，在柏林米兰人厅召开容克地主大会，约400人参加，取名“普鲁士人各阶级私有财产利益保卫者大会”，大会进行两天。大会决定成立“土地所有者同盟”。盖拉赫在发言中号召容克地主主要团结在波茨坦宫的周围。《十字架报》十分嚣张，它大造反革命舆论。反动军官更加活跃，他们创办《德意志卫报》，公开扬言要同“革命恶魔”进行斗争。他们的核心人物是普鲁士亲王的朋友冯·格里斯海姆中校。7月23日，格里斯海姆中校起草一份反革命传单《德意志中央政权和普鲁士军队》，扬言普鲁士军队是现时德国唯一的巩固而公正的支柱，是帝国大厦的中心。

军队向革命人民进攻。7月31日，西里西亚小镇施维特尼茨市民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卫戍司令对市民自卫团的不公正态度。卫戍司令竟下令开枪，死14人，伤33人。这件事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新内阁不得不把小镇的卫戍司令调离。8月9日，普鲁士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内阁解除反动军官的职务。奥埃尔斯瓦德—汉塞曼内阁未能执行8月9日议会的决议，于9月9日正式辞职。普王弗·威廉四世遂任命恩斯特·冯·普富尔将军组阁，他兼任陆军大臣，古斯塔夫·波宁任财政大臣，基斯克爾任司法大臣，内政大臣是埃赫曼。普富尔将军在三月革命后任柏林警备司令，他接近自由派。威廉四世所以任命他组阁，是因为举行政变的时机尚不成熟，并且他还未有准备。

九月危机，重要的事件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人民起义。这是由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引起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两公国从15世纪中叶在国家法上就是统一的。1460年什列斯维希同丹麦组成君合国。1815年又宣布霍尔斯坦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

1848年1月，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逝世，新王弗里德里希七世要正式宣布合并什列斯维希。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两公国人民也发动起义，组成以弗里德里希亲王为首的临时政府。丹麦国王调动1.4万人的军队，于4月9日在弗林斯堡的巴乌打败两公国的军队，两天后占领什列斯维希。

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人民起义得到德意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他们派出志愿军前往支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同样支持两公国人民，并请普鲁士出兵。普鲁士派弗里德里希·乌兰格将军率10个军团9000人进入两公国。5月2日进入日德兰半岛，占领弗里德里希堡，承认两公国的自治权。

但是，普鲁士军队突然很快撤出日德兰半岛。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也不再对两公国人民进行支持。这首先由于普鲁士政府惧怕两公国人民革命的继续发展会影响德国国内的革命。其次，普鲁士政府受到英俄两大国的压力。俄国以封锁普鲁士港口相威胁。英国则认为，两公国加入德意志联邦，对英国海上贸易不利。在这种形势下，8月26日普鲁士和丹麦签订马尔摩停战协定。

协定规定停战7个月。该协定对丹麦极为有利，因为它使丹麦获得了喘息机会，而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则十分不利。协定要求：解散3月建立起来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临时政府，建立5人混合政府，其中3人为丹麦人；两公国的军队不受德军总司令的支配，而由丹麦人占优势的新政府领导。这一协定引起了德国各阶层的不满。在基尔开会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议会首先表示抗议。9月4日，帝国外交大臣把马尔摩停战协定提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根据达尔曼的提议，9月5日国民议会的338票对221票通过决议否定了停战协定。可是陆军大臣配伊科尔不同意。经过3天的辩论，法兰克福议会于9月16日通过批准马尔摩停战协定。

法兰克福议会批准停战协定的消息，激起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怒。从9月16日起，各城市人民纷纷集会，通过致法兰克福议会

宣言,要求立即废止停战协定,甚至要求解散法兰克福议会,解散临时中央政府,组成以民主派为主的政府。

法兰克福市的形势异常紧张。9月16日晚,在议会前及附近街道上集中了大批群众。负责停战协定的外交大臣海克谢尔从法兰克福逃到盖科斯特。

同时,左翼和极左派代表在左翼俱乐部“德意志宫”餐厅集会,许多代表要求立即退出法兰克福议会,但左翼领导人不同意采取退会的办法。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市几个民主组织,如法兰克福民主同盟、法兰克福民主共和党人同盟、法兰克福工人同盟也在纽伦堡宫举行联席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派代表团到德意志宫向议会左派表示同情和支持,谴责议会批准停战协定。

在各民主组织代表团的的要求下,议会中的左翼代表罗伯特·勃鲁姆答应他们在第二天,即9月17日在法兰克福市东北区的普芬格斯特瓦伊德大草地上召开人民集会。次日,法兰克福、加纳乌、美因兹、盖科斯特等城市的居民都参加了大会。大会最后通过如下决议:“占国民议会大多数的258位代表于9月16日通过了耻辱的停战协定,他们是德国人民、德国自由和德国荣誉的叛徒。”^①大会选举代表团,请它把这个决议送交法兰克福议会。

9月18日晨,代表团来到法兰克福议会所在地圣保罗教堂,这时圣保罗教堂已戒备森严。代表团试图进入会场,受到士兵的阻拦,他们只好把决议交给主席,请他转交。

在群众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约翰大公和政府首脑施美尔林下令法兰克福戒严,解散所有民主组织,禁止集会。当天从其他城市调来军队,任命诺毕里将军为镇压起义部队的司令。

这时群众在工人同盟代表埃塞伦、来特林根等人的领导下开始修筑街垒。其中最大的街垒是修筑在弗里德贝尔路、阿里德路、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625页。

金盖斯路、阿里尔加伊根路的街垒。不仅城市工人、手工业者，而且郊区农民也参加了修筑街垒。

当下层人民起义开始的时候，议会左翼不是领导群众进行斗争，而是充当起义者和帝国政府的中间人，进行调停。他们请约翰大公撤出军队，大公拒不回答。他们同镇压起义部队诺毕里谈判，停战1个半小时。诺毕里便利用停战时间又调来了1.2万人的军队，还有许多大炮。晚6时停战时间结束，政府向起义者开炮，进攻街垒。

起义人民不超过500人，面对24倍于己的敌人英勇战斗。战斗特别顽强的是阿里尔加伊根路和金盖斯路的街垒中的战士。其中由市民自卫军战士阿尔诺德·拉伊纳赫指挥的街垒战最为顽强，他们一直坚持到夜晚，大炮轰击才迫使他们撤退。在战斗中没有一个人当俘虏。在福盖尔津格一个不大的街心公园的街垒里，5名工人对抗200名士兵，坚持战斗3个小时。战斗继续到晚10点半，起义人民弹尽粮绝，才不得不停止抵抗。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9月18日起义对巴登共和党人是巨大的推动。黑克尔从9月份已经侨居到美国去了。司徒卢威继续领导巴登人民进行斗争。司徒卢威听到马尔摩停战协定签订后，便在《德意志观察家》杂志上著文，指出：“德意志议会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愤怒的人民和与人民为敌的一帮恶棍。”他号召人民举行武装起义。9月21日，他从瑞士越界来到边境城市来拉赫。第二天，他在这里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并成立了临时政府。他宣布实施一系列法律，取消封建义务和赎金，停止向国家和教会缴税，实行累进所得税，把属于反动地主、教会和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交给公社。他在一项宣言中提出“社会共和国，一切人的幸福，教育和自由”的口号。司徒卢威的队伍扩大到几千人，并率军占领了弗赖堡。霍夫曼指挥的巴登军队截住了他们的去路，在什塔

乌劳附近向起义部队进攻。司徒卢威占领弗赖堡后同政府军展开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司徒卢威等人在逃往瑞士途中被捕。

9月里，科隆同样进行着激烈的斗争。9月13日，根据《新莱茵报》的倡议，在科隆召开群众大会，恩格斯在会上发言。会上，根据威廉·沃尔夫的建议，选出30人组成的安全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委员。

9月17日，《新莱茵报》编辑部和科隆工人同盟联合倡议在莱茵河畔沃林根村（距科隆不远）召开人民集会。出席会议的达万人。以恩格斯为首的科隆千人代表团乘坐几艘大船，举着红旗到达。大会主席是沙佩尔，恩格斯任秘书。大会批准了科隆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会议还根据恩格斯的建议通过了致普鲁士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宣言，并对丹麦停战表示坚决抗议。

原定在9月24日召开各民主协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但科隆当局逮捕了会议的组织者沙佩尔、贝克尔和莫尔。科隆民主派在9月25日召开人民集会，抗议政府的挑衅行为。群众得知普鲁士军队已经接近科隆，立即修起街垒，准备抵抗。

普鲁士军队从9月26日宣布科隆戒严，禁止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进行任何活动，并解散了同情人民的市民自卫军。《新莱茵报》被迫于9月27日停刊，大多数编辑逃往国外。德朗克、恩格斯到比利时，威廉·沃尔夫去普法尔茨。

但这时实行反革命政变时机还不够成熟。普鲁士军队在10月份解除对科隆的包围。10月12日《新莱茵报》复刊。

普鲁士反革命政变

奥埃尔斯瓦德—汉塞曼内阁垮台后，9月15日组成了普富尔内阁。普富尔内阁由于得不到议会的支持，又不满王室及宫廷奸党的行为。10月10日便向国王提出了辞呈。国王表示挽留，但盖

拉赫却秘密去布勒斯劳，企图说服勃兰登堡组阁。勃兰登堡出身于贵族，是普鲁士的将军。10月17日，勃兰登堡回到柏林，开始进行组阁活动。勃兰登堡组阁的过程也就是反革命政变的准备过程。11月9日，当反革命政变准备就绪以后，勃兰登堡正式宣布组阁。这时柏林周围已布满军队，柏林市内戒备森严。政府拥有8万军队、170门大炮，这些兵力对付议会已经绰绰有余了。

11月9日清晨，勃兰登堡在曼推菲尔等人陪同下来到议会。他宣布新内阁已经组成，同时宣读了国王的命令：议会在11月27日以前休会，然后在勃兰登堡市这个平静而和平的城市复会。理由是，国王希望保证议会的“行动自由”，保证它不受外界的压力。

议会主席翁卢宣布，不经议会同意不能休会，而勃兰登堡又宣布，议会继续开会是非法的。内阁部长和77名右翼代表退出会议。左翼和中间派左翼代表高喊：“留在这里！”企图阻止他们退席而无效。但这时议会内还有263名代表，还具有合法的人数，所以议会便通过决议：国王无权违反议会意志宣布中途休会，无权把它迁往别的城市。议会要继续工作，绝不解散，并授权翁卢有权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召集代表们开会。

可是，议会仍然不敢发动人民来保卫自己。11月9日晚，柏林警察局长命令市民自卫军司令里姆普列尔包围议会，命令代表们最迟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以前休会。11月10日早上议会继续开会。人民群众坚决支持议会。柏林工人号召进行武装抵抗。柏林工人在给议会的信中说，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反对任何敌人。但是，议会却不接受工人的号召，翁卢在会上宣布“只需要给予消极的抵抗”。

反动派的军刀在挥舞。11月10日上午10时，政府军队从各个方面向市中心调动，午后2时开到议会开会的让达尔姆广场。

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准备发动起义来反对反革命政变，机械制

造工人把议会保卫起来，企图阻止军队进入会场。可是，议会并没有领导人民起义的打算，仍然在继续审查土地法草案。

11月11日国王又宣布特别命令，解散市民自卫军。为了执行这项命令，11月12日宣布柏林及其周围两公里实行戒严。革命俱乐部遭到破坏，《改革报》和《阅报室报》都被迫停刊，和平居民遭到逮捕、枪毙。

11月11日，代表们想到剧院大厅继续开会，但道路已被士兵阻塞，只得改在射击俱乐部开会。会议的决议仍然是消极抵抗，他们的座右铭是：“不引起革命，不许街头斗争。”但是，武装的工人、学生却把俱乐部保卫起来。全国各地都发出保卫议会的呼声。而翁卢仍然坚持消极抵抗的方针。容克地主和反动资本家却提前缴税，支持政府，仅西里西亚一地地主就提前交税200万塔勒。

13日晚，士兵冲进射击俱乐部，把代表们赶往市政厅，14日又从市政厅赶到坦茨瓦尔厅，然后又赶回市政厅。15日议会在“米连茨”旅馆大厅开会。会议刚刚开始，士兵又冲了进来。翁卢叹息说“我们再次对武力让步”并宣布闭会。许多代表坚决提出抗议。瓦尔德克高喊：用你们的刺刀来刺杀我们吧！他号召代表们不要离开会场。他高呼：谁离开会场，谁就是祖国的叛徒。

在内阁与议会冲突期间，法兰克福议会派巴塞爾曼、西蒙和盖尔根汉到柏林来，企图在议会和政府之间进行调解。11月14日，法兰克福议会通过下列决议：1. 责成普鲁士政府取消把议会迁往勃兰登堡的决定，采取充分措施保证它在柏林开会的自由。2. 责成普鲁士王室建立在国内得到支持的政府，消除反动派对人民自由的破坏。可是几天后它又通过决议，认为柏林议会抗税的决议是违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12月5日，国王发布了两道命令：解散议会；1849年2月召开新的议会。至此，反革命政变最后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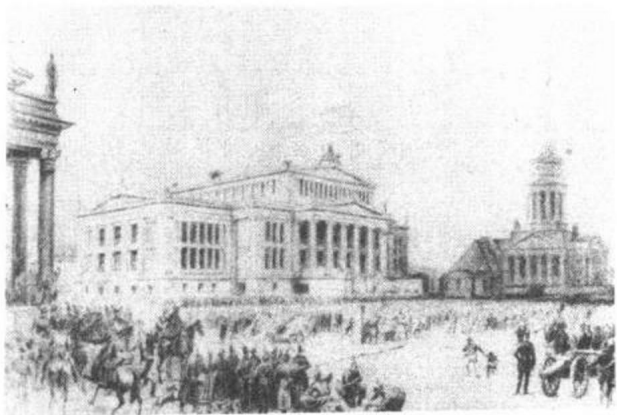


图 17 普鲁士议会被驱散

第五节 维护帝国宪法运动

大德意志道路和小德意志道路 帝国宪法

宪法委员会从 1848 年 10 月 19 日开始审议德意志帝国宪法。在讨论中大德意志派和小德意志派的斗争表面化。

所谓大德意志道路，就是亲奥地利的集团主张以奥地利为首统一德国。他们都是最保守的自由派，主要是奥地利和南德各邦的反革命力量。他们同教权派、天主教反动分子有密切的联系。奥地利统治集团在镇压了维也纳十月武装起义之后，对法兰克福议会统一德国的计划采取了明显的敌视态度。1848 年 11 月 27 日，奥地利帝国政府新首脑施瓦尔岑贝格在国会里发表演说，明确表示：不允许对帝国内部事务进行任何干涉，不允许限制它的主权。但同时，奥地利力图恢复 1815 年德意志联邦的机构，像梅特涅时代一样，由它继续统治分裂着的德国。

小德意志道路则是拥护以普鲁士为首统一德国。小德意志道路得到大多数自由派，既包括普鲁士的自由派，也包括中德和南德自由派的支持。小德意志道路的精神鼓舞者是布恩赞、标洛夫和康普浩森，即所谓支持“大普鲁士”的人们。他们主张以普鲁士为首组成新的德意志联邦，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小德意志道路的拥护者德罗伊森宣称：“300年来，由于奥地利，德意志变得民气不振，破败不堪，软弱无力。”“谁都知道，奥地利曾使1/3的德意志人脱离自己共同的祖国。”他认为，普鲁士是产生路德、弗里德里希大帝、德国古典文学和解放战争领袖的国土，它注定领导德国。1848年10月27日通过关于德意志帝国组成的条文：“德意志帝国的任何部分不能与一个非德意志部分一起统一进入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已存在的地方（例如在奥地利），只允许这两部分在共同的君主身上表现出来。”

帝国政府首脑施美尔林是大德意志道路的拥护者。由于法兰克福议会大多数自由派倾向于普鲁士，所以他的位置由拥护大普鲁士道路的加格恩代替了。1848年12月18日加格恩在法兰克福议会发表施政纲领，主张建立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联邦。法兰克福议会经过激烈的争论，于1849年1月13日通过了加格恩的施政纲领。

加格恩为了实现他的政纲，便同温和民主派妥协。妥协的结果是：民主派不再反对帝国宪法的普鲁士化，同意普鲁士国王为帝国皇帝。而自由派答应，选举帝国下院议员时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实行普选，取消皇帝的绝对否决权。自由派和温和民主派的联盟使他们成为议会中的多数。

加格恩也寻求同普鲁士王朝和各邦君主的妥协。1849年1月15日，法兰克福议会讨论帝国元首问题。经过4天的辩论，以258票对211票通过决议，把帝国元首授予某位国王。同时，一读通过宪法，主张建立以普鲁士为首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帝国。3

月9日,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贝格通过施美尔林照会帝国政府,要求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辖的全部领地必须被接纳加入德意志帝国。他要求,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必须解散,成立新的德意志联邦院,由各邦议会选举70名联邦院议员。其中奥地利38名,普鲁士及其他各邦32名。同时,奥地利通过宪法,建立统一的帝国。这就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多数议员倒向普鲁士。3月28日,帝国宪法第二读通过。

宪法规定,德意志帝国由36邦组成,各邦在内政上独立。帝国元首是“德意志皇帝”,是世袭君主。皇帝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他有权任命内阁,宣战媾和,解散议会。中央政府负责外交和军事,制定海陆军立法,判定关税政策,享有铸币权。帝国议会由两院组成。上院称联邦院,议员176名,半数由各邦君主任命,半数由各邦议会选举,任期6年。上院不能解散。下院称人民院,通过普遍、平等、秘密选举产生,5万人选1名代表。帝国议会通过的法律,皇帝无权否认,只能延期执行。宪法规定,帝国皇帝称“德意志人皇帝”,效仿拿破仑一世称为“法兰西人皇帝”。宪法把1848年12月通过的《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列入第6章。

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以290票对248票选举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德意志人皇帝”。

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开始

在通过宪法的同一天,以议会主席西姆桑为首的代表团到达柏林,把帝国皇位和帝国宪法作为两件礼物献给威廉四世,可是威廉四世拒绝从这个议会手中接受皇冠,因为这个议会是由革命产生的,并且还制定了自由主义宪法。

不仅威廉四世拒绝接受皇位,而且普鲁士政府和其他德意志国家也拒绝承认这个帝国宪法。尽管这部宪法具有较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性质,可是在各邦重新占据政府要津的贵族和官

僚还是认为无法接受这个宪法。为了保卫和实行帝国宪法，各邦都展开了争取承认帝国宪法的运动。

在各邦议会的强烈要求下，通过报纸的广泛宣传，各种政治组织的积极活动和各种集会的呼吁，至4月末有29个邦被迫承认了帝国宪法，但是奥地利、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巴伐利亚等邦仍拒不承认这个宪法。

在这种形势下，自由派决定采取新的步骤。5月4日，法兰克福议会通过决议，号召各邦政府、立法机关以及全国人民承认宪法。议会中的温和民主派号召以武力保卫宪法。于是，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开始了。

维护宪法的运动是从萨克森起义开始的。4月17和19日，上下两院投票要求政府立即承认帝国宪法。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唯普鲁士国王之命是听。4月28日他听到威廉四世拒绝宪法的消息后，便立即解散了议会，宣布拒绝承认帝国宪法。

奥古斯特的行动引起全国哗然。几天内，请愿书、代表团、团体或个人的宣言，雪片似地飞来。以内阁首相盖尔德为首的3位大臣因不同意国王追随普鲁士而辞职。国王任命极端反动的奇申斯基为首相。全国人民愤怒异常。5月3日共和俱乐部向人民发出号召，拿起武器，保卫萨克森的自由。于是，德累斯顿的居民在当天就对军械库发动了两次进攻。守军对人民射击，20余人被打死。这时，人民无比愤怒，他们用大车拉着死者的尸体在街上游行，向王宫示威。全城闻讯立即行动起来，修筑街垒，到傍晚街垒已有百余座了。

奥古斯特忙向普鲁士求救。但是，普鲁士的援军被堵截在路上，铁路工人把火车开走，并在中途毁掉。派往柏林求援的军官被巴申乌市民逮捕，未能达到柏林。奥古斯特被起义人民包围，极端孤立，又感军队不足，5月4日逃往山城哥尼格施太因，大批权奸也跟着逃到这里。

国王逃走后，起义人民便成立了自由的领导机关——安全委员会，5月4日傍晚又成立了临时政府。参加临时政府的有温和民主派领导人盖布涅尔、自由派托德和极左派奇尔涅尔。临时政府的实际首脑是奇尔涅尔。这个临时政府并不能完全代表人民的利益，它主要是为维护帝国宪法而斗争。

这时安全委员会同德累斯顿城防司令苏尔茨签订了停火一夜的协定。这个协定给了政府调动军队的时机。5月5日，政府从各地调来军队。所以，停火时间虽未到，但政府军已开始向起义者射击了。起义者英勇还击。从5月5日到8日，街垒战一直在激烈地进行，整个城市都在燃烧。政府军用大炮轰击，血腥屠杀起义者。5月9日，起义者转移到弗赖堡山区继续进行战斗。波尔恩率领两队起义战士到达这里，盖布涅尔、巴枯宁等人也赶到这里。盖布涅尔和巴枯宁在赫姆尼茨被城市委员会逮捕。波尔恩的队伍也瓦解了，少数人逃往国外或隐藏起来，多数遭到逮捕，送交法庭受到审讯。

莱茵省起义

莱茵省的广大群众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5月3日埃北菲尔的民兵通过决议：要保持团结一致，只服从法兰克福议会的命令，保卫祖国的自由，免受普鲁士的威胁。埃北菲尔还成立了民兵委员会，同佐林根、亚亨、多特蒙德及其他城市的民兵取得联系。这些城市的民兵在5月6日在埃北菲尔召开会议，一致支持埃北菲尔民兵的决议，并加入埃北菲尔民兵委员会。

埃北菲尔的工人在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攻下了监狱，解散了市政机关。这时，莱茵省各城市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温和民主派都行动了起来。1849年5月8日，根据科隆自由派组织“市民费来因”的倡议，在科隆市召开莱茵省各市、镇参议会的代表大会，共500名代表出席。出席大会的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都宣布拥护帝国宪法。提罗尔的温和民主派分子、

法兰克福议会议员采尔被选为大会主席。大会通过致普鲁士国王和法兰克福议会的决议，宣布承认帝国宪法为确定的法律，并且在普鲁士政府引起的冲突中，站在德意志帝国议会方面，号召莱茵省全体居民，特别是能手持武器的男子，坚决捍卫帝国宪法、贯彻帝国宪法的规定，要求勃兰登堡内阁辞职，希望撤消召集后备民兵的命令。决议最后说：下面签名的代表们深信，拒不理会本声明的内容，将给祖国造成极为严重的危险，甚至可能使普鲁士不能保全现今的版图。

普鲁士政府不仅没有理睬会议的决议，反而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就进攻埃北菲尔。5月9日清晨，从科隆开来的第十六团和从杜塞尔多夫开来的枪骑兵连，携带大炮到达埃北菲尔郊区。埃北菲尔人民早已修好街垒，严阵以待。普军向街垒开炮，街垒战士英勇还击，民兵也进行协助。埃北菲尔人民把普鲁士军队打得抱头鼠窜，慌忙逃散，指挥官当场毙命。

埃北菲尔的战斗推动了其他城市的起义。杜塞尔多夫和佐林根的工人也都手执武器，举行起义。佐林根的民兵占领了军械库，把它变成了整个莱茵省起义者的武器供应地。

5月13日，埃北菲尔派代表到柏林同普鲁士政府进行谈判。普鲁士政府答应“饶恕”他们的罪过，条件是要恢复秩序。代表团在5月16日回到埃北菲尔。当天，根据市民自卫军的倡议，召开城市委员会，决定采取措施解散安全委员会。16日晚，他们用欺骗办法把工人武装调往城外，说是去同普鲁士人作战。结果市民自卫军向工人武装开火，起义工人最后遭到残酷镇压。莱茵省的起义遭到了失败。

普法尔茨的运动

5月1日和2日，普法尔茨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护宪法运动。普法尔茨的主要城市凯撒斯劳滕召开群众大会，选出地区保卫

委员会,由温和民主派和一些自由思想家组成。委员会采取积极维护帝国宪法的策略。5月3日,它向巴伐利亚政府提出承认帝国宪法、从巴伐利亚撤回普法尔茨军队、在普法尔茨组成人民自卫军等项要求。同时,委员会向居民提议,在巴伐利亚政府承认帝国宪法以前,不向国家缴税,甚至以脱离巴伐利亚相威胁。

委员会还采取了两项超出合法范围的措施,查封所有的国家银行,宣布不向帝国宪法宣誓的官吏为违反命令者。然而这两项措施并没有坚决执行。

但是,以加格恩为首的帝国政府对普法尔茨的运动却采取了镇压的措施。加格恩认为地区保卫委员会的活动是无政府主义自发性的表现。他得到消息说,红色共和党人从国外来到普法尔茨,某个可疑的外国军官有夺取兰道要塞的可能。因此,帝国陆军大臣配伊科尔决定派军队到普法尔茨,同时调来的还有普鲁士的军队。

这个消息引起全民起义。武装的市民、农民和市民自卫军一起抵抗普鲁士的军队。他们占领了车站,拆除了铁路。地方卫戍部队也转到起义方面来。帝国特使埃津斯迪尤科在兰道司令配合下,才说服普鲁士军队撤离。

5月17日,各地保卫委员会代表选出临时政府,宣布普法尔茨脱离巴伐利亚王国。可是,普法尔茨临时政府面临严重的危险。地方资产阶级向右转,同贵族、官吏、军官们相勾结,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反动君主正准备进行武装干涉。临时政府掌握的军队微乎其微,正规军只有3000人,志愿军为5000人,没有大炮,总共不到5000支步枪。临时政府的财政更是困难,国库已空无一文,只有借款。

临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往各省、各市和各部队派了特派员,可是地方官吏原封不动,它们仍然是国王的支柱,死命地反对革命政府。临时政府宣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要严惩敌人,但并没有采取革命的恐怖主义。左翼共和党人,包括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埃斯特尔在内，不断推动普法尔茨民主派进行坚决斗争。但他们的努力都落空了，他们找不到支持的社会力量。只是由于巴登运动的开展，才延缓了普法尔茨运动的失败。

巴登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在全国人民维护帝国宪法的斗争中，巴登人民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在巴登，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主力军是广大工农群众，领导力量是民主派人民同盟的领导人罗仑兹·布伦坦诺。他与彼特、米尔德、赫列斯等人号召武装人民，保卫德国的统一，但不要超出合法的范畴。他们对列奥波德大公和贝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帮助普法尔茨，反对对普法尔茨的武装干涉，并要求巴登军队和官吏向帝国宪法宣誓效忠。

由于巴登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力量非常强大，贝克政府被迫于4月28日在国会里宣布准备承认帝国宪法。5月9日在政府机关报上公布了宪法全文，5月11日承认宪法为国家法，同意自己忠于“全德事业”。但是，贝克政府在内政上仍然拒绝实行民主制度，因而国内的民主运动仍不断发展，决定5月12和13日在奥芬堡召开人民群众集会。

在准备奥芬堡会议期间，布伦坦诺、米尔德等民主派右翼主张成立新政府，以代替贝克政府，然后召开立宪会议，而以盖格为首的民主派左翼则主张直接宣布共和国。这时，巴登民主派便召开预备会议，讨论采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布伦坦诺占了上风，他的纲领被接受了。

5月12日晚，民主派代表团到达卡尔斯鲁厄，准备向贝克政府宣布他们的要求。可是，当天晚间已传来了拉什塔特、弗赖堡、布魯赫萨尔和来拉赫等城市都爆发起义的消息。

起义扩大到巴登首都卡尔斯鲁厄。卡尔斯鲁厄起义从5月13日开始。首都卫戍部队向帝国宪法宣誓后拒绝服从长官的命令。调

来进行镇压的军队也反戈投诚。高级军官纷纷逃走。列奥波德大公晚间坐在炮架上逃往法兰克福，大臣们也跟到这里。第二天，曼海姆也参加起义的行列。巴登军队完全转到起义方面来了。

5月14日，以布伦坦诺为首的地区委员会来到首都卡尔斯鲁厄，受到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布伦坦诺组成了新政府，他任政府首脑，同时兼任内政大臣和外交大臣，陆军大臣是埃赫费尔法，财政大臣为共和派盖格。

可是，布伦坦诺政府立即表现了妥协的性质，它发表宣言说，他们并不想推翻大公，他们来到卡尔斯鲁厄是为了保卫公民的个人自由和财产。它虽然控制3万多军队和充裕的财政，但并没有采取进攻的策略。他们同贝克政府没有多大区别。他们派特派员到各地和地方官吏一起镇压人民起义。它同样保留了一切旧官僚机构，取消了奥芬堡会议的一切激进要求。因此，反革命肆无忌惮地进行活动，准备迎接普鲁士军队。巴登国库继续在财政上支持外逃的列奥波德大公。

布伦坦诺政府竭力同大公进行妥协。帝国的特使赫列斯特和采尔往来于大公和布伦坦诺之间，进行调停。

布伦坦诺政府在6月10日于卡尔斯鲁厄召开巴登立宪会议，其大多数成员是人民同盟的成员。立宪会议选举布伦坦诺、盖格、威尔涅尔为“三执政”政府，其实是布伦坦诺一人执政，他有任命大臣的大权。立宪会议使布伦坦诺政府有了合法的依据。

普鲁士对南德革命的镇压

到6月初，普鲁士政府决定用武力镇压革命。普鲁士国王同萨克森国王和汉诺威国王结成“三王同盟”，以帮助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和巴登的列奥波德大公。同时提出法兰克福全德政府无权掌握全德武力，要求帝国政府陆军大臣配伊科尔把全德军队交给普鲁士指挥。约翰大公对普鲁士投降，同意帝国军队加入普鲁士军

队，列为第二线辅助部队。巴登大公随之也拒绝了帝国宪法，加入三王同盟。武装干涉的全部指挥权交给普鲁士的威廉太子。普军集中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边境，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越境而入。

巴登和普法尔茨政府曾经希望法国进行干涉，这当然只能是梦想。他们也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布伦坦诺政府任命著名的波兰将军梅洛斯拉夫斯基指挥巴登—普法尔茨的军队。

6月12日，普鲁士军队攻入巴登—普法尔茨境内。起义部队集中在巴登北部的斯皮耶尔、曼海姆和海德堡的三角地带。它的中心由内卡河掩护，右翼是符登贝格边界，左翼是莱茵河。普鲁士军队从3个方面展开进攻。6月12日，海尔斯费尔德军团攻入普法尔茨，很快占领了凯撒斯劳腾。6月15日这个军团进抵莱茵河路德维希港，并准备渡河。格罗宾将军指挥的军团从北面向曼海姆正面进攻。第三个军团就是配伊科尔指挥的帝国军队，从东北方面经过卡费尔塔尔也向这个方向移动。他们企图包围巴登军队，但没有成功。曼海姆守军用炮火阻止普军强渡莱茵河，巴登人民打退了来自各方的普军的进攻。

6月18日普军再次发动攻势。当天，普军把普法尔茨军队赶出普法尔茨，并在炮兵掩护下向巴登进攻。其他两个军团从北面和东北方面进攻，企图包围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军队。梅洛斯拉夫斯基军队在菲力普堡和瓦格海泽尔地区展开进攻，虽未能阻止普军前进，但却撤出了普军包围圈，经过巴登东部撤到南部。在撤退过程中，约翰·菲·贝克尔率领一支装备不好的军队于6月25日在杜拉赫阻截普军两个军，阻击配伊科尔的军队几小时，使巴登军队得以撤至木尔格平原。在这个平原的拉什塔特城下，发生了决定性会战。6月29日到30日，1.3万巴登军队对6万普军英勇战斗一昼夜，重创普军，最后避开普军包围，撤往瑞士边界。

恩格斯参加了巴登起义军的最后战斗。6月19日，恩格斯参加共产主义者维利希为首的志愿部队。当巴登军越过国境后，以恩

格斯为首的少数志愿兵最后离开祖国，他们光荣地完成了后卫任务，使起义部队安全撤到瑞士。恩格斯从瑞士经意大利转道英国。法国 6 月 13 日运动失败后，马克思从法国也来到英国。

这时只剩拉什塔特堡在继续抵抗。退伍少校比登费尔德指挥的第三边防步兵团，还有几千名巴登常备军以及本宁格指挥了 5—6 个侨民兵团守在城内。格罗宾指挥的 2.5 万普军包围了拉什塔特，9 日开始炮击。巴登军队伤亡越来越大，弹药不足。在格罗宾的诱骗下，巴登军队于 1849 年 7 月 23 日最后投降。

南德人民起义失败后，法兰克福这个“残缺国会”也寿终正寝了。1848 年德国革命失败了。

第三章 1848年奥地利革命

第一节 多民族奥地利末日的开端

多民族奥地利君主国的形成

公元962年，德意志奥托一世加冕称帝，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于是便形成了延续几个世纪并在奥地利历史上打下烙印的德意志王权与罗马帝国思想的那种结合。从此，奥托一世所征服的意大利北部也长期处在帝国的统治之下。

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奥地利属于神圣罗马帝国。14世纪末，奥地利已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大公国之一。1273年9月29日，根据美因茨大主教和纽伦堡城堡辖区长官的建议，鲁道夫·冯·哈布斯堡伯爵被选为德意志国王，此后，奥地利的哈布斯家族便一直当选为帝国的皇帝，成为帝国的统治力量，直至1806年弗兰茨二世时，因参加了拿破仑组成的莱茵同盟，同盟规定它的成员应宣布退出帝国，这才迫使弗兰茨二世于8月6日放弃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同时宣布“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在此期间，奥地利大公一直利用这种优势进行侵略与扩张。至1556年，奥地利已拥有上奥地利、下奥地利、蒂罗尔和斯提尔，以及克罗地亚、克赖恩等南斯拉夫的土地了。

15世纪末，土耳其人侵入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直接威胁着

匈牙利、捷克、波兰和奥地利。为抵御土耳其的侵略，要求成立一个集权大国。当时，欧洲这一地区能够抵御土耳其的主要力量只有奥地利，这就为建立多民族的奥地利国家创造了条件。

首先，哈布斯堡王朝企图征服因内战而削弱的、又受土耳其威胁的捷克和匈牙利。1526年8月2日，匈捷联军在莫哈奇战役中被土耳其军队击溃后，奥皇斐迪南便乘机向捷克和匈牙利施加压力，迫使捷克和匈牙利宣布斐迪南为其国王，就这样，捷克并入了奥地利。斐迪南还曾几度设法使土耳其人承认，哈布斯堡家族对匈牙利的权利，但都归于失败，所以奥地利只统治了与其毗邻的匈牙利西部和西北部地区。但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并没有放弃对匈牙利其余领土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野心，也没有停止向外侵略与扩张。1683—1699年奥土战争后，根据1699年的卡尔洛维茨和约，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一起并入奥地利版图。奥地利开始形成为多民族的国家。

1741—1748年，奥地利爆发了王位继承战争，战争以亚琛和约的签订而宣告结束，亚琛和约进一步扩大了奥地利领地。除伦巴第并入奥地利版图外，托斯卡纳、摩德纳和卢卡等公国也间接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此后，奥地利积极参加了1772—1795年三次瓜分波兰的勾当，它所获得的战利品是波兰南部的加里西亚地区。

在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的土地面积为57.6万平方公里，人口为2000多万。它的版图包括：奥地利、莱茵河左岸、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斯洛伐克、伏伊伏丁那、斯拉维尼亚、克罗地亚、克莱因、斯洛文尼亚、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捷克、加里西亚、布科温、巴纳特和伦巴底。如果不把伦巴底、威尼斯和意大利居民居住的地区计算在内，奥地利所拥有的领土可根据其居住的民族不同与统治方式的不同分为四部分：以奥地利大公为首的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捷克王国的领地、波兰王国和匈牙利王国的领地。

在这个由继承和窃夺的小块土地拼成的七零八落的奥地利帝国，反动势力特别猖獗。哈布斯堡王朝一开始就是欧洲野蛮、保守和反动势力的代表。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建立“稳定的秩序”，便残酷地压迫和奴役各个民族，压制它们的民族要求，强制实行德意志化的政策。玛丽亚·特蕾西亚在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确立了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权。在她统治期间(1740—1780年)开始了带有奥地利特色的开明专制主义精神的改革。她依靠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豪格维茨伯爵进行了国家行政改革和宗教政策领域的改革。晚年，她又在社会立法、教育、财政、工艺和人口政策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为改善农民状况也提出了一些创议。玛丽亚·特蕾西亚于1780年11月29日去世，约瑟夫二世又继承了奥地利王位。他进一步推行了国家改革：在政府机构方面，精简上层机构，推行中央集权制；在法律方面，革新以保守精神撰写的刑法典，废除了死刑，整理了诉讼法；在宗教方面，实行宗教宽容的原则；赋予犹太人以工作和学习的基本权利。他力图使君主国成为福利国家，又成为警察国家。这是符合约瑟夫主义的本质的。他认为国家应通过一个开明的政府和管理机构为它的公民的福利创造最良好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个纲领，还要维护秩序、道德和安全。这种官方的国家政治观是各种不同的文化潮流和传统，在特蕾西亚—约瑟夫时代的汇合。这些改革使封建农奴制的压迫与剥削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但是，到了弗兰茨二世统治时期(1792—1835年)，整个奥地利又完全恢复了改革前，即18世纪的农奴制。在奥地利，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到处都保留了下来，地主仍像以前一样拥有自己的警察和完备的法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家长的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婢膝的庸俗气昧在任何国家都不像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①所以，直到19世

^① 恩格斯：《奥地利末日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16页。

纪中叶,奥地利仍然是一个多民族的、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

30—40年代奥地利经济的发展

尽管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着奥地利,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仍然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封建土壤里破土而出。19世纪初,奥地利的纺织业已开始采用机器。维也纳的工场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维也纳已拥有100多家毛织、丝织、棉织、皮革和其他加工企业。维也纳的人口已增至19万人。到了19世纪20年代,在奥地利,特别是在捷克开始建立了第一批大小工厂。30年代后半期和40年代是奥地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虽然在奥地利存在着诸如资金缺乏、技术工人不足、国内市场狭小等严重障碍,但是40年代初,奥地利帝国(不包括意大利各地区)已有工厂135家。整个奥地利帝国已经拥有90万支纱锭,仅捷克一地就拥有33.6万支纱锭。从1831年至1842年,奥地利的棉花输入量增加1倍,制成的纱线增加了9倍。在1848年革命前夕,在捷克投入生产的织机达10万台;在摩拉维亚为3万台;在下奥地利为2000台。丝织工业极其繁荣,1845年,在维也纳开办的丝绸厂有430个。此外,在伦巴第、韦尔施蒂罗和格尔茨也相继建立了丝绸厂。毛纺织业、亚麻纺织业和天鹅绒制造业也都有很大的发展^①。随着纺织业生产的发展,各地的印染业也发展了起来,出现了上浆染色工业、布匹印花工业、化学颜料工业,在捷克,主要是在布拉格已有70个印染企业,拥有2万多工人,在下奥地利也有50余家印染企业^②。同时,在制糖工业、造纸业、木材和加工业和玻璃制造业等方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奥地利的重工业也发展了起来。重工业主

^① 埃里希·策尔纳:《奥地利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63—465页。

^②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77页。

要在施泰尔马克、卡林西亚、捷克的山区和奥属西里西亚。1848年革命前，英国炼钢新技术逐渐传入奥地利。冶炼技术的改进，特别是用辊压机代替传统的锤，大大提高了铁的产量。在40年代，圣法伊特的金属制造业也开始高涨起来。其他地区也出现了机器制造业，并开始使用了蒸汽机。

随着工业的发展，奥地利的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也同时发展了起来。1827—1832年期间，铺设了主要用来向波希米亚运盐的林茨—布德魏斯马力铁路，这是一条较大的铁路，但因是马力铁路，很快就过时了。1836—1847年间，修建了斐迪南皇帝北方铁路，它起自维也纳，经布鲁诺和北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工业区延至奥德贝格，1848年又从这里与普鲁士铁路网接通，于是建成了从维也纳至汉堡的直达线路，这条铁路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而把维也纳同亚得里亚海港连接起来的南方铁路是在1841年开始兴建由维也纳至格洛格尼茨一段，1844—1846年又兴建了从米尔楚施拉格至格拉茨和齐利一段。在受奥地利统治的匈牙利和意大利地区也开始修建铁路。铁路的兴建进一步促进了工业生产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虽然19世纪30—40年代是奥地利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工业、商业或交通运输都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但是，奥地利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受到了严重的束缚。这主要是因为，在弗兰茨二世统治期间，完全恢复了改革前的封建农奴制度。在19世纪上半期，地主为了增加收入，采取种种方法扩大徭役，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农民除承担封建地租外，还必须承担政府和地方的苛捐杂税：如土地税、房产税、州捐、村捐和教会捐等。在摩拉维亚，各种苛捐杂税在1848年革命前夕，竟高达242种；在克拉伊思达也多达123种。这些税捐耗去了农民的绝大部分收入，使农民处于极端贫困之中。这种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外，政府的工商业政策、关税制度、行会的

限制等均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高昂的进口关税，事实上剥夺了奥地利工业家所需要的原料，使他们不能够巩固与邻国的贸易联系，削弱了他们与别国资本家竞争的能力。同时，国内市场容量的狭小、内地关税壁垒的存在以及资本的缺乏都大大阻碍了奥地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总之，奥地利在经济发展方面大大落后于英、法、普鲁士等国。

梅特涅与“梅特涅体系”

从1804年起，奥地利的统治权便掌握在皇帝弗兰茨二世手中，弗兰茨在其统治期间（1804—1835年），深受梅特涅的影响。虽然梅特涅只是直接管理外交事务，但是自1815年至1848年被赶下台，他却一直控制着整个奥地利。梅特涅曾公开宣称：“革命者的明确而坚定的目的是……推翻一切现在的合法政体，因此，君主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全面进行破坏的计划，以维护现存的合法政体。”^①梅特涅的这种“合法政体”很快便被称之为“梅特涅体系”。“梅特涅体系”也就成了形容反动政体的总称呼，而且这种政治统治的反动体系很快就强加给了整个欧洲。

梅特涅（1773—1859）是奥地利的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梅特涅于1773年5月15日出生在德意志西部科布伦茨的一个贵族家庭里。他的父亲弗兰西斯·乔治·查理·梅特涅曾任奥地利派驻特里尔的使臣，是一个极爱虚荣又惯于扯谎的人。梅特涅的母亲比特丽丝·卡根涅格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梅特涅的察颜观色、见机行事和能讲一口地道法语等本领，都是她从她那里继承来的。

梅特涅16岁时便进入了培养外交家和圣职人员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他在哲学思想上深受福格特关于各主权国之间采取实力

^① 斯·波·卡思：《1848年奥地利和德国革命》，苏联教育出版社，莫斯科，1948年，第9页。

平衡政策和维护调和折衷的贵族政治思想的影响。梅特涅 21 岁时曾到过英国，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英国政治活动家，其中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对他的影响最大。1801 年，即梅特涅 28 岁的时候，他出任奥地利驻萨克森使节。从这时起，梅特涅真正地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09 年梅特涅便登上了奥地利外交部长的宝座，事实上他起着国家首相的作用。从 1821—1848 年，他一直任奥地利首相。

梅特涅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他不能容忍任何改革、进步与革命。他对奥皇弗兰茨二世忠心耿耿，在政治上善于看风使舵和施展诡诈伎俩，故深受弗兰茨二世的赏识与信任，长期独揽国家大权。

梅特涅坚决主张实行君主政体，特别强调天主教作为精神力量应当成为现行秩序的支柱。梅特涅体系的基础是无孔不入的警察监视、间谍活动和残酷的迫害。梅特涅制度助长了奥地利官僚政治的发展。官僚不仅把持着中央政权机关，而且还把持着地方管理机关。梅特涅十分蔑视人民，仇视革命，但又十分惧怕人民，惧怕革命。在他看来，保守和革命之间无论如何也不能保持平衡，而容忍自由主义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在他统治期间，任何社会活动，任何革命思想的传播与表现均会立即遭到镇压。梅特涅尤其害怕自由主义思想在大学生中间的传播和大学生掀起的革命运动。他主张大学不应该过问政治，应该超然于当前的纷争之上。只有这样，才能把学生导入人间的平静融洽的境界之中。在梅特涅看来，密谋、秘密结社、革命热情同遵守法律和保持秩序的好思想和好公民的基本条件是完全不协调的。他要求德意志的高等学校迅速恢复超然的风气，专心致志于学习，认为只有这些才是一所大学的根本宗旨。他在致根茨的信中说：“我的建议是针对大学的风纪，完全不是针对学习本身。……假若我们只顾后者，我们

便将一事无成。”^①他曾计划组织泛德意志委员会对大学情况进行调查,以及设立泛德意志法庭对那些被指控为阴谋反对邦联的人进行审判。他的这个计划遭到了弗兰茨二世的反对和严厉批评。但是皇帝的批评仍未能生效。为了更好的对大学生进行监督,规定任命一个特派的国家官员,但其推荐权仍归各邦政府。当时为处理革命密谋和革命宣传,设立了美因茨中央委员会,但未授予它法庭固有的权利。不仅大学和大学生处于严密的控制与监视之下。而且中、小学也逃脱不了警察的监视。书籍、报刊的出版,均须政府书报检查当局吹毛求疵的检查,稍有违背政府规定者,立即遭到查禁。尽管梅特涅对奥地利实行严密的控制,但是,奥地利的革命运动仍此伏彼起,严重地威胁着奥地利的生存。大学生运动也接连不断,在1848年革命中,他们仍然是革命的先锋。

梅特涅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利用民族矛盾维护奥地利的“安宁与秩序”。为了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使摇摇欲坠的奥地利帝国继续“支撑”下去,梅特涅苦心策划,惨淡经营。他警觉地注视着民族矛盾,巧妙地利用民族斗争,不择手段地挑起民族纠纷,使各种不同的阶级利益、民族局限性和各种地方偏见,总是处在互相抗衡的状态中。从而把各民族、各阶级均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与奴役。对于各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他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把不断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打入血泊中,尽管梅特涅施展全身解数扑灭民族解放运动,但是,他却像粘在民族解放运动编织起来的蛛网上的昆虫一样,不断地挣扎,始终逃脱不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罗网。

梅特涅体系在外交方面表现为他善于玩弄权术,又善于看风使舵。梅特涅对外的主要策略是削弱法国、提防俄国、排斥英国、遏

^① 《梅特涅回忆录》第3卷,第245页,转引自阿尔来农·塞西尔:《梅特涅》,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7页。

制普鲁士的强大。他非常确切地估计到,在革新时期成熟之前,他不得不支撑已经处在衰朽中的社会制度,正如他所说的:“现在我却不得不在支撑这所虫蛀的大厦中了却我的残生。”^① 所以,他的一切外交活动的目的也是为了制定一种能够保证奥地利生存的政策。在维也纳会议期间,他施展种种手腕与权术,维护了奥地利在分赃中的利益。在组织反动的“神圣同盟”时,他处心积虑地不让英国充当主要角色,而使自己成了这个反动同盟的“缔造者”。在国际事务中,他经常组织大国首脑会议,主张搞五强政治^② 式的欧洲均



图 18 1848 年 3 月 14 日
的梅特涅

势,在德国则主张与普鲁士实行和睦政策。总之他千方百计地使其他国家互相抗衡,而自己来掌握天平。梅特涅所推行的这种大国“均势”政策,即所谓“实力均衡”政策,虽不是他的首创,但他却运用得颇有成效,使在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奥地利帝国居然能一度称霸欧洲,而他本人也就俨然以“欧洲首相”自居。

梅特涅体系是极其反动的体系。在整个梅特涅体系中充满了背信弃义和虚伪欺诈。这种体系在奥地利的实行,曾一度巩固了老朽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维护了奥地利封建的野蛮状态,保持了奥地利闭关自守的落后状况,严重地阻碍了奥地利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

梅特涅无论是在外交或者在内政方面,在同他那个等级的人

^① 转引自阿尔杰农·塞西尔:《梅特涅》,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26 页。

^② 五强政治(pentarchie),指 1815—1860 年间,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五大国称霸欧洲。

和戴王冠的人物周旋时，精通了待人接物的艺术，曾一度成为欧洲反动派的主要首领之一，并制定了镇压各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但是，在领导群众方面，他却缺乏一个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才能。在40年代，这个日益衰老的政治家的活力已明显地减退，在其活动的最后几年，就再也没有什么建树了。1848年奥地利革命开始后，他虽然诬蔑这次革命是一些面包师傅的胡闹，并主张出兵镇压，但是，这位在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政治舞台上曾显赫一时的梅特涅，已老朽得无力抗拒来势凶猛的革命洪流，并在革命洪流的猛烈冲击下，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民族压迫与民族解放运动

在奥地利帝国的版图内至少居住着二十多个不同的民族。其中主要的民族是德意志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喀尔巴阡乌克兰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等。

这些民族在并入奥地利帝国的版图之前，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自己独特的经济和文化。他们的民族意识已经十分成熟，因此，自并入奥地利之日起，他们的民族要求便很强烈。但是，哈布斯堡王朝却竭力摧毁他们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遏止其民族意识，推行强制的德意志化政策。德意志民族使这个国家的其他各民族一直遭受着沉重的民族压迫和奴役。所以恩格斯说：“奥地利的罪过是它使我们落得一个压迫其他民族、充当各国反动雇佣兵的臭名。德国人在奥地利的旗帜下奴役着波兰、波希米亚和意大利。从塞拉库斯到特里延特，从热那亚到威尼斯，德国人都被当作专制制度的卑鄙的雇佣兵而遭到仇视。”^①各民族强烈的民族要求一直威胁着奥地利帝国的统治。

^① 恩格斯：《奥地利的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23页。

哈布斯堡王朝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便利用各民族间的矛盾和各民族的各阶级间的矛盾来维护“稳定的秩序”。在梅特涅统治时期,他就是利用各民族间的矛盾,挑起民族纠纷,使他们处于相互敌对之中,从而防止各民族结成共同反对奥地利帝国的联盟;同时,他又利用各民族的贵族同资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首先把金融贵族拉到自己一边,从而削弱了资产阶级,加强了他对资产阶级的控制;尔后,又利用贵族对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恐惧心理,把各民族的贵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总之,他竭力使各民族、各民族的各阶级经常处于敌对和均衡状态,以避免奥地利帝国的崩溃。弗兰茨二世非常赞赏梅特涅的做法,他曾公开无耻地宣称:“我把匈牙利人安置到意大利,而把意大利人安置在匈牙利。他们每一个民族都警戒着自己的邻居。他们互不了解,彼此仇视。正是从他们的互不友好之中产生秩序,从他们的彼此敌视之中产生普遍的和平。”^①所以,马克思指出:“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②

尽管奥地利政府与梅特涅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和统治伎俩,但是,各被压迫民族却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无权地位和民族利益与奥地利统治阶级的利益之不相容,因而,各民族的反抗情绪日益强烈,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

维也纳会议以后,意大利人居住的地区已经开始动乱不安。特别是1820年和1821年撒丁岛和那不勒斯推翻了原政府,成立民族政府后,意大利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就更加高涨了。虽然这些革命运动后来被奥地利军队和“神圣同盟”军镇压下去了,但是,意大利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资产阶级所领导的“烧炭党”进行着

① 斯·波·卡恩:《1848年奥地利和德国革命》,第10页。

② 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16页。

秘密活动,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1848年革命前夕,经常爆发小规模起义。接连不断的群众斗争和起义严重地威胁着奥地利的统治。

匈牙利人和捷克人的民族斗争对奥地利帝国的存亡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匈牙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奥地利帝国内居首位。19世纪30年代,在匈牙利已经出现了一个由资产阶级化贵族组成的自由派团体,其领导人为约拉什·科苏特。他们要求在哈布斯堡帝国内建立独立的自治的匈牙利国家,通过赎买逐渐取消封建农奴制和实行其他的资产阶级改革。对于资产阶级化贵族的这些要求,奥地利政府不仅置之不理,而且解散了1836年的例行议会,逮捕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其中包括科苏特。但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哈布斯堡王朝被迫于1840年释放了科苏特。科苏特出狱后又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的政治观点比以前更加激进了。他与资产阶级一起提出了新的政治要求:民族独立、建立由匈牙利人管理的、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匈牙利统一国家。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也掀起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这种革命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奥地利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它首先清洗了各州的自由主义者,并且派出官吏和军队进行镇压。梅特涅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没有吓倒匈牙利人民,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大的、更有力的反抗。结果,匈牙利的政治形势便越来越紧张了。

在捷克王国,民族独立的愿望也十分强烈。捷克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以资本主义关系在捷克的发展和捷克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为基础的。捷克人的民族觉醒与表现在文学、语言学和历史的发展上的民族复兴运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捷克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思想的代表者是一些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捷克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坚决要求捷克在奥地利帝国内享有完全的民族自治的权利、捷克

语和德语平等。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写的《捷克语言史和捷克语》、约瑟夫·容格曼编纂的《捷克新旧语字典》、沙法里克的《斯拉夫语言和文学史》、帕拉茨基的《捷克民族史》、诗人扬·科拉尔的长诗《斯拉夫儿女》等著作，在唤醒捷克人的民族意识，激发捷克人的民族自豪感方面都起了一定作用。

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捷克人民，特别是在地主沉重剥削下呻吟的农民和饥饿线上挣扎的工人，不断地举行起义和掀起罢工斗争。1821年摩拉维亚的农民起义是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布拉格和里巴都先后爆发了捣毁机器的工人斗争。广大工人和农民斗争的矛头直指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压迫和本国贵族地主的统治。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的斗争是分散的、彼此孤立的，所以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直到1848年革命前夕，捷克的革命人民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民族的政治纲领。

不仅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而且在奥地利帝国最落后的地区加里西亚也爆发了反奥斗争。加里西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波及到普属波兰和波兰王国。波兰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是与改革波兰社会制度、解放农民、消灭封建关系的斗争同步进行。1846年加里西亚的革命斗争和克拉科夫为抗议吞并这个对波兰人民具有波兰独立象征意义的城市而举行的起义^①，是1848年奥地利帝国革命的重要征兆之一。

在奥地利的南部地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巴纳特等地的形势也非常紧张。这些地区的统治者是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其民族压迫具有双重性质：既受奥地利帝国的压迫和统治，又受匈牙利贵族的奴役和剥削。因此，这个地区的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们既反对德国人，又反对马扎尔人。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在1848年革命过程中，哈布斯堡王朝便巧妙地利用了南斯拉

^① 详见第七章。

夫和马扎尔人的民族矛盾，唆使斯拉夫居民反对匈牙利革命，从而削弱了匈牙利的革命力量。

总之，1848年革命前夕，在奥地利帝国各个地区：匈牙利、捷克、加里西亚、克罗地亚、伦巴底、威尼斯等都可以看到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此起彼伏的民族运动。正是纷纷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沉重地打击着奥地利帝国的统治，孕育着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

人民的悲惨状况

30—40年代，奥地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使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处于三重压迫之下，即封建压迫、资本主义压迫和民族压迫之下，是使广大劳动人民迅速地赤贫化。

资本主义工厂的兴建和机器的使用断绝了手工业工人的生路，整村整村的纺纱工和织布工在失业后多半由于饥饿而死亡。工厂的工人深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便任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奥地利，工人的劳动时间每天长达14—16小时。同时资本家还普遍使用童工和女工。1845年，在奥地利、捷克、摩拉维亚、伦巴底和加里西亚，1000个产业工人中平均男工为433人，女工420人，童工147人，而在奥地利本土，女工的数目甚至超过男工。根据官方资料，童工的工作时间每天长达12—13小时。按照规定，童工必须到12岁才能被录用，但实际上6岁到9岁的儿童就被录用了^①。

工人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工资非常微薄。维也纳是工资最高的地方，男工每周的收入约为5盾，女工为2.5盾，童工每周仅得

^① 埃·普里斯特尔：《奥地利简史》，苏联外文出版社，莫斯科，1952年，第336页。

到 20—30 克莱茨^①。但是物价却十分高昂，每一加聂茨^② 马铃薯的价格是 2.08 盾，1 公斤肉为 25 克莱茨。如此高昂的物价致使工人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据官方报纸《多瑙河报》的报道，一家夫妇均参加工作的工人家庭，其收入除去捐税、煤费、洗澡以及购衣服衬衫（衣服衬衫通常是购买旧的）等开支外，每天只能余下 27 个克莱茨作为全家的伙食费用。因此，工人经常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在业工人的生活已如此贫困，失业工人的生活更可想而知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青年奥地利”在莱比锡出版的《格林茨波特》杂志曾刊载了反映 1847 年维也纳失业工人情况的文章。文章写道：“在维也纳街头，有一个男人领着三个孩子乞讨而被扣留。他之被扣留并不是因为行乞，而是因为他被饥饿逼到绝望的地步，甘愿以自己的孩子换取一点施舍……；传闻维也纳某郊区有一个 6 个孩子的寡妇，她也是被饥饿逼得走投无路，结果杀了最小的 1 个孩子来给其余的孩子充饥，以免统统饿死……”^③ 这种凄惨的景象是令人发指的。但是，与贫穷、饥饿和死亡形成强烈对照的是达官贵人的佳肴美饌与寻欢作乐。据一位银行家的仆人说，他的主人为了向宾客们表示敬意，花了 25 盾钱买了两个草莓果。那些为显贵们演出的剧院也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在这种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广大工人被迫掀起反饥饿的暴动。

奥地利帝国的农民仍然处于对贵族地主的依附地位。他们除缴纳一般的封建地租外，还必须缴纳大量的代役租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土地税、房产税、州捐、村社捐和教会捐以及学校、教师、更夫、牧人等的生活费等等。在 1848 年革命前夕，摩拉维亚的苛捐杂税高达 242 种之多；克拉伊恩的苛捐杂税达 123 种之多。这

① 1 盾等于 60 克莱茨。

② 1 加聂茨等于 3.28 公升。

③ 埃·普里斯特尔：《奥地利简史》，苏联外文出版社，莫斯科，1952 年，第 339—340 页。

些税捐搜刮了农民的大部分收入。除此之外，农民还深受官府的横征暴敛、驻军的骚扰、讨伐队的抢劫之苦。所有这些就使得农民债台高筑，一贫如洗，常年过着饥饿的生活。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便离开农村，他们或流浪街头，乞食为生，或到地主所经营的企业中去当雇工。为反抗地主的剥削与压迫，农民常常揭竿而起，举行暴动。

在奥地利帝国，不仅工人和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的生活也十分恶劣。安东·富斯特在描述大学生的生活状况时写道：“我常常听到大学生的贫困状况，但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居然穷苦到这种程度。许多大学生一连好几个星期吃不到热饭，他们唯一的食物就是面包和白水，……许多穷苦大学生的住所是一些阴暗、潮湿、冬天没有煤火的地下室，这里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据我们所知，有一个大学生根本没有宿舍，冬天他到郊外的草堆或仓棚里去过夜，夏天不下雨的时候，就睡在露天里。”^① 奥地利大学生的这种悲惨状况，在其他国家里是罕见的。因此，奥地利的大学生经常掀起反对政府当局的示威游行。

可见，奥地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没有给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带来任何益处，反而使他们陷入更加贫穷、更加困难的境地。正是沉重的压迫、奴役和极端的贫困激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情绪，加深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促进了奥地利革命形势的成熟。

革命形势的成熟

哈布斯堡王朝的反动统治，梅特涅制度的倒行逆施，在很久以前就激起了奥地利帝国各民族、各阶级的普遍不满。特别是在

^① 埃·普里斯特尔：《奥地利简史》，苏联外文出版社，莫斯科，1952年，第338页。

1848年革命前夕,这种不满情绪尤为强烈。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逐渐发展成为反对政府的群众运动,并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

日益贫困化的工人和农民,为了活命经常掀起反饥饿的暴动。参加暴动的工人砸毁了政府的办公地点,捣毁了许多面包房和其他商店。不仅在维也纳,而且在其他地区,如布拉格、莱亨堡、乔尼格烈茨等地也爆发了工人起义。起义工人烧毁了工厂,捣毁了机器,抗议降低工资和使用新机器。农民不仅参加反饥饿的暴动,而且还经常拒绝服徭役、缴纳赋税和代役租,直至袭击过路的皇帝的轿车,举行武装起义。他们在起义时提出“杀光老爷!”的口号,并惩办地主、地主管家、税吏、林务官和行政官吏。但是,工人和农民所掀起的斗争都被奥地利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在工人、农民不断进行斗争的同时,大学生也掀起了反对政府的运动。大学生运动具有鲜明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性质。

大学生之所以积极反对政府,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他们经常遭到政府的监视和迫害,特别感到在精神上与欧洲各国的隔绝;政府的政策以及国家的贫穷落后致使他们英雄无用武之地;再加之大学生的恶劣的物质条件,所有这些都激起了他们对政府的强烈不满。

大学生反政府的方式,主要是经常组织示威游行,举行辩论会,讨论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以及路易·勃朗的著作。整个知识界,如作家、记者、医生、律师是政府所谓的“不满分子”的主要核心。他们是来自不同阶级的作家和政论家,具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但在反对奥地利政府的斗争中,却暂时地联合了起来。他们创立了“青年奥地利”。这个集团最著名的代表有:安东·奥韦尔贝伯爵、政府官员安德连男爵、政论家伊格纳茨·古郎大、维斯诺尔、缪林和舒塞尔卡、作家鲍威尔·费勒特、莫里茨·哈尔曼、查理·别克、盖尔曼·罗列特和诗人尼古拉

·列纳乌等。

知识分子表示反抗情绪的另一种方式，是组织以同业团体为名的小组。其中最著名的是索马路加男爵、医师亚里山大·巴赫等人所组织的“政法学会”。参加这个学会的是反对派中的温和派，主要是工业家和大官吏。此外还有称之为“和平女神”的作家联盟、“工业联盟”和一些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小组，其成员多为商人和工业家。所有这些团体，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在一定的时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人民群众运动普遍展开的形势下，1847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迅速地波及奥地利。在经济危机和农业歉收的影响下，失业工人踉跄街头，无以谋生；广大农民贫困不堪，无力纳税。奥地利呈现出一幅悲惨凄凉的景象。特别是在1847年末到1848年初的严寒冬季里，饥饿与寒冷更加猛烈地袭击着广大劳动人民。在维也纳的街道上乞丐成群，饿殍载道，一些妇女常为一块面包而卖淫，或被迫自杀。对这种情况，政府则是一筹莫展，无能为力，它除滥发纸币外，毫无他法。而滥发纸币的结果又引起了通货膨胀，奥地利的国债竟高达74800万盾。

这种形势标志着奥地利末日的开始，说明老朽的奥地利帝国已经无力再长久地“支撑”下去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847年曾担心地说道：“奥地利已经无人管理。它正在腐朽的、甚至完全腐朽的、即将坍塌而又勉强支持的行政机构的重压下苟延残喘，谁也受不了，它还能维持多久。”^①

在多民族的奥地利即将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摧毁多民族的封建的奥地利帝国，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独立的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

^① 斯·波·卡恩：《1848年奥地利和德国革命》，第36页。

第二节 奥地利的三月革命

革命的开始

1848年初,“米兰雪茄骚动”开始后,局势非常动荡,这是一次意大利爱国者的拒不抽烟运动,其矛头直指奥地利帝国。此时,那不勒斯王国首府西西里岛的巴勒摩起义,揭开了欧洲革命的序幕。在波希米兰,危机的气氛笼罩着一切。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首先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引起强烈的反响:3月3日路德维希·科苏特在匈牙利议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压在我们头上的是阻碍我们自由发展、使我们丧失勇气的专制制度。”^①“奥地利大厦的基石是不稳固的,它的倒塌是不可避免的。”^②他的演说猛烈地抨击了梅特涅政府和奥地利的专制制度,要求制定民主宪法,会上通过了要求成立匈牙利责任内阁的请愿书。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维也纳人民。3月11日,布拉格人民举行集会,通过了要求政治自由、废除徭役和其他封建特权、捷克语与德语平等和成立统一的捷克议会的请愿书。在维也纳,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革命热情迅速高涨,他们把法国革命视为奥地利政治变革的先声。巴黎二月革命点燃了奥地利帝国各地区所孕育的革命火种,加速了奥地利革命的爆发。资产阶级反对派很快便行动起来了。

3月3日,下奥地利议会的33名左翼代表起草了请愿书,其中除批评帝国的一般状况外,还提出了进行改革的要求。不久《奥地利进步党宣言及纲领》发表了。在这份宣言和纲领中写道:“古老的奥地利正走向死亡。不稳固的、摇摇欲坠的暴政大厦也必将坍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264页。

^② 斯·波·卡恩:《1848年奥地利和德国革命》,第59页。

塌,在它的废墟上必将诞生一个新的奥地利——自由、平等、文明的国家。”同时纲领还提出了修改宪法、改革政府体制、改组内阁和召开联合议会、工业活动自由、废除书报检查等要求。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温和派一翼“奥地利工业同盟”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只不过带有浓厚的温和色彩罢了。



广大工人的革命积

极性更为高涨。维也纳格劳尼茨机械制造厂的工人首先组织了集会,工人们发表演说,号召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压迫。其中一位工人说道:“我们巴黎兄弟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也应该成为我们维也纳工人的口号。”

图 19 奥地利进步人士的俱乐部

在工人行动的同时,维也纳的大学生也行动起来了。他们在3月初便成立了“争取自由斗争同盟”。德意志、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和捷克等各民族的大学生都参加了这个同盟。他们都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推翻梅特涅制度。3月9日,有40名大学生在弗利奇和什宾列尔的住室里召开了秘密集会,拟定了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出版和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该请愿书在3月12日召开的大学生大会上通过,并有2000多名大学生在请愿书上签名。大会还呼吁工人和农民支持大学生的要求。

各阶级、各阶层的发动使维也纳沸腾起来了。在革命形势急剧高涨的形势下,3月13日,斐迪南一世为缓和局势,和平解决冲突,安抚资产阶级反对派,答应于7月3日召集各等级和帝国各领地的代表,商谈“必要的改革”问题。但是,这种不明确的诺言为时

已晚,革命的火焰在奥地利各地已经燃烧起来了。

维也纳 3 月 13—15 日革命事件

3 月 13 日,奥地利议会在维也纳开幕。大多数议员认为,议会的基本任务是制定致皇帝的请愿书,要求扩大选举范围和增加议员名额,而广大人民群众则希望议会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现存制度。

议会开幕的当天早晨,议会大厦前面的广场上便挤满了人群,其中大多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大学生。他们要求议会同专制制度作强有力的斗争。他们的口号是:“自由! 宪法! 打倒政府!”而等级议会的代表却毫无反对皇帝的愿望。人民群众闯入议会大厦,医生阿道夫·菲施霍夫博士讲了话,并宣读了科苏特的声明。此后,人民群众强迫议会代表停止讨论,和人民一道到皇宫去时,等级代表们则千方百计地回避这种联合发动,只把一份决议案交给了群众。这份决议案无疑是极其谦卑而又适中有度的禀奏书。它对皇帝允许召开等级代表会议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此群众极为愤恨,一个大学生把决议案撕得粉碎,掷到空中。

在议会大厦前面,革命者和大学生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阿道夫·菲施霍夫在讲话中指出:“弊病百出的国家管理方法使得奥地利各民族四分五裂。现在各民族应该互相谅解,结成兄弟般的联盟,增强自己的力量。一些民族的软弱可以由其他民族的强大来弥补,各个民族的优点也会在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更加发扬光大,从而为国家的利益服务,给国家带来空前的尊严和强大……奥地利及其光荣的未来万岁! 奥地利各民族的团结万岁! 自由万岁!”^①同时,他们还要求政治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陪审制和责任内阁。接着便宣读了科苏特 3 月 3 日的发言。这些演说和科苏特的发言,在群众中立即得到了强烈的反响,人群中迸发出了响彻议会

^① 埃·普里斯特尔:《奥地利简史》,第 357 页。

大厦上空的呼声：“打倒梅特涅！打倒路德维希大公！”“人民政府和人民武装万岁！”这时，波兰大学生布里安也发表了演说，他号召推翻梅特涅制度、争取出版和信仰自由。捷克大学生沃伊杰赫·费格鲁特也提出了出版自由的要求，并热情地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梅特涅制度而斗争。这些演说，可以说是当时提出的革命纲领。虽然它带有浓厚的温和色彩，但它在号召奥地利人民不分民族、不分阶级和财产状况，团结一致为争取自由，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斗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图 20 1848 年 3 月 13 日政府军袭击在议会大厦前集会的群众

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决定采取镇压措施。于是，人民群众便进行自卫。他们在维也纳城内的窄街陋巷里，如雨后春笋般地筑起了街垒。步兵向议会大厦开去。在议会大厦附近，军队和群众发生了武装冲突，引起了第一个流血事件。议会大厦的流血事件不仅动员了维也纳居民，而且也激怒了郊区的工人。当流血事件发生的消息传到各大小工厂时，工人们立即组织起来，

他们捣毁机器，烧掉工厂，并于傍晚向市中心出发。但是，根据政府的命令，城门是紧闭的，而且在各个城堡里都安放着大炮。于是工人们便对索坚门和布尔格门发起了攻击。他们打碎了路灯，点起瓦斯，试图烧毁城门。他们的进攻受到军警枪弹的阻击。工人们虽遭到很大牺牲，但仍顽强的战斗。一位3处受伤的工人仍继续战斗，并鼓舞自己的同志不要气馁。另一位工人则大声宣布：“我虽然死了，但统治者也不会长久了。”

格林加斯的战斗是城市中心所发生的最大的一次战斗。它靠近议会大厦，在这里军队向徒手的人群射击。勇敢的维也纳人民则以石子还击，他们将骑兵打下马，然后把受伤者安放在马背上，沿着首都的大街游行示威，控诉政府血腥镇压起义者的罪行。

傍晚6时许，要求梅特涅辞职的代表团到达宫廷。这时梅特涅仍要求代表团立即停止“无政府状态”。代表团的领导人舍尔采尔回答说：“这不是无政府，这是革命，是各阶级都参加了的革命！”这时，各个代表团又接踵而来。他们宣称：群众坚决要求梅特涅辞职，他们将等待至傍晚9时；如果在这之前政府不采取坚决措施，人民就发动总起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惊慌失措的宫廷和政府经过短时间的动摇之后，决定“牺牲”梅特涅。当天傍晚，拥有无限权力的梅特涅被迫辞职，并于次日乔装逃出维也纳，流亡到英国。

与此同时，斐迪南一世还答应取消书报检查、颁布新闻法、武装市民和大学生。当梅特涅被迫辞职和皇帝同意武装市民和大学生、取消书报检查等消息传出后，维也纳群情激昂，一片欢腾。安得列斯·舍尔采尔爬上瓦斯灯杆，向人民报告梅特涅辞职和政府同意武装大学生的胜利消息。在火炬的照耀下，4000名大学生立即武装起来了。

但是政府所作的让步，并不能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梅特涅虽然辞职了，但梅特涅体系仍然保存了下来。3月14日至15日，战斗仍然在继续着。起义人民要求制定明确规定人民政治权利

的宪法，以君主立宪代替君主专制。政府对此只作了含糊其词的答复。人民极为不满，郊区工人一直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们继续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同时还焚烧了警察局和食品税收所，捣毁粮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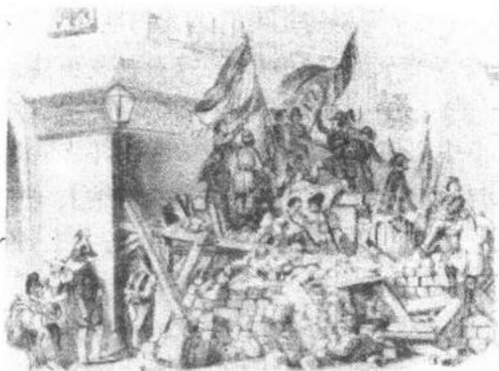


图 21 维也纳街垒

和大商人的住宅。劳动人民的暴动在大资产阶级中引起了恐惧与混乱。于是政府于3月14日下午颁布了将维也纳交文迪施格雷茨管理的命令。

当群众得知血腥的刽子手文迪施格雷茨统治维也纳的消息时，进行斗争的呼声又响彻云霄。

成千上万的工人冲向火药库，并控制了那里的武器弹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怕事态进一步发展，便被迫取消了戒严令。3月15日政府颁布了至迟在7月3日召开奥地利各地区等级议会的通令。这一通令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召开的不是等级议会。他们呼吁说：“我们要求召开的是人民代表会议，而不是等级议会。”当任命戈约斯为国民自卫军首脑时，群众的不满情绪就更加强烈了。维也纳居民又奋起斗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宪法万岁！”傍晚，成千上万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大学生包围皇宫，开始向皇宫攻击。当新的起义严重地威胁着皇宫时，政府被迫宣布皇帝同意颁布宪法，并决定于7月召开各省议会资产阶级代表代议讨论宪法。同时还改组了维也纳的市政机关，参加新政府的有贵族、大工业家、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新政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内务部长皮勒斯多夫。

3月13—15日的革命风暴迫使政府对革命群众作出了某些

让步。这是工人阶级、中小资产阶级和激进知识分子共同斗争的结果。

维也纳三月革命影响和推动了奥地利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随着维也纳三月革命的发展,施泰尔马克、匈牙利、捷克、加里西亚、蒂罗尔以及林茨等都先后掀起了革命运动。这些地区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都提出了不同的资产阶级改革的要求。这些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有力地支援和帮助了维也纳革命。

三月革命的阶级实质及特点

维也纳三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件。其特点是:这次革命是由工人、大学生、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除银行家和股票投机商外)共同努力完成的。甚至少数银行家和贵族也参加了这次革命。例如罗特希尔德等银行家,在革命前夕曾拒绝给梅特涅以信用贷款,但是,不久却自动拿出相当大的一笔款项给大学生团体支配,满足了大学生的要求。这件事充分说明了广大人民群众,甚至大资产阶级和部分贵族对奥地利专制制度的极大不满。

在维也纳三月革命事件中,反封建力量的联合是极为广泛的。这种暂时的、广泛的联合之所以可能,并不是因为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比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而主要是因为奥地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比其他国家缓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矛盾也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不够壮大,他们之间的关系尚未发展成为公开的对抗,阶级矛盾尚未完全激化。因此,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尚能同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暂时联合,并自觉地利用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迫使政府作出了某些让步。另一方面,工人为数不多,尚未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在革命中也没有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要求,这也是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能够容忍工人阶级,并暂时地同他们联合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但是,尽管如此,奥地利的资产阶级仍然像其他国家的资产阶

级一样,十分害怕人民,害怕人民的革命运动。例如,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之一“工业联盟”,对大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和政策虽未明显地表示反对,但是他们却千方百计地避免参加。另一些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如“政法学会”也抱着同样矜持和冷淡的态度。这就使哈布斯堡王朝在三月革命中得以维护其阵地,在三月革命后,仍能继续推行其反动政策。

在三月革命过程中,各阶级、各阶层的暂时联合,由于其阶级利益与政治观点的不同,是十分不巩固的。随着三月革命的胜利和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革命阵营中的分歧与矛盾便日益形成,并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第三节 奥地利的五月革命

3月—5月的政治形势

在三月革命中,奥地利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作出了一些让步。在维也纳进行了国家行政机构的改组。宫廷办事处、宫廷总务府和宫廷财政局均由部所代替,大臣会议取代了枢密院和国务会议。国民会议由两院组成,选入下议院者需有一定的纳税能力,上议院由大地主的代表和由皇帝任命的议员组成。皇帝有权否决两院决议。4月15日,颁布了由内务大臣皮勒斯多夫参照比利时宪法起草的宪法。奥地利政府的这些让步,立即使资产阶级得到了满足。他们感谢奥皇斐迪南一世“好心地”答应制定宪法、实行宪法,而且允许资产阶级监督政府。他们的政治愿望已接近实现,因而便立即安静下来了。弗昂托在描述这时维也纳的形势写道:“城市的秩序确立了。暴动消失了。国民自卫军和大学生负责地和严

格地维护着城市的秩序。”^①当时一首十分流行的诗歌也充分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情绪。诗歌写道：

高尚的鲜血流出，
公正的政权出现。
万岁！我们的皇帝，斐迪南，
……………
警卫着！自卫军战士、人民的儿子，
平息这起义的海洋。
鏖战的辛劳已经结束，
胜利的果实尽情地享受^②。

但是，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革命并没有结束。三月革命后，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状况并没有改善。改组后的维也纳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援助饥饿的工人。奥皇斐迪南一世关于取消书报检查、实行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的诺言，均未付诸实现。同时，人民发现3月17日成立的新内阁还是由贵族控制着。参加新内阁的屈贝克、贝叶·拉图尔、菲克尔蒙等都是梅特涅统治时期的活动家。内阁首相科洛夫拉特不同于梅特涅之处，与其说在于政治信仰，不如说在于他的缺才少德和平庸无能。这个内阁执政的时间极短，而且无所作为。

4月初，菲克尔蒙公爵代替了科洛夫拉特任内阁首相，他是梅特涅的学生。菲克尔蒙内阁虽稍有活动能力，但也同样平庸。这个政府和前任政府一样力求赢得时间，意图拖延颁布宪法和召开国民会议。虽然皇帝被迫答应从意大利调回军队，但那里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菲克尔蒙内阁的行动激起了群众的愤怒，5月3日，学生和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几次到菲克尔蒙的住宅抗议，结果他被迫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275页。

② 斯·波·卡恩：《1848年奥地利和德国革命》，第124页。

辞职。继菲克尔蒙任内阁首相的是皮勒斯多夫，在三月革命前他是科洛夫拉特的亲密助手。这个内阁与前两个内阁不同的是它吸收了几个自由主义者“装饰门面”。

内阁频繁的更迭并没有减轻奥地利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也没有平息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懑。相反，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失业人数的增长使政治危机更加严重了。在这个时期，奥地利的金融状况不断恶化，赤字不断增加，纸币一再贬值。政府为对付失业，组织了维也纳3个区的建筑和土工劳动，吸收失业工人参加。到5月15日以前，从事这种劳动的约有7000多失业工人。由工商业危机和货币贬值而引起的粮食危机加速了工人和手工业者革命运动的新高涨。他们提出了劳动权、10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建立互助储蓄所、降低间接税等要求。

政府为了镇压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于4月1日颁布了有关出版的临时措施，事实上是恢复了原来的书报检查。4月20日，政府又成立了附属于市政府的安全委员会，其任务是根据政府的意图，“坚定不移地实行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的现行法令”。4月25日政府公布了新宪法，确定了皇帝的无限权利，规定了议会选举的财产资格和定居年限，确立了议会的两院制，保留了对旧有封建关系不能随便触动的权利，规定取消农民义务时必须向地主缴纳补偿金。接着政府于5月11日又颁布了选举法。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工人、短工、职员以及享受社会救济的人员、在战争中丧失了工作能力而由国家负担生活费的残废者均被剥夺了选举权。

政府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宪法和选举法的公布，引起了奥地利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恨。农民抗议继续保留其封建义务，工人抗议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所有民主团体一致认为，宪法只是政府进一步把国家转向专制制度的保证。因此人民群众反对政府的反动措施和非民主的宪法的斗争已经愈演愈烈，一场新的革命发动已经成

为不可避免的了。

这时，在奥地利帝国的其他地区，如下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匈牙利、捷克、加里西亚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革命运动，各地的革命形势也日益高涨。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活动

从三月革命开始，维也纳就存在着两种对抗的力量。一种是从各地集中到首都驻防的政府军，一种是与之相对抗的革命军。革命军包括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维也纳一些区的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自由主义派的自卫军和大学生军团。为了发挥更大的力量，4月14日，各国民自卫军派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了国民自卫军“中央政治委员会”。它是代表人民和革命军利益的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任务是充当自卫军和大学生军团的喉舌，维护民主原则，以便使国民自卫军在政治生活中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它是由各国民自卫军的代表组成的，所以在成分上，它也像国民自卫军一样庞杂。参加该委员会的有自由主义者，医生阿道夫·菲施霍夫、民主激进派戈利德马克和在群众中素享盛名的大学生维利尼尔。由于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在委员会中很快便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个派别：捍卫4月25日宪法的右派和要求实现民主的左派。由于左派坚定、团结，有决心为自己的目标而斗争，因而在斗争中往往居于优势。

中央政治委员会逐渐成为反对宪法和选举法斗争的核心力量。它反对“自上而下的宪法”，提议把宪法作为临时法，要求实行一院制和普选法。这样一来，政府就把它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分裂它。开始时，政府为了使右派和自由主义者脱离委员会，便力图诽谤左派，诬蔑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政体拥护者，继而又说他们是企图分裂奥地利的那些民族的工具，是工人的工具。当这种阴谋未能得逞时，政府便又施展收买伎俩，秘

密建议自由主义者担任政府官员。但是，自由主义者看到政府的地位不稳，也拒绝了。于是，政府分裂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企图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便不顾一切地采用了强制手段，于5月14日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中央政治委员会自行解散。在要求遭到拒绝后，政府便以武力镇压相威胁。这种威胁不仅引起了委员会的强烈反对，而且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中央政治委员会以请愿书回答政府的威胁，请愿书要求政府立即接受修改宪法的建议。政府不仅没作任何让步，反而动用了军队。于是，五月革命事件发生了。

5月15日革命事件

5月15日清晨，中央政治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团到霍夫堡宫递交请愿书。它以国民自卫军和大学生军团的名义要求政府撤销解散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命令，将军队调出维也纳，由国民自卫军维护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修改宪法和选举法。而政府的答复是：军队已动员起来，准备战斗。

政府的答复成了成千上万工人、大学生和国民自卫军行动的信号，几乎整个维也纳的人民都参加了示威游行，而且这次示威游行是全副武装的示威游行。

维也纳人已经不是用语言和决议来捍卫革命，而是手执武器在街垒中捍卫革命了。工人得知政府的答复后，立即向市中心推进。《宪法报》在报道工人的情绪时写道：“他们都用自己的工具武装起来，步伐整齐地前进着。在同政府的斗争中，他们准备全力支援大学生。工人的情绪是饱满的、战斗的。同时，他们准备修筑街垒。”^①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359页。

傍晚,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开始了。示威游行高呼“打倒贵族的宪法!”“制宪议会万岁!”等口号前进。千千万万示威者向皇宫逼近,他们堵塞了中心街道,占据了城门。为了阻止示威游行接近皇宫,政府军便守卫在皇宫附近的广场上。但是,约2000名用斧头、铁锹和铁铲武装起来的工人已经到达市中心了。在城市的一些区域里已经筑起了街垒,很多士兵和人民群众亲如兄弟,并把自己的子弹送给起义者。

街垒的修筑对政府是极大的威胁。政府立即意识到形势的发展是很危险的。傍晚10时许,政府召开了部长会议,宣布取消解散国民自卫军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命令。可是代表团仍不散去,坚决要求政府接受请愿书中的其他条款。这时游行示威队伍越来越大,大学生军团占领了霍夫堡宫的一部分。在这种形势下,政府被迫同意群众的要求:实行一院制、取消选举资格限制和实行民主选举,承认宪法为临时法。



图 22 1848年5月维也纳

的街垒

在5月15日革命事件中,民主派和人民群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宫廷却要求,在议会召开前政权仍掌握在皇帝手中,并劝说皇帝秘密出走因斯布鲁克。同时,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一些领导人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十分恐惧,便通过了自行解散中央委员会的决议。5月18日,在著名官吏蒙特康科利公爵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安全委员会。它由20人组成,并成了首都的真正权力机关,它的任务是恢复维也纳的“安宁与秩序”。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革命领导人的软弱和动摇,说明他们惧怕人民群众的真正发动和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领导

人的软弱与动摇给了贵族和反动势力积聚力量,进行反革命准备的时机。

奥皇逃往因斯布鲁克

奥地利政府被迫作出让步的消息传出后,维也纳沸腾起来了,人民群众兴高采烈地欢庆胜利。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维也纳宫廷里却在秘密策划到落后省份里寻求支持,对革命维也纳进行反扑的阴谋。以索菲娅为首的宫廷奸党决定让皇帝逃到落后的教区蒂罗尔的首府因斯布鲁克。

5月17日,斐迪南一世及其周围亲信以出外游览的名义逃出了维也纳,于5月19日到达了因斯布鲁克。5月21日皇帝从这里发出了宣言,宣言声称:“5月15日事件使我不沉痛地相信,无政府主义者企图依靠被异族所控制的大学生军团,依靠狡猾的公民和国民自卫军来剥夺我的行动自由,藉以像奴役我的首都的善良居民一样地奴役外省居民。”^①宣言显然是对维也纳起义者的诬蔑和对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的煽动。

皇帝斐迪南一世逃到因斯布鲁克不久,许多显赫的大贵族也相继逃出了维也纳,因斯布鲁克很快便成了宫廷策划反革命阴谋的中心,在这里确定了召开奥地利各省的联合议会。各省贵族纷纷向皇帝表达了“忠君”之心,藉以得到皇帝的信任。捷克贵族和加里西亚贵族都表达了这种意愿。

皇帝及宫廷的出逃在维也纳资产阶级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感到失去了皇帝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出逃给那些与宫廷和宫廷贵族订货的大企业家和大商人带来了损失。特别是5月18日限制从储蓄银行提取存款的命令公布后,资产阶级的恐慌情绪就更加严重了。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和大学生,责

^① 斯·波·卡恩:《1848年奥地利和德国革命》,第127页。

备他们以激进的要求使“善良”的斐迪南离开了首都。国民自卫军中央政治委员会之所以通过自行解散的决议，就是企图以此作为让步，使皇帝能平气息怒，回到首都。

这时，内阁便派以戈约斯公爵为首的代表团到因斯布鲁克，劝说皇帝返回维也纳，但遭到拒绝。皇帝声称：只有当维也纳恢复了以前的秩序时，他才能返回。这时，政府便利用革命阵营中的意见分歧，估计到资产阶级的情绪，颁布了有关建立维也纳“安宁与秩序”的种种措施。政府首先任命奥厄施别尔格将军为维也纳武装部队的首脑，蒙特库科利公爵为国民自卫军和社会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接着禁止印刷宣言和传单、禁止结社、禁止召开大会等镇压措施便接踵而来了。5月24日教育部关闭了维也纳所有的高等学校，5月26日政府又以特别命令宣布解散大学生军团，并使之与国民自卫军合并，凡不愿参加国民自卫军的大学生均须在24小时内交出武器。

被激怒的大学生拒绝服从政府的命令。他们又同成千上万武装工人联合在一起，开始在维也纳的主要街道上修筑街垒，准备进行新的战斗。

5月26日革命事件

5月26日黎明，军队都布置在广场上，骑兵守卫在皇宫前。早晨6时许，步兵开始向大学推进，准备切断国民自卫军、大学生与郊区工人的联系。但是，政府的企图未能得逞。工人和国民自卫军战士又把首都的街道和广场堵得水泄不通。街垒像是从地下长出来的一样，布满了整个维也纳。巨大的街垒在斯特凡广场矗立了起来，它是各民族团结的象征。在这座街垒的上空飘扬着德国、匈牙利、捷克的旗帜；在街垒里，自卫军的服装、各民族的民族服装均清晰可见；从街垒里传出了各民族的不同语言。这样巨大的街垒在中心广场米哈伊尔也建立起来了，这个广场也和其他许多广场一样，

用旗帜、标语和讽刺贵族的漫画装饰起来。在大学周围建有十几个石头壁垒，保卫着大学。

在每一个通向城市中心的郊区域门附近都不断地发生工人和政府军的冲突。在红塔门旁国民自卫军撵走了政府军，约有 5000 余名工人冲进了市中心。凡政府军防线薄弱的地方都被工人突破了。经过很短时间的战斗，工人和大学生军团又控制了城市，政府所施展的阴谋诡计又被工人和大学学生的街垒战斗粉碎了。因此，五月事件以后，在报纸杂志上、诗歌散文里都热情地歌颂了街垒战斗。在当时流行的诗歌中，有几句这样写道：

对权利

人民不需要

甜言蜜语地哀求。

对权利，

人民不喜欢

卑躬屈膝地乞讨。

对权利，

只有去夺取

在严酷的街垒战斗里^①。

工人、大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胜利迫使政府作出让步，取消了解散大学生军团的命令。但是，这个让步是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的。就是在命令取消以后，工人仍然留在街垒里，密切地注视着政府军的动向。当又有新的军队调进维也纳的消息传出时，工人们便开始拆毁铁路。

在这次斗争中，起义者提出的要求是：1. 在 24 小时内军队必须撤出维也纳。2. 政府承认 5 月 15 日革命的所有成果。3. 在政府未实现自己的诺言前，需交出几个贵族作人质。4. 在 14 日内，皇帝

^① 斯·波·卡恩：《1848 年奥地利和德国革命》第 128 页。

必须返回维也纳。在起义者发表的宣言中还提出了在全民选举的基础上召开制宪议会、在民主宪法的基础上改革政府机构、取消修道院等要求。

5月26日晚，在起义者的强烈要求下，人民群众最痛恨的戈约斯公爵和迪特里希施泰因等被逮捕了。在押送被捕者时，群众高呼“打倒贵族！”“打倒奸党！”等口号，并呼吁绞死蒙特库科利。

在这些日子里，工人阶级这支积极战斗的力量的发动，比5月15日更加广泛，其对革命进程的影响比5月15日更加深远。5月26日革命事件表明，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真正捍卫者。他们在革命中所表现的革命英雄主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对敌人毫不妥协的精神是参加革命的其他阶级所不能及的。

5月27日，政府改组了社会安全委员会。委员会由234人组成，根据起义者的要求，大学生军团和国民自卫军的代表参加了委员会。以菲施霍夫为首的社会安全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督所有社会机构的活动、讨论宪法问题、进行议会选举的准备工作和制定具体的政府措施。人民群众把社会安全委员会视为革命政权，事实上并非如此，它所奉行的是妥协政策。

第四节 1848年五月革命后的奥地利

5月—7月的奥地利

5月15日和26日革命事件后，事实上，政权转入到社会安全委员会手中，即控制在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和大学生军团手中，其左翼系大学生军团。工人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劳动人民的状况依然如故，所以，工人仍然坚持斗争，农民到处都掀起暴动和起义，拒绝承担封建义务，有的地区还摧毁了地主的城堡和仓库。而在非奥

地利本土的其他地区如布拉格，也因维也纳五月革命的胜利而掀起了革命运动的高潮^①；匈牙利得知皇帝逃往因斯布鲁克的消息后，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革命运动更加蓬勃高涨，这时，匈牙利责任内阁事实上只是在口头上继续承认斐迪南一世的权利^②；意大利的反奥独立战争正在激烈的进行，意大利军于5月30日在戈伊托村击溃了拉德茨基统率的奥军^③。所有这些都使奥地利的形势动荡不定，使得逃至因斯布鲁克的奥皇斐迪南一世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在奥地利，不仅政治形势动荡不安，而且经济危机也日益加深，特别是意大利战争的消耗、盐税等税收的取消、供应宫廷装饰品企业的关闭，就更加深了经济危机，减少了国家的收入。这样一来，国库的亏空越来越大，赤字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形下，无所作为的社会安全委员会束手无策。为了缓和局势，政府决定大量发行纸币。从7月至8月，国内硬币与纸币流通的比例为1：9。市场出现了纸币泛滥、货币贬值的混乱现象。随着货币贬值，出现了物价飞涨、投机成风、贪污公行、民不聊生的衰败景象。这种景象的出现显然破坏了革命的声誉，降低了社会安全委员会的威信。

同时，经济危机的加深导致了信贷缩减、生产萧条、中小企业破产、工人大批失业的严重后果。虽然在5月底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其纲领也规定“使工人群众得到工作并关心他们的生计，组织和举办公用工程并依照同各企业的协议分配劳动力，合理使用工人并采取阻止外地工人流入的措施”，但是，工人仍继续失业，生活毫无保障。政府为了平息失业工人的不满情绪，避免导致工人的起义或暴动，便又决定组织土建工程，收容失业工人。6月初，就已收

① 详见第六章。

② 详见第八章。

③ 详见第四章。

夺了1.4万多失业工人。但是土建工人的劳动时间长达10小时之久，而且工资收入极为微薄，一个男工的工资每天为25个克莱茨，女工的工资为20个克莱茨，童工则仅为10—20个克莱茨。因此，工人们便掀起了提高工资的斗争。6月里，由于阴雨连绵，从事土建工作的工人无法工作，无分文收入，难以糊口，工人们便提出了下雨天仍应支付工资的要求。7月24日工人又重新提出了提高工资的要求，但均遭到了拒绝。同时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还利用他们在军队中的影响，乘机派出国民自卫军对付工人。由于工人同国民自卫军双方达成妥协，而未发生武装冲突，但革命阵营中的矛盾第一次公开暴露出来了。

7月初，内阁的更换问题成了政治斗争的中心。激进派的报纸加紧了更换内阁，敦促皮勒斯多夫辞职的宣传，他们希望成立一个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政府政策，能够巩固五月革命成果的内阁。6月底，皇帝的叔父约翰大公到达了维也纳。为此大资产阶级欢腾雀跃，认为约翰大公是未来君主立宪的最合适的首脑人物，于是便大肆吹嘘约翰的美德和才干，喧嚣一时。小资产阶级也试图利用约翰大公的威信推翻皮勒斯多夫内阁。但是，他们寄希望的约翰大公在授权自由派的多布尔霍夫男爵组阁后，便匆匆地离开了维也纳。

7月18日新内阁成立，内阁首相为梅特涅的老同事约翰·菲利浦·冯·韦森贝格男爵，多布尔霍夫任内务部长和教育部长，工厂主霍恩博特尔任商业部长，《全奥日报》的编辑恩斯特·冯·施瓦采尔担任了劳动部长。这个内阁较以前的内阁倾向于民主。7月30日，新内阁颁布了施政纲领。纲领宣布奥地利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强有力的统一的强国，在帝国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原则下，内阁可以使奥地利与德国结成紧密的同盟。这个纲领得到了维也纳人民的支持，但遭到了国防部长拉图尔的公开反对，他主张仍然实行原来的方针政策。

新内阁在施政纲领方面的意见分歧、经济危机的加深和阶级

斗争的日益深化,使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越来越转到皇室方面去,越来越反对革命,这就是五月革命事件以后奥地利形势的特点。

奥地利议会的组成与召开

奥皇斐迪南一世为了摆脱困境,赢得时间,聚集力量,以便对革命重新发动进攻,便主动地对社会舆论作了一些让步,同意在维也纳召开制宪议会,并公布了新的选举法,允许奥地利工人有选举权。

6月19日—21日,议会进行了选举。在选举之前,社会安全委员会成立了选举委员会,领导选举的准备工作和选举的进行。根据1848年5月11日的规定,议会选出代表383名,其中农民代表97名,贵族代表约42人,但由于后者得到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所以,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甚大;代表中占优势的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律师、医生、记者等。

根据政治主张和观点的不同,议会代表可分为三部分:左派、右派、中间派。左派的代表是在群众中享有盛名的菲斯特尔、维奥兰、库德利希、舒塞尔卡和戈利德马克;中间派有影响的活动家是塞利格、施特拉塞尔和捷克的里格尔和帕拉茨基;右派的代表人物是历史学家赫尔费特^①。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整个议会进行期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议会于7月22日在维也纳隆重开幕。7月24日议会开始了正常工作。在议会上,首先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语言问题。奥地利代表在议会开幕时便以傲慢的态度拒不承认德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为官方语言,甚至不允许把发言人的演说和发言译成其他语言,因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仍以德语为官方语言,不过通过了捷克代表加夫利切克的修正案,即凡有10名代表要求表决的问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572页。

题,在投票前将提案译为波兰文、罗马尼亚文和捷克文。

接着,议会讨论了致奥皇书和皇帝返回维也纳的问题。在奥皇必须返回维也纳的问题上,各派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讨论致奥皇书时,左派与右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右派主张在致奥皇书中明确表示对皇帝的忠心,而左派则主张致奥皇书应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由于右派在议会中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右派的意见在会议上通过了。

在会议上,对农民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各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农民和左派代表,特别是库德利希,要求彻底消灭农奴制,无代价地解放农民,实行土地改革,以便使农民摆脱债务,成为土地的主人。由于某种原因必须赔偿贵族的损失时,则应由国家负担。库德利希说:“农民,当他还在摇篮里的时候,贪污受贿的神父和牧师便企图压抑他们的聪明才智,用信仰和偏见禁锢他们的头脑,使他们不能产生自由、勇敢的思想。”^①同时他指出,农奴制度不仅威胁着国家的安宁,而且也威胁着自由和议会的存在。但是,他们的主张和发言遭到了右派的强烈反对。在双方激烈争论的情况下,议会为讨论农民问题召开了38次会议,对库德利希的建议提出了100多条修正案。最后,由于必须尊重不容侵犯的“神圣的财产所有权”,议会否决了库德利希的提议,决定农民本身应为自己的解放付出代价。

关于农民解放是否向地主缴纳赎金的问题,经过争论,议会决定,凡由于农民的个人依附而必须尽的义务和由于地主的法定权利而应尽的义务,在取消时是无偿的,而所有其余的义务,如租税、土地的使用权、徭役等,在取消时必须是有偿的。9月7日,皇帝批准了废除农民封建义务的法令。关于赎金,原规定由国家负担1/3,农民承担1/3,地主放弃其余的1/3,但实际上农民所支付的远远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574页。

超过了1/3,而地主的损失则不及1/3。在农民向地主支付赎金的过程中,许多地主都捞得了巨额赎金。如施瓦尔贝格家族捞到了187万盾,瓦尔施坦伯爵捞到344.7万盾,科劳列多·曼斯菲尔德伯爵为42.7万盾,阿劳伊斯·列支敦士登的口袋装进了40.9万盾^①。

9月7日法令是在赎买的基础上废除了封建义务。农民在实际上须支付2/3的赎金,他们仍然是主要的纳税者,所以,9月7日法令并没有完全解决农民的问题。但是,它的颁布仍然为资本主义在奥地利农业中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反革命转入进攻

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失败后,欧洲革命开始处于低潮,各国反动派加强了自己的阵地,开始转入进攻。奥地利的情况也是如此。此时,反革命集团开始活跃起来;资产阶级民主阵营中的分歧加深,并表现出了明显的动摇;自由资产阶级开始转入反革命营垒。奥地利统治集团便利用革命阵营的分裂,并对革命阵营暂时作出微小的让步,以稳定奥地利本土的形势,从而集中力量加强了对非奥地利本土各地区革命运动的镇压。

维也纳五月革命事件后,暂时回到奥地利的文迪施格雷茨又到了布拉格,对布拉格起义人民发动了进攻。布拉格人民虽顽强应战,但终因寡不敌众,于6月17日被文迪施格雷茨强大的兵力镇压下去了^②。

布拉格起义的被镇压是奥地利统治集团的一大胜利。奥地利统治集团在血腥镇压了布拉格起义之后,便加强了对正在镇压意大利反奥独立战争的拉德茨基的支援。6月中旬,拉德茨基占领维

^① 埃·普里斯特尔:《奥地利简史》,第390页。

^② 详见第六章。

琴察后，意奥战局便发生了有利于拉德茨基的根本变化。这时奥军很快便占领了几乎整个威尼斯的领土。7月20日，拉德茨基把奥军调出维罗纳，进攻防守在曼图亚的皮蒙特军的左翼。25日皮蒙特军战败。这次战役的失利使米兰陷入奥军进攻的危机之中。英勇的米兰人民虽然不惜牺牲地奋起保卫城市，但由于查理·阿尔伯特的出卖，米兰于8月5日最终陷落了^①。米兰的陷落不仅意味着整个意大利的失败，而且还意味着欧洲反革命中心奥地利的复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米兰的陷落，意大利的革命活动顿时减弱了……。与此同时，奥地利的反动派也重新抬头，加紧进行活动，从中心（拉德茨基的司令部）出发，把阴谋活动扩展到各省。只是在现在，耶拉契奇才转入了进攻，只是在现在，反革命与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大联盟才完全实现。”^②

在米兰陷落，意大利反奥独立战争失败后，奥皇斐迪南一世于8月12日，怀着胜利的喜悦和坚决镇压各省革命运动的决心回到了维也纳。这时，反革命的阴影又笼罩了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

8月19日，皇帝斐迪南一世检阅了国民自卫军。在检阅时，奥皇及宫廷显贵对国民自卫军表示了极大的“关怀”。这说明奥皇竭力想把国民自卫军拉在自己一边，并在未来的反革命活动中充分利用国民自卫军来为自己服务。

就在这一天，劳动部长施瓦采尔颁布了降低土建工人工资的通令。通令规定：女工的工资由20个克莱茨降低到15个克莱茨，童工降低到10个克莱茨。8月21日，工人派代表团前往市中心区，要求施瓦采尔撤销这一决定。工人们手持旗帜列队前进，其中多半是妇女。当工人到达市中心时，国民自卫军便向徒手工人开枪射击。正当手无寸铁的工人开始后退时，骑兵冲进了他们的行

① 详见第四章。

② 马克思：《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91—92页。

列，用马刀砍杀，许多工人受伤。同时劳动部长还以国家缺乏资金为借口，拒绝了工人的要求，并且威胁说，代表团不要忘记了巴黎六月工人起义的后果。

为抗议政府的暴行，8月23日，工人又组织了示威游行，这是一次特殊的送葬形式的游行。示威群众抬着担架，担架上面放着一个象征劳动部长施瓦采尔的草人，草人口中含着一个克莱茨。草人的身上书写着：劳动部长已经吞下了4个克莱茨，但是，吞到第5个的时候，他噎死了。

奥地利政府为了对付示威游行群众，不仅调来了骑兵，而且调来了国民自卫军。国民自卫军以战斗队形向前推进。当接近示威游行队伍时，他们便按照信号，一齐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射击。特别是守卫在富人住宅区的国民自卫军，对示威群众的镇压尤为残酷。他们不仅冲杀示威游行，而且把躲藏在地下室里的妇女们也拖出来杀掉。一些帮助示威群众逃跑的人也牺牲在他们的屠刀下。在这次残酷的屠杀中，工人死伤300多人。

当天晚上，歇斯底里的国民自卫军狂欢乱舞，庆祝胜利。他们手持从工人那里夺来的彩旗，军帽上插着花朵，在市中心区耀武扬威地列队前进。这时，躲入深宅大院的资产阶级分子纷纷打开紧闭的窗户，一个个探出头来，得意忘形地向他们的“救星”鼓掌致敬，而他们的那些胖得发愁的老婆也立即挥动着色彩斑斓的花手帕，向“胜利者”表示祝贺。

8月24日，政府为进一步采取镇压措施，颁布了国民自卫军和所有城市机关均须服从内务部长的命令。命令规定：国民自卫军如有反抗者，均按刑事法严格治罪；凡发生暴动的工厂、企业，均须停工，工人退出工厂，凡愿重新参加土建劳动者必须证明自己未参加过任何暴动，同时还必须证明在维也纳长期定居。政府不仅加强了对工人的迫害，而且也加强了对进步报刊的迫害。

社会安全委员会的软弱无能在8月工人暴动的日子里已暴露

无遗了。它丝毫不能也不敢阻止政府的反革命行动。在工人暴动被镇压后,它于8月25日立即自动宣布解散。社会安全委员会的自动解散,在客观上削弱了革命力量,进一步加强了反革命阵营。

奥皇斐迪南一世回到维也纳以后,不仅加强了对奥地利本土革命运动的镇压,而且加紧了镇压匈牙利革命运动的准备工作,积极地武装和充实克罗地亚自治州长耶拉契奇的军队,把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耶拉契奇的身上,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大举进攻匈牙利。

第五节 维也纳十月起义

起义前夕奥地利的政治形势

八月流血事件使奥地利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仅影响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削弱了革命阵营的力量,而且使大资产阶级更加接近和靠拢贵族。这时,马克思于8月27日来到了维也纳,在这里,他一直停留到9月6日。马克思在维也纳期间作了许多工作,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和“维也纳民主协会”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号召民主协会的会员同正在反扑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①

这时,奥地利的反革命力量正在集结,大资产阶级于9月15日成立了“君主立宪同盟”,以巩固大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的反革命联合。

“君主立宪同盟”成立以后,国民自卫军分裂成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维护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黑黄队”,它主要是由大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居住区利奥波德什特拉斯、兰德什特拉斯和阿尔特

^① 详见第十章。

谢尔郊区的居民组成。这支军队的行动和政府军的行动是一致的。另一部分是维护民主派利益的国民自卫军，它主要是由郊区特别是维杰恩和尼巴乌区的居民组成。国民自卫军的这一部分与大学生军团接近，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议会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大资产阶级、贵族的斗争，主要反映在耶拉契奇入侵匈牙利的问题上。民主派坚决反对耶拉契奇入侵匈牙利，但是，大资产阶级和贵族却极力主张镇压匈牙利革命。由于他们在议会中占据优势，所以议会竟公然宣称：它不能容忍革命的匈牙利，坚决支持耶拉契奇对匈牙利的入侵。

事实上，在奥皇斐迪南一世逃至因斯布鲁克时，已与耶拉契奇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已着手武装和充实耶拉契奇的部队。斐迪南一世及宫廷返回维也纳以后，更加加紧了对耶拉契奇军队的武装，并于9月4日正式任命耶拉契奇为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军队总司令。9月11日，耶拉契奇率军渡过德拉瓦河，向佩斯进军，大举进攻匈牙利。^①

9月29日，匈牙利革命军与耶拉契奇军在帕科兹德和苏科罗开战，耶拉契奇的军队遭到失败，并立即向奥地利边境退却。在这里耶拉契奇打算休整自己的军队，并希望从奥地利得到增援部队，以便重新进攻匈牙利。但是，克罗地亚贵族阿尔加尔德所率领的军队却在这里被包围，阿尔加尔德被匈牙利军俘虏。这件事情的发生使耶拉契奇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计划。

10月3日，皇帝发布敕令，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任命耶拉契奇为皇帝在匈牙利的全权代表。与此同时，奥地利国防部也开始组织力量，给耶拉契奇以紧急援助。宫廷奸党也竭力巩固自己在维也纳的阵地，任命别赫托尔负责维也纳的国民自卫军、阿马埃什别尔格指挥维也纳的卫戍部队。

^① 详见第八章。

但是,从维也纳调出部队支援耶拉契奇,远非易事。10月5日,政府命令里希特率领掷弹兵营与拉德茨基率领的部分军队出发到匈牙利。但是,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掷弹兵拒绝出发到匈牙利,维也纳居民为反对奥皇入侵匈牙利,支援匈牙利革命,立即掀起暴动,当天傍晚就召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在会上,发言人指出:“如果匈牙利人受奴役,整个奥地利的自由也就会被取缔。”^①因此,群众大会决定,坚决阻止奥地利军队从维也纳出发。

塔包尔桥战斗 袭击武器库

10月6日晨,在支援耶拉契奇的掷弹兵即将离开维也纳的消息传出后,工人、大学生和部分国民自卫军便包围了车站,拆毁了几处铁路,以阻止掷弹兵出发。这时,指挥官便发布新的命令,派警卫队护送掷弹兵步行至车站。可是,在去车站的途中,掷弹兵擂起大鼓,以鼓声召唤人民支援他们。人民群众听到鼓声,便立即涌向大街集合起来,与掷弹兵联欢。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派出纳萨乌步兵营、几个骑兵连和轻骑兵队再加上三门大炮,前往镇压。于是,在塔包尔大桥,人民群众与政府军发生了第一次流血冲突。

大批军队和大炮的出现并没有动摇人民群众的战斗意志,他们继续阻截支援耶拉契奇的军队出发。这时,政府军的指挥官便命令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射击,但人民群众仍继续进攻,顽强战斗,终于夺取了大炮,并扭转方向,对准政府军射击。这时,用铁锹、锄头、镰刀和月牙镰武装起来的郊区农民也及时赶到,参加了战斗。很快,下令开火的政府军官布雷迪少将被击毙,许多军官受伤,士兵溃败,在塔包尔桥的战斗中,人民取得了胜利。

塔包尔桥的冲突一开始,又像在3月的日子里一样,警钟四起,人民涌向街头,修筑街垒。街垒虽较5月为少,但是它成环形地

^① 斯·波·卡恩:《1848年奥地利和德国革命》,第168页。

包围了市中心区，而且像锁链一样紧密地连接着。在城市的各个区，如国防部附近、大学旁、格拉列恩和斯切潘广场都发生了街垒战斗，其中最激烈的是斯切潘广场的战斗。

6日下午约1时许，在塔包尔桥战斗中取得胜利的人民队伍带着凯旋的喜悦出发到市中心去。走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是古姆宾多夫的掷弹兵，在他们后面的是工人和大学学生的队伍。他们带着战利品：两门大炮和战斗中丧命的布雷迪少将的帽子和马刀，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市中心推进。

这时，国民自卫军的“黑黄队”为了阻截革命群众进入市中心，便封闭了斯切潘广场北面的大教堂，藉以防止人民利用钟声号召总起义。人民群众的队伍到达这里时，便与国民自卫军的“黑黄队”展开了战斗。“黑黄队”用霰弹射击群众，炮轰房屋和教堂。起义群众虽然牺牲很大，但最后仍然击退了国民自卫军的“黑黄队”，夺取了大教堂，冲向市中心。这时，胜利已成定局，维也纳又一次掌握在人民手中了。

接着，起义人民便迅速地包围了国防部大厦。人民群众愤怒地声讨罪恶累累的拉图尔，并决心处死他。这时正在开会的议会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立即组成代表团，试图拯救拉图尔。由包罗什、斯莫尔卡等人组成的代表团手持白旗到达国防部，当他们劝说人民群众散开时，就更加激起了起义人民的愤怒。他们冲入大厦，将屠杀革命者的刽子手拉图尔拖到大街上，在“消灭杀人犯”的口号声中，把他吊死在大厦前的灯杆上。1848年10月12日的《新莱茵报》在报道这一件事时写道：“拉图尔曾绞杀了意大利、匈牙利、波希米亚和加里西亚革命，现在是人民复仇的时候了。”

起义人民绞死拉图尔以后，便与掷弹兵一起肃清了城市中的政府军。但是，起义者并没有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因为过去几个月的经验告诉他们，统治阶级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还会进行反扑，更残酷的斗争还会发生；胜利的成果虽然取得，但还必须用武

力去保卫和巩固。可是，起义者非常缺乏武器。为了加强自己的武装，他们决定全力以赴地夺取武器库。

6日傍晚7时许，起义工人和人民便聚集在武器库旁。守卫武器库的是两连政府军和国民自卫军的“黑黄队”。整个晚上，战斗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在战斗中起义工人和人民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为了说服守卫部队转到人民方面来，国民自卫军士兵约翰·弗劳斯曼自愿充当军使，与守卫部队谈判。午夜时分，约翰·弗劳斯曼出发到敌营，中途他受到了火力的阻击，身受重伤，差点送命，结果，未能达到目的。

夺取武器库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了。起义人民和工人占领了武器库附近的房屋，他们从窗子、顶楼和房顶上向敌人射击，但是仍不能使隐蔽在武器库的政府军投降。这时，起义人民，特别是工人坚决要求使用大炮轰击。在起义人民的坚决要求下，大学生委员会被迫同意使用大炮。于是起义者便用4门大炮同时轰击。经过3个小时的炮击，火药库被打开了缺口，并着了火。守卫部队被迫投降。10月7日晨，起义人民胜利地夺取了武器库。

这时，议会慌忙作出决定，宣布武器库所有的枪支弹药均须转交给人民政权。但是，起义人民根本不理睬这个决议，他们冲进武器库，获得了5万支步枪、大量弹药和其他武器。起义人民的枪支弹药得到了保证。

《新莱茵报》又立即报道了起义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新莱茵报》欢呼道：“胜利了！武器库被占领！人民用最好的武器武装起来了。”

斐迪南一世再次出逃 反革命力量的集聚

维也纳人民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统治集团并没有完全被击溃。他们还拥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而且同各省的反动势力，同国际反动派还有广泛的、密切的联系。他们为了拯救皇室，

赢得时间，向革命势力反扑，决定让皇帝斐迪南一世及皇室贵族再一次出逃。

10月7日晨7时，皇帝斐迪南一世及皇室在6000名士兵的护送下，离开了维也纳，到达了摩拉维亚的阿罗木茨（奥洛穆茨城）。文迪施格雷茨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斐迪南一世离开维也纳时，又向居民发表了宣言。宣言称：“无政府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屠杀和火灾笼罩了整个维也纳，我的国防部长死在杀人匪徒手中。在这决定性的时刻，我离开了维也纳，目的是设法支援被奴役的维也纳居民……”^①皇帝的这一宣言，事实上是为镇压革命的维也纳作舆论准备。

在皇帝和皇室逃跑以后，内阁部长和宫廷奸党也先后到达了阿罗木茨。维也纳人民的胜利，不仅使奥地利的统治集团惊慌万状，而且使驻奥地利的国外使节也惴惴不安。在奥皇逃跑以后，俄国驻维也纳大使麦杰姆也立即离开了维也纳。他在10月8日给涅谢尔罗迭的信中，明显地表现出了他的恐怖情绪。他写道：“皇帝和皇室已由骑兵和炮兵护送离开了维也纳。我已同英国大使商议过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我们的意见是：在这个首都我们已经失去了支撑我们的基石，我们不能够同在动荡时候成立的内阁来往……”^②

斐迪南一世出逃以后，维也纳完全控制在起义人民手中。尽管如此，议会并没有成为革命维也纳的领导者。它并不关心革命成果的巩固和革命进一步的深入发展，它所关心的是调解敌对双方的矛盾和设法使皇帝返回维也纳。因此，在皇帝逃跑后不久，议会便一个接一个地派出代表团，奔赴阿罗木茨，向皇帝表忠心和请求皇帝返回维也纳。议会代表包罗什提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便建立国内安定的“秩序”。议会请求皇帝允准召开这样的大会，但皇帝却

① 斯·波·卡恩：《1848年奥地利和德国革命》，第169页。

②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639页。

置之不理。这时，奥皇所关心的是聚集反革命力量，镇压革命的维也纳。

这时，文迪施格雷茨奉命与奥厄施别尔格和耶拉契奇取得联系，并开始集中军队。同时，耶拉契奇也接到命令：除留下部分军队阻击匈牙利军队外，其余的军队均向维也纳集中，首先援助文迪施格雷茨战胜革命的维也纳，尔后再集中兵力打击布达佩斯。10月9日，耶拉契奇的军队已经到达了奥地利。

为了讨论共同进攻维也纳的行动计划，10月10日，耶拉契奇与奥厄施别尔格会面。在会见中商定了奥厄施别尔格的军队迅速地同耶拉契奇的军队相汇合，尔后再共同包围维也纳。10月12日晨，奥厄施别尔格的军队便撤离了维也纳，在与耶拉契奇的军队汇合后，他们便按照事前商定的计划占据了维也纳郊区的战略要地。耶拉契奇的军队占领了维也纳东南郊的战略要地，奥厄施别尔格的军队占领了西南部的战略要地。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也向维也纳集结。这三方面的军队共约7万人，对维也纳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当帝国军队向维也纳集结的时候，文迪施格雷茨到达阿罗木茨，会见了皇帝斐迪南一世。在会见时，皇帝审查了进攻维也纳的计划。当时对进攻维也纳提出了两个计划：一个是立即解散议会，宣布全国处于戒严状态，任命文迪施格雷茨为特派全权代表；另一个计划是保存内阁，保存议会，但是，将议会从维也纳迁出，从而切断它与维也纳人民的联系。经过审查，皇帝批准了后一个计划。

10月16日，皇帝斐迪南一世再次拟定宣言书，它宣布维也纳是“野蛮人和暴徒的巢穴”，是“暴乱头子统治的中心”。同时宣言还警告说：“文迪施格雷茨所指挥的强大军队一定能击溃维也纳。”这个宣言不仅是对革命维也纳的诽谤和威胁，而且也是向革命维也纳的宣战。

保卫维也纳的战斗准备

在反革命力量集结的同时,维也纳的工人、居民、大学生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积极组织革命力量,保卫维也纳。

10月12日,议会代表库德利希建议以社会安全委员会的名义呼吁外省,特别是农民支援革命的维也纳,并派遣全权代表到各省去组织自卫军,动员健康的、能够拿起武器的成年男子奔赴维也纳,以保卫议会和革命成果。但是,库德利希的这一建议引起了议会内多数人的反对。因此,关于组织自卫军和动员外省人民群众的问题便成了议会争论的中心问题了。

议会的争论与斗争很快便传到各个社会团体中,从而在各社会团体中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大学生军团和“民主同盟委员会”赞成动员外省群众,动员农民,组织自卫军,保卫维也纳。10月7日大学生在农村广泛地散发了革命传单。传单写道:“我们所争得的自由处在危险中,城市被政府军围困。虽然部分军队转移到我们方面来,但政府又派来了新的军队。拿起武器来!只有自卫军能够拯救维也纳。我们需要迅速的支援。”两天以后,“民主同盟委员会”又散发了致农民书:“兄弟们,迅速地支援我们吧!拿起武器来,农民兄弟!拯救维也纳的自由与光荣吧!如果维也纳自由了,你们也就自由了!”^①

《激进报》、《宪法报》和妇女民主协会也同样要求成立自卫军。10月16日,500名妇女来到议会大厅,强烈要求成立自卫军。但是,由于在议会中温和派居多数,所以动员外省群众,动员农民和成立自卫军的建议被否决了。

在自卫军没能成立的情况下,维也纳的主要革命武装力量是国民自卫军、志愿军和波兰特别支队。国民自卫军有1万至1.2万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642页。

人，它是一支装备最好的队伍。自从“黑黄队”分裂出去以后，国民自卫军基本上便是由小商人、工人和劳动人民组成的军队了，因此，它是一支积极保卫维也纳的武装力量。

除国民自卫军外，波兰将军贝姆领导的志愿军和贝姆最亲密的战友杜布罗维茨基、包托茨基所领导的波兰特别支队也是保卫维也纳的重要武装力量。志愿军是在10月16日由贝姆组织的一支队伍，参加这支队伍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技工。波兰特别支队是由两个支队组成的，其中一个支队是参加1820—1823年西班牙革命的老兵马克斯·格里涅尔领导的；另一支是由退伍军人、著名政治活动家路德维希·哈乌克领导的“精锐部队”。在保卫维也纳的战斗中，贝姆将军所领导的志愿军与杜布罗维茨基和包托茨基所领导的波兰特别支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0月战斗的日子里，大学生军团也是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它以系为单位组成。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影响了工人，而工人人们的革命热情和战斗决心也给了他们以巨大的影响。1848年10月20日的《新莱茵报》在报道这种情况时写道：“只有用自由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学生军团和工人才充满了必然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就是在大学生和无产阶级处于战斗状态时，他们同宫廷奸党的和解也是不可能的。”

革命的维也纳虽然拥有一定的革命武装力量，但总的说来，武装力量还是很不够的。同时枪支弹药也很不充足。起义人民虽然夺取了武器库，但仍不能满足需要。起义者拥有72门大炮，可是缺乏炮弹。所有这些都给维也纳的保卫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奥地利外省和国外对维也纳的支援

奥地利的外省对维也纳的支援是很有限的。在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只有少数村庄为革命的维也纳准备了粮食和金钱，支援维也纳人民。在外省只有施泰尔马克州的格拉茨以及上奥地利州的

林茨展开了保卫维也纳的运动，它们都对维也纳给予了极大的援助。施泰尔马克州的革命人民试图组织民兵，支援维也纳，但受到



图 23 奥地利外省支援
革命的维也纳

反动当局的阻止，未能成功。而在格拉茨，民主派却成功地组织了民兵，并于10月17日派出几百人支援维也纳。至于林茨这个不大的城市，其革命情绪更为高涨。10月16日，由200人组成的志愿军在马特维·尼斯利的领导下开赴维也纳，并且积极地参

加了保卫维也纳的战斗。与此同时，非奥地利本土的其他地区及国外也给了维也纳以不同程度的支援。

维也纳10月6日事件发生后，虽然奥地利议会中大多数捷克代表以示威游行反对10月6日事件，离开维也纳，回到了布拉格，声称10月6日和7日的议会活动是非法的，但是捷克的民主派对维也纳10月6日事件深表同情，并且在捷克工人、大学生和农民中广泛地进行了支持维也纳革命的宣传工作。布拉格的大学生代表团到达维也纳以后，立即发表声明：“布拉格将同维也纳在一起，或者共同胜利，或者一起失败。”他们的声明极大地鼓舞了维也纳革命人民。

10月6日事件是维也纳革命人民给予匈牙利的巨大支援，因此，维也纳人民也希望革命的匈牙利援助维也纳，共同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但是，在匈牙利政府中以戈尔盖为首的投降派拒不执行支援维也纳的命令，他们按兵不动。只是在科苏特的坚决要求下，匈牙利政府才向文迪施格雷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奥地利政府立即解散克罗地亚军队，解除对维也纳的包围，并且强调指出，如

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匈牙利军便渡过莱达河，支援革命的维也纳。但直至10月28日，匈牙利军才赶来支援维也纳，这时，有利的时机已经失去了^①。

至于胆小如鼠的法兰克福议会，它不敢、也不愿支援革命的维也纳。当文迪施格雷茨的重炮即将轰击维也纳时，法兰克福的右派和中间派却在幸灾乐祸，只有左派强烈要求支援维也纳。在他们的要求下，议会才派出代表罗伯特·勃鲁姆、尤利乌斯·福禄培尔、诗人哈特曼和阿尔别特·特拉普什到维也纳去，表示支援。同时，议会赋予他们的任务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充当调停人。在去维也纳的途中，哈尔特曼与阿尔别特·特拉普却又到了阿罗木茨，结果文迪施格雷茨在他的司令部里将他们两人杀害了。所以，只有勃鲁姆与福禄培尔到达了维也纳。勃鲁姆与福禄培尔两人到达维也纳以后，便立即发现丝毫没有调停的余地，于是他们便放弃了法兰克福议会交给他们的任务，请求“给予他们以光荣任务：允许他们参加保卫维也纳的战斗行列”。勃鲁姆与福禄培尔光荣地参加了保卫维也纳的战斗。

除上述军事援助外，《新莱茵报》也给予了道义上、舆论上的援助。《新莱茵报》刊登了详细报道维也纳革命事件的消息，并且动员全德的民主舆论支持革命的维也纳。报纸还公布了支援维也纳的声明及各地积极支援维也纳的情况。在德国“人民俱乐部”委员会的呼吁书中写道：“维也纳人！德国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里，……请你们想一想，现在我们震撼全球的斗争是暴政和自由之间的斗争，是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的斗争，是鞭子的普遍统治与自由人民的普遍友爱之间的斗争……”^② 呼吁书还建议维也纳民主派解散议会，成立临时政府。

^① 详见第八章。

^②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649页。

所有这些支援都给了维也纳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增强了他们保卫维也纳的决心。

维也纳的战斗

维也纳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危急了。10月16日，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出动，21日到达了维也纳城下。当天文迪施格雷茨发出公告，宣布他要攻占维也纳，并在城内实行特别戒严。

维也纳革命人民为了保卫维也纳，决定充分利用多瑙河和环绕在维也纳周围的地堡。10月20日，在维也纳郊区已建筑起坚固的街垒群，挖了战壕。塔包尔桥的巨大街垒挡着了利奥波德广场。在郊区的一些主要街道上同样筑起了街垒。建筑在耶格尔采尔的街垒叫作星星街垒，它是一座由石头砌成的宏大街垒，周围是极深的堑壕，堡垒上筑有6个炮眼，可以向四面八方射击。这座街垒是维也纳革命无产阶级的骄傲。在维也纳的防御战中，它起了巨大的作用。

领导保卫维也纳战斗的是剧作家梅森豪塞。他虽是一个天才的剧作家和诗人，但不是一个杰出的军官，因此领导防御战的重任很快便落在贝姆的肩上了。在贝姆担当起指挥官的重任后，维也纳的军事防御才算真正有了组织，有了防御计划。

10月23日，文迪施格雷茨又发出了最后通牒。通牒要求：城市在48小时内投降，凡未参加国民自卫军的居民均须交出武器，解散大学生军团，封闭所有的俱乐部，交出维也纳民主派的活动家和处死拉图乐部长的“罪犯”。对此，议会和社会安全委员会表现得软弱无力。议会不断地派代表团到文迪施格雷茨所在地，请求妥协，但未获成功。

文迪施格雷茨违背了自己提出的48小时内答复的诺言，于当天就开始了军事行动。在23日和24日的战斗中，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几乎未能前进一步。所以，25日的炮击就更加激烈了。早晨8

点，拉姆贝格将军的大炮已经从塔包尔桥方面向城市轰击。对利奥波德广场的射击也加强了。但直到后半夜，他们才占据了第一道防线的某些阵地。

10月26日，战斗又以新的力量开始了。政府军向索菲娅桥攻击，在这里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在5小时内，保卫索菲娅桥的起义者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因这一地区的防御组织工作较差，大桥的守卫者遭到了失败。

距离索菲娅桥不远的地区由志愿军和国民自卫军守卫着。敌人很快便突破了这个据点，但守卫者仍顽强地战斗。到中午，勃鲁姆领导的部队赶来支援，方才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更激烈的战斗在马利吉尔夫和列尔亨费尔德一线进行。守卫在这里的是弗尤弗哈乌兹和泽克斯哈乌兹的工人，他们均手持武器，英勇顽强地保卫着这个区域。

尽管起义人民顽强坚持，勇敢战斗，但是，政府军还是取得了胜利，占领了利奥波德广场、布拉杰尔和布利吉恩等据点。在此危急情况下，贝姆寄希望于匈牙利。他认为匈牙利的支援必将大大改变起义者的处境。如果匈牙利的援军能够迅速赶到，占领马利吉尔夫和列尔亨费尔德一线，那么，政府军便没有取胜的任何可能，并且起义人民可以迅速地收复被政府军占领的地区。可惜，匈牙利的援军来得太迟了。

在这困难而又危急的时刻，维也纳的革命者并没有考虑投降，他们仍以饱满的情绪继续战斗。他们以自我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捍卫着城市的每一寸土地。

10月27日，文迪施格雷茨为了重新部署自己的军队和调来新式大炮，迅速战胜革命的维也纳，便宣布短时间的休战。于是军事行动停止了一天。起义人民在离开阵地几小时后，夜里又回到阵地上来了。莫里茨·司梅斯在描述这些战士的装备时写道：“民兵主要是由贫苦手工业者、短工和工人组成。……他们头上戴的有大

学生制帽、有国民自卫军军帽、有褪色的夏帽或破旧的大礼帽，脚上穿的有皮鞋、有便鞋，还有许多人光着脚。……他们的武器也和他们的装束一样地不寻常。有些人腰上挂着月牙斧、老式火枪，或者长刀、短剑和手枪。”^①正是这些装备很差的革命人民抵抗着装备优良、数倍于自己的政府军，正是他们死守着自己的岗位，一直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正是他们坚强不屈，英勇地保卫着革命，保卫着维也纳。

10月28日，政府军的进攻又开始了。铁路工人、国民自卫军战士和志愿军都奋不顾身地战斗着。弗尤弗哈乌兹和泽克斯哈乌兹的居民也顽强地守卫着每一所住宅。

下午2时许，进攻星星街垒的战斗开始了。贝姆以惊人的冷静态度，在枪林弹雨下指挥着保卫这座街垒的战斗。起义军的主力——路德维希·哈乌克指挥的波兰特别支队的“精锐部队”、大学生军团、志愿军都集中在这个据点。在街垒的上空飘扬着德国和匈牙利的旗帜。星星街垒的战斗进行得特别激烈。星星街垒周围其他工事的保卫者，都是坚守岗位，他们从每一所住宅里向政府军射击，枪弹散落在政府军中间，这对政府军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政府军使用了大炮，猛烈地向街垒及其周围工事射击。同时，政府军的指挥官命令三倍于街垒保卫者的士兵发起冲锋，街垒的捍卫者沉着应战，英勇还击，但终因寡不敌众，星星街垒被政府军占领了，紧接着整个利奥波德广场区也被占领了。星星街垒的陷落和整个利奥波德广场区的被占领，决定了维也纳失败的命运。

这时，维也纳的守卫者接到了文迪施格雷茨要求维也纳投降的命令，并要求将维也纳最积极、最忠诚的保卫者全部交出来，其中包括贝姆将军。

^① 埃·普里斯特尔：《奥地利简史》，第395—396页。



图 24 1848 年 10 月 28 日维也纳的大火

10 月 28 日晚,召开了各战斗队的指挥官与社会安全委员会委员的联席会议。在会上关于投降谈判的建议引起了争论,一部分指挥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指挥官反对投降谈判,而另一部分指挥官和大部分安全委员会委员主张谈判。经过争论,会议通过了派代表团会见文迪施格雷茨,谈判投降条件的决定。但是,这一决定是违背绝大多数战士的意志的。所以,在 10 月 29 日,当代表团去见文迪施格雷茨时,走至半路,被聚集起来的武装人民挡住了去路。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卡泽尔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道:“这时,从四面八方传来了让我们停下来喊声。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去见文迪施格雷茨的代表团时,他们的喊声就更加高昂。他们高呼:打死这些走狗!枪毙了他们!他们要背叛我们并出卖我们!”^①文迪施格雷茨也断然拒绝了关于投降条件的谈判,因为他要求革命的维也纳必须无条件投降。

代表团毫无结果地返回了维也纳。10 月 30 日又召开了会议。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 年革命》第 1 卷,第 651 页。

在会上，梅森豪塞通知说：弹药只够用4个小时了，除让出城市外已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梅森豪塞的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他是乘贝姆未参加会议之机欺骗大家。结果一部分人受骗，另一部分人便以此为借口竭力主张投降，于是无条件投降的决议通过了。当天就又派出了第二个代表团。

当继续奋战的革命群众听到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他们气愤之极，高声大骂投降派，“打倒叛徒！”“打倒骗子手梅森豪塞！”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士兵们愤怒地谈论：“不是弹药不够，而是叛徒太多了！”他们彼此相约，如果把城市交给敌人，他们便相互开枪打死，宁愿死在自己同志的枪下，也决不作敌人的俘虏。他们就是以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气节鼓励自己，鞭策自己，奋战到底。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个代表团像一群小偷一样悄悄地溜出了维也纳城。

就在维也纳即将投降的前夕，许多士兵仍然继续战斗。在匈牙利援军就要到来的消息传出后，战斗又重新开始了，起义者又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匈牙利援军的到来。但是，匈牙利援军被耶拉契奇的军队阻击，被迫退却。这个消息传出后，维也纳起义者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战斗沉寂了下来。不过，城市的个别地区，工人和大学生还在坚持战斗，直到逼近的政府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或者把他们枪杀为止。英雄的维也纳人民在保卫革命维也纳的战斗中表现了奥地利广大劳动人民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和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

11月1日，光荣的、革命的维也纳陷落了。维也纳的陷落标志着1848年奥地利革命的失败。

第六节 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的奥地利

维也纳的白色恐怖

维也纳陷落的当天,3个星期内一直没有打开过的百叶窗,立即打开了。窗子里传出了富人的欢笑声和“皇帝万岁”的叫喊声。那些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又走上街头,为革命被淹没在血泊中而互相祝贺,弹冠相庆。维也纳的上空阴云密布,它又成了反动统治的中心、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

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进入城市后,维也纳的白色恐怖便开始了。他们抢劫居民,奸淫妇女,杀害无辜。对郊区工人的洗劫尤为残酷。这场洗劫是秘密进行的,凡工人的住宅均遭抢劫;凡工人士兵均遭杀害;凡反抗掠夺者,不论男女老少均立即处死。他们对大学生军团和国民自卫军也同样怀有刻骨的仇恨,凡穿大学生军团和国民自卫军军服者均被枪决,无一幸免。

在秘密抢劫之后,军事法庭开始活动了。大逮捕一直在进行,从1848年11月至1849年4月共逮捕了4375人。逮捕一直持续到1849年底。绝大多数的被捕者均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其中一些人被关进监狱,一些人被判罪,革命领导人被枪决。被处死的革命领导人有贝希尔、耶利涅克、罗伯特·勃鲁姆和梅森豪塞等24人。他们都分别在不同的时间被处死。除革命领导人被处死外,尚有145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军事法庭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849年5月9日才算告一段落。

罗伯特·勃鲁姆于1848年11月9日被处死。勃鲁姆的被处死在德国进步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奥地利政府对这位受宪法保护的议会代表的镇压激起了德国人民的极大愤恨。马克思在科隆“民主同盟”召开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枪杀勃鲁姆的通告。工

人列斯纳在叙述当时的情景时写道：“会议大厅里寂静万分。我们大家都为这一残暴行为而震惊。这个消息像风暴一样吹过大厅。”^①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义愤填膺。11月16日，坚决主张投降的梅森豪塞也同样落得个被处死的下场。17日，尤利乌斯·贝希尔和盖尔曼·耶利涅克被绞死。

自从维也纳陷落后，白色恐怖一直笼罩着这个城市。

奥地利议会迁往克列麦尔日 弗兰茨·约瑟夫即位

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奥地利政府便依靠军队的力量，采取种种反革命措施。它立即取消了三月革命的一切民主成果，成立了新内阁。新内阁由资产阶级代表和贵族地主代表组成。施瓦岑贝格任内阁首相，并兼任外交部长，他是反对维也纳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内务部长由原加里西亚总督斯塔迪昂公爵充当，他是宫廷的热烈支持者和拥护者；司法部长的职位交给了巴赫；财政部长由克莱斯出任；贸易部长由布鲁克担当。新内阁于11月12日正式开始工作。这样一个内阁的组成，只有在维也纳十月起义被镇压，资产阶级完全转入反革命营垒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随着内阁的更替，对皇帝忠心耿耿的议会被迁到摩拉维亚的一个偏僻的小城市克列麦尔日。把议会迁到这里的目的是割断议会代表与维也纳人民的联系，使之失去人民的支持。

议会迁到克列麦尔日以后，于1848年11月22日复会。议会的基本力量是“捷克俱乐部”和“奥地利德意志同盟”的左翼代表。议会中的中间派由“中心俱乐部”的著名活动家拉塞尔领导。左派在议会中起决定作用。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652页。

11月27日，奥地利新内阁在议会上发表了施政纲领。纲领强调，内阁全力保证“帝国完全统一”的愿望，实质上也就是将各地区和各民族均置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的愿望。这时，议会完全成了帝国政府的忠实仆从和带有“民主”标记的装饰品。

1848年12月2日，皇帝斐迪南一世退位，其侄弗兰茨·约瑟夫即位，这时他年仅18岁。真正掌握实权的是他的母亲索菲娅大公妃。皇帝的更换是宫廷党派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拥立弗兰茨·约瑟夫为皇帝这一派的首脑人物是索菲娅大公妃及新皇帝的叔父路德维希大公。索菲娅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她对革命怀有刻骨的仇恨。皇帝之所以在这时更换，既是满足索菲娅的权力欲，又是反对革命的需要。因为新皇帝对维也纳的革命人民不曾承担过任何诺言，所以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在奥地利恢复革命前的旧秩序，毫无顾忌地取消革命的一切成果。

弗兰茨·约瑟夫在即位之初，为彻底取消民主组织，立即解散了国民自卫军和大学生军团，解散了所有的民主同盟与俱乐部。由于弗兰茨·约瑟夫对匈牙利不曾直接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他可以宣布对革命的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在弗兰茨·约瑟夫的即位宣言中，丝毫未提及匈牙利的独立问题，相反，却强调指出了迅速恢复帝国统一的重要性。他在宣言中直言不讳地说：“我的职责和我的愿望是结束‘弊政’和结束革命。”^① 匈牙利议会针锋相对，宣布不承认弗兰茨·约瑟夫为匈牙利国王，并责令匈牙利一切官吏拒绝听从弗兰茨·约瑟夫的任何命令。所以，弗兰茨·约瑟夫即位完全割断了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最后的极其薄弱的联系。

弗兰茨·约瑟夫即位后，议会继续在克列麦尔日工作。它根据政府的意志批准发行了8亿盾的公债，给政府以巨大的援助，在经济上保证了奥地利政府对革命匈牙利的武装入侵。

^① 斯·波·卡恩：《1848年奥地利和德国革命》，第177页。

1849年3月4日宪法与议会的解散

1849年3月初,匈牙利的处境非常困难。这时,匈牙利民族政府在匈牙利的北部和西北部必须打击奥地利的军队,在南部和东部又要对付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军。2月26至27日,在戈波利恩,文迪施格雷茨给匈牙利军以沉重打击,迫使它退至蒂萨河对岸。

奥地利军队在对匈牙利军的战斗中所取得的这一初步胜利,使反革命集团增加了力量,增强了取胜的信心,并使施瓦岑贝格-斯塔迪昂政府对内采取了坚决的反革命措施:解散议会,颁布新宪法。

颁布新宪法必须在解散议会之前进行。于是,施瓦岑贝格-斯塔迪昂政府便慌忙于2月份将新宪法文本准备就绪,并于3月4日在议会上阐明了新宪法的基本原则。新宪法规定:奥地利帝国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帝国的全部权力均集中在皇帝和大臣手中;立法权属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由各省议会代表组成,下议院由每年缴纳直接税不少于10弗洛林的居民选举产生。这一选举规定,事实上完全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同时,新宪法也完全剥夺了各民族地区的自治权,完全取消了三月革命的一切成果。1849年3月4日,政府向全国颁布了新宪法。3月4日宪法的颁布标志着在奥地利已经全面地复辟了封建专制制度。

新宪法的颁布激起了议会代表的极大愤怒,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于是,奥地利政府便以此为借口,于3月6日至7日在克列麦尔日集结了大量军队,包围了议会。街上到处张贴着解散议会的宣言。3月7日,奥地利议会被解散了。

新宪法的颁布、议会的解散使奥地利广大劳动人民又重新在封建专制制度的重压下呻吟和挣扎;伦巴底、威尼斯、匈牙利和捷克又作为奥地利的基本领地统一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从

匈牙利分离出来的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也变成了奥地利的基本领地，受奥地利直接统治与管辖。

所以，1848年奥地利革命失败后，这个七零八落的多民族国家又得以苟延残喘，奥地利皇帝、贵族、大资产阶级同捷克、波兰以及匈牙利的贵族又结成了“神圣同盟”，在共同反对革命的基础上联合了起来。

第四章 1848年意大利革命

第一节 革命前的意大利

意大利被重新肢解和奴役

1814年拿破仑垮台后,反法各国为重新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而召开了维也纳会议。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意大利又被肢解为八个邦国,奥地利侵略势力卷土重来,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君主被扶上意大利各个小公国的王位。伦巴底—威尼斯地区(人口500万)直接划入奥地利帝国的版图;巴马公国(人口50万)被交给前法国皇后玛丽·路易丝(奥皇女儿、拿破仑的第二个妻子)女大公作为终身领地;托斯坎纳公国(人口150万)落到奥地利大公斐迪南手中;摩地那公国(人口57万)则归属弗兰茨大公;卢加公国(人口16万)给予另一个玛丽·路易丝(西班牙王查理四世的女儿);教皇恢复了对罗马及其领地(人口290万)的统治;萨伏依王朝在皮蒙特王国(即撒丁王国,人口490万)复辟;西班牙波旁王朝在那不勒斯王国(即两西西里王国,人口640万)复辟。这种民族的分割是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利益的,所以,梅特涅便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

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恢复，意大利内外反动势力力图消除法国革命的影响和拿破仑改革的痕迹。于是，亚平宁半岛上到处恢复了贵族和僧侣的等级特权。国家的官职、军队和法庭中的高级职位，依旧为特权阶级所垄断。1789年以后擢用的官吏、军官和法官均被免职。各地几乎都恢复了教会审判权，耶稣会教士则重新取得了特权。皮蒙特国王维克多·厄曼努伊尔一世复位的第二天，就废除了法国人实施的一切法律和制度，并向自己的臣民宣布：“除遵守1770年国王宪法外，其他法律一概无效。”他把被没收的贵族和僧侣的土地归还给他们，并恢复他们的封建权利；他重新实行“亵渎神灵”死刑法，对出版书报进行严格检查，把大、中学校交到僧侣手中。在教皇国，反动气焰甚嚣尘上；在罗马和波伦亚大学不准讲述地球转动学说和但丁的作品；1841年，异端裁判官比萨罗出了一份告示，飭令全体居民告发异教徒、犹太人和魔法师，并威胁说，凡是知道“内心崇拜魔鬼”者而不报告的要开除教籍。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一世废除法国人实行的宗教改革，成倍增加主教的人数，40年代初该国约有800万居民，其中计有2万天主教神父和2万男女修道士。在绰号叫“刽子手”的摩地那大公弗兰茨统治的年代里，曾经把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监狱、绞死和枪杀，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和他不同。

封建复辟波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教皇庇护七世禁止人民种牛痘和罗马街灯照明，因为据说这些“理性”措施是法国人实行的；皮蒙特政府宣布依据拿破仑法典而缔结的婚约为非法，维克多·厄曼努伊尔一世封闭了都灵植物园，听任公路破坏不加修复，甚至想拆掉波河大桥，原因也仅仅是因为这些都是法国人统治时期修建的^①。

封建反动与民族压迫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维也纳会议巩固

^① 吉科夫斯基主编：《意大利简史》，莫斯科，1958年，第230页。

了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统治。“意大利在梅特涅的压迫下辗转呻吟”^①。在伦巴底—威尼斯地区，奥地利驻扎有大量军队，派出许多警察和官吏；反动当局专横暴戾，随意监禁和屠杀爱国人士。他们掠走当地的特产蚕丝，百般限制丝织工业的发展；他们敲榨勒索，每年征收的税款竟占帝国总收入的 1/4（该地区人口只占帝国人口的 1/7），盐税和烟草税往往超过其价值的 10 倍；无论是一条道路，或是一道堤坝，未经维也纳的批准都不能兴建。在其他各个公国，奥地利的警探也遍布各地，实际上把全体意大利人民置于警察监视之下。梅特涅的侦察网包括驻在每一个宫廷的使臣和被收买的告密者，他们经常出入公共场所、咖啡馆和饭馆，并向有关人员报告私人谈话和街谈巷议，意大利人民对奥地利统治稍有不满意露即遭逮捕和处死。千万爱国志士在奥地利的监狱中受尽折磨。意大利内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白色恐怖笼罩各邦。意大利民族灾难深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

封建复辟势力的猖獗，奥地利民族压迫的变本加厉，激起了意大利人民的普遍怨愤。维也纳会议后，秘密会社在意大利纷纷建立，其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烧炭党。

烧炭党是为驱逐法国侵略者而于 1807 年建立的一个秘密组织。参加烧炭党的主要是自由派贵族、资产阶级及属于这两个阶级的军官和知识分子，也有少数手工业者和农民。它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纲领，其中一些人既鼓吹自由主义思想，又赞扬共和思想，还有一些人因受菲力普·邦纳罗蒂思想的影响，信仰空想共产主义。但总的说来，烧炭党人的目的是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意大利的独立，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立宪制度和实行有限度的改革。

^① 恩格斯：《1847 年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505 页。

可是，他们对争取国家统一的认识是模糊的。烧炭党人的斗争方式，主要是密谋活动。

1820年7月初，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那不勒斯南部诺拉城的烧炭党人举行起义，政府派佩帕将军平息起义，但这支军队附和了起义者。起义者随之壮大，并向那不勒斯挺进。这时，首都也发生了骚动。领导这次运动的自由派要求立即颁布以1812年西班牙宪法为蓝本的宪法。斐迪南四世吓得卧病在床，被迫颁布了温和的宪法，并批准成立新政府。起义的领导者佩帕将军被任命为政府的首脑。

自由派政府成立后，不但不支持人民起义，反而镇压了西西里岛要求独立的运动。1821年3月，奥军侵入那不勒斯，恢复了波旁王朝的统治。

1821年3月，在撒丁王国的都灵市和热那亚市也爆发了烧炭党人起义，自由派也乘机攫取了政权。他们对君主制充满幻想，无所作为。4月，萨伏依王朝的军队和奥地利武装干涉军反扑过来，镇压了革命。

到了30年代，在1830年法国7月革命胜利的推动下，意大利又掀起了新的革命浪潮，烧炭党人在意大利的中部点燃了新的起义烽火。1831年2月，摩地那和巴马两公国爆发了起义。大公被赶下了台，自由派贵族掌握了政权。接着运动席卷了教皇国的罗曼那、马尔基和翁布里亚。在波伦亚成立的临时政府推翻了教皇的世俗政权，并颁布了宪法。起义波及的各地区联合起来，组成了意大利联合省。起义者向罗马推进，教皇格利哥里十六世准备逃跑。但就在这时奥军大举进犯，又将各地起义镇压下去了。

烧炭党人发动的多次起义之所以屡遭失败，主要是因为这些起义是上层的起义，是同广大人民没有联系的起义。他们在起义获得暂时胜利、革命应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刻，不但不发动群众支持革命，反而对群众切身利益和要求，特别是农民所切盼解决的土地

问题漠然置之，甚至调兵遣将镇压群众运动，因而抵挡不住反革命的进攻。

30年代初发动的起义失败后，烧炭党人退出了意大利政治斗争的舞台。

经济发展与各阶级状况

维也纳会议后的政治反动对意大利各国的经济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20年代前后意大利各国经济处于停滞不前的衰落状态。封建租税和行会制度的部分恢复，阻碍了工农业的发展；奥地利的民族压迫和掠夺政策，成倍地增加了北部人民的负担；林立的邦国各有自己的法律、纸币和度量衡，高筑的关税壁垒使贸易十分困难。例如，从巴马向37英里外的摩地那运输货物，就要征收关税6次；沿意大利北部的主要商业线波河运输商品，要征收关税21次；谷物从都灵运到热那亚的费用，比从敖德萨运到热那亚还要昂贵。一位当时人指出：“意大利好比一座房屋，里面通往各房间的门比大门锁得还紧。”

19世纪前半期，意大利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当时它的2200万人口中，有4/5住在农村。王公贵族、寺院僧侣握有大量土地。例如，在教皇国的罗曼那省，鲍尔格兹公爵占有2.5万公顷的土地，托尔洛尼亚公爵占有2万公顷土地。8个天主教家族和僧团竟占有罗曼那全部耕地的一半。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岛的贵族一般占有土地1000公顷。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伦巴底，至19世纪中期还存在70个封建大地主。这些僧俗贵族代表了意大利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他们和外国统治者哈布斯堡家族结成政治联盟，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反对任何微小的改革，害怕国家实现统一会丧失王位和特权，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意大利的农民形式上是自由的，农奴制度早已消失，但农民由于租佃土地，对地主仍有很大的依附性。租佃的主要形式是对分

制。中意大利对分制农民称“科隆”，他们用自己的牲畜和农具耕种地主土地，可分得一半收获物；如果地主负担部分牲畜和农具，则“科隆”分得的收获物更少。在西西里岛，佃农“鲍尔杰齐”租地契约时间很短，处境更为艰难。对分制佃农除向地主交纳实物地租外，农忙季节须给地主服无偿劳役，逢年过节要给地主奉献鸡鸭蛋肉，还要向国家缴纳苛捐杂税，其中磨粉税有时竟达粮食价值的20%。沉重的封建剥削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往往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被迫抛弃田园，沦为乞丐。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彻底推翻封建制度，赶走外国压迫者，获得土地和解放，他们是面临的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

北意大利的土地制度与南部比较有显著特点。在伦巴底和皮蒙特，法国统治时期，大量封建地产通过拍卖转到商人手中。这里的地主也早就与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30—40年代，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贵族和资本家）为提高农产品产量，在保持半封建剥削的同时，开始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大农场。他们使用雇佣工人，改进耕作技术，开垦稻米种植场，大量栽培桑树，从粮食和蚕丝的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这部分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对封建专制和异族统治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群众，所以他们总是期待那些戴王冠的人物开明起来，颁布宪法，进行改革，摆脱外族统治，实现国家统一。这部分人由于在当时意大利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影响很大。

30—40年代，意大利工业有所发展。传统的丝织业遍及城乡。广大农民在农事之余从事丝织品生产，城市中有许多生产丝绸的手工场和作坊。除丝织工业外，意大利还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工业部门——棉纺织业，并于三四十年代最早使用了机器。革命爆发前夕，伦巴底有28个纺织工厂，皮蒙特有50个纺织工厂。1825年米兰开设了第一家机械工厂，先是生产提花机，不久就开始供应布

机。40年代初建立起第一批大型的机器制造企业和冶金企业。1839年修筑了从那不勒斯到波尔季奇的第一条铁路,1843年建成利伏诺到皮萨的铁路。到1850年,意大利共建筑铁路400公里。1830年,意大利消费了2万吨生铁和铸铁、400万英磅棉花。意大利的商品总流通量1830年为2.2亿马罗克,1850年增至5.2亿马罗克。

虽然总的说来,革命前意大利的手工工场仍居统治地位,但是工业产品的增长、企业数目的增多、特别是机器的使用,表明意大利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意大利的工业革命是在国家分裂、外族压迫和封建贵族当政的条件下展开的,开始晚,速度慢,发展极不平衡。因此,从工业革命中诞生的资产阶级人数少,力量小,并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反对奥地利的统治,憧憬国家统一和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但又力不胜任,不能单独领导民族革命到达胜利;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建立共和国,但又惧怕农民,拒绝土地革命,这就必然使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动摇妥协,不能把革命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刚刚从一般劳动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意大利无产阶级,其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还比较低。40年代中期,北部米兰等城市的工人开始组织互助性的会社。初期的工人运动主要表现为饥饿暴动。他们虽是一支最革命的力量,但在当时还不能独立登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

“青年意大利”马志尼和加里波的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意大利各邦国的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激化。推翻外族压迫,实现民族独立,消灭各邦封建专制统治,完成国家统一,这是当时摆在意大利人民面前的革命任务。

19世纪30—40年代,意大利出现了新的民族觉醒,到处激荡着反奥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诗歌、历史、小说、戏剧、绘画和音

乐等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爱国者用迂回曲折的方式抗议奥地利的强权，表达民族的愿望，提出变革现实的要求。孟佐尼的浪漫主义杰作《订婚夫妇》把过去意大利的成就与伟大同现实的屈辱相对照，以唤起人们的爱国感情。韦迪的早期歌剧《参加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的伦巴底人》充满了反抗异族压迫的呼声，歌剧的曲调深受群众欢迎。朱斯蒂的讽喻诗口授给不识字的人，诗歌抨击暴政，赞美自由和正义，描绘了意大利遭受苦难的画面。罗马约西主编的《年鉴》杂志名义上是商业杂志，而实际上它却歌颂每一种改革，用其他国家的一些事实和数字来鼓励贸易，强调指出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压迫、敦促意大利走上进步的道路^①。

就在反奥情绪遍及整个亚平宁半岛、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进入新阶段的时刻，一个新的革命组织——“青年意大利”诞生了，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意大利民族愿望的出色表达者、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朱塞佩·马志尼。

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年)出生于热那亚一个医生的家庭。青年时代在热那亚大学修完了法学课程。大学毕业后担任律师。20年代末，马志尼在热那亚创办报纸，撰写大量政论文章，雄辩和热情地宣传反奥爱国思想。1827年加入烧炭党。1830年被奸细告密遭逮捕，监禁6个月后被逐出意大利。1831年，马志尼在法国马赛团结一批侨民爱国者，创立“青年意大利”党，并用同名创办一个刊物，作为他传播革命思想和指导革命运动的工具。

“青年意大利”党成立后，在国内很快建立了许多支部。每个成员入党时必须宣誓严守秘密，倘破坏誓言，“将招致神明愤怒和同人共弃”。“青年意大利”党大量吸收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参加自己的组织，城市下层群众，即手工业者、工人和贫民的代表

^① 赫·赫德·德·普·韦利：《意大利简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48—253页。

人物也有加入的。参加的人年龄限于40岁以下。以马志尼为首的“青年意大利”党建立不久就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堡垒，它采用白、红、绿三色做自己的旗帜。

“青年意大利”党的纲领是马志尼亲自制定的。在马志尼为“青年意大利”党所拟订的《宣言》中宣称，意大利应该建立在“三个不可分割的基础上，即：独立、统一和自由”^①。也就是说，“青年意大利”党把反对奥地利的民族压迫、消灭封建割据和君主专制，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共和国，作为它的革命斗争目标。



图 25 朱塞佩·马志尼

马志尼吸取了烧炭党人失败的教训和30年代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认识到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自由之树，只有当它用公民之手培植起来，用公民的血加以灌溉并靠公民的勇气加以护卫的时候，才会开花结果。”^②因而主张广泛吸收人民参加革命斗争，“以便尽可能用最大的力量走向战场”^③。1840年，马志尼在“青年意大利”党里设立了工人部，专门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但是，由于马志尼阶级地位和唯心史观的限制，他不能将民族解放的任务同国内的经济改革结合起来，也不能制定一个土地纲领，因而也就不能将农民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同时，在斗争策略方面，他仍然沿袭了烧炭党的密谋暴动，不敢广泛地发动群众。所以在30—40年代接连几次的发动，如1833年马志尼分子鲁菲尼

① 格·姆·屈味林：《加里波的保卫罗马共和国》，伦敦，1924年，第26页。

② 塞朗：《马志尼的不朽思想》，伦敦，1939年，第34页。

③ 基洛娃：《马志尼著作中的意大利革命观念》，载德鲁日宁等编《社会政治思想史文集》，莫斯科，1955年，第434页。

兄弟在热那亚发动的起义,1834年马志尼领导下的起义都遭到了失败。参加了1834年起义的加里波的逃离意大利,被缺席判处死刑。

朱塞佩·加里波的(1807—1882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一个风景如画的古老城镇——尼斯,他家祖祖辈辈都以航海为生。加里波的自幼就跟随父亲当水手,远渡重洋。艰苦的航海生活锻炼了加里波的意志,世界各地的游历开阔了加里波的胸怀。他对祖国山河的破碎痛心疾首,对争取祖国美好的未来心向往之。1833年他从一个青年意大利党员库涅奥那里了解到了关于意大利



图 26 朱塞佩·加里波的

的发展前途和革命等一些道理,觉得他久思不解的问题得到了答案,觉得他的“不幸的国家有了一线曙光”^①。就在这一年,加里波的与马志尼在马赛第一次晤面,并立刻加入了“青年意大利”党。1834年起义失败后,加里波的流亡国外,于1836年到了南美洲,曾先后参加了那里的里奥·格兰德共和国(在巴西南部)反对巴西争取独立的斗争和乌拉圭人民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加里波的第一次显示出他的卓越的军事天才。

自由派的运动

19世纪30—40年代,意大利的政治生活日趋活跃,出现了各

^① 大仲马:《回忆加里波的》,加拿特,1931年英译本,第38页。

种各样的政治派别。这些派别虽然都关心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但由于它们代表着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因而其政治观点截然不同。40年代中期后，由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组成的自由派，利用以马志尼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失败和错误迅速发展起来。

自由派反对马志尼派的武装起义和建立共和国的方案，他们寄希望于“开明”的封建君主能“自上而下”地把各邦国联合起来，完成国家的统一；他们不满封建专制制度，但仅恳求封建君主能颁布一部宪法，让他们参与政权，进行一些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他们不满奥地利的民族压迫，但总想依靠欧洲一个大国的援助来结束奥地利统治，实现国家独立；他们主张限制教会财产，主张取消长子继承和遗产转让，但同时又坚决反对取消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当时在自由派的报刊上，在“学术会议”上，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客厅里，到处都在讨论着经济和政治问题，如建立统一国家的意见，各意大利国家之间修筑铁路和建立关税同盟的方案等。1847年在都灵创刊的《复兴报》对自由派观点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1843年，天主教神父贝约蒂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论意大利人在道德和社会方面的领先地位》。著者提出，统一意大利的办法是在教皇统辖下成立一个意大利联邦，由一些当权的君主组成超内阁，各邦现存的制度保持不变，甚至奥地利皇帝作为伦巴底和威尼斯的君主，也可以成为意大利联邦的成员。这个倡议引起了自由派极大的兴趣，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844年，希萨尔·巴尔波伯爵的《意大利的希望》发表。作者支持建立意大利联邦的意见，但认为如果不把伦巴底和威尼斯从奥地利占领下解放出来，联邦就不可能建立；而解放伦巴底和威尼斯的最好办法是利用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促使俄、英、法劝说奥地利自愿退出意大利，并使奥地利在巴尔干得到补偿。

1846年，马西莫·达杰利奥侯爵也写了一本叫《罗曼那的最

五事件》的小册子。作者在书中强烈地反对马志尼及其拥护者所主张的革命斗争方法，竭力论证统治皮蒙特的萨伏依王朝最有资格、最有能力领导意大利实现统一。皮蒙特的国王应当成为全意大利联邦的国王，这就是作者的结论。皮蒙特的“阿尔伯特分子”，《复兴报》的主编卡米洛·加富尔就是这种思想的狂热鼓吹者。

革命爆发前夕，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形成了两种思潮（革命的和改良的）、两大派别（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两种思潮、两大政治派别的斗争，贯穿于1848年意大利革命和以后统一运动的整个过程。

第二节 革命的酝酿和爆发

革命形势的形成

革命爆发的前几年，意大利人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1845—1846年农业歉收、马铃薯病虫害和1847年的工商业危机，也在意大利蔓延起来。各个邦国都在闹饥荒。许多地方饿殍载道，村无炊烟。在城市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粮价飞涨，疫病流行。陷于困境的城乡人民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不断举行暴动，反抗内外反动派的统治，争取生存的权利。自由主义反动派也乘机活动，宣传改革。封建统治集团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

教皇国的斗争形势对整个意大利产生了巨大影响。1846年，人民极端痛恨的教皇格利哥里十六死去后，新教皇庇护九世在罗马登位。这时正值教皇领地人民的斗争方兴未艾之际。新登位的教皇庇护九世为维持自己的统治，便企图用改良阻止革命。他拉拢自由派头目，把自己装扮成“改革者”的模样，一上台就大赦政治犯，设立有世俗人物参加的罗马咨询会议，宣布出版自由，允许资

产阶级修筑铁路和建立国民自卫军等。于是，这个中世纪顽固思想的代表——罗马教皇俨然成了自由主义运动的首领。自由派对庇护九世的这些措施吹捧称颂，高呼：“庇护九世万岁！”马志尼为了同自由派建立联盟，暂时取消了建立共和国的要求，甚至写信给庇护九世，请求教皇领导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但劳动群众对这些改革并不满足，他们不断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减免赋税，分配粮食，武装起来赶走奥地利奴役者。1847年初，饥饿的人群捣毁商店、粮仓，冲进盐场抢夺食盐，惩治奸商、教皇官吏和奥地利压迫者。在罗马，反奥骚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罗马下层群众的领袖安杰洛·布鲁涅蒂在组织这些革命行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种形势下，庇护九世便暗中向奥地利乞求“援助”。1847年6月，在教皇当选的周年纪念日，一支全副武装的奥地利部队开进了教皇辖地斐拉拉城。哈布斯堡王朝这个挑衅性的行动，立刻在全意大利引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在奥地利直接占领下的伦巴底—威尼斯地区，人民群众掀起了爱国示威行动。米兰人民展开禁烟行动，抵制奥地利的重税盘剥。威尼斯的街头出现了“德意志人滚出意大利！”的标语。那不勒斯的农民烧毁地主的城堡和粮仓，要求平分村社的土地。托斯坎纳大公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实行改革，吸收自由派参加了政府。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了起来，它标志着意大利革命形势的成熟。

巴勒摩人民起义和各邦的立宪运动

1848年初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岛首府巴勒摩人民的起义，揭开了欧洲革命的序幕，标志着意大利革命的开始。

位于地中海中的西西里岛，风景佳丽，土地肥沃，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但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反动统治把这个天堂似的岛屿变成了人间地狱。波旁王室视西西里岛为自己的“征服区”，横施专制和压迫。农民在地主苛重的压榨下颠连困苦；硫磺矿工过着牛马不如

的生活。在40年代,由于连年歉收和工业危机,劳动群众忍饥挨饿,怨声载道。同时,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集团也日益强烈地反对那不勒斯王国的统治。在这里,实行资产阶级立宪改革的要求,是同推翻波旁王朝以及使西西里脱离那不勒斯王国而取得自治的要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1847年12月1日,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报纸刊登了自由派人士致斐迪南二世的意见书,劝说国王进行改革。那不勒斯的自由派欢迎这个意见书,他们不顾政府的禁令,在各城市组织了拥护庇护九世、要求改革的示威游行;接着,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自由派协商决定:如果



图 27 佛罗伦萨的示威游行

斐迪南二世在1848年1月12日前不作让步,西西里的自由派便号召全岛居民举行起义,而那不勒斯的自由派则以要求实施宪法的示威游行支持起义。

1848年1月9日,巴勒摩街头出现了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举行起义的传单。11日夜,家家户户作好了战斗准备。自由派为了领导起义,组成了起义委员会。12日晨,一队队武装的手工业者和市民向反动军警发起了进攻。郊区农民闻讯前来支援。傍晚,人民击败了国王的军队,并把他们赶出巴勒摩。入夜,全城张灯结彩,欢庆起义胜利。

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妄图用武力镇压起义。1月15日,他出动5000名士兵袭击巴勒摩。起义者早已森严壁垒,坚守阵地。王军攻打不下,就用大炮连续轰击城市9天。起义者在20日冒着

敌人的密集炮火，潜入敌后，烧毁了敌人的粮食，切断了输水的管道，使敌军断粮缺水，处于困境。王国军队指挥官杰·索格将军在给斐迪南二世的报告中诉苦说：“我军处境日益悲惨。巴勒摩居民都已组织起来。整个西西里都卷起狂澜……我忧伤地考虑，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城市……”^①

就在这时，革命运动席卷了整个西西里岛。墨西拿、卡塔尼亚、特拉巴尼和其他城市都爆发了起义。运动很快就蔓延到了大陆上。王国首都那不勒斯街头也响起了“巴勒摩万岁”的口号声。斐迪南二世被迫于1月26日下令王国军队从巴勒摩撤退。

巴勒摩解放后，起义委员会在2月间改组为临时政府，资产阶级自由派掌握了政权。4月初，西西里临时政府宣告成立。除了那不勒斯王国军队盘踞的墨西拿要塞外，全岛都承认了临时政府。

西西里事件加速了那不勒斯王国革命的爆发。那不勒斯手工业者和工人举行了武装的示威游行，领导斗争的自由派趁势要挟国王颁布宪法。斐迪南二世被迫让步，批准成立有自由派参加的新内阁，并颁布敕令，宣布在2月10日公布宪法。

在皮蒙特、托斯坎纳，在教皇国，群众普遍卷入了运动，统治集团惊恐万状，纷纷宣布立宪。皮蒙特国王查理—阿尔伯特在2月9日允许实行宪法（3月4日公布了宪法）。托斯坎纳大公不得已也在2月17日步其后尘。德意志3月起义的消息传来，迟迟拒绝立宪的庇护九世也赶忙于3月15日颁布了宪法，委任自由派组成第一届世俗内阁。这样一来，在那不勒斯、都灵、佛罗伦萨和罗马都出现了有温和自由派参加的立宪政体的政府。

米兰起义

西西里人民起义的胜利，巴黎二月革命的成功，意大利各地关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119页。

于改革和实行宪法的消息，激发了米兰人民。米兰街头出现了“仿效巴勒摩！”的大标语，小巷里躺着被群众打死的奥地利士兵。3月17日，维也纳起义和梅特涅逃跑的消息传到米兰，人们奔走相告，欢喜若狂。群众奋起斗争，高呼：“德意志人滚出意大利！”



图 28 米兰起义

为了安抚群众，帝国政府于3月18日贴出布告，宣称要废除书报检查和尽快召开帝国议会。但是愤怒的群众撕下布告，踩在脚下，在墙上书写“太晚了！”作为回答。同时，革命群众在通往省总督府的大街上筑起了街垒，由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职员和大学生组成的起义队伍冲入总督府，降下奥地利旗帜，撕毁帝国皇帝画像，焚烧档案。至下午2点，街垒战已全面展开了。

驻扎在米兰的奥军，由奥地利的元帅拉德茨基指挥。他们控制着制高点，从教堂的塔顶向起义者射击。缺乏武器弹药的起义者便从桥上拆下石块、从博物馆里找来大刀长矛同奥地利军队作战。在激烈的战斗中，街垒越筑越多，纵横交错，使奥地利骑兵的行动受到很大的阻碍。从19日起，起义者开始围攻奥军的据点。他们前

仆后继，顽强奋战，迫使奥军节节败退。拉德茨基惊叹说：“这些人简直变成了狂热的宗教徒！”20日夜，拉德茨基下令奥军撤出市中心区，退到城墙两侧，并封锁了城门。起义者乘胜追击，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起义初期是自发的，至20日才成立了以资产阶级民主派卡米洛·卡塔涅奥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在20日以后的战斗中，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区协同作战，并组织军火生产，分配缴获武器，照顾死伤战士；委员会每3—4小时出一期战报，总结战况，布置任务；委员会发出汽球，号召省区人民响应米兰起义，赶走奥地利侵略者。在很短期间，伦巴底城乡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展开打击奥地利侵略者的斗争。帕维和帕杜伊的大学生营，布列希、科莫和别尔加莫的志愿兵营，伦巴底农民营等，星夜开往米兰城外援助起义者。他们的到来，牵制了奥军的力量，阻止了奥军的会合，配合了城内起义军的进攻。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军腹背受敌，连吃败仗，于是就玩弄和谈骗局，要求停战。军事委员会坚决反对停战和谈。街垒战士识破了敌人的缓兵之计，同声怒斥：“让奥地利人见鬼去吧！”

这时，奥军的处境更加恶化，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粮食供应困难。3月23日，军事委员会发布向城门发动总进攻的命令。起义者奋勇冲击，势如破竹，胜利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23日夜，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奥地利残兵败将狼狈弃城逃走。

米兰解放了！起义胜利了！这次起义是值得钦佩的，几乎没有任何武装的米兰人民竟在短短5日的激战中把1万多名欧洲精锐之师打得一败涂地，实在是一个奇迹；它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具有全意大利的、全欧洲的意义。恩格斯热烈赞扬米兰是一个“在1848年革命中完成了最光荣的革命的英雄城市”^①。

^① 恩格斯：“科伦日报”论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39页。

威尼斯起义

差不多与米兰同时，威尼斯也爆发了起义。3月17日早晨，愤怒的人群冲进监狱，救出囚在里面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活动家曼宁和托马泽奥。入夜，在省府门前的广场上居民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18日，群众紧张地修筑街垒。

威尼斯的奥地利反动统治当局对人民运动感到特别惊恐，因为这里的驻防军有一半是从意大利人中召募来的。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奥军指挥部于18日命令军队进入营房。威尼斯市自治局也害怕群众的武装发动，它贴出通告，宣称奥地利当局允许建立国民自卫军，指令人民“勿轻举妄动，保持安静”。在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的曼宁当时也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他号召“工人进厂做工，商人开店营业”。

18日晚，维也纳起义胜利的消息被证实以后，威尼斯总督帕尔菲张惶失措，登上省府大楼的阳台向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宣布威尼斯实行自治。威尼斯的贵族、银行家和大商人支持和赞赏帕尔菲所采取的措施，但广大劳动群众对帕尔菲的空洞言辞深表不满，他们保持警惕，准备对付奥地利统治者的阴谋诡计。

这几天，在曼宁的家里经常举行会议。曼宁每每慷慨陈词，规划未来。他认为，在革命暴风雨席卷西欧的情势下，意大利可以指望得到欧洲强国、首先是法国的援助而获得独立，独立后的威尼斯应当恢复马可^①共和国的名称；新成立的共和国必须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使其更加昌盛；在把奥地利赶出国土之前，威尼斯应建立

^① 据说，许多年以前，威尼斯还是一片海滩。马可到意大利传教，乘船经过里阿托岛海岸，当时风暴骤起，船被刮到荒凉的沼泽地带搁浅了。马可以为到了绝境，向天祈祷，似乎听到天使在召唤：愿你平安，马可！你和威尼斯共存。这样，这位《马可福音》的作者就成了威尼斯的护城神，其标志为狮子。现在的威尼斯城徽还是一头狮子拿着一本《马可福音》。

自己的武装力量,以防止骚乱。3月18日至20日,在曼宁的指导下,威尼斯国民自卫军建立,其中专门吸收2000名出身贵族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参加。之后,曼宁才开始组织新的反奥起义。

按照曼宁的计划,起义应当从占领奥地利军火库开始。但遭到自由派的反对。因为自由派既反对共和国,也反对武装起义。在起义无望的时刻,却传来了喜讯:军火库的意大利工人已经发难,打死了奥地利上校军官马里诺维奇。曼宁闻讯,带领数十人,赶到军火库。他们的到来,成为军火库总起义的信号。



图 29 曼宁

军火库的意大利工人都武装起来,加入战斗行列,听从曼宁的指挥;奥军中的意大利士兵响应起义。军火库中的奥军头目被迫交出了军火库的钥匙。

军火库起义胜利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城,人群汇集广场欢腾跳跃。城中的意大利官兵全部反正。曼宁在群众大会上宣布马可共和国正式成立。帕尔菲总督被迫在投降书中签字,奥军退出威尼斯城。

22日晚,资产阶级自由派妄图窃取胜利果实。市自治局发布公告,宣称建立临时政府委员会。威尼斯群情激愤,坚决反对。临时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不敢就职。23日早晨,曼宁在群众的护拥下来到市自治局,宣读了他拟定的马可共和国政府成员的名单。曼宁自己出任共和国总统。

不久,人民起义从威尼斯市发展到广大乡镇,威尼斯全境从奥地利占领者的铁蹄下解放了出来。

三月反奥怒潮

伦巴底—威尼斯人民起义进一步推动了各邦反奥运动的蓬勃发展。“德意志人滚出意大利！”米兰起义者的呼声传遍了整个意大利。

皮蒙特的首都都灵连日举行集会游行，群众要求武装起来，要求立即援助米兰人民，要求政府向奥地利宣战。大学生自动停课，准备开赴伦巴底。街头展开了志愿兵签名运动，自愿入伍的签名者排成长长的队伍。左派报纸的文章声称：“如果国王不发给长剑以服务于自由，……人民为了自由将徒手作战。”3月23日，《复兴报》刊载加富尔的文章说：“为了民族，为了政府，为了人民，只有一条出路：战争。立即开战，不容拖延。”^①

面对高涨的反奥运动，查理—阿尔伯特动摇不定，犹豫不决。一方面，他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准许人民组织志愿兵，表示同情米兰起义；另一方面，又极端害怕米兰人民起义胜利，成立共和国，危及自己的统治和君主制度的存在。3月21日，他派使节到米兰，提出只有伦巴底同意与皮蒙特合并，他才能出兵援助米兰，力图利用对奥战争来制止皮蒙特的革命发展并阻挠米兰成立共和国。这一天，查理—阿尔伯特在王宫召开内阁会议，商讨战争问题。革命群众闻讯层层包围了王宫，等候国王作出满意的回答。陆军大臣李奇在会上告诉国王，如果不立即向奥地利宣战，他不能保证君主制度的存在和国王生命的安全。查理—阿尔伯特被迫出现在王宫阳台上，并向革命群众宣布：对奥地利宣战。

巴黎、维也纳、米兰的胜利消息传到教皇国首都罗马后，警钟长鸣，人群踊跃。大学生游行队伍包围了奥地利使馆，人们降下黑黄旗，升上三色旗；摘掉奥地利国徽，摔成碎片；在大使馆墙上书写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234页。

“意大利议会大厦”的大标语。3月23日，革命群众在大圆马戏场举行盛大集会，欢庆胜利，要求武装。修道士阿列桑德罗·加瓦齐呼吁对奥宣布十字军远征；斯捷尔比尼提议让富人出资助战。他们的建议得到会议参加者的热烈赞同。第二天，由群众自己组成的募款小组开始向富人募捐金钱和物资。教皇庇护九世也只得发布命令：派遣军队和志愿军参加对奥作战。教皇政府大臣、自由派头目明格蒂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供认：“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其他办法安抚群众。教皇同意了我们的观点，另外的让步方式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不把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人民将强迫你这样做，那时谁也不知道会成个什么样子。”^①

托斯坎纳、那不勒斯的封建君主慑于人民爱国运动的强大威力，于3月末也相继宣布派遣政府军和志愿军到伦巴底参加对奥作战。

1848年3月末在人民反奥爱国运动高涨的基础上开始的反奥独立战争，有着极为有利的形势。当时革命的风雷正激荡欧洲大陆，统治意大利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维也纳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它的力量由于匈牙利人、捷克人的普遍起义而分散削弱，穷于应付。意大利人民的爱国热潮汹涌澎湃，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洪流。所有这一切，使意大利的反奥独立战争具备了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但是，反奥独立战争的领导权是操在以查理—阿尔伯特为首的封建君主手里，他们是被人民的革命浪潮推向反奥战场的。他们对奥宣战，不是真要履行民族义务，而是为了维护阶级利益。他们仇视人民，甚于仇视奥地利统治者。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所表现的勇气、热情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无论如何也不符合这些当权者的心愿。“他们公开或秘密地进行种种勾当，利用他们权限范围内的一切手段来麻痹人民的力量，尽快地恢复实质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235—236页。

上的旧秩序，而不是使国家从奥地利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①
这预示着意大利反奥独立战争必然遭到挫败。

第三节 反奥独立战争

查理—阿尔伯特在反奥战争中的叛卖行为

当3月23日皮蒙特向奥地利宣战时，拉德茨基统率的奥地利军队在遭到起义人民的毁灭性打击后，正从米兰狼狈溃逃。26日，皮蒙特军队越过边界进入伦巴底，追赶逃跑的奥地利军队。反奥独立战争从此开始。

战争开始后，查理—阿尔伯特率领2.3万人的皮蒙特军队进入伦巴底。在伦巴底，他取得了一些胜利。本来他可以乘胜追击，全歼残敌，但是由于他害怕伦巴底建立共和国，担心都灵爆发革命，所以行动迟缓，竭力避免作战。国王的儿子斐迪南曾道出了查理—阿尔伯特的心机。他说：“如果它表示赞成我们，我们定全力支援，如果它不赞成我们，我们就撤到波河右岸……等到奥地利援军进入伦巴底，那时伦巴底将不得不向我们求救。”^②可见，查理—阿尔伯特之所以避免同奥地利作战，是图谋坐山观虎斗，随时镇压革命运动，待机兼并伦巴底。所以，恩格斯说：“在意大利的一切君主中，意大利自由的最可恶的敌人还是查理—阿尔伯特。”^③

由于查理—阿尔伯特在反奥战争中消极作战，致使拉德茨基残部得以在4月初退入维罗那—曼图亚—莱尼亚戈—佩斯克4个

① 恩格斯：《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目前失败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34页。

②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242页。

③ 恩格斯：《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目前失败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34页。

城堡构成的四角地区，并获得了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机会。

四角地区的防御工事虽然比较坚固，但里面粮食弹药储存甚少，拉德茨基要想从奥地利得到人力物力补给，必须通过威尼斯的领土。皮蒙特统帅部曾有人建议派部队进入威尼斯以截断奥军给养补充的通道，但查理—阿尔伯特拒不采纳。奥地利政府乘机于4月中旬派努根特将军带领1.3万名军队并载运大批粮食弹药，自特里斯特经威尼斯地区与拉德茨基会合。刚成立的威尼斯共和国没有正规军队，人民组成的志愿部队缺少武器，不能阻止奥军的突袭。共和国政府曾多次派代表请求皮蒙特国王给予援助，查理—阿尔伯特含糊其辞，不作肯定答复。他的大臣李奇公开说：我们不援助，国王不保护威尼斯共和国。

4月21日，努根特的军队进抵乌迪诺。这个小镇的人民奋起抵抗奥军。努根特调动全部大炮对小镇轰击3小时。镇中的自由派分子准备与努根特谈判投降，群众坚决反对，许多人在街垒战中英勇牺牲。乌迪诺是革命和战争开始以来第一个被奥军占领的意大利城镇。它的失陷，在全意大利引起了震惊和愤怒。

奥地利在武力进攻的同时，还施展和谈的阴谋，派格尔蒂哥率代表团来意大利谈判议和，劝诱皮蒙特和伦巴底签订和约。查理—阿尔伯特又准备在谈判桌上出卖意大利的民族解放事业，他企图以承认恢复奥地利对威尼斯的统治为条件，来换取伦巴底的独立。但是，皮蒙特政府和伦巴底临时政府唯恐缔结这种丧权辱国的和约会引起新的革命，因而中断了谈判。

意大利革命爆发，特别是反奥战争开始的消息，使长期流亡在南美的加里波感到欢欣鼓舞。1848年6月21日，加里波的怀着火热的激情，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祖国。他立刻到皮蒙特军队大本营罗维尔别拉去会见查理—阿尔伯特国王（正是这个国王的法庭在1834年将加里波的判处死刑），向国王表明自己“效忠于意大利事业”的决心。可是国王非常冷淡地接待了加里波的。陆军大臣李

奇拒绝了他关于建立志愿军的建议。加里波的怒不可遏，又来到米兰向临时政府表示自己的心愿。驻米兰的皮蒙特使臣根据国王的旨意千方百计地阻挠加里波的组织志愿军。由于查理—阿尔伯特的干预，加里波的组织志愿军参战的宿愿不能立即实现。

萨伏依王朝的领土兼并

萨伏依王朝国王查理—阿尔伯特在对奥战争中消极背叛，但在兼并领土方面却颇为积极。三月革命后，“他派往意大利北部各地去的特使把他描绘成唯一能够拯救而且正在拯救祖国的人。可是要他实现这一点，他们说，当然就必须建立一个北意大利王国。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掌握不仅能抵御奥地利，而且还能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的必要力量。”^①他力图利用民族运动来达到个人目的，成为凌驾于意大利其他一切君主之上的“王中之王”。

与皮蒙特相邻的伦巴底是查理—阿尔伯特第一个兼并的对象。当米兰硝烟弥漫、街垒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他竟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派特使来试探合并伦巴底的条件和步骤，充分表现出他那贪求功名、鼠目寸光的贵族本质。

1848年4—5月，伦巴底的民主派和自由派在与皮蒙特合并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自由派控制的临时政府极力主张马上与皮蒙特合并。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指望依靠萨伏依王朝粉碎民主派的进攻，镇压革命，取得反奥战争的胜利。从4月开始，自由派就在省内展开与皮蒙特合并的宣传运动。他们不断地向临时政府呈递请愿书，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吹捧查理—阿尔伯特是“民族事业的唯一保卫者”，是“反奥的军事领袖”，宣扬合并会给伦巴底带来工业

^① 恩格斯：《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目前失败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35页。

发展,经济繁荣,要求把米兰作为合并后的北意大利国家的首都,等等。5月12日,临时政府正式通过法案,决定举行全民投票来表决伦巴底与皮蒙特的合并问题。而民主派内部在伦巴底与皮蒙特合并的问题上,意见也并不一致:有的人主张在反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伦巴底完全解放后再来解决这个问题;有的人对查理—阿尔伯特抱有幻想,倾向于立即合并;有的人坚持共和国立场,坚决反对合并。4月4日,民主派分子罗曼伊在《伦巴底报》上发表文章,揭露临时政府与阿尔伯特分子秘密勾结的事实,遭到另外一些民主派人士的反对。这时,自由派乘机挑拨离间,把反对者的代表——吉埃林里和科连蒂拉入临时政府,从而造成了民主派的公开分裂。

4月8日,马志尼来到了米兰。人民热烈欢迎这位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老战士,民主派以急切的心情等待他的指示和表态。但马志尼却采取了极端错误的立场:他号召人民为了“国家统一”而放弃共和国;他和自由派头目卡扎蒂握手言欢,斥责米兰“共和思想宣传协会”进行共和宣传,并拒绝卡塔涅奥关于推翻临时政府的建议。

民主派的妥协立场和自由派的欺骗宣传决定了“全民投票”的结果。投票赞成立即与皮蒙特合并的有581万张票,反对合并的仅有700张票。

临时政府对投票的严密控制和投票的显著差距,使一些民主派人士深感失望和愤怒。部分国民自卫军在省府门前广场上举行集会游行,要求在人民获得真正的政治自由后再议合并。三月革命后从法国返回祖国的民主派分子乌尔比诺等散发传单,号召人民推翻临时政府,宣布伦巴底为共和国,销毁投票赞成皮蒙特合并的名册,向富人征收重税作为反奥战争的军费。5月29日,乌尔比诺率领部分大学生和国民自卫军冲进临时政府办公室,将卡扎蒂掀到大厦阳台上,向人群宣布推翻临时政府,成立共和国。不久,临时

政府调来了军队，驱散了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逮捕了乌尔比诺、罗曼伊等 11 人。事后，米兰民主派的领袖们纷纷发表与乌尔比诺断绝关系的声明。卡塔涅奥讥讽这次建立共和国的企图是一幕“可笑的和荒诞的滑稽剧”，马志尼竟写文庆贺“合法政府”对“无政府状态”的胜利。

过了几天，临时政府代表团向查理—阿尔伯特呈交了伦巴底与皮蒙特的合并书，反对合并的民主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这是他们采取同自由派妥协的政策的结果，卡塔涅奥后来承认：“民主派不惜任何代价要求妥协，结果毁灭了自己。”

继伦巴底之后，巴马、摩地那也并入了皮蒙特；稍晚，威尼斯也并入了。

反革命势力的反扑

反奥战争开始后，人民的负担更加重了，因而工人罢工斗争和农民暴动此伏彼起，阶级斗争趋于尖锐化。这使资产阶级自由派更加恐慌，因而更加向贵族靠拢。他们掌握政权后不但不巩固三月革命的成果，反而与封建君主结成联盟，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伦巴底临时政府残酷地镇压了布里安查的农民起义。自由派把国民自卫军变成了保护私有权的工具。在那不勒斯，国民自卫军射击罢工的印刷工人；在罗马，他们射击要求面包和工作的失业者；在巴勒摩，国民自卫军还攻击那些使一月起义获得胜利的人民部队。资产阶级的反人民政策助长了封建反动势力的气焰。封建君主们以十倍的疯狂向革命发起了反扑。

4 月 29 日，庇护九世违反众愿，突然在红衣主教会议上宣读了臭名昭著的《宣言》，呼吁停止对奥地利作战。《宣言》说：“许多人希望我们会同意大利其他人民和君主一道进行反奥战争。我们的义务促使我们宣布，这违反我们的意图，因为我们最高的天职是以同样的仁慈对待所有的人民和民族。”

教皇的《宣言》公布后，群情激愤。4月30日，古城群众在示威游行中高呼“打倒教皇！”民主派活动家斯捷尔比尼要求建立临时政府以掌握全部政权；部分国民自卫军与人民会合，封闭了城门，占领了军火库、造币厂等据点；自由派部长纷纷辞职。庇护九世准备逃往那不勒斯。

以马米阿尼为首的自由派看到教皇政权摇摇欲坠，十分恐惧不安。他们一方面欺骗群众（如说《宣言》尚未被国王的行动所证实），另一方面劝说教皇收回《宣言》或实行其他让步。5月2日，庇护九世委托马米阿尼组织新内阁，以缓和人民的不满。民主派认为马米阿尼组阁是“民族事业的胜利”，便解除了武装，停止了斗争。

意大利封建反动势力把庇护九世的《宣言》看作是向革命进行反扑的信号。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听到《宣言》后顿时眉飞色舞。一个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在宫中酝酿着。国王的近臣组织了秘密的委员会。首都4000名由“拉察罗尼”^①组成的军队是准备举行反革命政变的主要工具。

5月15日，新选出的议会在市自治局举行预备会议，得知国王要求议员必须宣誓效忠宪法后，部分民主派议员坚持主张修改宪法（取消上院，降低下院选举资格），拒绝宣誓。那不勒斯居民也觉察到国王这种要求是想恢复旧制度，便聚集在市自治局的广场上等候议会的决议。入夜，国王调兵遣将，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发起突袭。群众仓促修筑街垒应战。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议员龟缩在议会厅内不敢出来领导街垒战。国王的军队血腥地镇压群众，约有500人惨死，几千名民主派和自由派分子被囚禁在那不勒斯的各个阴森的刑讯室里。国王解散了议会，撤销了国民自卫军，成立了新的反动内阁。

6月，教皇也把他的战败的军队从前线调回罗马。

^① “拉察罗尼”是对那不勒斯王国不务正业的流氓无产者的鄙称。

意奥战局的变化

皮蒙特军队虽然在4月底就包围了佩斯克要塞,但查理—阿尔伯特照旧没有把主要心思用在对奥战争上。教皇4月29日的《宣言》,那不勒斯发生的反革命政变,使这位“叛徒国王”更加犹豫不定。马克思指出:“在每次革命之后,主要在随着每次革命而来的反动势力的进攻之后,外交的髑髅就张牙舞爪。”^①从5月起,英国的外交官不断地来往于维也纳和都灵,劝说查理—阿尔伯特同奥地利谈判议和,怂恿萨伏依王朝合并伦巴底、摩地那和巴马等地区,而把“不安定的”威尼斯留给奥地利。

5月25日,努根特率领奥地利军队冲破威尼斯军民和罗马教皇军队的堵截,满载粮食弹药进入维罗那,与拉德茨基会合。5月28日夜,奥军主力开出维罗那,第二天,进抵离曼图亚不远的小村库尔塔顿,向住在这里的5000人的托斯坎纳军队发起突然攻势。托斯坎纳军队在仓促迎战的同时,要求皮蒙特军队给予援助。激战进行了整整12个小时,皮蒙特援军仍未来到。托斯坎纳军队损失了1/3。托斯坎纳军队虽遭失败,但他们的英勇抵抗,却为皮蒙特军队赢得了一天的时间,使其加强了应战的措施。5月30日,在离库尔塔顿9英里的戈伊托村,皮蒙特军以逸待劳,痛击了前来进攻的奥军。拉德茨基败退曼图亚。6月1日,佩斯克的奥军被迫投降。

戈伊托村和佩斯克的胜利在全意大利引起了狂欢。查理—阿尔伯特和他的将军们、斐迪南·萨伏依和皮蒙特政府都认为可以迫使奥地利政府签订“合理的”条约了。斐迪南得意忘形地说:“在进行了3个月光辉之战和米兰拥护我们之后,用缔结美好条约结束战争的时刻已经到来了。”^②

① 马克思:《英法在意大利的调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15页。

②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508页。

当皮蒙特政府陶醉在胜利之中时，拉德茨基已开始准备新的攻势了。奥军选择威尼斯的维琴察作为打击的重点。守卫这个城市的除当地的志愿军外，还有杜兰多统帅的教皇军队。这里的军事力量虽然薄弱，但粮食弹药比较充足，可以长期防守。

6月10日拂晓，奥军向维琴察发动了进攻。他们占领了城郊的制高点，用大炮猛轰城市。城内燃起大火，处境极为困难，但军民奋不顾身，坚持战斗，尽力保卫每一寸土地。教皇军被奥军优势吓倒，杜兰多的一个军官向威尼斯政府代表别卢查上校提出可耻的投降建议。维琴察军事委员会坚决反对杜兰多的叛卖计划，声明在任何时候决不在投降书上签字。晚7时，杜兰多竟在市政厅上空升起了白旗。革命军民义愤填膺，用子弹将白旗打成碎片。杜兰多决计投降，星夜派人潜入奥营，迅速与奥军达成投降协议。6月11日，杜兰多不顾居民的反对，打开城门，让奥军安然入城。而查理一阿尔伯特仍按兵不动，让拉德茨基占领维琴察后胜利返回维罗那。

6月中旬，意奥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拉德茨基的根本变化。托斯卡纳军被削弱，那不勒斯军和教皇军退出战争，只剩下皮蒙特孤军与奥军对峙。6月14日，奥军一枪未发占领了巴杜亚；次日，只经过3小时战斗便占领了特列维佐；25日又占领了帕里马努奥沃。到6月底，除威尼斯城和不大的奥佐波城堡外，所有威尼斯领土都被奥军所占领。战局的变化明显地意味着奥地利实际上已经赢得战争，但查理一阿尔伯特却还在做着签订“光荣”和约的黄粱美梦。

库斯托查战役与米兰陷落

1848年6月，由于巴黎无产阶级起义的失败，欧洲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镇压了布拉格起义后，加强了对拉德茨基的支援。于是，拉德茨基策划给皮蒙特军队决定性的打击。7月22日，他再次把奥军主力调出维罗那，进攻布置在曼图亚

周围的皮蒙特军队。在库斯托查地区的战役开始了。

战役是以奥军的猛烈进攻开始的。突然的奇袭、密集的炮火，弄得皮蒙特军指挥部措手不及。夏季的烈日、饮水的缺乏，虽然使双方官兵都难以忍受，但在兵力上占优势的奥军得以轮换作战而稍事休息，故较皮蒙特军处境为好，战斗力越来越强，皮蒙特军的几个团队在激战的两天中滴水未进。饥饿和疲劳使皮蒙特军的防御能力逐日下降。至25日，皮蒙特军指挥部下令撤退。奥军紧紧追赶。

在奥军追赶、米兰面临奥军进攻的情况下，7月27日，临时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邀马志尼、卡塔涅奥、加里波的等民主派领袖参加，请他们出谋划策，担负起保卫城市的重任。民主派提议建立国防委员会作为领导城市防务的最高机关，自由派害怕权力被夺而犹豫不决。7月28日，马志尼明确指出：如果临时政府再行拖延，人民将自己建立起国防委员会。自由派答应将临时政府部分权力暂时转交给由民主派组成的国防委员会。马志尼认为该委员会具有“党派性质”，因而拒绝参加。实际上，由马埃斯特列、范特和列斯捷里三人组成的国防委员会控制在马志尼手中。

国防委员会为加强米兰防务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宣布全民动员·委派加里波的到各地去组织志愿部队、特派工程技术人员去构筑阿达河边的工事、向富人征收特别防务捐、筹划储备粮食弹药、建立临时战地医院等。但是，像临时政府一样，委员会顽固地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拒绝满足农民任何的土地要求，而不实行这项革命性措施，就不能真正把农民发动起来进行反奥战争，马志尼所谓的“全民的反奥战争”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在奥军的追击下，皮蒙特军队的退却变成了溃逃。查理—阿尔伯特原拟在阿达河旁展开阻击战，利用构筑的工事作为保卫米兰的外线，但到河边时突然放弃了作战的计划，渡河后又决定往帕琴查撤退，以便把敌人引向西南方向，从而为米兰加强防务争得时

间,但在洛第忽又通知部队退入米兰。国王朝令夕改的混乱作法,打乱了国防委员会的防务计划。8月3日,皮蒙特军队退到城郊,4日与奥军发生战斗后仅几小时就逃入城内。英雄的米兰人民像3月一样奋起保卫城市,但查理—阿尔伯特出卖了他们,国王深夜派代表与拉德茨基谈判投降。5日晨,查理—阿尔伯特向国防委员会宣布:投降协定即将签订,城市将要交出。消息传出,群众悲愤满腔,大街小巷响彻了“打倒卖国贼!”的怒吼声。临时政府的成员逃之夭夭,国防委员会自行解散,马志尼参加了加里波的志愿军,数日后随同部队退到意瑞边境,后转赴罗马。

8月6日,皮蒙特军队撤出米兰。城中的资产阶级为了防止人民“骚乱”,派代表将奥军迎入城内。8月9日,查理—阿尔伯特同拉德茨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他答应让出伦巴底、威尼斯、摩地那和巴马等地区。北意大利又重新沦入奥地利的桎梏之下。

拉德茨基重新占领米兰,是反革命在“巴黎六月胜利之后第一个具有欧洲意义的事件。米兰大教堂圆顶上的双头鹰不仅象征着整个意大利的失败,它还意味着欧洲反革命重心的恢复,即奥地利的复活”^①。

第四节 革命的新高涨与最后失败

革命斗争的新阶段

革命道路是曲折反复的。三月革命后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查理—阿尔伯特和他那些碌碌无为、卖身求荣的将领们的背叛,皮蒙特军队在库斯托查的惨败,使意大利的民族解放事业遭受严重

^① 马克思:《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91页。

挫折,革命人民饱尝难以忍受的苦难。但是,燃烧在意大利人民心中的怒火并没有熄灭,资产阶级民主派准备发动新的战斗。1848年8月初,在查理—阿尔伯特投降的日子里,马志尼就号召人民发动革命战争来反对奥地利。他说:“国王的战争结束了,民族的或者说人民的战争开始了。”从此,意大利革命由第一阶段(1848年1月—8月)进入到第二阶段(1848年8月—1849年8月)。

在意大利革命的新阶段,由于资产阶级自由派中有的脱离了革命,有的公然转入反革命阵营,资产阶级民主派便成为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了自下而上统一意大利的纲领,把民族解放的任务和实行比较深刻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进行人民战争以求得民族独立。召开制宪议会以建立共和国,是人民进行斗争的基本内容和口号。

曾同奥地利统治者英勇作战的威尼斯人民首先行动起来。8月11日,威尼斯人民知道了签订停战协定并把威尼斯交给奥地利的消息以后,立刻掀起暴动。在人民的压力下,阿尔伯特分子放弃了政权。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曼宁在马可广场上宣布威尼斯脱离皮蒙特并恢复共和国。威尼斯的政权转到了以曼宁为首的三执政的手里。

接着,8月23日,在托斯坎纳的大城市利伏诺,人民为反对卡保尼自由派政府逮捕加瓦齐牧师而举行起义。街垒战连续进行了数日,9月初,慑于派去镇压起义的军队发生哗变,利奥波德二世才任命资产阶级民主派著名人士古埃拉齐为利伏诺市自治局长,蒙塔涅利为利伏诺省省长,后又在10月27日任命蒙塔涅利组阁,并邀请古埃拉齐参加新政府。蒙塔涅利是比萨大学的一位教授,其政治观点原倾向于自由派,但自库斯托查战役后,他接受马志尼的思想,认为由罗马教皇或皮蒙特国王领导,实行君主联盟,自上而下统一意大利的方案已经破产,只有依靠民主力量自下而上才能完成意大利的统一事业。因此,他一到利伏诺任省长,就提出了“召

开全意大利制宪议会”的口号。这个口号意味着要排除各邦封建君主，由人民选举代表来决定意大利的未来命运。这个口号深得人心，很快就传遍了托斯卡纳和整个意大利，受到各地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热烈欢迎。意大利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支持这个要求的示威游行。

召开意大利制宪议会的号召在罗马引起特别强烈的反响。这里自1848年秋天以来人民反抗教皇反动政策的斗争已具有很大的规模。11月15日，自由派政府首脑罗西被刺。在罗马平民领袖安杰洛·布鲁涅蒂的组织下，罗马的工人、手工业者、小资产者和从前线回来的志愿兵纷纷涌上街头，高呼“我们要自由！”“意大利万岁！”等口号，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成立民主政府，恢复对奥战争，召开全意大利制宪议会。11月16日，示威的人群包围了教皇的宫廷，要求立即作出答复。庇护九世竟下令向示威者开枪。愤怒的群众很快用刀矛武装起来，对教皇宫廷发动进攻。国民自卫军站到人民一边。起义笼罩了整个罗马。庇护九世无力镇压，被迫同意成立以加列蒂为首的世俗内阁，并被迫表示赞同召开全意大利制宪议会，答应参加对奥战争。

教皇国的巴士底遭到了一次严重打击。11月16日起义开辟了罗马革命的新阶段。马克思在估价托斯卡纳事件和罗马起义的意义时写道：“在民主派半年来几乎接连不断地遭到失败之后，在反革命获得一连串空前的胜利之后，终于又出现了革命政党即将胜利的征兆。意大利的起义曾经是1848年欧洲起义的序幕，意大利的失败曾经是维也纳陷落的前奏。现在，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意大利第二次站起来了。托斯卡纳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府，罗马也刚刚给自己争得了这样的政府。”^①

^① 马克思：《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89页。

罗马共和国的成立和它的社会经济措施

11月16日后,以加列蒂为首政府推行反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在施政纲领中表示要争取意大利的独立,赞同召开全意大利制宪议会;另一方面暗中和庇护九世勾结,幻想在保存宪法的条件下与教皇达成妥协。但是,庇护九世拒不履行自己的诺言,执意要离开“叛乱的首都”。11月25日夜,他带领红衣主教安托涅里,经捷拉契那逃到不勒斯王国的加埃塔要塞,从那里向所有天主教国家发出反革命呼吁。

庇护九世的逃亡更加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促使教皇国中反对教权拥护共和的情绪越发高涨。民主派起显著作用的各地俱乐部,积极地展开宣传活动,要求召开制宪议会和建立共和国。12月13日,罗曼那等14个城市的俱乐部的代表在福尔里集会,一致通过建立临时政府以领导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罗马制宪议会的决议。12月27日,安杰洛·布鲁涅蒂率领500名泥石匠向自由派政府递交了要求召开制宪议会的请愿书。过了两天,国民自卫军宣布完全支持人民的革命行动。加里波的及当时驻在教皇国的志愿军团主动地参加了城乡群众的政治斗争,坚持主张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使加列蒂及其政府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12月28日,加列蒂政府在群众的压力下通过了召开罗马制宪议会的决议,并建立了以穆查列里为首的临时政府委员会来组织制宪议会的选举。

1849年初,临时政府委员会颁布的选举法规定:元月20日为选举日;投票采取直接、普遍和秘密的方式;凡年满21岁的人均有选举权,年满25岁的人均有被选举权;代表名额为200名。

在普选的基础上进行选举,这在教皇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广大城乡出现了活跃的气氛。各地的俱乐部展开了竞选活动。在罗马的威尼斯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联欢。但是,教皇在新年通

告中威胁说：凡参加选举的人将被开除教籍。许多地方发生了反革命叛乱。为维护选举秩序，革命群众自动起来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临时政府委员会建立了特别法庭专门来审理处置叛乱的参加者。

元月-20日，在空前热烈的情况下进行了选举。

2月5日，当选的200名代表从各地汇集罗马，制宪议会隆重开幕。历时4天的会议，围绕着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民族英雄加里波的提议宣布罗马为共和国。以阿米阿尼为首的自由派虽不敢为教权辩护，但以建立共和国会失去皮蒙特和欧洲的同情为借口反对共和制。他们的谬论受到与会多数代表的驳斥。许多代表朗读了俱乐部的请愿书和人民来信。马志尼主义者萨非在回忆录中证实：“没有一个俱乐部、没有一个市自治局再愿意同教皇妥协。共同的要求是制宪议会享有立法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许多贺信和请愿书都说到共和国。”

2月9日，会议以压倒的多数（144票中的139票）通过了加里波的提议，决定推翻教皇的世俗政权，宣布成立共和国。下午2时，革命的三色旗在罗马上空升起，101响震天礼炮宣告了罗马共和国的诞生。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热情赞扬：“罗马共和国！——这是1849年革命的序幕。”^①

在宣布成立共和国的同时，制宪议会选出了以三执政（萨非、亚美林尼和萨利契提）为首的新政府。新政府主要代表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在群众的推动下实行了一系列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如废除一些中世纪封建残余；把僧团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收归国有，交付拍卖；废除长子继承制；取消磨粉税；废除宗教裁判所，建立世俗法庭；取消教权派对教育的控制等。

^① 马克思：《罗马宣布成立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69页。

新政府还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如废除关卡税，在财政上大力帮助商人，降低 80 种进口货的关税。对小资产者的要求给予了格外的照顾：取消商业税和手工业税，豁免了小店主的债务。

新政府为了减轻教皇制度遗留下来的国库支绌状况，规定向最大富户、工商业公司和宗教团体强制征收累进所得税。大资产者反对实行这项法律，指责共和派侵犯私有权。

1849 年 3 月，制宪议会又重新选出了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并赋予无限权力。在这个时期，三执政曾试图巩固共和国政权，加强同下层人民的联系。为此，政府规定了食盐和烟草的固定价格，让穷人迁入收归国有的教会房舍居住；更重要的是颁布了把收归国有的教会土地租给贫苦农民的法令。但是，这项法令实际上并没有执行，土地关系并没有任何改变。至于城市下层群众的要求，制宪议会则拒绝把其中可以解释为给予无产者以“劳动权”的条款列入宪法；三执政还拒绝了工人、短工、雇农和小职员关于增加工资的要求。

毫无疑问，上述罗马共和国的这些改革措施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但同时也说明了民主派的阶级局限性。在当时，对于新生的、处于内外反革命势力包围中的共和国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情乃是实行革命的土地政策，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否则就不能破坏教皇统治的基础，不能获得农民的拥护，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但是，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却没有勇气向资产阶级和贵族说明：“使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① 共和国不能迈出这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要想长期存在和胜利发展是不可能的。

^①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02 页。

罗马共和国的阶级斗争

罗马共和国的成立,使在教皇世代统治下的领地人民无比欢欣。在各地革命分子的领导下,人民举行集会游行,庆祝教皇政权的垮台和共和体制的诞生。革命群众为清除天主教的残暴势力继续斗争。在罗曼那的许多地方,人民烧毁寺院中的刑事档案,控诉牧师的罪行,要求重新审查关押在监狱中的 5000 名“罪犯”。在首都罗马,人民在反教皇示威中,要求在政府机关中清洗教皇的代理人 and 可疑分子,废除教会征收的一切苛捐杂税,没收教会、主教的财产,镇压进行破坏的奸细。同时,城乡劳动群众不断向制宪议会的执政官呈递请愿书,要求减免赋税,增加工资,降低物价,防御外敌;要求组织社会劳动以消灭失业,打击奸商的投机倒把活动以保障生活。

逃亡到加埃特的庇护九世竭力诋毁共和国。他在 1849 年 4 月 20 日发表的声明中说,罗马已变成了“一个野兽狂吼的森林,充斥着……叛教者、异教徒、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头子们!”^①国内的僧俗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对新生的共和国恨之入骨。他们互相串通,内外勾结,疯狂反对共和国的社会经济措施,四出进行破坏活动,蓄谋恢复他们的权势和统治。

天主教寺院的僧侣百般抵制共和国没收其土地和财产。他们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利用教会对落后农民的影响,煽动不满情绪。在阿斯科里省和弗尔马省等地方,发生了农民反对共和国的叛乱。

城市中的富商厂主以及制宪议会中的“立宪主义者”利用共和国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的弱点。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拒绝购买寺院的土地,拒绝缴纳政府的强制借款,致使共和国财政危机日甚一日,工商业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粮食物资奇缺,人民生活

^① 格·姆·屈味林:《加里波的保卫罗马共和国》,伦敦,1924年,第107页。

更加痛苦不堪。

面对这样严重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罗马三执政只有像 1793 年的法国雅各宾党人那样，采取铁的手腕，实行革命专政，充分依靠人民，坚决镇压反革命，才能拯救共和国于危难之中。但是，以马志尼为首的罗马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 18 世纪末雅各宾党人的智慧和胆略。“意大利农村居民（他们同爱尔兰的农村居民一样，都遭到了敲骨吸髓的压榨，经常被弄得精疲力尽，愚昧无知）的物质需要，对马志尼的世界主义的、新天主教的、痴心妄想的宣言里的那一套高谈阔论来说，当然是太卑下了。……马志尼似乎认为，借一千万法郎要比争取一千万人更革命一些。”^①

反奥战争的再起与皮蒙特国王的再背叛

意大利各邦共和运动的高涨，从根本上威胁着萨伏依王朝的统治。查理—阿尔伯特国王与欧洲大国不断地进行勾结策划，认为只有恢复对奥战争才能稳定自己的宝座。当时所有的法国报纸都披露了欧洲列强的大规模的反革命阴谋，披露了反革命企图彻底镇压欧洲各国人民的计划。俄国和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法国和撒丁，都参加了这个新的神圣同盟。“查理—阿尔伯特奉命同奥地利作战，让人把自己打败，从而使奥地利人有可能在皮蒙特、佛罗伦萨和罗马恢复‘安宁’，并给各地钦定军法宪法。”^②

皮蒙特同奥地利停战协定的期限在 1849 年 3 月 20 日届满。3 月 12 日，查理—阿尔伯特在都灵议会声明废止停战协定，并决定对奥地利宣战。萨伏依王朝是在反革命阴谋的怂恿下走向战争的，所以对战争的准备很差：被征入伍的新兵缺乏训练和装备，炮兵、工程兵力量很弱，最高指挥官赫山诺夫斯基缺乏作战的实际经验。

①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02 页。

② 恩格斯：《皮蒙特军队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464 页。

查理—阿尔伯特更不愿意使这场战争变成全民族的战争，他既没有向托斯坎纳、威尼斯和罗马的共和派请求援助，也不打算在伦巴底发动反奥起义。开战前夕，8万人的皮蒙特军队驻扎在提契诺河和波河之间的地带，想集中力量从各方面同时向米兰和洛第推进。拉德茨基一面故意散布谣言，说他只限于防御并要向阿达河撤退，一面则暗地把自己的全部队伍集中到圣安吉洛和帕维亚。由于都灵的亲奥地利反动势力的叛变，拉德茨基充分探悉了赫山诺夫斯基的一切计划和作战部署，探悉了他的军队的全部配置情况。

战斗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的。3月20日凌晨，奥军在提契诺河边的格拉维洛那地方袭击拉莫里诺统率的皮蒙特军队。拉莫里诺临阵叛变。他命令自己的军队不战而退，从而使奥军渡过了提契诺河，接着突破了皮蒙特军队的中央阵地，把它分割成为互不联系的两部分。进而，拉德茨基把拥有六七万人和120门火炮的军队调到提契诺河和阿哥尼亚河之间，并从侧翼向提契诺河沿岸的5个皮蒙特师大举进攻。他凭藉优势兵力，于21日在摩尔塔拉、加尔拉斯科和维吉瓦诺击溃了附近的4个师，占领了摩尔塔拉，迫使皮蒙特军队向诺瓦拉撤退，并威胁他们去都灵的唯一通道——从诺瓦拉穿过韦尔切利和基瓦索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皮蒙特军队要么就在诺瓦拉应战，要么就把自己的兵力调往伦巴底，组织人民战争，把预备队和国民自卫军留在都灵。这样，拉德茨基就不敢前进了。但是皮蒙特政府不敢武装人民，不敢组织人民战争。所以，3月22日，奥军就向皮蒙特军队阵地的要冲比科卡（诺瓦拉郊外小村）发起冲锋，双方进行激烈战斗，阵地4次易手。皮蒙特官兵作战虽然非常顽强，但指挥部和国王却表现得极为怯懦。他们没有抓紧暂时有利时机坚决进击，扩大战果。比科卡终于被奥军攻陷了。3月23日，皮蒙特军队放弃诺瓦拉城向阿尔卑斯山方向，即到比耶拉和博尔哥马涅罗去的道路逃跑。查理—阿尔伯特担心败局不可收拾，也于当日宣布逊位给儿子，自己则逃到葡萄牙。3月26

日，新国王维克多·厄曼努伊尔二世赶忙同拉德茨基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许多地方，人民群众仍在英勇地抗击敌人。布里西亚城的反奥起义者同敌人进行了10多天的街垒战。奥军于4月1日破城之后，大肆杀戮，许多无辜居民被士兵绞死，用刺刀刺死，或用火活活烧死，连妇孺也未能幸免。

3月28日，在热那亚爆发了共和派领导的起义。起义人民打败了政府的军队，宣告成立利古利亚共和国。皮蒙特政府派来了优势兵力攻击这个共和国，最后在英国军队援助下镇压了起义。

1849年8月6日，皮蒙特王国同奥地利签订了和约，答应偿付巨额赔款。

托斯卡纳和西西里革命的失败

托斯卡纳的民主派掌握政权后，既没有解决面临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也没有改善广大劳动人民的处境，更没有答应群众关于政治改革的要求，因此，人民群众对三执政大失所望。同时，民主派内部也产生了混乱与分歧。这时，马志尼尚在罗马，蒙塔涅利因不愿再领导群众运动而到了法国。在这种情况下，制宪议会于1849年3月27日通过决议，解散了三执政政府，把政权交给古埃拉齐一人。古埃拉齐掌握政权后力主利奥波德二世复位，他的目的是希望利用利奥波德二世的复位博得欧洲大国的好感，为同奥地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

正当古埃拉齐充满幻想的时候，君主派却在集结力量策划反革命政变。鲍切尔侯爵和潘奇阿奇卡侯爵分别在卢加和佛罗伦萨建立了反革命中心。他们煽动不满情绪，同利奥波德二世保持密切联系。古埃拉齐对这些反革命阴谋活动虽略有所闻，但未加防范。4月11日，佛罗伦萨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君主派操纵指挥一些不满的人围攻、抢劫驻扎在首都的利伏诺志愿兵营房，双方发生了流

血冲突。古埃拉齐准备采取镇压措施，但拂晓刚打开城门，受天主教僧侣欺骗宣传的武装农民便成群结队闯入城内，他们包围街巷，寻衅闹事。佛罗伦萨市自治局乘机夺取了政权。古埃拉齐向新政府投降，被拘禁于别里维杰尔要塞。接着，佛罗伦萨市自治局下令解散制宪议会，宣布自己为托斯坎纳临时政府。

从佛罗伦萨开始的反革命政变像瘟疫一样传遍全托斯坎纳。到处都在屠杀、迫害民主派人士及其拥护者。在4月政变时期陈兵于边界的奥军于5月20日攻入托斯坎纳。侵略者一路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各地的君主派人物，开门揖盗，充当内奸。只有始终不承认临时政府的利伏诺人民英勇地抗击了侵略者。5月25日，奥军进入托斯坎纳首都佛罗伦萨，利奥波德二世在奥军刺刀的保护下复位。

继托斯卡纳革命失败之后，西西里革命也被血腥镇压下去。

1848年5月那不勒斯王国军队占领墨西拿后，虽然暂时中止了对西西里的侵略，但斐迪南二世并未忘记恢复对整个西西里岛的统治。1849年2月28日，他在英法的怂恿和支持下，向西西里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西西里必须解除武装，其主要城市必须由王国军队占领，全岛必须服从国王的统治。在此条件下，国王同意实施1812年西西里宪法的某些原则。西西里人民的回答彻底粉碎了国王的痴心妄想：全岛怒吼起来了，爱国的热潮激荡，人们立誓与岛屿共存亡。在群众的压力下，西西里政府坚决拒绝了波旁王朝的要求。3月23日，外交大臣在议会宣布：“我们的回答，全西西里的回答，只有一个：让战争到来吧！”

在同仇敌忾的激昂情绪中，西西里人民开始了紧张的备战活动。各地居民造武器，运子弹，挖战壕，集粮秣。新的军团迅速组织起来。

3月29日，即皮蒙特军队在诺瓦拉会战失败后的第六天，斐迪南二世向尚未屈服的西西里发动了进攻。武装极为简陋的西西

里人民奋起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只有军队 8000 人，分散各地，缺少火炮，而那不勒斯王国军多达 2 万人，武器精良，且有海上舰只支援。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西西里人民顽强战斗，奋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4 月 2 日，在王国军的众炮轰击之后，塔奥尔米那陷落，4 月 7 日，卡特尼亚失守。城陷之后，奥军大劫 3 日。

卡特尼亚失陷后，王国军在叛徒的帮助下一枪不发又占领了锡拉库扎。在随后的卡尔塔查塔战斗中，人民组织了志愿部队，农民积极前来支援，但政府却下令部队撤出阵地。前线的接连失利，动摇了政府抗战的决心。巴勒摩一片惊慌。政府成员和议会议员放弃职守，逃之夭夭。市自治局准备谈判投降。人民抵制屈辱的投降条件，拒绝交出武器。他们分守各个山头，射击敌人的舰只。在 5 天的时间里，首都掌握在人民手中。5 月 11 日，巴勒摩平民无比顽强的反抗被优势的敌人击败，首都沦陷。5 月 15 日，王国军队镇压了西西里人民的最后抵抗，恢复了对全岛的统治。

反革命猖狂地进行反攻倒算：那不勒斯的议会被解散，书报检查更严格地执行，千万革命人士被逮捕监禁，那不勒斯王国又回到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与此同时，奥地利军队又恢复了巴马大公和摩地那大公的地位。封建反革命势力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胜利了。

外国的武装干涉与罗马共和国的倾覆

自 1849 年 2 月教皇庇护九世逃往加埃特后，欧洲天主教国家（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代表不断地麇集这个沿海小城，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意大利问题”，制定干涉计划。他们虽然矛盾重重，各有打算，但在镇压罗马革命、恢复教皇权位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奥地利和法国充当了武装干涉的急先锋，英国实际上也参加了这个反革命武装干涉集团。

1849 年 3 月底，路易·波拿巴政府利用欺骗手段，强使立宪

议会通过征讨意大利的提案。4月24日，由14艘军舰组成的法兰西舰队到达了契维塔韦基亚。乌基诺将军带着1万人的兵团登陆，该城的资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一枪不发，投降了敌人。

罗马的民主派对外国武装干涉毫无警惕，他们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抱有很大幻想，一直期待着能得到这个“姐妹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法军登陆的消息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古城罗马。制宪议会不停地讨论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这些法国人，是作为敌人，还是作为朋友？乌基诺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是来保护教皇领地和防范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的野心的”。会议揭露了乌基诺的骗局，并通过了“拯救共和国，以武力回击武力”的决议。3月27日，三执政发布抗法宣言。人民抗议法国武装侵略的怒涛汹涌澎湃。各地市自治局表示坚决反对恢复教皇制度。罗马全城开始了武装抵抗和准备。在统治集团中热烈地议论着由加里波的和马志尼提出的两个不同的作战方案。

加里波的作战计划的要点是：反对武装干涉者的战斗应在罗马城外进行；在通往维捷尔堡的道路上建立有利阵地，伺机袭击向罗马进攻的法军侧翼，部队保持主动，如战斗不利可退往蒂布尔河上游待援；发动教皇领地人民打击敌人。总之加里波的作战计划是积极防御的策略，是军民联防、机动灵活的策略，这是小民族战胜大民族、弱军战胜强军的有效方法。

与加里波的作战方案相反，马志尼主张：不要主动出击法军，而应在城内等候敌人，共和国的真正力量在于争取法国人民的同情，军事上的失利可以最终促进“道义上的胜利”；维护共和国的荣誉，不许因“侵略者的行动”而玷污它。可见他所主张的实际上是消极防御的策略，是被动挨打的策略。

两种作战方案争论的结果，马志尼的主张占了上风；在法军的武装侵略面前，共和国固守罗马，消极防御。

4月29日，乌基诺率军进抵罗马城下，开始了攻城战斗。加

里波的被委派守城。他部署了兵力，安置了炮位，沉着地还击敌人，并选择时机，亲率军团，冲出城门，突袭敌人，取得辉煌战果。加里波的从罗马附近将法军打退后，曾要求增派一部分援军，以便将法军的退路切断，一举加以歼灭。但马志尼拒绝了这一建议，并说：“我们不要因为使法军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而变成法国的死敌。”

在法军入侵罗马的同时，奥军侵占了罗曼那，那不勒斯的军队也急速向罗马推进，西班牙军队占领了位于罗马以南的菲乌米奇诺渔村。武装干涉者从各方面加紧了对于罗马的包围。

为了粉碎敌人的包围，加里波的取得三执政的同意，于5月两次率军快速行进，迎头痛击了那不勒斯王国的军队。在第二次出征中，加里波的军团攻入那不勒斯领土，占领了阿尔切、罗卡等城市，备受压抑的那不勒斯农民箪食壶浆，把加里波的军队当作解放者来欢迎。正当加里波的准备向桑杰尔马诺挺进时，三执政军令突下，命加里波的火速率军返回罗马。

法军围攻罗马不能奏效，便玩弄缓兵之计。5月1日，乌基诺向三执政提出停战的建议。5月15日，法国的谈判代表斐迪南·列谢普斯来罗马。三执政盛情款待了法国的“友好使者”，力图与法国达成和平协议。法国乘机大量增援。5月31日，法国骤然召回代表，中止谈判，占领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蒙捷—马里亚高地。罗马民主派的和谈美梦变成泡影，进行决战的时刻到来了。

随着罗马保卫战的吃紧，加里波的与马志尼的分歧又尖锐地表现出来。加里波的根据罗马城地势的特点（城墙较长）竭力反对消极防御。他认为，以少量兵力对付装备和数量均居优势的法国人是难以守着罗马城的，而且不可能把所有的兵力都集结在罗马城内。因此，他主张：“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把大量的武器弹药从城里运出，政府也必须撤离罗马，迁到一个易于防守的中心地区去。”

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固执地拒绝采纳加里波的正确意见，他们还指望罗马的抵抗会在法国激起同情。三执政在《告民众书》中说：“法国人的刺刀和大炮只是该民族具有很小价值的部分，因为它是暴力。我们的刺刀，我们的大炮乃是思想，是神圣的原则，我们每一个人都保卫自己的家乡、自己的荣誉、自己的祖国，保卫不朽的城市——罗马。抵抗和荣誉！如果法国人民还稍稍珍惜荣誉和自由，那他们就会帮助我们获得胜利！”三执政委派既无本领又不果断的罗西里为共和国军队的总司令，不愿让才能出众的加里波的来担任这个职务。

战斗逐日激烈起来。6月2日，乌基诺指挥的4万大军把罗马团团围住，用大炮猛轰城市，掩护部队进攻。战斗开始几小时，法军便控制了通往首都的要冲，即帕姆菲里和科尔西尼别墅。加里波的志愿兵使用长枪和马刀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和徒手战。只在6月3日这一天科尔西尼别墅高地就数次易手。但装备简陋的志愿军英雄们究竟抵挡不住拥有头等装备并在人数上多四五倍的敌人。傍晚，科尔西尼别墅最终失守了，只是到这时，马志尼才建议由加里波的担任总司令，但为时已晚，不能扭转局势了。

6月13日，乌基诺向罗马发出勒令投降的最后通牒，民主派内部发生了动摇和分歧。加里波的又多次劝说三执政把战争转移到城外。他14日写信给马志尼说：“我们唤醒外省和全意大利，无论如何必将证明，它比我们固守罗马要有利得多。”但马志尼仍犹豫不决。马志尼的无理顽固态度引起加里波的极度愤懑，他曾想辞职交权，但最终还是屈服于马志尼的权威。作为军事家的加里波的在政治斗争中是软弱退让、缺乏经验的。

6月23日，乌基诺指挥法军向罗马展开总进攻。城内伤亡惨重，物资匮乏，居民忍饥挨饿，资产阶级对战争失掉了信心。被围困的罗马已疲惫不堪，实在无力抵抗下去。7月1日制宪议会讨论继续防守还是停止防守的问题，加里波的被召出席。当执政官问他是

否能继续防守时，他回答说：我们只能再坚守几天，但必须付出使半个城市遭到完全破坏的代价。”第二天，会议决定停止防御，同时公布了罗马共和国宪法，这个宪法是在法军包围期间制订的。另外发布了给予在包围期间牺牲者的家属以抚恤金的命令，授予参加保卫城市的外国人以公民权等。马志尼和其他许多民主派人士逃亡国外。

7月3日，乌基诺的军队开进了罗马。罗马共和国毁灭在波拿巴的刺刀之下。制宪议会解散，共和制被废除，教皇的专制政权又恢复了。

加里波的仍不屈服，他率领4000人的队伍离开罗马去支援威尼斯共和国。

威尼斯的陷落

罗马共和国倾覆后，争取意大利自由和独立的堡垒，只剩下威尼斯了。

自1848年8月以来，奥地利侵略军就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威尼斯，并对它实行海上封锁。城市与外面的联系被割断，工商业活动中止了，军需和城市供应发生了极大的困难，财政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但是，反对奥地利民族敌人的斗争把城内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他们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克服巨大的困难，为保卫可爱的城市贡献出一切。

以曼宁为首的三执政在保卫城市中也执行了消极防御的策略，认为等待的政策是“拯救威尼斯和意大利”的唯一方法。这种策略不断遭到人民的反对。群众坚持要求实行积极进攻的策略，以粉碎敌人缩小包围圈逐步逼近城市的种种阴谋和活动。10月下旬，威尼斯军民曾两次主动出击，占领卡瓦里诺和麦斯特拉地区奥军的前哨阵地，使敌人遭到很大伤亡。

曼宁对英、法调停者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多次写信给两国政

府，同它们的外交使节举行谈判；央求英法居间调停，迫使奥地利撤去包围；请求英法慷慨解囊，给予物力财力援助，甚至臆想法国会为了威尼斯而进行武装干涉。但是，对所有这一切，威尼斯得到的回答实质上只是一个：向奥地利侵略者投降，签订屈辱的和平协定。

1849年3月26日，在奥地利对皮蒙特的战争结束后，奥军元帅加伊纳乌向威尼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投降。威尼斯军民不屈不挠，誓死抗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7万名国民自卫军抗击奥3万余陆海军。5月，经过反复争夺，奥军占领了马里格尔要塞，更加接近市区。6月，奥军在发动多次攻击都被击退后，便对威尼斯不停地炮击。熊熊的大火在城内昼夜燃烧，威尼斯2/3地区变成了瓦砾。此外，粮食枯竭，饥荒日甚，伤寒、霍乱流行、千万战士牺牲在炮火中，无数居民倒毙在街垒里。威尼斯人民为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8月22日，被围攻达11月之久的威尼斯投降。这个共和国的最后失败标志着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的结束。

加里波的援助威尼斯的目的没有达到。他经历了千辛万苦，行军一个多月越过了亚平宁山隘；他试图渡海前往威尼斯，但被奥地利军舰追上，多数英勇战士被枪杀，葬身大海。加里波的在人民的掩护下，费尽周折到达皮蒙特，后又被逐，流亡海外。但他相信意大利革命一定会胜利，他在等候着祖国新的召唤。

第五章 1848年罗马尼亚革命

第一节 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 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

罗马尼亚是东南欧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家。公元106年，罗马帝国征服了达契亚。此后，达契亚人与罗马人逐渐同化，形成了罗马尼亚民族。从13世纪到14世纪，先后形成了封建国家：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①。特兰西瓦尼亚在这以前作为一个省从属于匈牙利王国。从15世纪起，奥斯曼帝国的侵略魔爪伸进了罗马尼亚诸公国，迫使它们向奥斯曼帝国纳贡称臣。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逐步崛起的沙皇俄国和奥地利为争夺罗马尼亚诸公国和瓜分巴尔干半岛而进行了长期的战争。1699年，根据卡尔洛维茨和约^②，不断向巴尔干和多瑙河下游扩张的奥地利帝国，夺得了对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权。而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通过1829年的阿德里安堡和约^③，获得了对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保护”权，将两公国置于它的军事占领之下。所以，罗马尼亚人一直遭受着残酷的民族压

① 瓦拉几亚：在罗马尼亚的历史著作中多用罗马尼亚国。这里仍沿用了习惯用法。

② 卡尔洛维茨和约是土耳其对奥地利、俄国、波兰、威尼斯的战争失败以后，于1699年在南斯拉夫境内的卡尔洛维茨签订的。卡尔洛维茨，现名卡尔洛瓦茨。

③ 阿德里安堡和约是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在阿德里安堡签订的。阿德里安堡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现名埃迪尔内。

迫与阶级压迫，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英勇不屈的罗马尼亚人从来没有屈服过，他们为反抗外来侵略者与本国统治者，一直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从15世纪起，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被迫臣属于奥斯曼帝国。向苏丹纳贡，继而又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英勇不屈的罗马尼亚人为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与压迫，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为了争取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完全独立，老米尔卡同土耳其人进行了30年战争；什特凡大公领导抗击土耳其奴役者的斗争达半世纪之久。

为加强对两公国的统治，奥斯曼帝国便于1711年让希腊的富豪登上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的大公宝座。这就是历史上称之为法纳里奥特统治时期(1711—1821年)^①。在这个时期中，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人民所遭受的民族压迫更为深重。由于法纳里奥特公子是靠贿赂登上大公宝座的，所以，他们首先便把谋得的职位作为发财致富的源泉。为发财致富，他们便滥用职权、侵吞公款、对广大劳动人民敲骨吸髓、肆意掠夺。同时，他们还强迫广大劳动人民向君士坦丁堡缴纳沉重的贡税、提供粮食和建筑材料。

但是，真正控制着两公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仍然是奥斯曼帝国。在政治上，为了巩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根据奥斯曼帝国的需要，对两公国的行政管理机构进行了改革。在经济上，奥斯曼帝国完全垄断了两公国的对外贸易，严重地破坏了它们同欧洲各国贸易关系的发展，致使两公国的城市很不发达，国内市场十分狭

^① 法纳里奥特：它是指居住在君士坦丁堡法纳尔区的希腊贵族。从1711年起，奥斯曼帝国便从他们中间挑选两公国的总督，代替两公国本地的大公。史称这一时期为法纳里奥特时期。它延续了110年之久。

窄,工业只限于手工业作坊和少数手工工场,而资本的来源主要来自商业高利贷活动。同时,不允许两公国铸造自己的货币。在军事上,只允许两公国有宫廷军队、狱卒和外国雇佣军,而不允许有自己的军队。奥斯曼帝国的倒行逆施,严重阻碍了两公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使其长期处于封建落后状态。

18世纪末,在两次俄土战争(1768—1774年和1787—1791年)中,由于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胜利,在客观上削弱了它对两公国的统治,促进了两公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加强了两公国争取独立的斗争。1821年,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罗马尼亚人民不满和反抗情绪的总爆发,它表达了罗马尼亚人民决心摧毁封建制度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坚强革命意志。弗拉迪米雷斯库所领导的革命不仅反对土耳其人的统治,而且也反对国内的封建势力。因此,所有关心推翻封建制度,要求摆脱土耳其—法纳里奥特桎梏、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各阶层都参加了这一革命。但是,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被奥斯曼帝国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沙皇俄国的入侵

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结束后,于1829年9月2日签订了《阿德里安堡和约》。该和约削弱了土耳其对两公国和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巩固了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确立了俄国在多瑙河两公国的统治地位。从此,沙皇俄国获得了对两公国的“保护”权,将两公国置于它的军事占领之下,把一个俄国总督长期地强加在罗马尼亚人民头上。沙皇俄国的入侵在客观上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对两公国的统治。马克思指出:“1828年,俄国曾得到机会向土耳其发动了战争,结果缔结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把整个黑海东岸地区北起阿纳帕南至波提(切尔克西亚除外)都夺到了自

已手里，并且占领了多瑙河河口诸岛屿，而莫尔达维亚^①和瓦拉几亚实际上也脱离了土耳其，被交给俄国统辖。”^②

随着军事占领和“保护”权的确立，沙皇俄国便开始在两公国建立反动的农奴秩序，把一部相当于宪法的“组织规程”强加给两公国人民。这部“组织规程”把农民的徭役增加到不堪负担的地步，并且巧立名目，规定了一系列苛捐杂税：人头税、专利税、驾车入城税、过桥税，还有村道捐、户口捐、乡村学校与小学教育捐、定量玉米储存仓库捐等等。按照“组织规程”规定，两公国的农民除交纳详细规定的大量实物贡赋之外，还必须为地主完成诸如田间工作日、搬运木材工作日等名目繁多的劳役。这些工作日并不是通常意义的工作日，而是生产某种平均日产品所必需的工作日。马克思指出：“‘组织规程’本身以道地的俄罗斯式讽刺的露骨语言解释说，12个工作日应该理解为36日体力劳动的产品，……某些农活的法定的一日劳动定额，甚至可以解释成所谓这一日是从5月开始一直到10月为止。对于莫尔达维亚，规定更加苛刻。有一个为胜利所陶醉的领主喊道：‘《组织规程》规定的12日徭役，等于一年365日！’”^③。可见，“组织规程”不仅剥夺了两公国人民的固有权利，使国家组织完全成为贵族地主的国家，而且促使贵族地主的权力无限膨胀，实际上把人变成土地的奴隶，并使财富掌握在贵族地主手中。所以，马克思称“组织规程”是贵族农奴主的法典，是徭役劳动法典。“组织规程”的实施将两公国的封建农奴制关系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虽然“组织规程”在公国的管理方面改变了某些中世纪的残余，但是，它大大地巩固了贵族的地位和对农奴的剥削。总之，“组织规程”的实施和沙皇俄国残酷的民族压迫，给两公

① 莫尔达维亚，现译摩尔多瓦。

② 马克思：《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俄国的纵容。——预算。——报纸附刊税。——议会的舞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60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6—267页。

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

19世纪中叶,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资本主义也逐渐发展起来。两公国的耕地面积都有所扩大,过去“赤地千里”的状况有所改变,不少荒地种上了庄稼。轻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工业企业有所增加。如加拉茨,1836年仅有两个工厂,到1841年就增加到5个。随着工业企业的发展,加拉茨的居民由9908户增加到18096户。1840年瓦拉几亚的家庭手工业者为26617人,约占居民的6%^①。同时,在两公国已有了采煤和开采石油的工业、纺织工业等,出现了造脂工厂、制蜡工厂、制革工厂、呢绒纺织、酿酒、造纸、火柴、砖瓦和陶瓷等工厂。另外还建立起了用水作动力的小型企业。随着工农业的发展,两公国的对外贸易额也有了很大的增长。1831年瓦拉几亚的出口额为10382931法郎,超过入口额4017597法郎。在摩尔多瓦,出口额也大大地超过了入口额。随着工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的增长,瓦拉几亚的布拉伊拉和摩尔多瓦的加拉茨成了两公国的商业中心,欧洲许多国家的数百艘船只都开到这里来。1836年布拉伊拉被定为交货港口^②。1831—1837年驶进该港的船只:

1831年为111艘。

1833年剧增至383艘。

1837年达到449艘^③。

摩尔多瓦加拉茨港接受船只的速度增长得更快。

1831年为182艘。

① 伊昂·康·菲利蒂:《组织规程下的罗马尼亚王朝》,布加勒斯特,1915年,第578页

② 交货港口,即商人在运输货物经过时有权免交关税的港口。

③ 尼·约尔加:《罗马尼亚商业史。近代》,布加勒斯特,1952年,第146—150页。

1833 年增加到 236 艘。

1840 年剧增至 929 艘。

1847 年为 959 艘^①。

随着工商业、城市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也就大大增加,其价格也不断上涨,这就更加刺激贵族地主扩大其耕地,加强对农民的剥削。随着商业金融的发展,贵族地主便希望增加货币收入,为此,他们常常将劳役地租变为货币地租,在瓦拉几亚更是如此。瓦拉几亚的贵族常常让农民用货币来抵偿未作完的劳役日(按照固定的价格)和以廉价雇用农民。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便逐渐渗透到了农村。被封建贵族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民,为了摆脱日益加剧的剥削,被迫流入城市,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成为一无所有的工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贵族与资产阶级

处于土耳其统治与沙皇俄国“保护”下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阶级关系极为错综复杂。

沙皇俄国的“组织规程”把全部政权都保留在大贵族^②手中,它完全不适于以自由的雇佣劳动耕种土地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两公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是一小撮大贵族地主(在瓦拉几亚总共只有 70 家,在摩尔多瓦不到 300 家)。他们田连阡陌,占据着两公国的绝大部分耕地。1840 年摩尔多瓦耕地的总面积为 1279186 法尔恰^③,而 1092 人的大贵族地主却占了耕地 745309 法

① 尼·约尔加:《罗马尼亚商业史,近代》,第 149—150 页。

② “组织规程”将两公国的贵族分为三类:大贵族、第二等级贵族、第三等级贵族。大贵族为数甚少,但他们在议会中占大多数。

③ 1 法尔恰等于 14322 平方米。

尔恰^①。在瓦拉几亚,1623 人的大贵族地主也占了绝大部分耕地。这些贵族地主分别是沙皇俄国和土耳其在两公国进行统治的社会支柱。沙皇俄国和土耳其为了巩固他们在两公国的统治地位,便勾结和依靠他们,并给他们以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特权,特别是沙皇俄国所制定的“组织规程”更加巩固了贵族地主的特权。他们凭藉着自己的特权,贪污盗窃、卖官鬻爵、侵吞公款,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1827 年,摩尔多瓦的总支出为 6841789 皮亚斯特^②,其中 1881247 皮亚斯特落入大公的腰包。在瓦拉几亚,出卖一个上尉或上校的官职可以赚 1.5 万到 2 万列伊。他们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特权,竭力反对一切革命和任何社会改革,亲俄的大贵族所竭力维护的是封建农奴制度和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的“组织规程”,以及沙皇俄国在两公国的“保护”权;亲土的大贵族地主同样竭力维护封建农奴制度,但是他们反对沙皇俄国的“保护”权,而千方百计地维护土耳其的宗主权。这些大贵族地主彼此倾轧、互相排挤,唯恐失去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论是亲俄贵族和亲土贵族,他们都是旧制度的维护者。

贵族阶级中的中小贵族,即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贵族,在两公国贵族中占绝大多数,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与大贵族相提并论。就经济地位来说,他们仍然是封建主,其剥削方式与大贵族一样,但是,他们占有的土地有限,收入也较微薄。特别是小贵族的经济收入,较无保证,每逢凶年,难免欠债累累,不得不出卖土地,方能度过荒年。在政治上,他们没有显赫的大贵族所享有的特权,不仅得不到高官厚禄,且深受官僚独断专横之苦。在这些中小贵族中,不少人参与工商业活动,并拥有自己的工业企业,成为资产阶级化的

① 伊昂·康·菲利蒂:《组织规程下的罗马尼亚王朝》,布加勒斯特,1915 年,第 584 页。

② 皮亚斯特系 19 世纪中叶在两公国流通的土耳其银币。

贵族。贵族的这一阶层与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很容易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对自己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十分不满。在同外国资本家的竞争中，他们深感缺乏统一货币（当时在两公国有70种外国硬币流通）和信贷之苦。因此，他们不仅反对大公的统治，而且反对沙皇俄国和土耳其的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尽管在革命中他们的态度和意见与资产阶级有着各种分歧，但是，在争取自身利益方面，却与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在瓦拉几亚的这个阶层中，由于对待革命的态度和政治主张的不同，出现了两个派别：一个是以伊·埃利亚德为代表的温和派。这一派主张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实行某些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不主张用革命方法推翻现存制度，他们力求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反对人民群众用革命方法推翻现存制度。另一派是以尼古拉·伯尔切斯库为代表的激进派，这一派主张废除沙皇俄国的“保护”权和土耳其的宗主权，激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斗争。

两公国的资产阶级大部分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均不享有任何特权。但是，在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的资产阶级中也分离出一个大规模从事投机事业的特权集团，即大资产阶级集团。这个集团与大公关系密切并享有特权，因此，它能够依恃特权同民族资产阶级竞争，并将他们排挤到不重要的地位上去。这些大资产阶级多出身于大贵族，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同大贵族地主结合在一起。同时，由于两公国的土地也提供一定的收入，大资本家便乐意向土地投资。大资产阶级集团和大贵族地主在政治上的“合作”和在经济上的“结合”，就大大缓和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同时，两公国的资产阶级是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转向反动的历史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从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那里吸取经验，即应在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仍依靠君主政体和封建时代的残余。因此，在两公国

资产阶级的编年史上没有显示出什么英雄的革命功绩,相反,它的每一页上都记载着争取妥协的尝试。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既受害于沙皇俄国与土耳其所支持的商业垄断,又受害于本国大资产阶级的排挤与兼并;在政治上,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十分不满,坚决反对本国大公、沙皇俄国和土耳其的统治,希望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取得民族独立,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但由于其本身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听命于要求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资产阶级化贵族,即自由派贵族。

农民与无产阶级的状况

两公国的农民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如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是受着双重压迫与剥削的阶级,他们既受沙皇俄国和土耳其的民族压迫与奴役,又受本国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他们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濒于破产。两公国的农民几乎都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居住在贵族或僧侣的土地上,为贵族地主服役。这就是所谓的“隶农”(也称“依附农民”)①。这些农民承担着繁重的赋税和封建义务,特别是“组织规程”的颁布和实施,更给广大的农民戴上了沉重的枷锁。“组织规程”扩大了贵族的耕地面积,而将农民使用的土地削减了1/2到3/5②。而农民如有所谓的“多余土地”(即多于“组织规程”规定的土地),地主可按照土地价收回,或者与农民签订增加封建租税和封建义务的特别合同,或者从这些“多余土地”上收回1/10的收成。两公国的农民除了承担繁重的赋税和劳役外,还

① 隶农主要是以徭役地租形式为贵族地主服役的农民。他们从贵族庄园取得份地,可以传给后代,从法律上讲有人身自由。

② 1805年,摩尔多瓦农民的份地是7.9公顷到19.3公顷不等(取决于农民拥有牲畜的数量多少);根据“组织规程”规定,农民份地是3.4公顷到7.68公顷,较以前约减少1/2到3/5。见维诺格拉多夫等《罗马尼亚近现代史》,苏联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13页。

必须向贵族缴纳酒、干草和其他农产品的代役租。所以，马克思说：“在多瑙河各公国，徭役劳动是同实物地租和其他农奴制义务结合在一起的，但徭役劳动是交纳给统治阶级的最主要的贡赋。”^① 被封建贵族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民，由于国税与租税所累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常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弗列杰利克·达姆在描绘当时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农民的状况时写道：“农民，这是真正负重的牲畜，是被地主剥削的奴隶，是累以重税、病于冷热病、死于霍乱和鼠疫、营养不良、居住条件恶劣的奴隶，他们常年生活在恐怖之中，为了避免收税人的勒索和奴役者的掠夺，他们随时准备携带牲畜逃跑。”^② 总之，农民被剥夺得一贫如洗，饥寒流离，如牛负重，常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堪忍受压迫与剥削的农民，不断揭竿而起，多次举行大规模的起义，反对沙皇俄国和土耳其的民族压迫与本国统治阶级的奴役。多次农民起义不仅震撼了本国的封建农奴制度，而且沉重打击了沙皇俄国和土耳其的反动统治。所以，农民是推翻沙皇俄国和土耳其统治的热烈赞成者，是反封建农奴制的积极参加者，是革命的主力军。

由于两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晚，且较缓慢，所以，至 19 世纪中叶，两公国的无产阶级只是刚刚诞生。在贵族手工工场劳动的主要是处于农奴依附状态的农民，即隶农。在各大城市的手工业作坊和手工工场劳动的主要是从那些逃跑而被捉回的农民中挑选出来的，他们靠计时或计件的极微薄的工资收入生活。事实上，他们是没有和农村失去联系的“农民”。1821 年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日趋发展，工人队伍有所壮大，工人阶级的斗争日益加剧，但是，两公国的无产阶级尚未完全形成，在革命斗争中尚不能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尽管如此，它却是一支有前途的、不可忽视的革命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65 页。

② 弗·达梅：《罗马尼亚现代史》，布加勒斯特，1961 年，第 10 页。

力量。

1848 年前的革命运动

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反对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的斗争日益高涨。1821 年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革命，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是，它是争取自由和社会正义、摆脱外国的统治和奴役、确立罗马尼亚人民民族权利的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一系列的革命和改革方案相继出现。1838 年 11 月 1 日，瓦拉几亚议会中，以扬·肯皮内亚努为首的民族派起草了题为“统一和独立文件”的反对派宣言，公开提出“废除俄国的保护权和土耳其的宗主权”，宣布亚·吉卡的任命和“组织规程”为非法，主张所有的罗马尼亚人联合起来。1840 年，在米蒂克·菲利佩的领导下建立了秘密协会，协会的宗旨是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新制度，主张有偿地解放农民和分给他们土地，建立民主共和国和革命军，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举行武装起义。但因协会中混入了叛徒，协会会员遭到逮捕。1843 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爱国知识分子通过讲授民族历史，宣传革命思想。这吓坏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于是，驻雅西的俄国领事便慌忙出来阻止，在沙皇俄国的蛮横干涉下，宣传工作被禁止了，但是革命思想却深入人心。同年，民族派又以秘密协会的形式再度出现，即由扬·吉卡和尼·伯尔切斯库等领导的“兄弟会”。参加这个秘密协会的有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还有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这个协会在瓦拉几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而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更是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其规模之大，一下子可以波及十几个村庄。例如，1835 年，普洛什特周围的 16 个村庄的农民，为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和贵族地主的压迫，同时举行起义。

在摩尔多瓦，革命者组织了爱国协会，协会总部设在瓦斯卢伊，分会遍及摩尔多瓦各城市。协会主张争取法律上的平等，为解

放茨冈奴隶、为确定庄园赋税等目标而斗争，并且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但是由于泄漏了秘密，协会的部分会员被捕，其余的逃亡国外。

1847年，欧洲的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也严重地影响到两公国的经济。沙皇俄国、土耳其以及英法等国，为了转嫁经济危机，便加紧了对两公国的掠夺与剥削，他们把本国剩余的工业品大量地向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倾销，结果使两公国的工业相继崩溃。两公国的贵族地主为了维护和扩大其经济收入，更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与压榨，并乘机倒卖粮食，牟取暴利。他们虽然地跨州县，但仍然乘机霸占农民良田，致使农民贫无立锥之地。经济危机、外国的掠夺、贵族的压榨以及农业歉收，致使两公国出现了一幅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的悲惨景象。正是在这幅悲惨的景象下，孕育着一场旨在废除沙皇俄国的“保护”权和土耳其的宗主权，推翻本国封建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罗马尼亚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二节 摩尔多瓦革命

革命的开始 自由派的纲领

摩尔多瓦的封建统治和斯图尔扎大公的暴政，特别是沙皇俄国的倒行逆施，在人民中间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骚动。1848年革命前夕，摩尔多瓦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

1847年春，摩尔多瓦遭到严重的旱灾，许多县份（如图托瓦、捷库奈、高威卢伊、弗尔契乌、普特纳等）农业歉收。而那些幸免于旱灾的地区，在收获前又遭到水灾，即将收割的庄稼都被泡烂在地里了。在边境地区遭到了严重的蝗虫灾害。据统计，约有100089法尔恰耕地不同程度地受到虫害。同时，从瓦拉几亚传来的牲畜流行

病,致使许多牲畜病死。在这种严重灾荒的袭击下,农民更是走投无路,无以谋生。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四出逃荒,有的甚至逃往国外。深受封建剥削与“组织规程”之害的农民,随着苦难与贫困的急剧加深,革命情绪日益高涨。从1847年秋天起,他们经常拒绝服劳役,地方性的起义也不断发生。弗尔契乌的一个贵族抱怨说:“现在叛乱和不服从情绪以及无政府状态在居民中已占统治地位……”^①这时,备受苛捐杂税压榨的城市手工业者和贫民也积极展开了革命活动。

不仅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及贫民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而且在资产阶级、自由派贵族和某些大贵族当中,不满和反抗情绪也十分强烈。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不仅公开不满大贵族享有中世纪的某些特权,而且对全国行政混乱、贪污受贿和盗窃资财之风猖獗、缺乏有组织的信贷以及道路状况恶劣等,都十分不满。因此,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要求实行某些改革,但是,斯图尔扎大公拒绝实行任何改革。他说:“宁愿逃出摩尔多瓦,也比接受反对集团的要求要好得多。”^②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一部分大贵族也对斯图尔扎的独断专行不满。这样一来,摩尔多瓦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同上层的反对派运动便结合起来了。

雅西三月革命爆发前,摩尔多瓦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贵族曾组织集会。摩尔多瓦侨居在巴黎的革命者科斯塔凯·内格里、瓦西里·默林内斯库、扬库·阿列克山德鲁、特奥多尔·勒什卡努等人参加的巴黎罗马尼亚革命者小组,决定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但是,他们对如何进行革命有不同的看法。尼·伯尔切斯库建议大家先回到瓦拉几亚,等

^① 维诺格拉多夫等:《罗马尼亚近现代史》,第17页。

^② 尼·维·别列兹尼亚科夫:《1848—1849年多瑙河两公国的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基什尼奥夫,1955年,第35页。

革命爆发后再回到摩尔多瓦；而摩尔多瓦的革命者则主张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的运动齐头并进。所以雅西的革命者没等侨居国外的革命者回国，便发动了革命运动。

1848年3月，在雅西出现了号召摩尔多瓦人民要求撤换大公的匿名宣言。这份宣言揭露了贪官污吏和大公及其奸党的独断专横，但是，没有号召人民进行革命，只是呼吁撤换大公。宣言写道：“摩尔多瓦人！觉醒吧！你们在不适于你们的、毫无知觉的昏睡状态中要停留到何时？你们要把暴政的锁链戴到什么时候？……大公野兽般的残暴给你们带来了无穷的痛苦。……还有比大公与所有法庭勾结，将法庭的一切职责都变成商品更低贱的事吗？那些劳动人民被法院和录事剥夺得贫无立锥之地，呼天不应，入地无门。摩尔多瓦人！那些真正向你们呼吁的人才是爱国者，他们是大多数。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联合起来，选择自己的道路吧。”^①这个宣言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

不仅摩尔多瓦各阶层人民看到革命的必然到来，而且各国驻雅西的领事也观察到这一点。斯图尔扎在接见法国驻雅西领事格卢时，格卢曾向他表明了自己的忧虑，并劝说大公，为了防止革命发生，应实行一些改革。但是，顽固的斯图尔扎不愿听取任何劝告，他对格卢说：“如果贵族要求改革，我就以武力将他们赶出宫廷。而我本人宁愿放弃王位，像路易·菲利浦从巴黎逃跑那样，从摩尔多瓦逃跑，也不同意实行任何改革。”^②

这时，各县农民暴动的消息也不断地传到斯图尔扎那里。斯图尔扎对农民运动要比对贵族反对派的运动更为害怕。他决定以武力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他还命令将所有的贵重物品装箱打包，准备

^① 《致摩尔多瓦人》的宣言，载《罗马尼亚诸公国的1848年。文件和文献集》第1卷，布加勒斯特，1933年，第142—145页。

^② 同上书，第167页。

好 40 匹驿马,以便在他逃往国外时,随时驮运。

1848 年 3 月 27 日,在征得内务部长斯切潘·卡达尔日的同意后,1000 多名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彼得堡大饭店”集会。参加会议的有不满斯图尔扎大公统治的大贵族、中小贵族的代表,有教师、律师、僧侣和商人的代表,有城郊市民及部分旅居摩尔多瓦首都的波兰侨民。领导运动的斯克尔·罗塞蒂、亚·伊·库扎、弗·吉卡都在会上发了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致大公的请愿书。这份以宣言形式出现的请愿书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纲领。纲领共包括 35 条,其中主要要求:严格执行“组织规程”、清除贪污和弊政、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释放政治犯、实行责任内阁、改革教育、取消国内关税、重新选举大公谘议会并使之公开化、改组城市警察、取消书报检查、取消雇佣军和成立国民自卫军等。请愿书只谈到必须迅速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调整他们同大地主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即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推翻大公统治,废除“组织规程”以及废除徭役和把土地分给农民等要求却只字未提。由于请愿书抛开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它既不能将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不能把城市贫民吸引到自己一边。正如一个请愿者所指出的那样,“衣衫褴褛的人是不会为了维护‘组织规程’而进行革命的。”^①

这时,被革命吓得惊慌失措的斯图尔扎大公却完全忘记了不久前他所说的“谁要求改革就把谁赶出宫廷”的威胁,立即答应接受请愿书中的 35 条要求,但拒绝解散自己的雇佣军和改选现存的大公谘议会。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 斯图尔扎的反扑

由于参加革命运动的各种政治势力的要求不同,所以他们对

^① 维诺斯拉多夫等:《罗马尼亚近现代史》,第 18 页。

大公的答复所持的态度也各异。参加革命的农民和城市劳动人民坚决要求推翻大公及其奸党的统治、废除农奴制和分给农民土地、废除贵族特权、减少赋税和徭役、摆脱沙皇俄国和土耳其的统治和废除“组织规程”等，同时他们还主张拿起武器，以暴力摧毁封建农奴制度和摆脱外国统治者的奴役。而不满现存制度的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则力图利用人民群众高涨的革命情绪，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他们之间却明显地出现了两个政治主张不同的派别：一个是带有自由民主倾向的派别，其中有瓦西里·阿列克山德鲁、科斯塔凯·内格里、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扎哈里亚·莫尔多万努等，他们主张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和斯图尔扎大公的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另一个是温和改良派，其中有主教梅列蒂和大贵族反对派。他们只要求通过改良途径逐步改变社会，并不要求推翻封建农奴制度。所以，温和改良派对斯图尔扎大公的答复表示十分满意，并且纷纷脱离了刚刚开始的运动。而农民、城市劳动人民和一部分主张推翻斯图尔扎统治的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对于斯图尔扎大公的答复则表示不满。这样一来，革命阵营内部就发生了分裂。具有自由民主倾向的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开始在雅西居民中散发请愿书，力图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参加斗争。同时他们又在马夫罗高达的家里召开秘密会议，讨论继续战斗的问题。部分出席会议的人表示，坚决要求大公全部接受请愿书的 35 条。个别激进的贵族如弗·吉卡甚至提出：“很明显，大公在愚弄我们，就像在 14 年内一直愚弄我们那样。我们必须武装起来，我们的武装会由小到大。明晨 8 时，我们要在大主教的率领下，向暴政冲锋，为了推翻专制制度、拯救祖国，我们愿流尽鲜血。”^①会议充分表现了这一部份贵族和资产阶级对斯图尔扎大公及封建农奴制度和“组织规程”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不过，要推动老

^① 《罗马尼亚诸公国的 1848 年。文件和文献集》第 1 卷，第 225 页。

态龙钟的大主教梅列蒂率领反对派以武力向暴政冲锋的想法是十分荒唐的。

这时在雅西，劳动人民如潮水般涌向大街，他们迅速地聚集起来，并发生了骚动。自由派贵族扎哈里亚·莫尔多万努号召市民宣布成立共和国。有人还试图以改善农民痛苦的处境来吸引他们参加运动，但是，由于他们同人民相距甚远，没有一个摧毁封建农奴制的明确纲领，又加之他们惧怕人民真的动员起来，而不敢认真地去发动群众，所以他们始终不能把城市贫民和农民吸引到自己一边，跟着自己走。

在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那些被吓破了胆的大公亲信纷纷要求辞职。斯图尔扎本人也从宫廷逃到兵营，他的贵重物品则在沙皇士兵的护送下，转运到了比萨拉比亚。但是斯图尔扎大公并没有放下屠刀。

参加运动的各政治派别、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深刻矛盾，很快就被斯图尔扎大公觉察了。当部分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在马夫罗高达家里秘密开会，街上人群骚动时，斯图尔扎大公已经作出了镇压的决定，他计划首先全力粉碎贵族反对派和资产阶级，尔后全力以赴地镇压起义的农民和骚动的市民。3月28日夜，斯图尔扎将1000多名雇佣军灌得酩酊大醉，让他们乘着酒兴，去镇压革命运动。革命运动的领导人试图号召人民起来战斗，并修筑街垒，但为时已经太晚了。

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斯图尔扎大公的雇佣军便在大公的儿子季米特里和戈尔盖以及警察军官罗伯特·英格的率领下，用大炮驱散了聚集在街上的人群，尔后开始了大逮捕。参加会议的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一得知武装部队接近的消息，便准备战斗，以便赢得时间，争取逃跑，但是，终因寡不敌众，马夫罗高达的住宅被雇佣军包围了。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在马夫罗高达家里被捕，而其他未参加会议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在自己家里被捕了。被捕者约300余

人。被逮捕的人们都被捆绑起来，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雇佣军像驱赶牲畜一样地用木棍把他们驱赶到监狱的地下室里。第二天，13位革命领导人被押送到加拉茨，尔后从那里再押送到土耳其。但其中6人在布勒伊拉逃脱，并从那里逃到了特兰西瓦尼亚。

刚刚兴起的雅西三月革命被摩尔多瓦的统治者斯图尔扎大公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尽管如此，它却是1848年罗马尼亚革命的第一次演习。

摩尔多瓦流亡者的活动与各县农民起义

3月29日，斯图尔扎向“自己心爱的市民们”宣布：“具有叛乱思想的、不成体统的人们”被制服了，“秩序”恢复了。然而，雅西三月革命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摩尔多瓦革命斗争的结束，斯图尔扎统治的加强也不能阻止摩尔多瓦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仍然在继续着：流亡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布科温的革命领导人发表了革命纲领，农民起义仍然不断兴起。摩尔多瓦人还十分密切地注视着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事态，其中有些人还参加了那里的革命。

逗留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摩尔多瓦革命者从失败中吸取了严重的教训，他们开始认识到，向大公提出请求和递交请愿书是无用的，只有通过斗争，推翻封建农奴制度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但是，他们又不敢依靠人民群众，深恐人民革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这种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充分地表现在他们所制定的纲领中。1848年5月3日，在特兰西瓦尼亚召开了布拉日代表大会。大会之后，即5月12日，流亡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摩尔多瓦革命者在布拉索夫拟定了一个比三月革命更激进的纲领，题为《我们改革祖国的原则》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5月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或称“布拉索夫纲领”。这个纲领是在特兰西瓦尼亚革命的影响下起草的。纲领规定：废除徭役和各种形式的

封建义务；把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废除等级特权；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管理国家；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应成为统一的独立的罗马尼亚国家。这里所以没有提出与特兰西瓦尼亚统一，主要是考虑到当时不利的国际条件还不允许与特兰西瓦尼亚统一。这个纲领的形式简短有力，内容具有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性，它是摩尔多瓦最进步的革命纲领。但是，这个纲领却没能和群众中进行广泛的传播。

在摩尔多瓦，4至6月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爆发了许多地方性的农民起义，如巴克乌、尼亚姆茨、图托瓦、罗曼、多瓦霍伊和苏恰瓦等县。摩尔多瓦农民受到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革命胜利的鼓舞，采取了更为勇敢的行动，也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准备向雅西挺进，掀起反对斯图尔扎大公统治的斗争。起义农民都自己武装起来，准备以暴力反对斯图尔扎大公。在许多地方，农民撕毁了斯图尔扎宣称首都革命运动已被镇压的布告。在农民起义又纷纷兴起的革命形势下，斯图尔扎加强了武装镇压。同时，奥地利帝国政府惧怕革命运动同本国境内的强大革命运动洪流汇合起来，也在布科温的边境线上加强了军事警备。

6月瓦拉几亚革命爆发后，被流放的摩尔多瓦革命者在切尔纳乌茨成立了摩尔多瓦革命委员会，他们通过扬库·亚历山德里与瓦拉几亚革命者取得了联系，并选出了执行委员会。同时，摩尔多瓦出现了许多传单和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小册子是摩尔多瓦作家瓦西里·亚历山德里写的。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有力地抨击了斯图尔扎的野蛮统治，揭露了摩尔多瓦农民的悲惨状况。同年8月，切尔纳乌茨的摩尔多瓦革命委员会决定让米·科格尔尼恰努起草一份新的革命纲领《摩尔多瓦民族党的要求》，即八月资产阶级民主纲领。纲领要求：取消“组织规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农民通过赎买得到土地；社会各阶级派代表参加国民议会；废除徭役；把寺

院财产有偿地收归国有和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免费教育等。纲领认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统一应当是未来民族大厦的“擎天柱”。这个纲领虽然较雅西三月请愿书有很大的进步，详细地论述了广泛的资产阶级改革，但是它与5月的“布拉索夫纲领”比较，在有些方面，特别是在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的问题上，则后退了一步。

摩尔多瓦人民在布拉索夫和切尔讷乌茨所提出的5月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和8月资产阶级民主纲领，都未能付诸实现。但是，摩尔多瓦的革命运动表明，它已经有力地冲击和动摇了摩尔多瓦封建农奴制的基础和沙皇俄国在摩尔多瓦的统治。

革命的失败

摩尔多瓦革命一开始，沙皇俄国就非常惧怕。尼古拉一世惧怕革命动摇他在摩尔多瓦的统治，惧怕反对封建农奴制的革命运动波及边境地区比萨拉比亚，波及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因此，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摩尔多瓦革命事态的发展。摩尔多瓦革命刚刚开始，沙皇俄国便封锁了沿普鲁特河与多瑙河的边境线，禁止摩尔多瓦人或者经过摩尔多瓦的外国人渡过普重特河进入俄国，以免他们将革命思想带到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不仅把俄国将军焦格麦尔派到雅西，协助斯图尔扎镇压革命运动，而且于1848年4月末，就开始将军队集结在沿普鲁特河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便于军队随时可渡过普鲁特河，占领摩尔多瓦直至塞列特河。1848年5月24日焦格麦尔向他的军官宣布：“……虽然摩尔多瓦政府于3月29日采取了有力措施，但是，摩尔多瓦的思想动荡仍在继续着，因此在表面平静下掩盖着真正的危机。”^①

^① 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军事统计档案室，第5332号卷宗，第7卷张。转引自尼·维·别列兹尼亚科夫：《1848—1849年多瑙河两公国的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第44页。

1848年整个5月和6月，焦格麦尔和斯图尔扎一直在进行着关于摩尔多瓦统治集团与沙皇俄国共同镇压革命运动的卑鄙交易。5月20日，斯图尔扎得到了关于居住在匈牙利的摩尔多瓦起义者已经集合起来，企图越过格罗泽什蒂进入摩尔多瓦，以及摩尔多瓦北部的自由派贵族准备支持他们以600名武装山民的消息后，便加紧乞求俄国帮助他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沙皇尼古拉一世也早已将军队集结在比萨拉比亚准备随时对摩尔多瓦实行军事占领。而沙皇俄国之所以迟迟未侵入摩尔多瓦，只不过是等待有利时机，以便从斯图尔扎那里索取更多的报酬罢了。斯图尔扎与焦格麦尔谈判的结果，答应摩尔多瓦政府承担供应俄国军队所需的一切。于是，6月19日，焦格麦尔报告俄国：“摩尔多瓦正准备发动总起义，某些贵族已经回到自己的庄园，武装山区人民。”而且摩尔多瓦准备起义的人们是以推翻斯图尔扎大公为宗旨的。因此，焦格麦尔请求驻扎在比萨拉比亚的俄军先头部队的统帅，将军队开过普鲁特河，并推进到贝尔拉得和雅西。根据焦格麦尔的请求，6月25日，俄军先头部队从勒奥弗附近渡过普鲁特河，向贝尔拉得推进^①。6月28日，另一支3000人的部队在斯库利亚内越过普鲁特河，占领了雅西。俄军渡过普鲁特河，侵入摩尔多瓦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制止摩尔多瓦群众性的大规模起义，维护斯图尔扎政权和巩固沙皇俄国在摩尔多瓦的统治。

刚刚兴起就被本国统治阶级和沙皇俄国扼杀了的摩尔多瓦革命，在1848年始终未能掀起更大的高潮，也没能发展成轰轰烈烈、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

^① 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军事统计档案室，第5332号卷宗，第12—13卷张。转引自尼·维·别列兹尼亚科夫：《1848—1849年多瑙河两公国的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第44—45页。

第三节 瓦拉几亚革命

革命的爆发 伊兹拉兹宣言

1848年革命前夕，瓦拉几亚出现了严重的霍乱和牲畜流行病，人畜大量死亡，致使瓦拉几亚农村人烟稀少，田园荒芜。

1847年3月23日，布加勒斯特发生了特大火灾，烧毁了1800所住宅，损失达100万列伊。许多人流离失所。但比贝斯库统治集团却视而不见，他们不仅不设法救济受灾群众，反而乘群众之危，贪污受贿，投机倒把。1847年，比贝斯库大公乘粮食缺乏之机，将1846年的库存小麦，按极低廉的收购价格出售给一个与他亲近的帕奇尤利。这个帕奇尤利，立即将廉价到手的小麦以出奇的高价向市场抛售，从中攫取了巨额利润。大公及其周围亲信滥用职权，贪污盗窃，更是屡见不鲜。例如，在瓦拉几亚，1米长的公路造价竟高达2700列伊。这个价格远远超过了实际修路所需要的费用，于是多余的钱便源源流入到大公及其亲信的腰包。在当时的瓦拉几亚可以说是君昏臣奸，官贪吏猾；天灾人祸，交互为虐；官民相仇，势如宿敌。瓦拉几亚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瓦拉几亚的资产阶级虽然也较软弱，但比摩尔多瓦的资产阶级活跃。早在1843年，自由派贵族扬·吉卡、克里斯蒂安·特尔德·沃伊内斯库就成立了秘密组织“兄弟会”。该会的宗旨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参加“兄弟会”的多为中小贵族和商人，大贵族只有戈列斯库兄弟和埃利亚德及罗塞蒂等人。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尼古拉·伯尔切斯库是兄弟会的领导者。

尼古拉·伯尔切斯库(1819—1852年)是瓦拉几亚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1848年瓦拉几亚革命领导者之一。伯尔切斯库

出身于小贵族家庭。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参加革命运动,21岁时因参加一次以废除贵族特权、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建立共和国为目的的密谋而被捕,监禁了3年。但是,监狱生活并没有使伯尔切斯库屈服,反而使他变得更坚强了。他刚一出狱,便立即投入斗争,参加“兄弟会”。由于瓦拉几亚当局对他的迫害,他不得不于1846年离开祖国,侨居巴黎。当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吹响欧洲革命的号角时,他立即投入战斗,和法国起义者一起冲进了王宫。1848年4月,当瓦拉几亚掀起革命风暴时,伯尔切斯库便立即回到布加勒斯特,积极参加准备起义的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他认为,罗马尼亚革命并不是“没有来历和前途、没有其他原因而只体现少数人偶然意愿的一种暂时现象,或者是欧洲的普遍运动……它的原因渊源于历史的长河。促成革命的是罗马尼亚人民在18世纪里所从事的艰苦劳动,所遭受的苦难和所付出的努力。”^①在整个1848—1849年瓦拉几亚革命中,伯尔切斯库始终把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罗马尼亚国家作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时他一直把解放农民的问题当作革命的中心问题,主张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把土地分给他们。他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争取解放农民和祖国的独立与统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图30 尼古拉·伯尔切斯库

1848年3月中旬,“兄弟会”便积极展开了革命活动。但是,在“兄弟会”中存在着政治主张不同的两个派别:一个是以伯尔切斯

^① 安·奥采特亚:《罗马尼亚人民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4页。

库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派，它主张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将祖国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取消封建特权和分配给农民土地，成立国民自卫军。另一派是以埃利亚德和阿尔比尼为代表的温和派。它反对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只要求实行某些有利于自己的改革。阿尔比尼曾说：“我们并不想推翻大公，相反，却赞成他领导运动。”^①这两个派别的斗争在领导 1848 年瓦拉几亚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曾一再表现出来。

1848 年 4 月间，布加勒斯特革命委员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几次秘密集会，制定革命的政治军事计划，并积极购买武器。5 月，革命委员会拟根据计划，于 1848 年 6 月 9 日在布加勒斯特、伊兹拉兹、奥克内列—马里和特列加等地同时发动革命。在确定这些地点时，革命委员会既考虑到革命力量，又考虑到驻防军对革命的态度。如在特列加和奥克内列—马里，盐矿工人将是革命的主力军，因为伯尔切斯库曾在这里进行过有力的宣传工作。多瑙河沿岸、奥尔特河两岸和伊兹拉兹附近驻扎着克里斯蒂安·特尔少校和尼古拉·普列绍亚努上尉的部队，这两位军官都是革命的拥护者。伊兹拉兹位于罗曼纳茨县境内，县长格奥尔基·马格鲁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革命委员会就是在考虑到这些地方的有利条件之后，决定在这些地区首先发动革命的。

6 月 9 日，根据革命委员会的倡议，在伊兹拉兹村召开集会。参加集会的有军队、港口海军和伊兹拉兹及邻近村庄的农民。当人民群众聚集得越来越多时，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便向成千上万的农民和排列整齐的士兵宣读了宣言，即“伊兹拉兹宣言”。这个宣言是由伯尔切斯库起草的，但有些部分却被埃利亚德删掉了。宣言共 22 条，其内容为：“罗马尼亚人民宣布：1. 根据米尔恰与弗拉德四

^① 斯·阿尔比尼为《罗马尼亚诸公国的 1848 年。文件和文献集》所写导言，布加勒斯特，1933 年，第 50 页。

世执政时所签订的条约^①，实现行政和立法的独立，其他列强不得干涉内政；2. 政治平等；3. 普遍课税；4. 成立由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全民议会；5. 实行大公责任制，大公任期五年并受各阶层监督；6. 削减皇室费用，清除各种形式的贪污受贿；7. 大臣和所有公务人员应对自己的职责负责；8. 出版完全自由；9. 国家支付任何报酬应通过代表而不是大公；10. 根据大公由全体人民选举的规定，各县有权选举自己的官吏；11. 成立国民自卫军；12. 解除从属寺院^②对外国寺院的从属；13. 解放农奴，并在支付土地所有者‘损失’以赔偿金的条件下分给农奴土地；14. 在支付土地所有者‘损失’以赔偿金的条件下解放茨冈人；15. 任命罗马尼亚人为驻君士坦丁堡的国家代表；16. 所有罗马尼亚人均享有平等的、普遍的受教育的权利；17. 取消与公职无关的封号与等级；18. 取消侮辱性的体罚；19. 废除绞刑；20. 建立罪犯赎罪、改邪归正的惩戒机关；21. 犹太人享有自由，信仰不同的同胞同样享有政治权；22. 立即召开由各阶层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并在罗马尼亚人民所颁布的上述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宪法。”^③

① 米尔恰与弗拉德四世均系瓦拉几亚的大公，他们分别于 1393 年和 1460 年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条约。

1393 年签订的条约包括有，瓦拉几亚“……将继续根据本国的法律进行统治，瓦拉几亚国君将有充分的自由自行选择方式和时机同邻邦宣战和媾和”；“国君（基督徒）由大主教和贵族选举产生”；“瓦拉几亚国君有义务每年给帝国国库纳贡 500 皮亚斯特尔”等条款。

1460 年签订的条约包括有“苏丹同意并且保证由他本人和他的继承人保护瓦拉几亚和防御任何敌人的进犯，为此仅要求瓦拉几亚承认苏丹对作为主权公国的瓦拉几亚具有宗主权，地方县官为此必须每年向土耳其纳贡 1 万皮亚斯特尔”；“土耳其政府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该公国的地方行政，任何一个土耳其人无正当理由，均无权进入瓦拉几亚境内”；“地方长官照旧由大主教、主教和贵族选举产生，土耳其政府承认这种选举是合法的”；“瓦拉几亚人民仍享有按本国法律进行管理的自由，它的地方长官享有对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利以及宣战与媾和的权利，他们自己的行为不对苏丹负任何责任”等条款。

② 从属寺院，即由外国寺院领导的寺院。

③ 《1848 年的罗马尼亚诸公国》（史料汇编），布加勒斯特，1948 年，第 92 页。

“伊兹拉兹宣言”首先表达了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和要求,总的说来,它具有较明显的反封建性质,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和民族性的宣言。关于解放农奴和分配给他们土地的条款虽然表达得不够明确,既没有规定地段的大小,也没有规定赎金的多少,但是能把这个要求列入宣言,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因此,在宣言宣读以后,聚集在伊兹拉兹的农民深受鼓舞,欣喜若狂。这个宣言在动员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伊兹拉兹宣言”宣读以后,扬·埃利亚德向大会发表演说。他说:“罗马尼亚兄弟们,……我们的祖先抛头颅、洒热血,给我们留下了这面光荣的三色旗。我们的祖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给我们留下一个在敌人面前从不屈膝的祖国。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子女留下一笔伟大的遗产。”^① 群众宣誓为实现这一宣言而斗争。

此后,革命委员会便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由扬·埃利亚德、什特凡·戈列斯库、克里斯蒂安·特尔少校、尼·普列绍亚努上尉和杜·沙普克神甫组成^②。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以后,革命者便在军队和人民的簇拥下经过卡腊卡耳和克拉约瓦,前往布加勒斯特,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一部分用镰刀和长矛武装起来的农民参加了护送临时政府成员的队伍。

临时政府的建立

在伊兹拉兹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迅速燃遍了普拉霍夫、威尔契以及其他许多地方。

6月初,比贝斯库大公就在布加勒斯特开始了大逮捕,企图使革命失去领导。当伊兹拉兹革命事件传到比贝斯库那里时,他便下

^{①②} 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等:《罗马尼亚通史简编》,布加勒斯特,1971年,第254页。

令派出军队进行镇压，准备绞死其领导人。但是，由于革命在许多地区同时爆发，比贝斯库已经无力镇压革命运动了。恰巧这时，发生了谋杀比贝斯库的事件。6月10日，比贝斯库乘敞篷马车出猎时遇刺，但比贝斯库安然无恙，刺客失踪了。于是比贝斯库便企图利用这一事件打击革命运动。

6月11日早晨，比贝斯库向军官发布调动军队镇压革命运动的命令，遭到了军官的拒绝。大多数出身于中小贵族的军官同情革命，他们向比贝斯库大公表示：在同任何外国敌人作战时，他们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决不参加骨肉相残的战争。这时，聚集在多布罗蒂亚萨贫民区的阿克森·塞维尔家的一部分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便决定立即开始行动。在他们号召下，布加勒斯特的手工业者、农民和士兵便成千上万地集合在大街上，于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便在大街上直接向人民宣读了“伊兹拉兹宣言”，并宣布废除“组织规程”。宣读后，在大教堂的钟声中，布加勒斯特人高举三色旗帜，佩戴着三色胸章和彩带，高呼着“我们要正义！宪法万岁！”的口号，向王宫进发，要求比贝斯库大公在宣言上签字。比贝斯库看到人数众多、声势逼人、威力强大的场面，吓得浑身发抖，面色苍白，不得不答应群众的要求，被迫坐在两位革命委员会委员的中间在宣言上签了字。宣言成了国家宪法。同时比贝斯库还承认了由布加勒斯特革命运动领导人组成的临时政府。后来，伯尔切斯库写道：“6月11日的革命是一个民族所进行过的最美好的革命。”^①

但是，比贝斯库大公和沙皇俄国是不甘心失败的。俄国驻布加勒斯特的领事科采布全力支持反动贵族，帮助其中的一些人逃到俄国，同时还竭力唆使比贝斯库进行反革命活动。为了表示抗议破坏“组织规程”，这位领事离开了布加勒斯特，到达福克夏尼。比贝斯库大公不愿意实行他自己签署的宣言，并慑于俄国领事的抗议，

① 米隆·康坦丁内斯库等：《罗马尼亚通史简编》，第255页。

也逃到了布拉索夫。随后,反动贵族纷纷逃跑,有的逃回自己的领地,有的逃往国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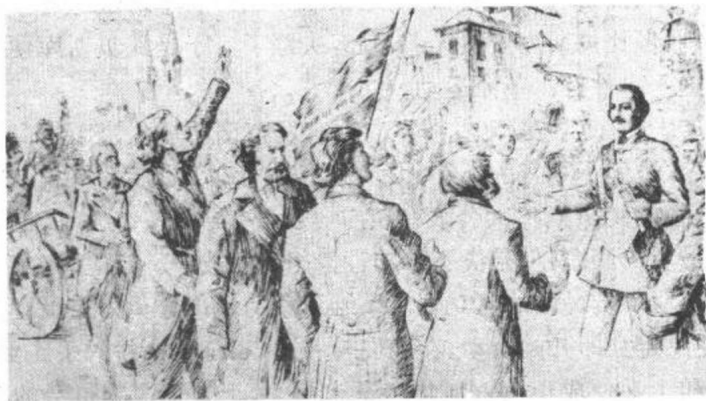


图 31 6月11日布加勒斯特人民
强迫比贝斯库大公在宣言上签字

6月13—14日,临时政府宣布废黜大公,接管了政权,伊兹拉兹政府与布加勒斯特临时政府合并。参加临时政府的有扬·埃利亚德、尼古拉·戈列斯库、什特凡·戈列斯库、克里斯蒂安·特尔·格·马格鲁、尼·伯尔切斯库和康·亚·罗塞蒂等人。在临时政府成员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①。

在临时政府成员中分成三个不同的派别。以伯尔切斯库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基本上能表达人民群众的愿望。以罗塞蒂为首的激进自由派代表中间派的观点,主张在国内实行广泛的民主改革。以埃利亚德为首的温和自由派对革命民主派提出的政治主张持保留态度,反对进行彻底的革命。后两派在临时政府中占优势,因此,在比贝斯库逃跑以后,他们不是利用有利时机,发动群众,而是向封

^① 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等:《罗马尼亚通史简编》,第255页;尼·维·别列兹尼亚科夫:《1848—1849年多瑙河两公国的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第61页。

建势力妥协，竟让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大主教内奥菲特领导临时政府，并被任命为政府主席，尼·伯尔切斯库、亚·戈列斯库、亚·罗塞蒂和康·布勒蒂亚努被任命为政府秘书，而原军事大臣奥多贝斯库上校和布加勒斯特卫戍司令索洛蒙则官复原职。内奥菲特领导临时政府后，立即召集一些大贵族开会，讨论请求沙俄军队进驻瓦拉几亚和镇压革命的问题。

当人民群众得知大主教内奥菲特及其周围的反动贵族阴谋叛国，妄图扼杀革命时，愤怒万分。数千人立即向主教辖区进发，包围了大主教的教堂。这时，被群众的威力吓坏了的大主教，为了平息群众的愤怒，立即走出阳台，假惺惺地吻着三色旗，宣誓效忠宪法，并向人民群众解释，他们从来不反对革命。大主教及其周围反动贵族的第一个反革命阴谋被人民群众粉碎了。

这时，以埃利亚德为首的温和派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了，不愿意再将革命向前推进，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却要求将革命进行到底。6月15日，渴望自由的人民群众在菲拉雷特广场（从这时起改为自由广场）集会。印刷工人、制革工人、织布工人和面包师、裁缝等都来参加大会。印刷工人用大板车拖着印刷机，当场印刷和散发了歌颂自由的诗歌：

书报检查被废除，
印刷业得到了
渴望已久的自由。
大家将怎样生活？
我们将自由地生活，
自由地前进，前进！
我们自由了！
我们友爱了！^①

① 《1848年的罗马尼亚诸公国》（史料汇编），第125页。

在群众大会上，革命领导人在群众的要求下再一次宣读了“伊兹拉兹宣言”，并兴高采烈地宣誓效忠它。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与革命民主派的坚决要求下，临时政府颁布了第一批法令：宣布有“正义、博爱”字样的三色旗为国旗；取消国民等级；释放全部政治犯；废除文官官衔、书报检查、体罚、死刑；成立国民自卫军。法令虽然没有涉及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农民的解放和土地问题，但是，它是罗马尼亚人民在斗争中争得的革命成果。

人民为保卫革命成果而斗争

当临时政府颁布第一批法令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时，各地的劳动人民都沸腾起来了。他们纷纷宣誓效忠宪法、拥护政府法令。朱尔朱、布勒伊拉、布泽乌、布加勒斯特、克拉约瓦、特尔古一日乌、福克夏尼等 18 个县的教师都接受了向人民群众宣讲宪法的任务，并且都积极行动起来。许多地区都展开了宣誓效忠宪法的活动。在特尔古一日乌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的参加者以巨大的热情通过了宪法，并宣誓效忠宪法。布勒伊拉的革命群众专门布置了宣读宪法的讲坛，讲坛上挂起了三色旗，到会的革命群众热情地赞扬宪法，并向三色旗致敬。

但是，临时政府仅仅采取这些措施是不能巩固革命成果的，因为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和自由问题，即废除封建义务和把土地变为自己所有的问题。因此，要想将革命向前推进一步，必须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才能粉碎贵族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而在临时政府中，温和派占优势，他们不敢也不愿触动贵族的根本利益，他们甚至还向农民宣布说，贵族绝不是农民的敌人，并号召“农民兄弟”在 3 个月内履行他们对地主所承担的一切义务。政府对农民的态度，使尼·伯尔切斯库和亚·戈列斯库非常不满和愤恨；亚·罗塞和扬·布勒蒂亚努宣告辞职；贵族反动派便利用临时政府的优柔寡断，施

展反革命阴谋，企图推翻临时政府。

6月18日，贵族反动派在布加勒斯特的“莫莫洛”（后来称“卡普沙”）饭店集会，借口讨论土地所有制问题，进行阴谋活动。会议策划了推翻临时政府的具体问题，并决定由军队司令奥多贝斯库和布加勒斯特卫戍司令索洛蒙负责。这是他们策划的第二个反革命阴谋。

奥多贝斯库和索洛蒙于6月19日发动暴乱，试图推翻临时政府。他们秘密地调动了两连喝醉酒的士兵，借口向政府“致意”，而包围了临时政府。叛乱分子首先把守住宫中所有的进出门户，尔后冲进宫里，逮捕了正在开会的临时政府成员扬·埃利亚德、尼·戈列斯库、克·特尔、尼·伯尔切斯库等人。革命处于严重关头。

政府成员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布加勒斯特人民便迅速地向市中心集中，最后包围了王宫。正在匆匆忙忙拼凑“新政府”的索洛蒙等反动分子看到群众冲进王宫，便命令士兵开枪，结果死亡8人，受伤者更多。索洛蒙的武力镇压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于是，他们便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士兵看到群众来势凶猛，便不敢阻拦他们。人民群众逮捕了奥多贝斯库。这时，索洛蒙仍然继续反抗，向群众射击。一位挺身而出的女英雄安娜·伊帕黛斯库表现得特别勇敢，她身挂战刀，两手握着两支手枪，热情地号召人民奋起保卫临时政府，高喊“处死叛徒！”的口号，带领群众前进。安娜·伊帕黛斯库的英勇行动大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和决心，她那“处死叛徒！”的呼声传遍了人群，变成了所有人的口号。广大人民群众在王宫周围的街道上筑起了街垒，向士兵投石子，索洛蒙被迫带领残部逃回兵营。布加勒斯特人民粉碎了贵族反动派的第二个反革命叛乱阴谋，释放了被捕的政府成员，尔后他们向兵营出发，包围了兵营，坚决要求逮捕索洛蒙。

正当人民群众坚决地与贵族反动派作斗争时，临时政府中的右翼分子却企图与反革命分子妥协了。在临时政府中对于如何对

待这次叛乱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尼·伯尔切斯库主张，临时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严惩叛乱分子，以儆效尤。但是，以扬·埃利亚德为首的右翼分子已准备与反革命分子进行谈判。他们对于继续顽抗的索洛蒙不但不敢采取断然措施，反而答应索洛蒙，只要他不再继续顽抗，便允许他逃往外国。临时政府中右翼分子与贵族反动派的这种妥协行为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为了平息群众的愤怒，他们表面上逮捕了索洛蒙，并对叛乱的首要分子进行了“审判”。但“审判”结果，只是免去奥多贝斯库和索洛蒙的职务，将他们驱逐出军队。对奥多贝斯库和索洛蒙的处理充分暴露了右翼分子控制的临时政府的妥协投降和软弱无能。

事实证明：这次反革命叛乱，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干预是不能立即平息的；革命成果和临时政府，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奋不顾身的斗争，也是无法保存下来的。

但是，不到10天的时间，以大主教内奥菲特为首的贵族反动派又利用政府的软弱无能和投降妥协，策划了第三次反革命阴谋。反动贵族地主在大主教内奥菲特的支持下，到处散布谣言，声称一支沙皇军队已渡过普鲁特河，正向布加勒斯特推进。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临时政府内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埃利亚德被吓得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坚决主张逃跑。而尼·伯尔切斯库则坚决主张组织抵抗。但是，大多数政府成员都倾向于埃利亚德，主张逃跑。6月28日，胆小如鼠的埃利亚德便向喀尔巴阡山逃走了。其余的政府成员也连夜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最后他们不顾伯尔切斯库的强烈反对，决定步埃利亚德的后尘，当天夜里便离开了首都，逃到了特尔戈维什特。

6月29日，惊异的布加勒斯特人发觉，政权改变了。墙上贴着由大主教内奥菲特签字的布告，这个反动分子向布加勒斯特人祝贺“叛乱”结束和“秩序”的恢复。贵族反动派在内奥菲特的指使下，慌忙成立了以费多尔·米凯列斯库和埃马努伊尔·韦列亚努为首

的反革命政府，即所谓的总督府。贵族反动派又在大主教的授意下，发表宣言，宣布临时政府成员均为叛乱者，临时政府的一切法令均无效，并恢复了瓦拉几亚革命前的秩序。曾经销声匿迹一时的奥多贝斯库与索洛蒙又官复原职，耀武扬威。总督府向各县发出了逮捕临时政府所有成员和恢复以前所有官吏职务的命令。

于是残酷的镇压与大逮捕开始了。“布加勒斯特的所有住宅都被搜查，布加勒斯特的居民在街上都遭到了鞭打。警察上尉科斯塔凯狂妄地叫嚣：‘我要用罗马尼亚人的皮编我的马鞭子，我要用罗马尼亚人的血染红我的马鞍子，以便让罗马尼亚人好好地记着，自由传播到这里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①

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是不能容忍旧制度复辟的。正如猛烈袭来的风暴一样，具有大无畏革命精神的布加勒斯特人民又集合了起来，他们高呼“宪法万岁！”“打倒总督府！”的口号冲进了大主教的教堂。群众强迫他放弃头天晚上签署的布告、解散警察、派遣急使请回临时政府成员。群情激昂的游行队伍走遍了全城。当他们向王宫逼近时，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从这里逃跑了。尔后，革命人民群众便高唱歌曲向米凯列斯库、韦列亚努、警察上尉科斯塔凯和其他反革命头子的住宅冲去。当示威游行队伍到达反革命分子的住宅时，人民群众愤怒地捣毁了他们的住宅，参与叛乱的贵族反动派都逃跑了。

索洛蒙和奥多贝斯库仍躲藏在兵营里，企图继续反抗。这时，武装起来的人民便推倒兵营的围墙，冲进兵营。索洛蒙和奥多贝斯库命令炮兵开炮，但是大炮的威力并没有吓倒布加勒斯特人民，他们蜂拥冲上前去，冲散了士兵的队列，而士兵们也拒绝向人民开炮射击，并且转到革命人民方面。于是，贵族反动派的第三次反革命

^① 尼·维·别列兹尼亚科夫：《1848——1849年多瑙河两公国的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第67页。

阴谋又被彻底粉碎了。临时政府又回到了布加勒斯特，人民又一次保卫了临时政府和革命成果。

农民为土地问题而斗争

临时政府在回到布加勒斯特以后，并没有采取任何镇压反革命的措施，只是在教育、财政、行政、税务制度、农业、工业、商业和造船业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并准备废除茨冈人的奴隶制。但是在讨论制宪会议成员的问题上，临时政府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埃利亚德为首的妥协派顽固地坚持成立等级制机构，主张贵族、商人和农民各派 100 名代表参加会议。这样，贵族和倾向于贵族的商人就会在制宪会议中占稳定的多数，并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农民。以伯尔切斯库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猛烈地抨击了这个卑鄙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政府成员的支持，埃利亚德的提议被否决了。7 月 14 日颁布了关于召开由两级选举制产生的制宪会议的法令。

临时政府又根据伯尔切斯库的建议，分别派遣自己的代表到各县宣传和解释各项新法令。各地的劳动人民也派代表团到首都，表示支持和忠诚于临时政府。于是，布加勒斯特的自由广场（即菲拉雷特广场）上又聚集着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民。代表团人数最多的是伊尔福夫县代表团。在这个代表团中，每一个乡都有一辆大车，拉车的牛角上都涂上代表民族的色彩。车上装饰着农民的劳动工具：镰刀、大镰刀、锄头以及农产品。穿着农民服装的骑手围绕在车旁。布加勒斯特又呈现出一片节日景象。

但是，这些节日气氛并不能掩盖临时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临时政府虽然准备在上述各方面进行改革，但是却不打算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民族独立问题。临时政府以种种借口推迟土地问题的解决，并且要求农民继续对贵族地主履行义务，直到召开制宪会议为止。在民族独立问题上，

迟迟不敢宣布摆脱沙皇俄国与土耳其的奴役，而且还派代表团至君士坦丁堡，谈判关于承认新政权的问题。同时，临时政府对于参与第三次叛乱的反革命分子没能坚决镇压，奥多贝斯库与索洛蒙虽两次参加叛乱，不但没有判刑，反而给以养老金，让其逃亡国外。埃利亚德临时政府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强烈不满。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逐渐发展成为公开的对抗。在布勒伊拉发生了人民群众公开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许多地区的农民都拒绝为地主服役。有些地区，农民公开砍伐地主的森林，占据已经种上粮食的土地，并在贵族草地上割草，在贵族的池塘里捕鱼；有些地区的农民没收贵族的世袭领地，自行分配，并将自己的牲畜赶到贵族的草地或耕地上放牧。而规模最大的农民暴力多发生在伊尔福夫、罗曼纳茨、特列奥尔曼、德日和布勒伊拉等县。在伊尔福夫县的大多数村庄里都发生了暴动，起义的农民捣毁贵族的住宅和办公地点，并拒绝缴纳任何租税。农民的斗争严重地打击了贵族地主。

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便于7月11日发布宣言，要求农民在尚未召开制宪会议废除徭役和租税之前，对地主履行义务，否则，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内务部长还命令军队帮助各县行政机关镇压农民起义。这个宣言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对。为了缓和与农民的矛盾，临时政府不得不同意成立“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委员会由36名代表组成，其中贵族地主代表18名，农民代表18名。政府向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是调和贵族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制定土地改革方案，但方案应规定只能触动贵族的一小部分土地，其数量不得超过一半，而且必须缴纳大量的赎金。无论从委员会组成的人数，还是从政府对它提出的任务来看，这个委员会对贵族地主都是有利的。

委员会于8月9日正式开始工作，经过10天的辩论，终因贵族地主的反对而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农民迫不及待地等候讨论结

果,各地都派来了人数众多的代表团,会议厅被挤得水泄不通。看到这种情况,埃利亚德害怕农民在布加勒斯特发动暴乱,便以委员会“不利于巩固国内团结”为理由,于8月19日解散了土地问题委员会。所以,土地问题委员会没有任何作为,它既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改变农民的悲惨处境。

临时政府解散土地问题委员会以后,便完全失去了农民群众的支持,失去了革命的最基本的力量。加之临时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也失去了各民族的支持。总之,临时政府的倒行逆施不仅断送了革命,断送了人民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而且也断送了临时政府本身。

关于建立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是诸公国的共同目标。7月13日,《罗马尼亚婴儿报》发表了题为《致我们的摩尔多瓦兄弟》的号召书,它鼓励摩尔多瓦人起来推翻专制统治,使“整个的罗马尼亚民族获得自由,使整个罗马尼亚民族组成一个国家,一个单一的亲如兄弟的民族。”^①7月19日,《自由的人民报》也发表了题为《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国的统一》的文章。文章写道:“主要问题之一是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国的统一……”^②8月,瓦·亚历山德里致函伯尔切斯库等领导人,表明摩尔多瓦革命者的意愿,他说:“摩尔多瓦多数人的最殷切的希望”是把摩尔多瓦“在同一个政府和同一部宪法下同瓦拉几亚”统一起来^③。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以及特兰西瓦尼亚联合和统一的思想,为了避免引起土耳其和俄国的干预而未在革命纲领中具体地表达出来,但是,它却一直孕育在革命者和广大人民的思想中。

① 米·康斯坦丁内斯库等主编:《罗马尼亚通史简编》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51页。

② 安·奥采特亚:《罗马尼亚人民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5页。

③ 米·康斯坦丁内斯库等主编:《罗马尼亚通史简编》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51页。

沙皇俄国与土耳其的反革命武装干涉

瓦拉几亚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知道，瓦拉几亚革命事件必然会引起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敌视，它们会在一定的时期进行干预。临时政府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活动阻止沙皇俄国与土耳其的反革命武装干涉。为此，临时政府曾向欧洲许多国家派遣了外交代表，并为实现瓦拉几亚革命和欧洲其他国家革命之间的相互声援作了巨大的努力。为了防止俄土联合行动，扬·吉卡向奥斯曼政府保证，革命并不想断绝同宗主国的联系。但是，这未能制止沙皇俄国与土耳其的反革命干涉。虽然土耳其与沙皇俄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在镇压革命方面，他们之间的矛盾便退居第二位了。

在瓦拉几亚贵族反动派于6月19日和29日发动叛乱失败之后，沙皇俄国对于日益高涨的瓦拉几亚革命十分忧虑和恐惧，它力图藉土耳其的屠刀绞杀瓦拉几亚革命，俄国大使威胁说：如果土耳其不干涉，俄国将进行干预。同时，俄国在给欧洲各国政府的声明里表明了它将以军事力量干涉公国事务的企图。在俄国的外交压力下，7月19日，土耳其专员苏里曼巴夏率领1.1万人的土耳其军队和两个炮兵连渡过了多瑙河，开往朱尔朱。苏里曼巴夏宣称，他此行的使命在于恢复革命前的制度和比贝斯库政府。与此同时，沙皇俄国也通过外交照会，为它干涉公国的行为进行辩护。

土军侵入瓦拉几亚的消息在广大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7月20日，3万多首都居民和郊区农民在自由广场上集会，抗议土军入侵瓦拉几亚，坚决要求土耳其军队从瓦拉几亚领土上撤出去。愤怒的群众还要求临时政府派出代表团，由群众护送着向苏里曼巴夏提出抗议。埃利亚德为首的妥协派立即出来制止，劝说群众不要这样作，以免同土耳其人发生武装冲突。因而，这次群众大会也只停留在对土耳其武装入侵的书面抗议上。

7月22日，在大主教内奥菲特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宣读了苏里

曼巴夏对瓦拉几亚人民的宣言,宣言要求在瓦拉几亚恢复革命前的秩序和解散临时政府。苏里曼巴夏威胁说:“如果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我就采用暴力。”^①在回答苏里曼巴夏的宣言时,临时政府表示,土军侵入瓦拉几亚是非法的,如果土耳其军队不将自己的军队撤出,而企图干涉瓦拉几亚内政的话,“那么,罗马尼亚民族将从对土耳其政府所承担的一切义务中解放出来”。而且土耳其政府的法令也是非法的^②。但是,在同一声明中却又说,如果土耳其政府承认瓦拉几亚宪法,那么,临时政府将是“君士坦丁堡的支持者”。这个声明充分表明了临时政府对待土耳其入侵问题上的动摇不定的态度。

苏里曼巴夏凭借武力,于7月28日解散了临时政府,由扬·埃利亚德、尼·戈列斯库和克·特尔组成督政府。在革命进程中,这个督政府无疑是一个倒退。苏里曼巴夏要求督政府取消临时政府的一切法令,取消“伊兹拉兹宣言”中关于改革社会政治制度的一切规定,允许逃往国外的贵族回国、逃回领地的贵族回到布加勒斯特。苏里曼巴夏还要求督政府成员向人民群众说明,在瓦拉几亚所实行的一切措施,未经土耳其专员和苏丹批准,一律无效。督政府温顺地答应了它的一切无理要求。

但是,人民群众是不愿受奴役的。9月6日,布加勒斯特人民组织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抵抗外国侵略者,废除“组织规程”,交出“组织规程”原本和贵族谱,但是,群众的要求遭到埃利亚德的拒绝。于是,被激怒的人民群众便冲进督政府所在的王宫,砸开机要档案室的大门,将12册贵族谱搬到街上,但是,没有发现“组织规

^① 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军事统计档案室,第5332号卷宗,第53—54卷张。转引自尼·维·别列兹尼亚科夫:《1848—1849年多瑙河两公国的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第81页。

^② 同上。

程”。经过查询，得知“组织规程”原本交给了一个名叫拉格兰日^①的法国人。这时，愤懑异常的群众便向这个法国人的住宅进发，捣毁他家的大门，取出了“组织规程”原本。然后，他们把“组织规程”与贵族谱一起装在出殡用的灵车上，在送葬曲的伴奏下，运送到大主教的教堂里，并在一片响彻云霄的欢呼声中，将它们扔进熊熊烈火之中。这个像镣铐一样束缚着罗马尼亚人民的“组织规程”，和保障贵族世世代代享受特权的贵族谱一起在人民革命的烈火中化为灰烬。在福克夏尼等地也同样烧毁了“组织规程”和贵族谱。这时，督政府授予格·马格鲁以特别的权力，并把大部分军队派往勒乌雷尼军营，以便在苏里曼巴夏占领布加勒斯特时，在奥尔特尼亚组织武装抵抗。

9月13日，土耳其的新专员付阿德—埃芬迪在科罗切尼军营里接见了一个有200名成员的代表团，向他们宣读了关于恢复实施“组织规程”和任命康·康塔库齐诺为总督的声明，并把革命说成是“共产主义”幽灵带来的“一次叛乱”。伯尔切斯库和另一些代表强烈抗议这个决定，遭到逮捕。扬·埃利亚德和克·特尔逃到英国领事馆，后又逃至特兰西瓦尼亚。

在既无武器，革命领导人又遭逮捕的情况下，布加勒斯特人民仍然竭力阻止土耳其侵略军入城。当土军越过手无寸铁的群众组成的人墙，逼近瓦拉几亚兵营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消防连表现得特别勇敢，他们在帕维尔·泽格内斯库上尉的指挥下，同人数相当于他们20倍的土军作战，并给土军以沉重的打击，在1848年罗马尼亚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篇章。马克思高度评价了罗马尼亚人坚贞不屈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把这次战斗称为“布加勒斯特的血浴”。

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布加勒斯特以后，便大肆掠夺居民，进行了

^① 拉格兰日是在瓦拉几亚临时政府中任职的法国人。

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当土耳其军队进入瓦拉几亚时，“俄国特使杜哈美尔将军跟随着，并且实际上指挥着土军，而土耳其敕令的发出是得到他的赞同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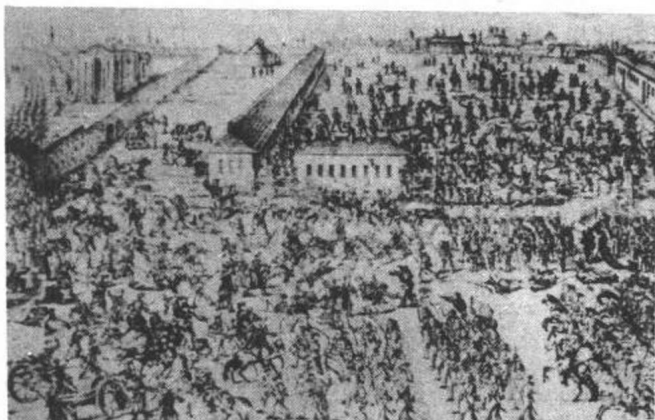


图 32 布加勒斯特消防连战士英勇抗击土耳其侵略军

这时，沙皇俄国为了防止土耳其独霸瓦拉几亚，并巩固它在这里的地位，也将俄军开进了瓦拉几亚。9月8日，设在摩尔多瓦的俄军指挥部得到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关于俄军进驻瓦拉几亚的命令。9月15日，沙皇军队开始渡过米尔科夫河，从摩尔多瓦侵入瓦拉几亚，占领福克夏尼。俄军侵入瓦拉几亚以后，开始了比土耳其更为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掠夺。瓦拉几亚的一切机关——民政的、军事的和司法的机关，均为俄国军人非法霸占或操纵。所有革命者和反对俄国的居民均遭到逮捕，被投进监狱。不仅如此，俄国人还控制了公国的税收，改变了贸易税率并禁止瓦拉几亚产品出口。同时，瓦拉几亚被迫支付庞大的军费，供养俄国士兵。俄军到处抢劫，掠夺，鞭打农民，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为了避免俄军的欺压，许多

^① 马克思：《关于罗马尼亚人的札记》，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92页。

村庄的居民被迫逃到覆盖着冰雪的喀尔巴阡山中，隐藏起来，过着悲惨凄凉的生活。

在奥尔特尼亚，格·马格鲁坚决维护着革命秩序，他决心抗击入侵的俄土军队，但是扬·埃利亚德和克·特尔却写信敦促他不要抵抗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俄土军队。英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罗·科胡恩也同样地告诫他。在这种情况下，马格鲁动摇了，于9月28日解散了兵营，在几位军官的陪同下，撤至特兰西瓦尼亚。

在沙皇俄国占领军的刺刀保护下，康塔库齐诺政府又开始实施“组织规程”，恢复了旧秩序。轰轰烈烈的1848年瓦拉几亚革命就这样被沙俄和土耳其的反革命武装干涉扼杀了。

瓦拉几亚革命被镇压以后，驻扎在皮亚特拉、济姆尼恰和土尔努等地的俄军和驻扎在克拉约瓦、卡拉法特等地区的土军，便积极帮助康塔库齐诺反动政府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并把军队派到各县，强迫农民到田间劳动，为贵族地主播种秋季作物。康塔库齐诺政府还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强迫农民“赔偿”革命时期他们给地主造成的所谓“损失”。于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因无力“赔偿损失”而被关进监狱，而贵族却在他们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庆祝血腥的“胜利”。

瓦拉几亚的革命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人民反抗沙皇俄国和土耳其占领者的斗争并没有停止。革命还拥有很大的力量，斗争以种种不同的形式进行着。特别是1848年秋季，农民起义甚为高涨。例如，斯洛鲍则亚—乔治县、赫勒埃什蒂县的农民拒不服从康塔库齐诺反动政府的命令，并袭击政府官员，有时甚至杀死他们；在托洛古尔乡的许多村庄里，农民拒不交出枪支，同政府官员作斗争；济姆尼恰附近伦库村的农民拒绝执行反动政府的命令，并集合了200多名携带武器的人，杀死和逮捕了反动政府的官员。各地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俄国和土耳其占领军以及康塔库齐诺反动政府，并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准

备了条件。

第四节 特兰西瓦尼亚革命

革命前的特兰西瓦尼亚

15世纪末,特兰西瓦尼亚是匈牙利王国内的一个自治公国,而在16和17世纪,它又是土耳其的附庸国。到了17世纪末,即1683—1699年奥土战争后,根据1699年的卡尔洛维茨和约,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一起并入了奥地利帝国的版图。直至1848年革命前夕,特兰西瓦尼亚仍作为一个自治公国,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管辖。

特兰西瓦尼亚虽然是一个自治公国,但实际上完全受奥地利的统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或经济上均毫无自治权利。特兰西瓦尼亚虽有国民议会存在,但议会的一切决议都必须经维也纳批准;特兰西瓦尼亚没有自己的军队,奥地利帝国的军队常年驻扎在这里,随时准备镇压一切革命运动。在经济上,奥地利把特兰西瓦尼亚看作它的原料供应地和加工品销售市场,奥地利的商品可以不受任何关税限制,大量向特兰西瓦尼亚倾销。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特兰西瓦尼亚工农业的发展。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是逐渐渗透到工农业中,并有所发展。一些矿藏得到开发,毛纺、食品等轻工业还发展得较快。

特兰西瓦尼亚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罗马尼亚人占居民总数的60%,他们多数是农民,是一个备受压迫的民族;其次是马扎尔人(即匈牙利人)占24%,他们多为贵族地主,是一个居统治地位的民族。因此,在特兰西瓦尼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错综复杂。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就是勾结这里的贵族地主,利用民族矛盾来加强和巩固它的统治的。

在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中只有少数是贵族地主，他们多数已马扎尔化了。大贵族地主控制着特兰西瓦尼亚的国民议会，享有种种特权，所以他们竭力维护哈布斯堡王朝和马扎尔族的统治，维护封建农奴制度。贵族中的自由派贵族大多从事工业生产或经营商业，他们的要求和资产阶级是一致的。特兰西瓦尼亚的资产阶级是在艰难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人数少，多数是从中上层农民中间成长起来的。一般说来，它能够表达罗马尼亚人争取民族平等的愿望，并得到罗马尼亚人的支持。如以西米翁·伯尔努齐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一个比较能够受到人民支持的派别，它激烈反对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主张罗马尼亚民族独立。

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农民是一个倍受压迫的阶级。他们不仅承担着沉重的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而且仅有的一点土地还常常被贵族地主霸占去，特别是在1846—1847年，贵族霸占农民土地的情况发展得更为严重，他们在“整顿”地界的借口下，将大批农民从他们祖传的土地上赶走。流离失所的农民被迫成群结队地逃到森林里。许多地区的农民，为了活命便揭竿而起，举行起义。当时，农民起义的领袖是一个人数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大多数是下层教士、边境农民甚至农奴的子弟。他们在领导革命方面是最激进的分子，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领袖是阿夫拉姆·扬库。扬库出身于富裕农民的家庭，曾当过律师。他是1848—1849年特兰西瓦尼亚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农民运动的著名领袖。他对农民的疾苦深表同情，坚决要求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和封建农奴制度，竭力主张解放农奴，并把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号召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革命失败后，他一直隐居在深山中，直至1872年生命的终结。

在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尽管数量不大，但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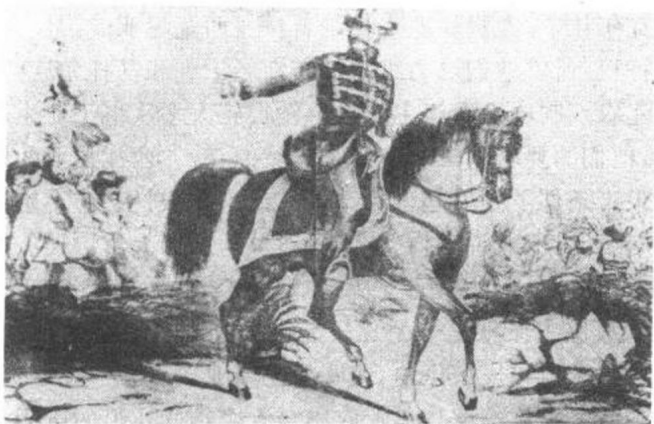


图 33 阿夫拉姆·扬库

有重要的使命。他们继承阿尔迪亚尔学派创始人的思想^①，极力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从而唤醒广大人民群众对共同文化遗产和自己民族权利的意识。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格·巴里齐乌于 1838 年在布拉索夫创办了《特兰西瓦尼亚报》和《思想、心灵的文学》。这两份报纸是刊登有关 3 个罗马尼亚公国的文章、消息和评论的最早罗文报纸，它们在宣传民族解放思想和启迪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觉醒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奥地利帝国的民族压迫和匈牙利贵族地主剥削的加强，引起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唤醒了罗马尼亚人的民族意识。3 公国的罗马尼亚人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运动的兴起。1830—1834 年，在巴纳特和锡比乌都先后建立了秘密团体，设有许多分会，并同瓦拉几亚的革命运动有着密切联系。1839 年，巴纳特人的秘密纲领提出了建立一个由摩尔多瓦·

^① 阿尔迪亚尔学派创始人的思想是：罗马起源和在古老的达奥亚领土上的连续性。

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组成的罗马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主张。1841—1847年,在西山地区爆发了长期的动乱;反对苛捐杂税。倍受压迫的农民拒不缴纳强加给他们的捐税,后来甚至自行使用公用的森林。特兰西瓦尼亚各地区的骚动与农民起义,是特兰西瓦尼亚革命条件成熟的重要标志。所以,在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的影响下,特兰西瓦尼亚也爆发了要求推翻封建农奴制度,保障资本主义自由发展,争取罗马尼亚民族解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革命的开始

佩斯3月15日革命的消息传到特兰西瓦尼亚以后,广大劳动人民以巨大的热情欢迎佩斯革命。在佩斯革命的鼓舞下,特兰西瓦尼亚的许多地区,如阿拉德、蒂米什瓦拉、克鲁日、特尔古—穆列什都发生了示威游行。在革命开始时,不论农民、知识分子或城市贫民,不分民族差别,都一致要求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联合起来。3月22日,特兰西瓦尼亚国民议会中的亲奥分子召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罗马尼亚农民和匈牙利农民,他们充分表达了在反对封建奴役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罗马尼亚人同匈牙利人团结一致的愿望。会议要求,以匈牙利为榜样,迅速地解放特兰西瓦尼亚农民,在特兰西瓦尼亚建立罗马尼亚人的学校和在罗马尼亚人聚居地区的行政机关中任命罗马尼亚人担任政府职务等。3月24日,西米翁·伯尔努齐乌教授发表宣言,要求承认罗马尼亚民族,主张废除农奴制。聚集在特尔古—穆列什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革命知识分子,于3月25日举行罗马尼亚—马扎尔大会,在会上,以阿夫拉姆·扬库和亚·帕皮乌·伊拉里安为首的罗马尼亚革命者,提出无条件地解放农奴、民族语言应受到尊重、承认罗马尼亚公民享有政治和自由的权利以及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联合等要求。3月28日,在克鲁日举行的另一次集会上,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又一次提出了民族权利的要求。总之,特兰西瓦尼亚人民的革命热

情像火山一样地迸发了出来。

与此相反，特兰西瓦尼亚国民议会中的匈牙利贵族地主，却对匈牙利革命表示冷淡，他们对于资产阶级改革，特别是农民的解放深为反感。因此，他们不愿召开国民议会，竭力拖延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的联合，妄图藉以阻止匈牙利“三月宪法”^①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传播。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当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贵族看到匈牙利政府坚定不移地维护马扎尔贵族的利益，并保证他们的财产不受侵犯时，他们便迅速地改变了态度，坚决主张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合并，并开始组织国民自卫军，藉以保护他们的财产，维护他们的安全，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特别是镇压罗马尼亚人的民族运动。不仅如此，匈牙利贵族还竭力拖延在特兰西瓦尼亚实施“三月宪法”的某些规定，继续要求服徭役和缴纳什一税。匈牙利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举行起义，如在比霍尔、阿拉法、卡拉什和塞特马尔等地都发生了占领地主庄园、草场和森林的农民运动；在克鲁日、特尔纳瓦河流域和西山地区也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但是，这些农民运动都遭到了匈牙利贵族的残酷镇压。这种状况就更加深了罗马尼亚民族和匈牙利民族之间的矛盾，压抑了本来很活跃的罗马尼亚人与马扎尔人共同斗争的思想，促使罗马尼亚人联合成一个单一国家的思想更进一步的形成。主张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联合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力量也就大大地削弱了。

这时，匈牙利革命政府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极端错误的立场，它不愿承认除匈牙利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奥地利政府便利用这一点，发动宣传攻势，宣布奥地利帝国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样，奥地利就争取了一部分罗马尼亚人，孤立了革命的匈牙利。

^① 详见第八章。

布拉日人民大会

从革命一开始,关于召开人民大会的消息已经在人民中间传播了。每个村庄都宣读了号召罗马尼亚人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4月30日布拉日人民大会的宣言。全国各地的农民,不顾当局的恐怖措施,冲破重重困难与阻挠,前来参加大会。成千上万的克鲁日农民在开会之前就来到了布拉日,他们怀着废除农奴制和求得民族解放的强烈愿望来参加大会。匈牙利的农民也怀着同样的愿望来参加大会。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斗争目标,与罗马尼亚农民站在一起。参加大会的还有革命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阿·扬库、西·伯尔努齐乌、扬·布特亚努等。此外还有来自两公国的学者和革命者:瓦·阿·亚历山德鲁、迪·布勒蒂亚努、科斯塔凯内格里等。伯尔努齐乌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明确表示,废除农奴制和使罗马尼亚人享有一切权利的时刻到来了。同时,他号召更多的人参加5月3日即将在布拉日召开的国民大会。这次大会显示了特兰西瓦尼亚强大的革命力量。

大会前夕,即5月2日,在布拉日大教堂召开了一次确定大会纲领的会议。罗马尼亚人的三个派别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一派是以主教安·沙古纳和伊·列梅尼为首的赞成同维也纳谈判的忠实派;另一派是乔·巴里齐乌和蒂·契帕里乌领导的民主自由派;第三派是西·伯尔努齐乌、阿·扬库和亚·帕·伊拉里安领导的革命民主派。西·伯尔努齐乌的意见得到了与会各派的赞同。他主张,赞成和欢迎匈牙利废除农奴制,但是,他反对特兰西瓦尼亚同匈牙利合并,并建议宣布在自治的特兰西瓦尼亚范围内承认罗马尼亚民族。

5月3日,国民大会在布拉日自由广场上正式开幕。参加大会的有4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还有知识分子、僧侣、资产阶级分子和少数几个小贵族。此外还有摩尔多瓦流亡者和瓦拉几亚

的革命者。大会的主席是安·沙古纳和伊·列梅尼，副主席是西·伯尔努齐乌和乔治·巴里齐乌。在西·伯尔努齐乌的建议下，通过了一项动议，宣布罗马尼亚民族为“独立自主的民族”，是“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特兰西瓦尼亚的组成部分”。接着便进行了宣誓。誓词声称“将尽可能致力于废除农奴制、解放工商业和维护正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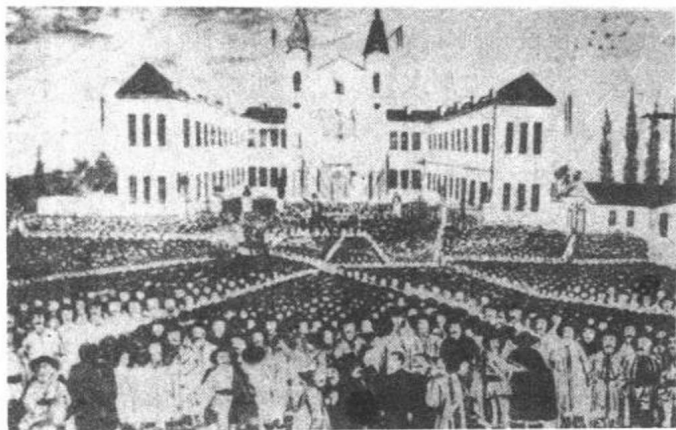


图 34 布拉日大会

第二天，即5月4日，奥·特·拉乌里安把一份“国民请愿书”提交大会通过。请愿书共16条，又称“十六条纲领”。它包括：罗马尼亚民族代表应参加国会、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罗马尼亚国民自卫军；无偿地废除农奴制和什一税；每年召开一次罗马尼亚国民会议；建立各民族按比例产生的代表机关；在学校里使用本民族语言教学，用国家基金开办一所罗马尼亚语大学。在各种机关团体里使用本民族语言；保证工商业自由和取消同邻国（即同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的关卡；公民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废除书报检查；对罗马尼亚学校及罗马尼亚教会实行国家奖金；选用罗马尼亚民族教师；取消罗马尼亚东正教对卡尔洛维茨塞尔维亚东正教大主教的依附关系；承认常设的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修

改关于把农民土地、森林、牧场让给地主的决议以及拒绝剥削阶级在既违背大多数居民意志而又不同他们的代表商量的情况下策划的联合^①。由于纲领符合罗马尼亚人的愿望，所以，大会热烈地通过了“国民请愿书”。

纲领宣布以后，布拉日人民大会便决定派出两个代表团：一个是由主教安·沙也纳率领的代表团向奥地利宫廷提出罗马尼亚人的16条要求；而另一个代表团由主教伊·列梅尼率领，要求克鲁日国会将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合并”的问题推迟到召开一次由罗马尼亚人按其重要性派代表参加的会议。还成立了一个常驻锡比乌的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大会的第三天通过了会议纪要，并成立了第一个罗马尼亚国民卫队。

布拉日人民大会是特兰西瓦尼亚革命的重大事件，它制定了革命纲领，大大加强了罗马尼亚民族意识和建立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思想。

然而，特兰西瓦尼亚国民议会对罗马尼亚人在布拉日所提出的要求却置之不理。5月29日，特兰西瓦尼亚国民议会在克鲁日开会，在没有罗马尼亚民族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投票通过了与匈牙利合并的决议。而且国民议会宣布匈牙利语是特兰西瓦尼亚唯一的官方语言，并拒绝给予罗马尼亚人以参与地方行政和学校事务的平等权利。数日之后，奥地利皇帝批准了这个决议，同意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合并。

布拉日人民大会派出的代表团到达奥地利宫廷所在地因斯布鲁克时，奥皇斐迪南一世已经批准了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合并的决议，所以，代表团只是从奥皇那里得到了尊重“罗马尼亚人的自由与平等”的含糊不清的答复。

^① 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等：《罗马尼亚通史简编》，第263—264页；维诺格拉多夫等：《罗马尼亚近现代史》，第37页。

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合并的决议，激起了全体罗马尼亚人的愤懑，使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在匈牙利本国，革命诗人山多尔·裴多菲领导的《三月十五日报》对仓促采取这一步骤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指出特兰西瓦尼亚国会最多也只不过代表几百人，它采取这个步骤是违背大多数居民的意志的。

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匈牙利以后，从5月29日起，匈牙利的“三月宪法”开始在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生效，宣布取消封建义务。但是，仍然掌握行政权的匈牙利贵族地主不仅拖延执行这个宪法，而且还搬出多年前在代役租和徭役方面农民所欠的旧帐，强迫农民作工偿还。结果，更加激起了农民的愤怒。他们不断举行起义，拒绝为地主服役，并要求贵族地主将霸占去的草地归还他们，但遭到了匈牙利自卫军的残酷镇压。当特兰西瓦尼亚的广大劳动人民奋起斗争的时候，特兰西瓦尼亚当局指责布拉日人民大会的领导人“唆使”群众反对政府，开始逮捕他们。这些领导人中有些人被捕入狱，有些人则躲藏到罗马尼亚边防团区和山中。特兰西瓦尼亚的形势十分紧张。

日益紧张的形势，促使1848年9月3日至13日再次召开了布拉日大会。这一次，两万多农民和手工业者都全副武装地参加大会，他们手持大刀、长矛、火枪和钢叉。会议要求特兰西瓦尼亚当局停止恐怖行动，取消讨伐队，调整土地问题，取消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匈牙利的决议，建立罗马尼亚国民自卫军，成立新的特兰西瓦尼亚国会，让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根据其人数多少，按比例选出代表参加国会。会议闭幕以后，农民加紧了武装。但是，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革命者仍然力图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他们向匈牙利发出了备忘录和致马扎尔民族宣言等，均未得到答复。匈牙利革命领导人仍然坚持错误，不给马扎尔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以平等的权利，更不愿失去马扎尔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权。

因此,这不仅不利于两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为奥地利宫廷利用民族矛盾稳定自己的统治提供了方便条件。

反奥斗争

10月,特兰西瓦尼亚成立了15个罗马尼亚军团,开始了为特兰西瓦尼亚脱离匈牙利管制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同时,在锡比乌还成立了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罗马尼亚人把它看作是自己的真正的政府。在罗马尼亚人同马扎尔人的民族矛盾尖锐化以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便拉拢锡比乌的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利用民族矛盾,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加紧了对革命力量的镇压。1848年秋,哈布斯堡王朝在镇压了帝国其他地区的革命以后,便对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采取了行动。1848年8月,当匈牙利革命政府成立自己独立的军队时,哈布斯堡王朝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代理人便煽动罗马尼亚人反对匈牙利人,造谣说:“匈牙利人企图用战争强迫奥皇取消关于解放罗马尼亚农民的决定。”^①同时,他们企图利用罗马尼亚的武装力量,对付革命的匈牙利。1848年9月6日,当耶拉契奇大举进攻革命的匈牙利时^②,奥地利政府便唆使罗马尼亚农民举行起义,以配合耶拉契奇的进攻,反对匈牙利革命和革命政府。所以纳索德边区的农民在起义时,号召“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要站在皇帝一边,奋起反对匈牙利人的奴役与压迫”^③。这时,奥地利的普赫涅尔将军除指挥1.7万名奥皇军队外,还控制着几千名用马刀和镰刀武装起来的罗马尼亚起义者。普赫涅尔标榜“中立”,实际上切断了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的联系,并于1848年11月,占领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大部分地区。政权转入奥地利军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487页。

② 详见第八章。

③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487页。

官手中，锡比乌的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完全被奥地利政府所利用。这时，来到特兰西瓦尼亚的伯尔切斯库呼吁这个委员会摆脱奥地利的监督，但没有成功。

1848年11月18日，奥皇军队进入克鲁日。当普赫涅尔将军断定特兰西瓦尼亚的反抗力量已被摧毁，特兰西瓦尼亚已控制在奥军手中的时候，他便立即掉转枪口，对准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对匈牙利军队作战的同盟者，即武装起来的特兰西瓦尼亚农民。他要求农民立即放下武器，解甲归田。但是，在加博尔·阿隆的领导下，特里亚、斯卡乌纳等地的人民仍进行着顽强的抵抗。这里的男女老少都全力以赴地制造火药和武器，供应军队的需要。到了12月中旬，特兰西瓦尼亚的革命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时，匈牙利政府派卓越的军事家、波兰革命者贝姆所率领的一支匈牙利军队进入了特兰西瓦尼亚。贝姆希望在击退奥军征服特兰西瓦尼亚以后到波兰去，解放波兰。他在这支军队中建立了铁的纪律，使这支军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贝姆进入特兰西瓦尼亚以后，便采取迂回战术和出其不意的办法阻止了奥地利军队的进攻。12月19日，在巴亚·马雷的南面取得了普赫涅尔军队的胜利，打开了沿索梅斯河的广阔平原深入特兰西瓦尼亚的道路。尔后，于12月25日收复了特兰西瓦尼亚的重要城市克鲁日。贝姆在这里宣布对起义者大赦，并向特兰西瓦尼亚的全体人民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同匈牙利人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暴政。呼吁书是这样结束的：“互相伸出手来，结束民族分裂！在我们面前开辟了幸福的未来。”^①在罗马尼亚革命领导人中只有扬库一人同意和贝姆谈判。但是，匈牙利政府的特派员恰尼公爵阻止了这件事。他宣布贝姆的大赦无效，并在特兰西瓦尼亚建立了许多非常法庭，实行大规模的绞刑。恰尼的所作所为又一次加深了罗马尼亚人与匈牙利人的民族矛盾。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4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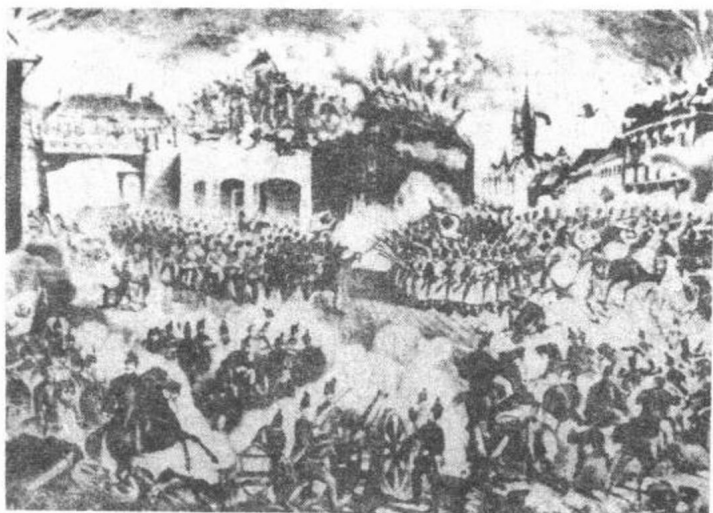


图 35 贝姆将军率领的革命军攻占锡比乌

1849年春,贝姆又先后在特尔古—穆列什和皮什卡取得了对普赫涅尔的胜利。普赫涅尔在遭到惨重失败以后,便请求俄军司令部给予援助。占领瓦拉几亚的俄军统帅利杰尔斯立即给普赫涅尔以援助。俄军占领锡比乌与布拉索夫以后,使普赫涅尔得以重振旗鼓。他以两倍于贝姆的优势兵力向贝姆发动进攻。贝姆转移到西部,3月11日到达锡比乌,经过小的战斗,占领了锡比乌。3月20日,贝姆又占领了布拉索夫,从侧面打击了普赫涅尔,迫使他率部退至瓦拉几亚。这时,奥地利军队和前来支援他们的沙俄军队被全部驱逐出特兰西瓦尼亚。此后,贝姆使用最大的精力组织特兰西瓦尼亚的管理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对贝姆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写道:“当特兰西瓦尼亚为他控制的时候,他防止了马扎尔人特派员打算采取的毫无意义的和不讲策略的残酷

手段，因而受到人们的尊敬。”^①

争取革命力量的联合

尼·伯尔切斯库、阿夫拉姆·扬库、贝姆以及其他革命民主主义者一直为争取实现革命力量的联合，打击共同的敌人而努力。在罗马尼亚与马扎尔的接近与和解的问题上，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在匈牙利人士中也逐渐加强了这样的信念，即不给以前被压迫的各族人民以民族权利就会葬送革命，所以他们也希望各民族能够团结起来。罗马尼亚革命民主主义者尼·伯尔切斯库为此作出了更大的努力。1848年秋，伯尔切斯库和他的战友付利亚克到达锡比乌以后，便全力以赴地为匈牙利革命和罗马尼亚革命联合起来而努力。他们在锡比乌出版了报纸，利用报纸尖锐地揭露了奥地利政府利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间的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分裂，妄图藉以削弱革命、扼杀革命的反动政策。付利亚克在他对罗马尼亚人的第一份呼吁书中写道：“罗马尼亚兄弟们！现在全欧洲都在进行着同样的斗争，即制造民族之间的敌视与误解。各民族如果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那么，这种敌视就会不存在了。”^②尼·伯尔切斯库、付利亚克等革命领导人是从更广泛的、欧洲的范围来理解革命的，因此，他们认识到革命是针对日益危险的国际反动派的。在伯尔切斯库起草而经扬库同意的关于匈牙利人与罗马尼亚人的和平法令中写道：“由于匈牙利民族与罗马尼亚民族有着共同的地理位置、共同的利益，并在维护自由的同一旗帜下战斗，所以这两个民族应该互相支援。”^③贝姆将军也始终呼吁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联合起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贝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34—135页。

②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490页。

③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490页。

1849年春，伯尔切斯库在德布勒森与以科苏特为首的匈牙利革命领导人进行了接触。这时，阿夫拉姆·扬库在西山与匈牙利议会议员伊昂·德拉戈什进行了谈判。德拉戈什以全权代表的身分宣布，在罗马尼亚起义者放下武器的情况下，匈牙利政府同意承认罗马尼亚文化和行政机关的完全自治。4月25日，扬库召开了起义者领导人会议，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德拉戈什代表科苏特所提出的建议，但会议要求签订停战协定。这时伯尔切斯库便在德布勒森提出了签订停战协定的要求，科苏特答应了这一要求，于是，5月5日在阿布鲁德，德拉戈什与扬库以及集合在那里的其他罗马尼亚领导人签订了停战协定。

但是，就在同一天，一支拥有1500人的所谓匈牙利“自由军”在冒险家哈特瓦尼的指挥下，对阿布鲁德进行了挑衅性的袭击，他置停战协定于不顾，把许多罗马尼亚领导人俘虏了。罗马尼亚革命者扬·布特亚努被绞死。扬库和所有起义者认为这是德拉戈什和匈牙利政府的背叛行为，于是又重新拿起武器，消灭了这支匈牙利军队，并绞死了德拉戈什。民族的对立使革命双方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这时，考虑到革命的共同利益而支持和解的阿夫拉姆·扬库致函匈牙利领导人，他用富有说服力的言词写道：“马扎尔兄弟们，……采取别的办法同我们谈判吧！应当坚信，我们的争吵无论何时也不应当再用武力去解决。”^①从阿夫拉姆·扬库的全部活动来看，他是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当中一位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他把匈牙利人民与专横的、反动的、沙文主义的贵族截然区别开来，并对匈牙利人民的民主愿望，像对本民族人民的民主愿望一样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经过由于匈牙利领导人的拖延而旷日持久的艰巨谈判，只是在沙皇俄国干涉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革命时，伯尔切斯库、付利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490页。

亚克和科苏特才于1849年7月14日在塞格德签署了罗匈媾和草案，这是双方妥协的结果。草案共有18条，包括一项关于保障罗马尼亚人最起码的民族权利和罗马尼亚—匈牙利进行革命的政治合作的原则声明，以及有关组织罗马尼亚革命军的规定。关于罗马尼亚民族权利，草案规定，在罗马尼亚人占多数的地区，他们可以在行政机关和法院里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语言，国家必须在这些地区创办用罗马尼亚语教学的学校，罗马尼亚人获得大赦。在建立罗马尼亚军队的条文中载明，两个民族“必须互相援助，在一个旗帜下，共同战斗……捍卫自由”。而对于农民则规定，立即免除他们的一切封建义务，地主利用权力强迫农民接受的一切契约均属无效，非法强占的土地应予归还，被烧的村镇必须修复。但是，这些规定只是在匈牙利革命已经临近失败的日子，即7月28日才得到承认。正如1848年8月3日阿夫拉姆·扬库对伯尔切斯库所说的那样，共同行动的时机已经错过了。

沙皇俄国的反革命武装干涉

沙皇尼古拉一世早已密切地注视着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事态的发展，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出兵镇压，所以当奥皇弗兰茨·约瑟夫请求沙皇尼古拉一世支援时，他便欣然同意了奥皇的请求。1849年6月，沙皇俄国派出38500人的俄国军队，与为数1.4万人的奥地利军队同时侵入特兰西瓦尼亚。这时，贝姆在特兰西瓦尼亚总共只有3.8万人的兵力。俄军侵入特兰西瓦尼亚以后，贝姆试图攻入摩尔多瓦以骚扰敌人后方，结果失败，他又回到特兰西瓦尼亚。7月29日，在舍斯堡附近，被数倍于他的俄军击溃。但是，这位一生极端仇视俄国的革命家并没有气馁，他以顽强的意志、充沛的精力迅速重整残部，并于8月5日再次占领了海尔曼施塔特，因得不到增援，不久只好放弃这个地方。在8月7日的战斗失败以后，他又到匈牙利，率领残部在卢果日进行最后抵抗。失败后，他又进

入特兰西瓦尼亚，继续同占绝对优势的俄军作战，直至8月19日，他才逃到土耳其避难。

1849年8月13日，停战协定在阿拉德附近的希里亚签订，轰轰烈烈的特兰西瓦尼亚革命被沙皇俄国的反革命武装干涉绞杀了。^①

1848年罗马尼亚诸公国革命是罗马尼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充分表达了罗马尼亚人民数世纪以来要求社会正义、民族自由和进步的决心。这次革命是1821年革命的直接继续。它是上个世纪前半叶末席卷欧洲的伟大的革命更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848年罗马尼亚诸公国革命具有共同的目标。在革命的旗帜上都书写着同样崇高的理想：废除农奴制、争取民主自由、摆脱外国统治，实现民族的统一和独立。1848年罗马尼亚诸公国的革命运动虽然先后遭到了失败，但是它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特别是在瓦拉几亚，新的资产阶级政权取代封建政权整整3个月，并制定了宪法纲领。马克思高度评价了瓦拉几亚革命。他说：“瓦拉几亚人推翻了旧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他们要改变整个旧制度，并且要按照各文明国的榜样建立自己的制度。”^② 1848年这场社会革命鼓舞了罗马尼亚人的革命斗志，唤起了罗马尼亚人的民族意识；表达了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人民要求摧毁旧的封建关系、在同一个国家境内实现民族统一并在进步与民主道路上坚定不移地前进的坚定信念；为后来的1859年的罗马尼亚的统一作了组织上、思想上和革命纲领上的准备。

① 安·奥采特亚：《罗马尼亚人民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4页。

② 马克思：《俄国的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47页。

第六章 1848年捷克、斯洛伐克 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节 奥地利统治下的捷克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居住的主要地区就是今天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三个地区,即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捷克人的故乡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斯洛伐克人的故乡是斯洛伐克。

匈牙利王斯蒂芬一世统治时期(995—1038年),斯洛伐克便依附于匈牙利,归匈牙利王国管辖。这时封建的捷克国家已经开始形成,到1526年摩哈兹战役后,捷克和匈牙利的一部分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原来依附于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也同时受哈布斯堡王朝的管辖。^①

1620年白山战役失败后,捷克便完全丧失了自治权。在弗兰茨一世(1792—1835年)执政时期,捷克已经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行省,受维也纳控制。从此之后,捷克也像奥地利帝国版图内的其他非德意志民族一样,遭到残酷的民族压迫与剥削。哈布斯堡王朝在捷克所推行的强制的德意志化,旨在阻挠捷克民族的发展,剥夺他们的民族权利,借以巩固专制政体,原封不动地保存封建关系,特别是保存天主教会这个最大的封建势力。直到19世纪中叶,捷克仍然处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

^① 详见第八章

自从捷克遭受奥地利的民族压迫以后，捷克的广大城乡劳动人民就没有停止过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斗争。1679—1680年弗利德兰的地主领地爆发的农民起义波及到许多地区；1705年伊赫拉伐城郊的农民起义；1713年科尔日姆边区的农民起义以及1775年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都是捷克劳动人民为反对奥地利的民族压迫和本国封建统治者而发动的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被政府当局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它表明捷克人民反抗异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坚定信念和英勇气概。

资本主义的发展

捷克虽然是一个农业国，但是，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外国资本，如富格家族、维杰尔家族及德国其他大商人和企业家的资本渗透，捷克的资本主义也发展起来了。18世纪40年代，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失败以后，便丧失了著名的纺织工业基地西里西亚。这时，哈布斯堡王朝便试图在其他地方，特别是波希米亚寻找纺织工业基地，以代替西里西亚。这样一来，捷克的资本主义便发展得更迅速了。到了19世纪上半期，捷克已经成为奥地利帝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了。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在工业生产中，手工劳动逐渐过渡到机器生产，蒸汽机逐渐地普遍地投入工业生产，大量的自由劳动者从农村流入城市等。正是这些特点使捷克的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世纪40年代初，捷克的工业企业已达1389家，其中纺织工厂为412家。1841年，捷克86家纺织厂已经拥有机器1695台。当时，奥地利帝国所有纺织工厂的纱锭为90万支，其中捷克就占36万支。随着纺纱工业的发展，织布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当时捷克的织布工人已达到15万，摩拉维亚的织布工人为5万人左右。捷克纺织工业所使用的蒸汽发动机占全帝国的将近一半，而棉织品产量则占全帝国的3/4。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花布印染业也极

为普遍，拥有两万工人的印染企业就有 70 多个^①。

捷克不仅是奥地利帝国的纺织业中心，而且也是机器制造业中心。19 世纪 20 年代，捷克出现了新的生产部门机器制造业。30 年代末，在维特科夫铁厂建起了第一座使用焦炭的高炉。到 1841 年，在奥地利工业企业中使用的机器有 2/3 是布拉格制造的。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冶金工业的发展，先进的资金技术的传入使生铁和煤炭生产率都在迅速增长。从 1827 到 1841 年生铁和钢的产量增加了两倍多，沃斯特拉伐煤区的煤产量从 1820 年到 1850 年，差不多增长了二十四倍。

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也相应地发展了起来。农奴制的废除和农具的改革，特别是 1825 至 1827 年间，维维尔卡表兄弟制作的捷克犁以及耕地的定期轮换制代替了旧的三圃制，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和产品交换的需要，交通运输业也兴旺了起来。为了满足运输产品的需要，开始修建新的公路网，并注意发展航运。1817 年约·博热克机械师组装了蒸汽车和汽船，投入运行。^②铁路的建设更是一大进步。开始，火车是用马拉的，主要是为货运服务。1825 年从阿尔卑斯山的格蒙登到捷克布迭约维策的运盐铁路，就是第一条马拉线路。此后便开始使用蒸汽机车。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832 年铺设了由迭约维策到达林茨的铁路，1839 年，又修建了维也纳—伯尔热次拉夫—布尔诺铁路，到 1841 年，这条铁路又从布尔诺延伸到阿罗木茨，尔后又延长到波赫尼亚。这条铁路的修建促进了商品交流，促进了捷克工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① 茨·霍拉切克：《捷克工人运动的开始》，布拉格，1933 年，第 22 页；伊·斯维马：《1848 年的捷克》，布拉格，1933 年，第 68 页；姆·巴赫：《1848 年奥地利革命简史》，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 年，第 147 页。

^② 瓦·胡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8 页。

30—40年代的阶级状况与革命运动

捷克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后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形成。19世纪40年代,捷克的纺织工人已达15万之多,印染工人约7万,呢绒工人也达数万人。但是,捷克无产阶级的处境是非常悲惨的。他们劳动条件恶劣,不仅要在没有最起码的卫生设施的黑暗、不通风和无取暖设备的车间里劳动,而且劳动日平均长达14—16小时。工厂普遍使用童工和女工。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失业人数日益增加,工人工资日益下降,无产阶级的状况更日趋恶化。大贵族地主图恩在其与友人的通信中也不得不承认劳动人民的这种悲惨处境,他在信中写道:“从春天开始,大部分居民不得不吃霉烂的李子和草根。”^①

为反抗压迫与剥削,为争取生存和改善自己的处境,工人不断掀起捣毁机器和罢工的浪潮。纺织工人,特别是印染工人在斗争中表现得最为积极,他们建立了第一个工人互助会,酝酿举行罢工。1840年贝得若夫地区工人捣毁机器。1843—1844年,在布尔诺、布拉格、利贝雷茨等地都爆发了反对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的罢工斗争和群众示威游行,其中布拉格“波尔盖斯兄弟公司”的罢工斗争是规模较大的工人运动。但是,这时捷克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十分薄弱,无组织,缺乏阶级觉悟,因此,他们的斗争具有盲目的自发性质。

靠农业劳动维持生存的捷克农民常年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为了活命,他们只好在工业生产中寻找生计。但是,由于工业,主要是纺织业逐渐实行机械化,贫苦的农民和农村家庭纺织工,被迫加入了无产阶级的行列。虽然他们不时地举行起义和暴动,但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而且常常遭到政府的镇压。

^① 克·卡兹邦达:《1848年的捷克运动》,布拉格,1929年,第24页。

捷克的资产阶级多为中、小企业主，因为捷克的大工业企业都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德国资产阶级利用其统治民族的地位，依靠国家政权的支持及其经济实力，竭力压抑和限制捷克资产阶级的发展。这样一来，捷克资产阶级与德国资产阶级之间便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对立。捷克资产阶级为了冲破束缚其发展的桎梏，除迫切要求消灭封建专制制度，掌握国家政权外，还力图摆脱奥地利的民族奴役，争取捷克民族的独立。虽然在捷克资产阶级与德国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对立，但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目的与要求，并且在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口号下，曾共同进行了斗争。

捷克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大多是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达出来的，他们主要是用自己的文学、历史、拉丁语等著作唤起捷克人民的觉醒。如约·荣克曼的《捷克—德文字典》把捷克语的新形态固定下来，帕拉茨基的《捷克人民的历史》、希·马赫的天才作品《五月》等在评介捷克的光荣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唤起了捷克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觉醒。在1848年革命以前，捷克资产阶级当中已经形成了两个政治主张截然不同的派别。一派是由卡列尔·萨宾纳、约·瓦·弗利奇、瓦夫拉·什塔利斯基、埃·阿尔诺尔德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领导的激进民主派（布拉格三月革命失败后成立了激进民主党）。这个派别在革命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主张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取消贵族特权、废除封建义务、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另一派是由弗·帕拉茨基、弗·列·里格尔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布拉格三月革命失败后成立了民族自由党）。这个派别代表大资产阶级和部分贵族的利益，它在1848年革命前就已具有保守的性质了。这个派别主张与贵族结成联盟，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在与哈布斯堡王朝谈判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现存制度。

弗兰蒂什克·帕拉茨基(1798—1876年)是捷克资产阶级自

由派的著名活动家，也是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帕拉茨基出生在摩拉维亚的一个教师家庭。他曾任捷克民族博物馆捷克文和德文广告的编辑。从19世纪30年代起，帕拉茨基就积极地参加了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反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斗争。1836年，他的著作《捷克人民的历史》第一卷出版了。帕拉茨基的这部著作收集了捷克人民长期同德国侵略者作斗争的大量资料，促进了捷克人民的民族自觉。但是，在这部著作中，帕拉茨基却抹煞了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40年代，在捷克农



图 36 弗兰蒂什克·帕拉茨基

民和工人的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帕拉茨基竟公开主张捷克的资产阶级与贵族结成同盟，维护捷克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团结，反对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反对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同时，以帕拉茨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还倡导一种“奥地利斯拉夫理论”，其主要内容是维护与巩固摇摇欲坠的奥地利帝国。1846年1月帕拉茨基所创办的刊物上发表了哈尔卡克的《斯拉夫与捷克》，他写道：“奥地利专制制度是保护我们民族的最可靠的保证，奥地利帝国越强大，我们的民族就越巩固。”^①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主张，实质上已经改变了捷克民族运动的性质，将争取民族独立篡改为维护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捷克民族运动的这个反革命侧面，

^① 克·哈弗利切克·沃罗夫斯基：《政治手册》第1卷，第69页。转引自伊·伊·乌达里卓夫：《1848年捷克民族政治斗争简史》，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51年，第63页。

在1848年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以萨宾纳与弗利奇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1830年以后曾先后成立了“捷克俱乐部”、“读书会”并出版了《人民之歌》。1845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成立了“里皮尔协会”。参加协会的有作家、医生、艺术家、建筑师、化学家、大学生和资本家。领导这个协会的除捷克人外,还有德国人鲁别尔特。因此可以说,它是捷克人和德国人的民主协会,是两个民族具有激进情绪的知识分子代表的联合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深受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①“里皮尔协会”在1848年以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里皮尔协会”有了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它主张推翻哈布斯堡王朝、取消贵族特权、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废除封建义务、改善工人生活等。“里皮尔协会”的成员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领导许多小组和团体,并同工人保持联系。在“里皮尔协会”中,萨宾纳和弗利奇起了重要的作用。

约瑟夫·瓦茨拉夫·弗利奇(1829—1890年)是布拉格一位律师的儿子。他在1847年参加“里皮尔协会”,当时年仅18岁。在这之前,他曾到过伦敦与巴黎,在巴黎时曾参加了波兰流亡者小组,同阿达姆·米兹凯维奇结识,并在波兰邓宾斯基军事学校进行过短期学习。1847年5月他回到布拉格之后,便参加了“里皮尔协会”,并成为这个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弗利奇在巩固这个协会与布拉格工人之间的联系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卡列尔·萨宾纳(1813—1877年)是捷克卓越的诗人和政论家之一。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常年生活在贫困之中。按照弗利奇的话来说,他是“里皮尔协会”中一位非常有教养、政治上很成熟的会员。还在30年代,萨宾纳就因参加政治活动而受到警察的迫害,他

^① 克·斯拉维切克:《捷克的秘密政治协会“里皮尔”》,布拉格,1947年,第82页。

的诗歌也常因“不能容忍的思想内容”而多次被没收和禁止。萨宾纳与布拉格的无产阶级有着广泛的联系，在工人中有着很大的影响。



图 37 约瑟夫·瓦茨拉夫·弗利奇

由于这两个资产阶级派别的政治主张不同，他们对待革命、对待哈布斯堡王朝，对待广大革命人民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因此，在整个革命进程中，在许多问题上，他们都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斗争。

捷克的农民也像帝国其他各民族的农民一样，遭受着双重的压迫与剥削，处于对贵族地主的依附状态。随着土地的不断集中，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与年俱增，特别是所谓看家者^①的数目急剧扩大。广大农民承担着繁重的赋税与徭役。赋税达 240 种之多，其中有所谓葬埋税、猎犬税、蘑菇税、樱桃税和野菜税等等。此外，农民还必须承担僧侣和地主官吏的开支。但是，对农民来说，最沉重的负担还是徭役，徭役剥夺了农民的大部分精力与时间，农民为地主服役的天数，每年高达 104 天^②。破产的广大农民，一般都沦为看家者或短工。不堪忍受压迫与剥削的农民不断举行起义，反对奥地利的民族压迫与贵族地主的剥削，所以，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捷克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伏彼起。这时最大的

^① 看家者是指那些从地主那里得到一间茅屋和菜园旁的一小块土地，而为地主看管土地，并终年无偿地为地主劳动的无地农民。

^② 克·卡兹邦达：《1848 年的捷克运动》，第 24 页。

农民起义是 1796—1797 年的三月密谋。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即



图 38 卡列尔·萨宾纳

1821 年,在摩拉维亚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发生在兹诺伊姆边区,随之迅速波及布尔聂基和伊格拉弗边区。起义开始时,农民拒绝服徭役,遭到军队的镇压,但是,残酷的武装镇压和严刑拷打并没有使农民屈服,他们仍然坚持斗争,捣毁或烧毁地主的庄园。起义持续了将近 4 个月之久,最后被镇压下去了。持续不断的大小规模的起义虽然没有达到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目的,但是,这些起义表明,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了。

捷克的贵族阶级是哈布斯堡王朝在捷克进行统治的社会支柱。特别是大贵族地主,他们已经完全德意志化了,并且和德国贵族一样,无论在政治或经济上都享有种种特权,因此,他们的利益同哈布斯堡王朝及德国贵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捷克贵族中还有一部分贵族形成为贵族反对派,他们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也极为不满。他们所竭力维护的是捷克王国的“历史权利”,争取捷克等级议会的自治,并将其变为捷克的立法机关。但是,贵族反对派所掀起的“民族运动”,旨在恢复捷克贵族在中世纪所享有的封建特权,恢复中世纪的封建秩序。同时,由于贵族反对派的“民族运动”与资产阶级刚刚兴起的民族运动平行发展,在革命进程中,贵族反对派又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妥协政策,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进程和纲领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阻碍和束缚了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发展,并破坏了农民群众参加

革命的积极性。因此，贵族反对派的这种“民族运动”是倒退的和反动的。

第二节 捷克的3月与民主运动的高涨

第一次请愿书与圣瓦茨拉夫委员会

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在3月初就传到了布拉格，使布拉格的政治空气变得十分紧张。由于布拉格是捷克政治生活的中心，所以这些消息便立即从布拉格传到了各省，并在各省引起了骚动。3月初的日子里，在捷克的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政治传单。3月7日，在布拉格出现了要求保卫宪法、出版和人身自由的传单。传单这样写道：“兄弟们！我们一定要从皇帝和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制定宪法，宣布平等、自由、博爱。1848年3月20日将举行总起义。”^①

这时，“里皮尔协会”积极地开展了革命活动。“里皮尔协会”的领导人弗·哈乌契、列·鲁别尔特起草了致布拉格居民的呼吁书，呼吁书用德文与捷克文两种文字写成。呼吁书写道：“巴黎事件将整个欧洲从睡梦中惊醒。德国正在准备战争。首都的公民们！全国都在注视着你们。你们应该积极地行动起来，要求你们应享有的权利。你们应该真正地参预国家事务。”^② 呼吁书还提出了召开由各省市代表和农民代表参加的议会、武装人民和取消书报检查等要求。为了讨论这些要求，建议于3月11日晚6时在圣瓦茨拉夫游泳场集会。

^① 尼基京主编：《捷克斯洛伐克通史》，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59年，第2卷，第11页。

^② 瓦·弗利奇：《回忆录》，第2卷，第247页。转引自伊·伊·乌达里卓夫：《1848年捷克民族政治斗争简史》，第70页。

国内民主运动的高涨使以帕拉茨基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极为不安。还在3月5日，帕拉茨基就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忧虑地写道：“在这里，在布拉格，全体人民都为路易·菲力浦的垮台而兴高采烈，对于将来的后果他们却很少考虑。……我只希望，我们的活动不要离开秘密活动的途径。”^①

“里皮尔协会”为群众大会准备了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请愿书草案。请愿书草案共20条。其内容为：1. 各选区在平等选举的基础上选出贵族、僧侣、城乡居民的代表，共同制定宪法。宪法必须载明每年在布拉格召开议会，批准捷克境内的课税和法律。2. 出版和言论自由。3. 削减常备军。4. 在布拉格设立最高执政机关。5. 废除徭役、世袭法官和其他封建机构。6. 公布全国收支情况。7. 利用国库收入解决捷克境内的贫困状态，8. 捷克语和德语在学校和法庭中同等使用。9. 实行公开的和口头的审判程序和陪审制。10. 在社会机关中禁止雇用外国人。11. 国民自卫军军官应由选举产生。12. 皇帝至少每三个月到布拉格一次。13. 保障人身安全。14. 彻底改革政府制度。15. 集会自由。16. 信仰无条件的自由。17. 实行公社自治。18. 设立劳动组织和调整工资。19. 废除现行警察制，其职能由公民自己行使。20. 取消全部消费税。^②这个纲领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纲领，它所提出的要求多为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对于争取捷克民族独立的问题根本没有提到。所以，这个纲领是一个具有温和性质的纲领，不过，在当时的捷克，它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这时，以帕拉茨基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特别惧怕不断高涨的民主运动会发展成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独立发动。为了防止工人和农民的独立发动，为了使圣瓦茨拉夫游泳场的群众集会成为

^① 克·卡兹邦达：《1848年的捷克运动》，第24页。

^② 阿·克利马：《捷克的1848年》，布拉格，1948年，第30页。

温和的和效忠政府的大会，自由派便首先提出了共同筹备和召开这次大会的建议。于是，“里皮尔协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便进行了协商。根据“里皮尔协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协议，委托自由派的弗·布拉乌涅尔审定请愿书草案。

为了制止圣瓦茨拉夫游泳场的群众集会，政府公布了禁止群众集会并镇压其领导人的通令。布拉格市长缪列尔又向各行会领导人发布了在群众集会这天不允许帮工和徒工上街的命令。布拉格的大资产阶级派代表团谒见缪列尔，要求将军队调至城内，逮捕所有的“肇事者”，保护大资产阶级。

尽管政府竭力阻挠这次群众大会的召开，但是人民群众不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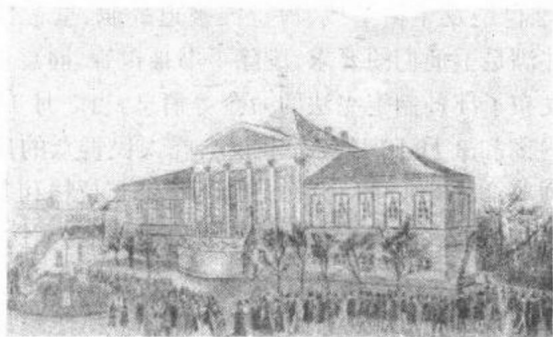


图 39 圣瓦茨拉夫游泳场

政府法令，在规定的日期，携带武器到达了圣瓦茨拉夫游泳场。所以，圣瓦茨拉夫游泳场的群众大会于3月11日按时召开了。参加大会的约3000人，其中大部分为工人和手工业者。

大会作出决议：以捷克地区所有居民的名义向皇帝递交请愿书。当大会讨论请愿书时，激进派在工人的支持下，要求在请愿书中加上废除劳役和建立劳动和工资组织。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调整工资、取消现存警察制度等条文。但是，对一些条文的讨论，在会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为了最后制定这个请愿书，便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即圣瓦茨拉夫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共29人，其中捷克人

有普·法斯切、普·特罗扬、弗·哈乌契等；德国人有列·鲁别尔特等。除此之外，参加委员会的还有磨坊主、制革师、商人和其他许多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自由派的建议，又选出了贵族代表弗·杰伊姆、布库阿、阿·弗伊特、维拉尼男爵和弗·特乌恩伯爵，但是特乌恩拒绝当选。3月15日，委员会又补充了19人，其中2名地主、2名工厂主、7名商人，其余均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工人和手工业者没有一人参加委员会。所以，圣瓦茨拉夫委员会是由捷克和德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以及少数贵族代表组成的。当然，它不会完全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这时，维也纳三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了布拉格。人们得知3月13—15日维也纳发生街垒战、梅特涅被迫辞职、皇帝接见了匈牙利代表团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废除了书报检查、同意成立国民自卫军以及发布了准备制定宪法的命令等消息，当3月17日匈牙利成立责任内阁和3月18日匈牙利议会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被迫通过一系列革命法令^①的消息传来后，整个布拉格和其他城市都沸腾起来了。捷克人民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增强了为实现社会、民族和政治要求而坚决斗争的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捷克地方议会议长斯塔吉昂便建议德国大资产阶级派代表与圣瓦茨拉夫委员会取得联系，以改变圣瓦茨拉夫委员会的性质，使其成为对现存制度没有任何威胁的组织。他们又公开宣布：“为了保证首都与各省的联系，防止可能发生的混乱和维护城郊的秩序，必须在布拉格郊区以及斯米霍夫和科尔林等地驻扎几个骑兵师。”^②同时，又根据大资产阶级的要求，在布拉格成立了国民自卫军，准备随时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

尽管地方当局及资产阶级自由派千方百计地将人民群众的革

① 详见第八章。

② 阿·克利马：《捷克的1848年》，第145页。

命运动纳入自己的轨道,妄图破坏圣瓦茨拉夫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在法国、德国和维也纳革命的鼓舞下,圣瓦茨拉夫委员会成立以后,便立即开始拟定请愿书。在拟定请愿书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激进民主派之间的分歧明显地表现了出来。“里皮尔协会”的会员坚持请愿书既要包括民族性质的要求,又要包括社会经济性质和政治性质的要求,也就是要包括无偿地取消徭役和其他封建义务以及成立劳动组织和调整工资等要求。资产阶级自由派则要求从请愿书中删去要求社会改革的一切条款。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张遭到了激进民主派、布拉格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3月17日,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要求圣瓦茨拉夫委员会保留有关社会改革的一切条款。在这种形势下,圣瓦茨拉夫委员会被迫作出让步,同意把这些要求重新列入请愿书。1848年3月19日,圣瓦茨拉夫委员会派代表团,携带着请愿书,出发至维也纳。与此同时,布拉格的大学生也向维也纳发出了请愿书,要求集会结社自由、讲授自由和在高等学校里捷克语与德语平等。

革命斗争的初步胜利,促进了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在布拉格,1200个印花布厂的工人要求政府采取具体措施,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巴尔杜比茨地区的农民试图进入布拉格,但地方当局阻止他们入城,并加强了军事警戒。激进民主派在军队中加强了宣传活动,他们号召士兵要牢记“军民是一体”,并且要和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反对他们,要像法国国民自卫军那样转到起义人民方面。

几天之后,向皇帝递交请愿书的代表团从维也纳回到了布拉格。它带回斐迪南一世的答复是:斐迪南拒绝在捷克境内成立独立政府的要求;而关于捷克、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联合的问题,以及恢复其政治组织和国家组织的问题则交3地区下一次的等级议会审定。斐迪南一世的答复显然是不能使捷克人民满意的,于是,人民群众便提出了重新提交新的请愿书的要求。

第二次请愿书与民族委员会的成立

3月28日,圣瓦茨拉夫委员会又拟定了第二次请愿书。它除重复了第一次请愿书的要求外,还强调提出,将捷克的要求交中世纪的等级议会审理是不符合捷克社会的利益的;同时,请愿书再次坚决要求成立捷克、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统一的制宪议会和责任内阁,其常设地点为布拉格。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圣瓦茨拉夫委员会中政治主张不同的两个派别的分歧越来越大了。3月末,两个派别的分裂已经形成。温和派在圣瓦茨拉夫游泳场宣布会议闭幕,而激进派则在另外的地方公开集会,其中起指导作用的是“里皮尔协会”成员。圣瓦茨拉夫委员会的分裂,标志着革命的继续深入,说明了在革命初期政治主张不同的派别联盟只能是暂时的,到革命的关键时刻,必然要分化、解体。

圣瓦茨拉夫委员会激进派的坚决立场及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引起了政府的极大不安。为了削弱激进派的影响,斯塔吉昂伯爵于3月29日命令选出一个由自由派、大资产阶级和贵族组成的“大公民委员会”,并宣布从“大公民委员会”选出之日起,圣瓦茨拉夫委员会必须解散。但是,斯塔吉昂的这一企图引起了布拉格的骚动。布拉格的革命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召开群众大会,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坚决要求保存圣瓦茨拉夫委员会,并从中驱逐了贵族。不仅如此,广大人民群众还坚决要求斯塔吉昂在第二次请愿书上签名。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斯塔吉昂被迫在请愿书上签字。可是,1848年4月初,他又藉口制定民族、土地、行政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草案而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并邀请圣瓦茨拉夫委员会中的自由派成员,如帕拉茨基、布拉乌涅尔、什特罗巴赫伯爵、聂伊别尔格男爵等参加该委员会。

这时,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波澜壮阔,规模之大,几乎席卷整

个捷克。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接连不断。许多地区的农民都拒绝服徭役和履行其他封建义务，有些地区的农民占领了地主的土地、牧场和森林，并进行了平分，有的村庄还赶走了村长。如贝得若夫地区的农民拒绝服徭役并砍伐地主的森林；赫鲁默茨领地的农民宣布：“每一个农民，至少必须得到6斯特里赫^①的土地，否则，暴乱就不会平息。”

不仅各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而且各省的工人运动也方兴未艾。布拉格工人提出10小时工作制的要求。3月中旬，赫腊德次州雷赫诺夫城呢绒工人要求州政府立即改善他们的状况，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支付呢绒工人补助金和解决工人的贫困问题等。当这些要求遭到政府的拒绝时，雷赫诺夫的失业工人便占领了市自治局，撕毁税册，武装袭击扎姆别列茨工厂。在包列斯拉夫地区，由于大批工人失业，引起了群众性砍伐森林的运动；但这些运动都先后被政府军队镇压下去了。

革命运动的高涨使捷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贵族集团极为恐慌。为了削弱群众的革命运动，斯塔吉昂及其所成立的特别委员会便讨论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一致认为，要想阻挡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首先削弱圣瓦茨拉夫委员会的影响，使特别委员会能够与之相抗衡，直至取消圣瓦茨拉夫委员会。为此，资产阶级自由派便试图在4月10日召开的会议上宣布取消圣瓦茨拉夫委员会，但是这个企图又遭到了激进派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

自由派的企图遭到失败后，斯塔吉昂又建议圣瓦茨拉夫委员会主席将该委员会与特别委员会合并。斯塔吉昂的建议被采纳了，于是两个委员会便合并为民族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40个成员中有70名为知识分子，捷克和德国资产阶级为50名，贵族和僧侣为20名。民族委员会处在资产阶级自

① 1斯特里赫约等于100平方米。

由派的影响之下,他们很快便成了这个委员会的核心力量。卡列尔·哈弗利切克的《民族报》成了自由派的机关刊物。

次日,即4月11日,向皇帝递交第二次请愿书的代表团回到了布拉格,带回了皇帝斐迪南一世对请愿书的答复,即所谓4月8日的“内阁文书”。在答复中,斐迪南一世除对某些条款,如建立捷克地区的责任内阁,承认捷克语和德语在国家机关中的平等地位等作了让步外,其他许多重要要求均未予以满足。关于捷克、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联合为统一国家的问题仍同前次的答复一样,交3地区下一次的等级议会审定。同时,“内阁文书”规定,任命皇帝斐迪南一世的侄子斐迪南-约瑟夫为捷克总督,任命列夫·图恩为捷克地方议会议长。

4月13日民族委员会正式开始工作。民族委员会的任务是为下届地方议会准备各种材料和草案。为了便于工作,民族委员会分为12个部门(分别负责宪法问题、农奴制关系、社会管理、学校事务等),实际上,民族委员会已成为捷克的政权机关了。

在捷克,尽管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蓬勃兴起。但是,这一时期群众运动的主要形式是请愿运动,即拟定请愿书和向民族委员会递交请愿书。在请愿书中,广大劳动人民描述了他们无法忍耐的悲惨状况,并要求取消封建义务。贝得若夫边区的一份请愿书这样写道:“我们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除了破烂不堪的茅屋之外,我们一无所有。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担负各种义务。沉重的负担压在我们这些贫民身上。”^①科瓦涅茨公社农民的请愿书要求:取消徭役,确立出版自由,取消等级议会,召开有人民代表参加的新议会,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公职人员、神父和牧师必须掌握民族语言的基本知识,法院独立,缩短服役期限等。

人民群众的这些请愿书都纷纷递交民族委员会。但送到民族

^① 尼基京主编:《捷克斯洛伐克通史》第2卷,第18页。

委员会的请愿书未经任何人审阅,就被放到民族委员会的档案里了。人民的请愿书起不到任何作用。

捷克资产阶级与德国资产阶级的分裂

捷克的革命运动开始时,布拉格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纲领,而是与捷克资产阶级的代表共同行动。当时许多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如乌费奥·戈尔恩、鲁别尔特等都强调与捷克人团结一致。根据德国诗人克·埃别尔特的建议,帕拉茨基起草了“布拉格作家声明”,在捷克和德国的作家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声明强调指出,在争取奥地利帝国内捷克王国自治的斗争中两个民族将团结一致。3月11日,在布拉格两个民族的作家会议上,又通过了具有同样精神的第二个声明。

但是,在声明发表以后不久,捷克资产阶级与德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便暴露了出来,特别是在4月8日“内阁文书”公布以后,矛盾便深化了。德国资产阶级认为,承认德语和捷克语享有平等地位是敌视德国人的行为,因此他们反对两种语言平等。这样一来,在民族委员会、国民自卫军和大学生组织中,捷克人与德国人之间的分歧便公开暴露出来了。随着大德意志情绪在布拉格德国人中间的增长,特别是法兰克福议会提出将奥地利帝国,其中包括捷克并入德意志联邦之后,双方的分歧与矛盾就更加激化了。

在邀请德国各地代表参加法兰克福议会时,德国资产阶级力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政府,以便结束当时德国的封建分裂状态,形成一个统一的德国资产阶级国家,在革命斗争中推翻封建制度、统一德国的尝试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德国资产阶级却又竭力奴役斯拉夫人。法兰克福议会所设想的未来的德国国家是包括部分波兰、捷克、摩拉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大德意志帝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革命的德国本来应该抛弃自己过去的一切,特别是对于邻国的人民。它本来应该在自己获得自由的同

时,也让一向受压迫的人民获得自由。然而革命的德国是怎样做的呢?它完全同意德国军阀过去对意大利和波兰的压迫,以及现在对波希米亚的压迫。”^①

捷克各政治派别的活动家都一致反对参加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并且指出,参加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就意味着同意将捷克并入德国。帕拉茨基表达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他在“致法兰克福”的信中表示,他不能促使德国达到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目的,因为他不是德国人,而是“斯拉夫民族的捷克人”。他还指出,法兰克福议会的目的是:“永远削弱奥地利,甚至使它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因此,他认为,维护奥地利帝国的完整和巩固奥地利帝国,“就成为,且必然成为不仅是我国人民的,而且是全欧洲人民,乃至全人类和整个文明的伟大和重要事情”^②。帕拉茨基反对建立囊括捷克等国的“大德意志帝国”,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维护奥地利帝国的完整和在信中所暴露出来的“奥地利斯拉夫主义”则是非常错误的。

关于参加法兰克福议会选举的问题引起了民族委员会内捷克人与德国人的分裂。由于捷克资产阶级拒绝参加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德国代表便退出了民族委员会,并于4月19日成立了以加尔特曼、格罗斯和黑杰尔为首的“制宪同盟”,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参加法兰克福议会和德国的统一。这样一来,民族委员会便成了捷克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机构。

不久,皮勒斯多夫部长代表维也纳政府宣布,法兰克福议会在帝国境内所有地区进行选举。这时,法兰克福委员会便派代表团至捷克,与民族委员会进行谈判。但是在谈判中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代表团只好毫无结果地返回法兰克福。当代表团在法兰克福议

^① 恩格斯:《布拉格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95页。

^② 伊·伊·乌达里卓夫:《1848年捷克民族政治斗争简史》,第96—97页。

会上谈到捷克拒绝参加法兰克福选举,并反对将捷克并入德国时,希林格便以挑衅的口吻说道:“我坚信,既然不能说服捷克留在德意志联邦内,那么,就必须用利剑使它归服德国。”^①法兰克福委员会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行径激起了捷克人民的强烈愤怒。所以,在捷克的68个选区中,有46个选区没有参加选举;捷克境内共选出18名议员,其中大多数是德意志人。

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和有害的政策,不仅被维也纳宫廷用来挑起民族纠纷,制造民族矛盾,而且也被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用来宣布“全民”斗争的口号,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离开阶级斗争,走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歧途。捷克资产阶级同德国资产阶级分裂以后,便试图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其他斯拉夫民族中寻找自己的同盟者。同时捷克资产阶级还企图通过斯拉夫人联合的力量,变哈布斯堡君主国为民族平等的民主联邦,而这个联邦能保证斯拉夫人在共同议会中占优势。因此,他们便倡议召开斯拉夫人代表大会,藉以利用斯拉夫人联合的力量和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节 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准备

1848年1月初,召开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想法就已经出现了。捷克资产阶级与德国资产阶级的分裂加速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4月中旬,捷克人、南斯拉夫人和波兹南的波兰人已经讨论了召开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草案。4月20日,草案第一

^① 尼基京主编:《捷克斯洛伐克通史》第2卷,第20页。

次公布。

在代表大会之前，斯拉夫国家的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流派对召开斯拉夫代表大会的目的是不相同的。捷克资产阶级活动家大多数是代表大会的积极组织者，他们力图在各斯拉夫民族的资产阶级中寻找支持者，并且在同德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夺取国内政治统治权的斗争中得到各斯拉夫民族的支持。参加代表大会的捷克贵族则企图利用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夺回自己失去的权利和特权。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活动家希望，代表大会能够迫使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家考虑匈牙利境内斯拉夫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并促进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其他地区的自治^①，加里西亚乌克兰地区的代表则希望在反对德国地主和波兰小贵族压迫的斗争中得到支持。

1848年4月25日奥地利政府公布宪法以后，召开斯拉夫代表大会的思想便得以实现了。根据宪法规定，行政权和军队的指挥权仍然保留在皇帝手中，取消封建义务必须采取赎买办法，议会的选举必须有财产资格的限制。宪法所“赐与”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递交请愿书以及陪审制等，都得不到任何保障。在宪法中，对于改善工人和手工业者状况的问题则置之不理。这部宪法不仅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且也使捷克资产阶级大失所望，这样一来，也就进一步推动了斯拉夫代表大会的召开。

这时，捷克、波兰和斯洛伐克的社会政治活动家组成了一个小组，讨论研究召开斯拉夫代表大会的步骤。1848年4月30日，他们在捷克作家沃采利家里集会。路德维希·什图尔建议集会者拟定致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呼吁书草案。经过讨论，通过了呼吁书草案。会议参加者要求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组织代表大会，于是，当天

^① 详见第八章。

便成立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会由 12 人组成，他们是：历史学家帕拉茨基、律师里格尔、历史学家哈恩卡、作家扎恩、男爵维拉尼、牧师和作家弗·什图尔茨、男爵尼别尔格、伯爵杰伊姆、作家沃采利、埃尔宾、语言学家伊奥尔丹和波兰人格日包夫斯基。此外又选出商人布拉列茨、卡什巴尔、律师雅罗什、啤酒酿造师姆诺乌切克和建筑师里包达 5 人，负责管理经济。伊·姆·图恩被选为委员会主席，尼别尔格男爵被选为副主席，扎普被选为秘书。^①伊·姆·图恩虽被选为主席，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任何会议。在筹备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帕拉茨基及其政见支持者。

次日，筹备委员会讨论了大会邀请书。在讨论邀请书时，委员会成员之间，首先是在波兰人与捷克人之间产生了分歧。波兰代表主张邀请书应向所有的斯拉夫民族发出，而代表大会的任务之一应促进波兰的复兴。而帕拉茨基则强调必须维护和巩固奥地利的统一和完整，反对邀请非奥地利统治下的斯拉夫人参加大会。^②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在沙法利克和捷克自由派的支持下，帕拉茨基的主张占了上风。最后决定，邀请书只发给奥地利统治下的斯拉夫民族。不过在邀请书的最后附有：如果其他国家的斯拉夫民族希望参加代表大会，那么衷心地欢迎他们作为客人参加。最后，筹备委员会确定斯拉夫代表大会于 5 月 31 日在布拉格召开。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纲领

筹备委员会活动的重要成果是制定了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主要包括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奥地利帝国各斯拉夫民族必须结成同盟的问题。纲领写道：“当同盟的某一成员的宪法自由或者民族独立遭到

① 兹·托博尔卡：《1848 年布拉格斯拉夫代表大会》，布拉格，1901 年，第 53 页。

② 兹·托博尔卡：《1848 年布拉格斯拉夫代表大会》，第 53—54 页。

国内外敌人的威胁时，所有同盟者必须互相援助和支持。”纲领还建议讨论签订这一同盟的形式和方法。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斯拉夫民族对帝国内其他民族的关系和建立奥地利联邦国家的条件。纲领在强调奥地利斯拉夫民族的自由同盟是民族平等的同盟时指出：“使其他民族屈从于自己的意志是完全不符合这个同盟的性质的。我们自己已经长期遭受别人的奴役，我们决不会把这种受压迫的不幸强加在其他民族身上。”纲领又写道：“如果帝国其他各民族：德意志人、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愿意和我们一起为巩固奥地利联邦国家而努力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衷心地向他们伸出友谊的双手。”为建立这样的国家，纲领建议在维也纳召开各民族有同等代表参加的议会。同时，纲领还谴责了马扎尔人继续压迫斯拉夫民族的政策，呼吁马扎尔人公平地对待这些民族，并且警告说：如果马扎尔人与斯拉夫人发生了流血斗争，那么，出席代表大会的斯拉夫民族“将站在本民族一边，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兄弟民族，而且是因为正义在他们一边”。

第三个问题是建议代表大会讨论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国家的斯拉夫民族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纲领只局限于提出巩固斯拉夫民族之间的联系，希望停止波兰与俄国之间的争吵和解放土耳其压迫下的斯拉夫人，并且还表示希望普鲁士和萨克森政府放弃迫使斯拉夫民族德意志化的政策。

第四个问题谈到了奥地利斯拉夫民族与欧洲非斯拉夫民族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纲领坚定地阐明了反对将奥地利领土全部或部分地并入德国的任何企图，并且建议代表大会抗议法兰克福议会的无理要求。^①

从筹备委员会的活动及其所拟定的纲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帕拉茨基的“奥地利斯拉夫主义”已经贯穿在代表大会的纲领中。

^① 伊·伊·乌达里卓夫：《1848年捷克民族政治斗争简史》，第122—124页。

帕拉茨基的这个理论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建立奥地利斯拉夫民族的自由平等的同盟是不可能的。如恩格斯所说：“如果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像波兰人、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一样，是一个紧密的实体，如果它们能够联合成为一个拥有 1200 万到 2000 万人口的国家，那末他们的要求倒会有一些认真的性质。但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已经像一个大楔子楔入他们中间，直抵喀尔巴阡山的最边缘，差不多已到达黑海，他们用一条宽达 60 到 80 英里的广阔地带把捷克人、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同南方斯拉夫人分开。”^① 加之各族人民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又各不相同，硬要把它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同盟，只能是一种幻想。同时，这个理论在当时符合欧洲反动派和沙皇俄国的反动对外政策，即维护和巩固奥地利的统一和完整，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藉以维持欧洲的均势和俄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由此可见“奥地利斯拉夫主义”在主观上是行不通的，在客观上是符合欧洲反动派、特别是沙皇俄国的利益的反动理论。而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所制定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纲领，无疑具有反革命的性质。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召开

5 月末，大部分代表到达了布拉格。代表都是著名的斯拉夫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活动家。捷克代表有萨宾纳、弗利奇、沙法利克、帕拉茨基、加夫利切克、布拉乌涅尔、伊·姆·图恩伯爵；波兰代表有利别尔特、马利什、留包米尔斯基公爵等；南斯拉夫代表有卡拉日奇、达恩契奇和弗拉兹等。所有代表都热情地欢迎代表大会的召开，特别是斯洛伐克人，他们在自己艰巨的民族斗争中期待代表大会给予援助。

参加代表大会的共 240 人，其中贵族代表 35 人，僧侣代表 16

^①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329 页。

人,其余几乎均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根据筹备委员会提出的大会工作程序,代表分为捷克、波兰—乌克兰、南斯拉夫3个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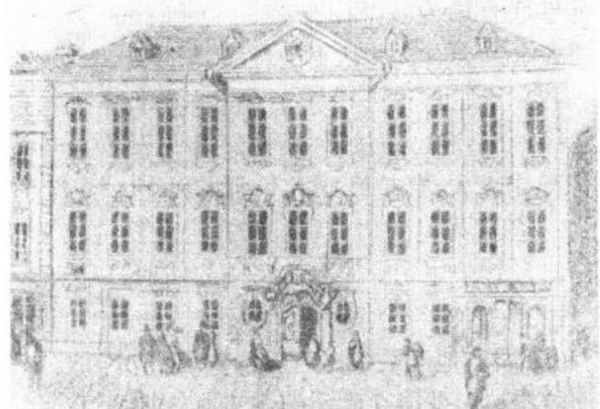


图 40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会址

6月2日,代表大会在布拉格隆重开幕。在会议大厅的中央悬挂着黑黄色的奥地利国旗,周围由其他斯拉夫民族的旗帜环绕着。这一点就说明了大会对奥地利帝国的忠心。代表大会由筹备委员会副主席聂伊别尔格主持。会议开始后,聂伊别尔格宣布帕拉茨基为大会主席,筹备委员会已完成历史使命,从大会开始之日起停止活动。

6月3日,分组讨论纲领的第一个问题。各组原则上同意为了互相援助必须结成斯拉夫民族同盟。但是,在讨论结成这一同盟的方式方法时,各组内部和各组之间都产生了分歧。捷克斯洛伐克组提出了奥地利斯拉夫观点。他们坚决主张把奥地利变为完全平等的联邦国家,在联邦国家里,每一个斯拉夫民族都享有独立权和拥有自己的议会。南斯拉夫组完全支持这个观点,但是,波兰—乌克兰组反对。波兰—乌克兰组的代表利别尔特提出了新的纲领意见,它要求应以资产阶级民主精神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资产阶

级的自由、改革选举制度、改善工人状况等。利别尔特所提出的纲领草案要求代表大会讨论如下的问题：起草《告欧洲各民族宣言》，阐明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原则和目的；拟定《致皇帝的请愿书》，说明奥地利斯拉夫民族的要求和签订斯拉夫民族同盟，以及确定实现代表大会的原则和目的的方法。斯洛伐克代表卢·什图尔也呼吁代表大会应坚决拥护欧洲革命的民主目标。最后捷克提出的奥地利斯拉夫纲领以多数人赞成而通过了。

6月12日，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在激进派的影响下通过了《告欧洲各民族宣言》。在宣言中，提出了在奥地利联邦内民族平等的原则，谴责了瓜分波兰的政策和匈牙利对斯拉夫人的压迫，号召普鲁士政府和萨克森政府放弃在波兹南、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所推行的，使斯拉夫民族丧失其民族特性的政策，表达了解放土耳其统治下的斯拉夫民族的愿望，提出了召开全欧代表大会解决国际问题的初步意见。这一宣言是代表大会唯一的一个文件。

1848年6月12日布拉格起义中断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国民自卫军指挥劳布科维茨公爵命令，凡不居住在捷克境内的大会代表，如波兰、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等代表，必须立即离开布拉格。这些代表离开布拉格以后，代表大会便宣布无限期地延期。“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结果，证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幻想是多么没有根据和虚无缥缈。”^①

1848年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按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其特点是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密切联合，相互支持。这次代表大会也像以前的民族运动一样，反映了斯拉夫资产阶级反对德国和匈牙利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次大会中，以帕拉茨基为首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起着领导作用，因此，在进行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时，他们能够把“奥地利斯拉夫理论”塞进代表大会，并作为大会的

^①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37页。

指导思想,把民族问题作为主要讨论的问题。在大会进行期间,帕拉茨基等自由派便竭力维护他们所制定的奥地利斯拉夫方针,即巩固和维护奥地利帝国的完整和统一的方针。由于参加代表大会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人数较少,力量薄弱,所以,帕拉茨基得以成功地贯彻了这一方针。

1848年欧洲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统治,推翻各民族的监狱奥地利帝国;另一重要任务是打击沙皇俄国。维护和巩固这个帝国的完整与统一,保持沙皇俄国在欧洲的优势,这无疑是维护和巩固欧洲和沙皇俄国的反革命力量,从而大大地削弱了革命力量,因此,布拉格斯拉夫代表大会在客观上起了反动的与倒退的作用。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激烈地批判了斯拉夫资产阶级,首先是捷克资产阶级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政策和“奥地利斯拉夫主义”。

第四节 布拉格起义

革命运动的高涨

正当捷克资产阶级和贵族在斯拉夫代表大会上忙于争论,指望奥地利维也纳政府发善心作出某些让步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已迅速席卷布拉格以至捷克全境。

4月25日以皇帝诏书形式颁布的宪法没有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更不符合人民的愿望,阿尔诺尔德在致农民的呼吁书中写道:“宪法仅仅是口头上的,它并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对人民来说,它不过是画饼充饥罢了。”^①

^① 尼基京主编:《捷克斯洛伐克通史》第2卷,第23页。

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对宪法的不满，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维也纳五月革命事件的消息，特别是皇帝斐迪南一世从维也纳逃到因斯布鲁克的消息传到捷克后，立即在捷克掀起了革命运动的高潮。在布拉格和外省都出现了大量的政治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广大工人和农民越来越多地参与了政治生活。还在4月9日，布拉格普尔日布拉姆城纺织工厂的工人就要求将冬季劳动日缩短为10小时，夏季为12小时。对这一要求，政府只是说应由工人与工厂主共同协商解决。工人对政府的答复十分不满，于是纺织工人便发动了暴动，并得到了其他工厂工人的支持。斗争的结果，只有几个工厂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日。维也纳五月起义的消息传来后，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限制使用机器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同时，各地的反封建斗争也大规模地展开了。资产阶级激进派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如物价上涨、工人失业、农民缺乏土地、手工业者贫困等，在农村进行了有力的宣传。他们在农村提出的主要口号是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他们在农民中散发许多传单，号召农民为取消徭役和其他封建义务而斗争。其中有一份传单的标题为《我们需要什么？》，这份传单提出了迅速取消徭役、保证工人工资和享有平等权利等要求，同时还号召德国人和捷克人团结一致。另一份传单写道：“统治者比狐狸还狡猾，比豺狼还狠毒。……我们不要相信他们，布拉格的公民和大学生们！不要相信他们。”^①

5月末，为对抗德国人的“宪法同盟”，捷克大学生成立了捷克大学生“斯拉夫同盟”，它是一个具有激进民主性质的组织，其口号是“自由、平等”。大学生“斯拉夫同盟”中还成立了以弗利奇为首的

^① 弗·鲁比克：《1848年的捷克农村》，载《捷克斯洛伐克农业博物馆画报》，1928年合订本，第3期，第268页。

军事小组，它的任务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大学生的活动，引起了自由派和统治者的不安和强烈反对。议会主席图恩伯爵为把日益强大的革命运动纳入“合法”轨道，便于5月18日公布一项法令：1848年6月7日召开捷克议会，并在捷克境内进行议会选举。

同时，原民族委员会的成员、自由派的特罗扬和乌尔姆布兰德男爵向图恩建议成立临时政府。最初，图恩是动摇的，但当维也纳5月26日起义的消息传来时，他便决定成立临时政府协商会，即临时政府。5月30日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参加临时政府的有帕拉茨基、里格尔、布拉乌涅尔、包罗什、律师什特罗巴赫、诺斯吉茨和乌尔姆布兰德伯爵^①。临时政府成立的目的是不承认维也纳五月革命，把权力全部集中在捷克议会主席图恩手中。所以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它不承认维也纳五月革命后所成立的新政府。

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临时政府对待维也纳五月革命的态度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一部分具有激进情绪的资产阶级，为了对抗临时政府，便成立了自己的委员会。委员会与维也纳革命者和波兰流亡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委员会成员也开始同捷克工人、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取得联系。这时，布拉格的革命形势已成熟了。就在这种革命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开始向布拉格推进。

文迪施格雷茨的挑衅行为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文迪施格雷茨是奥地利帝国的元帅，他是一个傲慢的贵族、哈布斯堡王朝专制制度的崇拜者。他主张使用武力镇压反对王位和专制制度的一切运动，1844年他就曾残酷地镇压了捷克的工人运动。

^① 姆·巴赫：《1848年德国革命史》，圣彼得堡，1906年，第318页。

自1840年起,文迪施格雷茨一直担任奥地利驻捷克军总司令。18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后,他暂时离开了布拉格,回到了奥地利。维也纳五月革命事件和皇帝斐迪南一世逃到因斯布鲁克以后,他认为返回布拉格的时机已到,于是,他通知国防部长拉图尔伯爵说:“我要回到布拉格去,我的职责在召唤我,因为事情关系到我们的专制制度、皇帝宫廷和所有诚实人的利益!”^①

文迪施格雷茨在回到布拉格以前,就已经作好了武装镇压捷克革命运动的计划。维也纳的军事档案材料表明,早在3月份,军事司令部就已制定了占领布拉格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6月初,文迪施格雷茨便经常进行军事检阅和训练,布拉格城驻满了军队。在别特尔任和维舍堡,文迪施格雷茨设置了大炮。

根据文迪施格雷茨的命令,步兵和骑兵都驻扎在城内,每条街道上从早晨5点到晚上9点都有哨兵巡逻,整个布拉格都处于战备状态。这种状态引起了布拉格各阶层居民的强烈不满,甚至温和派和自由派加弗利切克所创办的《人民报》,在6月8日也这样写道:“每一个诚实的人都以极大的不安注视着频繁的军事训练和检阅,而这些就是在公民的眼皮下进行的。无数的巡逻兵、接连不断的骑兵日以继夜地在布拉格街道上蠕动着。”^②同时,文迪施格雷茨一直和驻意大利和加里西亚的奥军保持着联系。克拉科夫起义被镇压后,布拉格和加里西亚的驻军司令部举行盛大的游行,庆祝胜利,并把克拉科夫的起义被镇压视为进攻捷克的信号。

但是,文迪施格雷茨所准备的种种挑衅和镇压措施并没有吓倒布拉格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准备反击。布拉格的大学生和维也纳的大学生保持着联系,要求文迪施格雷茨停止军事挑衅。6月8日,布拉格的大学生组织了大型

^① 伊·伊·乌达里卓夫:《1848年捷克民族政治斗争简史》,第172页。

^② 兹·托博尔卡:《1848年布拉格斯拉夫代表大会》,第176页。

会议。在会上，刚从维也纳返回布拉格的卡尔·斯拉德科夫斯基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要求撤销文迪施格雷茨驻军司令的职务，要求奥地利停止反布拉格的军事挑衅行为。

6月9日，布拉格街道上出现了许多标语，标语号召居民参加会议，讨论关于文迪施格雷茨军事威胁的问题。第二天下午10点在一个大学的礼堂——克列缅京乌姆集会，会上提出了关于从维舍堡、别特尔任撤出炮兵和取消克拉列宫兵营，以及交给大学生同盟一个装备炮兵营、2000支枪和8万发子弹的要求。同时，他们派出特别代表团向文迪施格雷茨的助手卡尔·弗迪南德大公提出上述要求。但是，弗迪南德声称，他不能全权代表文迪施格雷茨，并让代表团亲自去见文迪施格雷茨。

布拉格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劳布科维茨公爵指挥的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集合了起来。资产阶级激进派请求无产阶级，特别是在不久前罢工的裁缝工人和印花工人给予支持。遭到文迪施格雷茨拒绝的大学生怒不可遏，他们号召布拉格人不要向文迪施格雷茨让步。维也纳的律师吉夫特卢克在这时也宣布：“你们应该捍卫自由，在必要的时候修筑街垒。我们，维也纳的大学生们将教给你们和帮助你们修筑街垒。”^①

布拉格革命人民与文迪施格雷茨之间的对抗情绪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6月12—17日起义

在文迪施格雷茨拒绝大学生要求的当天，布拉格人民在圣瓦茨拉夫游泳场召开了大会。会上卡尔·斯拉德科夫斯基号召布拉格居民要求撤销文迪施格雷茨的职务，并将军队撤出布拉格。斯拉德科夫斯基宣布要以友爱的名义参加第二天举行的盛大集会，向

^① 伊·伊·乌达里卓夫：《1848年捷克民族政治斗争简史》，第176页。

文迪施格雷茨示威。示威游行的发起者号召布拉格工人，特别是失业人数较多的印刷工人参加示威游行。

6月12日早晨，在人们经常作礼拜的科恩广场聚集着人群，其中工人约有2500人。礼拜结束后，人群沿着布拉格的大街游行，其中一支队伍向文迪施格雷茨的住宅进发，以示抗议，但是，遭到了文迪施格雷茨掷弹兵的猛烈射击。这枪声恰巧成了号召起义的信号。

在布拉格的街道上立即出现了400多个街垒。^①工人、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都武装了起来，投入了抗击文迪施格雷茨的战斗。起义是自发的，没有一个固定的计划，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因此，每一个战斗小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街垒都各自为战，互不联系。而激进民主派的领袖，如弗利奇、萨宾纳、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也没能将起义者的行动协调一致。

但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和缺乏统一领导的起义者却给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参加起义人数最多、最积极的是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街垒里进行战斗的还有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大学生。在一些街垒中，还有德国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其中有德国激进派代表鲁别尔特。他们和捷克人并肩战斗在一起。

起义者逮捕了地方议会议长列夫·图恩。包德斯卡利埃区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将自己的居住区变成了堡垒，并修建了一条横过伏尔塔瓦河的浮桥，将包德斯卡利埃区和城市的其他区域联接起来。

布拉格革命事件的消息迅速传到外省，各地立即组织队伍支援布拉格。这时许多宣传鼓动家便分赴外省各城市和乡村，号召人民举行起义，并在农民中散发了许多传单。有的传单写道：“不纳税、不服役，立即拿起镰刀、叉子和其他武器到布拉格去。”萨宾纳

^① 阿·克利马：《捷克的一八四八年》第1卷，第504页。

在索包尼茨村的农民会议上，要求农民武装起来，随时准备自卫，在缺乏武器的情况下，用连枷、镰刀和叉子武装起来。其他的宣传工作者也以同样的精神进行工作。

在支援布拉格的口号下，革命运动几乎席卷捷克全境。在恰斯拉夫斯基边区，为支援布拉格派出了国民自卫军。在科林，有200名自卫军到达布拉格，集中在民族博物馆，帮助起义者修筑街垒。在包列斯拉夫、索包特克、姆尼霍夫—格拉吉什等地都有农民和国民自卫军支援布拉格。有人在描述德国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支援布拉格的情形时写道：“几百名德国人戴着黑色软边军帽，穿着袖上有红白条的短上衣，雄赳赳地出发远征了。”

随着支援布拉格革命运动声浪的高涨，反封建斗争也掀起了高潮。在贝龙、普拉亨、克拉托夫、劳克特、恰斯拉夫、塔博尔和其他边区，都发生了拒绝服徭役和砍伐地主的森林等革命事件。

为了制止起义和各地的配合运动，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袖们便企图在起义者与文迪施格雷茨之间进行调停。文迪施格雷茨声称，在起义者释放列夫·图恩伯爵和拆除街垒的条件下，停止军事行动。领导起义的激进民主派却表现出不能容忍的软弱，他们竟然释放列夫·图恩，拆除了小斯托罗恩区的街垒。但是，文迪施格雷茨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仍然继续射击。因此，斗争在新城和老城一直继续着。

列夫·图恩获释后，立即颁布了两个宣言。第一个是致布拉格公民的宣言，要求起义群众拆除街垒，停止反抗。在宣言中，图恩保证，只要起义者答应这些条件，一定将军队调回兵营，停止对城市的炮击，释放被捕的大学生和市民。第二个宣言要求支援布拉格的农民撤离布拉格，并警告他们打消入城的念头。但是，群众对议长的宣言置之不理，仍然继续斗争；为了回击图恩的宣言，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展开了群众性的宣传。

6月13日，布拉格张贴了由卡尔·斯拉德科夫斯基和加弗利

切克等所写的宣言。宣言指出，流血事件是文迪施格雷茨和国民自卫军军官挑衅的结果，他们应对此负责。宣言号召国民自卫军的士兵选举自己的新长官，要和人民站在一起。接着宣言提出了恢复秩序的条件：

1. 文迪施格雷茨伯爵立即离开布拉格。

2. 布拉格只需留下卫戍部队，它与市民和大学生一起，共同守卫城市。

3. 成立临时政府，作为对人民负责的内阁。

这时，两位政府全权代表从维也纳来到布拉格。一个是70岁的骑兵将军埃马努伊尔·米歇尔多夫伯爵，30年代，他曾任捷克的军事长官和宫廷顾问，另一个是负责捷克事务的内务部长约瑟夫·克列查斯基。他们两人到布拉格的目的是制止起义。为此，他们首先同起义者进行谈判。起义者的代表向他们提出立即撤销文迪施格雷茨的职务，将军队撤出布拉格的要求。为了缓和布拉格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米歇尔多夫将军打算暂时撤销文迪施格雷茨的职务。文迪施格雷茨对这一决定极为不满，便在军队中组织反对维也纳代表进行干涉的示威游行。文迪施格雷茨不仅继续炮击布拉格，而且以驻军司令部的名义宣布，如果撤销文迪施格雷茨的总指挥职务，那么，就把布拉格杀得鸡犬不留。6月15日，文迪施格雷茨与列夫·图恩一起发表了宣言，宣言声称：“无论新城或老城必须在明天十二点钟以前无条件投降，并且交出所有的武器。”

但是，起义者并没有放下武器，他们仍然继续战斗。当以帕拉茨基为首的自由派试图挫败起义，迫使起义者向文迪施格雷茨投降时，斯拉夫代表大会的一些激进派代表力图采取新的步骤，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起义的中心。同时，他们还设法将外省的国民自卫军和农民队伍调到布拉格来，以增援起义，可是为时已晚，文迪施格雷茨已经封锁了所有通往布拉格的道路，增援部队无法进入布

拉格。

6月16日，文迪施格雷茨和列夫·图恩向起义者发出了最后通牒。通牒除重复了上一次的要求外，又威胁说，如果起义者不能答应要求，政府除用炮击迫使城市投降外，是不会采用其他办法的。大炮已经放置在必要的地方，但是炮击城市将要等到明天中午。

这时，以帕拉茨基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又被最后通牒所吓倒，企图说服起义者接受政府和文迪施格雷茨的要求，停止战斗，向文迪施格雷茨投降，并声称战斗将是犯罪行为。6月16日帕拉茨基宣布说：“如果我们采取暴力，无论如何也不能胜过我们的敌人。”^①但是，起义者并没有听信帕拉茨基的说教，仍然英勇地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列夫·图恩伯爵宣布城市戒严，声称要把所有被捕的人交法庭审判，按战时法律制裁，而且军队将以最严厉的办法对付街垒，凡有8人守卫的街垒必予以炮击。与此同时，文迪施格雷茨发布了重新炮击城市的命令。这次炮击是所有炮击中最残酷的一次，它从根本上摧毁了起义者的力量，使古老的磨坊和水塔都燃烧起来，大火整整烧了一夜。

6月17日，被堵截在别霍维策车站的农民增援队伍与政府军发生了流血战斗。军队射击前来支援的农民队伍，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时，文迪施格雷茨仍然继续炮击城市。在强大的炮火轰击下，加之增援部队无法进入城内，起义者终于遭到了失败，只有一部分领导人得以逃脱。

起义失败后，布拉格特别军事委员会便对起义者进行残酷的镇压。起义者大批地被逮捕；数百名失业工人被逐出布拉格；不仅激进民主派，而且不符合他们的意愿的自由派，甚至保守派也惨遭镇压；民族委员会、临时政府委员会均先后被解散；杰伊姆伯爵、维

^① 兹·托博尔卡：《1848年布拉格斯拉夫代表大会》，第185页。

拉尼男爵和布拉乌涅尔博士等均被逮捕；所有民兵队伍都被解除武装；皇帝的诺言被完全遗忘。但是，政府并没能逮捕起义领导人弗利奇、斯拉德科夫斯基和米科维茨等。

这时，在外省，许多地方的起义农民同地主发生了冲突。捷克的大地主之一弗·阿乌埃尔别尔格被迫从自己的城堡逃跑。农民武装反抗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不断地传到布拉格。因此，政府在镇压了布拉格起义以后，便把主要力量放在镇压农民运动上。军队迅速派往全国各地，政府的特别法庭开始审理农民暴动事件和通缉暴动的参加者。

6月19日，文迪施格雷茨和列夫·图恩发布了新的命令，宣布在戒严状态解除以前，严厉禁止任何集会。6月23日，为恢复外省“秩序”，列夫·图恩又发布了命令，要求各地指挥官收集各地起义领导人的情况，并整理成正式材料，交付法庭，作为证明材料。命令还指出：“必须逮捕最危险的分子，从法律观点来看，他们无疑是犯罪的。”

至6月末，外省的革命运动也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布拉格六月起义是在捷克国内革命迅速发展，民主革命运动普遍高涨的形势下爆发的。它是一次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广泛的政治运动，是1848年捷克革命的高峰，是捷克人民革命的功绩。但是，德国资产阶级、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及后来的某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却毁誉这次起义是“捷克人反对德国人的纯民族性质的斗争”。这一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事实表明，在起义中，德国的许多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同捷克人并肩战斗。在德国人聚居的地区还派出了自己的自卫队支援布拉格起义。就是奥地利的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列夫·图恩在6月23日曾说：“布拉格起义并不是斯拉夫民族反对德国人的运动，而是反对政府和军队的民主运动，……所有革命者，不分民

族差别，都参加了革命。”^①他在致皮勒斯多夫的秘密信件中也同样强调：“不能把这次起义看成是捷克人反对德国人的运动。它是所有反对奥地利政府、宫廷和官吏的激进派所发动的一次革命运动。”^②马克思、恩格斯也猛烈地抨击了对布拉格起义的错误观点，并高度地评价了布拉格六月起义。^③布拉格起义的失败结束了以三月事件开始的捷克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尽管资产阶级召开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但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人民群众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尽管资产阶级自由派力图在捷克的政治斗争中取得领导地位，千方百计地将布拉格起义纳入民族斗争的轨道，但是，由于工人和农民的坚决斗争，资产阶级自由派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布拉格起义的失败从根本上扭转了捷克政治斗争的形势，此后，激进民主派的力量日益削弱，自由派的力量日益增强，反动势力日趋猖獗。

第五节 布拉格起义失败后捷克的民族运动

起义失败后的捷克政治状况

布拉格起义失败后，捷克的社会运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反革命势力猖獗，激进民主派遭到逮捕，自由派开始在捷克政治生活中起领导作用，并公开地与专制制度和贵族结成同盟。

布拉格起义被镇压后，奥地利政府为了利用捷克资产阶级的

① 伊·伊·乌达里卓夫：《一八四八年捷克民族政治斗争简史》，第190页。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36—238页。

民族运动达到其反对革命的目的，便竭力在捷克人与德国人之间挑起民族纠纷，并对捷克政治活动家许以种种诺言。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布拉格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再起，文迪施格雷茨的 4 万军队一直驻扎在布拉格。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自由派便公开地与专制制度结成同盟，帕拉茨基及其拥护者一致抨击布拉格起义，坚决反对武装的革命斗争。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由于对待布拉格起义态度的不同，导致了两派最后的、公开的分裂。这两个派别分裂后，便形成了两个政治主张不同的政党，即激进民主党与民族自由党。

激进民主党的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部分大学生和工人。这个党主张采取革命斗争的方法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认为，布拉格起义是人民的伟大功绩，并把武装起义视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唯一道路；主张争取普遍选举权、实行一院制、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与匈牙利革命者团结一致。这个党一直同德国民主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有弗利奇、萨宾纳等。

民族自由党的政治纲领和实际活动是利用布拉格起义失败后民主力量遭到镇压的形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在奥地利帝国内争取捷克自治的斗争轨道上进行民族运动。这个党反对布拉格起义，反对采取革命斗争的方法。它主张争取有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权、实行两院制、用赎买方式废除封建义务、反对维也纳的民主派和革命的匈牙利。这个党公开与贵族结成同盟，它的政治活动家主要有帕拉茨基、里格尔等。

所以，布拉格起义失败后，捷克境内的社会政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一时期中，民族自由党在捷克的政治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它所领导的民族运动也就成了捷克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奥地利议会的召开

7月中旬,在残酷的政治恐怖的形势下,举行了奥地利议会的选举。捷克境内选举的结果是:在捷克,选出55名捷克代表,35名德国代表;在摩拉维亚,选出20名捷克代表,18名德国代表;在西里西亚,选出9名德国代表和1名捷克代表。^①在捷克代表中,大部分是民族自由党人,其中有帕拉茨基、里格尔、加夫利切克、特罗扬、布拉乌涅尔和什特罗巴赫等。

议会于1848年7月22日开幕。以帕拉茨基为首的大部分捷克代表依附于议会的右翼。他们站在奥地利斯拉夫主义的立场上,主张联邦君主制。捷克民族自由党提出的口号是巩固和保卫哈布斯堡王朝



图41 卡列尔·加夫利切克

君主制,在议会上,捷克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里格尔也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这一观点。他在发言中说:“我们斯拉夫人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力量,它是用我们的金钱、我们的鲜血支撑着,它将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长久地存在下去,而我们所希望的也正是这一点。”^②

当议会于8月8日开始讨论关于选举权、废除封建义务等问题时,捷克的民族自由党完全支持政府的意见,主张以赎买方式废除封建义务,实行财产资格选举和实行两院制。但是,在议会上部分捷克代表反对他们的意见。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对取消封建义务问题进行了表决,其结果是在174票赞成,144票反对,36票弃权

^① 克·卡兹邦达:《1848年的捷克运动》,第312页。

^② 克·卡兹邦达:《1848年的捷克运动》,第313页。

的情况下通过了采取赎买方式取消封建义务的决议。捷克民族自由党的行动得到了奥地利政府的赞扬。

帕拉茨基等对革命运动的敌视态度，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议会讨论革命的匈牙利的问题上。1848年9月11日，在奥地利政府的指使下，克罗地亚的贵族耶拉契奇率军进攻匈牙利时^①，科苏特建议派代表团至维也纳，请求议会中奥地利人民的代表给予援助。9月18日匈牙利代表团到达维也纳。在议会讨论是否接受匈牙利代表团参加议会时，以帕拉茨基为代表的捷克民族自由党坚决反对匈牙利代表团参加议会。

这时，哈布斯堡王朝为迅速镇压匈牙利革命，便选定匈牙利贵族拉姆堡伯爵为匈牙利总督。这个任命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和反对。9月28日，拉姆堡到达匈牙利后的第二天，便被人民处死了。于是奥皇便以匈牙利人民处死拉姆堡为借口，对匈牙利宣战。为了制止皇帝对匈牙利的入侵，支援匈牙利革命，维也纳革命人民于10月6日举行了起义。^②许多住在维也纳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也参加了起义。

维也纳人民的革命发动吓坏了奥地利政府和议会中的部分代表，他们被迫仓皇出逃。以帕拉茨基为首的36名捷克代表在起义的头一天就逃出了维也纳。帕拉茨基等捷克代表逃出后，便立即发表声明，说什么，维也纳起义是“凶残的，因为它要用残杀和暴力毁灭政府，而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民是拥护政府的”^③。在这里，帕拉茨基等捷克代表的反对革命的立场已暴露无遗了。

帕拉茨基为讨得奥皇的欢心，建议议会迁至摩拉维亚召开。帕拉茨基的建议被奥皇采纳，议会迁至摩拉维亚的克罗麦尔日。1848

① 详见第八章。

② 详见第三章、第八章。

③ 伊·伊·乌达里卓夫：《1848年捷克民族政治斗争简史》，第231页。

年11月22日，议会在克罗麦尔日复会。议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奥地利帝国宪法草案。为制定宪法草案成立了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捷克代表有帕拉茨基、里格尔、皮恩卡斯等。由于在委员会里不能推行自己的观点，帕拉茨基退出了委员会。

1849年3月，奥地利政府利用在匈牙利的军事胜利，命令内务部通知代表团，包括帕拉茨基、布拉乌涅尔和皮恩卡斯：皇帝决定解散议会，亲自主持制定钦定宪法。3月7日，奥地利政府借助于军队，解散了议会，颁布了钦定宪法，即三月宪法。

1849年“五月密谋”及其失败

三月宪法不仅不考虑捷克人民的民主要求，而且连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的奥地利斯拉夫主义也不加考虑。宪法仍保持着捷克王国的分裂状态，确定捷克是统一的帝国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行统一的商业政策和关税政策，实行统一的帝国两院制。关于选举权，则必须有财产资格限制。所以，从1849年3月起，奥地利全面恢复了专制制度。

奥地利政府的倒行逆施，不仅引起了捷克激进民主党的不满，而且也引起了民族自由党的不满。这时民族自由党已开始明白，指望奥地利宫廷发慈悲是徒劳的，因此，他们宣布站在反对政府的“立场”上。但是，民族自由党并不是团结一致的，由列夫·图恩和托麦克所领导的民族自由党的极右派，公然宣称同意奥地利政府的政策。他们脱离了民族自由党，成立了政府“保守党”，公开主张在捷克恢复专制制度。而民族自由党的其他成员虽然宣布自己是政府“反对派”，但由于他们长期推行反对人民的政策，所以，它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无力取得重要的地位。

自从布拉格起义失败以后，捷克激进民主党虽然遭到很大损失，但始终没有停止革命活动。从1848年秋起，革命形势暂时高涨。激进民主党的报纸不断刊登攻击政府和同情维也纳革命和匈

牙利革命的文章和报道。农民反对封建制度、争取土地的斗争仍然处于高潮。这时，激进民主党能否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口号，是能否将农民吸引到自己一边的关键。1849年初，激进民主党在爱国组织“斯拉夫菩提树”中取得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个组织在农村小镇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激进民主党便通过这些组织向广大农民宣传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但是，由于激进民主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不够理解和估计不足，因此没有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口号。这样一来，他们在农村的活动受到严重的影响。在城市，激进民主党为了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便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宣传鼓动，直到以各种理由召开群众大会。例如，以纪念1848年牺牲的革命者的名义而组织的示威游行，就是为了反对颁布不久的三月宪法。这次示威游行的规模很大，几乎所有的布拉格居民都参加了。为此政府大为不安。当时布拉格警察给内务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示威游行对宪法、内阁和年轻国王的辱骂是空前的；在街道上、饭店里，到处都骂声不止，他们公开高呼：‘打倒政府，科苏特万岁！’”^①

激进民主党的活动并不局限于反对政府的宣传和示威游行。维也纳和匈牙利的革命斗争有力地鼓舞着捷克的激进民主党，将他们试图举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起义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弗利奇、埃尔诺利德和斯拉德科夫斯基等组织了秘密协会“捷克摩拉维亚兄弟协会”，这个协会与布拉格德国激进民主青年的秘密组织“马尔科马尼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工人、大学生和农村中展开了宣传活动。密谋起义者制定了起义计划，拟定了夺取政权后临时政府成员的名单，预计参加临时政府的有巴特卢班、斯拉德科夫斯基、包德林普斯基教授和德国人采麦尔博士等。

^① 伊·伊·乌达里卓夫：《1848年民族政治斗争简史》，第245页。

1849年5月初,德国争取帝国宪法的武装斗争开始了,匈牙利革命也取得了巨大胜利。捷克激进民主党为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与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者共同行动,以粉碎哈布斯堡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制,确定于5月12日再次举行布拉格起义。虽然起义尚未准备好,但仍决定在指定的日子,按时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尚未进行,密谋已被政府得知了。在预定起义的前两天,起义的所有领导人和准备参加起义的人均遭逮捕,并交法庭审讯。5月10日夜,国民自卫军被解除武装,布拉格城遭到射击。到11日晨3时,城市的所有战略据点都被军队占领了。

密谋失败后,革命组织被解散,《布拉格晚报》被查封。由于参加密谋而被逮捕的有萨宾纳、弗利奇、采麦尔、加弗利切克、斯拉德科夫斯基和利布林斯基等。军事法庭对28名密谋的领导人和参加者判处绞刑,51人被判处9年徒刑。经过这次残酷的镇压,激进民主党事实上已不复存在了。

“五月密谋”的失败,结束了捷克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捷克社会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民族运动。在1848年捷克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布拉格起义失败后,捷克资产阶级民族自由党成功地将捷克的社会运动纳入到民族斗争的轨道,从而将捷克的社会运动引导到与欧洲革命运动相对立的道路,引导到维护哈布斯堡王朝、巩固奥地利统一和完整的道路。这在实际上也就是执行了欧洲最危险的敌人——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因此,捷克第二个阶段的运动在1848年欧洲革命运动中起了破坏作用。

第六节 斯洛伐克革命与民族运动

遭受双重民族压迫的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捷克一起,于1526年并入奥地利。从此

以后，斯洛伐克也象奥地利帝国内其他非德意志民族一样，遭受着残酷的民族压迫与剥削。哈布斯堡王朝将斯洛伐克的行政、经济和军事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将地方行政权力保留在匈牙利贵族手中，并保证匈牙利贵族对斯拉夫农民的封建剥削，所以，斯洛伐克既受奥地利的统治，又受匈牙利的压迫。匈牙利贵族对斯洛伐克实行强制的马扎尔化，并将匈牙利语定为斯洛伐克的官方语言。斯洛伐克也完全丧失了自治权。奥地利帝国的民族压迫与匈牙利贵族的奴役严重阻碍了斯洛伐克民族的发展。

哈布斯堡王朝和匈牙利政府的经济政策严重的阻碍了斯洛伐克的经济的发展。斯洛伐克的新兴工业和商业都控制在德国人手中。他们不仅在斯洛伐克建立自己的手工工场，而且还控制着斯洛伐克的市场，并竭力将匈牙利资产阶级排挤出去。而匈牙利资产阶级在斯洛伐克则多从事农业和经营农产品。由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资产阶级控制着斯洛伐克的工业和农业，所以，斯洛伐克的工业和农业都发展得非常缓慢，直至 19 世纪 40 年代斯洛伐克食品工业，主要是磨面业和制糖业才开始使用机器生产。在当时，斯洛伐克还没有自己的大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社会阶级，比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资产阶级诞生得更晚一些，而且斯洛伐克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市民阶层：手工业者、小业主和知识分子、机关工作人员、律师和神甫^①。因此，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长期没有明确的和固定的政治纲领。

斯洛伐克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农民，他们也像其他民族的农民一样，除承担名目繁多的劳役和沉重的封建租税外，没有任何权利。从 19 世纪初，农民的状况更趋恶化，许多农民因无力支付租税而逃到临近的国家去当短工。特别是灾荒年景，农民更是衣食无着。农民为反抗封建专制制度常常揭竿而起，举行起义。1831 年，

^① 瓦·胡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4 页。

斯洛伐克的农民起义几乎波及斯洛伐克的整个东部。除斯洛伐克人外,居住在斯洛伐克东部的匈牙利、乌克兰和德国的劳动人民也参加了起义。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起义农民提出了“杀光老爷!”的口号,在起义中,他们不仅惩治地主,而且还惩治管家、税吏和行政官吏。但起义最后被当局残酷地镇压,并由匈牙利地主组成的非常法庭判处了64件死刑案。120名起义者,其中包括3名妇女都被吊死了。

19世纪30—40年代,斯洛伐克的无产阶级,主要是矿工,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斯洛伐克工人的工资更为低廉,劳动条件更为恶劣。他们为抗议难以容忍的劳动条件和难以糊口的工资,常常举行罢工斗争。工人的斗争不仅仅限于经济斗争,而且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因为这些斗争的锋芒直指哈布斯堡王朝的殖民制度和匈牙利的民族压迫。矿工的斗争推动了斯洛伐克的民族运动,并吸引了城市小手工业者、工人和工匠。

斯洛伐克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捷克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的联系。30—40年代,斯洛伐克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有:历史学家巴·沙法利克(1795—1861年)、诗人和政治家留杰维特·什图尔(1815—1856年)、约瑟夫·米洛斯拉夫·古尔邦(1817—1888年)、扬科·克拉尔(1822—1876年)。沙法利克是斯拉夫考古学的奠基人,他写过《斯拉夫人的古代》和《斯拉夫人种志》这两部有重大价值的著作。这两部著作揭穿了德国沙文主义历史学家对斯拉夫民族历史的歪曲。证明斯拉夫人历史悠久以及他们具有同其他欧洲民族同等的价值。什图尔是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和他的信徒一起改革了斯洛伐克语,并创办了斯洛伐克最早的报纸《斯洛伐克人民新闻》。但什图尔及“什图尔派”却主张用和平手段,即通过由政府实施的办法以满足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要求和利益。古尔邦是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活动家之一,也是斯洛伐克语的奠基人之一。1842年,出版了他创办的《尼

特拉》年鉴,年鉴的第一号用捷克文出版,第二号和第三号用斯洛伐克文出版。1846年他又创办了杂志《斯洛伐克评论》,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文章《斯洛伐克及其文学生活》。后来古尔邦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历史小说和短篇小说。在1848年革命中,他参加过布拉格起义,但后来,他追随帕拉茨基,组织了反对匈牙利的起义。这个时期,较激进的民主派代表扬科·克拉尔用诗歌反映了农民的民主愿望与要求。他于1824年撰写的抒情史诗《光荣儿女》,呼吁斯拉夫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他们的著作与活动在斯洛伐克民族复兴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图 42 巴维尔·约瑟夫·沙法利克

但是,总的来说,斯洛伐克的民族运动长期脱离农民,而且运动的领导人什图尔、古尔邦和戈德扎追随帕拉茨基,拥护奥地利斯拉夫理论,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因此,他们所领导的斯洛伐克民族复兴运动也就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特点,而且在客观上有利于哈布斯堡王朝,而不利于革命的匈牙利。匈牙利革命政府曾把什图尔视为“王朝代理人”^①。

1848年匈牙利革命对斯洛伐克的影响

匈牙利佩斯三月革命,特别是匈牙利议会在人民压力下通过

^① 1884年革命失败后,什图尔因抗议对斯拉夫人日益加强的压迫而被奥地利政府逮捕。50年代初他成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

的民主法令和废除农奴制法令^①的消息传到斯洛伐克以后，在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匠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斯洛伐克绝大部分劳动人民同情匈牙利人民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这时，从布达佩斯返回斯洛伐克的季工和大学生，在斯洛伐克劳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裴多菲的“推翻暴君和老爷”、“平等、自由”、“民族友爱”等民主思想。1848年3月从布达佩斯回来不久的扬科·克拉尔和罗塔里杰斯向冈佳州下普里别利策的农民宣读了在佩斯通过的《十二条》^②。同时他们也向农民说明了匈牙利议会所通过的土地法令的局限性，并号召农民夺回地主和贵族霸占的森林和土地，拒绝向他们交租服役。在他们的号召下，农民烧毁文书和老虎凳，夺回公用的牧场和森林，并且拒绝服徭役和纳税。下普里别利策的农民还到邻近的村庄，号召这些村庄的农民也武装起来，对付地主和贵族。同时，他们还要求在公共生活中，特别在学校中使用斯洛伐克语。但是，这个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克拉尔和罗塔里杰斯被捕^③。

下普里别利策的农民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却此起彼伏，接连不断。4月初，斯洛伐克西部林业区的农民举行起义，要求无偿地得到土地。4月末，在赫麦尔、兹沃伦和特林琴等地也爆发了农民起义，他们赶走地主，占领仓库，牵走牲畜和平分地主的土地。匈牙利政府对此极为不安，在斯洛伐克全境宣布戒严，并且派遣国民自卫军到这些地区，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

在农民运动兴起的同时，工人和城市贫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了。3月，在斯卡利策城掀起了要求市长克·布津卡辞职的群众运动。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市政府不得不满足群众的要求，重新选举科列什克为市长。在5月进行的选举中，科列什克又重新当

①② 详见第八章。

③ 尼基京主编：《捷克斯洛伐克通史》第2卷，第35页。

选。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屡见不鲜。4月末,矿工的革命风暴几乎席卷了所有矿区。班斯卡—希提亚夫尼察的矿工首先发动,他们成立了以麦林格为首的矿工委员会,委员会为改善矿工的劳动条件、取消奥地利官吏管理矿井并将管理权移交委员会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同时矿工还提出了每半月支付一次工资、矿工生病期间给以补助、降低粮食价格和改善产品质量、组织互助会等要求,这些要求充实了要求提高工资的条例。但提高工资的条例遭到拒绝,这时,班斯卡—希提亚夫尼察的矿工便开始罢工。在班斯卡—希提亚夫尼察矿工罢工斗争的鼓舞下,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和克列姆尼察的矿工也举行了罢工。为了制止班斯卡—希提亚夫尼察和其他矿区的罢工斗争,匈牙利政府派来了全权代表别尼茨基,并调来了军队。但在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别尼茨基被迫同麦林格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接受了矿工提出的经济要求,承认斯洛伐克语在地方机关中为第二官方语言。

斯洛伐克的激进民主力量非常薄弱,而且完全是无组织和分散的,因此,他们虽然渴望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但在实际上是无力进行领导的。而以什图尔、古尔邦和戈德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活动家是较有组织的。他们的思想与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极其相似,力图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并把它视为反对人民革命运动的可靠支柱。他们的目的是使年轻的斯洛伐克资产阶级获得德国和匈牙利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权利,因此,在革命运动中,他们竭力把民族斗争提到首位。

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及其政治纲领

1848年4月末,古尔邦、戈德扎与刚从维也纳回来的什图尔成立了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5月10日,民族委员会在利普托夫—米库拉什城召开了斯洛伐克民族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

基督教牧师和崇拜什图尔的学者^①。在1848年春,什图尔、古尔邦和戈德扎就拟定了致匈牙利的请愿书,即所谓“要求”。这份请愿书主要反映了什图尔等人的政治主张。3月里,什图尔等提出在各州议会上讨论“要求”的建议。于是,米库拉什、尼特兰、布尔热约夫和弗尔包夫策等地都举行了大会,讨论了“要求”。在布尔热约夫的群众大会上,与会者建议“要求”增加两条:第一,“要使被剥夺了森林、牧场、耕地、公社土地和其他财产的人安守秩序,就必须使他们重新得到这些东西,并且让他们的子子孙孙有权无限期地拥有这些财产”。第二,“地方政府应向匈牙利政府递交要求释放克拉尔和罗塔里杰斯的申请书”。

在5月10日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斯拉夫民族会议上,通过了“要求”这个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其全名定为“斯洛伐克人民的要求”。最后通过的“斯洛伐克人民的要求”包括如下内容:斯洛伐克在匈牙利境内实行民族自治,设立自己的议会,并在统一的匈牙利议会中设立特别民族小组;在匈牙利各民族自治区之间确定人种界限;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实行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将公社的土地归还农民和实行将农民从封建义务下解放出来的法令;斯洛伐克语言为官方语言;成立斯洛伐克中学和大学。同时它还包括了将克拉尔和罗塔里杰斯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要求^②。

资产阶级的活动家,特别是什图尔及其信徒,对“斯洛伐克人民的要求”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能实现这一纲领。但是,匈牙利政府拒绝了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要求,《佩斯报》评论这些要求是“奥地利政府的阴谋”。5月末,匈牙利政府内部颁布了关于逮捕古尔邦等的命令。什图尔、古尔邦与戈德扎逃到了布拉格。在布拉格,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480页

^②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480页。

他们参加了1848年6月2日的布拉格斯拉夫代表大会。当大会讨论斯洛伐克问题时，由于斯洛伐克代表之间产生了分歧，所以，斯洛伐克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6月12日—17日布拉格起义爆发后，古尔邦和大部分斯洛伐克代表都参加了起义。布拉格起义失败后，他们回到了维也纳，向奥地利政府投降了。

斯洛伐克军团及其活动

匈牙利革命政府试图从思想上影响斯洛伐克，希望将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斯洛伐克出现了用斯洛伐克语散发的传单。传单号召斯洛伐克人民遵守秩序，打击反革命，保卫祖国，并号召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团结在一个统一国家里等等。但是，由于匈牙利政府不能很好地解决民族问题，不愿意给匈牙利境内各民族以平等地位，所以，在匈牙利议会选举时，斯洛伐克又掀起了暴动。在许多地区的选举小组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这种形势下，奥地利反动派便抓住匈牙利革命政府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弱点，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人民之间点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并竭力把斯洛伐克人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反对革命的匈牙利。

什图尔和古尔邦在布拉格六月起义后逃到维也纳，公开转到哈布斯堡王朝一边时，便向奥地利政府请求成立斯洛伐克军团。在征得维也纳宫廷的同意后，什图尔、古尔邦和戈德扎便开始搜罗军队，准备进行反对匈牙利革命的武装起义。古尔邦在奥地利军官的监督下成立了第一个斯洛伐克军团，军团由斯洛伐克人组成，但斯洛伐克中部的贫农和矿工拒绝支持古尔邦的这个计划，他们继续跟着麦林格战斗，沿着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前进。同时，什图尔等还在维也纳搜罗了300名“志愿军”。1848年9月，他们又成立了民族委员会，古尔邦任主席，什图尔和戈德扎为委员。“志愿军”的

指挥是弗劳乌杰库和扎胡。

9月17日夜，“志愿军”开始了对斯洛伐克的第一次志愿远征。它从维也纳到达斯洛伐克边境的布津策，以便在这里与来自布拉格的150人相汇合。这支军队全部由猎枪武装起来，他们宣誓“效忠皇帝斐迪南，效忠民族委员会和忠于反对敌人的斗争”。宣誓后，部队便向米雅瓦城进发。守卫城市的匈牙利卫戍部队不战而逃，于是，“志愿军”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座城市。在“志愿军”和米雅瓦居民的会议上，什图尔宣布：从现在起，斯洛伐克将独立于匈牙利。同时还选举了新的地方管理机关。

军团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在斯洛伐克领土上的出现，会掀起总起义，并且希望向包瓦日耶推进，占领斯洛伐克中部地区。但是，军团领导人发动总起义的愿望没能实现。什图尔、古尔邦和戈德扎号召农民忠于奥皇，但没有提出任何符合斯洛伐克农民利益的口号，没有提出土地问题，也没有提出有利于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口号。因此，原来欢迎军团的群众便很快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与态度，不愿意再为他们而同匈牙利军队作战了。

不久，匈牙利政府便开始反击斯洛伐克军团了。9月28日，匈牙利军队又从发格河畔的新城和雅布劳尼策向布列佐夫、斯塔拉雅—图拉和米雅瓦同时发动进攻，在包拉杰伊和弗尔包弗策之间，斯洛伐克军团被击溃了。

斯洛伐克军团被击溃后，剩下的零星部队逃到了摩拉维亚，军团领导人再次逃到维也纳。

1848年10月，随着匈牙利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奥地利政府又企图采用新办法，利用斯洛伐克的民族运动去反对革命的匈牙利。在9月间，奥地利政府还非常惧怕斯洛伐克军团成立后，会引起斯洛伐克反封建运动的高涨，但是在斯洛伐克军团被匈牙利政府击溃以后，奥地利政府便认为斯洛伐克与匈牙利的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已经加深，因此，斯洛伐克的起义对自己不会造成威胁了。根

据这种估计，维也纳政府便决定帮助什图尔等人在斯洛伐克建立军队。

1848年11月初，古尔邦和戈德扎在得到文迪施格雷茨的许可以后，便开始建立军队。第一支队伍是在斯洛伐克西部地区塞尼策城建立的，这时，在这里进行活动的是希穆尼奇将军，他对这支军队提供了武器。11月末古尔邦率领在维也纳搜罗的“志愿军”到达斯洛伐克。这支以雅尼切克为首的“志愿军”到达斯洛伐克以后，一部分留在希穆尼奇的军队里，另一部分派往斯洛伐克北部地区。

斯洛伐克军队的人数很少，不足200人。什图尔和古尔邦都希望迅速补充这支军队。他们号召斯洛伐克人民拿起武器反对匈牙利。他们在呼吁书中写道：“匈牙利人犯下了许多罪过，因为他们不仅反对我们，而且反对帝国宫廷，特别是反对皇帝陛下。”^①但是，这次呼吁在斯洛伐克人民中间没有得到任何反响。部队几乎没有扩充。

这时，斯洛伐克军团处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它不仅兵源不足，而且给养奇缺，士兵全靠强征和抢劫粮食过活。在这种情况下，士兵纷纷从部队逃跑。在行军刚开始，军事法庭便审讯了10名企图逃跑的士兵。

1849年奥皇的钦定宪法颁布后，匈牙利议会为抗议三月宪法，于同年4月14日在德布勒森宣布了匈牙利独立，不承认哈布斯堡王朝，成立了以科苏特为首的匈牙利政府^②。这时，匈牙利军队已全面转入进攻，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特别是在斯洛伐克领上，斯洛伐克军团再次被粉碎，至此斯洛伐克军团的活动也就停止了。

① 尼基京主编：《捷克斯洛伐克通史》第2卷，第41页。

② 详见第八章

自从斯洛伐克军团被粉碎以后，奥地利政府便不再考虑恢复军团的问题了。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看到，虽然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领导人维护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但是，斯洛伐克人民却对奥地利怀有仇恨，特别是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地区，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1848年12月，当奥地利军队侵入斯洛伐克时，斯洛伐克的矿工在麦林格的领导下，将大量贵重的金属都转移到东部地区；同时，在同奥地利干涉者的战斗中，麦林格所领导的志愿军表现得坚定、勇敢。特别是在1849年2月5日攻占布拉尼斯科时，斯洛伐克人民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表现得更为突出。正是由于斯洛伐克人民的顽强战斗，斯洛伐克东部的奥地利侵略军被扫清了。

这时，什图尔与古尔邦认为，由于他们参加了反对匈牙利的远征，可能会受到奥皇的重视，于是便向奥皇递交请愿书，要求斯洛伐克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斯洛伐克脱离匈牙利，但是，对此奥皇却置若罔闻。奥皇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这时奥皇已请求沙皇俄国的军事援助，并且看到借助于沙皇俄国的武力能够击败革命的匈牙利，恢复奥地利帝国，完全不再需要斯洛伐克军团和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的支援了。

在1848年斯洛伐克运动中，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派别。一个是以麦林格和扬科·克拉尔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但是，这个派别没有成为强有力的、能够对斯洛伐克民族运动产生巨大影响的势力。麦林格和克拉尔只是在较小地区领导了革命群众的反奥斗争。另一派是以古尔邦和什图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一派在斯洛伐克民族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由于他们惧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一贯地与奥地利妥协，并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的匈牙利，所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轻而易举地利用了斯洛伐克与匈牙利早已形成的民族矛盾和匈牙利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唆使一部分斯洛伐克人反对匈牙利，从而削弱了革命阵营的力量。这是斯洛伐克革命运动应吸取的一个教训。

1849年8月,匈牙利革命被俄奥联军绞杀后^①,斯洛伐克也重新遭到奥地利专制制度的残酷压迫与奴役。

^① 详见第八章。

第七章 1848年波兰革命 与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节 俄、奥、普占领下的波兰

波兰地处中欧，是东西欧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冲，沙皇俄国早已为之垂涎。早在17世纪中期，它便乘波兰东部地区乌克兰农民起义的机会，向波兰提出领土要求，发动了旷日持久的侵波战争，夺占了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土地。从此，贪得无厌的俄国沙皇政府得寸进尺，步步进逼，蚕食波兰东疆。18世纪下半期，大肆向外侵略扩张的沙皇俄国采取各种卑鄙手段，勾结波兰的西邻普鲁士王国、南邻奥地利帝国，于1772年、1793年、1795年三次瓜分波兰。俄国侵吞了波兰东部本土、整个立陶宛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那部分土地。普、奥分别夺占了波兰西部和南部的其余国土。波兰国家暂时从欧洲政治地图上消失了。

波兰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概况

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击败了普鲁士，波兰人民乘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在法国的帮助下，在原波兰部分国土上建立了“华沙大公国”。拿破仑帝国覆灭后，“华沙大公国”被俄军侵占。1814—1815年，以沙皇为首的欧洲各国君主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了分赃会议，商讨重新瓜分欧洲和殖民地事宜。波兰是这些君主之间激烈争夺的对象。最后，维也纳会议重新分割了波兰的土

地。贪婪成性的沙皇俄国凭藉它的雄厚实力，分得了波兰原有领土的9/10，其中包括普、奥两国以前侵占的绝大部分波兰国土。普鲁士仅获得波兰西北一隅，面积约为2.9万平方公里，后来这个地区称为“波兹南大公国”。奥地利分得了南边的加里西亚地区，面积在7.7万平方公里以上。位于俄、奥、普三国交界处的克拉科夫市及其附近1100余平方公里的地区划为缓冲区，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克拉科夫共和国”，名为中立，实为俄奥共同控制。为了欺骗和奴役波兰人民，在原“华沙大公国”的部分土地上，沙皇政府建立了一个名义上的“波兰王国”，面积约12.7万平方公里，并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兼任国王。这一切正如恩格斯所斥责的那样是“波兰第四次被瓜分”^①。“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②。

自从波兰被瓜分以后，英勇不屈的波兰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摆脱民族奴役和反对封建束缚的斗争。1830年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波兰王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十一月起义”。沙皇俄国调集了十几万俄军，历时一年才镇压了这次起义。

波兰人民抗俄起义失败后，俄国便加强了与普鲁士、奥地利政府的勾结。它们多次签订了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协议，加强了对波兰的统治，并藉以巩固其神圣同盟。奥地利政府在其占领区加里西亚加紧镇压波兰人民的一切反抗运动，强化了警察统治。在普占区的波兹南和西里西亚强迫进行“德意志化”。在“中立的”克拉科夫，它的自治地位遭到严重的摧残和削弱。但是，波兰各地区封建关系的土崩瓦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波兰人民民族觉醒的高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反动派也阻挡不了的，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

①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63页。

②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页。

命。一场新的革命风暴正在波兰土地上孕育成熟。

国家的被瓜分严重地阻碍了波兰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正常发展,并造成了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但是,由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需求的增长、粮价的提高、农业技术的进步、耕地面积的扩大,波兰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增长。例如,在波兰王国地区,在1841—1846年间,耕地面积从332310弗沃克^①。增加到365972弗沃克,即增长了14%^②。与此同时,农产品的产量增长更为迅速,如下表所示^③。

各年收获量

单位:万科尔察^④

品种	1827年	1839年	1848年
小麦	75.1	82.7	167.2
黑麦	443.9	440.4	721.1
大麦	150.6	160.5	237.8
燕麦	318.3	327.6	576.6
土豆	426.6	851.2	1155.4

由上表可知,从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后期,在20年左右的时间,小麦、土豆等主要农作物总产量猛增1—1.5倍左右,其余农作物产量也有可观的增长。

19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地主用大量剥夺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村中公用地、牧场、森林的方式,扩大庄园范围,加速取消劳役制,代之以自由雇佣制,转入资本主义经营轨道。流通资金需求的剧增,促使地主逐步采用货币地租制。到40年代后期,波兰王国地区已有近半数农户缴纳货币地租。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使农民拥有的土地面积急剧缩减。从19世纪初期到1848年革命前夕,波兰王国地区的农民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减少了

① 弗沃克为古代波兰的土地面积单位,约合16.8公顷。

② 库拉:《波兰资本主义的形成》,华沙,1955年,第28页。

③ 波兰科学院编:《波兰史》第2卷,第3分册,华沙,1959年,第16页。

④ 科尔察为旧时波兰重量单位。

50 多万公顷,与此同时,无地农民的数字扶摇直上,增加了约 50 万人。在普占区也出现了类似现象。例如,在西里西亚地区,从 19 世纪初到 1846 年,约有 1/3,为数 5 万公顷以上的农民土地转入地主手中。在普占区的波兹南地区和滨海区,农民丧失了 15 万公顷以上的土地,约占农民土地总数的 10%—13%^①。与此同时,在地主庄园服役的雇农、雇工(长工)、短工、“屋角农”^② 的数字增长更为迅速,出现了一支为数庞大的农业无产者队伍。波兰农村阶级分化的进程加速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进展使农民从土地上被驱逐出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少地农民、无地农民、雇农的处境越来越恶化了。他们反对地主剥削的反抗和冲突越发加强和频繁发生。封建农奴制再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了,庄园劳役制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崩溃边缘。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市中也有了发展。波兰各地区,尤其是波兰王国和普占区的工业生产也有缓慢进展。庄园经济向资本主义经营的转化扩大了对农业机器、酿酒业、制糖业技术装备的需求,促进了冶金业、制铁业、采煤业、采矿业、机器制造业、棉纺织业和加工工业的发展,也刺激了蒸汽机和其他新技术的采用。手工工业开始向机器工业过渡,工业品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例如,波兰王国地区棉纺工厂从 1830 年的 4705 家增至 1844 年的 9264 家。与此同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2 倍。同一时期,棉布总产量从 38 万沃基耶奇^③ 增加到 226 万沃基耶奇以上。出现了新兴的棉纺织业中心——罗兹。在波兰王国、波兹南、西里西亚出现了许多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工业,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由于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导

① 斯蒂希:《波兰经济史纳》,罗兹-华沙,1958 年,第 156 页。

② “屋角农”是当时波兰贫苦农民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没有自己的份地和房屋,居住在其他农民家的屋角,因而得名。

③ 沃基耶奇是当时波兰的长度单位,约为 0.6 米。

致了交通运输业的繁荣。40年代,修筑了初具规模的硬路面的公路网,疏浚了维斯瓦河的航道,使用了蒸汽机驱动的轮船。1843年在西里西亚地区修筑了以弗罗茨瓦夫市为中心的区间铁路,接着又铺设了第一条长距离铁路,即华沙—维也纳铁路。

波兰社会各阶级状况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波兰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波兰民族资产阶级来自上层市民阶层,主要由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主贵族转化而来。他们和外国占领者以及封建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波兰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革命进程中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他们没有能够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也无力充当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和以激进方式消灭封建结构的革命者的角色。正在成长的、新兴的波兰无产阶级人数尚少而且比较分散,在极为困难而复杂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暂时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担当起领导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重任。农民阶级是人数最多的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外国占领者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剥削,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生活上极为贫困,他们强烈渴望推翻旧制度以改变自己的处境,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但是,他们缺乏统一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所以,当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还没有足够力量对他们进行坚强领导时,尽管他们发动了声势惊人的起义,但仍无法把自己的革命斗争引向最后胜利的道路。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反映农民和城市平民以及手工业者利益和愿望的波兰革命民主主义集团登上历史舞台。这个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集团的领导人大多出身于濒临破产的中小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客观上顺应了在波兰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趋势。他们提出了土地革命的纲领,主张通过土地制度的革命变革来发动农民群众,并依靠农民群众、城市平民、手工业者和工人,推翻封建制度和争取民族独立。他们是波

当民族民主革命的现阶段的领导者。

总之，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基本上还是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相矛盾的，是与专制主义的上层建筑相矛盾的，是与以沙皇俄国为中心的民族奴役相矛盾的。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民族奴役的三重压迫下，波兰城乡劳动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之中。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日益发展，社会对立和民族矛盾更趋激化，从而形成了 40 年代后期以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为基础、以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主导的革命高潮。波兰革命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消灭封建制度，它是当时全欧面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40 年代革命形势的形成

1830—1831 年“十一月起义”失败后，在沙俄等外国占领者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波兰人民并未屈服，革命运动并未销声匿迹。起义失败的惨痛历史经验教育了波兰人民，使他们懂得了，为了有效地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必须同时实行激进的社会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围绕着如何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革，即农民问题和土地制度问题，在国内的社会各阶层和国外的流亡者中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这场斗争首先发端于流亡法国的波兰侨民中间，随着分歧的扩大，波兰流亡者分裂为两个阵营，即资产阶级民主阵营和贵族保守阵营。前者以“波兰民主协会”和进步历史学家列列维尔为代表，后者以查尔托里斯基公爵为首。在 1832 年建立的“波兰民主协会”周围集结了人数众多的进步爱国者和民主派，他们把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斗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波兰民主协会”在国内展开了广泛的活动，酝酿发动全国起义。稍后，协会的左翼分子克伦波威茨基、沃尔采耳等人另组“波兰人民村社”，他们代表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利益，提出了具有某些空想共产主义色彩的民主革命纲领，要求通过反封建的农

民革命的道路,通过在三个占领国同时发动人民武装起义的途径,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在国际上,他们提出了与国际进步势力和被压迫民族团结战斗的口号。村社的纲领对波兰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侨居国外的大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虽然提出了民族独立的口号,但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反对占领者、实现民族独立的主要社会力量。他们宣称,将借助于西方国家同沙皇的冲突来恢复波兰独立。他们无视农民要求土地的迫切性,拒绝激进的社会改革,因而他们在独立运动内的影响日益减退。40年代,波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领导权逐渐转入国内的民主革命派手中。

在波兰国内各地区,尽管占领当局严密控制,军警密布,监狱林立,但波兰人民的秘密革命活动犹似冰层下的潜流一直涌流不息。早在1833年,就出现过萨利夫斯基率领的武装游击活动。1835年,在潜回国内的革命派帮助下,克拉科夫和加里西亚出现了“波兰人民协会”。协会还把它的活动扩展到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等地,并与俄国革命者保持着联系。稍后,协会的左翼分子又创建了“波兰人民大联盟”。沙俄当局和奥地利政府发现了以加里西亚为基地的密谋革命活动后,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但是,占领当局残暴的高压政策无法使波兰各地区的革命活动长久沉寂下去。随着封建农奴制危机的日益深重和社会经济变革的进展,波兰地下革命活动以新的力量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区。

40年代初期,革命斗争的中心转移到了波兰王国和大波兰地区。在波兰王国地区创立了“波兰人民同盟”。它的活动中心是华沙,并和华沙周围的城市卢布林、温奇查、普乌图斯克等地建立了联系。同盟的著名领袖就是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活动家爱德华·邓波夫斯基和他的表哥亨·卡明斯基。邓波夫斯基(1822—1846年)出生于富裕的地主家庭。为了献身于人民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他毅然同家庭断绝了关系,18岁就加入了“波兰人民同盟”,开

始了革命生涯,同时从事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由于他的热忱、牺牲精神和组织才能,很快就成为革命运动的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在不断遭到迫害、追踪、流亡、被捕的动荡生活中,他发表了一系列才华横溢、有独特见解的哲学、美学和政治方面的文章,成为19世纪中叶波兰和东欧杰出的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之一。但是,邓波夫斯基首先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革命家,他全神贯注的主要对象是人民和社会革命,全力以赴地追求的目标是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的全波兰民族起义。他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



图 43 爱德华·邓波夫斯基

的新的正义的社会制度,他强调指出:“自由是人民生存的目的……那里没有私有制,那里才可能有自由。”^①邓波夫斯基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要求通过农民革命的途径在波兰实现社会主义。他的革命思想在他领导的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中得到了体现。邓波夫斯基的战友卡明斯基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民主革命左派活动家。他主张把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与无条件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的革命变革结合起来。他企图通过“人民战争”的道路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他们两人的革命宣传和实践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波兰民主革命派的形成。

随着农村阶级对立的激化和农民运动的兴起,1843年前后,

^① 爱·邓波夫斯基:《社会生活中的创造性》,转引自《人民之春百周年祭》第5卷(文献与史料),华沙,1953年,第444页。

波兰王国地区的东部出现了农民革命组织“农民同盟”。彼得·希切根尼神甫是它的创建者和主要思想家。希切根尼是一个农奴的儿子，与人民群众的频繁接触使他懂得了农民的苦难和斗争。他开始在卢布林、基埃尔基地区创立农民组织，并与“波兰人民同盟”及其领导者邓波夫斯基建立了联系。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是希切根尼和“农民同盟”的奋斗目标。希切根尼在长袍教衣的掩护下，对农民进行口头宣传和传播地下革命读物。希切根尼的小册子《小金书》在农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假借教皇格里哥尔十六世手谕的形式出现的一份呼吁书。这本小册子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用朴素而鲜明的民间语言宣扬了代表农民和平民利益的民主革命的观点和行动计划。《小金书》指出：“地主老爷们剥夺了你们的一切……把你们当做奴隶……他们必须归还你们……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自愿交出，那就必须用暴力行动夺回来。”^①作者号召农民反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号召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进行革命战争，举行起义反对沙皇制度和一切世俗的和教会的剥削者。作者还庄严宣告，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君主、地主的最后斗争已经临近。1844年10月，希切根尼和“波兰人民同盟”的领导人一起拟订了在波兰各地发动全民起义的行动计划，决定由希切根尼率领的农民武装首先发难，作为全民起义的开端。11月下旬，希切根尼在克腊依诺村聚集了数百名武装农民，举行了宣誓仪式，准备立即起义。由于地主的告密，希切根尼被沙皇政府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中俄边境的尼布楚矿区服苦役。华沙、卢布林腊多姆等地的起义组织被破获，数百名起义者被捕，全民起义流产了。

在俄占区掀起革命斗争的同时，普占区的波兹南大公国、波摩瑞（德国人称为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等地也有波兰地下组织在

^① 凯涅维奇等编：《1795—1864年波兰史史料选》，华沙，1956年，第573页。

活动,其中心是波兹南。1839年,出现了温和派控制的“波兹南委员会”。1842年,由印刷工人出身的革命派领袖斯泰凡斯基等人创建的革命组织“平民联盟”是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利益的代表者。联盟强调要依靠城市贫民、雇工、贫苦农民和农村无产者发动起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根本性的社会改革。联盟还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波摩瑞、西里西亚,并和波兰王国、加里西亚的秘密组织协调行动,酝酿发动全波起义。在波兰地主告密者的配合下,普鲁士当局迅即采取行动,搜捕了斯泰凡斯基及其战友,使“平民联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和摧残,使全波起义计划又一次遭到破坏。但是,波摩瑞和西里西亚地区波兰爱国者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特别在德国人和波兰人杂居的西里西亚更是如此。这里是中欧最早的工业发达地区之一,也是封建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纠缠在一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地方。1844年,西里西亚发生了著名的纺织工人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普鲁士当局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但社会主义思想却广泛地深入到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中,导致了第一批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前身的出现。在这些组织中,波兰爱国者和德国革命派进行了合作。

1845年前后,是波兰社会大变动的前夜,反对封建压迫的农民运动方兴未艾,反对民族奴役的解放运动逐浪高涨。革命形势臻于成熟,武装起义一触即发。正如一首民谣所唱的那样:

保卫自己,与旧秩序备战一番……

和我们并肩前进的还有那些人,

他们不愿为沙皇效劳,

一起,我们和他们一起,

决不能再长期等待下去了!

与此同时,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也趋于激烈化。以查尔托里斯基为中心的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坚持

具反民族反人民的立场，企图把起义无限期推延下去，如其不成，则力图把起义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使起义不至演变为农民战争和民主革命。以邓波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提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口号，主张依靠人民群众，首先是农民，立即举行全民起义，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波兰。为此，邓波夫斯基等人在农民运动汹涌澎湃、革命危机最为成熟的加里西亚地区首先展开了活跃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在知识分子、爱国的小贵族、矿工、手工业者、工人等各社会阶层中建立了一系列革命小组和委员会，并与波兰各地的秘密组织加强联系和协作，为起义进行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消灭封建制度进行革命斗争。

第二节 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 和加里西亚农民起义

克拉科夫起义的爆发 起义政府的革命措施

19世纪40年代后期，在全欧范围内酝酿着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惊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波兰由于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特别尖锐，所以，于1846年首先举起了革命旗帜。

1845年秋天，波兰国内外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经过秘密磋商，确定1846年2月22日为发动全波总起义的日子，并任命具有卓越军事才干的梅洛斯拉夫斯基为武装起义的总指挥。但是，由于地下组织中潜入了沙皇的奸细，他们向俄、普、奥三国占领当局告发了起义计划，使地下组织在起义前突然遭到了军警的大规模搜捕，梅洛斯拉夫斯基也落入了普鲁士当局的魔掌。加上一些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临阵动摇，使总起义无法实现，只是在一些地区爆发了零星的起义，很快就为占领当局镇压下去了，其中只有提前发动的克拉科夫起义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2月19日午夜,震天的枪声宣告了克拉科夫起义的开始,以城市贫民、雇工、手工业工人为主力的起义者向奥地利占领军发动了猛烈进攻。与此同时,克拉科夫附近的雅沃日诺、赫山努夫、柴比尼等地的农民、矿工、钢铁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开始了武装起义,打垮了奥地利占领军。22日,自由和胜利的曙光照耀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克拉科夫市。以革命派戈日科夫斯基为首的起义者宣告成立“波兰共和国民族政府”,并发表了《告波兰人民》宣言。宣



图44 梅洛斯拉夫斯基

言强调指出:“我们这里有两千万人,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像一个人那样站立起来,那么我们的威力是任何力量也压服不了的,我们将获得自由。”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义反对沙俄等占领者。它还表达了农民的基本要求,宣布立即废除一切封建特权,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参加起义军的无地农民,将从国有土地中分配份地:“根据每个人的贡献和能力使用土地财富,任何形式的特权将无容身之地”,“农民目前有条件地使用的土地,将无条件地为其所有,无偿地停止租赋、劳役制和一切类似义务,而手持武器、为国效劳的人将从国有土地中予以奖励。”^①为了实施宣言的原则,起义政府还颁发了“革命法规”,其内容包括对那些拒不接受革命措施的贵族反对派处以死刑。克拉科夫及其附近地区的波兰人民热烈拥护起义政府的宣言及革命措施,大批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踊跃参加起义军。短短3天内,起义军迅速扩大到近6000人。起义能否顺利开展和取得最后胜利,取决于能否迅速和坚决地在广大地区实施

^① 《人民之春百周年祭》第5卷(文献与史料),第478页。

宣言的原则。混入起义阵营的贵族反对派对起义政府的革命措施进行抵制和破坏，迟迟不愿采取革命进攻行动，把起义事业推进到整个加里西亚和波兰王国地区。起义政府内部也存在思想上的分歧和行动上的优柔寡断，丧失了向占领者乘胜追击的宝贵时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4日，原来在加里西亚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邓波夫斯基，带领了一支由维利奇卡的盐矿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组成的起义军赶到了克拉科夫，被任命为执政秘书，成为起义政府实际上的政治领导人。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命令封闭了对起义事业态度暧昧的《克拉科夫日报》，创办了革命喉舌《波兰共和国政府日报》。为了与群众建立直接联系，成立了“革命俱乐部”，作为宣传群众、传播革命思想的讲台。俱乐部还参与政府的共同管理，并监督“执政”，实际上成了人民的议会。在邓波夫斯基的提议和主持下，起义政府又颁布了使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补充法令，提出由国家和社会拨款筹建大众工厂，改善工人阶级就业状况；提高工人工资；取消宗教、种族特权和社会歧视，保证犹太人享有充分的公民权；严禁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违者重罚；毫不拖延地宣布废除农奴制，违者处死。还提出了动员、组织、武装全国人民抗击侵略者，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波兰的号召。起义政府的一系列革命措施体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反映了某些空想共产主义精神。恩格斯热情赞扬了以邓波夫斯基为代表的波兰起义者的革命主动精神，指出：“在克拉科夫，……每一个既定步骤都具有民主勇气，这种勇气，我可以说，很像无产阶级的勇敢。……这里没有任何犹豫和怀疑：向三个强国立刻发起了进攻，宣布了农民的自由、土地改革、犹太人的公民平等，而且绝不因为这会触犯一些贵族利益而踌躇不前。”^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6页。

克拉科夫起义的结局

起义政府的革命政策招致了克拉科夫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惊慌和反对，他们在2月26日深夜策划了一起反革命政变，企图同沙俄侵略军里应外合，推翻革命政府。邓波夫斯基率领武装群众，采取非常措施，粉碎了反革命叛乱。这次政变是贵族反对派勾结外国占领者力图扼杀革命的一个危险信号。驻扎在附近的沙俄侵略军和奥军在惊魂初定之后，便集结力量开始向克拉科夫移动，准备猛扑过来。在革命的危急关头，邓波夫斯基深深懂得，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发动农民，把农民的反封建自发运动与反对外国占领者的斗争结合起来，是邓波夫斯基关注的主要问题，也是关系到克拉科夫起义成败的根本问题。当时，在加里西亚农村奔腾起伏的农民斗争浪潮中，呈现出一派复杂的图景。在起义政府势力所及并实施革命措施、给农民以土地的地方，农民坚决支持起义并参加起义部队；在起义政府革命宣传所到的地方，农民对起义抱同情或等待观望的态度；在地主和奥地利占领当局控制的地区，农民被他们的欺骗性宣传所蒙蔽，对起义抱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阻击和俘获过往的起义者并交给占领当局。起义政府的一些领导人曾打算以严惩的办法制止这类事件的出现，但邓波夫斯基深信，只要深入农民群众，宣传和贯彻土地革命纲领，就能把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结合起来，就能战胜外国占领者。邓波夫斯基在《政府日报》上著文《人民与革命》，强调指出：“人民和革命，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如果人民群众暂时不支持起义，那也只是贵族的罪责，“只要热爱人民和向他们宣告社会革命，他们就会对我们深信不疑，就会跟我们一起前进，那怕是下地狱也罢。”^①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邓波夫斯基派遣了许多特派员，携带宣传土

^① 《人民之春百周年祭》第5卷（文献与史料），第492页。

地革命和说明起义政府政策的呼吁书，深入农村地区，发动农民群众，力图尽快地把农民运动引导到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外国占领者的正确轨道。然而，奥地利当局却赶在起义政府的前面。散布蛊惑人心的谎言，说什么奥皇有意废除农奴制，而贵族起义者反对这样作，并为此发动“暴乱”。由此，号召农民同当局“合作”，戡平“暴乱”。一些仇恨革命的地主分子也为虎作倀，不但大力扩散这种谎言，而且鼓动和纠集了数千名不明真相的农民，跟随一支奥军向克拉科夫进军，反对起义政府。2月26日，一支仅由500名起义者组成的部队主动出击，但在格杜夫附近被奥军和受蒙蔽的农民军击溃。2月27日，在革命的危急关头，邓波夫斯基不顾个人的安危，亲自带领一支起义队伍出城，试图与迫近的农民军建立联系，晓以革命真相。但是，在克拉科夫郊区波德古热，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一支奥军的伏击。在自卫反击战中，邓波夫斯基冲杀在前，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鲜血，英勇地献出了年仅24岁的生命。邓波夫斯基是克拉科夫起义的优秀领袖，是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牺牲给起义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沙俄政府乘机派出大批俄军进逼克拉科夫。3月初，俄军进占克拉科夫，起义失败了，克拉科夫共和国不复存在，被并入了加里西亚。俄、奥占领者对波兰起义者进行了血腥的屠杀，1200多名爱国志士惨遭杀害。

克拉科夫起义虽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而且为时也只有几天，但它在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史和欧洲革命运动史上占有光荣的地位。它不仅揭开了波兰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把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结合了起来，使波兰的民主革命纲领从理论变为实践，而且它推动了40年代和50年代一系列欧洲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是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前奏，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对克拉科夫起义发表过许多热情洋溢的演说和分析精辟的文章，予以极其崇高的评价。恩格斯在论述克拉科夫起义把波兰民族

解放运动推向新的更高的民主革命阶段时,强调指出:“1846年在克拉科夫,波兰第一个在欧洲打起了社会革命的旗帜。”^① 马克思也指出:“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做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做出了光辉的榜样。虽然这次革命暂时被雇佣凶手的血手所镇压,但是现在它在瑞士及意大利又以极大的声势风起云涌。在爱尔兰,证实了这一革命原则是正确的。”^②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无产阶级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在谈及共产党对各国党派的态度时,明确指出:“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③ 应该指出,这个党派还不是一个坚强的、成熟的组织,它未能深入农民群众并把其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以致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的革命纲领就被国内外反动派淹没在血泊之中。但是,克拉科夫起义的精神对波兰民族民主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具有很大的影响。

加里西亚农民起义

克拉科夫起义的火焰熄灭以后,加里西亚农民起义的浪潮继续高涨。奥占加里西亚地区是波兰各地区中农民受剥削最为深重、经济发展极为缓慢的落后地区。农民运动的兴起是农民群众对地主强化封建压榨的合乎逻辑的反应。农民份地的锐减,劳役范围的扩大,包工制的推行,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化和反抗情绪的增长。1844—1845年的歉收、洪水泛滥酿成了饥荒蔓延,农民破产和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这更激化了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以致1846年出现了波兰历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反封建起义。面对汹

① 恩格斯:《支持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7页。

涌澎湃的农民起义，震惊万分的奥地利占领当局施展了狡诈的手段，千方百计把农民起义这股“祸水”引向反对克拉科夫起义的轨道，用谎言和物质刺激诱使农民攻击起义者，使之两败俱伤，以便他们控制局势。如前所述，占领者的阴谋部分得逞了，从而加速了克拉科夫起义的失败。但是，起义幸存者深入农民起义队伍，宣讲克拉科夫起义的涵义，终于使一些农民武装懂得了把民族解放与反对地主的农民斗争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在正确方针的影响下，许多农民武装在反封建的同时，展开了反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846年2月下旬爆发的霍霍伍夫起义。这次有数百名山民和农民掀起武装起义虽然被奥地利占领当局血腥镇压下去了，但加里西亚西部广大地区的农民起义仍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势如大海怒潮的农民起义队伍横扫全境，捣毁了近500座地主庄园，处死了200多名地主和人数更为众多的地主管家^①。摧垮了奥地利占领当局的统治机构，使封建农奴制和占领制度受到了一次致命打击。塔尔诺夫地区是农民运动的中心，雅库布·舍拉(1787—1866年)是农民运动的主要领袖。他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本人是个木匠，多年来充当过乡的农民代表，对地主充满了阶级仇恨，是农民利益的坚强捍卫者。舍拉不相信君主们的“恩惠”和地主们的“好心”，他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不需要任何地主老爷，我们自己能管理自己……。地主们必须死去，我们将分配他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将生活得更好。”^②在农民运动的高潮中，农民接管了数以百计的村庄，自己分配地主庄园的土地和财富，成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从自己人中间选举村长和各级领导人。威望卓著的舍拉把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协调各地区的斗争，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组编了农民自卫武装和夜间

① 凯涅维奇：《1846年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弗罗茨瓦夫，1951年，第259页。

② 波兰科学院编：《波兰史》第2卷，第2分册，华沙，1958年，第214页。

巡逻队，整顿革命秩序，严禁自由行动和违犯纪律。

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猛烈地冲击了奥地利占领当局的统治基础，扫荡了贵族地主的无上权力。惊慌失措的奥地利当局基层机构密切注视农民起义的动向，它们在向其“总督”呈递的秘密报告中指出，舍拉及其领导下的农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完全不顾及政府利益”。因此，报告无可奈何地承认，“只有动用不仁慈的、非常的强制行动，投入和损耗大量时间和费用”^①，才有可能摧毁农民起义。于是，惶惶不可终日的奥地利政府及其首相梅特涅玩弄了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由奥皇下达手谕，感谢“忠诚的加里西亚人”，向他们“致敬”，号召他们“严格履行……劳役义务”，并把舍拉请去“谈判”，用和平的怀柔、“让步”手段迷惑农民，力图使加里西亚“安宁”下来，作为缓兵之计；另一方面，利用这段喘息时间进行军事讨伐准备，并从4月份开始，派出大批军事讨伐队“平定骚乱”，恢复旧秩序。农民起义者顽强地捍卫自己的既得成果，由此越来越频繁地爆发农民与奥军之间的武装冲突。1846年夏末，分散的、缺乏坚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终于被奥军逐个击破。但是，加里西亚农民的反抗和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许多地区的农民继续抗拒服劳役和交纳租赋。不论反革命势力如何喧嚣一时，想要恢复过去的旧秩序已是不可能的了。该年和翌年，由于马铃薯疫病的蔓延，加里西亚地区又出现了灾荒、饥馑和瘟疫，加速了农民的赤贫化和大量死亡。在1848年的革命年代里，这一切导致了农民运动又以新的力量再度高涨。

1846年加里西亚农民起义是推翻现存封建制度的英勇尝试，是波兰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农民运动，也是欧洲历史上仅见的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之一。这一举动也是同全欧当时普遍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相吻合的。由于加里西亚经济上

^① 凯涅维奇等编：《1795—1864年波兰史史料选》，第601—602页。

的落后性，农民觉悟不够以及组织上的涣散性，运动具有自发性质，没有能达到摧毁封建制度的目标，没能与克拉科夫起义有机地结合起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奥地利占领当局利用来反对起义事业，从而使农民起义本身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归于失败。但是，这一切并未改变加里西亚农民起义的积极意义。正是这次农民起义给予了封建制度以沉重打击，展现了通过土地革命道路解放农民的现实前景，促进了加里西亚和波兰各地区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推进了民族解放事业。其次，加里西亚农民起义的英勇举动在1848年革命前夜的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中东欧广大地区，特别是那些封建农奴制正处于解体边缘的国家和地区，如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立陶宛、乌克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促进了那里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1848年，农民运动的浪潮席卷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北部。在这些遥远的国家里，也传诵着加里西亚农民起义的英勇业绩，“舍拉的大刀”的故事还出现于外国的民间歌谣。在以后的一些年月里，奥地利等国的有产阶级一提到“舍拉的大刀”尚心有余悸，记忆犹新。如果说在1848年，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的统治阶级在革命形势下不得不对农民作出一定的“让步”，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害怕再次出现新的“加里西亚血腥事件”。加里西亚农民起义和它进行的土地革命的尝试加速了中东欧各国，特别是奥地利帝国全境封建农奴制的废除，推进了欧洲革命事业的发展。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各个大农业国家，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摆脱宗法封建的野蛮状态，才能把农奴制的或劳役制的农民变为自由的农民，这个革命和1789年法国农村中的革命完全相似。波兰民族是邻近的农业民族中首先宣布实行这个革命的民族，这是它的功绩。”^① 还说，正因为

^①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90页。

如此,当德国等国还在封建农奴制下浮沉的时候,“波兰就已经成了东欧民主的策源地”。^①

第三节 1848年波兰革命

欧洲革命运动中的波兰问题

1846年的波兰革命运动,是行将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震荡的序幕。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封建统治秩序早在1830年就遭到了沉重打击,面对着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现在再也不能苟延残喘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群众、被压迫民族,都期待通过民主革命的途径,实现自己不同的目的和要求。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已成为各种革命力量群起而攻之的众矢之的。1848年前夕的灾荒、饥馑和工业危机加速了革命的爆发。在全欧的革命运动中,波兰问题是中心问题之一。这不只是因为在中东欧被压迫民族中,波兰消灭封建主义和客观条件最为成熟,也不只是因为波兰拥有悠久的反抗外族奴役的斗争传统,更主要的是由于波兰所处的战略地位和社会环境。

波兰在欧洲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是欧洲大厦的基石,因为革命势力或反动势力谁能在波兰站稳脚跟,谁就能在整个欧洲取得彻底胜利。”^② 贪婪的沙皇俄国正是通过侵占波兰这块欧洲战略要地,作为向西、向南、向北挺进的基地,从而夺取了欧洲霸权。19世纪前期,沙皇俄国作为欧洲反革命堡垒“神圣同盟”的头子,倚靠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但扼杀了波兰人民一次

^①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22页。

^② 恩格斯:《在1863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页。

次的革命斗争,而且多次出兵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四处镇压革命运动,到处侵略扩张,扮演了封建顽固势力卫道者的可耻角色。“波兰的被瓜分,加强了目的在于掩饰沙皇对欧洲各国政府的霸权的神圣同盟。”^① 受俄、普、奥这三个反动强国奴役的波兰人民所掀起的民族解放斗争,就成为这些国家革命动荡的重要因素,客观上使“波兰……成了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革命的部分”^②。波兰人民每一次反对占领者的起义都打击和削弱了三个反动政府的地位,从而有助于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开展。同时,波兰人民持续不断的革命斗争还牵制了沙俄的力量,减轻了沙俄对欧洲革命运动的压力,掩护和援助了法国革命以至欧洲革命。正是由于以上情况,波兰成了统治欧洲的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柱——神圣同盟体系中最薄弱、最敏感的环节,波兰的重新独立同打击神圣同盟、推翻沙俄对欧洲的霸权地位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就使波兰独立问题成为关系到欧洲各国人民摆脱沙俄羁绊的重大国际问题,更加突出了波兰问题在欧洲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

其次,正如克拉科夫起义所表明的,波兰民族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和土地问题、民族独立问题,这对当时中东欧各国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由于克拉科夫起义,波兰问题已由过去的民族问题变成各国人民的问题,已由过去的同情对象变成与一切民主主义者有切身关系的问题。”^③ 因此,波兰问题超越了一个国家的范围,变成了影响欧洲革命全局的国际问题。

由此可知,建立一个独立和民主的波兰与全欧革命的胜利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6页。

②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7页。

着牢不可分的共同利益。这一切，使恩格斯得出结论说：“正是因为波兰的解放同革命密切地联系着，正是因为‘波兰人’和‘革命者’两个词成了同义语，波兰人就赢得了全欧洲的同情。”^①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波兰的民主革命派和欧洲各国民主派，同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了广泛的、密切的联系和合作，波兰革命者参与了许多国际性的革命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1847年，在伦敦秘密地召开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国际性代表大会，根据大会的决定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宣言结尾提出一个新的革命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波兰有自己的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公众集会上，著名的列列韦尔和他的同志们表示赞同代表大会的决议。”^②

在1848年欧洲革命高潮即将来临之际，马克思恩格斯精辟地分析了欧洲的国际形势。他们以洞若观火的革命敏感性和预见性觉察到了沙皇俄国对欧洲革命的严重威胁。在中东欧各国人民要求消灭封建制度、实现民族统一的斗争日趋高涨的时刻，沙俄、普鲁士、奥地利所结成的同盟形成了一道强固的反动壁垒，是欧洲一切反动派镇压革命运动的最后支柱，是国际革命运动发展的最大外敌。特别是沙皇俄国，凭藉其庞大的军事实力，不仅顽固地维护自己封建帝国内部的反动统治，而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将再一次援助各国反动派绞杀革命运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已经清楚了解到，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俄国，运动越是具有整个欧洲的规模，这个敌人也就越是不得不参加斗争。”^③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革命及欧洲革命不仅有内部

①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6页。

③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页。

敌人,而且有外部敌人。为了战胜这一而认恶的国内外敌人,夺取德国革命及欧洲革命的胜利,德国人民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对沙皇俄国开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指出,德国人民必须从自己方面解决波兰问题,即把过去普鲁士掠夺来的土地归还波兰人民,帮助波兰人民恢复民族独立,并共同进行反对沙皇俄国的斗争。在革命行将爆发的1848年2月22日,在纪念波兰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的国际大会上,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德国人民必须和波兰人民结成革命同盟,紧密团结,共同战斗,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压迫者,因为俄罗斯政府也像压迫波兰人一样地压迫着我们。”所以,“这个同盟是我们两个民族的共同利益所绝对必要的。”^①由此可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德国革命及欧洲革命的角度,是从德国和欧洲革命人民包括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战胜革命的主要敌人沙皇俄国的高度来论证波兰独立与欧洲革命的关系的。

1848年波兹南起义

1848年2月下旬,正当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就波兰问题发表演讲的时刻,法国巴黎的革命人民在街道上筑起了街垒,开始了战斗,结束了路易·菲力浦的暴虐统治。侨居法国的许多波兰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参加了战斗。3月中旬,革命的烈火延烧到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维也纳人民推翻了梅特涅政府,在柏林人民武装起义的压力下,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也被迫作出了种种让步。波兰人民为此欢欣鼓舞,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波兰各地区的爱国民主秘密组织加强了串连,迁居法、德的波兰侨民大批返回国内,共同努力,酝酿在三个占领区发动武装起义。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革命传单、地下读物向波兰社会各阶层通报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7页。

和解释了巴黎、维也纳和柏林的革命事件，号召人民群众备好梭标，磨快镰刀，作好准备，待机行动。他们期待在法国对神圣同盟各国宣战的时机，发动全民起义。革命形势在普占区首先成熟。然而，在起义阵营内部，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认识和行动方针却迥然相异。民主革命派想依靠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工人通过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秩序发动群众，经过武装斗争，用革命方式创建民主和独立的波兰。原大波兰地区“平民联盟”的领袖斯泰凡斯基就是这一派的杰出代表。在三月革命中被柏林人民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梅洛斯拉夫斯基基本上也属于这一派，但他态度不坚定，对德国资产阶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企图联合德国资产阶级实现民族独立。以查尔托里斯基为中心的波兰国内外资产阶级地主保守派却企图利用革命的形势，把独立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与被削弱了的普鲁士容克地主资产阶级妥协，以取得波兹南等地区的“区域自治”，通过合法途径接管政权，回避社会革命。他们在《告国内的波兰人书》中，告诫人们避免“猝发的、不耐烦的轻举妄动”，特别是在社会问题上。他们妄图箝制人民群众的革命主动行动。以实现自己的阶级目的。但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浪涛冲破了保守派设置的堤坝，在波兹南掀起了一场新的起义风暴。

柏林三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后，大波兰地区的波兰人民斗志昂扬，立即行动起来，发动了武装起义。3月20日，起义者在波兹南市建立了自己的权力机构“民族委员会”。该机构由10人组成，其中左派代表3人——斯泰凡斯基、贝尔文斯基、克劳托费尔，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右派3人——波特沃罗夫斯基、米耶任斯基和西尼塞夫斯基神甫。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城市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成千上万的农民、城市贫民、青年、工人和民主主义战士纷纷拿起武器，组建了“镰刀军”、“射手队”等人民志愿武装。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创立了一支近两万人的起

义武装。起义者捣毁了占领者的大批官衙，解除了一些普鲁士占领军的武装，没收了占领者的金库和财富，有效地控制了地方政权。起义者号召波兰各地区人民同心协力，把起义事业推向全国，通过革命途径争取祖国的独立。

农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3月下旬，仅在希洛达一地，就有5000农民自发地拿起了武器，他们随时准备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但是，掌握了起义军军事领导权的梅洛斯拉夫斯基却不相信农民武装的威力，醉心于组建“正规军”进行“常规战争”的错误设想，不愿组建和依靠庞大的农民武装来夺取起义事业的胜利。他的错误军事路线给波兹南起义带来了不可弥补的严重后果。

与此同时，混入“民族委员会”并篡夺了部分领导权的地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无视人民群众的愿望，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害怕起义演变为农民革命，号召人民“保持冷静”、“避免流血”，幻想用“合法革命”迫使普鲁士政府承认波兰独立。委员会中的左派革命分子虽然不同意右派的妥协路线，但错误地认为目前还不是与普鲁士占领者决战的时刻。他们想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组建和训练军队，等到普鲁士政府拒绝起义者的要求时再展开武装斗争。因此，他们也同意与普鲁士政府进行谈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派出了由右派分子普西乌斯基大主教和左派分子克罗托夫斯基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柏林谈判。普鲁士当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通过同波兰起义阵营内地主资产阶级右派的妥协，就能够控制局势，扑灭方兴未艾的起义火焰，于是3月21日派兵开进波兹南市中区。波兰人民义愤填膺，迅即反击，在第二天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簇拥着“民族委员会”的成员向市政厅进军。委员会中的左派领导人要求立即宣告成立临时政府，调集郊区农民武装，与普鲁士占领者开战。在波兰起义者的革命声威面前，惊惶失措的当地德国资产阶级不得不狼狈退却。他们一方面假惺惺地表态“热烈同情”波

兰人，抚慰起义者，另一方面，他们火速派代表赴柏林敦促普鲁士政府满足波兰起义者提出的一些基本要求，作为缓兵之计。3月24日，被德国人民和波兰人民的革命行动搞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的普鲁士政府，不得不答应对波兹南大公国实施“民族改组”，口头上同意行政机构和学校波兰化，成立波兰民族自卫军并撤退普鲁士占领军。但是，这个空洞的许诺纯粹是反革命伎俩，德国统治阶级根本无意放弃占领制度，只是想争取喘息时间，以便卷土重来，扼杀波兰起义，重建殖民统治。3月下旬，由于左派的坚持，特别是由于农民群众的巨大压力和强烈愿望，波兹南“民族委员会”在农民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笼统地宣布降低一般农户的租赋、无地农民由政府“给予关怀照顾”，取消了地主的许多封建特权。对于参加起义军的农民，凡是自耕农者，允诺豁免租赋；凡是无地农民者，则从国有土地中分配土地。波兹南“民族委员会”对于本地区最尖锐的农民问题，即如何没收地主土地并在贫苦农民中分配的问题，却采取了回避和缄默的态度。这种革命不彻底的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占据了委员会领导职务的地主分子不愿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过分”损害自己阶级的利益。当时，波兹南地区广大农民群众怀着炽烈的爱国热忱，迫切希望赶走外国占领者，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对这种不彻底的改革暂时抱容忍态度，没有立即对地主庄园采取革命行动，而是热心于组建农民武装，准备与外国占领者决战。为了保持对农民武装的领导权，波兹南“民族委员会”设置了军事部。3月底，军事部还制订了武装攻入俄占波兰王国、扩大起义的计划。梅洛斯拉夫斯基为了赢得时间训练“正规军”，制止了这一计划的实施。

普鲁士当局惊慌万分地注视着波兹南事态的发展，唯恐波兰起义力量发展壮大，从根本上动摇它在波兰地区的统治，因而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反革命进攻。4月3日，经普鲁士国王批准，驻波兹南普军首领科隆姆悍然宣布波兹南大公国处于紧急状态，并开始

向各地派出讨伐军。在左派的压力下，波兹南委员会采取了对策，秘密宣告成立“临时政府”，以便在与普鲁士关系破裂时领导武装斗争。慑于波兰起义战士的不屈态度和战斗准备，蠢蠢欲动的普军未敢轻启战端。狡猾的普鲁士政府图谋通过“和平途径”消灭起义军，扑灭波兰“革命传染病”。4月5日，以国王特派员身分抵达波兹南的维利森将军宣称，“民族改组”的允诺只有在解除波军武装的条件下才能付之实施，而建立“民族自卫军”则更是无限期将来的事。右派分子同意接受这个实质上等于投降的条件，宣称这是挽救“自治”的唯一办法。4月11日，在雅罗斯瓦维茨村，民族委员会与维利森达成了妥协的协议。根据协议，为了换取“民族改组”，波兰人只能保留不足3000人的武装部队，其余一万几千名志愿军应予解散。当协议下达时，“镰刀军”、“射手队”的战士群情激愤，高呼“这是叛卖！”普鲁士当局得寸进尺，步步进逼，连这个协议也不予承认。4月14日，普鲁士政府发表声明，把在波兰地区西部和北部的10个县，从原定的改组范围内一笔勾销，其借口是这些县的德国居民占多数。4月25日，普鲁士当局公然撕毁协议，对波兹南大公国重新作了划分，在总数26个县中，只给波兰人留下9个县以及6个县的小块地区，波兹南市正式并入德国。与此同时，3万名装备精良的普军开赴各地，进行讨伐，解散民族委员会，解除农民武装，凌辱当地居民，忍无可忍的农民奋起反击，自动拿起镰刀、长矛，组成武装分队，在城市和村庄入口处修筑战壕和掩体，迎头痛击进犯的敌人，或者流动作战，袭扰敌人后方，从而打破了占领当局原来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戡平骚乱”的狂妄计划。然而，农民的武装斗争是自发的、分散的，缺乏有力的领导，所以无法把斗争引向最后胜利。当时，把起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彻底的社会改革和武装农民，来实现民族民主革命。但是，领导波兹南起义的右派并不是彻底的革命派，他们优柔寡断，缺乏行动勇气。当时作为波军总监的梅洛斯拉夫斯基统率着仅存的四五千波兰正

规军，继续坚持“常规战争”的错误路线，没有支持和联合农民武装，壮大起义力量，向敌人主动进攻，而是按兵不动，无所作为，贻误时机，甚至还幻想与普鲁士当局取得妥协，共同进行反对沙皇俄国的斗争。

米洛斯拉夫战役 波兹南起义的失败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普军对起义军发动了进攻。4月29日，4500名普军猛扑克祥什起义军驻地，以原农民“镰刀军”为主要成分的1000名起义军坚强不屈，奋起抵抗。在伤亡过半、指挥官弗·东布罗夫斯基壮烈牺牲的情况下，普军攻占和焚毁了这个营地。翌日凌晨，普军又挟其优势兵力和强大火力向起义军总部所在地米洛斯拉夫营地发动疯狂进攻。手持镰刀、长矛的起义军战士毫无惧色，奋勇格斗，不但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而且转入反攻。鏖战竟日，起义军取得了全胜，损失惨重的普军狼狈溃退。可是，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起义军上层军官却在敌人强兵压境的情况下丧失了斗志。在胜利的当夜，就有数十名军官从营地潜逃了。这与起义军普通战士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对照，也与波兰农民高昂的爱国热情有天渊之别。第二天，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纷纷要求参军参战，不但补充了起义军的战斗损失，而且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势。5月2日，起义军一鼓作气，乘胜进击普军，在符热希尼亚附近的索科洛夫村附近展开了激战。为震天的炮声和动地的厮杀声召唤来的武装农民自动投入了战斗，与起义军战士并肩冲杀。起义军以昂扬的士气压倒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重创敌军，再一次取得了战斗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密切注视着波兰起义的发展，他们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不但深刻地揭露了普鲁士反动当局的欺诈行为，愤怒地谴责了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所谓的“改组”波兹南是对波兰的“第七次瓜分”，还盛赞了波兰人民不畏强暴、顽强抗敌的革命英雄主

义：“三千个好歹用镰刀和长矛武装起来的波兰人，曾两次打垮两万组织严密和装备良好的普鲁士人，两次迫使他们退却。”^①

米洛斯拉夫等战役的胜利理应成为广泛武装人民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并把起义事业扩展到全国的起点。事实上，5月初，在波兹南附近，在瓦尔塔河畔的森林里，在一些城镇和农村，已出现了许多游击队，他们与普军发生了一系列武装冲突，击退了普军的进攻。在克罗托夫斯基领导下，游击队在自己控制的地区重建了起义政权。但是，梅洛斯拉夫斯基仍犹豫不决，没有采取果断行动，听凭普军逐个击破游击队。混入起义队伍担任要职的贵族军官以叛逃、哗变和拒绝执行命令等破坏手段，使起义军陷于瘫痪和瓦解状态。在普军的进迫下，梅洛斯拉夫斯基率领遭到严重削弱的起义军且战且退，撤至普、俄边境。5月6日，进退维谷的梅洛斯拉夫斯基眼看大势已去，辞去了统帅职务，出走西欧。5月9日，接管起义军指挥权的右派分子不顾下层官兵的抗议，签署了投降议定书，从而葬送了波兹南起义。普军对起义战士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大批宁死不屈的战士遭到杀害，监狱里塞满了被捕的起义者。所有被俘的起义人员一律被剃成光头，并野蛮地在他们手上和耳朵上用硝酸银打上永不消退的烙印。但是，一直到夏末，隐匿在森林里的一些“镰刀军”还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于是，普军对波兹南全境进行扫荡和清剿，烧杀掳掠，为所欲为。这一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柏林被击溃的反动军阀在波兹南重新抬头；他们在挽救德国的荣誉和民族利益的幌子下举起反革命的旗帜，镇压我们的同盟者，革命的波兰人。”^②

镇压波兹南的波兰起义是全欧范围内反革命势力抬头的第一

① 马克思：《新年贺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89页。

②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92—393页。

个危险信号。它也助长了柏林封建军阀集团的嚣张气焰，他们的下一步打算便是准备镇压德国本土的革命。

波兹南起义尽管持续时间不长，仅限于大波兰地区，而且由于主客观方面的一系列原因，没有演变为全波兰人民反对占领者的解放战争，但它有力地显示了波兰农民和城市贫民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坚强决心和无比勇气，促进了波兹南地区波兰人民的民族觉醒，振奋了波兰其他地区人民的革命精神，是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光荣的一页。另外，由于这次起义把革命火种引向了东欧，因此，波兹南起义也是1848年欧洲革命史上重大事件之一。

1848年西里西亚的革命运动

在全波兰各地区中，处于普鲁士统治下的西里西亚是资本主义关系最为发展的地区：发达的工业、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队伍、农村中严重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由此，在1848—1849年革命中，这个地区的斗争呈现出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既有旧矛盾，如农民与贵族以及容克地主的冲突，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的冲突；又有新矛盾，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贫苦农民与富裕农民的冲突。此外，还有激化中的波兰与德国的民族矛盾。

1847年席卷欧洲的经济危机、歉收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物价飞涨、瘟疫也冲击了西里西亚，加剧了社会矛盾。在弗罗茨瓦夫、尼萨等许多城镇爆发了反对物价腾贵、囤积居奇的群众斗争风潮。在霍佐夫发生了西里西亚矿区的第一次矿工罢工。

在法国二月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西里西亚革命运动的爆发甚至先于柏林三月革命。早在3月6日，弗罗茨瓦夫的人民群众就与普鲁士占领军发生了首次冲突。城市贫民、手工业工人和工人向市议会施加压力，要求它向政府当局呈递保障民主权利的请愿书。3月16日，再次出现了人民群众与军警的街头武装冲突事件。政府当局慑于群众街头示威游行的巨大声势，被迫释放了政治犯并同

意成立国民自卫队。柏林革命的消息传来后，佛罗茨瓦夫的手工业者、工人的革命情绪高涨，立即行动起来夺占了军火库，掌握了部分武器，惊惶失措的地方官员逃之夭夭。当人民群众在街头搏斗时，当地的德国资产阶级乘机窃取了政权，成立了“公安委员会”。他们无视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愿望，与国王达成了妥协性的“谅解”，为自己谋取阶级私利。在西里西亚地区的其他城市，如布瑞克、累格尼察、耶累尼亚—古腊、科华雷、腊齐布什、希维德尼察等地，革命运动的爆发和进展近似于佛罗茨瓦夫。几乎所有的西里西亚城市都出现过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共同参加的游行示威浪潮。无产阶级表现出了巨大的革命积极性。4月中旬，佛罗茨瓦夫的工人群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要求工作、降低物价和提高工资，并修筑了街垒，与前来镇压的政府军警、德国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自卫队展开了几天的巷战。5月上旬，在经济危机猛烈袭击、工人失业严重、民不聊生的上西里西亚各城市，这种街头冲突的浪潮汹涌澎湃，此伏彼起。在苏台德—波特古热地区，纺织工人的处境尤其悲惨，贫穷和失业促使他们奋起斗争，剧烈的街头冲突大有再次重演1844年纺织工人起义的趋势。惶惶不安的政府当局火速派出军队进行镇压，在这里，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再次显示了他们的叛卖性，他们控制的自卫队参加了绞杀革命运动的军事行动。

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的同时，从3月底开始，西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也随之蓬勃兴起。4月初，群众性的农民起义如同燎原的烈火燃遍了几乎整个西里西亚。农民运动普遍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性质：拒不履行劳役义务，拒绝交纳一切租赋捐税，农民甚至向地主追还过去一些年代交纳的地租。在一些地方，贫苦农民还分了地主的土地、财产、粮食。农民成了土地和村庄的主人。当时，处于城乡革命运动重重包围之中的政府当局焦头烂额，穷于应付，只能号召农民“安静”下来，并以空洞的改革诺言抚慰和欺骗农民，麻痹

农民的革命斗志。但是，在城市资产阶级与政府拍板成交，达成首批妥协，开始叛卖革命，使运动转入“合法”轨道以后，普鲁士政府就派出大批“清乡”部队，开赴各地，镇压农民运动。4月下旬以后，农民运动开始呈现退潮趋势。这是由一系列原因酿成的。首先，农民运动的自发性和分散性，使农民武装难于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对抗政府部队的讨伐，而被逐个击破。其次，农民运动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而轻信“好国王”，希望通过政府允诺的改革来解除封建义务。第三，农民内部的冲突。运动初起，农民各阶层采取了共同的反封建行动，随着斗争的深入，富裕农民害怕贫苦农民提出的分地要求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因而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削弱了运动的声势。第四，城市资产阶级的态度。他们害怕汹涌奔腾的农民运动的洪流会冲决一切，甚至破坏资本主义关系。因此，佛罗茨瓦夫等地的资产阶级派出了自己的自卫队协助政府军“平定”农民起义，或者呼吁农民等待“国民议会”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以此制止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如此，持续到1849—1850年的西里西亚农民运动终于摧毁了封建地主的无上权势，迫使政府再次肯定废除农奴制，并对有关条例进行了有利于农民的修订。西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不但在斗争中改造了社会，而且对西里西亚和波兰各地革命运动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1848年5月初，在西里西亚掀起了一个政治运动，即选举议员进入两个“国民议会”：柏林的普鲁士议会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全德议会。资产阶级容克地主自由派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保持、巩固或争取扩大自己的权利，进行了激烈的角逐和斗争。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也藉选举的机会，提出了自己的社会要求和民族要求。争取民族平等，特别是语言方面的平等权利的斗争尤为突出。为使用民族语言而进行的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迫使普鲁士当局同意在国民小学里讲授波兰语，制止了西里西亚的进一步德意志化。在争取民族民主权利的斗争中，波兰人还创建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民族

俱乐部”，许多工人和农民参与了该俱乐部的活动。广大波兰人民的民族觉醒在斗争中有了很大提高。

1848年夏季以后，随着全德反革命势力的转入进攻，西里西亚的工人和农民发动了革命反击，阶级斗争再度激化。农民坚决要求彻底取消农奴制残余和地主特权。农民的对抗运动最后迫使政府颁布有利于农民的新的赎买条例。城市也呈现出一派紧张形势，工人发动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反对失业、物价腾贵和要求提高工资。整个秋季，在累格尼察、弗罗茨瓦夫等城市，频频发生示威群众与军队的流血冲突。波兰和德国的工人群众团结一致，为捍卫自己在革命运动中取得的成果和民主权利而斗争。该年秋冬之际，德国反革命势力加强了进攻。西里西亚地区德波两国工人农民在民主派支持下，奋起抵抗。在许多城市建立了“公安委员会”，接管了政权和金库，酝酿成立西里西亚共和国。在聂莫特里那，波德的手工业工人和郊区农民高举红旗，行进到市政府，迫使市长分发了枪支，准备展开武装斗争。只是由于资产阶级逐步向政府和反革命势力靠拢，工农群众热切要求宣布成立西里西亚临时政府的提议才未能实现。12月5日，普鲁士国王悍然下令解散国民议会。西里西亚开始了白色恐怖和迫害工人、农民和民主派的反动局面。1849年3月，在封建反动势力已在德国各地区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法兰克福全德议会通过了具有进步意义的全德宪法，并决议把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帝位授予普鲁士国王。4月，普鲁士国王不但拒绝不接受帝位，而且发出通告，反对统一德国和全德宪法。像德国许多地区一样，西里西亚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把宪法看做是三月革命的仅存的成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护宪运动。4月底5月初，西里西亚举行了多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开始了保卫革命的最后斗争。5月6日，弗罗茨瓦夫工人群众的示威队伍与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工人们筑起了大批街垒。翌日，军队向市中心的7个大街垒发动了

进攻，德国和波兰工人英勇抵抗，多次击退了敌人的冲锋。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直到深夜，数量和火力占绝对优势的军队才攻占了街垒。弗罗茨瓦夫工人的失败意味着西里西亚革命运动的告终。

普鲁士当局在镇压了革命运动以后，强化了反动专政，解散了所有的民主团体，封闭了一切进步报刊。革命成果几乎丧失殆尽。但是，只是在一个领域内，即土地制度上，统治阶级不得不有所收敛。农民起义的刀光剑影使地主阶级心惊胆颤。正是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在农民继续拒服劳役的情况下，1850年3月2日，普鲁士当局对西里西亚颁布了新的土地法规，减轻了农民的赎买负担。尽管这个法规与农民的革命要求相距甚远，使西里西亚沿着充满痛苦的改良主义道路，即“普鲁士道路”走向资本主义，然而这毕竟是农民斗争的一个得之不易的成果。正是在1848—1849年的革命年代里，西里西亚人民通过斗争终于消灭了封建制度。对波兰人民来说，这一革命年代还是民族觉醒的开始，为保持波兰语和民族特性的斗争成果遏止了强制性的民族同化，为这一地区后来与波兰的合并创造了有力前提。

1848年加里西亚的革命运动

1846年革命风暴之后，奥地利占领当局用反革命暴力恢复了加里西亚的旧制度，但该地区并未稳定下来，农民群众反抗农奴制的斗争仍在继续。1848年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了梅特涅统治以后，加里西亚人民群情激动，准备再次掀起民族独立斗争。3月17日，在涌上街头的群众的压力下，克拉科夫市政当局不得不释放了关押的“政治犯”——波兰独立战士。利沃夫市的波兰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其头面人物斯莫尔卡的带领下迅速行动起来，在市民阶层和地主贵族的参与下，建立了各级民族委员会，抢先把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于3月19日拟订了致

奥皇的请愿书，提出了一般的民主自由要求。为了安抚农民，他们还宣称同意废除农奴制。4月初，以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人物为首的、由数十人组织请愿团到达维也纳，向奥皇呈递了请愿书。在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下，请愿书把原来要求区域自治的内容改为请求奥地利帮助波兰恢复独立，还要求宣布废除农奴制，通过赎买给予农民土地。可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的改良主义的土地改革方案并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农民群众在获悉革命爆发的消息后，坚持要求无偿分配土地。在紧张的阶级对抗形势下，从海尔特曼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害怕爆发农民革命，呼吁地主在复活节（3月23日）前“自愿放弃”农奴制和“无偿”移交土地。在农民行动起来自发酝酿夺地的关键时刻，为控制爆炸性的局势，确保对该地区的占领制度，制造奥皇“关怀”、“爱护”农民的假象，加里西亚总督斯塔迪奥恩不等奥皇批准，匆匆于4月22日发布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而且伪造签署日期为4月17日。同时，他还声称在“适当时机”由国家负责对地主进行“补偿”，这一措施有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仿佛农民获得土地既不是革命的结果，也不是地主的“善意”，而是皇上的“恩赐”，从而既可以使农民与革命割断联系，又可以拿“补偿”为香饵，诱使波兰地主俯首就范，放弃民族要求，有利于巩固奥地利占领制度。但是，从客观上讲，农奴制的废除乃是1848年革命的一大成果，是加里西亚农民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结果。由于废除了农奴制，加里西亚地区约有52万8千农户无偿获得了土地，取消了总数达1650万个劳役日和800万个“马工日”或“车工日”^①，每个农户平均每年减少了31个劳役日和15个马工（或车工）日^②。农

① 马工日指农民用自己的马为地主庄园无偿服役的日子；车工日指农民用自己的大车为地主庄园无偿服役的日子。

② 斯蒂希：《波兰经济史纲》，第165页。

民向地主交纳的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也大为减少,农民掌握了全地区约 3/4 的土地,从而显著地改善了自己的处境。从此,加里西亚地区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

农奴制的消灭和农民的土地要求得到一定满足并没有使加里西亚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烟消云散。在许多城市里,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向占领当局施加压力,为争取民族民主权利而斗争。奥地利当局采取软硬兼施的伎俩,力图窒息民族解放运动。4月26日,全副武装的奥军开入克拉科夫市。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工人不顾“民族委员会”里右派分子的多方阻拦,不管资产阶级国民自卫队的袖手旁观,毅然在城市中心筑起了街垒,击退奥军的进攻。奥军对城市进行了炮轰,势单力孤的克拉科夫人民被迫停止战斗。这是1848年全欧洲范围内,反革命势力在城市巷战中取得的第一次军事胜利。

加里西亚革命运动的命运与全奥地利境内的形势息息相关。随着全欧范围内反革命力量的猖獗,奥地利的反动派也采取了攻势。11月1日,在奥军向维也纳起义人民发动最后攻势的同时,加里西亚的奥军也开入利沃夫城内,企图解除波兰国民自卫队的武装。利沃夫的工人、手工业者自动修筑街垒,抵抗奥军的进攻。正当人民群众坚强不屈、准备殊死战斗的时刻,利沃夫的波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却心惊胆战,准备屈膝投降,他们命令拆除街垒,放下武器。人民群众对此置之不理,继续顽强抗敌。11月2日,奥军对城市进行了炮击,用武力扼杀了利沃夫人民的抵抗运动。奥地利当局宣布加里西亚全境戒严,解除了波兰人的一切武装,解散了所有的波兰团体,封闭了全部波兰报刊,大肆搜捕波兰爱国者和民主人士,在维护“秩序”的口号下,恢复旧制度。加里西亚的波兰民主革命派早在1846年革命中就遭到了极大摧残,元气大伤,在仓猝到来的1848年革命中更显得势单力薄,无力采取有效的反击行动。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开始时试图用合法斗争的形式,争取一些民主

自由权利，随着反革命势力的嚣张，便步步退却，放弃斗争。只有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不甘屈服，经由喀尔巴阡山麓，参加了匈牙利起义军队伍，加里西亚的革命运动就此告终。

第四节 1848年欧洲革命与波兰革命战士

波兰在欧洲革命中的敌人与盟友

波兰革命和欧洲革命同命运、共呼吸，欧洲形形色色政治力量对革命的态度同时也就决定了对波兰人的态度。在欧洲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以沙皇俄国为首的俄、普、奥三国反革命同盟从来就是一切革命的死对头，它们也极端仇视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在1848年革命的年代里，沙皇尼古拉一世气急败坏地进行了紧急军事动员，把40万大军从俄国腹地调集到波兰境内，加强警戒，实施恐怖统治，从而在俄军所占领的波兰边界上形成了一道牢固的反革命防波堤，阻挡革命浪潮涌向欧洲东部。因此，尽管波兰王国地区的波兰革命派以华沙为中心，进行了地下秘密活动，却无法实现武装起义的计划。更有甚者，沙皇政府还虎视眈眈，在邻近波兹南、加里西亚的边境地带派驻重兵，随时准备出兵帮助普鲁士、奥地利镇压波兰革命运动和武装干涉其他国家。由此可知，沙皇俄国是奥、普反动派的后盾，是波兰民族民主运动的死敌。

不仅沙皇俄国仇视波兰革命，而且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保持欧洲大陆列强间的力量均衡，也反对在抗俄革命浪潮中重建波兰。为此，1848年3月下旬，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告诫普鲁士国王，要他放弃对俄开战的想法，同时向沙皇暗示，怂恿他主动考虑建立一个沙皇卵翼下的波兰国家。此后，在国际舞台上，波兰革命者处处遭到英国的冷遇和反对，根本原因就在于保守的英国想以牺牲

波兰为代价，联合俄、奥控制欧洲政局。法国、德国、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为了争取自身的统治权而参加了革命运动，然而他们害怕革命的深入开展会导致工人阶级力量的迅速增长，会危及他们的阶级利益。因此，他们经常叛卖革命，都把沙俄看作是自己的最后支柱。与此相关连，他们也随时准备出卖波兰的革命利益，从刚开始时的表面支持到后来的公开背叛。早在1848年4月，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拉马丁就从与普鲁士联合行动反对俄国的立场上退了回来。5月，他又公开声称，法国不会干涉波兰问题，不会从物质上帮助波兰人反对俄国。与此截然相反，法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对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一贯表示热烈同情和坚决支持，他们懂得，波兰革命关系到战胜共同的敌人沙皇俄国和各国反动派，关系到欧洲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命运。波兹南起义的消息传到巴黎后，法国资产阶级只是以空洞的赞扬来掩饰行动上的怯懦，而巴黎人民却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支援波兰起义。5月15日，巴黎15万工人发动了强大的示威游行，他们举着波兰国旗，高呼“波兰万岁”，浩浩荡荡地向反动派控制的国民议会行进，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作出决议，出兵协助波兰起义者。示威的领导人布朗基还为此发表了热情的演说。由于群众的要求遭到拒绝，示威者曾宣告解散国会议会和成立革命政府，但他们被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驱散了。此后数日，法国国民议会虽然作出了“重建自由和独立的波兰”的决议，但只是纸上谈兵，并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真心诚意支持波兰革命。在德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革命初期，德国资产阶级为了统一国家，抗击沙皇的压力，发出了一阵对波兰“同情”和“支持”的聒噪声，甚至提出了对俄开战的设想。然而，他们的“同情”只限于对俄占区的波兰人，认为普占区的波兰地方过去和将来“永远”属于德国。1848年4月初，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控制的法兰克福“预备国会”通过了谴责瓜分波兰、支持恢复波兰的决议。当时，尚未背叛革命的德国资产阶级想把波兰作为抵挡沙皇尼古拉

干涉德国革命的缓冲国。在人民的支持下，柏林、莱比锡等城市还建立了“援助波兰委员会”。在波兹南起义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决定性地转向反革命，同时也结束了对波兰问题的有限支持。重新划分波兹南的问题提到了法兰克福议会的议事日程。7月，在国民议会的3天辩论中，所有政治派别的代表都口若悬河地发了言。可是，从右派到所谓“自由派”，都在“健康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名义下，反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仅有个别的民主派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波兰人。只有德国的革命派，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它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站在革命立场，始终不渝地捍卫波兰民族利益，支持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法兰克福议会辩论波兰问题的过程中，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辛辣地讽刺了这些波兰人民的公开的敌人和伪装的朋友，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民族沙文主义面目。恩格斯还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深刻地论证了波兰人民重建独立国家的历史权利，有力地阐明了波兰革命与德国革命的关系，从舆论上、道义上支援了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与此同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德国工人阶级和民主派的努力下，柏林和德国各地的工人团体和民主派组织展开了广泛的活动，谴责普鲁士政府的反波政策，以种种实际行动支持波兰革命运动，并在国际上与波兰革命者建立了活跃的联系和合作，相互支持，为反对德波人民的共同敌人普鲁士反动派和沙皇俄国而斗争。

总之，无数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以沙皇俄国为中心的欧洲各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是波兰人民的敌人，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派是波兰人民的盟友。

法、意、德、罗、匈等国革命中的波兰人

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民族解放斗争锻炼的波兰革命者深深懂得，为了争取波兰的独立和进步，除了在国内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

起义外,还必须联合国际上的革命力量共同奋斗。因此,在1848年的革命浪潮中,为数众多的波兰革命者以忘我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投入了欧洲各国的革命战斗,他们把欧洲革命的成败和波兰的解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恩格斯后来所概括的:波兰人“经过百年来的压迫,已处于这样的境地:或者起来革命,支持西欧的一切真正的革命起义,作为解放波兰的第一步;或者就只有灭亡”^①。因此,“他们始终站在革命方面,……在巴黎、维也纳、柏林,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波兰人都参加了历次革命和革命战争。”^②

事实正是这样。1848年春,法国革命爆发后,激起国内外的波兰革命者巨大的斗争热情,热烈同情和支持法国革命。当巴黎工人阶级发动六月武装起义,与资产阶级进行历史上第一次伟大战斗时,侨居巴黎的波兰革命者毅然站在工人一边,参加了六月起义的街垒战。稍后,波兰最著名的爱国诗人、民主主义革命家亚当·密茨凯维支来到了巴黎,与法国以及德、意等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民主派一起创办了《人民论坛报》,并任该报主编。《人民论坛报》在它创办的初期,大力宣传民主共和思想,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密茨凯维支以昂扬的革命激情,优美酣畅的文笔,写作了许多政论文章,捍卫工人、农民的利益,批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他还以巨大的注意力研究国际问题,提出了各国人民团结友爱、为自由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奋斗的思想和口号,鼓舞了法国和各国革命者的斗志。

在意大利革命中,由密茨凯维支1848年3月29日组建的波兰义勇兵团转战各地,与意大利共和主义者并肩抗击奥地利占领者和意大利反动派,为保卫伦巴底革命、罗马共和国作出了自己独

^①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42页。

^②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38—339页。

特的贡献。波兰革命者还参加了西西里岛人民的武装起义，原波兹南起义的著名将领梅洛斯拉夫斯基被任命为起义军的总司令，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保卫西西里浴血奋战，战功卓著。

在革命烽火燃遍德国各地的日子里，人数众多的波兰革命者站在第一线参与了战斗。这里，波兰人的第一个战斗场所是维也纳。以约·贝姆将军和尤·哥斯拉尔为杰出代表的波兰革命战士，在1848年10月下旬保卫维也纳的战役中处险不惊，英勇善战，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实际上是维也纳保卫战统帅的贝姆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恩格斯稍后在评论维也纳起义时，曾赞誉贝姆说：“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末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①只是由于领导机构的对他不够信任，他不得不辞去指挥职务。但他的余威尚在。在强敌围攻下，“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个’，在很多地方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的。”^②维也纳起义失败后，许多波兰革命战士被枪杀，贝姆则脱险逃往匈牙利。在1849年的巴登革命中，数百名波兰革命者组建了波兰兵团，为保卫巴登革命而战。在西西里起义中负伤初愈的梅洛斯拉夫斯基刚刚来到巴登，就接任了起义军总指挥的职务。在敌人兵力占压倒优势的危急情况下，梅洛斯拉夫斯基组织力量，艰苦支撑，顽强地抗击普鲁士军队的凌厉攻势达1个月之久。巴登革命濒于失败时，波兰革命战士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撤离战场，越过国境，进入瑞士。

1848年的革命浪涛也冲击了多瑙河上的罗马尼亚诸公国。摩尔多瓦、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等国相继爆发革命。流亡罗马尼亚的数百名波兰人，主要是1846年起义战士，先后参加了罗马尼亚各地的革命运动，并成立了波兰兵团，与罗马尼亚革命者并肩战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72页。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72页。

斗,共同抗击沙皇俄国和土耳其入侵者,为保卫罗马尼亚革命不惜流血牺牲。

匈牙利起义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最后一个小高潮。在匈牙利革命如火如荼展开后,数百名波兰革命者和青年越过喀尔巴阡山脉进入匈牙利境内,与侨居匈牙利的数千名波兰人一起,参加了起义队伍,在匈牙利革命的旗帜下,为抗击波匈人民共同的压迫者奥地利占领者而战。辗转来到佩斯的波兰著名将领贝姆以及维索茨基、邓姆宾斯基等人,担任了匈牙利起义军的高级领导职务。面对奥军的强大攻势,仅有3000人的波兰军团独当一面,骁勇善战;贝姆等人指挥有方,力挫强敌,屡建奇功,重振军威,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为支援匈牙利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贝姆,他受委派全权指挥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战争。他不但擅长用兵,而且善于团结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农民群众共同抗敌,深受军民爱戴,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贝姆老爹”。在贝姆指挥下,得到波兰军团紧密配合的匈牙利起义军击溃了奥军,赶走了俄军,解放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巩固了匈牙利起义者的后方。恩格斯在谈到贝姆在特兰西瓦尼亚取得的辉煌的军事胜利时,称誉他是“当代最有天才的统帅”^①。匈牙利革命领袖科苏特十分钦佩和赞赏波兰军团的英勇无畏、忠于革命,曾写信给波兰军团领导人,要求把波兰军团作为突击力量应付“非常事变”并部署在“最危险的地方”^②。波兰革命者打算在匈牙利起义顺利展开的情况下,率军进入加里西亚,重新点燃波兰革命火焰。然而,波兰革命者的美好愿望未能实现,穷凶极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惊恐万分地注视着匈牙利起义事态的发展。他一直把革命的波兰人看作沙俄称霸欧

① 恩格斯:《匈牙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9页。

② 参阅《波兰土地上的1846—1848年革命运动》(文献史料选),华沙,1958年,第38页。

洲的心腹之患,更不能容忍波兰人充当欧洲革命的先锋战士。早在1848年10月24日,他在致华沙总督帕斯凯维奇的信中就惊呼:“在革命前头到处都站着波兰人。”^① 尼古拉一世尤其害怕革命火种延烧到波兰等地会危及它在欧洲的霸主地位,悍然决定出动驻在波兰的大批俄军入侵匈牙利,扼杀起义,从而扑灭欧洲革命最后一座火山。尼古拉一世在战争宣言中公然声称,他的出兵不只是针对匈牙利人的,而且也是为了对付与之合作的波兰“暴乱者”。在俄国反革命武装干涉军和奥军的夹击下,腹背受敌的匈牙利起义军和波兰军团处境十分艰险。但是,匈牙利和波兰战士仍然临危不惧,坚强不屈,继续坚持抗敌,并取得了对俄奥反革命联军的一系列胜利,在战争后期,贝姆还担任了匈牙利革命军最高统帅的职务。只是由于敌人的绝对优势军力和起义阵营内部一些不坚定分子的叛卖活动,匈牙利革命才最后归于失败。伤亡严重的波兰战士战斗到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战斗阵地。贝姆、邓姆宾斯基等人率领残部转移到土耳其境内。落入敌手的波兰革命者和匈牙利起义军一起遭到了血腥的屠杀和镇压。

波兰革命的历史地位和成果

如前所述,由于波兰的历史传统和所处的地理、战略地位,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全欧意义,在欧洲革命史上起了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这一点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在这次席卷全欧的革命浪潮中,波兰人民不仅进行了反对外国占领者的英勇斗争,而且有成千上万的波兰革命者以忘我的牺牲精神和昂扬的国际主义精神投身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去,沉重地打击了以沙皇俄国为核心的反动势力,为欧洲革命作出了难能可贵的独特贡献。正因为如此,波兰革命者被马克思

^① 里曼诺夫斯基:《波兰民主史》第2卷,华沙,1956年,第230页。

誉为“欧洲的不死的勇士”^①。恩格斯则指出：“波兰人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认识和真正的革命精神。”^②

19世纪60—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和研究了波兰问题后,他们对波兰革命的历史地位和波兰革命战士的历史功勋都给予了极其崇高的评价。他们指出,波兰的民族独立问题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为了击败沙皇俄国在欧洲的压倒一切的反动权威,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支持和联合波兰:“……在法国和德国,人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决定性的关键在于:联合波兰,革命就保证成功,否则,革命就必须死亡,……欧洲所以处在沙皇的支配之下,就是因为放弃了波兰。……正是这一特点使波兰对一切革命者说来都具有莫大的意义,使我们现在也要高呼:波兰万岁!”^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再度回顾波兰革命者的业绩时还指出:“在1848年和1849年,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的革命大军都有很多波兰人。他们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指挥官,都表现得拔类萃。”^④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考察和估价波兰在欧洲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时得出结论说:“不仅在斯拉夫民族中,而且在欧洲民族中,波兰都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份进行战斗的民族。”^⑤他们还说:“‘波兰万岁’这个在当时响彻整个西欧的口号,不仅表达了对遭受暴力摧残的爱国战士们的同情和钦佩,人

① 马克思:《1867年1月22日在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5页。

②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7—198页。

③ 恩格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9—4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6页。

⑤ 恩格斯:《支持波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页。

们还用这句口号向这个民族表示敬意。”^① 总之，波兰革命战士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绩，是各国人民团结战斗、互相支援以推进革命事业的光辉榜样！

1848年波兰革命虽然失败了，然而外国占领者和波兰地主阶级一笔勾销革命成果的罪恶图谋并未得逞。不论1849年以后反革命势力如何狂暴肆虐，猖獗一时，重新剥夺了劳动群众在革命中取得的许多民主权利。但是，要保持波兰封建农奴制的古老面貌已是不可能的了。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奥占区加里西亚被迫取消了农奴制，农民获得了土地，使加里西亚摆脱了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进入资本主义开拓了道路。普占区也在革命浪潮冲击下，通过农业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俄占区的波兰王国的农民也争取到了不得随意剥夺土地的权利，限制了地主的专横权力，改善了自己的处境，为60年代初的解放农奴奠定了基础。总之，急风暴雨式的1846—1848年的波兰革命震撼了封建统治的腐朽基础，加速了它的彻底崩溃。农民群众用革命方式改造了土地制度，占领当局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所给予农民的，大都只是农民在斗争过程中自己已经实现了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是被迫接受既成事实，予以承认而已。还应指出，波兰革命也有力地冲击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统治当局，加速了奥普两国封建农奴制的瓦解，具有很大的革命意义。这一切，有力地展示了革命斗争是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

其次，这次革命运动把愈来愈广泛的社会阶层卷入了斗争的激流，不只是大中城市的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而且广大农村地区原来处于社会主流之外的千百万劳动农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政治锻炼，促进了民族觉醒，加速了波兰民族

^① 马克思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5页。

形成的过程。革命运动失败的沉痛的经验教训还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派,使他们从传统的陈腐观念、过时的纲领、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解放了出来,提高了思想觉悟和阶级觉悟。随着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生活的重趋活跃,波兰工人阶级逐步成长壮大,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波兰的民族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第八章 1848年匈牙利革命 与民族解放战争

第一节 革命前的匈牙利

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公元896年,马扎尔族(匈牙利族)游牧部落从乌拉尔山脉移到匈牙利平原定居,建立了匈牙利王国。从16世纪起,土耳其、奥地利先后侵占了匈牙利,土、奥之间又不断发生争夺匈牙利的战争。1699年,奥地利打败了土耳其,通过英国的斡旋,签订了考罗曹^①和约,规定除泰迈什地区^②之外,土耳其放弃整个匈牙利,归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匈牙利人民遭受着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实行的殖民政策完全践踏了匈牙利的主权。在政治上,匈牙利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匈牙利的国王由奥地利的皇帝兼任。虽然匈牙利法律规定,匈牙利国王和匈牙利议会共同管理国家,如无议会同意,他既不能正式颁布敕令,也不能征

① 考罗曹亦译卡尔洛维茨,即今南斯拉夫诺维萨德东南的斯兰斯基·卡洛弗奇镇。

② 以今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为中心的一片地区。

收赋税和召募新兵；议会至少每三年要由国王召开一次。然而从1812年起，奥地利皇帝在13年间从未召开过议会，国家政权完全控制在奥地利统治集团手中。在经济上，匈牙利没有自己的货币，没有本国工业，对外贸易90%以上被奥地利所控制，不能实行独立的对外贸易政策。在军事上，匈牙利没有自己的军队。在文化上，德语被定为官方语言，一切民族文化活动都被禁止，匈牙利的民族文化遭到摧残。总之，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使匈牙利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完全依从奥地利，变成了奥地利的附庸国，使匈牙利仍然处于封建落后状态。

这一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匈牙利仍居于统治地位。贵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仅占匈牙利人口总数5%的贵族地主，却拥有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9%，而广大的农民和农奴则无地或占有少量的土地。1846年，匈牙利172.5万户农民中，60%的农民是没有土地的，其余40%的农民也只占有少量土地，其土地面积仅为土地总面积的31%^①。农民使用地主一小块土地，必须承担繁重的劳役，并将收获的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缴纳给贵族地主。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迁徙自由，连结婚也必须得到地主的允许。而匈牙利的贵族地主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庇护下，享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他们不缴纳赋税，可以随意打骂甚至处死农民。贵族地主的残酷压迫与剥削，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贵族地主的统治。

当时匈牙利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主要民族为马扎尔族。根据1842年著名的统计学家费涅什·埃莱克的统计，匈牙利王国（包括匈牙利本土、埃尔代伊和霍尔瓦特）共有1200多万居民，其中匈牙利人为480万，罗马尼亚人为220万，斯洛伐克人为160万，奥地利人120万，乌克兰人40万，塞尔维亚（现属南斯拉夫）人32.4

^① 普·巴赫：《匈牙利资本的原始积累》，布达佩斯，1952年，第93页。

万人,克罗地亚(现属南斯拉夫)人10.8万人等。匈牙利被奥地利占领后,哈布斯堡王朝为了巩固它在匈牙利的统治地位,便勾结匈牙利的大贵族地主,不仅给予他们种种特权,而且还保证他们像德意志贵族一样,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喀尔巴阡山附近的地区统治和奴役斯拉夫民族。所以,“德国贵族和马扎尔贵族的利益是一致的”^①。匈牙利贵族坚持“一个政治民族”的观点,要求各少数民族要逐步匈牙利化,使各少数民族永远遭受匈牙利贵族的统治。匈牙利贵族为了维护封建贵族的统治,共同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他们与德国贵族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匈牙利人民不仅受着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奴役,而且受着匈牙利贵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

在匈牙利,少数民族反对匈牙利贵族的“一个政治民族”的主张,他们要求各民族均有独立的权利。随着匈牙利民族的觉醒,少数民族也开始觉醒起来。这些少数民族特别重视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探讨本民族的发展过程,霍尔瓦特族认为,南斯拉夫人是古代伊利亚人的后裔,罗马尼亚人是达科人和罗马人融合的结果。各少数民族为了推动民族运动的发展,他们相继办起了多种语言的报纸,塞尔维亚语、罗马尼亚语、斯洛伐克语和其他语言的报纸相继出版,这些报纸广泛宣传民族独立思想和愿望。

从18世纪后半期起,奥地利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了从匈牙利获得廉价的原料,便千方百计地强制匈牙利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为了在匈牙利推销商品,他们又百般阻挠和限制匈牙利发展民族工业,把匈牙利工业局限在加工农产品方面。同时,奥地利的资本家还在匈牙利开办工厂,利用匈牙利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榨取巨额利润。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严重地阻碍了匈牙利资本主义的发展,致使匈牙利到19世纪中期,仍然处于贫困落

^①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5页。

后之中。

资本主义的发展

尽管奥地利在经济上以种种手段阻挠匈牙利民族经济的发展,但是,在19世纪上半期,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和世界资本主义向匈牙利的渗透,匈牙利的资本主义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1846年,整个匈牙利已有875家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工人的队伍在迅速地壮大,从1815年的8.8万增加到1846年的23.3万人,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这时的手工工场多为一些染色、纺织、铸造工业企业,并开始采用蒸汽机。随着蒸汽机的使用,兴起了采矿业,在1841年,匈牙利煤的开采量居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第四位。商业也逐渐繁荣,从1828年到1846年,商人由9088人增加到21512人。濒临多瑙河沿岸的佩斯已成为当时匈牙利的商业中心。

匈牙利的对外贸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1816—1826年间,匈牙利的对外贸易额已达81652.7万福林。其中入口额为41725万福林,出口额为39927.7万福林。这时治理了多瑙河^①和蒂萨河,轮船开始通航,匈牙利成了东南欧商品贸易的中心。

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的交流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达和金融业的建立。在19世纪40年代,在佩斯和瓦茨、索普罗和威聂尔—涅丝达德特、佩斯和索尔诺克之间已修建了铁路,在佩斯建立了匈牙利商业银行和30多个储蓄银行。

这时,首都的两部分:布达和佩斯也有了迅速的发展。佩斯的高速度建设使城市面貌为之一新。1780年,全市人口只有1.3万人,到1848年,人口已达11万。许多公共建筑(匈牙利民族博物馆,州府大厦等)拔地而起。最有名的博览会都在佩斯举行。

在30—40年代,匈牙利的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也有了较大的

^① 指匈牙利境内的多瑙河南段。

发展。这时，第一批蒸气碾磨厂、酿酒厂、制糖厂和农业机械制造厂、铸铁厂等相继建成。

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实行阻挠匈牙利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妨碍了匈牙利国内的资本积累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因此匈牙利不能充分利用其天然资源来发展民族工业，工业发展的速度与奥地利相比还是相当缓慢的。

社会阶级关系

奥地利的民族压迫，使匈牙利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种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变化，匈牙利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各阶级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对待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也完全不同。

大贵族地主阶级。匈牙利的大贵族地主在匈牙利占统治地位，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是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可靠的社会支柱。哈布斯堡王朝保证他们的种种特权，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完全依附于哈布斯堡王朝。他们代表匈牙利最落后最反动的势力。他们竭力维护同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盟，坚决反对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但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当匈牙利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日益加深时，在大贵族地主阶级中也分裂出一个赞成实行部分资产阶级改革的反对派。

中小贵族地主阶级。中小贵族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均受哈布斯堡王朝和匈牙利统治集团的控制与排挤。在议会中虽然有他们的代表，但人数很少，不能享有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在经济上，小贵族绝大部分陷于破产，出卖了自己的土地。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同大贵族地主有很大差别。由于农业歉收，中等贵族土地上的收入减少。于是，他们从19世纪20—30年代，便开始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畜牧业、葡萄酒酿造业和开办纺织作坊等，成了资产阶

级化的贵族。在对待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上,这个阶级出现了两个派别,即温和派和激进派。温和派以巴蒂安尼为代表,主张实行一些较温和的改革,反对同哈布斯堡王朝分裂。激进派则要求废除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争取匈牙利独立,实行资产阶级改革,通过赎买方式废除农民的封建义务。这个派别虽抱有民族解放的愿望,但对少数民族则采取大民族主义态度,不承认他们有独立自主的权利。这个派别以科苏特为代表。

拉约什·科苏特(路德维希)(1802—1894年)是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匈牙利的民族英雄。他出身于小贵族家庭。青年时期深受法国革命思想的熏陶。早年就学于萨罗什保陶克大学,1823年取得律师资格,1824—1832年在自己的家乡泽姆普莱州担任地方官职。1832年底,他当选为波若尼(当时匈牙利的首府)等级议会代表,从此涉足政界。他主持创办了《议会通报》(1832—1837年),



图 45 拉约什·科苏特

作为议会反对派的喉舌,极力宣传保卫民族利益和进行社会改革。因而招致反动当局的嫉恨,于1837年被捕,坐了4年监狱。于1840年获释。1841年他创办了《佩斯报》,撰文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他认为不建立独立的工业和国内市场,匈牙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得不到发展;他主张把匈牙利变成一个单独的关税区,以利工业的发展;要求废除贵族免缴捐税的特权,通过赎买方式消除农民的封建义务。科苏特在1843—1844年匈牙利议会中组成了反对派,使议会通过了实行保护关税的议案。在议案被奥皇否决后,他便建立了“保护关税协会”,掀起了抵制奥货运动。1848年匈牙利民族解

放战争爆发后，科苏特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为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他在领导和指挥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和抗击沙皇俄国反革命武装入侵的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资产阶级。当时匈牙利的资产阶级刚刚成长起来，大部分是商业资产阶级。他们深受奥地利贵族及资产阶级的排斥和打击，又受匈牙利大贵族地主的压迫，所以，他们同哈布斯堡王朝及匈牙利大贵族地主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们要求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挣脱封建制度的束缚，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统一的国家。在他们的激进派当中还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哈布斯堡王朝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封建制度的勇气，在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因为如此，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它们只好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结成联盟。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山多尔·裴多菲。

山多尔·裴多菲(1823—1849年)是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中著名的活动家，匈牙利的民主革命诗人。他出身于多瑙河畔的基什克勒什的一个屠户家庭。他曾在匈牙利军队里当过士兵，后来作过流浪艺人。他走遍了全国，亲眼看到人民的疾苦，了解到处于奥地利政权和匈牙利地主双重压迫下的社会状况。裴多菲的思想形成的时期正是匈牙利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期，他的创作反映了当时民主革命思想和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他的诗歌鼓舞了匈牙利人民为争取



图 46 山多尔·裴多菲

自由独立而斗争的信心和热情。

小资产阶级。农民、小手工业者、小知识分子阶层和小商人都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受着双重压迫和剥削。他们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濒于破产，特别是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更为严重。他们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生活，承担着名目繁多的封建赋税，担负着沉重的封建地租。他们在遭受本国贵族地主剥削和压迫的同时，还经常受奥地利官吏的横征暴敛和奥地利驻军的骚扰和抢劫。

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革命民主派。这个派别要求匈牙利完全实行独立，争取在匈牙利确立民主制度，无条件地解放农民，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其代表人物是坦契奇·米哈依。

坦契奇·米哈依(1799—1884年)是匈牙利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出身于农奴家庭，青年时代曾当过学徒。40年代到国外，了解了工人运动，熟悉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坦契奇写了很多小册子，他的早期作品已表明他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他的作品充满了战斗精神。他尖锐地抨击了贵族地主阶级的法律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阐明了进行革命变革、无条件解放农奴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同时，他还通过自己的报纸和国民议会的讲坛公开捍卫贫民、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展开支持农民运动的坚决斗争。他因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两次被捕入狱，每次出狱后，仍继续进行革命工作。

无产阶级。由于匈牙利资本主义发展较晚，且很缓慢，所以当时匈牙利无产阶级的人数较少，不过10—12万人。在1848年革命前大部分是在小型手工工场，还有为数不多的染色、纺纱、铸造和其他行业的较大作坊里。由于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所以他们一般是要求废除封建行会特权，取消升为师傅的条件限制，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较进步的工人则提出了权利平等的反压迫等政治要求。

30—40年代争取改革的斗争

19世纪30—40年代是匈牙利风起云涌的争取改革的时代。30年代初,匈牙利的农业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农业危机又导致了匈牙利政治和经济上的危机。在国家处于危机的情况下,匈牙利的许多进步人士,便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改革要求。

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最早的政治活动家是大贵族地主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伊什特万·谢切尼。19世纪20年代欧洲革命一系列事件——西班牙起义、意大利和德国自由民主运动和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等,对谢切尼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正是从这些革命事件中,他预见到匈牙利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20年代初,谢切尼已经认识到按照资本主义原则改造匈牙利农业的重要性。为了改进匈牙利农业,他提出了取消腐朽的封建机构、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废除封建徭役而代之以雇佣劳动、改善交通运输和调整信贷等政治要求。到了30年代初,谢切尼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提出了实行宪法、和平改革社会、贵族自动放弃特权、反对民族压迫等要求。从谢切尼的这些政治主张来看,他只是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是进行彻底的革命。但就是这种较温和的政治主张仍遭到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贵族地主的强烈反对。

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及匈牙利大贵族地主统治集团拒绝任何政治改革,匈牙利封建制度的危机日益加深。到了40年代,在匈牙利贵族反对派中又出现了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即中等贵族。在中等贵族中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科苏特·拉约什。

科苏特的政治思想比谢切尼激进。科苏特在波桑有较大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波桑成立了“座谈会”,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半公开的政治小组。这些组织提出的政治要求是:出版自由、陪审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解放农民、取消封建义务等。在这个时期,随着阶

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他们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哈布斯堡王朝及其在匈牙利的社会支柱——匈牙利大贵族地主。因此，这些政治组织的活动立即遭到了奥地利政府的镇压，“座谈会”的领导人遭到逮捕。梅特涅在给匈牙利总督约瑟夫大公的信中说：“现在，确实存在‘青年意大利’、‘青年法国’、‘青年瑞士’以及‘青年匈牙利’等组织。现在着手预防已经晚了，只有一个办法：镇压。”^①

科苏特为掀起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建立政治联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直至1847年才在佩斯组成了“反对派”。其政治主张是在新宪法的原则基础上，以“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改造国家。参加这个“反对派”的有以拉约什·巴蒂亚尼为首的大贵族，也有以拉斯劳·马达拉斯兄弟为代表的小贵族。对这个组织影响较大的是科苏特。由于这个组织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因此，其内部的政治主张也就各不相同。所以，在讨论“反对派”的政治纲领中，巴蒂亚尼与马达拉斯兄弟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与深刻的分歧。拉斯劳·马达拉斯建议将普选权写入纲领中，但遭到了拒绝。这种政治主张上的不同必然要导致组织的分裂。

“反对派”于1847年6月制定了《反对派宣言》。宣言提出：平等课税、城市居民享有参加立法机关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取消法定的租税赔偿义务、取消长子继承制。从这些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宣言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还有坦契奇、裴多菲和瓦丝瓦尔。

1846年，坦契奇正在国外，他为了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及本国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先后在巴黎、伦敦组织手工业工人，并帮助他们成立“匈牙利协会”。他不仅同科苏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

^① 列·阿·阿维尔布赫：《1848年—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56年，第43页。

且同裴多菲和瓦丝瓦尔保持着更紧密的联系。

在40年代的革命活动中,裴多菲最初是以自己的诗歌同反动统治集团进行斗争的。他的思想比坦契奇、科苏特更为激进。他与瓦丝瓦尔都深受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裴多菲非常崇拜雅各宾党人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马拉。这些著名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鼓舞他的政治热情,坚定他的革命信心。

瓦丝瓦尔的政治观点与裴多菲非常相近。他也深受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并崇拜罗伯斯庇尔与马拉。同时他还深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曾仔细研究过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他极端仇视哈布斯堡王朝和“梅特涅制度”,主张消灭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40年代,裴多菲与瓦丝瓦尔同佩斯郊区的贫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裴多菲与瓦丝瓦尔活动的中心是在佩斯。他们经常在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从30年代起,佩斯的“皮里瓦斯”咖啡馆已成了革命青年活动的中心。裴多菲经常带着自己的诗歌、瓦丝瓦尔常常带着自己的论文和演讲稿到这里来进行朗诵和演讲。此外,革命青年在裴多菲与瓦丝瓦尔的领导下,经常组织辩论会,研究革命纲领的基本原则,并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的。“皮里瓦斯”咖啡馆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奥地利政府和匈牙利大贵族地主的极大恐慌。他们为了破坏“皮里瓦斯”咖啡馆的革命活动和裴多菲及瓦丝瓦尔的声誉,便诬蔑他们“酗酒”,斥责他们信仰“共产主义”。为了反对以裴多菲和瓦丝瓦尔为首的革命青年,政府和教会便组织了一个反动的青年组织“俱乐部”,并企图以此吸引青年,削弱革命力量。但是,政府的这个企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无论在佩斯,或者在波桑,这个反动组织不仅没能将青年吸引到自己一边,而且遭到了青年的反对。相反,“皮里瓦斯”咖啡馆的革命青年的威望越来越高,裴多菲与瓦丝瓦尔也越来越成为革命青年所爱戴的人了。

30—40年代争取改革的斗争,为后来的革命斗争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革命形势的成熟

1845—1846年的欧洲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以及1847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波及匈牙利后,严重地破坏了匈牙利的经济,致使匈牙利粮食奇缺,物价上涨。1847年同1846年相比,物价上涨了四五倍,匈牙利广大的劳动人民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但是匈牙利的贵族地主却不顾人民的饥饿,继续向奥地利和其他国家贩卖粮食,从中牟取暴利。同时,他们又在奥地利廉价购买玉米,然后在饥饿的匈牙利以高价出售。这就更加重了匈牙利人民的灾难。

奥地利政府和匈牙利贵族地主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继续加紧对匈牙利人民的压榨和勒索,并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劳动人民。在农村,他们加强对农民的剥削,霸占公用土地和牧场,扩大封建赋税;在城市,降低工人工资,广泛地使用廉价的女工和童工,变本加厉地剥削工人。

沉重的封建赋税和饥饿导致了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1847年,农民的反抗运动常常发展成为武装暴动或较大规模的起义。当时的暴动和起义几乎遍及整个匈牙利,其中包括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1847年12月,克罗地亚爆发了农奴暴动;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民也普遍展开了斗争,农民起义的中心是扎兰格县和矿山,起义的领导人是匈牙利人恰达林、瓦尔格。但是,这些起义都被政府当局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经济危机、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对工人剥削的加强,致使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和工人的状况急剧恶化。广大的手工业者和工人认识到,要想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只有同哈布斯堡王朝进行艰苦的斗争。贫困的生活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他们在斗争中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青年工人和手工业者俱乐部”和“民族俱乐部”。瓦

丝瓦尔在俱乐部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俱乐部成立以后便积极展开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和本国统治阶级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联合知识分子,团结和帮助他们,使之成为革命的积极力量。

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积极性的空前高涨是革命形势成熟的重要标志。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不断壮大,是革命力量最深厚的源泉。农民起义和工人斗争汇合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浪潮,涌向全国各地,使哈布斯堡王朝和匈牙利统治集团陷入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一场用革命暴力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消灭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风暴来临了。

第二节 佩斯^① 三月革命

3月15日革命

1848年意大利一月革命和法国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匈牙利以后,大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进步社会阶层,有力地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意大利一月革命发生后,匈牙利进步社会阶层密切地注视着遭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国家所发生的事件。裴多菲在他的诗歌《意大利》^②中,热烈欢迎意大利革命者,歌颂他们的英勇业绩。

法国巴黎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及共和国成立后,居住在巴黎的匈牙利公民便立即派代表团会见了外交部长拉马丁,对法国革命的胜利表示欢迎。巴黎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佩斯后,裴多菲便

^① 在1872年以前,布达佩斯原为两个部分,即佩斯和布达。佩斯是当时匈牙利的首都。

^② 见《山多尔·裴多菲选集》,莫斯科,1952年,第284页。

游历了整个匈牙利，在游历中看到的情况使他坚信，匈牙利人民是热烈欢迎巴黎二月革命的。

意大利一月革命和巴黎二月革命的发生，也有力地调动了国民议会中反对派的积极性。3月3日，科苏特把一份新的纲领草案交给议会。这份纲领要求制定一个全哈布斯堡帝国的宪法，成立匈牙利民族责任内阁，建立人民代表制度，在匈牙利实行自治，废除农奴制，进行资产阶级改革。这些要求后来成了裴多菲等人所拟定的纲领《十二条》的基础。

接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也爆发了革命。维也纳三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一传到匈牙利，便引起巨大的反响。匈牙利的空气立刻活跃起来。这一夜，聚集在皮里瓦斯咖啡馆的革命者，一直没有散去。他们听到维也纳革命胜利的消息后，便行动起来了，马上开展了革命活动。3月15日黎明，佩斯革命者在裴多菲的领导下，热情地通过了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纲领，即著名的《十二条》。其内容是：要求出版自由，取消书报检查；成立匈牙利责任内阁；成立匈牙利国民议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立国民自卫军；实行普遍课税；废除农奴劳役制；实行陪审制；建立国民银行；军队应效忠宪法，匈牙利军队不准开赴外国，外国军队也必须撤出匈牙利国土；释放政治犯，使其享有自由；与特兰西瓦尼亚合并，成立联邦。平等、自由、博爱^①。但纲领没有提出匈牙利完全独立，也没有提出给少地农民分配土地的主张。所以，这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它反映了裴多菲等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不过，在当时这个纲领仍然起到了团结匈牙利人民的作用。

《十二条》通过以后，佩斯的革命者便宣誓永远忠于革命，尔后便跟随裴多菲，高唱革命歌曲，冲向大街进行示威游行。人群从四

^① 什皮拉·久尔基：《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布达佩斯，1959年，第73—74页。

面八方向市中心集中，工人、手工业者、帮工、大学生都一批一批地参加了沸腾的游行行列，队伍越来越壮大了。游行队伍走到兰德列尔印刷所时，便占领了这个全市最大的印刷所，并立即印刷《十二条》和裴多菲在前一夜写成的《民族之歌》^①。中午印妥，开始在群众中大量散发，人们惊喜若狂，立刻把它抢光了。裴多菲在《民族之歌》中写道：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时候到了，现在干，或者永远不干！
是作自由人呢，还是作奴隶？
就是这个问题：你们自己选择！——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永不作奴隶！

这是一首革命的赞歌。3月15日这一天，裴多菲多次给人们朗诵了这首诗。它有力地鼓舞和动员匈牙利人民为自由而斗争。千万群众重复着裴多菲的“我们宣誓，我们，永不作奴隶”的口号，把它作为革命的誓言。

当示威群众到达并包围市政厅，强迫市长在《十二条》上签字时，政府军队忽然开来了。当时群情激愤，人们立即高呼：“拿起武器来，拿起武器来！”“到布达去！去打开牢门！”马上有两万多群众伴随着一个代表团涌向总督府，向总督申述各项要求。裴多菲在回忆那时的情景时写道：“总督府官员见来势汹汹，吓得面色发白，直打哆嗦。”经过5分钟商谈后，不得不同意《十二条》的全部要求，并向军队下了不要干涉的命令，撤销书刊检查机关。革命群众冲进牢房释放了在押的政治犯，其中有革命民主主义者坦契奇。将近中午时刻，革命群众控制了整个首都，成了佩斯的主人。由城市资产阶

^① 见《裴多菲诗选》，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78—181页。

级、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组成的公安委员会成立了。它是当时革命的政权机关，在组织国民自卫军、争取实现革命纲领和推动革命向全国发展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匈牙利的另一些城市，也效法首都佩斯，建立了公安委员会。在斯拉夫民族居住的土地上，以及乌哥罗德、穆卡切伏和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其他中心城市里，也都讨论和补充了政治纲领《十二条》。在潘切伏市，起义群众赶跑了城里的官吏和派来镇压这个运动的政府军。

3月15日革命的胜利促进了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兴起，遍及全国。矿工、纺织工、手工业者、农民、学生和所有受压迫的人们都参加了斗争的行列。在斗争中，他们提出了更为激进的反封建的口号。谢里梅巴尼亚的矿工提出保障矿工劳动安全和减轻罚金的要求；手工业者要求改善物质条件，提出了“打倒工厂主压迫者！”的口号；农民催促普勒斯堡议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大多数中小贵族、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都积极地参加了群众运动。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封建专制制度，有力地震撼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在匈牙利议会中，以科苏特为代表的反对派无情地揭露了奥地利政府和匈牙利贵族的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提出建立匈牙利独立政府和废除封建制的建议。议会慑于三月革命的威力，被迫表决通过。科苏特带领由100人组成的代表团，带着议会的决议到维也纳去，要求奥皇批准。在人民群众革命的压力下，奥皇斐迪南一世惧怕维也纳和佩斯的革命事变，惧怕革命的群众运动，不得不同意成立匈牙利责任内阁。1848年3月17日，他授权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温和派代表巴蒂安尼负责组织匈牙利第一个责任内阁，巴蒂安尼为内阁首相。参加内阁的有大贵族地主的代表、资产阶级化贵族温和派的代表，唯一的激进派代表是担任财政部长的科苏特。内阁中大多数成员主张同哈布斯堡王朝妥协，实行温和的改

革。所以，这个政府并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3月18日，匈牙利议会和巴蒂安尼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通过了下列法令：责任内阁对国会负责；在军事和财政上独立自主；取消劳役制、什一税和现金税，实行普遍课税等等。同时还制定了新的选举法。尽管这些法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可是，要实行这些法令还必须经过奥皇斐迪南一世的批准。斐迪南一世为了控制匈牙利，不仅竭力拖延批准这些法令，而且为了毁灭匈牙利革命的成果，只批准了普遍课税，拒绝批准取消劳役制和什一税的法令，并于3月27日颁布了一项敕令，规定匈牙利政府无权处理国家的军事和财政。

匈牙利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在敕令颁布的第二天，普勒斯堡的青年冲向大街，举行了整整一天的示威游行，革命歌曲响彻大街小巷。夜晚，他们又以极大的愤慨焚烧了国王的敕令。佩斯的革命群众也举行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武装起来！”“打倒德意志人的政府！”“共和国万岁！”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从3月27日一直持续到3月31日。在此期间，公安委员会便向各省发出号召，号召他们支持普勒斯堡和佩斯人民的革命行动。于是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斐迪南一世被迫取消敕令，于4月上旬批准了匈牙利议会和内阁所通过的一切法令。奥皇妄图毁灭匈牙利革命成果的第一个反革命阴谋被粉碎了。

为保卫三月革命成果而斗争

正当佩斯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三月革命成果而欢欣鼓舞，希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以巴蒂安尼为首的政府却在图谋断送三月革命的成果。他们既不理睬工人群众提出的各项要求，也不打算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极力反对革命群众运动和建立国民自卫军。巴蒂安尼政府的妥协政策立即被佩斯的劳动人民和以裴多菲、马达拉斯和坦契奇为代表的革命派识破了。于是，革命

派与巴蒂安尼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是巩固和发展三月革命的成果,还是否定和断送胜利果实;是维护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统治,还是推翻哈布斯堡王朝、争取匈牙利民族独立。这都是有关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

佩斯的工人群众在裴多菲的领导下,为保卫和发展三月革命成果而进行了斗争。3月23日,佩斯的铁匠、裁缝、钳工和打绳工人,为实现3月18日法令,保卫三月革命成果,举行了群众集会。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取消封建的行会制度。4月3日,马车工匠和钳工宣布罢工。4月12日裁缝工人举行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4月13日,4000多名佩斯工人要求取消封建行会,并焚毁行会章程。4月14日发生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斗争,许多行业工人都举行罢工,成千上万的罢工工人参加群众大会,高呼“打倒封建行会”的口号。他们在草拟的25份请愿书中,要求把工作日从13—15小时缩短为13—10小时,工资由每月20—30克里泽^①提高到48克里泽。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政府只好满足他们的主要要求,签订了匈牙利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个集体合同。外省工人也普遍展开了同样的斗争。

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农民在民主主义者坦契奇的组织下,也积极行动起来,为实现3月18日法令和发展三月革命成果而斗争。在1848年3月末,佩斯州和维斯普雷姆州的农民就已经掀起了废除地主享有的酒类专卖权、捕鱼权及狩猎权的运动。这两个州的农民斗争十分激烈。在佩斯州有13个地区的农民收回了地主霸占的可耕地,有15个地区收回了地主霸占的农场,有7个地区均分了地主的土地。农民为土地而进行的斗争,在一些地方演成了反对地主和地方当局的起义。4月间,农民运动达到了最大的规模,席卷了全国29个州。但是,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很快就被巴蒂安

^① 克里泽为匈牙利的货币单位

尼政府用围剿的办法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根据 1848 年 3 月通过的新选举法，匈牙利国民议会于 6 月 28 日进行了选举。在选举问题上，革命派与巴蒂安尼政府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巴蒂安尼政府掌握了选举中的一切有利条件。他们利用新选举法中关于财产资格的限制，剥夺了广大城乡贫民的选举权；并在贫民所在选区的选民中诬蔑和诽谤革命派的候选人裴多菲、马达拉斯和坦契奇等，败坏他们的声誉；同时他们又以收买和行贿等卑劣手段争取选票。对于他们这种可耻的行径，革命派给予了充分的揭露，并在选民中为自己的候选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但由于广大城乡贫民被排斥在选举之外，所以革命派的代表当选较少。选举结果，议会中贵族地主的代表占了 72%，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占了 26%，小商人、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只占 2%^①。尽管如此，这个议会同以往的议会相比，还是比较进步的。上议院仍是贵族地主的议院。下议院也充满了斗争。以巴蒂安尼为首的政府坚决主张同哈布斯堡王朝建立联盟，反对农民运动，认为除 3 月制定的法令和已给过农民的利益外，不能再给农民更多的利益。他们还反对匈牙利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们坚决要求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争取匈牙利独立，坚决支持农民运动，主张无条件废除农奴制，实现匈牙利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由于革命派力量较弱，下议院仍不能完全表达人民群众的意志。

革命派经过议会选举和议会内部的斗争认识到，要使革命进一步发展，必须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是根据裴多菲和马达拉斯的建议，成立了“平等协会”，坦契奇也加入了协会。协会成立后便立即公布了自己的纲领。纲领要求：取消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实行普选权、实行出版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纲领没有提出共和国

^① 什皮拉·久尔基：《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第 208 页。

和农民问题，所以仍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由于“平等协会”经常在人民群众中传播革命思想，揭露和抨击巴蒂安尼政府的妥协政策，号召人民群众对政府和议会实行监督，所以，它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和支持，革命派力量迅速加强。在“平等协会”的宣传和组织下，群众运动，特别是被巴蒂安尼政府镇压下去的农民运动，于7月下半月又猛烈地开展起来了。8月，匈牙利东部和多瑙河以南各州的农民纷纷起来，分配地主的土地和牧场，为取消封建禁令，特别是取消葡萄什一税进行了斗争。坦契奇通过自己的报纸和国民议会的讲坛，宣传自己的主张，捍卫贫农、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展开支持农民运动的坚决斗争。坦契奇在国民议会中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并在自己创办的《工人报》上予以发表。纲领要求：取消葡萄什一税、归还二十年内被地主夺去的所有耕地和牧场、把拥护哈布斯堡王朝的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分给雇农和少地的农民。坦契奇的这些主张对于发动农民参加斗争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农民运动的高涨和“平等协会”及坦契奇的积极斗争，国民议会于9月初通过了废除葡萄什一税的决议。

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和壮大，使科苏特等人急剧向左转。从这时起，科苏特同哈布斯堡王朝斗争的态度更加坚决起来。

7月11日在议会上，科苏特阐述了国内形势和政府的任务，揭露了奥地利政府所进行的军事演习和准备武装干涉匈牙利的罪恶活动，批评了巴蒂安尼政府的妥协政策，指出了国家没有自己的军队的危险性。他要求建立一支20万人的匈牙利军队，并发出了“祖国在危急中”的号召。但是，巴蒂安尼却不愿建立这支匈牙利军队，竭力拖延。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议会被迫通过了建立匈牙利国民自卫军的法令。

激进派在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三月革命成果，沉重打击了保守派的妥协活动。

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和激进派斗争的胜利，不仅威胁着巴蒂安尼政府，而且也威胁着哈布斯堡王朝。这时，奥皇斐迪南一世便竭力扶植和拉拢巴蒂安尼政府，以便利用它的反人民的政策，从内部扼杀匈牙利革命。同时又利用它压迫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政策，挑拨民族纠纷，以此破坏匈牙利的革命。

在内阁中，科苏特看到了维也纳政府的反革命阴谋，因此，也坚决反对同维也纳政府妥协，但是他这时还处于接近激进派阶段，不认为奥皇政府会发动反革命进攻。

第三节 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

耶拉契奇的入侵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自意大利一月革命、巴黎二月革命、柏林三月革命和维也纳三月起义发生后，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搏斗十分激烈。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悬殊，无产阶级缺乏自己的政党的领导，因此，先后都被反革命势力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声势浩大的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也遭到了失败，欧洲各国封建残余势力立即嚣张起来，革命逐渐走向低潮。在这种反革命势力猖獗的国际形势下，德国封建势力便残酷地镇压革命，力图恢复三月革命以前的旧秩序。奥地利封建势力也到处进行反攻倒算。维也纳五月起义后，逃往因斯布鲁克的奥皇斐迪南一世，积极拼凑反革命力量，于6月镇压了布拉格起义，8月5日又占领了意大利的起义中心米兰，扼杀了意大利革命。1848年8月12日，皇室贵族及反革命军队从因斯布鲁克回到了首都维也纳，集中力量准备镇压匈牙利革命。

斐迪南一世积极地武装和充实耶拉契奇的军队。耶拉契奇原



图 47 耶拉契奇

在奥地利军队中充任上校，是克罗地亚反革命贵族的首领。他公开支持哈布斯堡王朝，反对匈牙利独立，因此，他被克罗地亚等级议会中的亲奥分子选为克罗地亚自治州州长，并得到了奥皇的批准。奥皇把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9月4日，斐迪南一世正式任命耶拉契奇为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总司令。9月11日，耶拉契奇率军渡过德拉瓦河，大举进攻匈牙利。

在这紧要的时刻，巴蒂安尼玩弄两面手法，他在佩斯周围布防，表面上是防止耶拉契奇进攻，实际上是为了镇压佩斯的革命人民。为了掩盖其反革命行动，又假惺惺地发表宣言，号召匈牙利人民起来反抗耶拉契奇的进攻。但是巴蒂安尼并没有取得人民的信任。广大人民群众在科苏特和马达拉斯的领导下，揭露了巴蒂安尼的两面派手法，戳穿了他的投降阴谋。

奥皇斐迪南一世于1848年9月22日发表正式声明，宣布匈牙利政府所颁布的法律和命令一概无效。这个声明一发表，立即在匈牙利人民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同时，也教育了科苏特，使他进一步看清奥地利政府的真面目，他开始积极向左转。为了反对斐迪南一世的反革命声明和防止耶拉契奇的武装进攻，根据科苏特

的建议和人民的要求，匈牙利国民议会在奥皇发表声明的同一天，立即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由6人组成，他们是：拉约什·科苏特、拉斯罗·马达拉斯、巴尔·恩利亚、雅诺什·巴尔费、约瑟夫·巴达伊、伊姆尔·热别利^①。科苏特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巴蒂安尼被迫辞职，1848年10月1日将政权转交给以科苏特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这时，科苏特更加依靠革命力量，同匈牙利人民站在一起，并立即着手建立一支匈牙利国民自卫军。科苏特成了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哈布斯堡王朝为了彻底摧毁欧洲革命的最后—个基地，迅速把匈牙利革命镇压下去，便选定匈牙利贵族拉姆堡伯爵为总督，让这个民族败类来控制匈牙利，充当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刽子手。这个任命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和坚决反对。

9月27日晚，拉姆堡到达布达。28日早晨，佩斯全城都在传播着拉姆堡到达布达的消息。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聚集在一起，准备游行，反对拉姆堡的到来。游行队伍到达军用仓库时，一部分人便捣毁仓库，取出武器，武装自己，另一部分人则用棍棒和斧头武装起来。大约在下午两点钟，拉姆堡的四轮马车来到了布达通往佩斯的浮桥上，游行队伍这时也来到了这里。当拉姆堡到达的消息传出时，游行队伍立即沸腾起来，发出了“绞死叛徒”、“叛徒罪该万死”的口号。革命群众当场抓住拉姆堡，将他从四轮马车上拉下来，宣布了匈牙利革命人民对他的判决，立即处死。裴多菲为赞扬和歌颂佩斯人民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写了《把国王吊死》的诗篇。拉姆堡的被处死说明了匈牙利革命人民反抗情绪的高涨，哈布斯堡王朝企图利用其代理人从内部扼杀匈牙利革命的阴谋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① 列·阿·阿维尔布赫：《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第166页。

接着，奥皇斐迪南一世便宣布处死拉姆堡事件为叛乱事件，并设立战地军事法庭，镇压匈牙利革命者。同时任命耶拉契奇为匈牙利总督，宣布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军队一律由耶拉契奇指挥，这时已经渡过德拉瓦河的耶拉契奇的军队开始向佩斯进军^①。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委员会主席科苏特针锋相对，宣布奥皇的声明无效。

在反革命武装向革命势力进攻的关键时刻，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积极响应国防委员会的号召。踊跃地参加了自卫军，为保卫革命果实，为保卫匈牙利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当耶拉契奇的军队向佩斯推进时，以莫克为首的一部分匈牙利军官代表大地主贵族的利益，主张同奥军妥协，对奥军的进攻不加任何抵抗，拒绝同耶拉契奇作战。但是匈牙利人民毫不气馁，被占领地区的人民，首先是农民，他们在国防委员会的号召下，组织民兵，开展了活跃的游击战，袭击耶拉契奇的零星小部队。他们不是炸毁桥梁，就是烧掉敌人的给养；不是侦察敌人的行动，就是偷袭敌营；他们有时把敌营包围起来，致使敌人来不及拿枪便被俘虏；他们有时设置陷阱，活捉那些出来骚扰的敌人。所以，耶拉契奇的侵略军被打得惊慌失措，草木皆兵，常常龟缩在军营里不敢露面^②。在莫迪州有14万农民、在佐洛地区有3万农民拿起镰刀和大叉同敌人进行战斗。9月29日，匈牙利自卫军在帕科兹德和科苏罗附近同奥军的决战中，得到起义农民队伍的很大帮助，以致一举击溃了耶拉契奇的军队，获得了解放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已把这一天作为人民军建军节）自卫军和民兵的革命热情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奥地利军队中的匈牙利人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纷纷转到革命的匈牙利方面来。耶拉契奇的残余部队在退却时，又被俘虏和击毙

^① 埃·普里斯特尔：《奥地利简史》，莫斯科，1952年，第29页。

^② 《科苏特全集》第13卷，第368页。

了1万多人,遭到了惨重的损失。10月3日,奥地利政府对匈牙利正式宣战,并派出镇压布拉格起义的刽子手文迪施格雷茨率军支援耶拉契奇,决心在德国和斯拉夫人军队的帮助下,重新征服匈牙利。10月7日,自卫军把赶来援救耶拉契奇的奥地利将军罗特的部队包围起来,并迫使他们投降,再次取得胜利。10月10日,追击耶拉契奇的匈牙利军队直逼奥地利边境。

年轻的匈牙利自卫军所取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奥地利及欧洲的反革命势力,大大地鼓舞了匈牙利人民的斗争热情。

10月6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人民为反对奥皇武装入侵匈牙利,支援匈牙利革命,又发动了新的斗争。工人、学生和部分国民自卫军战士起来阻止奥军开往匈牙利,他们一面拆毁铁路,一面包围陆军部,同政府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经过一天的激战,起义人民击溃了政府军,军事大臣拉多尔被绞死在路灯杆上。斐迪南一世及其皇室逃往阿罗木茨。维也纳的政权转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占优势的市议会手中。但市议会一开始就犹豫动摇,力图同奥皇妥协。逃到阿罗木茨的奥皇迅速把耶拉契奇的军队向维也纳集中,同时又调集由文迪施格雷茨指挥的军队包围维也纳,10月底开始了进攻。维也纳被反革命军队层层包围。

以科苏特为首的国防委员会马上认识到,维也纳的覆灭也就是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于是科苏特坚决主张支援革命的维也纳。但是,在匈牙利军司令部里对支援维也纳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总指挥莫克为代表的一部分军官,藉口耶拉契奇和奥皇的军队装备好、力量强、难以战胜和存在着战略上的困难,反对支援维也纳。而以卡尼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军官则认为应该刻不容缓地支援维也纳,因为支援维也纳也就是保卫匈牙利革命。科苏特完全支持卡尼。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支援维也纳革命的决议。但是,莫克却以种种藉口对抗国防委员会的命令,使匈牙利的军队在奥地利边境停留了3周之久。当莫克被迫进攻时,有利

的时机已经失掉了，文迪施格雷茨已经赢得时间，率领军队顺利地渡过了多瑙河。耶拉契奇的军队也得到了补充。10月29日夜至30日，匈牙利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在施韦哈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由于莫克的叛卖行为，匈牙利军队遭到了重挫，致使维也纳这个被围的城市，得不到任何援助。10月31日，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占领了维也纳，将革命扼杀在血泊中。

施韦哈特战役后，国防委员会撤销了莫克的职务，任命戈尔盖为多瑙河两岸匈牙利军队的总指挥。戈尔盖也是一个大地主贵族的代表，投机革命，反对同奥军作战，依靠贵族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阴谋破坏匈牙利革命。但这时戈尔盖破坏革命战争的阴谋尚未暴露出来。

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失败，使奥地利革命处于低潮，而匈牙利的革命却继续高涨，引起了欧洲各强国的恐慌。这时，欧洲各强国的统治集团已在策划如何镇压欧洲革命的这个最后营垒了。10月中旬，文迪施格雷茨同沙皇的外交使节进行了谈判。沙皇俄国驻维也纳的代表方托恩表示坚决支持奥地利。

施韦哈特战役后，奥皇军队和匈牙利军队之间整整对峙了6个星期，没有采取军事行动。当双方都在忙于充实自己力量的时候，哈布斯堡王朝的宫廷忽然发生了政变。政变者于1848年12月2日强迫斐迪南一世退位，立其忠实的奴仆、斐迪南一世的侄儿弗兰茨·约瑟夫为皇帝。

12月中旬，奥地利的反革命进攻开始了。奥皇军队从四面八方同时向匈牙利发动进攻。文迪施格雷茨亲自率领9万人，从奥地利出发，向多瑙河以南推进。努根特率领近2万人从施梯里亚沿德拉瓦河右岸向巴纳特前进。虽然奥军力量占优势，但是，由于奥地利政府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遭到奥地利人民的强烈反对，所以它无法筹集足够的军饷，同时也招募不到新兵。而匈牙利的情况则完全两样，虽然匈牙利受过训练的军队只有八九万人，由

于匈牙利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所以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情支持和进步力量的同情。

匈牙利人民的浴血奋战

匈牙利人民充满了民族自豪感，为了打败侵略者，纷纷组织志愿军开赴前线。兵工厂的工人们开足了马力进行生产，给前线送去源源不断的枪炮。每一个匈牙利人都省吃俭用，为反侵略战争提供大量的资金。人民斗争热情高涨，全国都在为反侵略战争服务。

科苏特和匈牙利人民准备诱敌深入，采用游击战拖垮敌人。他们认为，即使奥军有优势兵力，匈牙利军队也可以在普勒斯堡和佩斯之间的地区坚守两三个月，因为这里的江河和沼泽地是一道天然屏障。但是，这时严寒已经到来，江河和沼泽已开始封冻，奥地利军队和一切装备都可以从冰上通过。这样一来，匈牙利人就失掉了有利的防御条件，他们构筑的一切防御工事都变成了无用之物。加之戈尔盖在“保存实力”的借口下，拒不抵抗。不到20天，匈牙利军队就由艾登堡和普勒斯堡退至腊布，由腊布退至莫尔，又由莫尔退到佩斯。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匈牙利于12月31日召开了上下两院会议。在会上，科苏特建议将国防委员会和国民议会迁至德布勒森，以便继续抗战。以巴蒂安尼为首的右派只同意国防委员会迁至德布勒森，而坚决反对国民议会也迁到那里，企图以此来削弱甚至取消国防委员会，以便实行其投降主义的政策。同时他们又建议派代表团同文迪施格雷茨进行和谈。以马达拉斯为代表的左派激烈地抨击了巴蒂安尼，严厉地斥责了同哈布斯堡王朝妥协的右派分子。

佩斯人民坚决支持科苏特的建议。12月31日夜，佩斯的人民群众便集合起来，包围了议会，强烈要求国民议会迁至德布勒森，并要求严惩叛徒。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议会被迫通过了将国防委员会和国民议会同时迁至德布勒森的决议，同时还决定将兵工厂、

被服厂以及冶炼厂也迁出佩斯。

虽然科苏特下令抗击奥军，但是兵团指挥官戈尔盖却公然违抗命令，继续退却，并于同一天在伐茨城发表宣言，宣称不再服从国防委员会的指挥。1849年1月5日，匈牙利首都佩斯陷落了。匈牙利大贵族马伊拉特、阿沽尼等人开始残酷地屠杀匈牙利革命人民。匈牙利革命者的处境极为困难。

面对困难的处境，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西欧各国革命被镇压的不利国际形势，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匈牙利人民表现了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当他们撤离佩斯时，组织工作做得非常之好。当铁路运输不能满足需要时，就动员了成千上万辆马车，而运输一个兵工厂的设备就需要400辆马车。为了保证兵工厂设备的运输，英勇顽强的匈牙利工人便在零下25°的严寒中步行。撤离佩斯的兵工厂、弹药制造厂和被服厂都安全地迁到了冶炼中心纳世瓦拉得，在那里建厂，并于2月投产了。为自由独立而战的匈牙利人民不仅经受住了撤退的严峻考验，而且为春季的反攻准备了物质条件。所以撤离佩斯是1848年匈牙利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科苏特也在匈牙利议会上庄严宣布：“如果我们不能在莱达河上击溃奥皇军队，那我们就在拉布尼茨河上击溃他们；如果不能在拉布尼茨河上击溃他们，那就在佩斯城下击溃他们；如果不能在佩斯城下击溃他们，那就在蒂萨河上击溃他们。总之，无论如何我们要击溃他们。”^①恩格斯对于科苏特这一时期的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写道：“长时期以来，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革命性质，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敢于代表本族人民接受敌人的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人——路德维希·科苏特。”^②

1849年1月，奥地利军队切断了匈牙利主力部队与德布勒森

① 转引自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06页。

②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3页。

的联系。匈牙利军队必须从佩斯到蒂萨河上游之间另外开辟一条道路,但是,要开辟这条道路必须越过覆盖着冰雪的拉尼斯科山顶。能否打开这条道路直接关系到匈牙利的存亡,所以开辟新路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可是,任何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匈牙利人民。优秀的指挥官里恰德·丘奥恩上校挺身而出,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接受任务后,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工程师路维希·科尔尼杰斯为他绘制了一幅详细的地图。于是,他们率领着新入伍的士兵和游击队出发了。一路上,他们排除了种种障碍,终于到达了山顶。这时,发现在离山顶不远的地方密布着奥地利的炮兵。要想翻越白雪皑皑的布拉尼斯科山顶,就必然会受到奥地利炮兵的猛烈袭击。但是,他们凭着勇敢和机智,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冒着生命危险,攀登满布冰雪的悬崖峭壁,巧妙地消灭了一个又一个火力点,一共摧毁了22个建立在狭窄山路上的奥军碉堡,为匈牙利的主力部队打开了一条通道。这是1848—1849年匈牙利民族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①。

1849年春,匈牙利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攻,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匈牙利的变化。这时匈牙利革命又得到了国际革命力量的大力支援。由奥地利、德国、波兰、意大利、法国及土耳其革命者组成的外国军团,在波兰将军贝姆的领导下,运用巧妙的战术,将奥军从特兰西瓦尼亚北部驱逐出去。2月9日贝姆又在南部取得了胜利。3月末贝姆领导的这个军团几乎占领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这不仅表现了贝姆的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也表现了这支军队的民主革命精神。这时在革命中一直用笔进行战斗的裴多菲也来到贝姆的军中,和贝姆一起并肩战斗,不倦地号召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团结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战斗,坚决捍卫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独立。

^① 梅雷·久拉:《1790—1849年匈牙利人民史》,布达佩斯,1952年,第411页。

2月，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决定进攻德布勒森。2月26日至27日在科马罗姆的战役中，匈牙利军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奥地利的新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得知文迪施格雷茨胜利的消息后，于1849年3月14日批准了一项新宪法。宪法规定：取消匈牙利的自治权，匈牙利仍属哈布斯堡王朝管辖，变成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一个行省，并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伏伊伏丁那和特兰西瓦尼亚从匈牙利领土上分割出去。宪法规定皇帝拥有全部行政权，妄图以此保证帝国大贵族地主的集权统治，并将匈牙利三月革命的成果一笔勾销。

新宪法激起了匈牙利人民的坚决反对，匈牙利人民和军队表示，坚决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进行到底，坚决抗击奥地利的侵略。1849年4月初，匈牙利自卫军在哈特瓦转入进攻，先后在霍特房、达皮奥北比奇克、格德勒和伐茨等地的战斗中击败了文迪施格雷茨的反革命军队，获得了重大胜利。

1849年4月14日，匈牙利议会通过了匈牙利独立宣言。宣言列举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宣布匈牙利独立。科苏特被选为新国家的元首，这时，新国家的政权主要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右派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坦契奇在叙述当时的情况时曾说：“在通过宣言时，右派的代表巴尔·尼雅利、拉约什·卡瓦契、加包尔·卡金奇、雅诺什·巴尔费、卢道尔费·索尼奥格等人离开了会议大厅，躲到阴暗角落里悲泣。”^① 匈牙利独立宣言具有巨大的革命意义，它不仅反映了匈牙利人民摆脱哈布斯堡王朝奴役的愿望，而且也沉重地打击了革命内部的右派势力，它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推动了革命的进程，有力地震撼了欧洲最反动的堡垒之一——奥地利帝国的统治。

4月19日，匈牙利又在纳迪沙罗的决定性战役中粉碎了奥

^① 米哈伊·坦契奇：《我的生活道路》，莫斯科，1952年，第290页。

军，4月26日解放了多瑙河上游的科马罗姆要塞，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被迫撤退，仅在佩斯留下了驻防部队。奥地利的主力部队被粉碎后，维也纳的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一直盼望匈牙利军队将自己从反革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匈牙利军队在击溃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后，本应乘胜追击，继续前进，一直攻进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彻底消灭奥皇军队，恢复维也纳的革命秩序。但是，戈尔盖却以种种借口，竭力阻止匈牙利军队追击奥军，并主张将匈牙利军队调回布达，去攻打佩斯。这是戈尔盖的一个阴谋。而科苏特对待这个问题的立场是动摇的。他一方面认为进军维也纳是正确的，因为占领维也纳就意味着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匈牙利自然也就解放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没有识破戈尔盖的阴谋，又倾向于光复佩斯，以此作为匈牙利国家独立的象征。最后，决定将部分军队从科马罗姆调回布达，而不去进攻维也纳，匈牙利军队调回布达后，于5月21日攻克了佩斯。匈牙利的首都光复了。但是，围攻佩斯花了数星期时间，给了敌人以重整军队组织新进攻的时机。

在奥地利军队被逐出佩斯以后，以科苏特为首的民族政府的任务应该是巩固革命成果，迅速集中全力进攻维也纳，解放维也纳，彻底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但这时匈牙利政府内部的右派势力又逐渐猖獗起来，以谢米尔为代表的大贵族以及天主教僧侣、大部分中小贵族和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竭力阻止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主张同哈布斯堡王朝妥协，反对推翻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同时戈尔盖的投降面目也日益暴露出来，他拒不执行科苏特的作战命令，同谢米尔勾结在一起，秘密策划投降。这就涣散了战斗力，削弱了对文迪施格雷茨的打击。加上科苏特不能很好地解决民族问题和农民的土地问题，得不到少数民族和农民的有力支持。这也给奥地利反对政府组织新反扑造成了良好的机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后果。

第四节 沙皇俄国的反革命武装干涉

沙皇俄国的武装入侵

1849年，欧洲革命浪潮又重新高涨，革命中心转移到了匈牙利。1849年春，英勇的匈牙利人民在抗击奥地利入侵的战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使奥地利军队遭到一系列惨重的失败。在西北作战的匈牙利军队巧妙地绕到由施利克指挥的奥军的后方，迫使施利克放弃阵地，向文迪施格雷茨的主力军方面退却，而匈牙利军队则向蒂萨河进发，与匈牙利主力军会合。由邓波夫斯基指挥的主力军也渡过了蒂萨河，全线击退了奥军，并推进到佩斯附近的霍特房。但是敌人在这里集中了强大的兵力，经过激烈战斗，匈牙利军又暂时退过蒂萨河，与接近蒂萨河的西北部匈牙利军在托卡依会合。这两支军队的会合，标志着匈牙利人将再次发动强大攻势。

不久，匈牙利部队分3个军强渡蒂萨河。右翼向北面推进，在埃佩尔耶什附近迫使追击自己的朗堡师向奥军主力方面退却。奥军主力在埃格尔、格德勒和霍特房附近受到猛烈袭击，被打得溃不成军，仓皇退向佩斯。左翼在亚斯贝雷尼附近击溃了耶拉契奇的军队，并迫使他也向佩斯退却。这样一来，奥地利沿多瑙河配置在由佩斯到瓦茨一线的军队，恰巧处在匈牙利人的半包围之中。这时，匈牙利军乘胜追击，所向披靡，一举攻克瓦岑，在赫兰海和诺伊特腊河之间将奥军打得狼狈逃窜，慌忙向腊布和普勒斯堡退却，从而解放了被奥军包围的科马罗姆要塞。耶拉契奇的军队也丢盔弃甲，望风而逃，顺多瑙河而下，退至斯洛文尼亚。从战争形势的发展来看，不久，英勇善战的匈牙利人就会追赶着奥军残部，长驱直入维也纳，彻底摧毁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了。

匈牙利革命的胜利不仅威胁着奥地利帝国，而且也使国际反动派，尤其是俄国，大为震惊。但是，在1849年初，尼古拉一世还没有完全认识到革命中心已转移到了匈牙利，也没有充分估计到匈牙利革命胜利的严重后果。所以，当1月5日帕斯凯维奇将贝姆将军率领一支波兰军队出现在匈牙利的消息通知尼古拉一世时，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但只是一个枝节问题，无碍于结束欧洲整个政治危机。因而他要求帕斯凯维奇坚决消灭这支军队，必要时俄军可以越过国境线，但是，不是在最紧要的情况下，不要调用后备军，而且在战役结束后，俄军必须立即返回俄国。由此可见，尼古拉一世对西欧革命事件的整个进程的前景是十分模糊的。在1849年1月8日和31日的信中，尼古拉一世埋怨“国外事件的变化无常”，2月7日他又表示希望到5月13日“事情能有个眉目”，甚至在3月7日他还不同意把援助普赫涅尔同贝姆作战的一万俄军留在特兰西瓦尼亚。只是在1849年3月，奥地利内阁首脑不断地将紧急情报送到彼得堡以后，尼古拉一世才明白日益发展的匈牙利革命的危险性。

1849年3月，匈牙利革命已经取得巨大胜利，奥地利处于危机的时刻，约瑟夫·弗兰茨政府坚决请求沙皇给予军事援助，但这时，奥地利政府也只主张俄军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对此，尼古拉一世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根据经验，他了解同奥地利这一协议的价值。在尼古拉一世看来，受奥地利限制的活动是不能给革命力量以沉重打击的。所以他在1849年4月给帕斯凯维奇的信中写道：“昨天我收到了你4月2日的来信，奥地利的作战计划是十分愚蠢的，……如果他们自己担负不起这一重任而需要我们援助的话，那么，你可以让他们谈谈怎样援助。我们的干预无疑是坚决的，是使之全部覆灭，而不是部分的。……一如既往，如果不是利害攸关，不是看到贝姆这类骗子闯进匈牙利——他们不仅是奥地利的敌人，而且

也是世界秩序与安宁的敌人……为了我们的安宁，必须全歼他们。”^①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沙皇尼古拉对革命的无比仇恨。尼古拉一世对于匈牙利革命胜利的严重后果已经意识到了。他清楚地知道，匈牙利地处中欧，在中欧占有重要的地位。匈牙利革命的胜利，就意味着奥地利帝国的崩溃，而奥地利帝国的崩溃会促使德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尼古拉一世为了维护他在欧洲的利益和霸主地位，坚决反对德国的统一，特别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德国的统一，不愿意看到在中欧建立起一个不受俄国控制的统一的强大德国。因此，他对于普鲁士争夺德国领导权，并在其领导下实现德国统一的野心特别仇视。同时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主张复兴波兰，支持波兰流亡者建立一个将领土伸展至第聂伯河的“独立”的波兰，作为德国反对俄国的基地。显然，这一计划更是直接威胁到俄国的利益。因此，在俄国统治集团看来，统一的德国必然充满了“侵略与扩张精神”^②。还在1848年以前，尼古拉一世就曾不止一次地警告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要对资产阶级自由派作任何让步。但是，在1848年革命前夕，威廉四世为了防止议会控制领导权，企图利用民族统一的思想和对资产阶级作一些让步来巩固容克普鲁士的利益，确立其对德意志邦联的领导权。同时，为了解决由政治危机而引起的财政危机，威廉四世被迫召开了“邦联议会”。在尼古拉一世看来，威廉四世的让步标志着古老普鲁士的全部基石已经动摇了。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以后，尼古拉一世特别担心德国统一。如果德国采取革命的方法统一，那么在中欧就会出现一个强大的、难以制服的德国，就会出现德国同起义的波兰人结成同盟共同对付俄国的局面。为了阻止德国统一，虽然法国

^① 谢尔巴托夫：《元帅帕斯凯维奇公爵》第6卷，圣彼得堡，1899年，第282页。

^② 鲍萨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804页。

已宣布成立共和国,但尼古拉一世决定同法兰西共和国保持关系,并加强了同奥地利帝国的团结。到1849年春,普鲁士在争夺领导权方面前进了一步,原因是奥地利在奥匈战争中被削弱了。因此,当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威胁着奥地利帝国的生存时,尼古拉一世为了维护奥地利的完整,阻碍德国的统一,毫不犹豫地决定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革命。尼古拉一世的忠实奴仆涅谢尔罗迭道出了俄国干涉的目的。他说:“我们干涉匈牙利的目的之一,是反对在德国建立普鲁士的领导权和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德国的统一。”^①

同时,匈牙利革命的胜利、奥地利的崩溃会引起欧洲革命的进一步高涨,特别是波兰等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波兰是欧洲的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这是欧洲大厦的基石,因为革命势力或反动势力谁能在波兰站稳脚跟,谁就能在整个欧洲取得彻底胜利。”^②所以,在尼古拉一世对西方政策中占最重要地位的,是维护俄国在波兰的势力。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尼古拉一世特别害怕波兰革命、波兰复兴和丧失俄国对波兰的统治权,因此,当波兰各地区掀起解放运动的高潮,波兹南、西里西亚、波摩瑞、加里西亚等地区纷纷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时,尼古拉一世立即要求奥地利和普鲁士采取坚决措施,镇压叛乱。维也纳三月革命后,尼古拉一世又通过其代表向斐迪南一世转达:“如果革命在加里西亚爆发,而且那里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革命时,我将一刻也不犹豫地越过奥地利边境,以斐迪南的名义恢复秩序。”^③4月,在普鲁士残酷地镇压了波兹南运动后,尼古拉一世立即向普鲁士祝贺。但是,尽管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他的指使下扼杀了波兰各地区的革命运动,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年—1849年革命》第2卷,第191页。

② 恩格斯:《在1863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页。

③ 尼方托夫:《1848年的俄国》,莫斯科,1949年,第209页。

尼古拉一世仍然感到很不安全，总觉得波兰革命像影子一样跟着自己。他特别忧虑的是，在紧邻波兰的匈牙利，革命正在发展，匈牙利人民抗击奥地利入侵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许多波兰工人也参加了匈牙利的战斗行列，与匈牙利人民并肩战斗。1849年2月，匈牙利又同波兰人公开结成同盟，并以3000波兰人加入匈牙利军队巩固这一同盟。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尼古拉更惧怕匈牙利革命的胜利和奥地利帝国的崩溃。涅谢尔罗迭在对法国代办的谈话中说明了尼古拉一世干涉匈牙利革命的另一目的。他说：“我们不能容忍在波兰边境建立一个独立的和亲波兰的匈牙利。”^① 所以，当匈牙利革命取得胜利时，沙皇俄国必然要倾全力消灭1848年欧洲革命的最后这块阵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匈牙利起义者的成功还没有威胁到战胜了维也纳起义的奥地利反动势力时，尼古拉还可以按兵不动，他的军队还可以暂时只限于扼守波兰和威胁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只有威胁到反动势力时，这些俄国军队才大举入侵匈牙利，镇压匈牙利革命，保证反动势力在整个西方取得胜利。”^② 4月初，当奥地利政府再次请求沙皇给予军事援助，并答应应对俄国的行动不作任何限制时，沙皇便决定于5月21日在华沙与奥皇弗兰茨会晤。在会晤中双方商定：俄国将以24万大军镇压匈牙利革命，其中14万越过匈牙利边境，6万开往加里西亚，4万作为后备军驻扎在多瑙河两公国，而奥地利将无偿地供给入侵匈牙利的俄国以一切必需品。于是，尼古拉一世立即向军队统帅下令：“鉴于奥地利再一次向我们求救，我在祷求上帝之后，决定你出击。”^③ 于是，在武装干涉匈牙利的问题上，沙皇尼古拉一世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年—1849年革命》第2卷，第191页。

② 恩格斯：《在1863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页。

③ 谢尔巴托夫：《元帅帕斯凯维奇公爵》第6卷，第285页。

沙皇政府为解除武装干涉匈牙利的后顾之忧，便在国内采取了特别的防备措施，以防止群众运动的再起。同时为了掩盖调动军队、镇压革命运动的真相，尼古拉一世于1849年4月26日发表了标题是“我们调动军队是为了援助奥地利帝国镇压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暴乱”^①的宣言。宣言的第一部分表白了俄国武装干涉匈牙利革命的原因，即沙皇俄国根据条约（指1837年协定）负有道义上援助的职责，接着说明了革命对俄国的威胁，特别指出会危及半个波兰。宣言说：“鉴于必须协助盟国扑灭由多瑙河蔓延到维斯瓦河的烈火，并在连续不断的暴乱中保护居住在这片辽阔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俄国不仅享有无可争辩的自卫权，而且享有行动权。俄国认为，在真正热爱和平的各列强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应该像维护欧洲均势那样维护欧洲社会的安宁。”^②最后，宣言又假惺惺地表示：尼古拉一世在1848年初到1849年初整个一年内一直履行其不干涉的诺言，但同时也预料到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匈牙利革命是威胁到整个帝国完整和安宁的事件……因此，沙皇政府被迫采取了它所预料到的军事行动。

紧接着，又宣布了尼古拉一世的决议：“在这些暴乱事件中奥皇向我们发出呼吁，希望我们行动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对此我们不能拒绝。”接着又说：“我们呼吁最高战神和胜利之神援助我们，我们调动了各兵种部队去镇压暴乱，消灭扰乱我们安静与侵略我们的暴徒。”^③很明显，沙皇政府发表这一宣言的目的是为了安定国内秩序，防止在调动军队时发生群众骚乱，以便顺利地完成其武装干涉匈牙利的反革命计划。

在稳定国内秩序的同时，沙皇政府最忧虑的是国际反动派对

① 《帝俄法律全书》第2版第24卷，第23200号。

② 尼方托夫：《1848年的俄国》，第287—289页。

③ 尼方托夫：《1848年的俄国》，第288页。

他武装干涉匈牙利的态度。所以,5月初,俄国驻伦敦大使便将俄国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消息通知英国,英国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便从有利于自己的立场出发,表明自己的国家赞同俄国的行动,并对俄国大使说:“应尽快地行动。”法兰西共和国也暗中表示,它早已希望镇压匈牙利革命。普鲁士政府对沙皇俄国干涉的态度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它认为,维护奥地利帝国的完整可能会使普鲁士丧失在1849年春所艰苦争得的德国领导权;另一方面,普鲁士政府不愿同沙皇俄国的关系破裂,同时,它也像尼古拉一样,惧怕在匈牙利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波兰会重新爆发起义。更重要的是普鲁士政府认为,匈牙利革命的胜利,必将导致全德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个前景要比镇压匈牙利革命以后老对手奥地利的势力加强更为可怕,因此,普鲁士政府便同沙皇俄国暗中勾结,允许俄国军队经由上西里西亚的铁路开往匈牙利。欧洲各国反动派都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基础上,支持沙皇俄国的远征,希望用沙皇俄国的军事力量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①

当尼古拉一世认为已排除了“武装干涉”的一切障碍的时候,他便于5月27日下令俄军由帕斯凯维奇统帅,分两路向匈牙利进攻,兵力为14万,大炮576尊。一路为10万人,由帕斯凯维奇公爵亲自统帅,由加里西亚向匈牙利推进;一路为4万人,由利杰克统帅,从东部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到1849年6月初,沙皇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军队实际上已超过15万人。奥俄联军妄图以庞大的军事优势压倒匈牙利革命人民,一举扑灭匈牙利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国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匈牙利人民奋起抗战

英勇的匈牙利革命者清楚地知道,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就要对付数倍于自己的俄奥联军,因此,必须加紧肃清匈牙利境内的奥皇军队。他们从外喀尔巴阡山到施梯里亚的阿尔卑斯山脉坡地,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弧形包围圈,将奥皇军队紧紧包围起来;又派出一个加强军把守住雅布龙卡,在加里西亚各山上构筑了工事,封锁了这些山口,扩大了布达的工事,并迅速征集了25万新兵,从而保证了匈牙利两翼和后方的安全,这样很快就把奥军打败了。当初进入匈牙利的奥地利军队是20万人,而回去时只剩5万人了。

但是,奥地利利用戈尔盖“整编”匈牙利军队的机会得到了喘息,充实了被粉碎的奥地利军队,并任命残酷镇压意大利革命的刽子手威尔金为总指挥。当戈尔盖在科马罗姆消极等待时,威尔金已经开始进攻了。至于俄国军队,尼古拉一世要求帕斯凯维奇以闪电式的出击进攻匈牙利。5月末,15万俄国军队已经开到匈牙利了。

在俄军入侵以前,几乎整个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都控制在匈牙利政府手中,只有特兰西瓦尼亚的卡尔斯堡被奥军占领着。俄国的出兵,使匈牙利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俄军主力从加里西亚向匈牙利低地推进时,开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6月7日,俄奥联军与匈牙利军队在瓦格河左岸的彼列特村第一次交锋。匈牙利人英勇顽强地防守阵地,但最后被迫撤退了。6月28日,在腊布展开了第二次战斗,匈牙利人又遭到了失败。这时,匈牙利指挥部在如何对付俄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科苏特主张必须把大部分军队集中在蒂萨河下游,阻击俄军;而戈尔盖却坚持要把军队撤出科马罗姆要塞,企图突破奥军在多瑙河右岸设置的防线。这时,科苏特与戈尔盖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7月2日,匈牙利军队在科马罗姆击退了奥军。7月7日到11日在科马罗姆,俄奥联军主力与匈牙利军队进行了决定性的战役,

结果,匈牙利军队遭到失败。这时,早在6月2日成立的以谢米尔为首的匈牙利内阁,便乘军事失利之机,加强了反革命活动。谢米尔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化贵族的代表,曾任巴蒂安尼内阁的内政部长,那时,他就表明自己反对革命。谢米尔政府一上台就出卖革命,破坏革命。他一方面排斥以马达拉斯为首的激进派,另一方面又企图剥夺科苏特参加政府的权利。他从国防委员会召回了16个政府阁员,架空了国防委员会,削弱了科苏特的领导。谢米尔内阁成了掌握实权的政府机关,它公然摆脱国防委员会的领导,公开抗拒科苏特的命令。在匈牙利屡遭失败的困难时刻,谢米尔政府还同戈尔盖秘密勾结在一起,加紧策划发动取消《独立宣言》和撤销科苏特职务的军事叛乱。但是,由于士兵的坚决反对,叛乱阴谋破产了。这时,科苏特为了削弱戈尔盖的力量,便试图把他调出军队,任命他为国防部长,撤换他的总指挥职务。但是,戈尔盖接受了这个职务后,却拒绝放弃匈牙利军总指挥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科苏特表现得软弱动摇,他不敢打击投降势力,不敢同戈尔盖作坚决斗争,最后只好对戈尔盖让步,同意他继续担任总指挥。参加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波兰上校拉品斯基在其回忆录中叙述了这一情节,责备了科苏特的软弱。他写道:“如果有一位精力充沛的人物领导政府,那末,戈尔盖的一切阴谋当时就完蛋了。科苏特只需去军营向军队讲几句话,戈尔盖的威望就挽救不了自己的垮台……但是,科苏特没有去,他缺乏公开出面反对戈尔盖的勇气,他在密谋反对这位将军的时候,却企图向世人为对方的过失辩解。”^①

尼古拉一世要求帕斯凯维奇迅速取得对匈牙利战争的胜利。根据这个要求,帕斯凯维奇计划以其主力部队深入匈牙利内地,切断匈牙利军向南退却的道路。他试图在战役一开始,就以俄奥联军强大优势兵力击溃匈牙利军队。他计划8万俄国军队从匈牙利

^① 转引自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623页。

军队前面横过，向佩斯推进，与此同时，奥地利军队在后方追击，两面夹攻，歼灭匈牙利军队。虽然帕斯凯维奇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他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意图。英勇善战的匈牙利军队，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竭力避免同敌军的大部队正面冲突，而是采取迂回战术袭击敌军小部队，从而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6月的战役中，在匈牙利西部边境、东部和东北部、科马罗姆要塞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等地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尽管担任总指挥的戈尔盖一再密谋策划投降，不愿同俄奥联军作战，但是，具有高尚革命精神的匈牙利军队、游击队和革命的指挥官，却满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沙皇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同俄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西部边境的匈牙利革命军和游击队，在普利金贝格·阿士巴特的指挥下，多次击溃敌人的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然而，总指挥戈尔盖实行不抵抗政策，他既没有一个统一的作战计划，也没有采取打击敌人的战斗措施，只是坐在佩斯，等待投降。因此，6月中旬以后，特别是7月7日和11日，在科马罗姆的会战中，匈牙利军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这时，俄军侵入了特兰西瓦尼亚。在这里指挥战争的是受匈牙利政府委派的贝姆将军。俄国入侵特兰西瓦尼亚以后，他试图攻入摩尔多瓦以骚扰敌人后方，结果失败，又回到特兰西瓦尼亚，7月29日，在舍斯堡附近，被数倍于他的俄军击溃。和贝姆一起工作的裴多菲亲身参加了这场战争，并于1849年7月31日在吉格尔什瓦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贝姆指挥的军队虽然遭到失败，但他并没有气馁，而是以顽强的意志和充沛的精力迅速重整残部，并于8月5日再次以强攻占领了海尔曼施塔特，因得不到增援，不久只好放弃这个地方。尔后，他又去匈牙利，率领残余部队在卢果日进行最后抵抗失败后，他又进入特兰西瓦尼亚，继续勇敢地同占绝对优势的俄军作战。直到8月19日他才被迫到土耳其避难。

7月中旬，帕斯凯维奇率领的俄国侵略军在占领了匈牙利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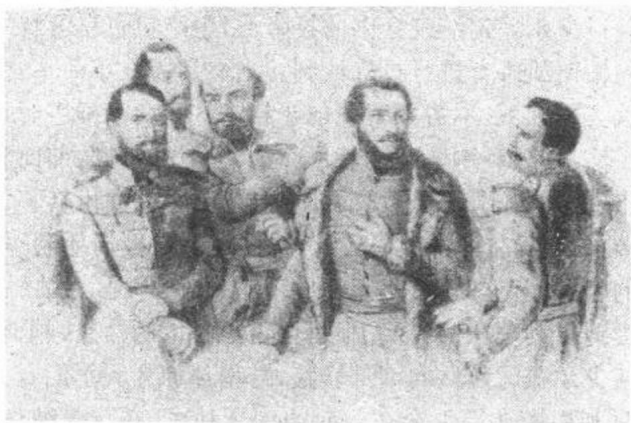


图 48 左起：克拉普卡、佩尔采尔、贝姆、科苏特、奥利赫部和东北部地区后，继续向首都佩斯推进，预备在那里同奥地利军汇合，两面夹攻集中在西部边境的匈牙利军队。但是，奥军没有根据俄军的行动计划而单独向南推进。这样一来，俄军便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粮食缺乏，又流行着霍乱，不少军官公开同情匈牙利革命，许多士兵都开小差转到匈牙利方面。俄国侵略军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乱作一团。帕斯凯维奇军事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俄国军队缺乏坚强的组织纪律性，而更重要的是俄军将军们的无能。帕斯凯维奇司令部的一位军官巴隆·尼古拉在日记中写道：“我们配置了如此多的骑兵侦察队，但却没有追到敌人的任何踪迹，对此不能不感到惋惜和羞辱。”^①但是，帕斯凯维奇却竭力掩饰其失败的真正原因，把军事失败归咎于这次远征的客观困难，甚至归咎于奥地利指挥部破坏了早已协商好的军事行动计划。

战争形势的发展对匈牙利十分有利。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科苏特命令戈尔盖在科马罗姆要塞留下一支强有力的卫戍部队，其余的主力部队向西部挺进，以便同西部的匈牙利军队汇合，共同打

^① 尼方托夫：《1848年的俄国》，第294页。

击俄军。但戈尔盖勾结议会中的投降派，拒绝执行科苏特的命令，并暗中同帕斯凯维奇进行投降谈判。当戈尔盖在革命军官和广大士兵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率领匈牙利军队向西南推进时，他却大耍两面手法：匈牙利军队在瓦茨迂回到俄军先头部队前面时，他不仅不打击俄军的先头部队，反而命令匈牙利军队向南转移，表面上好像是要与西部的匈牙利军队汇合，实际上是把匈牙利军队引进了俄军的包围圈。这时，戈尔盖便向俄军请降，但是，尼古拉一世命令不接受匈牙利军队的投降。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帕斯凯维奇必须迫使戈尔盖的部队向南部转移，与南部匈牙利军汇合。尼古拉的意图是利用南北部汇合在一起的匈牙利军，在与盖纳乌率领的奥军会战中削弱盖纳乌的军队，然后再接受戈尔盖的请降。这样一来，奥地利帝国在沙皇俄国面前就更成为一个软弱的完全从属于它的盟国了。基于这种原因，帕斯凯维奇拖延了同戈尔盖的投降谈判。

无论指挥北部的戈尔盖或者科苏特临时任命的南部军队总司令邓波夫斯基，都不愿意将两方面的匈牙利军队会合。不久，帕斯凯维奇接到了利季格尔的报告说：“匈牙利人团结一致地同奥地利人战斗。他们完全相信，如果俄国人不参加战斗，他们就一定能打败奥地利人。”^① 只是在这个时候，在帕斯凯维奇得知匈牙利大部分军队准备向特兰西瓦尼亚转移，并在那里继续战斗时，他才决定接受戈尔盖的投降。8月13日，戈尔盖在维拉哥什向俄军缴械投降，出卖了匈牙利革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正是马扎尔军队中的‘贵族’军官们从斗争开始直到今天每日每时都在出卖民族的事业！”^②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年—1849年革命》第2卷，第122页。

② 恩格斯：《〈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63—364页。

这时，守卫在科马罗姆的克拉普卡一直坚守要塞，拒不投降。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司令部便软硬兼施，引诱克拉普卡投降。参加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波兰上校拉品斯基描述了这一情况。“8月22日，尼古拉皇帝的一位侍卫官来到科莫恩……但是，——这位俄国的摩菲斯特斐勒司用甜言蜜语说道，——将军先生，您不会拒绝我们提出的两星期的停战，因为这是我仁慈的皇帝陛下向您请求的。这一席话像烈性毒药似地立即奏效了。奥地利和俄国军使们的一切努力和劝说都未能取得的东西，这奸滑的俄国人只花三言两语就得到了。克拉普卡经不住这翻巧妙的恭维，签署了两星期的停战。从此，科莫恩的陷落就注定了。”^① 停战协定签署后，克拉普卡周围的贵族军官多次要求放弃要塞，投降俄国。最后，克拉普卡于9月27日向俄军投降，科马罗姆要塞弃守，匈牙利革命最终失败了。

在投降的前些天，即8月11日，科苏特在戈尔盖以及议会中投降派的胁迫下，交出了政权，与贝姆等其他匈牙利革命领袖离开匈牙利，逃到被土耳其占领的保加利亚。

匈牙利革命失败后，镇压革命的刽子手沙皇尼古拉一世便指使奥地利统治集团和戈尔盖叛徒集团，在匈牙利土地上恢复了旧的封建秩序，对匈牙利革命者和匈牙利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开始了残酷的大屠杀。他们对革命者一个也不放过，10月6日，在奥劳德有13名国防军的将军被处死。同一天，在佩斯新大楼的兵营里枪杀了巴蒂安尼。数千名爱国者被判重刑，投入监狱。4万名国防军战士被送到奥地利军队中服役作为惩罚。就是那些逃到土耳其的军官，也受到缺席审判，被判处绞刑，整个匈牙利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① 转引自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637页。

匈牙利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特点

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奋起反抗奥地利民族压迫和沙皇俄国反革命武装入侵的正义斗争，是历史上弱国反抗强国、“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围的民族敢于用革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用红色恐怖’来对抗‘白色恐怖’”^①的一个突出事例。这场英雄豪迈的匈牙利革命最终被奥地利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反革命联合绞杀了。

这场革命是如何失败的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革命阵营内部的不团结，革命领导人的动摇妥协和某些领导人的背叛是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奥地利对匈牙利的民族压迫和统治，使匈牙利成了奥地利的附庸国。因此，匈牙利的社会阶级关系具有资产阶级发展不成熟这一明显的特征，它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比较软弱。在1848年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和本国封建制度的革命中，匈牙利的资产阶级与自由贵族结成同盟，领导了革命，并与其他阶级联合，形成了革命阵营。但是，由于各个阶级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对待哈布斯堡的态度和对革命的要求也不相同。所以，在革命阵营中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在革命过程中，它们由于不同的利害而经常发生激烈的矛盾和斗争，严重地影响了革命的进行。

佩斯三月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温和派的代表巴蒂安尼所组成的内阁是一个由各个派别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是它将革命家裴多菲、马达拉斯和坦契奇排斥于政府之外，这就使这些革命者不能很好地发挥其才能，严重地削弱了革命的领导力量。这样就使巴蒂安尼政府更加依靠哈布斯堡王朝来推行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例如，巴蒂安尼内阁成立后，科苏特便提出了建立匈牙利国

^①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3页。

民自卫军的问题。但巴蒂安尼特别害怕国民自卫军成为一支由贫民组成的军队，因此，他竭力阻止成立这支队伍。为了阻止贫民和手工业者参加国民自卫军，他们规定凡参加国民自卫军的农民必须每年有100本乔^①的纯收入，并且以手工业者多系犹太人为借口，不允许手工业者参加国民自卫军。巴蒂安尼内阁的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裴多菲和坦契奇的强烈反对。裴多菲指出：“你们第一个宣布不允许犹太人加入国民自卫军，你们也就第一个玷污了纯洁的三月十五日的旗帜。”^②坦契奇写道：“根据这种理由剥夺一部分公民应尽的义务和权利是不公平的。”^③但是，在政府中由于右派占优势，结果以限制贫农和犹太人参加自卫军为手段，清洗了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主义者，大大削弱了国民自卫军的力量。

巴蒂安尼政府在革命关键时刻耍弄两面派手法。当耶拉契奇的军队进攻匈牙利时，巴蒂安尼便任命总督伊斯特万大公为匈牙利军队总指挥。伊斯特万是一个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敌对分子。当他接到这一任命时立即表示：他“一定像祖国的每一个儿子一样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在他到达德拉瓦河以后，便立即暴露出了民族叛徒的嘴脸，准备与耶拉契奇讲和，遭到耶拉契奇的拒绝。这时，为了活命，他便逃到德国。后来，为追查这一事件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发现了他在三月写给奥皇的效忠信，信中建议：第一，将奥军从匈牙利调回本国，以便坐视匈牙利贵族与农民之间的斗争。第二，利用与巴蒂安尼谈判的方法逐渐地扑灭革命。第三，公开地同匈牙利决裂，解散其议会以后，调集大军镇压革命。他表示倾向于第二种办法，如不成功，就采取第三种办法^④。这封

① 本乔是匈牙利当时流通的货币。

② 《裴多菲全集》第4卷，莫斯科，1953年，第146页。

③ 坦契奇：《我的生活道路》，莫斯科，1952年，第263页。

④ 德·伊拉尼、什·尔·夏森：《1847—1849年匈牙利革命政治史》第二分册，巴黎，1860年，第89—90页。

信充分揭露了革命阵营内部叛徒的投降活动和伊斯特万的叛徒嘴脸。

随着俄奥联军的入侵，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右派的投降活动更加频繁。1849年6月2日成立的右派占优势的谢米尔内阁，一方面排拆以马达拉斯为首的左派，另一方面又企图剥夺科苏特参加政府的权利，并从国防委员会召回了16个政府阁员，架空了国防委员会，削弱了科苏特的领导。以后谢米尔内阁公然摆脱国防委员会的领导，公开抗拒科苏特的命令。在匈牙利屡遭失败的关键时刻，谢米尔政府便同戈尔盖勾结在一起，加紧秘密策划发动取消《独立宣言》和撤销科苏特职务的军事叛乱。由于士兵的坚决反对，叛乱阴谋遭到了破产。这时科苏特不但没有同戈尔盖作坚决斗争，反而动摇，让步，最后仍同意戈尔盖继续担任总指挥的职务。这成为戈尔盖后来投降敌人出卖革命的有利条件。1849年7月中旬，当战争形势的发展对匈牙利十分有利时，科苏特命令戈尔盖在科马罗姆要塞留下一支强有力的卫戍部队，而其余的主力部队向西挺进，以便同西部的匈牙利军队汇合，共同打击俄军。可是，戈尔盖勾结议会中的投降分子，拒绝执行科苏特的命令，暗中同帕斯凯维奇进行投降谈判，并把匈牙利军队引进了俄国的包围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第二，在匈牙利革命过程中，没有一个彻底解决农民问题的纲领是革命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这场革命中，匈牙利的农民运动是很可观的，农民革命运动的洪流推动了匈牙利革命运动的发展。可是，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制定出一个解决农民问题的纲领，特别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使农民运动没有奋斗的方向。在这场革命中，能否解决占人口90%的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关系着匈牙利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

佩斯三月革命胜利后，议会所通过的3月18日法令共35条，其中有7条涉及到取消农民名目繁多的劳役问题。但是，由于领导

革命的自由贵族的阶级局限性,3月18日法令并没有提出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是这个带有极大局限性的法令,巴蒂安尼政府也一再拖延实行,这就更加激起了农民的愤怒,引起了农民的暴动。

在战胜耶拉契奇以后,以科苏特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本应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改善农民状况,将他们从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并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但是科苏特并没有这样做。同时,为暂时控制农民运动,并将农民局限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斗争中,以科苏特为首的国防委员会答应农民在彻底战胜敌人以后,改善农民的状况。可是,在《独立宣言》发表和匈牙利民族政府成立后,并未履行诺言,仍然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正因为以科苏特为首的民族政府不能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就逐渐地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削弱了革命的力量。

第三,在革命过程中,没有解决匈牙利境内的民族问题也是造成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匈牙利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当维也纳和佩斯革命的消息传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后,立即得到了强烈的反响。在沃耶沃迪纳,革命消息传来,泽莫尼亚的居民便掀起了反对地方政权的暴动。纳吉基基达的居民也效法匈牙利,成立了国民自卫军。绝大多数的塞尔维亚人都欢迎匈牙利革命,并热烈地希望匈牙利新政府能够承认他们的民族独立和民族权利。在克罗地亚的扎格列布和许多地区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成立了国民自卫军和大学生军团。在斯洛伐克,广大群众都同情匈牙利革命,热情颂扬裴多菲的民主思想。在特兰西瓦尼亚北部的人民立即仿效匈牙利建立了国民自卫军,保卫新秩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其他地区,匈牙利革命激发了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他们在阿夫拉·扬库的领导下,于3月20日在马罗什瓦萨尔赫召开了会议,对佩斯三月革命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并制定了要求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合并,无偿地取消封建农奴义务、政治自由

和承认民族语的纲领。

在匈牙利革命受到了各民族人民欢迎的情况下，匈牙利革命的领导者本应支持各族人民的革命行动，满足他们民族独立的要求，共同打击革命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但是，以科苏特为首的匈牙利政府没有这样作，反而对少数民族采取了高压政策。在1848年5月用武力镇压塞尔维亚人的革命运动。对于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运动也采取了同样的镇压态度。结果就使得哈布斯堡王朝能够利用民族矛盾挑起民族纠纷，把旨在反对奥地利的民族运动变成了反对匈牙利革命的反革命运动，使奥地利反动派有可能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镇压各民族的解放运动，最后也镇压了匈牙利革命。

第四，沙皇俄国的反革命武装镇压是匈牙利革命失败的重要的外部原因。1849年5月8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发表了武装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宣言。沙皇俄国之所以武装镇压匈牙利革命，就是为了维护沙皇俄国在欧洲的利益和霸主地位。匈牙利革命如果成功，沙皇俄国称霸欧洲的美梦就会破灭。显然尼古拉一世是不能容忍匈牙利革命胜利的，于是，沙皇俄国派了14万军队，以绝对的优势镇压了匈牙利革命。

匈牙利革命同其他各国的1848年革命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归纳起来，其鲜明的特点有以下三点：

第一，1848年匈牙利革命是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佩斯三月革命发生时，没有流血，接着自由化贵族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并进一步向人民靠拢。10月成立了国防委员会，迫使温和派政府下台，政权由激进派掌握，革命向前迈了一大步。以后激进派在内外的压力下越来越激进，把革命推向高潮。当奥地利军队开始向匈牙利进攻时，以科苏特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加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战争，把匈牙利革命推向高潮。在1849年4月14日，科苏特宣布匈牙利独

立,这时匈牙利革命成为欧洲革命的中心。当沙皇俄国派兵侵入匈牙利后,匈牙利人民浴血奋战,面对强大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为保卫匈牙利革命的成果而英勇斗争。总之,从1848年3月佩斯革命到1849年9月革命的被镇压,匈牙利革命一直是沿着上升路线向前发展的,与1848年法国革命沿着下降路线进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1848年匈牙利革命同工农运动相结合。革命爆发时,匈牙利革命也同其他国家革命一样,参加者主要是市民、手工业者、大学生和自由化贵族。但是,随着革命的向前发展,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全国掀起了革命,特别是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兴起。在许多省分,农民拒绝缴纳地租,拒绝服劳役,有的地方还夺取了地主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在佩斯州有13个村庄的农民收回了地主霸占的可耕地,3个村庄占有了牧场,2个村庄占有了草原,70个村庄均分了地主的土地,18个村庄拒绝缴纳葡萄什一税。在城市中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许多手工业者踊跃参加国民自卫军,积极投入革命。各地兴起的工农运动大大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这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1848年匈牙利革命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广泛而深远。在1848年欧洲革命发展的过程中,自从巴黎六月无产阶级起义被镇压后,革命形势开始走上低潮。德国革命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犹如一颗星星之火,使行将熄灭的1848年欧洲革命的烈火又重新燃烧起来,匈牙利革命成为欧洲革命的中心,使欧洲各国各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看到了新的希望,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革命人民的英勇战斗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第九章 沙皇俄国与 1848 年欧洲革命

第一节 1848 年革命与俄国的阶级斗争

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

19 世纪初,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但是到了 19 世纪 30—40 年代,俄国已卷入了当时已形成的世界市场体系,特别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国内的普遍兴建,明显地动摇了封建农奴制的经济基础,促进了农奴制经济的解体,加速了俄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经过三个阶段,即手工业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和采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工厂。

19 世纪初,俄国已开始供应欧洲市场农产品。俄国在卷入世界市场以后,便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随着农业经济卷入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这时,俄国不仅具备了开始发展小型农村工业和手工工场的必要条件,而且也开始具备了发展工厂生产的必要条件。

19 世纪上半期,小型农村工业和手工工场大大地发展起来

了，下新城省（现称高尔基省）的巴甫洛沃村、特维尔省（现称加里宁省）的基木里、雅罗斯拉夫省的韦里科耶、弗拉基米尔省的伊万诺沃等地都成了较大的工业中心。当时，莫斯科是呢绒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在莫斯科省几乎每家农民都有一台或一台以上的织机，他们大多接受较大手工工场的订货。在卡卢加省，农民多为大手工工场加工纱线。在乌拉尔矿场附近，在雅罗斯拉夫县的布尔马金城、奥卡河畔著名的巴甫洛夫村以及巴塔舍夫冶金厂附近等地，农民的金属加工业都发展起来了^①。除了旧式的农民手工业生产，如麻布、毛织品、皮革和木器等外，俄国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小生产部门：印染、丝绸、棉布、丝带和儿童玩具等。这些小企业生产大多数都处于对包买商的依附地位，因而许多农业手工业者因无力竞争而纷纷破产，同时他们中也有极少数发展成为大企业主。破产的手工业者便不得不为大企业主做工。于是，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出现了剥削农民劳动并为资本主义市场制造产品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

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手工工场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官方统计材料，到1825年，工业企业增加到5261家，而到1854年则增至9995家。如果不计算16名工人以下的手工工场，那么，1825—1828年俄国的手工工场为1800家，而到50年代后半期已达2800家了^②。这时手工工场的工人已达86万，其中雇佣工人约53万人。手工工场的规模不仅日益扩大，而且大部分工场都使用雇佣劳动力，并同市场保持联系。

随着工业企业的增多和产品数量的增加，雇佣工人的数目也不断地增长。据官方材料统计，1804年自由雇佣工人占加工制造

^① 涅奇金娜主编：《苏联通史》第2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9年版，第13—14页。

^② 同上书，第15—16页。

业全部工人的48%，1825年为54%。在个别工业部门中雇佣劳动占明显的优势，如1825年棉纺工业中雇佣工人占工人总数的94.7%，与自由雇佣劳动增长的同时，19世纪30—40年代，手工生产开始让位于机器生产，手工工场开始变为资本主义工厂。

18世纪末，在俄国的纺织工业中已开始采用和推广机器生产。19世纪初，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手工工场首先使用蒸汽机。20年代，在彼得堡的一些印染企业中也采用机器印染。到了30—40年代，纺织业便蓬勃地发展起来了。1843—1854年，俄国的纱锭由35万支增加到100万支。仅莫斯科一省就拥有152台蒸汽机，功率为3115匹马力。机器进口的数字特别可以说明普遍使用机器的情况。

每年机器人口价值如下(银卢布)：

年 代	价 值
1824—1828·····	42529
1844—1846·····	1164402 ^①

这时，俄国除进口机器外，本国也创办了机器制造厂，如卡卢加省的马利采夫机器制造厂、科斯特罗马省的希波夫机器制造厂、彼得堡的谢苗尼科夫和别尔德机器制造厂以及乌克兰(基辅省)的西米连科机器制造厂等。所以，在当时除了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外，俄国还出现了较大的工厂企业。不过，工厂企业的数目及其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是很少的。

资本主义在农业和工业中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外贸易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在农奴制俄国的国内贸易中，集市贸易起着很大的作用。19世纪上半叶，集市的数目由3000个增加到4300个，集市的贸易总额达2.3亿卢布。

随着国内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逐步扩大了。19世纪上半

^① 涅奇金娜主编：《苏联通史》第2卷，第21页。

叶，商品输出额由 7500 万卢布增加到 13300 万卢布，输入额由 5300 万卢布增加到 1.3 亿卢布。

俄国的交通运输业也由于国内外贸易的扩大，在 30—40 年代有了一定的发展。30 年代末，在彼得堡及其郊区巴甫洛夫斯克之间建成了一条“实验”铁路。40 年代末，商轮开始在伏尔加河上航行，并开始兴建三条大铁路：彼得堡——莫斯科铁路、华沙——奥地利边境（通往维也纳）铁路和彼得堡——华沙铁路。尽管如此，俄国的铁路还是很少的，其总长尚未超过 1000 俄里。在使用蒸汽运输方面，农奴制的俄国远远落后于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

总之，19 世纪 30—40 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是有所发展的，但其速度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日益成长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有力地动摇着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基础，可是农奴制的统治却又阻碍着俄国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

农奴制危机的加深

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危机日益加深。到了 1848 年，由于普遍的歉收、霍乱的流行、毁灭性的火灾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这种危机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1848 年是俄国各省普遍歉收的一年。根据官方统计材料，1848 年整个俄国的粮食产量“平均不高于种子量的一倍半”。在萨拉托夫省的报告中谈到：“大部分的土地，甚至连种子粮也没有收够”。在辛比尔斯克、平兹、梁赞、沃龙涅什、唐波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塔弗利切等许多省的报告中都指出了这一点。

1848 年歉收的主要原因是耕作技术落后的俄国农业无力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从 1848 年春起，俄国的干旱现象便十分严重，干旱毁掉了不少庄稼，尔后“又出现了蝗虫和象鼻虫，八月份，这些害虫普遍地繁殖起来，结果，连当年夏季播种的庄稼都吃掉了；此

外,冰雹也损害了不少谷物”^①。

农业歉收使俄国的粮食奇缺,导致了俄国农业的进一步衰落。

1848年,在俄国不仅农业歉收,而且霍乱也普遍地流行起来。这一次霍乱,无论农村或城市,均未能幸免。在莫斯科一天就有400人患病;据官方报道,在其他一些城市里(诺夫哥罗德、奥林堡、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唐波夫、普斯科夫等),每100居民中就有9—16人因患霍乱而死亡;在彼得堡,特别是在劳动人民中,霍乱流行得十分严重。弗·普·贝科瓦曾亲眼看到彼得堡的情况。他在记事中写道:“6月24日……墓地全被占满了;每天大约有400到500人被埋葬在这里……大部分是普通的穷人……”^②在工人聚集的大工业企业中,传染病的流行更为严重,在格鲁萨科夫纺织厂里,工人因患霍乱而死亡的达800余人。

在农村,霍乱也是很快地流行着。据官方缩小了数字的统计材料看,霍乱也在不少省份流行。在莫斯科及其周围6省中,农民患霍乱者占农村居民的2.5%;在5个黑土中心地带的省份里,患病者达4%,而在乌克兰的6个省份里患病者达5.5%。

总之,据官方不完全的统计,1848年俄国患霍乱的病人达1800万人,其中70多万人死亡^③。

此外,1848年的火灾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1848年夏季,天气极为干旱,这时火灾蔓延得十分严重。当时5个省、十多个县城和成千上万个村庄的大部分建筑都被大火焚烧了。据官方统计,1848年的火灾烧掉了71000多家的家产,造成的损失总额达3400余万卢布。

① 斯洛弗佐夫:《俄国歉收史料和统计资料概述》。转引自尼方托夫:《1848年的俄国》,第20页。

② 弗·普·贝科瓦:《古斯摩棱斯克人记事》。转引自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2卷,第238页。

③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2卷,第237页。

在农业歉收、粮价和饲料价格急剧上涨、生产下降、国内外贸易紧缩的情况下，劳动人民更是难以谋生。于是，不堪忍受饥寒折磨的城乡劳动人民，便常常掀起暴动，反抗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到1848年，农民运动空前高涨。在第三厅的报告材料中曾经谈到了这一点：“农民反抗地主的暴动比以前大大增加了……”。1848年，农民反抗地主的事件达70余起，比之1847年的22起要多得多。”^①但是，这并不是整个俄国农民运动的材料，这个材料只统计了43个庄园的规模较大的农民运动。这些农民暴动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具有鲜明的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性质。但这些运动多被政府镇压下去了。

不仅农民暴动蓬勃兴起，而且城市居民的暴动也屡见不鲜。在彼得堡，1848年6月的下半月出现了城市居民的公开暴动。暴动从6月16日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18日。为了防止暴乱，沙皇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在彼得堡的各街区都设立了宪兵侦察班和警察分队，他们时刻注视着人民群众的行动。

1848年的城市居民暴动不仅发生在彼得堡，而且也发生在其他城市。乌格里奇、雷宾斯克都发生了暴动；在莫斯科、基辅、别洛斯托克、维利诺和斯摩棱斯克等地，形势也非常紧张。

这个时期，城市居民暴动虽多由霍乱流行病引起，但是它同样具有鲜明的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性质。

1848年的自然灾害推动了俄国城乡劳动人民革命运动的普遍高涨，革命运动的高涨使俄国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加深了俄国封建农奴制的危机。而这时西欧爆发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也对俄国的阶级斗争和农奴制危机有着极大的影响。

^① 尼方托夫：《1848年的俄国》，第41页。

农民解放运动的高涨

波澜壮阔的 1848 年欧洲革命从巴勒摩和巴黎开始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彼得堡宫廷,接着便在俄国人民群众中传播开来了。

关于 1848 年欧洲革命事件在这些地区传播情况的报告,接二连三地送到了彼得堡,送到了第三厅。在里加省的报告中说:“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老百姓对德国和法国发生的事件不是没有觉察的……甚至在一些县城,如在雅科什塔茨和维罗斯基县,通常对国外事件漠不关心的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也得知了目前国外发生的事件,并为之震动。”^① 在立陶宛的报告中说道:“被歪曲和误解了的欧洲事件在与普鲁士相毗连的各县迅速地传播着,现在,这个地区的居民,不论农民或地主,一天到晚都在谈论国外所发生的事件。”^② 在乌克兰,情况也是一样。1848 年春,宪兵专程来这里维持秩序,一位宪兵长官说,这个地区的农民非常清楚地知道奥地利革命的情况,还有不少人得知了加里西亚的政治事变,他们对此都兴高采烈,非常热烈地谈论着这些事件。

1848 年欧洲革命事件的种种传闻不仅在边区各省农民中广为流传,而且也在内地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图尔、卡卢加、弗拉基米尔等省传播着。1848 年 3 月 31 日,宪兵上校图拉在报告中谈到莫斯科郊区居民的情况:“在这里,许多各种各样的不确切和有害的传说到处流传。对于士兵和其他阶层来说,这种传说尚不足为惧,但在手工业工人和老百姓中,特别是在农民中,这种传说就非常有害了。”^③

1848 年欧洲革命的消息在人民,特别是农民中广为流传,说

① 第三厅档案,1848 年。转引自尼方托夫:《1848 年的俄国》,第 104 页。

② 同上书,第 106 页。

③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 年革命》第 2 卷,第 248 页。

明了俄国农民关心欧洲革命、欢迎欧洲革命的思想感情。正是这种渴望自由、解放和革命的思想感情促进了农民解放运动的高涨。

1848年欧洲革命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的农民运动，特别是西部各省的农民运动。当欧洲爆发革命的消息传来时，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地的农民运动空前高涨。不少地区的农民都争相购买枪支弹药，准备武装暴动。与此同时，有些地区还散发了号召起义和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的传单。

1848年3月19日，宪兵上校阿兰达连科从沃伦省报告说：“在靠近奥地利辖区的弗拉基米尔县，在布拉尼茨基伯爵的领地上约有3000农民拒不服从政府的命令；但是要恢复这里的秩序，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为了防止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阿兰达连科还建议“封锁边境”和增加边防军^①。

在同一天，宪兵上校别洛乌索夫也向第三厅报告了基辅省的情况。据他报告，在切尔克斯克、兹韦尼哥罗德和基辅等县有6个庄园的农奴拒绝服满应服的徭役。在这个报告中还特别提到，由于奥地利和德国革命事件的影响，乌克兰普遍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别洛乌索夫写道：骑兵将军尼基金“鉴于柏林和布勒斯劳所出现的混乱状况，已命令第一和第四轻骑师随时准备镇压这里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暴乱”^②。

1848年欧洲革命的消息在俄国的广泛传播和俄国农民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使绝大多数贵族地主陷于极端的恐怖之中。他们感到，欧洲革命，特别是俄国的农民运动，直接威胁着他们的统治地位，动摇了他们的私人财产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每当听到欧洲革命和俄国农民运动的消息时，他们便被吓得惊慌失措，恐惧不安。斯摩棱斯克的一个贵族地主在回忆录中写道：“1848年到来

^① 第三厅档案，1848年。转引自尼方托夫：《1848年的俄国》，第109页。

^② 第三厅档案，1848年。转引自尼方托夫《1848年的俄国》，第109页。

了,它,可以说,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时代。……这一年的开始,我们就听到了这样一些可怕的传说:整个欧洲都发生了革命运动;国王一个接一个地被赶跑了;离我们不远的某个地方,农民杀死了地主,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会发生等等。……每当这些消息传给我们时,我们一家老少就处在恐怖、忧郁之中。”^①

西部边境各省,如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沃伦等地的贵族地主,其恐怖情绪更为严重。在这些地区,经常听到西欧革命各国关于解放农民、杀死地主、夺回地主土地等消息。在沃伦省沿边境线的县内,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在复活节里农民将杀光所有的主。这一传说在地主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怖,许多地主纷纷离开庄园,逃到县城。这些地区的贵族地主曾多次上书沙皇尼古拉一世,表示忠心,请求他增加各地的驻军,防止暴乱,保证其人身与财产安全。

总之,1848年欧洲革命受到了俄国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欢迎,遭到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集团及贵族地主的强烈反对。它推动了俄国农民解放运动的重新高涨,引起了俄国统治集团和贵族地主的极大不安。

俄国各社会思想流派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反响

1848年欧洲革命不仅促进了俄国农民解放运动的高涨,加深了俄国封建农奴制的危机,而且也加速了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和成熟,在俄国各社会思想流派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斯拉夫派。斯拉夫派是19世纪30年代在俄国地主集团内部形成的一个特殊的自由主义派别。它认为俄国有着不同于西欧各国的、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认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浓厚的宗教信仰、和平情绪、忠君思想和对革命的憎恨是俄国人民所“固有的”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2卷,第250页。

本质，因而革命与俄国人民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在斯拉夫派看来，西欧是腐朽的，是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斯拉夫派所捍卫的是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它妄图把一切斯拉夫民族都置于沙皇的“庇护”之下。显然，这种思想是很反动的。

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斯·霍米亚科夫、伊万兄弟、康斯坦丁兄弟、彼得·基列耶夫斯基、伊万·阿克萨科夫兄弟、阿·科舍廖夫和尤·萨马林等^①。他们大部分都属于显贵，并拥有大量的地产。因此，他们虽然也对尼古拉一世的政府和政策进行了抨击，但仍然是俄国封建农奴制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在1848年，贵族地主由于惧怕欧洲革命和本国农民解放运动而产生的茫然失措的情绪，在斯拉夫派当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对他们来说，法国二月革命是出乎意料的。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是敌视的，对革命群众是憎恨的，对革命的评价是否定的。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斯拉夫派很快便得知了这一消息。2月27日，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就把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阿克萨科夫家族的包戈金。他在信中写道：“巴黎发生了革命。法国宣布为共和国。路易·菲力浦逃跑了，基佐等人也逃跑了。土伊勒里宫和巴尔罗亚尔宫被焚烧。您听到这些消息了吗？”^②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斯·特·阿克萨科夫便写信给他的儿子格里戈利。他在信中写道：“现在，事情并不在于狂暴野蛮的法国人像疯子一样地宣布了共和国，而在于火灾蔓延到了整个欧洲，而且还会烧到我们屋旁……他们，疯狂的法国，真见鬼；我们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他们这种革命热情。”^③这封信充分说明了阿克萨科夫对法国革命群众的憎恨和对革命的极端恐惧。

① 涅奇金娜主编：《苏联通史》第2卷，第307页。

② 尼方托夫：《1848年的俄国》，第148页。

③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2卷，252—253页。

由于斯拉夫派仇视和惧怕 1848 年欧洲革命,因此,在这一时期,他们完全成了沙皇政府的追随者。他们无条件地支持沙皇政府的一切反革命行动,热烈地拥护反动的 3 月 26 日宣言^①和政府关于这一宣言的说明。卡·斯·阿克萨科夫在给阿·恩·波波夫的信中充分地肯定了这一宣言及其说明。他写道:“昨天我读了关于宣言的官方说明文章。文章写得多么好啊!多么果敢,又多么温和,写得多么尊严、高尚和坚定啊!我、伊万兄弟、父亲以及我所见到的熟人都称赞这篇文章。”^②

他们不仅支持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和反革命行动,而且还上书尼古拉一世,表示自己的忠君之心。1848 年 3 月 28 日,卡·斯·阿克萨科夫曾上书沙皇。他一开始就以俄国必须“同西方隔离”的著名原则为依据,将西欧国家的“时代动乱”和“狂暴的愿望”与俄国人民所特有的“顺从和忍耐”相比较,强调“俄国任何时候也不需要寻求政府形式的完善,因为俄国清楚地知道,世界上是不存在这种完善的政府形式的”^③。卡·斯·阿克萨科夫的这封信充分说明了斯拉夫派对沙皇政府的态度,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当时贵族地主对尼古拉一世的忠心。

总之,在 1848 年,斯拉夫派已失去独立性,完全成了沙皇政府的支持者和追随者,成了革命的敌人。

西欧派。西欧派是 19 世纪 40—50 年代俄国农奴制开始崩溃时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流派。在当时俄国各社会思想流派的论争中,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处于对立地位。西欧派反对斯拉夫派的认为俄国有着不同于西欧各国的、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的观点,主张

① 1848 年革命爆发后,沙皇虽急欲镇压革命,但尚无力立即行动。为了掩盖其力量的虚弱和干涉别国革命的企图,尼古拉一世于 1848 年 3 月 26 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声称:“我们不侵犯别人,但也不允许别人侵犯我们。”

② 尼方托夫:《1848 年的法国》,第 153 页。

③ 鲍姆金主编:《1848—1849 年革命》第 2 卷,第 253 页。

俄国必须沿着西欧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前进,俄国应学习西欧各国的制度、文学和生活方式。因此斯拉夫派称他们为西欧派。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多为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和学者。他们是教授特·恩·格兰诺夫斯基、恩·恩·库德利亚采夫、克·德·卡维林、布·恩·奇切林、伊·克·巴布斯特,文学家和评论家普·雅·恰达耶夫、普·弗·安尼科夫、弗·普·鲍特金、姆·恩·卡特科夫等。当时同情西欧派的有作家伊·阿·屠格涅夫、德·弗·格里戈罗维奇,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和政论家弗·恩·马伊可夫等^①。他们大多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也有几人出身于商人家庭。所以,这个派别是有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

西欧派的社会政治观点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他们力求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刊物和演讲等方法宣传其政治观点。西欧派在其著作中都猛烈地抨击了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尖锐地批评了尼古拉一世的反动政策,同时还宣扬了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资产阶级的自由和生活方式。但是,西欧派是温和的自由主义改良派。他们虽然反对封建农奴制度,主张废除农奴制、取消封建特权,但反对用革命的办法,主张由沙皇政府和贵族地主“自上而下”地逐步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虽主张解放农民,但要求农民向地主缴纳赎金,以赔偿地主的损失。西欧派的这些政治主张充分反映了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既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又唯恐封建农奴制度彻底覆灭,既同情革命,又惧怕真正的人民革命的矛盾心理状态。西欧派的这种矛盾而又复杂的心理状态在对待 1848 年革命的态度上也明显地表露了出来。

法国七月王朝覆灭的消息传到俄国后,西欧派都表示热烈的赞同。当时还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布·恩·奇切林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欣喜若狂……高声喊叫‘共和国万岁!’第二天,整个大学

^①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16 卷,第 2 版,第 424 页。

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大学生们都激动地、惊奇地奔走相告。”按照奇切林的话说，沉着的格兰诺夫斯基也同样兴高采烈，“欢迎这个向自由与和平道路上迈进了新一步的革命事件。”

但是，国内外形势的进一步发展，1848年革命在欧洲的普遍展开，俄国农民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城市秩序的混乱，尼古拉一世采取的极端残酷的镇压手段，所有这些使得西欧派极为恐惧和不安。这时，他们的“革命”情绪下降了，保守情绪增强了，因而，他们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评价也随之改变了。

西欧派的代表人物奇切林曾抒发了他对欧洲革命的热情，曾自称同情“极端派”，但是巴黎6月起义却使这位“极端派”的同情者动摇了。他写道：“六月的日子，当我相信的民主群众突然像一群暴徒一样，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考虑地发动暴动，准备推翻为他们而建立的政权时，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雷电般的打击。当暴乱被镇压，由卡芬雅克建立了秩序时，我便成了一个温和的共和派，并且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国才能确立起来。但是，总统的选举终于使我完全失去了对民主的天真的信任。在我看来，要达到这一目的，已经或多或少地是遥远的未来了。我对民主的生命力感到失望后，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也随之感到失望了。”^①

西欧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如普·弗·安尼科夫和弗·普·鲍特金也有着类似的变化。普·弗·安尼科夫曾目睹1848年法国革命，曾同马克思非常接近，并大肆宣扬了他与马克思的结识，但是，从1848年起，他又表示坚决与马克思绝交。他自称，在1848年10月他就断绝了与马克思的关系，并且不再恢复这种关系了，原因是马克思的实际行动与俄国的生活实际相距太远了。安尼科夫的这一变化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弗·普·鲍特金在1848年革命时期也走过同样的道路。据卡

① 《回忆奇切林。40年代的莫斯科》，莫斯科，1929年，第75—75页。

维林证明,别林斯基逝世前曾说道:“鲍特金到过欧洲,并了解欧洲,……,他沾染了欧洲的颓废,却把欧洲的伟大思想当作耳旁风。”卡维林还补充说:“鲍特金在回国时,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贪图享受,吃喝玩乐,而对社会活动不闻不问的资产者了。”^① 安尼科夫在其回忆录中也谈到,谁都不像鲍特金那样惧怕 1848 年革命。

奇切林、安尼科夫和鲍特金对 1848 年革命的态度,事实上也就是西欧派对 1848 年革命的态度。他们对 1848 年革命的这种态度并不是偶然的,是由其阶级地位及其政治观点决定的。正是他们的阶级地位和政治观点决定了他们在 1848 年革命后,逐渐与斯拉夫派接近,直至 60 年代初,完全归顺于贵族地主阵营。这时,作为一个派别,它已不复存在了。

革命民主派。在 19 世纪 30 年代初,别林斯基及其周围的青年组成了一个青年小组,这个小组被命名为“十一号文学社”(以其居住的房间号取名)。当时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彼得罗夫、格里戈里耶夫、奇斯佳科夫、普罗托波波夫、普罗佐罗夫和阿尔格兰杰尔等^②,这个小组具有平民知识分子的性质。在 19 世纪 30 年代,别林斯基



图 49 别林斯基

还极力拥护唯心主义,后来又成了黑格尔的信徒。到 1848 年以后,别林斯基才最后转变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曾同俄国的封建农奴制的专制制度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是

^① 《别林斯基回忆同时代人》,列宁格勒,1929 年,第 122 页。

^② 涅奇金娜主编:《苏联通史》第 2 卷,第 295 页。

同农民运动、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反抗农奴制的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别林斯基不仅反对封建农奴制度，而且无情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性，认为它是用“民主的”外衣掩盖了劳动阶级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和贫困状况。所以，别林斯基在俄国的革命斗争和先进文化的建立中起过很大的作用，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以后革命者的民主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1848年革命中，别林斯基和赫尔岑都没能亲身参加俄国的革命斗争。因为赫尔岑于1847年已经离开俄国到国外去了；别林斯基于1847年已身患重病，并于1848年春逝世了。尽管如此，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期，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革命民主思想及传统，仍在其信仰者彼得拉舍夫斯基派、车尔尼雪夫斯基、萨尔蒂可夫—谢德林、舍甫琴科等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是19世纪4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的革命派别。参加这个派别的有文学家、学者、大学生、小官吏和军官。这个派别从1845年开始活动，他们每逢星期五都在布塔谢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家聚会。在会上，他们热烈地讨论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致力于哲学世界观基础的研究，拟订活动计划。同时，他们在会上还公开地揭露封建农奴制的



图50 彼得拉舍夫斯基

罪恶，深切同情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经常参加集会的有斯帕西涅夫、阿赫沙鲁莫夫、蒙别利、卡什金等人。作家萨尔蒂可夫、陀斯妥也夫斯基、诗人普列谢那夫和马伊科夫、地理学家谢苗诺夫、钢琴

家鲁宾斯坦等人也都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常客。这些人都出身于小贵族家庭，是当时具有革命民主思想的青年。

1848年欧洲革命得到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热烈支持和深切同情。集会的参加者都积极策划革命活动方案。西伯利亚金矿工人尔·阿·切尔诺斯维托夫于1848年12月参加了一次星期五集会。在会上，切尔诺斯维托夫提出，准备在一年内参加西伯利亚居民、乌拉尔农奴工人、顿河哥萨克人或首都革命组织的大规模起义的行动计划。但是彼得拉舍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反对叛乱和平民起义”，希望在这一代看到“傅立叶所设想的法朗吉”得以实现。切尔诺斯维托夫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之间的争论，说明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中存在着不同的政治主张与分歧。

在1849年4月7日傅立叶诞辰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举行了同志聚餐会，在这次聚餐会上，他们猛烈地抨击了沙皇专制制度，热情地颂扬了未来的社会主义。

这个团体的许多参加者都希望人民革命的到来。他们主张准备群众性的起义，筹划建立秘密印刷所，到人民和沙皇军队中散发传单。斯帕西涅夫还拟定了秘密团体的章程草案。但是，他们尚未来得及作出自己的战斗计划和成立革命组织，便被沙皇的警察发现了。1849年元月22日，尼古拉一世指示逮捕这个团体中的积极参加者。当天晚上就有39人被逮捕，其中有彼得拉舍夫斯基、斯帕西涅夫、蒙别利、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经过审讯，军法会议审判长认为21人应判死刑，但因有可“减罪”的情节，便对一些人判以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代替死刑，其他人有的服苦役，有的被流放。彼得拉舍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尼古拉一世的残酷镇压。

除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以外，具有革命民主思想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萨尔蒂可夫—谢德林、舍甫琴科和赫尔岑等人对1848年革命也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出生于萨拉托夫的一个教士家庭。他从小就看到农奴所遭受的压迫与痛苦。他深受别林斯基革命民主思想的影响,并继承了别林斯基的革命传统。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彼得堡学习。欧洲革命的爆发和传播加速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革命世界观的形成。1848年9月8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不喜欢这些老爷们。他们经常说‘自由’、‘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局限在口头上和法律上,并没有付诸实现。他们只是谈论取消那些不平等的法律,而不谈消灭压迫着十分之九的人民——奴隶和无产者的社会制



图 51 车尔尼雪夫斯基

度。事情并不在于有沙皇或者没有沙皇,有宪法或者没有宪法,而在于社会关系,在于一个阶级不再吸吮另一个阶级的鲜血。”^①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随着俄国国内形势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认识到俄国农奴制度是真正束缚俄国的羁绊,认识到推翻俄国农奴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1848年欧洲革命寄予极大的希望和同情,同时,1848年革命也坚定了他同俄国封建农奴制度作斗争的信心。这时,他宣布说:“我……或者成为最激进的左派之一。”他深信俄国革命即将来临。

米哈伊·叶甫格拉夫维奇·萨尔蒂可夫—谢德林(1826—1861年)是俄国著名的作家。40年代他已经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莫斯科,1939年,第110页。

者了。1844年，他在皇村中学毕业以后，曾在军队中服役，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他深受别林斯基思想的影响，按他自己的话说，被社会主义学说所吸引。同时他还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星期五聚会，是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中坚决反对封建农奴制压迫的人之一。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不久，谢德林因其中篇小说《反抗》和《复杂事件》中的激进的文学主张而被流放到维亚特卡。

塔拉斯·格里哥利耶维奇·舍甫琴科(1814—1861年)是一个农奴的儿子，曾目睹贵族地主的专横残暴和人民不堪忍受的痛苦生活，因而万分仇恨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暴虐统治。直至24岁，他才在勃留洛夫和茹科夫斯基的帮助下获得自由。舍甫琴科



图 52 萨尔蒂可夫—
谢德林

深受十二月党人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1846年他参加了在基辅成立的秘密团体“吉利—美福季兄弟会”。1847年兄弟会被沙皇政府破获后，舍甫琴科被流放到边远的奥尔斯克要塞。

舍甫琴科通过报纸得知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消息，他欢迎和同情1848年革命。为了抒发对革命的向往和对沙皇的憎恨，他写了诗歌《沙皇》。在这首诗歌中，他号召一定要惩办戴王冠的暴君：

惩办沙皇，
他们，人类刽子手的末日
已经来临！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年)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出身于贵族家庭。童年时代，他从自己的家庭里看

到了封建农奴制的极端残酷性。他的法语教师、雅各宾党人布素对他讲述了法国革命和法国人民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革命行动，这使赫尔岑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产生了很大兴趣。以后，赫尔岑又深受十二月党人的影响，相信十二月党人是“真正忠于祖国的人们”。1829年，赫尔岑进入莫斯科大学后，他和奥加廖夫很快便组织了一个政治小组。他们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思想，主张用革命方法推翻封建农奴制度。

赫尔岑在出国前曾写小说抨击封建农奴制度。他的长篇小说《谁之罪？》、中篇小说《四十个女贼》都深刻地揭露了农奴制的罪恶，唤起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统治。总之，他对于农奴制度



图 53 亚·伊·赫尔岑

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都怀着强烈的仇恨。

1848年革命开始时，赫尔岑正在意大利。同年5月他从意大利到了巴黎，在这里一直停留到1849年6月。赫尔岑不仅目睹了1848年法国革命，而且还亲身参加了这次革命。他会见了法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会见了其他国家的流亡者，并经常给他们以物质上的帮助。他访问各政治俱乐部，参加会议和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同时，敏锐地观察法国革命的进程。他认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建立是资产阶级“窃取了人民胜利的成果”。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是革命的决定性的失败。六月起义的被镇压，使他极度失望，他在谈到这一时期的体验时曾说：“六月事变以后，在我的心中从来没有接近希望的曙光。”他的这种心情充分说明了他没有看到革

命的出路,也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

赫尔岑不仅注视着法国革命的进程,而且更关心俄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他在1848年8月2—8日给莫斯科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强烈地热爱着俄国和俄国人民,只有他们才具有豪放的天性,才具有我在法国工人中所看到的那种闪耀着高尚光辉的豪放的天性。……正因为这一点我才不愿意离开巴黎。”^①但是,他对俄国的未来却充满了悲观失望。1849年6月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曾表露了这种情绪,他写道:“我常常想,如果俄国比现在稍有一点变化,那么,我就立即前往莫斯科。那里的未来很难诞生,欧洲的过去很难死亡。”^② 赫尔岑对欧洲、对俄



图 54 奥加廖夫

国绝望的看法说明他没有达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高度,不可能明白社会发展的进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③

总之,由于俄国各社会思想流派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因而他们对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反响也各不相同。

① 《赫尔岑的新材料》,莫斯科,1927年,第45页。

② 《赫尔岑全集》第5卷,第276页。

③ 列宁:《纪念赫尔岑》,《列宁全集》第18卷,第10页。

第二节 沙皇俄国对 1848 年革命的镇压

尼古拉一世对欧洲革命形势的估计与反革命计划

1848 年欧洲革命的爆发并没有使尼古拉一世感到特别的震惊,因为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他都觉察到隐含着的反叛精神。像梅特涅一样,他预料到大的政治灾难总有一天会袭击他和他的王朝。所以,在 1848 年初,当意大利一月革命刚刚爆发时,尼古拉一世就对欧洲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估计:

(一)意大利革命爆发后,为了“平定边疆”,奥地利将出兵意大利。这样一来,奥地利政府就会削弱其在北部领地的地位;目前,北部也和南部一样动荡不安。

(二)革命运动可能从意大利蔓延到中欧。并迅速唤起整个西北德、西德和北德。欧洲事态的这一发展对俄国并不十分危险,因为它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摧毁德国革命。

(三)最后,革命运动可能遍及整个欧洲。这是最危险和最可怕的。

尼古拉一世认为,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三种估计,因此,他又设想了一个欧洲革命在各主要国家发生的图案:意大利革命发生后,奥地利会随之爆发革命;继奥地利之后,可能在德国爆发革命;而后,革命又会在法国发生。尼古拉一世根据上述的种种估计,拟定了一个反革命计划。这一反革命计划在他的文章、通信和谈话中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848 年 1 月,尼古拉一世在给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信中谈到西欧可能出现革命高潮时曾指出,“可怕的灾难”即将来临。同时,他让普鲁士国王相信,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拯

救欧洲”。尼古拉一世在《一月国际形势评论》中也表明；他将在一定的条件下调动军队镇压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这篇评论还谈到：“但是，也可能在德国突然爆发革命。……我担心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和平将遭到破坏。如果战斗在这里开始，那对革命者将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我们的切身利益，就必须勇敢地奋起反对那种即将威胁我们的祸害，必须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捍卫正常的秩序。俄国应该担负起这个任务。我接受这个任务，并愿在上帝的帮助下，依靠正义和信赖上帝去迎接危急。”^①

2月初，即二月革命爆发前两周，沙皇在同康斯坦丁大公谈话时公开表明，在西欧各国发生革命运动的情况下，沙皇俄国一定要领导欧洲封建反动势力，以武力扑灭革命。如果革命运动扩展到中欧各君主国，并波及到法国时，尼古拉一世的计划是，“必须作好两种准备，或者不经求援便直接进入德国，用我们的‘洪水’一下子把革命淹没下去，不给革命以发展的机会，迫使其按照我们的意志办理，或者以大军压境，等待称之为巨大怪物的革命到来。此时我们便与之决战，将其彻底摧毁。”^②

在这些日子里，尼古拉一世一直在考虑同革命作斗争的策略。他同其亲信帕斯凯维奇交谈，结果是：作好往西部边境调动军队的准备和制定在战争时期大规模动员军队的计划。关于这一点，康斯坦丁大公在1848年2月13日的日记中也作了记载。他写道：“我们大家都考虑到战争的可能性，为了在任何情况下战争的爆发都不致于使我们手忙脚乱，决定在本年度停止军队换防，因为这会造成多余的花费。目前所必须考虑的是如何把军队配置在边境线上

^① 《红档》，1938年，4—5号（第89—90卷），第163页。转引自尼方托夫：《1848年的俄国》，第199页。

^②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日记》，转引自尼方托夫：《1848年的俄国》，第201页。

和准备给养。”^①

但是,1848年欧洲革命完全不是尼古拉一世所想象和描绘的那样。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这对尼古拉一世来说,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也是极端危险的。他清楚地意识到,巴黎革命必将引起整个西欧的政治动乱,要制止革命向中欧扩展也就更加困难了。革命运动迅猛异常的发展不仅破坏了尼古拉一世的反革命计划,而且打乱了他的反革命步伐,使他处于极端恐怖与孤立之中。

沙皇政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及其反动的加强

1848年欧洲革命的消息传入俄国后,使俄国城乡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紧张局势,特别是在西部边境地区,还出现了骚乱与动荡。各地动乱的情况使彼得堡统治集团在1848年整个春季都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他们对国内的形势十分担忧。尼古拉一世在同皇室的谈话中也表露了这种恐怖与不安的情绪。他甚至公开承认:“在俄国可能发生动乱。”同时,他在给帕斯凯维奇的信中,也表现出了悲观情绪。他写道:“一般说来,对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事先作出估计,现在只有上帝能够拯救我们!我的一切希望和坚定信念都寄托在他的身上,按上帝的意志办吧!”^②

1848年春季是如此,到了夏季,国内形势也没有较明显的缓和,仍然处在动荡不安之中。第三厅上尉马什科夫在报告中写道:“今天,我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听到传说,这些传说足以使我相信,我所得知的关于本星期日将举行暴乱的事是真实的,平民试图举行武装起义。但起义的目的、计划和方法我尚未得知。只是听说,别尔德的手工业工人和亚姆斯克镇的居民是暴动的主要参加者

^①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日记》,转引自尼方托夫:《1848年的俄国》,第201页。

^② 谢巴托夫:《元帅帕斯凯维奇公爵》第6卷,第214页。

……”^①类似的报告像雪片似地飞向彼得堡，传到尼古拉一世的宫廷里。因此，在1848年整个夏季，彼得堡宫廷及显贵们仍然是慌作一团。关于宫廷及显贵的慌乱情绪，索洛维约夫曾有所记载，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彼得堡政府惊恐万状，这种恐怖真是愚蠢到了极点，也只有这样愚蠢了。在他们看来，似乎首都已经爆发了革命。据说，皇后沿彼得堡街道闲游归来后，竟十分满意地说：‘他们还向我行礼，他们还向我行礼！’她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她在听到法国革命的消息后，十分担心彼得堡的官兵们会在得知路易·菲力浦被赶走的消息后，不再向沙皇及其宫廷显贵们脱帽行礼。但是，莫斯科的恐怖情绪与彼得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时时都在担心，在莫斯科革命会马上爆发。”^②

在俄国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群众骚动蜂起的情况下，沙皇政府对当时国内形势进行了研究和分析，采取了更加反动的对内政策。

尼古拉一世及其政府清楚地看到，严重威胁其统治地位的是俄国国内的动乱，因此，要想维护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及其统治地位，就必须首先竭尽全力阻止革命向俄国蔓延和革命在俄国发生。为防止革命的发生，沙皇政府便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

当巴黎二月革命的第一批消息传到俄国时，沙皇政府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群众的情绪和行动上。在彼得堡，为及时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行动，第三厅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监视，同时政府还派出便衣警察专门负责监视群众的工作，无论是第三厅或便衣警察，必须随时将群众的情绪、言论和行动向政府报告。随着形势的发展，政府又加强了巡逻队和宪兵骑兵队，协助便衣警察进行监视。在西部诸省，沙皇政府实行了更为严厉的制度。政府在这些省份不仅没收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2卷，第270页。

② 《谢尔盖·米哈伊罗维奇·索洛维约夫日记》，第121页。

了居民的火枪,而且还没收了他们的大刀。紧接着,火药也被禁止买卖了。同时,在这些省份内(除波罗的海沿岸外),根据1848年3月2日命令,恢复了《一八一一年非常法》;根据这一非常法规定,在镇压群众解放运动方面,总督拥有无限的权力。3月24日,俄罗斯各省都接到了内务部的特别命令,命令采取“使农民归顺的一切措施”。所以,当农民运动刚兴起时,政府便调动正规军,进行残酷的镇压。

沙皇政府不仅加强了对群众的监视,而且在2月初便开始了军队的调动工作。为了随时镇压西部边境地区可能发生的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波兰王国可能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沙皇政府便把一部分军队调至西部各省,以加强这些地区的军事力量。同时,尼古拉一世还命令将强大的卫戍部队留在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各重要城市中。

在调动军队的同时,沙皇政府还动员和组织了一部分军队。1848年夏季,沙皇政府利用新建立的后备队负责讨伐工作,帮助地方警察监视人民群众,维持各地秩序,直至镇压革命运动。但是,保护沙皇政府、维护封建秩序的主要柱石仍然是沙皇的正规部队。

尼古拉一世特别惧怕革命思想在俄国的传播。为了制止革命思想的传播,沙皇政府加强了书报检查制度,采取了最严厉的书报检查政策,并成立了“书报检查非常委员会”。除规定禁止革命国家的人民进入俄国外,还严禁国外的任何报纸、杂志及书籍运进俄国,更不允许在俄国出售。在国内,任何书籍的出版,甚至包括儿童玩具的说明书,都要受到书报检查当局的严格检查,未经“书报检查非常委员会”许可,决不允许出版。因此,在这一时期,俄国的出书量甚小,就是已出版的一些书籍,也多属缺乏思想内容的作品。

沙皇政府借助第三厅、军队和警察在国内推行了极其反动的政策,阻止革命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制止革命在俄国的爆发。

尼古拉一世武装干涉的延期

自从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尼古拉一世始终企图以武力镇压这次革命。在巴黎二月革命前,他就曾对革命加以设想,仔细考虑了镇压革命的计划,并将其计划通过最高文官涅谢尔罗迭正式通知了梅特涅。这时,他还相信欧洲各君主国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革命,并幻想由自己充当这一联盟的领袖,担负起维护欧洲“安宁与秩序”的“神圣职责”。

意大利一月革命兴起时,尼古拉一世便准备出兵援助奥地利,镇压意大利革命,并暗中给奥地利600万卢布的经济援助;巴黎二月革命爆发后,虽然打乱了尼古拉一世的设想与镇压革命的计划,但是他仍没有放弃其原定计划,而是呼吁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动员全德的军事力量,将其配置在与法国接壤的边境线上,并答应将以30万大军援助普鲁士;当巴黎二月革命在奥地利与普鲁士引起骚动时,尼古拉一世仍未收敛,企图出兵奥地利与普鲁士,以便随时镇压革命运动。他在3月2日给帕斯凯维奇的信中写道:“如果普鲁士国王的行动坚决,一切还可以拯救;反之,我们就必须参与此事了。”在3月10日的信中,他又写道:“如果国王投降了,那么,在德国就会失掉一切,所以,我们必须祈求上帝的援助,挺身而出,反对混乱状态,……在奥地利新的统治者掌权的情况下,他们可能顺从革命的意志,加里西亚也会唱反对我们的调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必须以国王斐迪南的名义占领这一地区……”^①。

尼古拉一世在革命一开始就试图实现他的反革命计划,但是并没有立即出兵。这主要是因为迅猛异常的革命洪流使得尼古拉一世措手不及,他根本没有时间动员国内外反动势力,也没有作好

^① 谢尔巴托夫:《元帅帕斯凯维奇公爵》第6卷,第199—200页。

战争准备。他虽然试图干涉巴黎二月革命,但由于深知自己力量不足,始终未敢采取任何干涉行动。他虽然高喊援助奥地利镇压意大利革命,但是又害怕把自己的军队开进远离俄国边境的意大利。尼古拉一世在国际述评中写道:“如果奥地利和皮蒙特之间爆发战争,在那里我们暂不必采取任何行动,至少在革命的法国进攻奥地利以前是这样,……任何时候我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调至离帝国如此遥远的国家。”^①

在1848年欧洲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俄国农民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城市贫民的觉醒,也为尼古拉一世镇压别国革命运动增加了困难。特别是那些与革命欧洲邻近的地区,反响特别强烈,俄国西部各省的波兰民族要求复兴波兰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一世便决定将大量军队集结在波兰王国、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立陶宛、白俄罗斯和第聂伯西岸乌克兰地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随时镇压该地区所发生的革命运动,而且可以在适当的时机调遣军队过境,镇压欧洲革命,藉以阻止革命向俄国蔓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好心的沙皇”把进行侵略战争和执行俄国的传统对外政策(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说这一政策是‘不变的’)看成是延缓国内革命到来的唯一手段。”^②

但是,沙皇要调动军队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帕斯凯维奇在调动军队的问题上曾告知尼古拉一世,“1848年春初,只能调动37万军队”;沙皇在同沃尔康斯基的谈话中曾谈到,要把30万军队调至普鲁士的莱茵河沿岸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实际上,这个估计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尼古拉一世在衡量了他与帕斯凯维奇所制定的军事行动计划后,便把2个月改为4—5个月。从尼古拉一世与帕斯凯维奇1848年7月24日的通信中可以看出,直至1848年夏季向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803页。

^②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36页。

西部边境调动军队的工作才告结束，尼古拉一世写道：“现在，军队的调动才算就绪了。”^①

在军队调动的整个过程中，尼古拉一世一直采取防御立场，竭力避免同革命欧洲发生冲突。他的这一立场在他与帕斯凯维奇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在信中曾多次提到避免战争的事，他写道：“暂时我们还不可能同谁作战”，“目前战争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发动战争的借口”，“暂时我们还必须等待……上帝告知，不久即发生战争”等话语。这些都说明，尼古拉一世惧怕同欧洲各国革命力量发生冲突。就是在预计到致德国最后通牒可能导致同普鲁士发生军事冲突时，尼古拉一世仍要求帕斯凯维奇采取防御政策，甚至允许敌人直接进入俄国领土。

总之，至1848年4月，尼古拉一世一直没有制定什么新的方针，他一直采取等待的立场。所以可以说。直至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前，沙皇外交政策的特点是：采取防御立场，等待有利时机。

沙皇俄国武装干涉的准备及对革命的镇压

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沙皇俄国同欧洲革命的较量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级：从巴黎二月革命至巴黎六月无产阶级起义。这一阶段是革命在西欧各国胜利发展的时期，也是沙皇俄国处于孤立和国内动荡不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沙皇俄国对内加强了镇压，竭力防止革命在俄国的爆发；对外则被迫放弃了原定的侵略计划，暂时采取了等待时机的防御立场。第二阶段（1848年夏一冬）是巴黎六月起义被镇压后，欧洲反革命势力转入进攻的时期。这个时期，沙皇一方面残酷地镇压俄国的农民解放运动，巩固其统治；一方面积极准备力量，武装镇压别国的革命运动。第三阶段（1849年

^① 谢尔巴托夫：《元帅帕斯凯维奇公爵》第6卷，第243页。

春—夏)是欧洲革命中心转移到匈牙利和俄国国内状况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个时期,沙皇俄国采取了大规模地、残酷地镇压欧洲革命的最后一块阵地匈牙利的反动措施。

1848年夏季,国际关系发展的特点是反革命转入进攻。巴黎六月起义的被镇压,奥地利在库斯托查对意大利革命的胜利,俄国军队和土耳其军队对多瑙河公国的占领,那不勒斯军队对墨西拿的野蛮炮轰,革命维也纳的陷落,柏林的反革命进攻,所有这些就使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给了沙皇俄国进一步巩固国内稳定形势,大力扩充军备,积极改良武器装备以便大规模干涉别国革命运动的有利时机。

1848年6月,欧洲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后,沙皇俄国最早进行武装干涉的国家是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早在1848年4月1日,焦格麦尔便被派到两公国,不久,他又接到俄国全权代表的任命。尼古拉一世通知他,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可以调动在比萨拉比亚成立的特别远征军团(该团由格尔什坚茨维格领导)占领两公国。1848年6月,两公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慑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焦格麦尔请求立即占领两公国。根据焦格麦尔的请求和尼古拉一世的允准,6月25日,俄军先头部队渡过普鲁特河,向贝尔拉得推进;6月28日,另一支3000人的部队在斯库利亚内越过普鲁特河,占领了雅西。在占领摩尔多瓦以后,瓦拉几亚的革命运动也正处在高涨之中,沙皇俄国对日益高涨的瓦拉几亚革命运动十分恐惧,于是,6月19日便以恐吓和威胁的手段,迫使土耳其进军瓦拉几亚。在俄国的外交压力下,土耳其军队于7月9日侵入瓦拉几亚,同时在土耳其军队中还安插有俄国的军事顾问。此后不久,俄国军队也开进了瓦拉几亚,从而,以武力绞杀了两公国的革命^①。

^① 详见第五章。

沙皇俄国不仅干涉多瑙河两公国的革命，而且竭力破坏德国的统一。柏林三月革命为德国的统一开辟了道路。同时在霍尔施坦和什列斯维希爆发了反对丹麦统治的革命。它们成立了自己的临时政府，建立了当时在德国最进步的民主制度。4月6日，普鲁士向丹麦宣战，由青年组成的志愿兵开进了霍尔施坦，进占了什列斯维希，并远征丹麦的领地日德兰。对丹麦的战争是为统一德国而进行的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沙皇俄国十分惧怕德国的统一，于是便反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尼古拉一世把五六十万俄军集结在边境线上，随时准备开往德国去“整顿秩序”，并扬言不结束丹麦战争，俄国便进军普鲁士。

7月26日，涅谢尔罗迭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给德国发出了一个威胁性的照会，声明俄国政府不同意德国统一。与此同时，沙皇俄国还时时怂恿德国的反动势力进行反革命活动。1848年11月9日，国王威廉四世试图在这一天发动政变。事实上，早在9月，威廉在与尼古拉一世的秘密通信中，就曾询问能否在政变失败时援助他。沙皇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要想使普鲁士恢复旧秩序，就必须重新举起旧日的旗帜。”^①

但是，在武装干涉两公国的革命运动和破坏德国的统一时，尼古拉一世还不敢大规模地、广泛地干涉其他国家的革命事件，因为这时俄国所动员的军队只能勉强防止西部及中部各省的群众骚动和农民运动，他还受到俄国国内形势的牵制。但是，他对巴黎六月起义被镇压以后，反革命开始转入进攻的形势却是喜形于色，高兴万分的。他向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刽子手卡芬雅克将军致敬，庆贺他与“共产主义邪说”进行斗争。他赞扬扑灭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拉德茨基将军和血洗捷克和维也纳起义的文迪施格雷茨。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尼古拉一世便积极展开外交活动，竭力巩固国内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826页。

秩序，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军事力量，为实现其大规模武装镇压欧洲革命的计划，维护欧洲的封建秩序及神圣同盟，保持欧洲均势，巩固其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作准备工作。

在外交方面，沙皇俄国竭力摆脱其孤立处境。维也纳会议以后，俄、奥、普、英等国虽然结成了神圣同盟，声称互相援助，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一直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俄国的野心最大，力图建立俄国在欧洲的霸权，竭力阻止各国建立反俄联盟，因此，俄国竭力使奥、普之间不和，维护德国的分裂状态，并使德国不致过分削弱。英国的主要方针是全力加强普、奥的力量，以便同法、俄抗衡，使欧洲大陆保持均势，便于英国操纵与利用。奥地利的打算是抑制俄国，削弱普鲁士，维护其在中欧的霸主地位。普鲁士则是设法扩张自己的领土，同奥地利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它们之间的这些矛盾不断发展，使神圣同盟各国的关系日益恶化。在1848年欧洲革命前夕和革命初期，沙皇俄国与普鲁士、奥地利的关系极为紧张，俄国一度陷于孤立的地位。

但是，在巴黎六月起义以后，俄国基本上摆脱了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它在国际关系中的孤立处境。它不仅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与卡芬雅克共和国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与此同时，它还加强了同其他西欧国家的联系，特别是同瑞典和丹麦的联系。

虽然尼古拉一世对法兰西共和国十分仇视，但是卡芬雅克掌权以后，他立即看到，卡芬雅克制度是反对革命的可靠的支柱，因而通过当时尚在法国的基谢廖夫向卡芬雅克祝贺。尼古拉一世在1848年9月8日给帕斯凯维奇的信中写道：“据说，他（指卡芬雅克——引者）是一个很好的人。目前在那里，政务掌握在铁腕人物手中，看样子，一切都很有秩序……”^①

众所周知，在普丹战争中，瑞典和沙皇俄国曾采取一致行动，

^① 谢尔巴托夫：《元帅帕斯凯维奇公爵》第6卷，第252页。

给普鲁士以巨大的外交压力。而在1848年，尼古拉一世为了进一步加强同瑞典王国政府的关系，亲自派他的儿子康斯坦丁到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国王商谈关于共同镇压革命的问题，并得到了圆满的答复。

所以，在1848年夏季以后，沙皇俄国同西欧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并在与各国的相互关系中巩固了它的国际地位。

在军事方面，1848年夏季与年初相比，沙皇俄国也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这时，已有25万军队集结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边境。8月末，第二和第三军团已有14万人。8月23日，尼古拉一世通知帕斯凯维奇，“在目前欧洲尚未平静的情况下，这些军队完全处于战备状态。”1848年7月15日尼古拉一世在致普鲁士国王的信中告知说，俄国已经顺利地动员了42万人的军队和10万人的后备队。除此之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地方部队，负责维护西部各省的“秩序”，同时，协助地方警察进行工作的讨伐队也可作为后备队。

在动员军队的同时，尼古拉一世还千方百计地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他已经看到，俄国的军队装备和军事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先进国家。1848年7月11日，尼古拉一世曾警告帕斯凯维奇：“我们也不要忘记，只有我们还在使用燧石枪，而我们却要同使用来复枪的军队作战，所以在这一点上，优势在敌人方面。”为了改良步兵的武器装备，尼古拉一世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尽量采用来复枪武装自己的军队。1848年6月初，在俄国用来复枪武装的军队有14个自卫军团、1180个模范步兵、第三步兵军团的6个轻骑兵团的600人等。1848年9月，沙皇政府又从国外运往华沙1228支称之为“利吉赫”的步枪，武装其他轻骑兵团。1849年2月，俄国又得到了1152支来复枪。此外，沙皇政府还将龙骑兵使用的枪支改造为加尔图格式来复枪，用以武装更多的军队，同时在步兵中用尖头子弹代替圆头子弹，这样就能加大射程，提高命中率。

在国内，这时沙皇俄国虽然没能完全摆脱革命运动的威胁，但

是,由于加强了反动措施,所以国内的形势保持相对的稳定。

1849年春,沙皇俄国在外交、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国内的形势也基本稳定了。在这种形势下,沙皇俄国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武装镇压,决心摧毁欧洲革命的最后一块阵地匈牙利。

1849年5月27日,尼古拉一世在欧洲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以14万人的兵力开进匈牙利,公然镇压匈牙利革命。

沙皇俄国的入侵,使匈牙利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之中。英勇不屈的匈牙利人民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多次给奥俄联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终因寡不敌众,又加之某些领导人的叛变,终于在1849年8月被沙皇俄国镇压下去了。^①

匈牙利革命的被镇压标志着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和整个欧洲反动势力的胜利。虽然这一胜利加强了沙皇俄国的国际影响,但是恰恰是这种影响的加强使俄国与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矛盾尖锐化了。

1848年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它不断地向中东推进,向亚洲找寻市场,英国的这种要求与沙皇俄国在东方获取新领土的要求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法国早已成为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对手,特别是尼古拉一世在承认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问题上表现犹豫不决及对拿破仑三世的蔑视,使法俄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至于奥地利,它本应对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危急时刻俄国对它的拯救感恩戴德,但是,奥地利政府却不能容忍巴尔干半岛各国处在俄国的领导之下。因此,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俄奥两国虽步调一致,但在东方问题上,两国的对立仍不能消除。在普鲁士,资产阶级对沙皇俄国坚决反对德意志的统一深表不满,在东方问题和君士坦丁堡问题上,普鲁士虽希望置身于纠纷之外,但在英俄之间的斗争中,它是不会成为俄国的可靠支柱的。由此可见,沙皇俄国与欧洲

^① 详见第八章。

各主要国家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了。

沙皇俄国在国际关系中,不仅面临着与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矛盾,而且还面临着世界上日益增长的革命力量。1848—1849年革命后,不仅无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也把沙皇俄国看成是政治进步道路上的障碍。当时一切进步力量都反对沙皇俄国的农奴制度及其对外政策。

1848—1849年,在俄国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但是封建农奴制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农奴制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的进程加速了,这对后来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在1848—1849年,尼古拉一世所制定的赤裸裸的反动政策不仅没能阻止革命,反而促进了革命民主主义者世界观的形成。他们不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深刻地揭露了沙皇政府的反动实质,在后来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十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革命中的活动及其理论总结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参加 1848 年革命是其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

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和指导了 1848—1849 年欧洲革命，在革命实践中第一次检验了他们共同创造的理论，并把这次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和概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革命开始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远见期待着 1848 年革命的到来。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马克思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副主席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这两个组织里积极开展活动，而且决定到巴黎去，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

3 月 3 日，在马克思去巴黎的前夕，布鲁塞尔委员会在马克思家中开会，会议决定，解散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并委托马克思在巴黎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

马克思 3 月 5 日到达巴黎以后，便立即开始了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这时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代表团也来到巴黎。这个代表团包括宪章派厄·琼斯、乔治·哈尼，还有“伦敦德国工人启蒙同盟”的代表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的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同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中央委员也从布鲁塞尔到达这里。

马克思改组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马克思被选为主席，沙佩尔任秘书，委员有恩格斯、威廉·沃尔夫、莫尔和鲍威尔。

这时，德国革命即将来临。改组后的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德国革命的性质和具体任务，拟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纲领和策略。

1848年2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公诸于世了。在《共产党宣言》的第四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革



图 55 卡尔·马克思

命进行了论述。他们指出：“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 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① 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为了按照《共产党宣言》所确立的策略纲领原则，及时而又具体地指导“同盟”的革命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又为“同盟”起草了一份具体行动的政治纲领，即《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基本上遵循《共产党宣言》的策略原则,拟定了17条基本要点,其主要点是:

一、具体规定了德国革命的任务和道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指出:“全德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①由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团结在一起,自下而上地武装全体人民,用革命的方式统一德国。

二、制定了一系列国有化政策,例如把交通、矿山、银行收归国有,由无产阶级支配。

三、提出了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宣布必须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由国家没收王公、地主的领地、归国家所有。

四、号召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为实现《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各项措施,而共同奋斗。“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些措施,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并且今后还有可能受少数人压迫的德国千百万人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政权。”^②

由此可见,《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比《共产党宣言》更具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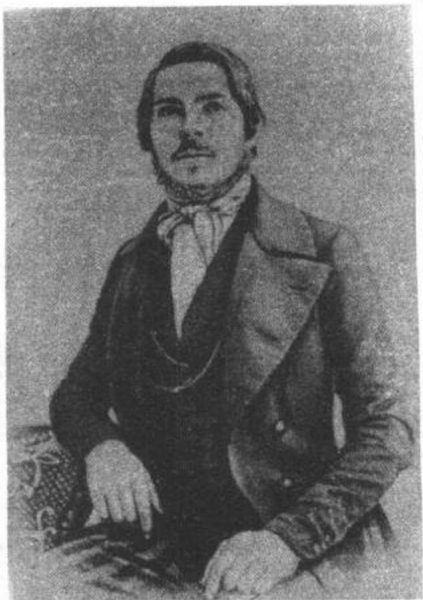


图 5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页。

提出了德国革命要由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的过渡的规定。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随时关心和指导着侨居在巴黎的德国工人的革命活动。当时，侨居在巴黎的德国工人中有一个冒险计划。恩格斯指出：“当时在巴黎人们热衷于组织革命义勇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和德国人。都组成队伍，准备去解放自己的祖国。”^①各国侨民相继组织革命义勇军。以新闻记者伯恩斯坦和诗人海尔维格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协会”，在巴黎组建了“德意志义勇军”。海尔维格号召德国侨民“拿起武器”，到莱茵河彼岸去取得共和国事业的胜利。巴枯宁也赞成这个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冒险计划。3月8日，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会议上，建立了由他领导的“德意志工人俱乐部”，同“德意志民主协会”相对抗。第二天，马克思带着这个俱乐部的章程出席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四个支部的联席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章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坚决反对“德意志义勇军”的冒险计划，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不能输出”，在祖国人民准备起来革命时，志愿军团如果采取武装进攻祖国的作法，只会使本国反动派以反对外来敌人为藉口来扑灭刚要燃起的革命火焰。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组织武装志愿军，打回老家去解放祖国的作法，是把革命当作儿戏的冒险主义。参加志愿军的人员成分相当复杂，他们在到达祖国边境时就有可能被出卖给自己的政府了。

马克思恩格斯及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德意志工人俱乐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8页。

部”的各种集会上向工人们说明“革命不能输出”的道理，并建议，德国工人和政治流亡者应当“一个一个地”回国。到4月初，大约输送了400名工人回国，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沙佩尔在拿骚，沃尔夫在布勒斯劳，波尔恩在柏林。后来事实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是正确的，因为赫尔维格军团在越过国境时就陷入了法国临时政府和普鲁士政府布置的圈套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与《新莱茵报》的创办

4月5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便于就近指导，使德国革命取得胜利，便从巴黎动身回国。4月1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抵达莱茵河畔的科伦，“同盟”中央委员也先后相继抵此。于是，科伦就成了“同盟”中央所在地，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指挥德国革命的活动中心。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选择科伦为活动中心，因为科伦是普鲁士第二大城市，莱茵省的中心，是德国最先进的地方。这里深受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推行过《拿破仑法典》，保留了某些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权利，特别是出版自由。1848年革命开始后，这里又是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

“同盟”中央回国后，根据马克思的倡议，作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就是派遣“同盟”特派员沙佩尔、威·沃尔夫、德朗克等人，分赴美因兹、黑森、拿骚、维斯巴登、科布伦茨、汉诺威、柏林等大城市，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以便推动柏林三月革命向前发展和进一步深化。4月中旬，恩格斯又亲赴巴门、爱北斐特和莱茵地区各城市，实地考察并指导“同盟”在各地的工作。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同盟”特派员的任务，主要是：宣传《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发展和壮大“同盟”的地方支部，并使各地支部尽快地同中央保持密切联系，以便组成以“同盟”为核心的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德国革命。

上述可知，从1848年2月至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同盟”制定的策略纲领的全貌，就是以“同盟”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德国革命，并根据《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所设计的蓝图，使德国革命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但是，革命形势并非按着人们预料的轨迹那样发展。柏林三月革命后，大资产阶级代表康普豪森—汉塞曼组成的“三月内阁”，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君主制的全部基础，相反它却成了普鲁士反动王朝的“挡箭牌”。在它的庇护下，一切旧的反动势力赢得了喘息和重整旗鼓的时间，准备伺机反扑；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发展的萎靡、畏缩和缓慢，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争得在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因而害怕无产阶级，不惜向封建势力妥协；“口头上勇敢，但行动上怯懦的奴颜婢膝的”小资产阶级，热衷于散布“革命已经结束”的幻想；农民，则是形成了“成百个地方性的革命”。形势表明，德国革命正处在一种极不稳定的局势之中，非但不能向前发展，而且有可能半途而废。“同盟”面临严峻形势的考验。

与此同时，“同盟”和恩格斯的工作，也是极不顺利的。4月25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叙述他在巴门的工作极不称心。恩格斯根据特派员的报告和自己的考察，对各地“同盟”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描绘：“过去在国外侨居的同盟盟员，有四分之三回国后就改变了自己的住址。他们从前的支部因此大部分都解散了，他们和同盟的联系完全断绝。他们中间有一部分较爱出风头的人，甚至不想恢复这种联系，而各人自行其是，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小小的分散运动。”^①为此，恩格斯得出的结论是：“两三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员消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9页。

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①，“同盟是个极其软弱的工具。”^②

不利的革命形势使马克思及同盟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在新的、现实的形势下，是继续坚持原先的既定方针，还是适应当前形势作出新的决策？于是，5月底，马克思在科伦召开了“同盟”的领导人会议，讨论“同盟”今后的命运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加快筹备出版大型的革命日报——《新莱茵报》，以便与各地盟员加强联系，向盟员宣传新的纲领和策略。

1848年6月1日，经过马克思及其战友的巨大努力，由马克思任主编、恩格斯参加编辑的《新莱茵报》提前出版了。该报是“同盟”中央的机关报，它“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③。其所以闻名，是因为在它存在期间（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体现了在科伦“同盟”领导人会议之后，马克思革命策略思想的变化，代表了“同盟”中央的新的策略纲领。

《新莱茵报》的策略纲领，与先前的策略纲领相比较，是有原则性区别的两种不同的策略纲领。《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强调了德国革命应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而《新莱茵报》则强调了德国革命应当高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

在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莱茵报》制定政治纲领的要点是：“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④这个纲领的核心就是尽量争取最大限度的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势力及其支柱沙皇俄国。只有

① ②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8页、第199页。

③ ④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0页。

实现了这些要求，才能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必要的条件。如果德国无产阶级脱离当时的客观实际，不站在彻底的民主主义立场，那就会丧失群众。所以，《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是无产阶级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唯一正确的纲领。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新莱茵报》编辑部不仅对于德国，而且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阶级搏斗、各个政党的动向、议会机关和群众组织的活动都应及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评论，规定了无产阶级应当采取的立场和策略，对他们的每一个成就都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

柏林 3 月 18 日起义以后，德国的大资产阶级便背叛了革命，立即同地主阶级、官僚和军阀妥协，缩小革命范围，保留封建特权。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叛卖行为和普鲁士政府欺骗农民的行为。马克思把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策同 1848 年德国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策进行了对比，他指出：“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

1848 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联，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

保存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 1848 年德国革命的结果。”^①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德国人民继续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制度，推翻地主、官僚和军阀的统治，把封建的分裂的德国建成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活动。他们指出，在保留旧的官僚机构、旧的军队和警察的条件下，

^① 马克思：《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331 页。

这两个议会只能是空想的机构。他们批评这两个议会的“议会痴呆症”。因为当反革命已在展开反攻的时候，议会还在辩论议事日程和宪法。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不懂得把批评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评。

《新莱茵报》对三月革命后德国政府所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对外政策也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新莱茵报》强烈要求改变德国的对外政策。它号召欧洲各国民主派起来保卫受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反对欧洲三个最反动的堡垒——沙皇俄国、英国和普鲁士。它号召欧洲各国人民发动一场对欧洲主要反动支柱——沙皇俄国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不但是保卫革命的战争，而且是使革命过渡到新阶段的条件。它指出，同俄国作战，会推动各国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国的扩张政策和沙皇鼓吹的泛斯拉夫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德国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势力的同时，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热情地歌颂和支持各国的革命运动。在巴黎六月起义的整个过程中，《新莱茵报》始终坚定地站在巴黎无产阶级一边，详细报道了六月起义战士们的英雄业绩，评述了六月起义的实质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的《新莱茵报》在组织群众和宣传群众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各个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团体的核心。1848年秋天，它已经能够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动员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反对政府的反动阴谋的斗争。1848年9月中旬，当普鲁士国王及其仆从企图发动反革命政变，解散资产阶级议会，策划成立亲王内阁的时候，《新莱茵报》立即刊登了马克思的文章，号召人们作好准备，一旦国王采取行动，就用1830年7月29日和1848年2月24日那样的起义来回答他，并且指出事变的进程“将取决于人民的行动，尤其是取决于民主党派的行动”^①。为了打击

^① 马克思：《危机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3页。

普鲁士政府的反革命气焰,《新莱茵报》编辑部便联合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在佛兰肯广场举行了一次 6000 人的大会,通过了恩格斯起草的致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呼吁书,要求国民议会的议员不要在武力威胁面前退缩,敢于起来反对政府妄图解散议会的罪恶意图。大会选出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夫等 30 人组成安全委员会来领导这次斗争。9 月 17 日,这些领导人又在沃林根召开了一次约有 8000 人参加的工农群众大会。这两次大会充分显示了《新莱茵报》的战斗力和影响力,使普鲁士政府大为吃惊。由于《新莱茵报》具有非常强的战斗力,是打击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有力工具,所以,每当《新莱茵报》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新莱茵报》的指导下,德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汇成了一股反对普鲁士反动势力的强大革命洪流。它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多层次、多样化群众斗争的艺术才能。这些事实也证明了马克思的革命策略思想转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恩格斯在解释这种必要性时指出,当时如果不愿意这样做,“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但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自己的纲领也不是为的这个。”^①

马克思恩格斯为团结工人阶级而斗争

三月革命后,在德国的许多城市,如柏林、汉堡、美因兹、科布伦茨、杜塞尔多夫、巴门、爱北斐特都成立了工人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努力把这些工人组织团结在《新莱茵报》的旗帜下。4 月 13 日,

^① 恩格斯:《马克思与〈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78—179 页。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建立了科伦工人同盟。同时，马克思把同盟的委员沙佩尔和《新莱茵报》的编辑派到其他地方组织同盟支部，建立工人同盟，从而通过《新莱茵报》有组织地教育德国工人，动员他们积极地投入当前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斗争。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革命策略却受到哥特沙克和斯蒂芬·波尔恩的阻挠。

哥特沙克是科伦支部委员，他的特点是极容易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最初他声明自己拥护“民主君主政体”，很快又号召为建立“工人共和国”而斗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下，他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他不同意当时的德国是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工人参加民主革命的策略，主张越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甚至提出“为建立工人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他向工人同盟提出的任务是，要为直接的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为不允许不劳而食的工人共和国而奋斗。他说，饥饿不允许工人等待，不允许把解放工人的任务搁置到将来。

在哥特沙克那里，超革命的空话与非常温和的行动奇异地结合了起来。他虽然主张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他认为工人同盟的目的是彻底和全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为此要利用一切依法应归其支配的资金。他屡次警告工人同盟盟员不要采取过火行动，主张工人可以利用合法的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即确立“自由、友爱和劳动”。哥特沙克主张，由于工人阶级是居民中的多数，它能够通过派到立法机关中的代表对制定法律起决定作用。

由于哥特沙克对德国革命的性质认识错误，并主张工人应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目的，所以，他就抛开了当时迫切的革命任务，而把工人同盟的注意力引向解决一些所谓改善工人状况的问题上。他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取消食品税，取消在拘留所和军队里进

行的生产,免得它们同手工业者竞争。请愿书还要求国家拨款给贫困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给富人和穷人开办同样的小学,改进地方医院和残废院的秩序,组织公断法庭。同时哥特沙克还主张直接选举,反对法兰克福议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间接选举产生。因此,哥特沙克及其拥护者反对工人参加法兰克福议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选举。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哥特沙克的观点和立场。在共产主义者同盟5月11日的会议上,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哥特沙克观点的危害性。他们指出,在哥特沙克看来,无产阶级似乎不需要参加阶级斗争,也不必参加政治斗争,似乎社会主义改造在任何国家制度下都可以实现^①。在会上,沙佩尔、莫尔等人也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哥特沙克的时候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参加政治斗争,而且还必须使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政治斗争。后来恩格斯在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1848年3月初,他在科伦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工人领袖。……他奉承那些刚刚觉醒的群众,纵容他们的种种偏见。”同时恩格斯还称“他是一个头脑十分空虚的人”^②,但是,他却以先知者自居。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哥特沙克的同时,努力把工人同盟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来。经过他们的艰巨工作,哥特沙克从工人同盟的领导中被驱逐出去,他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也失去了作用,同盟有了很大的转变。1848年6月,莫尔当选为同盟主席。同盟开始在工人、农民和军队中进行工作。10月,马克思担任了同盟的主席,工作有了更大的开展。

斯蒂芬·波尔恩是另一个阻挠马克思革命纲领与策略的实现

^①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564页。

^②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1889年10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92页。

的人。波尔恩是一个排字工人。1846年他在巴黎时，结识了恩格斯，后来又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柏林，波尔恩成立了工人中央委员会，后又创立了工人兄弟会。他主张进行微小的改良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力图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鼓吹工人应当争取在政府的支持下创办生产合作社，当一切工人都被吸收到生产合作社的时候，资本家就成为多余的了。他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一切问题都要等待法兰克福议会解决。这样一来，波尔恩就使工人脱离了现实的政治斗争，背离了德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即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任务。恩格斯在批判波尔恩的这些观点时指出：“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牢固的、可靠地实现这些东西的活动场所。”^①

波尔恩接近工人运动并不是为了领导工人进行革命斗争，而是为了追求政治活动家的地位。为达此目的，他不惜和各种各样的坏分子纠集在一起，彼此友好相处，并且他以不愿作“党的政策的奴隶”而自夸，力图发展自己渺小的、分立的运动。对此恩格斯尖锐地指出：“他太急于作为政治活动家出来活动。他竟和各式各样的坏家伙‘称兄道弟’起来，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主义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②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工人必须参加当前的政治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同时，还要求反对一切无原则的联合，反对同政治上可疑的分子相勾结。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6页。

② 同上书，第255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哥特沙克与波尔恩的同时,进一步阐明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和策略,努力团结先进的工人,并从思想上武装他们,以便为进一步发展革命而斗争。但是,德国工人由于自身软弱,在1848—1849年还不能成为领导力量,这个弱点也就不能不影响到德国革命的进程。

马克思到达维也纳

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后,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转入反攻,普鲁士大资产阶级组成的内阁倒台,成立了自由派贵族内阁,它也极力恢复三月革命以前的秩序。为了有力地打击他们的反扑,马克思认为必须把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对反革命势力进行反击。

8月23日维也纳发生了新的流血事件。工人们为反抗政府降低工人的工资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动政府对于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在革命可能被大资产阶级出卖的严重时刻,马克思为了加强民主运动的联系,指引斗争的方向,于8月25日动身去柏林和维也纳。

马克思在柏林逗留了两天,8月18日,马克思来到了维也纳,他在这里一直停留到9月6日。马克思在维也纳停留期间做了许多工作,对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发展给予很大的影响。

马克思到达维也纳以后,便与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和先进工人进行了个人接触,同耶利内克、斯蒂弗特及其他激进共和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和“维也纳民主协会”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马克思在到达维也纳的当天就参加了“维也纳民主协会”的会议。在会上讨论了8月21日—23日的工人反对降低工资的示威游行,讨论了“维也纳民主协会”对施瓦采尔及韦森贝格—多布尔霍夫内阁所有成员应采取的态度。在讨论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

必须尽快地推翻这个内阁,但在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推翻它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民主主义者列宾施泰因建议派代表团,向皇帝递交请愿书,请求皇帝免去施瓦采尔劳动部长的职务。法兰克福议会的左翼代表福禄培尔也倾向于这个建议。但这个建议遭到了马克思的坚决反对,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民主派关于向皇帝递交请愿书的建议,指出他们对8月21日—23日事件真正的阶级实质的不理解。马克思强调指出,维也纳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由谁来充当劳动部长的问題,而是阶级斗争问题,它也像巴黎一样,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他号召民主协会的成员同正在反扑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8月30日,马克思参加了维也纳“工人联合会”的会议。在会上马克思作了报告。维也纳“宪法报”对马克思的报告作了摘要报道:马克思博士论述了西欧的社会运动,论述了工人、法国的国家工场和巴黎六月起义。他还阐述了英国的宪章运动、比利时工人运动以及工人阶级取得最后解放的条件等。9月2日,马克思又作了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报告。

马克思在维也纳期间所作的演说与报告充分说明了他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对工人必然取得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马克思的演说与报告给予工人阶级及优秀的民主主义者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对于奥地利后来的工人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新莱茵报》被迫停刊

《新莱茵报》从创刊号直到最后一期,始终都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政治纲领。

针对柏林三月革命后人们对德国各级议会所抱的幻想,《新莱茵报》从第一号起就无情地揭露大资产阶级同国王进行的种种妥协活动,指出“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害怕工人和

民主的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①，他们在各邦政府已经举起屠刀的时刻，却把议会变成“清谈馆”，鼓吹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新莱茵报》用每天发生的事件引导读者看清反动派正在用禁止集会和游行、逮捕、武装袭击等手段来夺回他们在3月失去的阵地。

《新莱茵报》坚决反对大资产阶级企图以奥地利或普鲁士为中心来达到自上而下的统一。它也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把希望寄托在“民主的”普鲁士君主身上。《新莱茵报》指出，这纯粹是一种奇怪的再糊涂不过的思想，这只能使德国分裂的局面继续下去，要使德国摆脱它目前的贫困和创造财富，首先要使德国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统一国家，而实现国家的统一只能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心法国革命的进程。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失败后，《新莱茵报》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挾伐资产阶级反动派对巴黎工人的血腥屠杀，痛斥新老反革命分子对工人的无耻诽谤。他在《六月革命》一文中写道：“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暴力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俄、普、奥等国几次瓜分波兰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5月普鲁士反动派镇压了波兹南人民的起义，6月普鲁士正式把波兹南并入德意志联邦。《新莱茵报》无情地揭露了普鲁士的残暴和卑鄙，并指出，只要德国还继续压迫波兰，它就不能摆脱竭力支持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俄国的控制和威胁；只有拿起武

① 恩格斯：《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3页。

② 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61页。

器对付俄国，退回掠夺来的波兰领土，才能打破整个欧洲的均势，才能使打退的德国封建势力不致卷土重来，才能使德国得到真正的统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匈牙利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进行的英勇斗争也非常关注。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著文鼓舞他们采取多种方式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①。他们曾经估计，俄国决不会放过匈牙利人民的起义。1849年5月8日，沙皇尼古拉一世果然发表了武装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宣言。5月27日，14万俄军侵入匈牙利，进行残暴的镇压。

由于《新莱茵报》始终坚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支持一切民族的解放斗争，它赢得了广大人民和坚定的民主派的信任。3个月内它的印数达到5000份。同时它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自然引来了德国反动势力的敌视和迫害。7月6日科伦法院传讯马克思，控告他侮辱国家官吏和警政人员，并搜查了报纸编辑部。8月初科伦警察厅通知马克思，科伦市政当局不承认他是“普鲁士臣民”妄图再次把他驱逐出境。9月26日科伦实行戒严，《新莱茵报》同其他民主派报纸被勒令停刊。

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经过种种努力，使报纸于10月12日复刊。11月14日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1849年2月初普鲁士政府又接连两次控告马克思危害国家。马克思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始终为《新莱茵报》的文章进行辩护，无情地揭露反动政府的种种无耻的迫害，大声宣称：“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是摧毁现存制度的一切基础！”

^① 恩格斯：《皮蒙特军队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61页。

1849年5月,普鲁士反动政府相继镇压了德累斯赖、爱北斐特等地的人民起义后,立即把刺刀对准了《新莱茵报》。反动政府先对恩格斯发出了通缉令。当马克思刚从外地回到科伦时,驱逐令已经等着他了。紧接着德朗克和维尔特被驱逐,威廉·沃尔弗和斐·沃尔弗被通缉。《新莱茵报》不得不在5月19日出了它的最后一号就停刊了。这最后一号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发行了数千份。它庄严告别读者:“《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①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 欧洲革命的理论总结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积极投入1848年欧洲革命的洪流,站在群众革命斗争的前列,以正确的纲领策略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而且在革命之后,又以冷静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一系列光辉著作,其中主要有《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革命和反革命》和《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等。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着重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和工农联盟的思想。同时,他们还根据东欧一些国家的革命实践发展了民族问题的理论。

国家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革命群众掌握政权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1848年法国革命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特

^① 《致科伦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19页。

别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在总结过去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曾表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萌芽。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应当夺取政权并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但是，关于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怎样以无产阶级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的问题，还没有明确的具体的阐述。而在1848年革命以后，他们根据1848年革命斗争实践又对国家政权问题作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即必须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1848年欧洲革命，主要是法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就是，当无产阶级独立发动时，一切反动势力便联合起来，利用国家机器镇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起义。马克思非常重视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详尽地考察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的产生和它的作用，以及国家机器演变的历史过程，从而阐明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根本态度。

马克思指出，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是在封建制度解体时期产生的。法国的历次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没有动摇这个中央集权的军事官僚国家，而且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摧毁它。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不去破坏这个国家机器，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它只要把国家政权夺取过来，进一步加以完善和强化，就可以适应其镇压人民的需要了，所以，他们没有必要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对于资产阶级的国家，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决不能期望它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二月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对已争得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曾抱有很大的幻想，以至于称它为“社会共和国”，企图通过它来达到自身的解放。但是，事与愿违，无产阶级的地位不但没有得到稍许改善，连“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无聊甚至是

资产阶级性的要求”^①都被看作是“罪行”。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证明，无产阶级即使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改善，那怕是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也是不可能的。而当无产阶级要求解放的斗争威胁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时，资产阶级就毫不犹豫地动用国家机器，镇压革命人民，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要想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处境，就必须以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在《路易·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②

马克思主义关于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无产阶级不能只是简单地动用暴力，而是要在打破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时建立起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指出：在资产阶级庞大的官僚军事机器面前，无产阶级只能提出自己的革命战斗口号：“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③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科学概念。1850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和英国宪章派左翼、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共同签署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定第一条规定：“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④这就意味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式文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7页。

②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③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7页。

④ 马克思：《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05页。

件中,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得到了公认。

工农联盟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总结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前夕,恩格斯在《1847年的运动》一文中分析农民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关系时指出:“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①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表达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并把这种联盟看作是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重要力量。

1848年法国和德国革命都充分说明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1848年法国革命时期,由于当时无产阶级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还不够高,还没有条件组成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因而没有能够把农民争取过来。而且,资产阶级为了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陷于孤立,总是千方百计地拉拢和欺骗农民,挑拨工农关系,阻碍和破坏工农联盟的形成。其结果使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未能实现,农村中的农民运动同城市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相脱节,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所以,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教训时,强调指出,如果无产阶级能够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成为自己的同盟军,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②德国的革命经验也同样证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著作中指出,在农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同农民联合起来。稍后,马克思又在1856年4月

① 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11页。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9页。

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①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明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而且论证了工农联盟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也和工人阶级一样，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这种深受压迫与剥削的共同命运是工农能够结成同盟的可靠基础。所以，马克思在总结法国阶级斗争时指出：“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接着他又说：“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②由于工农结成联盟的基础是他们共同遭受压迫与剥削的厄运，所以，随着资产阶级对农民剥削的加强和农民的日益贫困化，广大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日趋尖锐化，这样一来，农民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便日益倾向无产阶级，并把力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视为自己天然的同盟者和领导者。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意大利、罗马尼亚、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的民族独立斗争的问题的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在1847年，恩格斯在论述波兰和德国革命的关系时指出：“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③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德国的革命力量动员起来，削弱和消灭普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10页。

鲁士国家,帮助波兰获得独立。因为波兰的独立能够打击和削弱德国反动统治的基础,打破德俄勾结和德国统治阶级对俄国的依靠,从而削弱俄国在欧洲的势力,为德国人民的解放创造条件。在1848年的革命高潮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论证了恢复波兰独立与夺取德国革命胜利的辩证关系,再次肯定了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获得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和保证。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笼统地支持一切民族运动,他们根据民族运动是否有利于国际革命运动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打击神圣同盟及其元凶沙皇俄国的原则,根据民族运动为谁服务,以及它在客观上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原则,把欧洲民族运动划分为两种类型: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正是在这些原则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伟大意义。

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后,对民族问题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他们特别评价了波兰问题在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和波兰的独立在欧洲革命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认为,为了击败沙皇俄国在欧洲的霸权,夺取欧洲革命的胜利,必须支持波兰独立。因为“波兰在欧洲革命的历史上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西方任何一次革命,凡是不能把波兰吸引到自己方面以及保证它获得独立和自由的,都注定要失败。就拿1848年革命来说。这次革命席卷的地区,比以前任何一次革命都广阔得多。它吸引了奥地利、匈牙利、普鲁士。但是它在俄国军队所占领的波兰的边界停住了。……欧洲所以处在沙皇的支配之下,就是因为放弃了波兰。”^①后来,恩格斯在论述波兰问题时,得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著名论断:“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

^① 恩格斯:《在1863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9—40页。

不能获得解放的。”^①这个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多年研究民族问题后得出的基本结论。列宁把这一著名原理称之为：“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②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斗争问题，特别是波兰问题的研究，阐明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与民族解放事业不可分割的联系，论述了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相互关系，证明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对国际反动势力和压迫民族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打击，是国际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和可靠保证，从而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推动了国际革命事业的发展。

①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6页。

②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3页。

第十一章 1848年欧洲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编纂学

19世纪是欧洲史学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在改变研究方法、发现和考证史料、积累和审定义献资料等方面都取得了很明显的成就,在解释和阐明历史事件、寻求历史发展规律方面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是,他们的阶级局限、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使他们看不到历史的真面目,也揭示不出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使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历史学才成为真正的科学。

波澜壮阔的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之际,正值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因此,在研究和阐明1848年欧洲革命史的问题上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史学,即无产阶级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他们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用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解释、阐明和评价1848年的革命事件、阶级、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从而得出各自的、不同的结论。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848年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在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身参加了革命斗争实践。

1848年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密切注视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还在革命初期,他们就撰文对革命进程中所发生的重大事

件、各阶级的活动进行了正确的评价,开始总结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的经验;在革命结束后,他们又不断地撰写许多光辉的著作,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和进程,阐明革命失败的原因,揭示革命的意义,并对各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作出了准确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论述1848年欧洲革命的著作和论文达90种之多。这些著作深刻地、全面地揭示了这次革命的原因、任务、性质、特点、进程、革命的失败、革命的成果以及革命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法国革命的研究

真正科学地阐明1848年法国革命史的首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第二版序言》;恩格斯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第三版序言》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以及他们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评论中,对1848年法国革命史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史作了科学地分析。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1848年法国革命的著作中,《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的这两部著作既是深刻的科学研究成果,又是抨击性的、战斗性的著作。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阐明了1848年法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指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论述了巴黎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和后果;马克思根据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指出了今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将主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公开搏斗,无产阶级应当牢牢地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团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强大的革

命队伍，孤立和战胜资产阶级，建立工人阶级专政。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对法国的整个一段历史时期作了唯物主义的论述。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著作中既揭示了这次革命爆发的政治原因，又阐明了它的经济原因。用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①。马克思在谈到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时指出，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事件，即1845和1846年马铃薯病虫害、农业歉收和英国工商业总危机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不平的怨言发展成了起义。在马克思看来，1848年革命的爆发是法国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不仅揭示了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而且也是对资产阶级所谓的“法国革命是一次无原因的举动”、“是神明的举动”、“是历史的偶然”等错误观点的有力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酒税的保留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法国“各个阶级分担的酒税是极不平衡的。对穷人来说，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负担，而对富人来说，它所添的麻烦却微乎其微”^②。因为喝高级香槟酒、克拉列特酒和勃艮第酒的富人几乎不纳什么税，而喝劣等酒的工人却要向政府交纳相当于这类酒价50%、100%、有时甚至500%—1000%的税金。这种状况也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征收酒税也是引起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

对于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评价，历来存在着分歧。一些进步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如路易·米纳尔、泰诺、苇莫雷尔、卡斯蒂等，以极大的同情颂扬了六月起义者的英雄业绩，尖锐地揭露和抨

^①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页。

^② 恩格斯：《法国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页。

击了资产阶级的阴谋和对起义者的恶意中伤和残酷镇压。但是教权君主派的皮尔·德·拉·戈尔和现代历史学家热奥利阿·贝尔托等,对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则进行了诬蔑、造谣和中伤。以乔治·列纳尔为首的社会改革派为了同教权君主派作斗争而创立了“1848年革命史协会”。这个协会在其存在期间为研究1848年革命作了许多工作,但是,它却忽视了对巴黎六月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即使协会中的一些史学家在著作中谈到这次起义,也多半歪曲了这次起义的阶级实质,贬低了它的意义。如夏尔阿利·施米特把这次起义描绘成一场自发的饥民暴动;布恩奥尔、罗贝尔·皮门特甚至把六月起义说成是波拿巴分子和王朝正统派阴谋策划的,并力图证明他们在起义中起了领导作用。

马克思以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论证了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始末,高度地评价了无产阶级的创造精神和斗争精神,深刻地揭示了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及其影响。马克思认为,六月起义,“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①。马克思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和深刻的哲理揭示六月起义的原因。他说:“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②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关于1848年法国革命的另一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不仅运用唯物主义的阶级观点,透彻地分析了法国革命和波拿巴政变的历史事件,而且还通过对政变的分析,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一步强调了工农联盟的重大意义。

对于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所发动的政变,各个阶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7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7页。

级的代表人物有着不同的解释。波拿巴主义的拥护者竭力美化这次政变，把波拿巴吹捧为历史的主宰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维克多·雨果把这次政变看作是与社会阶级斗争毫无联系的“晴天的霹雳”，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蒲鲁东则采取了客观主义的态度来阐明这一历史事件，事实上是在为路易·波拿巴辩护。而马克思则与他们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这次政变之所以发生是执政的资产阶级在共和国时期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经常进攻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侵犯革命成果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性的发展，害怕“红色怪影”而向波拿巴不断让步的合乎逻辑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①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依据法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说明了路易·波拿巴政变是1848年法国革命沿下降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揭示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原因以后，又对路易·波拿巴政权的阶级实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尽管波拿巴主义者标榜国家政权的独立，蛊惑性地向社会各阶层呼吁，但实质上这个政权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妥协的产物，它不过是用一种更加反动的统治形式，即采取诈骗、贿赂、露骨的煽动以及其他种种卑鄙齷齪的手段，代替原来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特别注意了法国农民对路易·波拿巴的态度。指出支持路易·波拿巴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所以，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马克思在分析了小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规律后，认为随着小农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15—146页。

经济的破产,加之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盘剥,贫苦的农民必然要摆脱“拿破仑观念”的腐蚀,与工人阶级采取一致行动,把城市的无产阶级看成是自己的天然同盟者。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的原理,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马克思以法国的历史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它的特征、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并且得出结论说: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还在君主专制时期就已形成的集中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而是使它更适合于镇压被剥削阶级。“一切变革都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①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和政权的集中,决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这种寄生性和剥削性的镇压群众的工具。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对付旧的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就是要“集中自己的全部破坏力量”来对付旧的国家机器并加以摧毁。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德国革命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所撰写的文章不仅是研究 1848—1849 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而且科学地阐明了这一历史时期。我们仅提出在形式上闪耀光芒、内容上深刻精辟的《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王朝之后》、《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等文章,就足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对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历史编纂学的重大意义了。

1849 年秋,恩格斯已经开始撰写总结 1848 年德国革命经验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216 页。

的文章《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了。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不仅是一本历史著作，而且是目击者所叙述的故事，是事件的积极参加者的生动证言。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运动发生的原因，各阶级各政党的立场，中肯地评价了参加运动的各个活动家，阐明了德国革命力量的配置，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叛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和软弱的致命特点。

在这里，恩格斯特别抨击了小资产阶级的行为。恩格斯强调指出，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纵然也像其他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①。恩格斯在批评小资产阶级的同时，赞扬了工人和农民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的大无畏精神。恩格斯指出，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在小资产阶级背后站着其他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大多数，他们曾经推动小资产阶级和现存的国家政权公开地决裂，并且他们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不怕流血牺牲。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总结了人民群众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最后阶段中的斗争经验，包含了关于革命党在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中的策略的许多重要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阐明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主要历史著作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这部著作是恩格斯于1851—1852年完成的。

恩格斯在这本著作的一开头就指出，他要利用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第二幕开幕之前的很短的休息来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中，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前提、性质、动力和失

^①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30页。

败的原因。恩格斯分析了德国革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研究了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指出了这些条件对运动的进程的影响,阐明了革命的各个重要阶段以及各个阶级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揭示了革命失败的原因。

在论述 1848 年 11 月普鲁士国家政变时,恩格斯揭露了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怯懦。恩格斯指出:“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他又说:“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① 恩格斯认为,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已经不能起领导作用,它已经站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出卖了它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必要同盟军农民的利益。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仅对德国以后的历史,而且对其他许多国家以后的历史都非常重要。

在这本著作中,恩格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学说的基础,从理论上丰富了武装起义问题,确立了一系列关于武装起义的原则。他表述了这样一个原理: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

此外,恩格斯特别重视失败了的革命的重大意义。他指出:“顽强奋战后的失败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② 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它对于进行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启迪。

恩格斯在 19 世纪 80 年代关于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德国工人运动的两篇文章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作为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德文版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82—83 页。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82 页。

第三版的引言而写的。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突出地论述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的最初阶段和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中在反革命猖狂时的革命活动。

恩格斯首先阐明了这个最先宣布以科学共产主义纲领作为自己思想旗帜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他指出，建立这个组织是争取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阶段，也是争取在德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阶段。恩格斯在阐明这一点的同时，揭露了拉萨尔分子散布的所谓德国独立的工人运动渊源于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奇谈怪论。

第二篇文章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一周年时写的。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非常鲜明地论述了马克思作为《新莱茵报》的编辑所执行的革命策略；清楚地说明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返回祖国以后，为什么不能够立即组织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为什么和其他共产主义者被迫与资产阶级民主党的极左翼接近。在阐明这些问题时，恩格斯着重说明了1848—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策略的特点。恩格斯的这篇文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论证了群众的革命斗争和正确的策略领导的历史意义。他以马克思在1848—1849年采取的策略为例，教育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为争取工人阶级在一般民主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而斗争，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丢掉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坚决揭露统治阶级用虚伪的诺言欺骗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卑劣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奥地利、意大利革命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对奥地利革命史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在《奥地利末日的开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等著作和刊登在《新莱茵报》上的《维也纳革命》、《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等论文中，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揭示了这次革命的原因，阐明了这次革

命的动力,对其主要活动家给予了明确的评论,论述了革命失败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指出了奥地利革命的历史特点。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这个多民族的国度里,仅占 1/7 的奥地利的德国人是统治民族,它压迫着其他许多民族。恩格斯指出:“德国人在奥地利的旗帜下奴役着波兰、波希米亚和意大利。从塞拉库斯到特里延特,从热那亚到威尼斯,德国人都被当做专制制度的卑鄙的雇佣兵而遭到仇视,这一点我们应当感谢奥地利君主国。”^①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都希望这个由继承和窃得小块土地拼成的七零八落的奥地利君主国,能够迅速瓦解。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维也纳十月起义。维也纳十月起义曾使首都控制在工人和民主派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维也纳十月起义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对于奥地利来说,它就像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对于法国那样重要。尽管这次起义失败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高度赞扬了维也纳人民群众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的革命斗争精神和英勇献身精神,并赋予这次失败的起义以重大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不管怎样,维也纳革命对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的影响,打乱了反革命进攻的全盘计划。”^②

马克思在《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一文中,深刻地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真实面目。马克思采取将法国资产阶级和德国资产阶级对比的手法,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在 1848 年革命中德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对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表现了深切的关怀和极大的同情。1848 年 5 月,马克思就以《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名义致函意大利民主派的报纸《黎明报》,提出建立合作关系,并肩战斗。

① 恩格斯:《奥地利末日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523 页。

② 马克思:《维也纳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494 页。

马克思明确表示,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争执的问题上,“我们要捍卫意大利争取独立的事业,要和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在德国和波兰的专制统治作誓死的斗争”^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特点是把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任务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密切地结合起来。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中,阐明了意大利经济发展的状况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恩格斯指出,在意大利,当1848年革命兴起时,纯粹的工场手工业还占统治地位,大工业还处于一裸之中。这时,工人阶级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剥夺和无产阶级化;它在城市中还占有它自己的生产资料,在农村里,工业劳动是占有土地的小农或者佃农的副业。“因此,资产阶级的毅力还没有受到它和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破坏。而因为意大利的分割状态仅仅是由于外来的奥地利地统治才存在下来,在这种统治的保护下,君主们把暴政推行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占有土地的大贵族和城市人民群众也都站在资产阶级这一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战士的一边。”^② 所以,恩格斯认为,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必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只是在1848年它才达到了全民族的规模。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1848年意大利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揭露了撒丁国王查理—阿尔伯特的叛卖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和不彻底性。恩格斯在《查理—阿尔伯特的叛卖》一文中指出:“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事业正是被那个和那些直到最后一刻还一再赌咒发誓不是为意大利争得胜利就是为它而死的家伙们出卖了。”^③ “在意大利的一切君主中,意大利的自由的、最可恶的敌人还是查理—

① 马克思:《给〈黎明报〉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8页。

②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72—473页。

③ 恩格斯:《查理—阿尔伯特的叛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第18页。

阿尔伯特。”^① 恩格斯告诫意大利革命者：“为了使意大利不致因君主制而灭亡，首先就必须使意大利的君主制灭亡。”^②

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东南欧民族解放运动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和关心 1848 年东南欧各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国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无论在革命前夕、革命当中，或者革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都撰写了许多著作和论文，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 1848 年欧洲革命中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特点，在《论波兰》、《布拉格起义》、《德国的对外政策》、《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匈牙利的斗争》、《皮蒙特军队的失败》、《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 年）》等著作中，阐明了欧洲总形势的发展与民族运动的关系、民族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与压迫民族自身解放的关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

在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曾把欧洲民族独立与解放寄托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且由于德国革命在 1848 年革命中起着特殊作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德国作为特定的研究民族问题的对象。德国作为一个压迫民族，它参与了“神圣同盟”瓜分波兰和镇压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作为被压迫民族，它受俄国的控制，成为俄国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所以，德国革命的胜利必将推进欧洲革命的进程，推动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同时，他们还认为，当时欧洲的民族独立与统一受到俄、奥、普的严重障碍，它像绳索一样紧紧地束缚着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首

^① 恩格斯：《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目前失败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434—435 页。

^② 恩格斯：《皮蒙特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464 页。

先是波兰、捷克、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恩格斯认为，只有德国摆脱俄国的控制、意大利砸碎奥地利的锁链，波兰从俄、奥、普的羁绊下挣脱出来，各民族的独立与统一才能实现，而其关键则是德国的统一和独立。因为沙皇俄国是德国封建王室的支柱，沙皇俄国为了维护欧洲的均势和俄国在欧洲的既得利益，历来反对德国统一和独立。因此，对俄国进行一场全欧战争，击溃俄国的实力，将有助于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特别是德国的独立和统一。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明确指出：“如果能使德国对俄国作战，那么，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就会灭亡，而革命就会在全线获得胜利。”^①恩格斯曾把欧洲的民族独立与解放寄希望于德国，但德国革命只出现了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可悲结局。

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失败，使欧洲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各国革命也都先后遭到了反革命势力的镇压。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这些历史事实和革命发展的进程，考虑到日益壮大的、经受了革命考验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改变了他们以往关于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取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看法，第一次提出了民族解放斗争必须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论断。只有依靠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结合，才能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才能取得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的胜利。“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最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②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根据 1848 年革命当中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明确地提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压迫民族自身

^①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09 页。

解放的首要条件的论断。

无论多民族的奥地利,或者四分五裂的德国,其封建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不断地利用民族矛盾,挑起民族纠纷,唆使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藉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延缓国内革命的爆发。奥地利政府就曾巧妙地利用了匈牙利革命政府对待境内其他民族的错误政策,唆使塞尔维亚人反对马扎尔人,结果使匈牙利革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同时坚持民族压迫和奴役政策的奥地利和德国,从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那一天起,又受制于“神圣同盟”的首领沙皇俄国,为本民族套上了枷锁。根据这种情况,恩格斯强调指出:“革命的德国本应该放弃自己过去的一切,特别是对于邻国人民。它本来应该在自己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让一向受到压迫的人民获得自由。”^①他又说:“毗邻民族的自由是他们本身自由的保障。”^②否则,自己获得的自由也会丧失。恩格斯特别强调说:“不把波兰人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③因为,只要德国人还帮助俄国压迫波兰人,占领着波兰的一部分时,德国就仍然要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所以,恩格斯要求德国的革命力量动员起来,帮助波兰获得独立,“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④。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了他们关于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相互关系的思想,得出了“任何民族当他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⑤的非常正确的结论。

再次,恩格斯不仅论证了压迫民族自身解放的条件,而且还指

① 恩格斯:《布拉格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95页。

② 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10页。

④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9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91页。

出了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条件。他根据1848年革命中民族运动普遍被镇压的经验教训,指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由之路。恩格斯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失败有多种因素,但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实现各民族的团结,即没有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当资产阶级已经丧失领导民族运动的能力,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它的阶级意识,并经受了革命锻炼时,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就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和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而“要实现‘欧洲各族人民的兄弟同盟’,不能依靠空洞的言词和美好的愿望,而必须通过革命和流血斗争”^①。即必须通过暴力行为。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明确指出了各民族的同盟应在武装斗争中相互支援。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为民族解放斗争制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和规定了民族解放战争打击的重点。他认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农民发动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民族独立运动的成败。因此,恩格斯明确指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尽可能地把农民动员起来,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中来。

但是,恩格斯从来不笼统地支持一切民族运动,他根据民族运动是否有利于国际革命运动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打击“神圣同盟”和沙皇俄国,根据民族运动为谁服务,以及它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把欧洲的民族运动分为两种类型: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正是在这些原则基础上,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伟大意义。

恩格斯根据革命原则把民族运动划分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可是恩格斯在论述匈牙利革命的一些著作中,把民族划分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这种观点是不妥的。恩格斯

^①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3页。

认为,在奥地利各个大小民族中,只有三个民族是进步的代表者,它们积极地影响历史,并且还保持着生命力。“这就是德国人、波兰人、马扎尔人。因此,他们现在是革命的。其他大小民族,在最近的将来都要在世界革命的风暴中灭亡,因此它们是反革命的。”^① 恩格斯的这些论断并没有被历史事实所证实。

第二节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研究 1848 年 欧洲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1848 年法国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1848 年法国革命的参加者:资产阶级共和派拉马丁、巴热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等都撰写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史》。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都力图说明法国革命的合理性,论证自己的政治活动是正义的,是无罪的,藉以反对反动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维护其所进行的革命活动。但是,他们在这些著作中,没有明确地阐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和由此而引起的六月起义的斗争实质,并且他们还力图摆脱自己对革命失败所担负的责任。

在革命的同时代人中论述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著作有基佐的《小拿破仑》(布鲁塞尔,1852 年)、《一个罪行的历史》(两卷本)(巴黎,1877 年),维克多·肖利瑟尔的小册子《十二月二日的罪行》(伦敦,1852 年)等著作,都对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政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明了路易·波拿巴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但是,他们没能揭示出 1851 年波拿巴反革命政变成

^①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197 页。

功的真正原因,过分夸大了波拿巴个人的作用。在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蒲鲁东的《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所表露的社会革命》(巴黎,1852年)。在这本著作中,蒲鲁东采取了客观主义的态度来阐明这一历史事件,采取了为路易·波拿巴辩护的立场,并企图把他描绘成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劳动人民利益的“保护者”。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这一著作时指出:“他那本关于‘政变’的著作应当认为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他在这里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①

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中,马克思评价较高的是革命政论家和诗人路易·梅纳尔的著作《革命的序曲》(巴黎,1849年)。梅纳尔在他的这本著作中用丰富的历史事实,以特写的手法阐明了1848年6月起义的原因、进程和结局,以极大的同情颂扬了起义参加者的功绩,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和抨击了资产阶级的阴谋和恶意中伤。

19世纪60年代末,在研究历史经验的热潮中,出版了一批有关1848年革命的著作。例如:资产阶级评论家泰诺的《1851年12月的巴黎》(巴黎,1868年)、《1851年12月的外省》(巴黎,1869年),泰诺的这两本书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在短期内就出了10版。社会主义政党的奥古斯特·韦莫雷尔(后来是巴黎公社社员)出版了《1848年的活动家》、《1851年的活动家》,其中第一本揭露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反革命政策和卡芬雅克对六月武装起义者的血腥镇压;第二本抨击了路易·波拿巴分子,韦莫雷尔的著作在民主阵营中享有极大的声誉。伊波利特·卡斯蒂的《1848年的6月屠杀》,揭露了梯也尔、法卢、马利等人的反人民的活动。

^① 《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5页。

到了巴黎公社时期,研究1848年革命史,特别是六月起义史的兴趣加强了。当时的革命政论家都把六月起义描述为1871年3月18日革命的先声。1880年出版的维克多·马鲁克的小册子《1848年的6月》就是一个例证。这本小册子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它可以说是对卡芬雅克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有力的控诉书,是一份珍贵的、文献性的资料。

19世纪末,在研究1848年革命史的史学中出现了三个派别:教权君主派、资产阶级共和派和社会改革派。

教权君主派的代表人物是皮尔·德·拉·戈尔院士。188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两卷本《第二共和国史》。这部著作是教权君主派伪造历史事实的典型例证。它重复着反革命书刊对于1848年6月起义的一切诬蔑、造谣和中伤。

资产阶级共和派于1893年出版了斯普勒尔的著作《第二共和国议会史》。这是一部极力捍卫共和制的著作。

社会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饶勒斯·乔治·勒纳尔。为了同教权派作斗争,社会改革派于1904年联合左翼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创立了“1848年革命史协会”。协会成立之后,首先出版了自己的杂志《1848年革命》,后改称《1848年革命和19世纪革命》,此后又易名为《1848年,当代革命评论》。1930年饶勒斯·乔治·勒纳尔逝世以后,资产阶级激进派茹斯蒂安·戈达尔任“协会”主席。

“1848年革命史协会”在研究1848年革命史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它先后出版了许多关于第二共和国史的著作和论文,公布了一批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在出版的关于1848年革命的专著中有勒纳尔的《1848年的共和国》(巴黎,1905年)、吉尔诺夫的《第二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团体和秘密协会》(巴黎,1906年)、阿尔贝特·克勒米埃的《二月革命》(巴黎,1912年)、西奥赞奈·瓦塞尔曼的《1848年巴尔贝斯和布朗基俱乐部》(巴黎,1913年)等。在这些著作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勒纳尔的专著《1848年的共和国》。他在这

本著作中阐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他力图证明，第三共和国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第二共和国所提出的社会政治改革。列纳尔的这个诊断说明他是从改良的角度来理解 1848 年革命的内容和性质，他力图把工人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发动的目的视为丝毫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统治基础的“改革”。而其他人的著作也像列纳尔一样不能正确地评价工人阶级的作用，同时把临时政府的政策理想化了。

“1848 年革命史协会”推动了法国历史学家对 1848 年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为后人研究 1848 年革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是，有些历史学家，如查理·施米特，在他的小册子《1848 年的 6 月》（巴黎，1926 年）和《1848 年 6 月于垒中的国家工场》（巴黎，1948 年）等著作中，对六月起义进行了歪曲。有些历史学家，如布诺尔、罗贝尔·皮芒特等，甚至把六月起义说成是波拿巴分子和王朝正统派阴谋策划的，并力图证明他们在起义中起了领导作用。不仅如此，他们还一致赞扬卡芬雅克的“丰功伟绩”，把他当作将法国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的救星。

在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中，对于 1848 年革命的研究和探讨，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首先，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随着大资产阶级反动的加强，他们对 1848 年革命的研究的反动观点就更加加强了。在这一方面，茹尔·贝托的著作《1848 年和第二共和国》（巴黎，1937 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这本著作充满了对民主运动、对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活动家的诽谤、抵毁和仇恨，特别是对布朗基的攻击。天主教历史学家的反动就更加明显了，如蒙塔朗贝尔、奥让昂和维奥，他们几乎毫不隐晦自己探讨 1848 年革命史和“1848 年的精神”的目的，是为了同马克思主义及其影响作斗争，是企图推翻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革命的历史经验所作的结论和对革命的评价，是为了加强 1848 年革命的“宗教民主”派的历史编纂学。

同时，他们还竭力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和路易·勃朗推出作为他们的盾牌。在他们的笔下，“无政府主义的鼻祖蒲鲁东”变成了“法兰西民族的社会主义之父”，变成了“结构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了。他们把路易·勃朗说成是“社会主义者”。

“宗教—民主派”的某些历史学家和共和派的一些历史学家在复活路易·勃朗思想的基础上联合了起来，他们寻找一切办法消除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日益增长的影响。教权主义的政论家兰日的著作《法国社会主义的起源》（巴黎，1947年）的卷头语，号召在全世界普及路易·勃朗的思想。兰日公开宣称：“如果我们不为法国工人阶级选择另一种社会主义，又怎样能使他们摆脱马克思主义呢？”

其次，一部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虽不属于反动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营垒，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着以往历史编纂学中的错误观点，他们对1848年革命爆发的原因，革命失败的原因，当时法国的阶级矛盾和社会活动家的看法和评价都是错误的。如乔治·勒费弗尔教授在其所编著的教科书（1937年石印版）中把1848年革命的爆发归之为历史的偶然。他认为，如果不是路易·菲利浦和基佐目光短浅和固执己见，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居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明智”而坚定的政策是能够阻止革命爆发的。拉布鲁斯在1948年发表的论文《两次革命》中论证，“1848年的法国仍然是一个较古老的农业国”，“法国的大金融资产阶级和大工业资产阶级只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形成。”勒费弗尔则认为这时“法国是一个手工业国家”，在大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同时，他们都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之为共和派不善于领导革命和群众，否认资产阶级的镇压和反动政策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竭力为资产阶级共和派镇压工人阶级开脱罪责。

第三，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则是站在折衷主义立场上来评价1848年革命。例如，接近社会党左翼的乔治·布尔让教授

载入《人民之春》论文集(巴黎,1948年)的文章和他的小册子《1848年共和国的生与死》(巴黎,1948年)就是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代表作品。他只是从表面现象论述1848年革命的原因和革命的任务,所以他在揭示这一革命事件的发展规律时就显得十分软弱无力。

第四,真正优秀的历史学家都团结在进步杂志《思想》的周围。《思想》是由杰出的学者和热情的爱国者兰热文教授创办的。《思想》杂志刊登的论文都是比较有分量和重要的论文。大部分论文都带有鲜明的战斗性。论文的作者以犀利的笔锋抨击了反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1848年革命历史的伪造,揭示了他们伪造史实的目的。在《思想》上发表的论文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费利克斯·阿尔曼的论文。他在自己的论文中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力图在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和资产阶级反革命阵营之间找出一条“中间路线”的错误作法。奥·科尔尼的《马克思与1848年法国革命》、罗歇·加罗迪的《论德萨米与1848年前的共产唯物主义者》和阿尔伯特·索布尔在对档案资料进行认真地、扎实地研究基础上而写出的著作《1848年的农民问题》以及埃米尔·杰尔谢恩的《1848年6月》都是非常重要的优秀的著作。他们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来阐明1848年法国革命。

应当看到,在纪念1848年革命一百周年出版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有一些著作是非常有益的。例如,图坦的学术专著《论1848年卢昂》(巴黎,1849年)、资料汇编《马恩省与1848年革命》(巴黎,1948年)以及收集在《当代和现代研究》论文集中的关于卢昂和埃尔伯夫1848年4月事件、关于国民自卫军的动员、关于各省对巴黎六月起义的态度等论文都是比较重要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比较正确地论述了1848年革命,而且引用了许多有益的和宝贵的新资料。这些著作是纪念1848年革命一百周年著作中的优秀作品。它们为后人研究1848年革命提供了有益的、比较可靠

的历史依据。

在纪念 1848 年革命一百周年所出版的真正优秀的、有价值的著作，是法国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的著作，如罗歇·加罗迪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法国的起源》（巴黎，1948 年）、安格兰的《傅立叶派与 1848—1851 年革命》和《卡贝与 1848 年共和国》（巴黎，1948 年）以及布吕阿的《1848 年的 2 月日子》（巴黎，1948 年）等。这些著作不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准确地阐明 1848 年革命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且运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宝贵的档案资料。这些著作作为后人深入研究 1848 年革命，正确地总结这一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准确地、公正地评价当时各种类型的、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活动家，是大有裨益的。

1848 年德国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19 世纪 60 年代，进步的资产阶级团体只是在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内对 1848 年革命事件和革命活动家产生了兴趣。但是，在德国“自上而下”的统一和在王朝战争后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就完全忘记了 1848 年革命，不再提及它的革命口号和革命传统了。到了 70 年代，在 1873 年纪念柏林三月革命 25 周年时，才有一部分对当时政治不满的小资产阶级团体举行了集会，而且是用非常胆怯的声音呼喊“在德国没有自由”。资产阶级左翼历史学家约翰·舍尔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出版了他的著名著作《1848 年——世界历史的悲剧》（莱比锡 1868—1870 年）。在 1848 年革命时期，舍尔积极地参加了柏林三月革命，后来流亡到瑞士，入了瑞士籍。根据其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但同时他也不赞成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所以，表现在他著作中的是用大量篇幅赞扬和歌颂恩格斯所猛烈抨击的小资产阶级。

在 90 年代中期，虽然出版了一批关于 1848 年革命事件和革命活动家的新的资料、文献和书信，但是“普鲁士派”的反动的历史

学家仍然控制着 1848 年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德国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这时,德国的阶级矛盾日益深化,社会民主党的人数增加了,组织巩固了,并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这种形势下,研究 1848 年德国革命的兴趣明显地加强了。在德国不仅出版了一批关于 1848 年德国革命史的新著作,而且在社会民主党的主持下,召开了纪念 1848 年革命的群众大会,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向 1848 年革命的于垒战士敬献缠绕着三色缎带和红色缎带的花圈。同时在议会里展开了关于三月革命的辩论,民族自由党因反对这种辩论而拒绝参加。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学中存在不同的倾向。

一部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颂扬 1848 年法兰克福议会的“丰功伟绩”。这是德国历史编纂学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汉斯·布鲁姆的著作和马尔赫的论文就是这一倾向的典型代表。

左翼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竭力恢复被人们忘却的 1848 年革命的口号,要求恢复 1849 年宪法所宣布的“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

另一部分历史学家论述了 1848 年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论述工人运动的著作内容比较狭窄,它们只是阐明了工人运动的历史,而且只是柏林和其他两三个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与论述工人运动的著作相比,论述农民运动的著作较少。有吕伊斯的《西里西亚农民运动》(布鲁塞尔,1910 年)、劳芬施拉格尔的《巴登农民暴动》(海德堡,1915 年)、约尔丹的《论保守派》(慕尼黑—莱比锡,1914 年)和一些关于革命初期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运动的报道。

在这一时期中,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著作。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机会主义,而且机会主义严重地腐蚀着党,所以,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就不可能不反映在社会民主党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例如赫尔曼·施吕蒂尔的《1848 年革命的社会历史》虽然能够正确地分析和论述工人运动发展的水平和状况,但是忽视了工人运动中

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传播。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许多演说和小册子中也声称，社会民主党不追求任何形式的统治。在1848年革命50周年纪念会上，他虽然歌颂了三月革命的战士，但是他却错误地说，他深信在新的政治条件下，社会民主党的“不可抗拒的武器”大概并不是在干垒战斗中，而是在选票中。李卜克内西在研究1848年革命以后所得出的这种极端错误的结论，毫无疑问，是机会主义影响的产物。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威廉·布洛斯的《1848年德国革命史》(1891年)中也可以看到。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柏林，1897年)。该书分三卷出版，其中第二卷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梅林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注意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战略战术的研究，详细地阐明了《新莱茵报》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的立场。论述了德国无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在50年代直到普鲁士宪法纠纷时期的发展。梅林在这里正确地批判了议会主义的局限性，强调斗争的胜负取决于群众，而不是取决于资产阶级议员的某种认识和见解。在阐明1848年革命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他严肃地批驳了贵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偏见，无情地揭露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叛变。但是，由于梅林也受到机会主义的影响，所以，他的有些观点也是十分错误的。例如，在论述三月革命的方式和评价波尔恩问题上的观点都是不妥的。

191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和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促使德国各社会集团加强了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这时，不仅出现了关于1848年革命的普及性小册子，而且出版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著作，公布了新的历史资料。在魏玛制宪议会时期，提出了“回到1848年去”的口号。法伊特·瓦连廷教授的著作《1848—1849年德国革命史》(两卷本)(1930—1931年)就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受到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极大欢迎。但是，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阅读这本著作，就会发现它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首先这部

著作没有完全揭示出 1848 年德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也没有阐明这次革命的多方面的和极其复杂的过程。他所注意的中心议题是某种超阶级的“民族思想”。他认为,德国革命的代表是有文化的和受过教育的市民,而这个阶层利益的代表者是勃留姆、福格特和拉沃。所以,瓦连廷把他们当作三月革命的主要“英雄”来描写。同时他还着力描述了法兰克福议会的活动,尊称它是“全德意志思想的神圣宫殿”,称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是“三月革命精神”的体现,是革命的最大成就。瓦连廷忽视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低估了工人、农民和贫苦手工业者的独立的政治发动,贬低了他们的革命领袖。

在德国,纪念 1848 年革命 100 周年,完全是在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时,希特勒已经垮台,容克地主的统治已经结束,农民的土地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在西德仍然保留着地主的土地占有权,资产阶级和贵族仍然占据着自己的阵地,所以,1848 年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祖国统一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重新被提了出来。正确的阐明和理解 1848 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就成为当时德国政治的必须。为祖国统一而召开的第二次全德人民代表大会预定在纪念 1848 年革命 100 周年之际召开,其目的就是着重研究这次革命的历史经验。

在纪念 1848 年革命 100 周年的前一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机关刊物《统一》发表了林达乌的论文《1848 年的 3 月》。这篇论文指出:资产阶级由于惧怕工人阶级而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观念,并同专制制度和贵族结成同盟,它对于革命的悲惨结局是应该负责的。

在纪念 1848 年革命 100 周年时,德国进步的历史学家所注意的中心问题是这次革命的历史教训和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例如,梅泽尔教授的《1848 年德国革命》(柏林,1948 年)不仅分析和阐明了三月革命失败的原因,而且尖锐地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明确指出它歪曲了三月革命失败的原因。此外,在纪念

1848年革命100周年时还出版了著名经济学家尤尔根·库钦斯基教授的著作《1848—1849年革命的经济和社会前提》(柏林,1948年)、比特尔的重要论文《巴登1848年革命中的政治革命》(刊载在1948年《统一》杂志元月号上)。这些著作都比较正确地论述了1848年德国革命的一个侧面,但是,无论梅泽尔,或者比特尔都同样忽视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司特卢威和格克尔所犯的重大政治错误,即他们轻视了镇压人民运动的反革命力量。

1848年奥地利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最早论述1848年奥地利革命史的是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人物杜德尔、迈涅尔和赫尔费特。他们是1848年奥地利革命的同时代人,都曾积极地反对过革命。在他们看来,革命就是“破坏”,是“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赫尔费特在他的著作中对革命者进行了诬蔑性的攻击。

在19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关于1848年奥地利革命的著作,如立宪制度的拥护者雷绍埃尔和斯梅斯的著作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利益。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非常详尽地论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抹杀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赞扬奥地利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叛变政策,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并且把革命任务视为确立和巩固立宪制度。而在19世纪末出版的著作,例如岑克尔的著作,则明显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和大学生的“理想”,捍卫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密不可分的,在他们之间也并不存在有阶级矛盾。

在纪念1848年奥地利革命100周年时,正是奥地利反动势力增长和帝国主义对奥地利加强其影响的时期,因此,在这个时期虽然出版了一些关于1848年奥地利革命史的著作,但是,具有科学性的著作是不多的。同时,纪念活动是在资产阶级“人民党”、社会

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

“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力图利用 1848 年奥地利革命的光荣传统为自己谋私利。“人民党”十分明显而又愚蠢地伪造了 1848 年奥地利革命史，他们认为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温和自由资产阶级，完全否认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社会民主党虽然也伪造了 1848 年的革命事件，但是，却没有完全否定这一革命的民主性质。

当代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人物，如夏尔马茨，他曾经对 1747—1947 年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评述。他的这些评述同以往历史学家的观点是毫无二致的。他也是抹杀了劳动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否定了他们在 1848—1849 年发动的意义。

奥地利共产党人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并猛烈地抨击了他们的错误立场。

1946 年，奥地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恩斯特·费舍尔出版了一本阐述 1848 年奥地利革命史的著作《1848 年的奥地利。奥地利的民主革命问题》。这本著作的特点就是它引导读者去注意那些在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著作中始终未能正确评述的问题。作者在这部著作中详尽地分析了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地表述了阶级斗争的进程和在革命进程中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同时，费舍尔特别注意到民主运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建立统一战线的企图。他指出，梅特涅制度的被推翻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积极发动，但是资产阶级却用枪杀来感谢自己的同盟者。同时，费舍尔还用专章阐明了奥地利的民族问题。他批评了匈牙利革命政府压迫斯拉夫民族的政策，并且正确地指出，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应该加强团结。他在论述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的不同革命道路时，赞成奥地利独立发展的思想。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奥地利共产党员耶瓦·普里斯特尔的著

作《奥地利简史》(1949)。在这部著作中,普里斯特尔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研究自哈布斯堡王朝形成至1918年奥地利帝国崩溃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进行广泛的总结。普里斯特尔的目的是普及奥地利独立自由发展的思想,证明奥地利有自己的民族历史、自己的文化。

普里斯特尔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述了1848年革命前夕奥地利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激进组织的活动和民主派报刊的宣传舆论工作;提出了革命前夕和革命运动进程中奥地利民族运动的性质和意义;特别指出了奥地利小资产阶级和大学生的大德意志情绪。普里斯特尔能够比较正确地阐述1848年奥地利革命。

除上述著作外,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舍利马·施泰因梅茨的论文《汉斯·库德利希,1848年争取自由的战士》。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正确评价了库德利希的功与过。

总之,奥地利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1848年革命史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如对革命的动力、民族矛盾的作用及民族的命运等问题都进行了有价值的论述。但是,严格说来,对1848年奥地利革命史的研究直至目前还是很不够的。奥地利共产党人的著作大多属于普及性质,吸收的新资料和新成果较少。同时,对于奥地利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经济状况、1847年末奥地利的革命形势、民主俱乐部的活动、民主派报刊的作用、小资产阶级的评价等重要问题还缺乏系统地、深入地研究。

1848年意大利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1848年革命在意大利各公国失败以后,革命的同时代人和革命的参加者,为了论证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的正确,已经开始撰写这一时期的历史,并陆续出版了历史著作和回忆录,公布了一部分官方文献。

当时的三个基本政治流派:封建君主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资

产阶级民主派都把自己的特征烙印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著作上。

在封建君主派，如布雷西尼、马尔霍蒂等人的著作和回忆录中，他们阐明这一历史时期的事件和人物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捍卫君主专制政权，特别是捍卫庇护九世的世俗政权；破坏革命时期一切进步运动的声誉，诽谤和攻击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活动家和贬低人民群众的作用。他们把一切革命运动都视为“可怕的罪行”甚至把那不勒斯资产阶级自由派、西西里独立主义者和罗马共和派的最温和的改革要求都视为蓄意破坏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在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中，资产阶级自由派深受 40 年代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切扎尔·巴尔博、德·阿泽利奥、焦贝蒂等人的著作的影响，在当时他们均属于温和的资产阶级君主派。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学家古尔蒂罗的著作《意大利最近的变革》（佛罗伦萨，1850—1851 年）、康图的《一百年的历史，1750—1850 年》（佛罗伦萨，1862 年）都表明他们捍卫意大利的独立。古尔蒂罗在其著作中阐明了意大利必须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意大利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民族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等政治观点。康图在其著作中也论证，民族统一的要求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但是，古尔蒂罗却认为，改革必须由“聪明的思想家和国家政权机关”来进行。

在自由派的一些回忆录和历史著作中，特别着力描述了 1848 年革命前庇护九世的改革，把庇护九世美化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把萨伏依王朝描绘成意大利统一事业中的决定性力量。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论点贻误至今。同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学家不去分析意大利各种不同的运动，没有研究意大利各公国的特点。他们不顾历史的真实，把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卸到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

在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中，资产阶级民主派论述 1848 年意

大利革命的著作是很多的。马志尼、卡塔内奥、萨非、罗斯科尼、加里波的、奥尔西尼、蒙塔内利、费拉里等人的著作和回忆录都是非常重要的著作。这些著作和回忆录不仅含有丰富的和珍贵的资料，而且对研究 1848 年意大利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都明确地阐述了革命爆发的原因，革命的性质和革命失败的原因，揭露了君主派和自由派的谎言欺骗。

在谈到 1848 年意大利革命爆发的原因时，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革命的爆发是意大利民族渴望摆脱异族压迫和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必然结果。革命的爆发标志着千百万意大利人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对摆脱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奴役的渴望。在阐明革命的性质时，马志尼在其论文《意大利的政党和事业》中写道：“革命首先是民族革命……意大利各部族现在正在寻求共同生存、民族团结的模式。”蒙塔内利在其《回忆录》（1857 年）中指出：“1848—1849 年运动是民族的和民主的运动。”萨非在其著作《1848 年 7 月至 1849 年 2 月的罗马史》（佛罗伦萨，1893—1898 年）中认为“民主革命，可以这样说，已经是民族问题的必要模式了”。在论述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历史学家认为，争取独立战争第一阶段的失败是由于伦巴底和皮蒙特的温和自由派的不彻底和投降的政策，而整个独立战争的失败是由于保守派的阴谋，是外部敌人的优势和内部敌人的活动，主要是君主派和教权派的活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历史学家在论述革命失败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民主派所领导的民主运动的正确性，并公开宣布，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民主派是会被宣告无罪的。

在论述 1848 年革命的同时，民主派的历史学家，如卡塔内奥的著作《1848 年米兰起义》和马志尼的一些论文都揭露了庇护九世及其他意大利大公进行了“自由主义改革”的谎言，指出了他们在争取意大利解放斗争中的叛变行为。

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更为激进的一翼，如加里波的、奥尔

西尼、皮萨卡内、罗斯科尼和费奇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君主派和自由派的反人民的政策和叛变行为，而且还批评了罗马三执政的政策，指出了他们对待敌人的软弱无能、军事上缺乏远见、不善于也不愿意开展人民群众运动和扩大斗争的社会基础等错误。这些批评在费利奇·奥尔西尼的回忆录《生活和回忆》(佛罗伦萨, 1863—1864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在批评马志尼的软弱的一面时写道：“虽然三执政拥有新的、强大的优势，但是，他远不具备革命的天才。”加里波的和皮萨卡内都认为，没有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参加革命运动，革命的民族任务是不能实现的。皮萨卡内在其著作《1848—1849年意大利战争》(热那亚, 1851年)中写道：“在库斯托查战役以后，在失去领导人的情况下，只有切身的物质利益才能吸引人民参加当前的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过渡到帝国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贝内德托·柯罗齐领导的自由派。柯罗齐是意大利唯心主义历史学派的奠基人。这一学派的政治任务是力图阐明萨伏依王朝的“历史功绩”，证明意大利统一以后所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完善性”和“不可动摇性”。

这个学派对于1848—1849年革命的研究并不是着重于1848—1849年革命事件的分析 and 论述上，而是尽力扩展和延长这个革命时代，藉以论证意大利的统一是由萨伏依王朝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完成的。在资产阶级自由派历史学家如奥尔西的《当代的意大利》(米兰, 1901年)、卡内莱蒂的《意大利史》(热那亚, 1902年)、乔瓦尼约利的《从1815至1848年的意大利统一运动》等著作中都是片面的、甚至是歪曲地阐明1848—1849意大利革命。他们大多把自己的斗争描绘成是超阶级的、独立的现象，不能揭示争取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内因和真正性质，并认为撒丁王国的自由派是决定性的动力。在他们看来，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温和自由派与平民

派之间的不团结及领导人的软弱和不坚定,而不敢触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叛变行为。

由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错误观点和立场,所以,他们不能建立1848—1849年革命的科学的史学编纂学体系,也不能正确地阐明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的性质、动力、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

在意大利,纪念1848年意大利革命100周年是在完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民主力量进行着争取国家独立、自由与和平的英勇斗争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随着纪念运动的展开也就出现了研究1848年意大利革命的高潮。

在纪念1848年革命100周年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学家罗特、蒙蒂、马尔切蒂所出版的著作中虽然也包括有新的历史资料,但是,他们所描绘的是一幅僵死的、缺乏阶级分析的历史画面。他们力图复活关于温和自由派和卡尔·阿尔伯特在1848年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谎言传说。

在现代文献中,进步历史学家德·马尔科的三卷本著作:《教皇国的衰落。潘斯托·格里戈里十六》、《庇护九世和1848年罗马革命》、《一次社会革命。1849年的罗马共和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占有显著的地位。这部著作包含有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共产党人的历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自狱中的信》、《贝内德托·柯罗齐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意大利统一运动》和《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记录。论政策与当代国家》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十分重要的著作。这些著作准确地解释了意大利的历史,这不仅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的历史观。

葛兰西反对片面阐述意大利民族国家建立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他认为1848年意大利革命是“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但是,研究1848年革命可以作为“研究意大利民族的社会和政治的典型”。在论述1848年革命时期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策时,葛兰西指

出,他们“不能为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军事方向”,“自由派和卡乌尔的拥护者所理解的意大利的统一就是皮蒙特国的边界的扩展和萨伏依王朝的统治,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民族运动。”葛兰西非常重视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中的作用,在阐明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葛兰西指出,1848年意大利革命的失败不仅温和自由派要负重大责任,而且资产阶级民主派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同时他还阐明了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进步阶层,如马志尼等,都没有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不能团结农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葛兰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来解释意大利历史,无疑,这对意大利的历史编纂学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1848年捷克民族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编纂学

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捷克已经出现了论述1848年捷克革命运动的著作了。当时的历史学家力图坚持和论证自己在革命中所采取的立场的正确性。在1848年革命50周年时,出版了一批论述1848年捷克革命运动的著作。1918年,奥地利档案开放,1928年革命80周年时,又出版了一批有关1848年捷克革命运动的新著作。在1948年纪念1848年革命100周年时,研究1848—1849年捷克民族斗争史的浪潮达到了高峰,成为各种政治流派的史学家所注意和研究的中心课题了。

捷克资产阶级史学家,如约瑟夫·丘日姆斯基、扬·切尔内、安娜·别耶罗娃、卡尔·卡兹邦德、兹迪内克·托鲍尔卡等,都撰写了关于1848年捷克政治斗争和革命运动的著作。他们的著作在理论、方法、结构等方面都是大同小异的,彼此没有根本的区别。

大多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是站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上,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论述1848年捷克革命事件。这些史学家的特点是他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念。在他们看来,在1848年革命

时期,捷克人民的斗争完全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民族权利;捷克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是民族主义者的领袖;革命斗争是在捷克各阶级全面联合的口号下进行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就是全民族的利益;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所采取的政策是最“合理”的政策等。在他们的笔下,捷克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存在了,捷克各阶级的政治斗争目的和各阶级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一切都被融合在资产阶级之中了。在他们的著作中只论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而很少涉及到资产阶级民主派。

但是,在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当中还有一部分历史学家,如马萨里克、托鲍尔卡等,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都给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应有的地位。马萨里克已经开始注意领导捷克农民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文献和资料了。

在20世纪30—40年代,捷克出现了一些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立场阐明1848年革命事件的著作。这些著作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明民族问题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历史教材中,例如,卡普尔·克罗弗达的《捷克斯洛伐克史》,兹津斯克·卡利斯达的《简明捷克斯洛伐克史》等都歪曲了1848年捷克革命事件。

在纪念1848年捷克民族政治斗争和革命运动100周年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瓦茨拉夫·萨瓦、阿尔诺什特·克利马、奥尔德日赫·尔日加等许多历史学家的著作都对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观点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和批判。

瓦茨拉夫·萨瓦在其著作《捷克史上的划时代》中,正确地论述了1848年革命在捷克人民斗争史上的意义、捷克民族运动在全欧革命中的作用。但是,不足的是,作者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只是纯理论上的探讨,而不是用历史事实来证明自己观点上的正确。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克利马的《捷克的1848年》(布拉格,1948年)。该书曾译成俄文,于1949年出版。这部著作反

映了捷克历史学家研究这一问题的成就,但同时也暴露了捷克进步的历史编纂学的弱点。

克利马在他的著作中,首先正确地把1848年以前捷克民族运动和捷克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以及资产阶级的形成联系起来。在阐述1848年捷克革命事件时,克利马揭示了事件爆发的原因、阐明了各个阶级和政治派别在当时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揭露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实质及其在形成资产阶级的两个营垒——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中的意义。在揭示和阐明这些问题的同时,克利马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把1848年革命运动视为全民族运动的论点。

克利马以许多历史事实证明捷克劳动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和贵族利益的根本对立,揭穿了关于帕拉茨基、里格尔及其他资产阶级自由派在革命运动中起进步作用的谎言骗语。

克利马基本上能够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捷克革命‘发动的态度,特别是对1848年6月12·日至17日布拉格起义的态度。但是,他没能理解马克思著名的观点,即捷克的民族运动在1848年革命时期起了反动作用,甚至没有提到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克利马虽然指出了布拉格起义对各省革命运动、对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高潮的影响,但是却没有认真地描绘这一斗争所展示的画面。

克利马详尽地论述了布拉格斯拉夫代表大会的活动,但是他却没有说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原因及其在1848年和以后捷克人民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尽管克利马的著作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但是,它是一部较详尽、较正确地论述1848年捷克革命运动的著作。他的著作表明:捷克斯洛伐克进步的历史编纂学正在认真地修正旧的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修正资产阶级对1848年捷克革命运动史的歪曲和伪

造。

1848年波兰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编纂学

波兰流亡者“民主协会”的杰出活动家赫里特曼·兹科维奇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著作是波兰人论述1848年波兰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史的最早的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著作《1848年波兹南起义》(巴黎,1860年)。

梅洛斯拉夫斯基亲自参加并领导了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和1848年4—5月波兹南公国的武装斗争。他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和体验,在著作中阐明了他所领导的革命失败的原因。梅洛斯拉夫斯基认为,1848年波兹南革命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小贵族的自私、狭隘、胆怯和对革命斗争置若罔闻以及农民的愚昧和对祖国解放的漠不关心。显然,梅洛斯拉夫斯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他没有揭示出小贵族作为一个阶级不可能支持土地革命的阶级实质,也没有深刻了解农民阶级中所孕育的反封建斗争的巨大力量。但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著作在波兰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波兰又出现了汉斯·什米特的《1848年波兹南大公国的波兰人革命》(魏玛,1912年)。

到了19世纪最后20年,波兰历史学家著作的特点是对小贵族的颂扬。这个时期,在加里西亚出版了一些论述1848年革命的著作。如奥斯塔谢夫斯基·巴兰斯基的《幻想的年代》(兹洛切夫,1890年)、利西茨基的《安东尼·齐格蒙特·赫尔采尔》(里沃夫,1881年)、斯杰利尔斯基的《1848年的里沃夫》(1909年)、洛津斯基的《加里西亚简史》(里沃夫,1913年)、什尼尤尔·别普洛夫斯基的《加里西亚史》(里沃夫,1895年)等。这些资产阶级——小贵族的历史学家,在其著作中大多是歌颂小贵族的爱国主义,否定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些著作的大部分资料来源于回忆录,而不是来源于档案资料。对于当时的一些档案资料,他们几乎没有

触动,只是在洛津斯基和斯杰别尔斯基的著作中还引用少量的档案资料。

值得提出的是鲍列斯拉夫·利曼诺夫斯基的著作,如《波兰民主史》、《斯坦尼斯拉夫·沃尔采尔》(波兰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曾再版)等。作者的这些著作都具有其独特的地方。利曼诺夫斯基是波兰社会党创建时期的杰出活动家。他在其著作中赞扬和歌颂了波兰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不仅歌颂了它的革命一面,而且也美化了它软弱的一面,即对资产阶级自由派投降、妥协的一面。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对后来人研究 1848 年革命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 1918—1939 年的波兰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中,研究 1848 年革命的著作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 1848 年革命的历史编纂学的特点是注意了波兰问题在国际上的地位。华沙大学汉杰利斯曼教授的研究班里撰写了一批论述 1848 年波兰革命的著作,其中有几种是论述 1848 年波兰国内事件的,如明科夫斯基的《1848 年波兰王国的秘密组织》(华沙,1923 年),基涅维奇的《1848 年波兹南起义时期的波兰社会》等,而更多的是研究 1848 年国际关系中的波兰问题的。在这一方面的著作有:汉杰利斯曼的《意大利的 1848 年与恰尔托雷斯基公爵的政策》(克拉科夫,1936 年)、《克里木战争前恰尔托雷斯基的乌克兰政策》(华沙,1937 年)。还有一些不属于汉杰利斯曼教授研究班所撰写的著作。如波兰杰出的历史学家尤泽夫的《1848 年的波兰问题》。

汉杰利斯曼教授及其研究班学员的著作,对 1848 年波兰革命的论述采取了客观主义的态度。这些著作从材料来源、结构布局以及结论来看,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其中有些史实仍然是虚构的。

在现代,研究 1848 年革命史的著作,主要是纪念 1848 年波兰革命 100 周年时先后出版的一些著作。

在波兰,对于纪念 1848 年波兰革命 100 周年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许多历史学家都撰写了著作和论文,而且波兰所有的历史杂志和重要的社会科学杂志都刊载了纪念 1848 年革命的论文。同时,在 1948 年 9 月在华沙召开了第七次波兰历史工作者会议,并成立特别小组讨论了有关 1848 年波兰革命各方面问题的 12 个报告。

在纪念 1848 年革命 100 周年的著作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集体编写的巨著《人民之春一百周年》。该书共分五卷:第一卷《波兰大地上的人民之春》;第二卷《欧洲的人民之春》;第三卷《欧洲的波兰问题。外交、武装斗争、思想》;第四卷《波兰的活动家和思想家》;第五卷《波兰思想家选集》。这部著作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观点正确。

第一卷主编为波兰进步经济史学家、洛津斯基大学教授娜塔利娅·旺肖罗夫斯卡娅。她为第一卷的公开发表发表了题为《十九世纪中叶西欧和东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的文章。文章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即“法国的工人问题”和“波兰的农民问题”。文章第一部分强调了这次革命所面临的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第二部分阐明了 1848 年波兰革命前夕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它是进一步研究和了解 1848 年波兰革命的基础。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得出只有农业革命,确立农业民主制才能保证波兰的进步发展这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人民之春一百周年》第一卷的出版是十分可贵的。该卷是对整个波兰的特写组成的,但由于这些特写是出自各不同作者的笔下,因此,彼此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没有构成一部统一的、关于 1848 年波兰革命的综合性的著作。

在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对 1848 年整个波兰革命有一个连贯地叙述的著作,即克涅维奇的《人民之春时代的波兰人》。克涅维奇在这部著作中首先论述了革命的前提、革命的动力。在论述革命的动力时,他认为波兰流亡者是革命的动力,他把各式各样的流亡者都

融合到一个统一的爱国主义的阵营中,却没有阐明流亡者的阶级差异、政见的不同,以及彼此间的矛盾与斗争。在评价恰尔托夫斯基时,他没有把恰尔托夫斯基同革命民主主义者区别开来,也没有阐明他是企图以赎买政策来废除徭役和企图借助于某种改革制止革命风暴的政治目的。同时,他也没有涉及到国内的社会经济条件。

在当代波兰的历史编纂学中,广泛地、深入地研究 1848 年波兰革命已经成为一种新风气了。

扬娜·别尼亚茹夫娜的著作《克拉科夫的自由派和保守派(1833—1848 年)》是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基础而进行研究的成果。扬娜·别尼亚茹夫娜所运用的关于克拉科夫和加里西亚的秘密爱国协会的资料,关于克拉科夫平民革命组织的开端的资料都是十分珍贵的。她对 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的论述是成功的,而且她还比较正确地描述了这次起义的杰出活动家邓宾斯基的形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波兰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明 1848 年波兰革命的问题,而且他们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 1848 年波兰革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研究 1848 年革命,特别是这次革命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与现实联系起来。例如他们提出:1848 年革命事件与波兰人民的今天有什么联系?纪念 1848 年波兰革命 100 周年时波兰人民应该学习些什么?这样一来,研究 1848 年波兰革命就具有了非常鲜明的现实意义。

1848 年罗马尼亚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1848 年,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都先后爆发了广度和深度不同的革命运动。革命的同时代人对当时发生的这场革命运动都有所论述,不过,这些言论和观点只是在后来,在纪念 1848 年革命 50 周年时,才汇集出版。

革命的同时代人对 1848 年罗马尼亚诸公国革命论述比较正确的首推尼·伯尔切斯库。伯尔切斯库认为：“1848 年革命并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更不是外国影响的结果。……它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① 伯尔切斯库在给一位革命参加者的信中，在谈到这次革命的爆发时写道：“六月革命不是我，也不是你，更不是埃利亚德或者其他革命者空想和臆造出来的。”^② 伯尔切斯库在他的著作《多瑙河诸公国的经济问题》中，明确地阐明了革命爆发的原因。他写道：“我们认为，没有一次革命不是不合规律和不必要的。被剥夺了生活所必须的面包、财产、安全、秩序和保障的罗马尼亚人，被排除在工业、商业、法律和正义之外的罗马尼亚人……应该怎样对待这些祖国的暴君和奴役他们的敌人呢？应该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悲惨的处境呢？难道还有比革命更好的办法吗？”^③ 伯尔切斯库的著作在 1848 年多瑙河两公国革命文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859 年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形成以及宪法和土地改革的实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开始改变了对 1848 年革命的看法。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革命是一次温和的革命。他们不是去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软弱和动摇，甚至背叛革命的行径，而是歌颂和赞扬他们，为他们的叛卖政策进行辩护^④。

在 1848 年罗马尼亚诸公国革命 50 周年之际，布加勒斯特于 1898 年 6 月 11 日组织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并编辑出版了《罗马尼亚诸公国的 1848 年；文件和文献集》（1898 年）。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撰文，以资纪念。他们认为，1848 年革命时期所制定的纲

① 弗·凯雪斯特斯库：《尼古拉·伯尔切斯库——罗马尼亚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载《纪念尼·伯尔切斯库论文和报告集》，第 31 页。

② 同上书，第 65 页。

③ 伯尔切斯库：《多瑙河诸公国的经济问题》第 1 卷，第 2 分册。

④ 卡马克契耶夫：《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和土地问题》，第 27—28 期，第 89 页。

领和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在罗马尼亚统一以后已经实现了。有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在陛下无敌的领导下,罗马尼亚民族的意志,1848年勇士所提出的全部纲领已经实现了。”^①事实上,1848年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和政治要求不仅在这个时期没有实现,而且在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也没有完全实现。

20世纪初,研究1848年革命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仍然继承和坚持着以往对1848年多瑙河诸公国革命的错误观点和对这次革命的歪曲和诬蔑。他们认为,多瑙河诸公国的革命只是一小部分出身贵族的青年的事情,而且歪曲这次革命是对1848年法国革命的简单模仿,完全抹杀了当时多瑙河两公国已成熟的革命形势和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

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这次革命的看法也是十分错误的。例如:菲利蒂在其著作《组织规程下的罗马尼亚王朝》(布加勒斯特,1915年)中,认为1848年多瑙河诸公国的革命是一次“假革命”。阿尔比尼认为,“雅西事件是带引号的革命”,并且轻蔑地说摩尔多瓦革命是“不足挂齿的”。帕纳伊特斯库在为《尼·伯尔切斯历史文集》所写的序言和注释中强调,1848年瓦拉几亚革命“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通过文学所进行准备的合乎逻辑的后果”。约尔加在其著作《罗马尼亚商业史》(布加勒斯特,1952年)中认为,思想和文学的发展导致了1848年革命事件;否认1848年革命对罗马尼亚历史的意义;反对把1848年三月雅西革命事件与1846年的手工业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联系起来。

上述这些历史学家不仅否认1848年多瑙河诸公国革命是多瑙河诸公国经济、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歪曲革命的性质和原因,而且他们还歪曲革命斗争的目的,并为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妥协、软弱,乃至叛变进行辩护。阿尔比尼宣称,摩尔多瓦

^① 《罗马尼亚诸公国的一八四八年,文件和文献集》第1卷,第7页。

和瓦拉几亚人民在 1848 年斗争的目的是争取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实行自治,至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则处于次要地位。约尔加赞扬摩尔多瓦自由贵族向大公递交请愿书的斗争手法,认为这是唯一可取的办法,指责那些号召并引导农民参加革命斗争的社会活动家,并且力图论证,革命者反抗大公及其制度的斗争是徒劳的。菲利蒂也竭力渲染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在 1848 年革命中的作用,把他们描绘成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勇士,强调“在 1848 年革命中,大贵族的功绩是非常之大的”。克塞诺波尔在其《罗马尼亚政党史》(1911 年)中把自由贵族的发动说成是人民运动。阿尔比尼甚至认为,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临时政府是代表了“人民意志”的政府。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罗马尼亚的历史学家非常重视对 1848 年罗马尼亚诸公国革命的研究,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 1848 年罗马尼亚革命问题,并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在 1948 年纪念 1848 年罗马尼亚诸公国革命 100 周年时,出版了《罗马尼亚诸公国的 1848 年》。这是一部研究 1848 年罗马尼亚革命的汇编。它收入了乔尔杰斯库—布泽乌关于 1848 年革命中的手工业者的论文、包别斯库·多尔列努论尼古拉·伯尔切斯库的文章等和其他一些著作。汇编中还收入了未发表过的伯尔切斯库致扬·吉卡和瓦西里·亚历山德鲁的信和其他文献。

收入这部汇编的论文和著作改变了以前对这次革命及其活动家的评价。他们认为,1848 年多瑙河各公国革命是国内社会矛盾增长的必然现象。汇编的作者令人信服地论证,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进步社会活动家并不是互不联系的。革命前他们之间已经保持着联系,并且竭力使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联合为统一的罗马尼亚国。

汇编对于尼古拉·伯尔切斯库及其在 1848 年革命时期的活

动作出了新的评价。1845年以前,对于伯尔切斯库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进行诽谤,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则是将其作为建设罗马尼亚的民主战士的先驱来纪念的。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革命领袖,罗马尼亚社会科学院出版了《尼·伯尔切斯库论文和报告集》(布加勒斯特,1953年)。这部著作比较正确地评价了伯尔切斯库,是根据他的实际活动来塑造他的形象。这部汇编的作者既阐明了伯尔切斯库对革命的贡献,也说明了他的错误与缺点。不过,对伯尔切斯库的错误和缺点的揭露是不够的。

科学院院士米哈伊·罗列拉主编了《1848年摩尔多瓦革命》(1950年)。这部汇编既论述了摩尔多瓦革命,也阐明了特兰西瓦尼亚革命。这部汇编所收入的616份文献中,有444份是第一次公布的。它对于后人研究1848年多瑙河各公国的革命运动是十分有益的。

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1848年匈牙利革命史的研究和记载,在革命时期已经开始了。

当时匈牙利的报刊为匈牙利历史编纂学提供了重要而宝贵的资料。当时著名的报纸有:《三月十五日报》、《工人报》、《佩斯报》和《我们的祖国报》等好几种报纸。

裴多菲的好友帕尔菲主编的《三月十五日报》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它广泛地报道和详尽地阐明了当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佩斯、波桑和其他重要城市的革命运动,特别论述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武装斗争和由谢米尔、科苏特签名封闭《三月十五日报》的命令。

《工人报》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坦契奇主编的报纸。坦契奇是农民利益的维护者,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所以他创办的报纸主要是反映了农民的问题,刊载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

土地纲领,描绘了农民贫困悲惨的状况,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替农民说话。实际上,这份报纸可以说是农民的报纸。

《佩斯报》和《我们的祖国报》都是官方的报纸。它们代表了官方的立场和观点。在这些报纸上,刊载了匈牙利人民同反革命武装干涉英勇斗争的情况,科苏特于1848年9月—10月在国民议会上的演说等重要材料。《我们的祖国报》还特别阐述了1848年革命前夕匈牙利人民群众的状况和匈牙利的革命形势。

革命时期出版的著作有:科苏特的《匈牙利近代史》(三卷本)(曼海姆,1849年)、《科苏特全集》(三卷本)(1850—1851年)和阿尔别尔特·尼亚里的著作《匈牙利革命的日子》(佩斯,1848年)。尼亚里当时是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是青年学生的领袖。他满怀激情地参加了佩斯三月革命。他的这本著作就是对3月15日佩斯革命的回忆和描述。在这部著作中充满了革命精神,充分表述了匈牙利青年在欧洲革命影响下,急欲同哈布斯堡王朝决裂、同封建专制制度决裂和渴望匈牙利大踏步前进的强烈愿望。

1848年革命以后,革命的同时代人和匈牙利历史学家非常重视对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研究。

关于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第一批编年史,首推匈牙利革命流亡者米哈伊·霍尔瓦特的《匈牙利历史上的25年,1823—1848年》(两卷本)(佩斯1867年)和《1848—1849年匈牙利独立战争史》(两卷本)(佩斯1863—1867年)、达尼埃尔·伊拉尼的《1847—1849年匈牙利革命政治史》(佩斯,1859—1860年)。

米哈伊·霍尔瓦特是1848—1849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的积极参加者,曾任谢米尔政府的文化和教育部长。他是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史实撰写自己的著作的,所以,他的著作拥有丰富的史实资料。在他的著作中,他主要是详尽地阐明了立法机关的活动,革命的政治意义和进步作用。但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却没有涉及到革命的阶级内容和阶级斗争问题。他相信自由贵族关于在1848年

革命中贵族能够自愿放弃自己的特权和解放农民的神话。他对待革命的立场也就是匈牙利自由贵族对待革命的立场。

达尼埃尔·伊拉尼是一位资产阶级较激进的革命活动家，是国民议会的代表。他积极参加了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全过程。革命失败后，他被缺席审理，哈布斯堡反动王朝判处他绞刑。他和法国历史学家与政论家沙尔·路易·沙赛恩共同撰写了《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政治史》。这部著作充满了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仇恨和对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忠诚。他们的这部著作不仅包含有这一时期整个政治斗争的丰富的史料，而且还分析了各个党派的立场，评价了各个派别的政治活动家。作者指出了科苏特的动摇，但是赞赏科苏特的活动。同时作者还特别阐明了左翼的活动。这是一部从激进派的观点详细阐明暴风雨般的革命年代的著作。

1867年，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统治阶级实行了联合，成立了奥匈帝国，匈牙利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权。这样一来就重新复活了民族的意志。科苏特被宣布为民族英雄，被处死的将军们也被宣布为英雄或勇士。革命开始的日子，即3月15日定为民族节日。这时在研究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历史学家中，艾尔温·沙波占有特殊的地位。艾尔温·沙波是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是社会民主党极左翼的领袖，是党内机会主义的敌人。他的主要著作《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中的社会斗争和党派斗争》（布达佩斯，1921年）是在作者逝世后3年才出版的。这部著作论述了匈牙利革命的理论 and 阶级关系。沙波认为，中等贵族是反对大贵族地主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力量，1849年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是，作者论证说：1848年革命并没有改变匈牙利的经济发展，马克思关于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是不正确的。在沙波看来，在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匈牙利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停留在土耳其入侵时期的水平上。不过，他的著作揭穿了当时统治

阶级文献中所说的匈牙利贵族可以自动放弃特权的神话。沙波正确的指出,只有在群众革命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贵族才可能走上解放农民的道路。他批评 1848 年的法律旨在维护贵族的统治地位和利益,高额的财产资格限制剥夺了广大人民的选举权。他比较正确地评价了科苏特,既肯定了他在革命中的作用,又指出了他在解决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上的错误。

70 年代出版了《坦契奇全集》。全集的题名为《我的生活道路》。它包括坦契奇革命前的著作、革命时期在《工人报》上发表的论文、呼吁书、回忆录等。《坦契奇全集》共 12 卷。它含有丰富的史料,在 62 章中有 11 章是论述 1848 年匈牙利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这部著作是历史学家的珍贵资料。

《裴多菲全集》大约也是这个时期出版的。《裴多菲全集》包括他的诗歌,论文和日记。该全集共分 4 卷。从《裴多菲全集》中可以看出裴多菲在 1848—1849 年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活动;革命青年对巴蒂安尼的批评;马达拉斯对 1848 年 6 月国民议会选举中统治集团压制人民的揭露。

到了 19 世纪 80—90 年代,在匈牙利兴起了研究 1848 年匈牙利革命高潮。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开始深入研究和探讨 1848 年匈牙利革命。在这一时期内,他们汇集出版了许多关于 1848 年匈牙利革命的文献和史料。如 80 年代,匈牙利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帕普·德奈什编辑出版了《1848 年佩斯的匈牙利国民议会》(两卷集)(布达佩斯,1881 年)。马达拉斯的回忆录《我对 1831—1881 年的回忆录》、普尔斯基的《我的时代、我的生活》(普列斯堡—莱比锡,1881 年)和《1848 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逐日年鉴》等。

德奈什编辑出版的《1848 年佩斯的匈牙利国民议会》是根据匈牙利政府的机关刊物《通讯》所刊载的有关匈牙利国民议会的资料汇集成册的。这部汇编包括有:1848 年 7—12 月佩斯国民议会的活动和 1849 年德布勒森国民议会的活动、国民议会的记录和一

部分代表的发言。这部汇编对于研究 1848 年匈牙利革命过程中各社会团体和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及其斗争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马达拉斯的《我对 1831—1881 年的回忆录》，包括有他的日记和记事。这本著作的部分章节阐述了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的重要事件，涉及到某些革命事件和某个革命阶段，评价和阐明了整个革命过程中的政治组织及其领导人和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在“1848 年平等派俱乐部”中，他阐明了俱乐部的任务及其在争取出版自由和废除选举中的财产资格限制斗争中的活动。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在革命最后几个月当中，左派与“和平党”的斗争。马达拉斯对其兄拉斯劳·马达拉斯的评述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普尔斯基是科苏特的好友和支持者，是匈牙利革命政府驻伦敦特使。他的著作《我的时代、我的生活》（两卷本）（普列斯堡—莱比锡，1881 年）的第二卷是阐述 1848 年匈牙利革命的。他的回忆录中论述了 1848 年匈牙利革命和奥地利革命的一些重要事件，表达了希望匈牙利和奥地利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哈布斯堡王朝的愿望。揭露了英国统治集团对匈牙利革命所采取的两面派手法，力图达到使英国支持匈牙利政府和承认匈牙利独立的目的。在这部著作中还附有杰列基和巴蒂安尼关于匈牙利对外政策方面的困境的论述等重要资料。

90 年代，在布达佩斯出版了《1848 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逐日年鉴》。它包括了匈牙利各个地区的革命事件。对一些重要事件的阐述都是来自各个不同报纸的论述和报道，因而，对每一事件的论述都存在着差异。这对于后人研究 1848 年匈牙利革命是十分珍贵的材料。

1919 年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对 1848 年革命的评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匈牙利资产阶级采取了极端反动的立场，日益倾向法西斯主义。在这个时期所出版的著作对于 1848 年匈牙利革命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意义和作用，完全持否定态度。他们攻击和诋毁科

苏特和资产阶级左翼革命活动家，而赞扬叛徒戈尔盖。

1936年出版的赛克菲·久拉主编的五卷本《匈牙利史》就是这个时期的一本重要著作。这是一部阐明1848年匈牙利革命史的集体创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很难看到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例证。全书浸透了唯心主义和心理学的推论。作者完全摒弃了阶级分析方法，他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是依据他们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是根据他行动时的心理活动。因此，他们对于科苏特在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活动与作用持否定的批判的态度。赛克菲·久拉及全书的作者伪造了许多重要政治斗争事件的事实和革命的日期。例如，标志着革命开始的3月15日革命，作者只是一笔略过，并且认为它没有多大的意义。对于参加了3月15日革命的青年，他们也只是提一提他们的名字。而对于贵族地主，作者则竭力歌颂与赞扬，标榜他们为了农民的利益，甚至是为了民族独立的利益而自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特权。他们诬蔑农民运动是“破坏性的运动”，否定农民和广大人民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在谈到沙皇俄国的武装干涉时，赛克菲·久拉和作者不是抨击沙皇的武装入侵，而是赞扬沙皇尼古拉一世对奥地利国王的允诺。他们把沙皇尼古拉一世所说的“沙皇俄国将永远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朋友”这句话说成是尼古拉一世的义士豪杰之言。他们认为，在匈牙利人民反对俄国入侵的战斗中，戈尔盖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为他的叛变行为辩护，竭力论证他的投降是为了拯救军队和民族。

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以后，匈牙利历史学家在纠正被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歪曲的历史事实、错误的传说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同时，为建立1848年匈牙利革命科学的无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提出的任务是，重新研究1848—1849年革命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那些被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所歪曲的事实。

匈牙利的史学家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了 1848 年匈牙利革命 100 周年。在 100 周年纪念前后,出版了一系列关于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的论文和专著。

在这里,应当首先提出的是人民民主匈牙利的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列瓦依。1945 年他出版了《1848 年革命的道路》。在纪念 1848 年匈牙利革命 100 周年时,他又出版以《马克思与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这部著作是他 1932 年在法西斯的监狱里写成的,直至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出版。尽管作者是在既没有档案资料,又没有足够的史料的情况下写成这本书的,但是,它却正确地论述了革命发展的过程、准确地评价了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左翼的代表人物,确切地阐明了革命的性质和意义。

匈牙利社会科学院院士安迪奇·伊丽莎白的著作《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教会的反动作用》(布达佩斯,1948 年)也是纪念 1848 年匈牙利革命 100 周年时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揭露了宗教在革命中的反动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农村神甫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原因和作用。作者在他的另一著作《科苏特同改革和革命的叛徒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既论述了神学的反动作用,也阐明了贵族的反动作用。他指出,科苏特不仅要同大贵族地主作斗争,而且也必须同中、小贵族中的机会主义者斗争,即同“和平党”作斗争。作者正确地指出,科苏特在 1849 年 3—5 月的斗争实质上是反对“和平党”的斗争。

在纪念 1848 年匈牙利革命 100 周年之际出版的著作还有沙·波·伊斯特万的《1849 年 1—5 月解放战争的首府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1948 年)、恩伯尔·居瑞的《1848 年匈牙利农民运动》(布达佩斯,1949 年)、内曼什·德瑞的《1848—1849 年革命中的工人阶级》(布达佩斯,1948 年)、英德的《1848—1849 年的党派斗争与政府的政策》(布达佩斯,1948 年)、麦列伊的《1790—1848

年匈牙利的农业和土地关系》等许多著作。

这些著作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及其经验教训。沙·波·伊斯特万的著作对于研究“和平党”、资产阶级左翼的斗争、科苏特的政治纲领和策略都是非常有益的。恩伯尔·居瑞的著作是在研究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这部著作论述了革命前夕的农民的贫困状况、农民的革命发动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内曼什·德瑞的论文研究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揭露了资本家大量使用童工、女工和残酷剥削他们的罪行,着重阐明了1848年4月手工业工人的革命发动,同时也指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弱点和分散性。莫德的论文阐述了革命时期的党派斗争,特别阐明了“和平党”成立的历史及其在革命中的影响和作用。麦列伊的著作研究了18世纪末直至革命时期的土地关系史,主要分析了农业经济的特点,论述了资本主义向匈牙利农村的渗透以及对农民剥削的加强。所有这些著作是当代匈牙利历史学家研究1848年匈牙利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成果。

到了50—60年代,匈牙利历史学家继革命100周年纪念之后,又出版了一批研究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及其经验教训的著作,同时还整理汇编了革命同时代人的著作、日记、回忆录等宝贵的原始资料。

50年代出版的著作有:莱德列尔·艾玛的《匈牙利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布达佩斯,1952年)、沙尔洛什的论文《1848年佩斯工人的革命斗争及其纲领》(载《世纪》1955年第1期)、什皮劳·久尔基的《1848年革命前夕佩斯州农民的分化》(载《世纪》1958年5—6期和《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中约拉什·科苏特与左翼激进派和人民群众的联盟》(布达佩斯,1953年)、伊斯特万·巴耳特的论文《1849年政府的农民政策》、多特·若尔丹的《科苏特与1848年的民族问题》(布达佩斯,1954年)和安迪奇·伊丽莎白的《哈布斯堡王朝与罗曼诺夫王朝的联盟》(布达佩斯,1961年)等90

种有关 1848 年革命的著作和论文。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当代匈牙利历史学家对 1848 年革命的重视和他们对建立无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贡献。

除了上述内容丰富、史料可靠、观点正确的著作和论文外，匈牙利历史学家还补充出版了《科苏特全集》、汇集出版了被资产阶级遗忘和忽视的年轻革命家瓦尔瓦里的著作《瓦尔瓦里选集》。

《科苏特全集》在 1850—1851 年曾出版过 3 卷，而真正的全集是在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出全。这部全集共 15 卷。在 15 卷当中有 4 卷是直接论述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从科苏特的论述当中，可以了解到科苏特的政治主张、他对匈牙利其他革命家的态度，如对巴蒂安尼、谢米尔、戈尔盖等人的态度，匈牙利政府在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上的摇摆不定等。

1956 年出版了《瓦尔瓦里选集》。《瓦尔瓦里选集》包括瓦尔瓦里的演说、日记、回忆录等。瓦尔瓦里的演说《论出版自由和民族问题的团结》，1849 年 5 月 15 日对印刷工人的演说，都较深刻地揭露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号召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在安全委员会上的演说要求手工业工人武装起来，而对士兵的呼吁书号召奋起同哈布斯堡王朝作斗争。

第三节 苏联关于 1848 年欧洲 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革命民主主义者关于 1848 年 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俄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已经对 1848 年欧洲革命进行了研究和论述。在这里，应特别提出的是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同时代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

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赫尔岑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目击者。1848年革命兴起时，赫尔岑正在意大利。当得知七月王朝被推翻时，他便立刻到达巴黎，从1848年5月17日至1849年6月中旬，他和家人一直呆在这里。在革命的法国首都，赫尔岑不仅密切注意着1848年革命的发展，关心革命的进程，而且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和法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德国流亡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给予他们以物质援助；积极参加政治俱乐部的活动和会议以及群众性的示威游行；资助激进刊物的出版并为之撰稿。而在参加1849年6月13日事件以后，赫尔岑受到法国当局的跟踪盯梢，被迫隐避在瑞士。

赫尔岑阐明1848年欧洲革命的著作有《自彼岸》、《法国和意大利来信》、《往事与沉思》等。他高度评价了1848年革命。赫尔岑写道：“巴黎在一年之内使我清醒了，而这一年就是1848年。”随着1848年法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赫尔岑很快便认识到，临时政府的成立是“人民胜利的果实被窃取了”。5月15日巴黎试图驱散制宪议会的愿望遭到失败以后，赫尔岑就开始意识到：“革命被战胜了；很快共和国也将被战胜……制宪议会胜利了，君主制胜利了。”巴黎六月起义被镇压以后，他为六月起义的失败而痛心，他诅咒资产阶级，说议会的800名代表的行动“像凶手、像恶棍”的行动一样。他在《自彼岸》中非常伤感地写道：“我没有死，但是我已经衰老了，在六月的日子以后，就像在患过重病以后一样，我正在恢复健康。”他又说：“在如此巨大的震荡之后，活人是不会再照旧生活下去了。”^①

巴黎六月起义失败之后，法国的反动势力日益加强，各国反动派也先后向革命发动了进攻。在这种形势下，赫尔岑日益感到革命失败给他带来的重大压力达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他甚至对革命

^① 《赫尔岑全集》第5卷，第412,414页。

感到悲观失望。1848年10月17日，他在致奥迦寥夫的信中写道：自从图契科夫离开巴黎之后，“这里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了。”“我实在难以向您描述生活在这个失去理性的、令人窒息的城市里所承受的全部重压。”^①当路易·波拿巴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他在1849年5月12日致格拉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含着泪水哈哈大笑。事情是如此地必然，我也就如此地经受了这一切，但已经忍受不住了。我不是早就从罗马来到了这里么！——也许在当时我是扮演了一个丑角。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经历了受教育的一年。”^②

俄国的另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同样关注和同情1848年欧洲革命。他在1858年《当代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卡芬雅克》，对1848年法国的阶级斗争作了精辟的分析，揭露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反人民的政策，斥责了卡芬雅克对巴黎革命工人的血腥镇压，并明确指出，卡芬雅克对巴黎六月起义的镇压为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政变扫清了道路。车尔尼雪夫斯基为英国历史学家金格列克关于克里木战争著作的俄译本所作的注中，分析了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原因和性质。

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论述了1848年法国革命，而且他们和杜勃洛留包夫一起还论述了1848年意大利革命和捷克等国的革命运动。

赫尔岑在《往事与沉思》、《法国和意大利来信》中，描述了意大利革命高潮的真实画面，塑造了1848年意大利著名革命活动家的鲜明的形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包夫特别关心和研究了1848年意大利革命的最后阶段的革命事件。杜勃洛留包夫的《卡米德洛·宾佐·卡乌拉公爵的生与死》、《难以抑止的恐怖》、《都灵

① 《赫尔岑，新资料》，莫斯科，1927年，第62页。

② 同上，第64—65页。

来信》和其他著作，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在《当代人》杂志上的论文，都是十分重要和有价值的著作。他们在这些著作中阐明了意大利统一的道路，论证了民族解放运动中两种不同派别的作用和性质，歌颂了人民群众参加 1848 年革命事件的重大意义。

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论述 1848 年捷克革命和民族斗争时，首先阐明了斯拉夫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的作用，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批判了奥地利资产阶级和匈牙利贵族的错误的民族政策。

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 1848 年匈牙利革命和匈牙利的革命活动家寄予极大的同情。当赫尔岑流亡在国外时，曾会见了科苏特，并经常同普里斯基通信。赫尔岑发表在《钟声》上的论文《战争》和他的著作《山之巅》都详述了匈牙利争取独立的斗争，强调指出了匈牙利革命在同欧洲反动势力斗争中的巨大意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日记中称他是匈牙利人的朋友，从而暗示他对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民主斗争的同情。后来他发表在《当代人》杂志上的文章明确地评价了匈牙利革命的民族解放的性质。

不仅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研究和论述了 1848 年欧洲革命，而且俄国的其他历史学家和一切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也同样阐述了 1848 年欧洲革命的问题。

一些远征匈牙利的俄国军官在其回忆录、日记和文章中都阐述了 1848 年的匈牙利。如列胡金的《1848 年远征匈牙利日志》（莫斯科，1875 年）、维尔尼科夫斯基的《1848 年的匈牙利远征》（《俄罗斯文献》，1885 年，第 12 册）、法捷耶夫的《1848—1849 年俄军远征匈牙利的情绪》（《俄罗斯古风》，1921 年，第 5 期）等，都论述了 1848—1849 年的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赞扬了匈牙利人民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一些贵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还论述了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他们在阐明 1848 年捷克的政治斗争时，一般是在《捷

克的民族觉醒》这类著作中进行论述和评价的。例如，舍普金的《斯拉夫人的觉醒》（《近代史阅读资料》，1913年版，第4卷）、弗兰采夫的《捷克民族觉醒简史》（华沙，1902年）等著作，都对1848年捷克的革命运动进行了研究、分析和论述。不过，他们在论述捷克的民族觉醒时，往往把民族觉醒的过程同捷克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割裂开来，而把民族觉醒的过程主要看成是某些“伟大”领袖和学者领导下的捷克全民族运动的过程。持这种观点的著作还有布吉洛维奇的《论帕拉茨基的特性》（尤里耶夫，1889年）、布吉洛维奇的《论弗兰吉什克·拉吉斯拉夫·里格尔博士的特性》、拉弗罗夫的《沙弗里克的生平和学术活动》（莫斯科，1898年）和《纪念拉曼诺夫斯基研究斯拉夫学学术活动五十周年论文集》（圣彼得堡，1905年）。

阐明1848年捷克和奥地利其他斯拉夫民族的革命事件的著作有罗文斯基的《1848—1849年的捷克》（载《欧洲通报》1870年第1—2期）、列文的《1848年奥地利的社会斗争和民族斗争》（莫斯科，1913年）和彼尔沃尔弗的《1848—1849年的奥地利斯拉夫人》（载《欧洲通报》，1879年第4期）。所有这些著作虽然也提到贵族、商人和工人，但是，并没有对革命运动中的各个阶级进行阶级分析。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贵族资产阶级阵营中的代表人物的活动上，论述他们的活动，赞扬他们的活动，而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他们则持否定态度或者避而不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完全回避了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斯拉夫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反革命作用。

列宁斯大林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列宁、斯大林已经十分重视对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的研究。他们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所写的许多著作和文章都论述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问题。列宁、斯大林是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研究 1848 年欧洲革命的。他们一方面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一方面用这些经验和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中所提出的纲领和策略以及理论来指导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在革命中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革命方针、策略和理论的正确性,从而以新的原则和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论临时革命政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我们的自由资产阶级想干什么和害怕什么》、《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论民族自决权》;斯大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论列宁主义的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以及他们在 1917 年夏、秋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路易·勃朗主义》、《波拿巴主义的开始》、《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等文章,都涉及到 1848 年欧洲革命的问题,深刻地论证了 1848 年欧洲革命的重要事件和人物,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还没有来得及阐明或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阐明的重要理论问题。他们在这些著作中,对革命形势、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作为革命斗争策略的武装起义、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斗争中的作用问题、民族和民族解放问题等都作了非常明确的论述。

在 1905—1907 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列宁都非常重视对 1848 年德国革命的研究,尤其重视马克思恩格斯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制定的纲领和策略。在列宁全集、特别是关于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几卷中,几乎都有研究 1848 年德国革命史的著作和文章。列宁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把俄国革命与 1848 年德国革命相比较,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革命的内容和革命的特点及各阶级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无产

阶级在革命中的斗争策略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论断。

在列宁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我们首先应当提出的是《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以1848年德国革命为例,结合俄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论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策略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错误路线和策略;斥责了法兰克福议会的无所作为;在同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对比中,批判了马尔丁诺夫、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的错误纲领和观点;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斗争路线和策略。

在谈到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时,列宁指出,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由于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所以,“1898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专门把共和制的问题当做首要问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会使人惊异,也不会引起非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在1848年不提共和制问题,那就是直接背叛革命了。”^① 据此,列宁认为,在俄国,先进阶级的政党的任务是必须“极力设法使民主革命对沙皇制度取得彻底胜利”^②。

列宁根据马克思在1848年向革命政府或革命专政提出的任务的论述,指出了俄国革命胜利后的任务。列宁认为,马克思在1848年向革命政府所提出的任务,按内容来说,首先是实行民主革命,也就是说抵御反革命势力,在事实上消除一切和人民专制相抵触的东西,也就是实行革命民主专政。在列宁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民”,其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直接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77页。

② 同上。

统治权转到人民手中，而不是转到汉泽曼、康普豪森之流手中，不是转到彼得尤克维奇手中，才能实现革命民主专政；只有实现了革命民主专政，才可以说是取得了革命的完全胜利。

列宁在1917年撰写的《国家与革命》是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设专章《国家与革命 1848—1851年的经验》，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1852年前后，关于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批判了机会主义的歪曲，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在这一章的第一节《革命的前夜》中，列宁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列宁指出，马克思关于“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是密切相联的。既然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使命，那么就自然会得出必须用暴力革命去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在《革命的总结》一节中，列宁论述了马克思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得出的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列宁根据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论述的国家机器的产生和演变过程的论述，阐明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首先必须消灭资产阶级的常备军和官吏。因为“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的‘寄生虫’”，它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资产阶级镇压、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最重要的工具，因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首先消灭资产阶级的军队和官吏机构。

此外，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和《民族问题提纲》中，对奥地利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实质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阐明了资产阶级的多民族的国家不稳固的原因。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中论述了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在1848年意大利革命中的作用。列宁认

为,马克思恩格斯为德国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的策略,在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的意大利也是可以应用,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可以成为革命的部分的,但要支持其极左翼,鼓励他们,同时也必须批评他们的错误和软弱动摇,指出他们的阶级局限性。

斯大林也像列宁一样,对1848年欧洲革命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著作进行了认真地研究。斯大林论述有关1848年欧洲革命的著作和论文在布尔什维克和俄国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在准备和实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也像列宁的有关著作一样,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和组织作用。

斯大林也着重研究了1848年德国革命。他对1848年德国革命的论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斯大林在其著作《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两次搏斗》、《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马克思恩格斯论起义》和《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等文章,都涉及到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问题,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怯懦和背叛,阐明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并在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

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一文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派时指出:“资产阶级时时刻刻惧怕共产主义的‘赤色魔影’,在一切革命中他们总是当事情刚刚开始时就力图把它结束。被工人所惊吓的资产阶级只要得到一点于自己有利的让步,就向政府伸出调和的手,无耻地出卖自由事业。”^①斯大林在指出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同时,批判了俄国某些“社会民主主义者”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范围内的错误作法。斯大林指出,历史教导我们,在只让工人充当配角的情况下,“工人就只好

①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4页。

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在资产阶级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他们利用“工人壮健的手臂”，而当取得胜利时，“他们就把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使工人一无所得。”^①因此，斯大林认为，让工人阶级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头，还是当资产阶级的配角，做运动的尾巴，这对俄国民主事业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斯大林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起义》中，批判了孟什维克维克诺·赫·^②。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主张的武装起义诬之为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斯大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仅主张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斗争中采取武装起义的方法，而且他们主张积极的进攻。斯大林引证了马克思的话：“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转入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斯大林认为，马克思所主张的起义要走进攻的道路，就必须既拥有武装，又要有军事知识和受过训练的队伍，而诺·赫·却把这一切都看成是布朗基主义。这就说明诺·赫·并不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的观点，而在实际上他是否定了“武装、红色队伍和军事知识的作用”。

无论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或者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斯大林都非常注意农民问题。他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提出的工农联盟的思想以后，根据当时俄国革命的具体条件，指出了俄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斯大林说，英、法、德、奥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遵循它们的道路进行的。在西方，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属于无产阶级，因为这个阶级在当时还比较幼弱，不可能单独领导革命。在当时革命的领导权，一般说来，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西方农民摆脱农奴制而获得的解放不是从人数很少和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手里得

①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页。

② 诺·赫·即诺依·赫米里基。

到,而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西方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一起反对旧制度的。因此,西方革命的结果是使资产阶级的政治比重增加了。而在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农民则是要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离开立宪民主党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同无产阶级共同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所以,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结果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相反。俄国革命的结果不是使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力量加强,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后备军增加,而是使它失去基本的后备军,即失去农民,把千百万农民团结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周围。^①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同托洛茨基作斗争的年代,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等著作都论述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问题,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次革命中的方针、路线及斗争策略等重要问题,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了孟什维克、托洛茨基等过低地评价农民的作用,否定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和否定工农联盟等错误观点。

斯大林还着重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民族问题的理论。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占有很大的比重。他先后撰写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等31篇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文章和报告,它们全部汇集成册,书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斯大林的这部著作涉及到民族问题的许多方面,论述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

苏联史学家关于1848年革命的历史编纂学

苏联是非常重视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的国家。苏联史学家把

^①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11—112页。

1848年革命史当作重要课题来进行研究。因此，他们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纪念1848年欧洲革命100周年前后，苏联出版了一批关于1848年革命的、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如扎斯金克尔的《1848年法国革命》（莫斯科，1948年）、卡恩的《1848奥地利和德国革命》（莫斯科，1948年）、别列兹尼亚科夫的《1848—1849年多瑙河两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基什涅夫，1955年）、阿维尔布赫的《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莫斯科，1965年）、乌达里卓夫的《1848年捷克民族政治斗争简史》（莫斯科，1954年）、尼方托夫的《1848年的俄国》（莫斯科，1949年）、鲍爵姆金、莫洛克主编的《1848—1849年革命》两卷集（莫斯科，1952年）和《纪念1848年革命一百周年论文集》（莫斯科，1949年）等一系列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都是研究各国保存的档案资料、革命同时代人的著作、回忆录和发掘的史料，并力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论述这次革命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所以，这些著作的史料是比较丰富、观点是比较正确的。

在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鲍爵姆金、莫洛克主编的集体大型著作《1848—1849年革命》。它是苏联历史学家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不仅在苏联的历史编纂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直至目前，在当代各国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编纂学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部著作的特点是：以历史事实纠正了资产阶级史学家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一些歪曲和伪造；扩大了1848年革命的界限和画面，不仅写了欧洲主要国家法、德、意、奥等国的革命，而且还写了捷克、波兰、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匈牙利、布科温、比利时、西班牙以及斯堪地那维亚半岛诸国的革命运动。

这部著作的最主要的观点如下：

（一）这部著作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1848年革命的真实原因、阐明事变的过程、分析阶级力量的配置及其对比关

系的变化、说明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二)从马列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这部著作的作者认为,不论1848年1月2月和3月在欧洲开始的革命运动,其结局如何不同,但在柏林和布拉格,在布达佩斯和哥本哈根,在布鲁塞尔和克拉科夫,人民群众都普遍地发动起来了。在革命的进程中,人民群众考验了自己的力量,检验了各自的思想家的理论和革命领导人的斗争策略和纲领。所以,这部著作的作者认为,不论某些国家的革命失败是如何惨重,不论革命者的鲜血汇成巨流,或者成千上万人在革命中失去亲人和幸福的家庭,但是,人民群众和各个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所受到的直接教育却是无法比拟的。

(三)这部著作对资产阶级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作了具体的分析。这部书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起的作用。对匈牙利革命者科苏特、裴多菲、坦契奇,罗马尼亚的革命者伯尔切斯库、波兰的革命者贝姆等人的革命活动给予了高度赞扬,正确评价了这些革命者的功绩和错误。对资产阶级自由派妥协、叛卖和反革命进行深刻地揭露。这部著作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工人阶级在有些国家里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自由派反人民、反革命的实质不仅在发生了革命的国家里暴露无遗,甚至在只出现昙花一现的人民骚动、工人起义和农民起义的国家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革命实质也表露得十分明显、十分充分。无论在法国、普鲁士、意大利,或者在爱尔兰、捷克、塞尔维亚等国,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毫无例外的背叛了革命。书中还对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作了详尽的分析。作者以丰富的历史事实,论证了恩格斯关于小资产阶级政治作用的论述,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畏首畏尾、躲躲闪闪,好唱高调、好说大话和软弱、妥协、摇摆不定的阶级局限性。在1848年法国革命中,小资产阶级赖德律·洛兰对于议会的盲目信任,断送了小资产阶级本身。在1848年意大利革命中,小资产阶级

民主派的领袖马志尼在对反革命斗争中的软弱无能,极大的危害了革命。在1848年英国,小资产阶级惊慌失措地退出了宪章运动。根据对上述史实的分析,作者认为,在这次革命中考验了小资产阶级。

(四)这部著作较正确的评价了1848年革命中的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如对加里波的、马志尼、拉马丁、路易·勃朗、卡芬雅克、帕拉茨基和布朗基等人的评价是客观的,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尽管这部著作比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这次革命的论述高出一筹,但是它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其主要缺点是:

(一)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德国革命中发生的革命事件割裂开来了,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次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是无产阶级的领袖的论述不够充分。

(二)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阐述得不够完满和明确。例如,在法国革命的几章中,没有谈到农民的作用,没有说明资产阶级把农民争取到自己一边与无产阶级相对立,孤立无产阶级的手法。在论述奥地利的几章中,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作用也没有提及。

(三)对于1848年波兰民族独立运动的论述不够正确。如把1848年波兰革命仅仅看成是法国和德国革命的反映。事实上,波兰革命的爆发是波兰已具备了爆发革命的社会前提,是波兰经济发展、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总的来说,这部著作是目前各国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的一部大型著作。它为后人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较为正确的观点。

第十二章 1848 年欧洲革命 在中国的反响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反响

1848 年欧洲革命爆发之时，正是中国道光 28、29 年间。这时，清朝统治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英国用暴力打破中国的大门之后，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在资本主义的强力驱使下，开始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漩涡之中，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代表新型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开始出游西方。其中中国近代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出游西方后，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 1848 年欧洲革命。

康有为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的论述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会首领。1847 年，他 17 岁时开始接触“西学”。1882 年，他在上海时阅读了江南制造局译书所出版的各种西学书籍，开始研究西方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从 1888 年起，他 7 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光绪皇帝也曾希望他和谭嗣同等人能够成为辅佐他维新定邦的马志尼和加富尔。1904 年初夏，康有为乘船经印度入地中海，作欧洲 11 国之游。康有为说，他的 11 国之游是为“遍尝百草”，寻找医治中国沉疴的“神方大药”。

但是，这时康有为已经从改良派滑到了保皇派。在出游欧洲 11 国之前，康有为已经占到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相对立的立场上了。为了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相对抗，康有为发表了他的《答南北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遭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严厉批判。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康有为开始了他的欧洲 11 国之行。他的主要目的虽是寻找“神方大药”。但是是寻找保皇派医治中国的“神方大药”。他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的目的是“用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和现实，来论证立宪有利进化，革命带来破坏的道理”，进一步和革命派论战，以扩大保皇派的思想影响。

欧洲 11 国之行归来后，康有为写成了《意大利游记》和《法兰西游记》。

在《意大利游记》中，康有为将中国与意大利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北欧各国，皆胜于我。意国与我国平等相类”。在“意大利沿革”一节中，康有为说明了意大利的变迁，论述了 1848 年欧洲革命前夕的意大利。康有为写道：“当拿破仑盛时，胜澳（奥地利），得意大利之北部，以乾隆六十年，于美兰（米兰）戴伦巴多（伦巴底）王冠，而为意王。及拿破仑败，维也纳会议归旧地，意诸小国复归于澳。而意人多愤其压制，欲合为一国以拒澳。道光二十八年，法革命再起，伦巴多、斐呢士（威尼斯）起而抗澳。罗马尼亚教皇而放之，萨蒂尼（撒丁）王阿尔培（阿尔伯特）主民政而自立，北部各邦从之，皆背澳矣。

逾年，法人以兵戍罗马，复教皇位。各邦畏之，不敢动。惟萨蒂尼王伊曼奴核（伊曼纽尔）第二，先立宪政，人心皆归之。”^①

在这里，康有为虽然没有详尽地论述 1848 年意大利革命，没

^①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71 页。

有提及革命爆发的原因是反对本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与剥削，但是，他阐明了 1848 年革命前夕，意大利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并正确地指出，在 1848 年意大利的伦巴底和威尼斯革命爆发的原因是意大利人不愿受奥地利的统治与压迫；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奥地利的统治，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国家。同时，康有为还简明扼要地叙述了罗马人民反抗教皇，并成立了罗马共和国以及法国武装干涉共和国，教皇复位的历史。康有为所阐明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对历史的叙述也是客观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作出这样的分析也是可贵的。但在“先立宪政，人心皆归之”一句中明显是暴露出了他拥护君主立宪的思想。

继《意大利游记》(1905 年)出版之后，他的《法兰西游记》于 1907 年 3 月 6 日又发行了。《法兰西游记》共分四个部分：(一)法兰西游记；(二)法国之形势；(三)法国创兴沿革；(四)法国大革命记。

在《法兰西游记》的“法国创兴沿革”部分的“法国与中国事势之异”和“拿破仑”两节中，康有为论述了自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后 82 年间法国的革命变革，其中涉及到了 1848 年法国革命的问题。

在“法国与中国事势之异”一节中，康有为在把中法历史作了比较之后，阐明了法国爆发革命的原因。他认为：“革命共和之事，不始于他国而必出于法者，以欧洲各国侯权甚大，群侯并强，民能小动一二，不能全动之也。惟法国削侯权夺侯土久矣，自路易十四后百余年，诸侯未闻有称兵作乱者，皆奔走后宫以希王宠。其小侯食邑，不满千户，几致饥寒，故尔时惟一王独尊耳。巴黎乱民，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围王宫，撤卫兵，而迁王于市……故革命共和所以独出于法者，即缘法尽收侯权之故也。”他又说：“及法第三次革命(指 1848 年革命——引者)，全欧几动，民心全易，而奥、普从之。故

革命共和之不起于奥、普者，即以强侯犹多故也。”^①

显然，康有为的这些观点是十分错误的。由于他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局限，他既看不到法国历次革命是法国政治、经济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看不到法国统治阶级的腐败和落后，人民群众的无权和悲惨状况。因而，他把法国爆发革命的原因归之为“削侯权夺侯土”之故。

在谈到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时，康有为写道：“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宰相禁民集会，出兵伍以弹压之。巴黎府民夜呼，结棚鸣钟，得数万人，遂迫王宫。王出奔。乱党横行，毁名胜为瓦砾，死人无数，又复见大革命之乱矣。

此二革命（指 1848 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引者），起于禁妄出书禁聚会，一夫夜呼，国王出走。盖巴黎民权之风，积久已成，一触即发。而法之君相，尚欲妄行威权，亦太不智夫。”^②

康有为不仅错误地论述了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爆发的原因，而且对二月革命过程的叙述也是不全面和不切实际的。他把革命人民和革命行动描绘得十分残暴，称革命人民是“乱党横行”，谓革命行动为“毁名胜为瓦砾”。在这里，不仅暴露了康有为反对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而且也表露了他对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畏惧和恐怖。不过他能看到巴黎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革命情绪，且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能指出法国统治阶级擅用职权的弊端。这也说明康有为是有一定的观察能力的。

为了论证“立宪有利进化，革命带来破坏”的理论，他对拿破仑三世改共和为帝制持赞赏态度。他写道：“于是拿破仑第三被选为总统，始誓行共和政。既得大权，三年，尽擒名士议员千人下狱，陈

^①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289—290 页。

^② 同上书，第 292 页

兵五十万，迫国人奉为帝。”^①显然，他是借此说明共和制是行不通的，纵然实行，也是半途而废。不仅如此，康有为对拿破仑三世称帝后的施政方针也十分赞赏。他写道：“拿破仑第三狡黠才术，其于内治，修堤防道路，实恤贫民新法，置工业学，积贮银行，亦有足取者。”^②

同时，康有为还站在保皇派的立场上，从反面吸取法国革命、包括1848年法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要求中国要以法国为鉴。他说：“盖巴黎误信自由已深，动行叛乱。八十二年间，大变数四。君主民主，举棋不定。即立宪法，政体亦已十次。其民死亡离散无数，为大地古今所未有。立爹亚为总统，至今七易。虽王党未尽，至今垂三十余年，政体少定，兵革不事，民保其生。以法国革命之事，所关最大，故详论述之以为鉴焉。”^③从康有为的这段论述中不难看出，他是站在保皇派的立场上来总结历次法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他把法国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说成是“误信自由已深”；把法国82年间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视为“君主民主”之争，因此，他就不可能正确地评价法国革命，不可能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正是基于他的错误观点，他才要求中国以法国为鉴。说穿了也就是要求中国不要进行像法国那样轰轰烈烈的、足以摧毁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藉以维护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康有为对意大利，特别是对法国政治的考察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中国当时的保皇派来说，自然是一种“神方大药”，而对于中国的革命派来说，它却是一付含有毒草的“草

^①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92页。

^② 同上书，第292页。

^③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走向世界丛书》，第292—293页。此段引文中的爹亚(L. A. Thiers)现译为梯也尔。

药”。尽管如此，毕竟是他首先将 1848 年欧洲革命介绍到中国来。

梁启超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的论述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有力的代言人。梁启超在青年时代就是以“新兴气锐”的姿态，走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他的功绩之一是他用从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宝库中搬过来的武器，批判了中国的旧思想、旧风习。梁启超曾积极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对于封建专制的巨大优越性。但是，却又惧怕足以摧毁旧制度的革命狂飚和人民群众的暴烈行动，耽心西方所实行的共和政体不适合于中国。所以，他的思想和行动均回旋于矛盾之中。

1898 年秋，梁启超从守旧派的屠刀下逃脱出来，“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流亡到了日本。这是他第一次出游外国。在日期间，梁启超进一步加深了对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了解，进一步西化，也就是资产阶级化。从 1899 年至 1902 年的 4 年间，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主要文章就有 30 篇之多。他希望通过介绍西方近代思潮、政治理论、历史哲学和价值观念，以“陶铸国人之精神，冶炼国人之灵魂”。梁启超的 these 文章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使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清“大地万国”的历史和现状，梁启超特别研究和介绍了外国的历史和革命史，其中包括对 1848 年欧洲革命史的研究和介绍。在梁启超的 30 余篇主要著作中，就有两篇是介绍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其一是《意大利三杰传》，它介绍了 1848 年意大利革命；其二是《噶苏士（科苏特）传》，它介绍了 1848 年匈牙利革命。

梁启超之所以特别介绍和研究这两个国家的革命经验，主要原因为，在当时，意大利和匈牙利均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并深受奥地利帝国的压迫，其国情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相

类似。梁启超在其《意大利三杰传》和《噶苏士传》中都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欧洲近数百年。其建国之历史。可歌可泣可记载者。不一而足。其爱国之豪杰。为吾生平所思所梦所崇拜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建国前之情状。与吾中国今日如一辙者。莫如意大利。求其爱国者之所志所事。可以为今日中国国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杰。”^①又说：“吾侪专制之民也。故吾法专制国之豪杰。切于自由国之豪杰。吾侪忧患之时也。故吾崇拜失意之豪杰。甚于得意之豪杰。吾乃冥求之于近代史中……噶苏士者。实近代一大奇人也。其位置奇。其境遇奇。其事业奇。其兴之暴也奇。其败之忽也奇。要之。其理想、其气概、其言论行事。可以为黄种人法。可以为专制国之人法。可以为失意时代之人法。”^②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说明了他写这两篇文章的目的，而且也抒发了他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他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他因壮志受挫，理想不能实现而失意的心情。

梁启超对于世界的认识，比起王韬等人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梁启超看来，“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完全在于是否能适应“变”这个规律。这说明梁启超已经有了辩证观点和比较明确的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观点。正因为他具有辩证的和进步的观点，所以他能够揭示出1848年欧洲革命，特别是意大利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爆发的深远历史背景，并能把意大利革命、匈牙利革命和巴黎二月革命有机地联系起来；能够客观地评价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家的政治思想、政治纲领和斗争策略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能够明确地论述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能够辩证地阐明失败了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在这两篇文章中，梁启超首先揭示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深刻

^①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九号，一一——二。

^② 梁启超：《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载《新民丛报》，第四号，第31页。

历史根源。他写道：“维也纳会议既终。神圣同盟斯立。千八百十五年事也。当时拿破仑之风潮既息。各国君主务以镇压国民为事。俄普奥三帝创此会盟。誓相援助以防其民。”^①在这里，梁启超揭示了神圣同盟的实质。同时他认为，正是各国君主对国民的长期镇压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促进了革命的爆发。梁启超写道：“蛰雷鸣矣。风满楼矣。涛涌堤矣。积维也纳会议以来三十年之奇怨殊毒。乃孕成欧洲十九世纪第一大纪念之岁。实一千八百四十八年。”^②

接下去，梁启超便指出了各国已成熟的革命形势。梁启超认为，当时整个欧洲都处于“硝药满地。待火线而爆焉。洪涛齿堤。乘蚁穴而轰焉”的形势下。正是在这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下，“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一声霹雳。巴黎之第三革命起。”“巴黎二月之革命起。阿尔良（奥尔良）王朝统。一日轰毙。路易拿破仑当选为大统领。而第二次共和国出现。”^③巴黎二月革命胜利，“奥匈各国民党，所在蠢起。”意大利各公国，竭竿之兵，骤然而至。一场冲击着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立即席卷了整个欧洲。

梁启超欢迎这场革命的爆发，热情地讴歌这场革命的巨大威力和它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猛烈冲击。他写道，巴黎二月革命“流其王于英”。维也纳三月革命使“四十年来控纵全欧气焰赫赫炙手可热飞鸟不落之梅特涅。其潭潭府第。付咸阳之一炬。其融融妻孥。为王孙之乞食。抱头鼠窜。孑身夜遁于英国。其前此所以炮烙千万之志士者。今乃请君入瓮。绳还自绳。”^④佩斯三月革命使“奥王而番民族之趋势。因舆情之顺潮……许匈加利以自治权”^⑤。意大

① 梁启超：《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载《新民丛报》第四号，四。

②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载《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五。

③ 同上。

④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五。

⑤ 梁启超：《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新民丛报》第六号，八。

利诸公国的革命运动先后迭起。西西里人和伦巴底人“拔剑以环王宫。顽固倔强之弗得南(斐迪南)。遂不得不颁宪法以救眉睫。米亚蓝俾尼士(米兰、威尼斯)诸地。相率屏逐梅特涅之傀儡。创建共和国。……新意大利之幻影。忽有从大白地涌起之观。”^①梁启超对这场革命的赞扬和歌颂的态度，正是表达了他希望在中国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改革的理想和愿望。

梁启超不仅阐明了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的原因，为巴黎二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而欢欣鼓舞，而且把巴黎二月革命看作是震惊欧洲大地的春雷，是点燃各国革命运动的火种。他把起推动作用的巴黎二月革命同匈牙利革命、意大利革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有机地联系起来，把1848年欧洲革命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各个国家的革命都是1848年整个欧洲革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他在论述1848年匈牙利革命和意大利革命之前，首先论述了欧洲革命的总形势和它爆发的原因。

梁启超对1848年匈牙利革命爆发的原因的论述就更为详尽了。他首先阐明了奥地利统治者梅特涅对匈牙利残酷的民族压迫与奴役。梁启超认为，梅特涅是一个“绝世之奸雄”，他“外之操纵列邦。内之压制民气”。而对于匈牙利之民权，则“摧陷殆尽。水深火热”。^②接着，梁启超便列举了奥地利对匈牙利所犯下的罪行。他写道：“宪法者匈加利(匈牙利)各种法律之源泉也。不经议院之承认。而妄布法律。是奥国政府之专横者一也。千八百二十五年以来。七年之间不开国会。是政府怠慢之罪二也。农工劳力者。国民之神圣也。今殆以奴隶视之。毫无保护。是谓厉民三也。选举权者。天赋权也。成年之民。皆当有此。而妄加限制。侵害自由四也。国会不许用匈加利语。而惟奖励拉丁语及日耳曼语。损匈加利之国

①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载《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五一六。

② 梁启超：《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载《新民丛报》第四号，四。

权五也。国文学不兴。学校不起。窒塞民智六也。内地工业为苛政所困。日渐衰颓。滔民死地七也。”^①在梁启超看来，正是奥地利帝国对匈牙利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梅特涅的暴政统治，激起了匈牙利的反抗。所以匈牙利国会要求“以大行改革。拯民疮痍”。可是“奥王方醉梦于专制之中。视新政如蛇蝎”。梁启超指出，奥地利政府不仅拒绝匈牙利国会的要求，而且对匈牙利的革命者施加压力，首先向威哈林(韦谢莱尼)开刀，“逮之下狱思以警其余”。梁启超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办法：“殊不知压力愈紧。则跃力愈腾。百新党演说于讲坛。不如一新党呻吟于牢槛。于是举国中革命！革命！！革命!!! 之声。撼山岳而吞河泽矣。”^②梁启超的这段论述是非常深刻的。

梁启超认为，正当匈牙利举国中革命之声撼山岳而吞河泽的时候，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和维也纳梅特涅垮台的喜讯，激发了匈牙利人民的革命豪情，点燃了匈牙利革命的熊熊烈火。梁启超写道：“爱独立尊自由之匈加利人受此影响。砰然若增万匹之马力。火焰万丈。不可复制。”^③匈牙利革命爆发了。

梁启超也同样深刻地阐明了意大利革命爆发的原因。梁启超认为，意大利革命形势的成熟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他说：“意大利自经玛志尼(马志尼)十数年大声疾呼热心训练以后。其国民之理想之气力。已非复前此之薄弱腐败。”“激昂之度。愈高愈烈。”而“意大利全国人。无贵无贱无贫 无富无老无幼。皆怀抱本于独立统一之决心。愈固愈剧。”梁启超认为，马志尼的宣传工作和革命组织工作，促进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觉醒，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斗志，从而出现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独立与统一的政治局面。而这种政治

① 梁启超：《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载《新民丛报》第四号，七一—八。

② 同上，第八—九。

③ 同上，第六号，四。

局面又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梁启超写道：“其秣马蓐食。为政治上秘密之运动者。比比皆是。于志那亚(热那亚)有学术会议。于卡萨尔有农业会议。实则皆政谈会也。”梁启超指出，正是日益高涨的人民的革命情绪和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的相互促进，使意大利的革命形势成熟了。梁启超描绘意大利的革命形势“殆如在弦之箭。持满而待发。如陵之爆。进星而欲轰。”^①

梁启超认为，“法国巴黎二月之革命。不特影响于匈加利而。”它同样也推动了意大利革命。梁启超写道：“当巴黎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意大利时，“意大利人立宪和平之思想。忽飞向九霄之外。革命运动。自村而村。自落而落。自市而市。自州而州。自国而国。斩木之旗。揭竿之兵。骚然矣。”^② 1848年意大利革命势如破竹，迅速展开了。

梁启超能够如此深刻地揭示1848年欧洲革命、匈牙利革命和意大利革命的历史远因和近因，并能揭示出它们内在的联系，这是与他深入研究和全面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分不开的。同时，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启超对这场迅猛异常、势不可挡的革命运动的极大同情和热烈赞扬；对封建统治者的无比仇恨和他们可悲下场的辛辣嘲笑。在当时，梁启超能够如此鲜明地表达他对革命与反动的爱与憎，确实是十分难得的。事实上，梁启超对欧洲革命与反动所表达的这种爱与憎，正反映了他对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奴役的满腔仇恨，他对祖国独立自强的殷切期望。

在论述匈牙利革命和意大利革命的进程中，梁启超分析和研究了各革命派别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纲领和活动，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

梁启超认为，当匈牙利处于奥地利的“专制政策日进日甚”的

①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二一三。

②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五。

情况下，“奥王实匈加利之公敌也。”因此匈牙利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奥地利的统治，争取匈牙利的独立。梁启超就是根据对待匈牙利民族独立，对待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来划分当时的政治派别的。梁启超说：“当时匈加利政界分三党派。一曰温和党。沙志埃（克劳乌扎尔·加波尔）为之魁。二曰急进党。噶苏士为之魁。其三则社会党也。温和党之主义。务与奥政府联络。徐图改良。社会党之主义。务破坏现时之文物制度。各行其新理想。惟噶苏士一派。别出机轴。即尽其力之所及。提出种种法案。迫政府以实行。若其不省。及更出他途。非万不得已。不用破坏手段也。以故此派常能调和于温和社会两党之中。使全国一致。”^①梁启超所说的社会党，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政党。梁启超对当时匈牙利党派的划分及其政治主张的论述是正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

梁启超不仅准确地划分了匈牙利革命中的不同派别，而且指出了派别之间的根本分歧及其根源。梁启超认为：“盖沙伯者贵族也。实行之经世家也。其所务者，以温和手段。易俗移风。”而科苏特家“系非贵族”，他“具如电之目光。抱如焰之血诚。深有见夫民族主义。为立国之本。久怀一匈牙利独立之大理想于其胸中。其不能以沙伯所设施而踌躇满志。亦势使然也。”^②

梁启超不仅看到了各派之间的分歧，而且也看到了它们之间的斗争及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他认为。当“匈加利之荣光名誉。洋溢于五洲。而独立灭亡。争机于一发”之时，派别之间的斗争，无疑削弱了匈牙利的革命力量。在梁启超看来，在匈牙利民族独立战争中，古鲁家（戈尔盖）和科苏特二人，“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匈牙利千余万之生灵所齐托命也。使其始终一心。互相提携。则国之前途。泱泱哉未艾也。何图昊天不平。两雄相辄。当此暴风横雨

^① 梁启超：《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新民丛报》，第六号，三。

^② 梁启超：《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新民丛报》，第四号，七。

交集之日。忽为龙跳虎斗内溃之形。读史至此，谁不顿足痛哭。为匈加利国民欲千秋之遗恨也。”^①梁启超为匈牙利革命阵营的分裂而痛心不已。

在科苏特与戈尔盖的斗争中，梁启超明确地表示他站在革命的代表者科苏特一边，而对于叛徒戈尔盖，他则视若仇敌。梁启超以爱慕的心情歌颂了科苏特的功绩，称他是“为国民伸其自由的豪杰”，“近世一大奇人”；歌颂他是对敌斗争中的“不惧于疾风的棱棱劲草”，“不损于凡鸟的莽莽神鹰”；赞扬他用兵的雄才大略；认为科苏特“其理想。其气概。其言论。其行事。可以为黄种人法。可以为专制国之人法。可以为失意时代人法。”^②梁启超认为，就是匈牙利革命失败以后，像科苏特这样的革命者仍然受到人们的敬重。当他流亡到土耳其时，土耳其人“待之如上宾”。1851年科苏特到美国时，“各地欢迎者。争先恐后”。当他游历英国时，“其受欢迎。一如美国云”。科苏特以民族英雄的称号载入史册。

梁启超对于戈尔盖的变节叛卖行为十分痛恨。梁启超认为，在革命进程中，“古鲁家自负劳苦功高。骄盈殊甚”。而且往往“竟不能践其言”。梁启超更耻于戈尔盖的叛变。他认为：“古鲁家之怀贰心久矣。”称他是断送匈牙利革命的“一贱丈夫”，“是公敌之功狗也”，戈尔盖在国民面前所演述忠愤之词。以欺饰耳目。“实乃私通款于奥俄军中。卖国以图自免。”^③在梁启超的眼中，历史上的任何叛徒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当然戈尔盖也不例外。梁启超在叙述他的可悲下场时写道：“自耻其无面目以见匈人也。乃退匿奥国之一田舍。奥迁给以岁俸六万终其残年。所至受村落之侮蔑。郁疾以死。”^④

① 梁启超：《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新民丛报》第七号，八。

② 梁启超：《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新民丛报》第四号，二。

③ 梁启超：《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新民丛报》第七号，十。

④ 梁启超：《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新民丛报》第七号，十四。

梁启超对科苏特与戈尔盖的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梁启超同样以对待革命任务的态度划分了意大利的政治派别,阐明了它们的政治主张。他说,在意大利革命中分为三派:“其一则玛志尼派。专欲以共和理想组织新国家者也。其一则加富尔派。欲凭藉撒的尼亚国以行其志者也。此外复有一派。名曰尼阿布奇克。欲戴罗马教皇以联合全意者也。”^①他认为,这三个派别在爱国热情方面,在争取意大利统一和独立方面,都是一致的,所不同者是它们的政治主张不同,斗争的手段不同。梁启超在揭示各政治派别的异同时,着力披露了马志尼派和加富尔派之间的根本矛盾和难以调和的对立。梁启超认为,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是由于它们的政治主张不同,斗争手段的各异所造成的。他指出:“玛志尼主共和政体,故欲于独立之后。代表国民多数之意见。置大统领以行主权。”而加富尔认为,共和制是行不通的,如果实行共和制,“则已毁我撒的尼亚国。夫撒的尼亚者。今日意大利独一无二之凭藉也”^②。因此,“加富尔既不肯弃所凭藉以从玛志尼。玛志尼亦不肯枉其所信以从加富尔。于是两雄不得不立于相对之地位以始终”^③。梁启超对于马志尼与加富尔自始至终的相互对立,不能为民族独立与统一共同合作而深感惋惜。

梁启超高度赞扬了马志尼与意大利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爱国主义精神。梁启超说:“无意大利则玛志尼忧。有意大利则玛志尼乐。彼心目中惟有意大利。”^④同时,梁启超认为马志尼提倡革命的思想是正确的,因为“无革命之论。则立宪终不可成。通观今世界之立宪君主国。何一非生于革命风潮最高点之时代也。”在梁启超看来,马志尼的政治主张虽未能实现,他所领导的1848年革命

①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一。

②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三。

③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三—四。

④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十五号,二。

也遭到失败,但是,马志尼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却为后来意大利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他认为:“论意大利建国之功首必推玛志尼。天下之公论也。玛志尼耕焉。加富尔获焉。”^①

梁启超在高度评价马志尼的同时,还极力赞扬了加里波的的革命活动。梁启超说,1848年意大利革命爆发时,在南美饱经战火锤炼的加里波的,早已渴望返回祖国,献身于祖国的独立与统一事业。所以,当加里波的得知意大利革命爆发时,便排除一切困难,立即返回米兰,不久与马志尼一起转战罗马。梁启超认为,正是在罗马充分显示了他们的领导才能和组织作用。他们是在罗马处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时进入罗马的,但是“玛志尼和加里波的两雄。既入罗马。运动不一月。而新罗马共和国成立。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九日,结集国会。宣告独立”^②。梁启超不仅以历史事实说明了加里波的的领导才能,而且着力描述了他在罗马保卫战中的英雄气概。罗马共和国成立不久,庇护九世便勾结法国,妄图扼杀新生的共和国。梁启超认为,在罗马保卫战中,充分显示了加里波的的作战才能。为抗击法军入侵,“加将军万死不顾一生。挥刀叱咤。突入敌营。师子奋迅。毙敌无算。”^③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马志尼为了加里波的安全,“以急使銜国会之命召还之。”“加里波的入议场。鲜血淋漓。胃铠铨赤。既折既缺之刀。插半鞘而未入。”^④尽管加里波的及其所率领的军队顽强奋战,终因寡不敌众,罗马共和国被法军扼杀了。梁启超热情地讴歌了罗马共和国保卫战,赞扬了加里波的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气概和对祖国一片赤诚的爱国精神,较客观地评价了加里波的在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①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十五号,二一三。

②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七。

③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九。

④ 同上。

梁启超在这两篇文章中还论述了这两个国家革命失败的原因。在谈到匈牙利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梁启超认为,奥地利利用民族矛盾,挑起匈牙利内乱,是匈牙利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梁启超首先分析了匈牙利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缺点是“合并许多异种之民以成国而无所统一”。同时,奥皇同意匈牙利自治并非本意,而是“迫于维也纳革命党内外之夹击。聊以此缓祸于眉睫耳。”而当本国革命被镇压下去之后,奥皇“心中之鬼域旋生”,“思以颠覆匈加利新政府”,而其疑覆之术,“乃谋煽动此法异种。自其内而戕之。”^① 在奥地利政府的煽动下,塞尔维亚人,“合同种九十四万以抗新政府”,“视马哥耶人(马扎尔人)为公敌”;紧接着,“警报续至。曰庇纳省叛。田杜兰斯哇省叛。曰撒逊叛。曰苏格拉和尼亚人叛。”^② 这样一来,就削弱了匈牙利的革命力量,使奥地利反动派有可能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镇压了各民族的解放运动,最后也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梁启超沉痛地写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③

梁启超认为,奥地利统治集团勾结沙皇俄国,组成联军,镇压匈牙利革命和革命内部分裂,戈尔盖的背叛,是革命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梁启超说,匈牙利民族政府发表独立宣言后,奥地利政府对此“且羞且愤。一面派大军于匈加利。一面重赂俄迁。乞师助剿。俄皇因以为利。发兵十三万。于三十万之奥兵联合。为蹂躏匈加利之计。”^④ 沙皇俄国出兵后,匈牙利腹背受敌,梁启超认为,“众寡悬绝。既已太甚。此匈加利千钧一发之时也。”^⑤ 正当大敌当前,匈牙利存亡危在旦夕的形势下,革命阵营内部以戈尔盖为代表的投

① 梁启超:《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新民丛报》第六号,八—九。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七号,十一。

④ 同上,第七号,六。

⑤ 梁启超:《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新民丛报》第七号,八。

降派，拒不执行科苏特的作战计划，并与奥俄联军勾结，“览降幡于军门。格拉布加(克拉普卡)。独立不支。寻亦屈节。于是匈加利遂亡。”^①

梁启超对奥俄的出兵镇压和戈尔盖的叛变投降义愤填膺，对于匈牙利的失败和科苏特的下场痛心疾首。他以悲愤的心情记载下了奥俄联军对革命者肆意屠杀的悲惨景象。他写道：“奥俄军藉战胜之大威。大肆屠杀。自前首相巴治(巴蒂安尼)以下。凡匈加利政府重要人物。处斩处绞者不下数百。民间以嫌疑被逮夷戮者殆十余万。骨委为邱。血流成河。”而“豺狼之欲。水草之性”的俄国，“悉索纵横。殆无天日”。而匈牙利人民犹如“瘠牛羸豚。坐待卦割。性命倏蝼蚁。权利同弁髦。”梁启超对于匈牙利革命惨败的结局，非常痛心。他表述自己的心情说：“君子读史至此。未尝不废书而长恸也。”^②

梁启超认为，1848年匈牙利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这场革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写道：匈牙利“一兴一亡之大活剧。不过匆匆两年间事耳。而以此至短之日月。起至大之波澜。耸动全欧。永为历史上一大纪念。”

梁启超也以同样敏锐地洞察力，总结了意大利革命，主要是罗马共和国失败的原因。为了说明罗马共和国灭亡的原因，梁启超首先剖析了教皇庇护九世及其改革的目的。梁启超指出：“皮阿士者。野心家也。窃天下之风云。欲利用之以恢复百余年前教皇赫赫之权力。乃以目言结民望。改政体。颂宪法。开议会。声称与民同治。皮阿士之言。非真言也。”^③正是由于梁启超清楚地看到了庇护九世假改革的目的，所以他能够淋漓尽致地勾画出他在革

① 梁启超：《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新民丛报》第七号，十。

② 同上，十一。

③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一一二。

命运动兴起和罗马共和国建立以后的真实面目。革命运动兴起后，庇护九世便采取两面手法。他在“狐疑三思之后，卒宣言不加入国民运动。以媚奥地利（奥地利）。同时又举自由派之首领培志伯（罗西）使行升级。以媚国民。”^①而当罗马共和国成立，失去统治权时，庇护九世便“愤愤不自戢。思藉外国之力。以复其位。”于是庇护九世便摇尾乞怜于法国。梁启超认为，这时法国总统拿破仑三世正野心勃勃，“欲树威域外以固其位。攫此机会。以买本国教徒及军队之欢心。乃骤遣三万五千之大军。罗马城。”^②于是，罗马共和国被拿破仑三世颠复了。梁启超对罗马共和国兴衰史的论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具有卓见的。

梁启超在揭示罗马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时，还能够辩证地看待成功与失败的相互关系，能够从革命失败中看到它包含着成功的因素。他认为，正是罗马共和国的灭亡为后来意大利的统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他说：“短命之罗马共和国。既已殒逝。自其表面视之。”而“意大利之建国（指意大利统一——引者）。非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罗马定都时始。实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罗马陷落时始也。”^③梁启超对失败与成功的辩证论述是很精辟的。

梁启超以欣羨和敬仰的心情写下了《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和《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他以歌颂匈牙利和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为主题，较详细地论述了1848年匈牙利革命和意大利革命的原因、进程、结局和历史意义；记载了革命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革命事件；描绘出了资产阶级革命轰轰烈烈的壮丽画面。在这两篇文章中，梁启超既抒发了他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外敌凌辱的仇恨，又表达了他藉以激励中国人民的愿望。尽管这两篇文章中

①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一一二。

② 同上，第十四号，八。

③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民丛报》第十五号，一。

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和不妥之处,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不少可借鉴的观点。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 1848年欧洲革命的评述

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开始创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革命历史经验的热潮,并不断地向中国介绍外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藉以开阔中国人民的视野,增长中国人民的知识,启迪和激发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在这个时期,虽然更多的是介绍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但是,对于1848年欧洲革命史的介绍,同晚清时期相比,就广泛得多,深入得多了。在这个时期,不仅历史学家对1848年革命进行了介绍和评论,而且文学家也对它进行了描述与赞扬。

鲁迅的评述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介绍外国进步的文学。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已经开始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当时清王朝及当权的洋务派崇洋媚外。出卖祖国主权。洋务派打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破旗,推行野蛮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鲁迅便在介绍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方面,同洋务和保皇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07年前后,鲁迅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域外小说集》等几篇重要的论文,投入革命派对洋务派和保皇派的大

论战。《摩罗诗力说》介绍了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热情地讴歌了代表这种文艺思想的若干“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①的叛逆诗人(摩罗诗人),其中就介绍了匈牙利的裴多菲。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当中,鲁迅是最早介绍1848年匈牙利革命家和革命诗人裴多菲的人。

裴多菲一生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和革命行动是他领导了1848年匈牙利佩斯三月革命,用诗歌形式记录了这一革命事件,用诗歌鼓舞匈牙利人民参加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并亲赴前线,参加了1848年匈牙利民族独立战争,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具有政治内容和强大战斗力的诗歌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鲁迅之所以热爱和介绍“摩罗”诗人,是因为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②而在“摩罗”诗人当中,鲁迅介绍最多和经常提到,并引用其诗句的只有裴多菲一人。鲁迅特别尊重和仰慕裴多菲是因为裴多菲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者;裴多菲的诗歌凝聚着深厚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它像一把利剑划破了沉寂的匈牙利黑暗的天空,是从民族奴役和封建统治重压下发出的黎明前的呐喊;裴多菲在1848年匈牙利革命中的活动充分地显现出了他的高尚的品德、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宁死不屈的硬骨头精神。而鲁迅正是要用他的作品“反抗和叫喊”,用他的宁死不屈的硬骨头精神激励和鼓舞自己,也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去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是从介绍裴多菲参加1848年匈牙

①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8页。

② 《鲁迅全集》第1卷,第99—100页。

利革命开始,介绍了他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和他的战斗性的诗歌。鲁迅认为,从1848年起,裴多菲的诗歌才具有明显的政治内容,并以诗歌为武器来鼓舞匈牙利人民参加战斗。鲁迅写道:“四十八年始,裴彖飞(裴多菲)诗渐倾于政事。”“是年三月,澳大利(奥地利)人革命报至沛思德(佩斯),裴彖飞感之,作《兴矣摩迦人》(实为《民族之歌》)一诗,次日诵以徇众,至解末迭句云,誓不复为奴!”^① 鲁迅认为,裴多菲的这首诗具有很大的威力,它调动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激发了他们的斗争意志,所以在裴多菲的诗歌朗诵以后,“则众皆和,持至检文之局,逐其吏而自印之,立矣其毕,各持之行。”鲁迅说:“文之脱检,实自此始。”^② 在这里,鲁迅看到了裴多菲诗歌的巨大感召力和革命威力。

1848年欧洲各国的共同革命任务是打击封建专制制度的堡垒和欧洲宪兵沙皇俄国。鲁迅当时把东欧作家对待沙皇的态度,作为衡量作品的准绳,这是非常正确和有见解的。鲁迅正是把裴多菲作为一个抗俄英雄加以介绍。鲁迅认为,裴多菲酷爱自由,真挚地热爱着祖国。当匈牙利面临着俄奥联军的进攻时,“诗人知战争死亡且近,极思赴之。自曰,天不生我于孤寂,将召赴战场矣。吾今闻

① 《鲁迅全集》第1卷,第98页。

② 《鲁迅全集》第1卷,第98页。

得角声召战，吾魂儿欲骤前，不及待令矣。”^①在这里鲁迅生动的描述了裴多菲迫不及待奔赴战场的心情。鲁迅赞扬他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奔赴前线的爱国主义思想，自觉投身于革命洪流的献身精神。鲁迅敬仰他不为恶势力所驱使，不为强暴所压倒，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战的高尚情操。当裴多菲在战场上牺牲时，鲁迅认为，裴多菲为这场正义的1848年匈牙利民族独立战争而献出年轻的生命是值得的，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鲁迅说：“平日所谓为爱而歌，为国而死者，盖自今日而践矣。”^②鲁迅对裴多菲在1848年匈牙利革命和民族独立战争中活动的肯定与赞扬，也就是对这次革命和战争的同情和赞成。

同时，鲁迅还对参加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波兰将军贝姆作了准确的介绍和评论。鲁迅介绍说：“贝谟(贝姆)，波兰武人，千八百四十八年之役，力战俄人者也。对轲苏士(科苏特)招之来，使当脱兰希勒伐尼亚(特兰西瓦尼亚)一面。”^③

在这篇论文中，鲁迅对裴多菲和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由于他受到匈牙利文学史家里泰尔·符利捷的观点的影响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的某些影响，因而鲁

① 《鲁迅全集》第1卷，第98页。文中鲁迅引用裴多菲诗句，出自裴多菲的抒情诗《我梦见流血的日子》第二节。此节现有两种翻译。一为兴万生译，一为孙用译。孙用译为：《我渴望流血的日子》，兴万生译为《我梦见流血的日子》。

孙译为：快要响了，快要响了，

战争的光荣的军号！

我渴望着，不久听到

那作战的高声大叫。

见孙用译：《裴多菲诗选》第74页。兴译为：已经响了，已经响了，

战场上高叫的军号

我喧嚣的心灵等待着。

那信号，战斗的信号

见兴万生：《裴多菲评传》第381页，注②。

② 《鲁迅全集》第1卷，第98页。

③ 同上。

迅就看不到劳动人民是 1848 年革命的主力军,在对裴多菲的全面认识和对 1848 年匈牙利革命和民族独立战争的评价上受到一定的局限。

鲁迅不仅自己介绍裴多菲,而且还把他人论述裴多菲的文章和裴多菲的诗歌介绍到中国。1908 年他在《河南》月刊第七期上发表了她的译文《裴彖飞论》^①(籁息著)。他亲自翻译的诗歌五首^②,先后发表在 1925 年 1 月《语丝》周刊第九期和十一期上。这虽然是几首短诗,但是它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鲁迅除自己翻译裴多菲的诗歌外,还极力鼓励他人,如白莽等人翻译裴多菲的诗歌,并把白莽翻译的《彼得裴(裴多菲)·山陀尔行状》发表在他主编的《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五号上。

30 年代初期,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开始了反革命的军事“围剿”,而且也残酷地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对世界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和翻译工作者横加摧残和迫害。他们查禁书报。封闭书店,竭力阻止世界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就是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鲁迅不顾个人安危,为孙用翻译裴多菲的《勇敢的约翰》(《雅诺什勇士》)的出版和校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鲁迅不仅对这首长诗的译文逐字逐句的校正、修改,而且亲自同各书局联系。出版事宜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出版界和书商图谋重利,进步书籍难以出版的情况下,鲁迅毫不畏惧和气馁,仍为裴多菲长诗的出版四处奔走。鲁迅认为:“作者是匈牙利大诗人,

① 《鲁迅译文集》第 10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 页。

② 《鲁迅译文集》第 10 卷,第 734—736 页。

这五首诗歌为:《我的父亲和我的手艺》(应译为《我的父亲和我的职业》)、《愿我是树,倘使你……》(应译为《我愿是一棵树……》)、《太阳酷热的照着》(应译为《谷子成熟了》)、《坟墓里休息篇》(应译为《坟墓中安息着我初恋的情人》)、《我的爱,一并不是》(应译为《我的爱并不是》)。见兴万生:《裴多菲评传》,第 382 页。

译文又好”^①，“恰如得到一种奇珍”^②，“倘使这从此湮没，万分可惜”。^③在各书局均不愿接受，出版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鲁迅决定“自行设法，印一千部给大家看看”^④。自1929年11月6日至1931年11月8日，经过长达两年之久的时间，如鲁迅所说，这部译稿“伴着我枯生，跟着我流离”，最终与读者见面了。如果不是鲁迅的苦心帮助，在旧中国，裴多菲的这部长诗恐怕真的要被“湮没”，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了。鲁迅为了向中国人民介绍裴多菲真是不遗余力。

鲁迅在介绍裴多菲本人和他的诗歌方面所作的工作，一方面培养、鼓舞和激励了中国青年一代，另一方面也渗透着他对诗人及其诗歌的钦佩和仰慕之情。鲁迅曾经说过：“我向来原是很爱裴多菲的人和诗的。”^⑤

由此可见，鲁迅对1848年佩斯三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这次革命的忠实记录者裴多菲的评价是肯定的。他不仅高度赞扬了裴多菲的战斗生活，而且特别歌颂了他在1848年匈牙利革命中的活动和贡献，以及他那充满青春活力和革命激情的诗篇。鲁迅对裴多菲的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准确的。对于裴多菲来说，这些评价也是当之无愧的。

茅盾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论述

茅盾原名沈雁冰。他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是“左联”时期在创作上获得重大成就，并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位左翼作家，是努力提倡现实主义的一位重要文艺评论家。

①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3册，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74页。

② 鲁迅：《勇敢的约翰校订记》，《鲁迅全集》第8卷，第314页。

③ 同上。

④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3册，第217页。

⑤ 鲁迅：《勇敢的约翰校订记》，《鲁迅全集》第8卷，第314页。

茅盾从开始文学活动起，即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他除致力于翻译和介绍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外，对东欧、北欧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非常重视。

1921年，茅盾就开始写了《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刊登在《新青年》上。1922年，茅盾翻译了裴多菲的小说《私奔》，发表在这一年的《小说世界》第一卷第一期上。1923年，他又撰写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百年纪念》，刊登在《小说月报》上。在这两篇文章中，茅盾既介绍了裴多菲本人和他的诗歌，又介绍了造就他的那个伟大时代。

在这两篇文章中，茅盾首先介绍了裴多菲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主要是1848年匈牙利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茅盾认为19世纪40年代是匈牙利政治变革的时代，是匈牙利人民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是匈牙利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时代，而裴多菲正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他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并极大地影响了这个时代。

茅盾认为，“四十年代是匈牙利历史上极可纪念的时代；在政治方面有第二次革命军的蹶起，……匈牙利民族精神苏醒的喊声充满于那个时代的空间，由新希望产生的新活力在人人血管里流动。”^①而生活在这个社会大变革前夕的裴多菲，不仅为这个时代所培育，而且“他在这‘新理想’时代的漩涡中，不但做了那个时代苏生精神的记录者，而且做了指导者，他的杰作国家内便满含了将至的革命底暗示。”^②沈雁冰称“裴多菲是匈牙利的爱国诗人，是匈牙利的民族诗人”。说“他的诗是非常的，他的人格和他的生活亦

① 沈雁冰：《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百年纪念》，载《小说月报》1923年1月号，第1页。

② 沈雁冰：《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载《新青年》第9卷3号，1921年。引文中“杰作国家”指《民族之歌》。

都是非常的!”^①

茅盾认为，在1848年3月14日维也纳革命的推动下，久已渴望独立和血管里流动着新活力的匈牙利人民立即感到谋求政治独立的时机到来了。他们在裴多菲《民族之歌》的鼓舞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占领了全市最大的印刷所，并且第一次未经过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而印刷了裴多菲满怀战斗激情的《民族之歌》。茅盾说：“此时匈牙利的革命运动已经是裴多菲所说的‘说话的时期已经过去，动手的时期已经到了’”^②。匈牙利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民族解放的战争开始了。

茅盾只用短短的几句话，就描述了裴多菲对待1848年匈牙利民族独立战争的态度，他对侵略者沙皇俄国的憎恨，他急欲参加革命战争的心情和誓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以及他在战场上的壮烈牺牲。茅盾写道：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以后，“裴多菲此时再不能伏在书桌上了！他生平的志愿是在军号怒吹声中死于战场，现在是机会了！”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裴多菲于“一八四八年十月投入邦（贝姆）将军营里。”在抗击沙皇俄国入侵的战斗中，裴多菲于1849年7月31日“在战场上被哥萨克兵所杀！”^③裴多菲在战场上献出他年轻的生命。裴多菲牺牲时年仅26岁。

茅盾在叙述裴多菲的牺牲时，引用了裴多菲的诗说：“在少年时死，死在战场上，为自由而战，既死后就葬在一个平常的坟堆里，

① 沈雁冰：《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百年纪念》，载《小说月报》1923年1月号，第1页。

② 沈雁冰：《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百年纪念》，《小说月报》1923年1月号，第3页。

③ 同上。

和一切为此神圣的缘故而死的人在一处。”^①茅盾认为，“这是裴多菲生平的志愿，现在可谓如愿以偿了。”在这里，茅盾论述了裴多菲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他非同一般人的理想。

在茅盾的笔下，一个匈牙利爱国者和革命青年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茅盾不仅如实地把裴多菲塑造为一个满怀强烈爱国热情的勇士，而且非常赞扬他的诗歌。茅盾说：“裴多菲的诗歌只有两个主要思想，一是恋爱，一是自由；他在他的一本诗集上题着的几句话是：

我一生最宝贵恋爱与自由，
为了恋爱的缘故，生命可以舍去；
但为了自由的缘故，
我将欢欢喜喜的把恋爱舍去。”^②

茅盾认为，裴多菲的诗歌是他的人格的自然的表现。他的“爱国心、友谊、恋爱、忿怒与政治的同情都热烈地表白在他诗歌中”。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心就像那有回声的树林，对着叫喊一声，会生出百个回音。”^③

茅盾认为，裴多菲的诗歌在1848年匈牙利革命中才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他的《民族之歌》、《把国王吊死》等都具有明显的战斗性。在茅盾看来，裴多菲的这些具有战斗力的诗歌并不是偶然写出的，它是裴多菲的世界观的反映，而裴多菲的世界观是托

① 沈雁冰：《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百年纪念》，载《小说月报》1923年1月号，第3页。此段译文孙用译为：

那里是我的尸体，收拾在一起，到了举行伟大的葬仪的日子，在那时候，唱着挽歌，又盖着战旗，神圣的全世界的自由啊！为了你，牺牲生命的那些英雄，都送到共同的坟墓中。（见《裴多菲诗选》，第80页）。

② 沈雁冰：《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百年纪念》，《小说月报》1923年1月号，3—4页。

③ 同上，第5页

根在平民主义的信念。^①正因为裴多菲说出了“平民”要说的话，发出了人民的心声，具有强烈的、生气勃勃的感召力，所以，茅盾说：“裴多菲的诗是青年的诗。凡读了裴多菲的诗，无有不激发起青年的精神的。他是一个匈牙利的爱国诗人，但是读了他的诗，看不见爱匈牙利的他，只剩下一个爱人类自由的裴多菲了！”^②茅盾不仅高度评价了裴多菲的革命活动，而且高度评价了他的诗歌。

但是，茅盾对于裴多菲世界观形成的论述是不全面的。他没有看到1848年匈牙利革命对诗人世界观形成的巨大影响。裴多菲思想的飞跃和世界观转变的根本原因是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战争。正是通过这场战争，才使他认识到自由思想和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才使他更加渴望和追求“平等与自由”，要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实现，并同革命中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等坚决斗争。他同1848年匈牙利革命其他领导人，如科苏特、梅萨洛什、赖姆巴·米哈依等，在文学和军事等方面的论战，说明他的激进思想的发展，已经逾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界限，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色彩。

除了鲁迅、茅盾之外，白莽、冯至、孙用等人都向我国人民介绍这位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斗士。白莽翻译了奥地利文学史家德涅尔思的《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发表在1929年12月《奔流》上，并根据鲁迅的建议，又翻译了裴多菲的八首诗歌。冯至曾写过关于裴多菲·山陀尔的文章，发表在1923年《沈钟》第二期上，叙述了裴多菲坎坷不平的一生。孙用在鲁迅的启迪、关心和帮助下，根据世界语翻译和介绍了裴多菲的许多诗歌。他是当时向中国人民介绍裴多菲的诗歌最多的人。

^① 沈雁冰：《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百年纪念》，《小说月报》1923年1月号，第6页。

^② 同上。

史学界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的论述

在这个时期,史学界有不少人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辟专章专节论述了 1848 年欧洲革命。从 1923 年起,史学界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的介绍和评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而深入了。

史黎雯于 1923 年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发表了她的《法国工人运动史概略》,其中介绍了在 1848 年法国革命中,对工人影响极大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政治主张。

史黎雯在介绍路易·勃朗的政治思想时,着重介绍了他关于夺取政权的思想。他写道:“他以为非夺到政权后是不能实行这种组织的。所以他说:‘假使你们不愿意政权压迫你们,你们就把他夺过来罢;假使你们不愿意他阻碍你们,你们就把他拿来作你们的工具罢。’”^① 史黎雯认为,路易·勃朗所说的夺取政权并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独裁的意思”。他是要把政权交给“超越阶级利益的国民之中的最好分子”。而由这些人组成的新政府,应当控制铁路、矿山和银行。组织社会工厂,使人人都有工作。这样的政府“一方面成为国家生产之管理者,一方面使劳动者得到受劳动权之保证。”^②

在论述路易·勃朗的社会工场时,史黎雯认为,路易·勃朗主张“地主与工人可以联合在生产协社里,而由国家借给他们资本。”^③ 资本家也可以加入,若拿出资本,还可以得到一定的利息。史黎雯说:“总之,路易白朗(路易·勃朗)以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可以联合的。”在这里,史黎雯关于“地主与工人可以联合在生产协社里”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路易·勃朗只是主张无产

① 史黎雯:《法国工人运动史概略》,《新青年》,1923 年第 2 期,第 133 页。

② 史黎雯:《法国工人运动史概略》,《新青年》,1923 年第 2 期,第 133 页。

③ 同上。

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而没有提出地主的问题。

在论述蒲鲁东时,史黎雯说,蒲鲁东反对私有制,认为它是贫困的根源,但是,他并不反对小私有财产。蒲鲁东主张:“小生产可以把他的生产品拿到这银行里换得他需要的同价的生产品。同时银行又可以把钱无利息的借给工人,使他们能建筑工厂作坊等,于是地租利息等事自然而然就消灭了。”^① 史黎雯对蒲鲁东思想的简单介绍,基本上是正确的。

周鲠生在1927年出版的《近代欧洲外交史》和1933年出版的《近代欧洲政治史》,是这个时期比较详尽地论述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著作。

周鲠生在《近代欧洲外交史》第六章法兰西二月革命与欧洲一般革命运动,《近代欧洲政治史》第二编第三章“革命与反动”的第一节“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潮流”中,首先论述了1848年法国巴黎二月革命的影响和意义。周鲠生认为,1848年法国巴黎二月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整个动乱不安的欧洲都沸腾起来,到处都点燃了革命的烈火,使欧洲出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画面。周鲠生写道:巴黎二月革命的胜利,“登时激动久在不安状态之欧洲。革命运动急速蔓延于欧洲全部”。他认为:“受影响最大者为奥大利(奥地利)德意志意大利之三处”,而最关重要的是“欧洲反动政策之大本营,神圣同盟之乡土”奥地利所爆发的“三月十三日维也纳之动乱”。在周鲠生看来,“一时具有大势力,支配欧洲政治,而代表反对革命势力之政治家”梅特涅的倒台,“实为一重要的历史的事变:此事表示一个时代之告终,一个陈腐的政治制度之倾覆。”^② 正是维也纳三月革命的胜利和梅特涅的垮台的推动下,“三月十五日,匈牙利亦发生革命,要求人民的宪章及民族的自治;波赫米亚

^① 史黎雯:《法国工人运动史概略》,《新青年》,1923年第2期,第134页。

^② 以上引文均见周鲠生:《近代欧洲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81页。

(波希米亚)亦起而要求宪法及国民的责任政府;克洛特人(克罗地亚人)及其他斯拉夫人亦起而反抗玛加耳人(马扎尔人)之统治,谋脱离匈牙利之压制。”^①在这里,周鯁生描述了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兴起的画面。在奥地利,不仅受它压迫和统治的匈牙利人奋起反抗奥地利的统治,要求独立,而且匈牙利境内的民族也同样起来,要求摆脱匈牙利的统治。

其次,周鯁生又论述了在巴黎二月革命影响下而爆发的意大利革命和德国的革命运动。他写道:“在三月十五日教皇失却奥法两国之助力,亦不得不给其领地以一个宪法。三月十八日米兰革命发生,驱逐奥地利之驻防军;三月二十二日威尼斯效米兰之例起事,自行宣告独立的共和国;三月二十三日萨地尼亚(撒丁)王阿耳倍(阿尔伯特)认为意大利解放之时机已到,对奥地利王室宣战。”而在德意志“三月十五日叛乱起于柏林”,迫使威廉四世承认“施行立宪政治”,“赞成德意志于普鲁士主宰之下完全统一”,“允许召集德意志国民议会”。而“在巴威利亚(巴伐利亚)巴疑(巴登)萨克逊(萨克森)方面,民众势力亦战胜君主。”^②

周鯁生对巴黎二月革命的影响和意义的论述,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他把人民群众的起义和革命运动称之为“动乱”和“叛乱”则是十分错误的。

周鯁生对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浮浅的,片面的;论述是不正确的。他认为,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各处革命运动之首领及其党徒,皆是不解实行的理论家,于政事无真实的经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民主运动之性质是世界的普遍的,漠视一切民族的传习气质之差异,势必至与民族的光荣心相冲突;民族的光荣心则在千八百四十八年,较之自由运动

① 周鯁生:《近代欧洲政治史》,第181页。

② 周鯁生:《近代欧洲政治史》,第181—182页。

自身,更为有力的因素。”^①周鯁生所提出的这两个原因,显然是十分错误的,首先,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他不可能也不会对参加革命的各个党派及其领导人进行阶级的分析,区别其对革命的态度及其间的斗争,因而,他就一律斥之为“不解实行的理论家”。而他提出的第二个原因更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在1848年革命当中,反对本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运动和反对异族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这次革命的两个缺一不可的方面,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其革命任务必然是既反对本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又反对异族压迫,既争取民主自由,又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因此,争取民主自由的民主革命运动和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民族革命运动是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它是1848年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周鯁生却把它们对立起来,认为它们是相互冲突的,甚至把这种“冲突”说成是革命失败的原因。当然,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

但是,周鯁生在分析和论述各个国家革命失败的具体原因时,虽然很不全面,却也有可取之处。例如,他认为:“自由运动之失败于奥大利(奥地利)是因为玛加耳人(马扎尔人)与斯拉夫人彼此无同情。其失败于德意志,则因为统一德意志全土(包括德意志的奥大利)之要求与设立有力的中央代议政治之要求,难于融洽。其失败于意大利,则半因为地方的割据主义,半因为奥大利人不解意大利人之运动与他们自己的运动是同一的;奥大利人欲争自由,而同时不令其治下的人民脱离他们的支配。”^②至于匈牙利革命,“若不是匈牙利人对于克洛特人之要求自由决然拒绝,匈牙利之革命或可成功。克洛特人以不满足于匈牙利,转而与奥大利连结,助其破坏匈牙利革命。”而最终,“卒以俄国之派兵助奥,匈牙利叛乱乃被

① 周鯁生:《近代欧洲政治史》,第185页。

② 周鯁生:《近代欧洲政治史》,第185页。

打平。”^①在这里，周鯁生能够阐明民族间的不团结，压迫民族不能正确对待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的要求以及沙皇俄国的镇压，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说明他还是有一定的观察能力的。这些论述是正确的。

周鯁生对于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各国反动派又重新掌握了政权的论述，和复辟政权的统治与压迫较之以往更甚的观点是正确的。特别是他对1848年欧洲革命成果的观点是十分可贵的。关于遭到了失败的革命是否有革命成果的问题，这是为一般人所忽略了的问题。而周鯁生不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比较符合历史事实地论证了这个问题；他不但看到了1848年欧洲革命对于各发生革命的国家之深远影响，而且还看到了它对那些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之震动，使这些没有爆发革命的国家，也因1848年革命的威力而不得不进行某些民主改革。在当时，周鯁生能用辩证的观点对待失败的革命的成果问题，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周鯁生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国家工场和六月起义等问题的论述却是很错误的。

周鯁生认为开设国家工场是社会主义的试验，临时政府承认有工作权，让全国各地“好乱”的不安分子，离开他们的职业，齐赴巴黎，依靠国家供给维持生活。这显然是站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立场上讲话，这是资产阶级史学观点。事实上，临时政府所以同意设立国家工场，既不是进行社会主义试验，也不是承认工人有劳动权，而是为了分化无产阶级，企图通过国家工场组织一支无产者反对自己的队伍，使工人彼此对立，使工农之间对立，破坏社会主义的威信。

周鯁生对巴黎六月起义的论述更是错误的。他认为六月起义是工人的“叛乱”；把卡芬雅克的镇压说成是“统兵平乱”；把六月起

^① 周鯁生：《近代欧洲政治史》，第183页。

义的被镇压说成是“叛变卒被打败”。这种史学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在20—40年代,除史黎雯、周鯁生外,向中国介绍1848年欧洲革命史的还有文圣举、文圣律和冯品兰等人。

文圣举、文圣律的《各国革命史》主要介绍了1848年法国革命的原因、经过、影响和革命失败的原因,同时也对1848年奥地利革命、匈牙利革命、普鲁士革命和意大利革命作了简要的介绍。

他们二人比较详细地介绍了1848年法国革命的原因:一是“劳动阶级的不平”。二是“社会主义者的鼓吹”。三是“报界的不平”。四是“一般国民的不平”。他们指出,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法国人民大为愤恨,而政府对内采取高压政策,更加引起人民的反对。他们屡向政府请愿,要求用普遍选举法,直接由人民选出责任内阁,结果均遭政府拒绝,于是反抗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巴黎二月革命。

他们二人对1848年法国巴黎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虽然论述得不够全面,也不深刻,没有明确提出这场革命运动是法国政治、经济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没有明确提出七月王朝时期尖锐复杂的斗争,但是他们能看到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路易·勃朗和蒲鲁东思想对当时工人的影响以及七月王朝对内对外政策的不得人心,从而促使了革命的爆发。在当时能提出这些看法,是十分难得的。

冯品兰在其著作《法兰西史》中,简要地论述了巴黎二月革命的原因、经过和失败。他其中着重评述了路易·波拿巴。

在“拿破仑第三”这一节中,冯品兰首先分析了路易·波拿巴当选的原因。他认为:“路易拿破仑当选总统并非因其才能奇特,亦非为其声望隆重,徒以自维也纳会议以来法国国威一落千丈,使国民不时追怀拿破仑第一的功业,及当时的繁荣。其时法国政治家,利用此种心理,鼓吹崇拜拿破仑大帝,以为攻击政府的手段。政府亦迎合此风潮,将拿破仑的遗体,自圣赫勒拿岛移至巴黎,举行盛

大葬仪，并进而为达到自己目的，拥戴路易拿破仑为总统候选人，谁知此种策略，竟成事实。”^①

冯品兰对路易·拿破仑当选总统的原因虽然论述得很不全面，但是他却抓住了路易·拿破仑当选的重要原因。而且他明确指出，路易·拿破仑当选总统，既不是由于他的“才能奇特”，也不是因为他的“声望隆重”，而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冯品兰的这一观点是很可取的。

冯品兰认为，在路易·拿破仑当选总统后，因为他“内具野心”，以“拿破仑大帝自命”，欲恢复帝制，登皇帝位，便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分析形势的变化，寻找称帝的时机。冯品兰说，路易·拿破仑为了称帝，“一面竭力操纵各党，与军队官吏亦多方交好；一面巡行国内，遍问民间疾苦，以收拾民心”。而路易·拿破仑称帝的步骤是“先着手于宪法的修改，延长任期十年，限制选举权，国务大臣以亲友任之，箝制社会主义的言论机关，收揽中产阶级的信用；并与罗马教皇提携，以维持传统势力”。冯品兰认为，这样一来，路易·拿破仑便为复辟帝制作了充分的准备。此后，“法国大总统大权独揽，任命官吏，提议法律，宣战，媾和诸大权，均集於总统一人之手，事实已与皇帝无异”^②。1852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正式宣布法兰西为帝国，路易·波拿巴称帝，为拿破仑三世。冯品兰的分析和论述符合历史事实，是正确的。

同时，冯品兰认为，路易·拿破仑虽然称帝，法兰西虽然为帝国，但是帝国的实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他写道：“考帝国实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③冯品兰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这说明冯品兰的观察力是很敏锐的。他能够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看到事物

① 冯品兰：《法兰西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07页。

② 以上引文均见冯品兰：《法兰西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08—109页。

③ 冯品兰：《法兰西史》，第110页。

的本质。

在 40 年代以后至我国解放前夕,史学界介绍和评述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历史著作有:钱亦石的《近代世界政治史》、平心的《各国革命史》和程浩的《近代世界史简编》等。

钱亦石《近代世界政治史》的第六章《欧洲各国一八四八年革命》,论述了法国、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的革命运动。

钱亦石对七月王朝的阶级实质的认识比较正确。他指出:“法皇路易斐利布(路易·菲立浦)的政策,专门在保护金融资本家的权利。”^①对于法国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阶级成分、临时政府开设国家工场的目的和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意义等问题的认识,都较以前的史学家的观点进步得多,正确得多,基本上接近我们目前的观点。在论述临时政府的阶级成分时,钱亦石认为,临时政府的划分为:“阿拉格(阿拉贡)、莫洛、拉马丁属资产阶级温和派的代表;勒德律洛林(赖德律·洛兰)、佛罗康(佛罗孔)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路易布朗(路易·勃朗)、亚尔培(阿尔伯)则为劳动者的代表,可见临时政府是废除‘七月帝制’后各阶级之一种妥协,然相互间的矛盾是异常尖锐的。”^②钱亦石对临时政府阶级成分的分析,认为它是各阶级间的一种妥协的看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在论述六月起义时,他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六月暴动的意义,证明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了。”^③在这里,他暗示出六月起义是无产阶级起义。

在阐述 1848 年德国革命时,钱亦石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中的活动。他认为这两位革命家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们指

① 钱亦石:《近代世界政治史》,三联书店 1950 年版,第 213 页。

② 钱亦石:《近代世界政治史》,第 217—218 页。

③ 钱亦石:《近代世界政治史》,第 220 页。

导了民主派的《新莱茵报》和批评了法兰克福宪法。钱亦石对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8 年革命中的活动虽然阐述的不够全面,但是在这之前所有论述 1848 年欧洲革命史的著作中,他是第一次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次革命中的活动的。

钱亦石对 1848 年匈牙利革命的论述是较为详尽和正确的,而且他还运用了以前从未应用过的史料,提出了以前从未提出的观点。

钱亦石对 1848 年匈牙利革命与奥地利革命的相互关系,沙皇出兵镇压匈牙利的的原因和匈牙利革命失败的原因,都作了比较准确的、具有新意的论述。钱亦石认为,“其政治完全依赖奥国”的匈牙利革命与宗主国奥地利革命休戚相关。他说:“奥国军队消灭了伦巴底与威尼沙(威尼斯)的革命以后,马上转过炮口向匈牙利射击。”“可是维也纳的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及工人反对这种举动,千方百计的阻止军队的运输;这时他们明白,匈牙利被征服之后,马上要临到自己的头上来。”^①但是,维也纳十月起义没能阻止奥皇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

1849 年春,各国革命普遍遭到失败,“剩下的只有匈牙利。但匈牙利的独立给了沙皇尼古拉第一次极大的威胁,他感觉到匈牙利的独立必然震动俄国在波兰的统治,所以,愿意帮助奥国。”“到一八四九年夏天,俄国出征了,帮助奥国削平匈牙利革命。”^②钱亦石认为,匈牙利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当维也纳起义者被帝国军队围困时,“匈牙利人行动不坚决。且坐视维也纳被困而不加援手”^③;“贵族对于农民运动有些畏怯,同时又不能与欧洲民主派以及意大利革命势力联合,以致力量大减”;最后,尼古拉第一出兵二

① 钱亦石:《近代世界政治史》,第 231 页。

② 钱亦石:《近代世界政治史》,第 232—233 页。

③ 钱亦石:《近代世界政治史》,第 229 页。

十万助奥，匈牙利不能支持。八月休战，噶苏士逃亡国外，民众大受屈杀，匈牙利贵族所建立的共和国也倾覆了。”^①

总之，钱亦石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介绍和评述，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研究，比以往的研究和论述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平心和程浩是这个时期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论述和评价1848年欧洲革命的史学工作者。

平心在他的《各国革命史讲话》的“法国革命史部分”，以《1848年二月革命》为题论述和评介法国二月革命和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

平心运用新的历史资料较全面的论述了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他不仅阐明了基佐统治时期政治腐败，国内各阶级的普遍不满、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等国内原因，而且第一次提出了“一八四五至四七年因歉收引起了全国的饥荒再加上欧洲工业恐慌袭来法国”^②的重要原因。

平心对临时政府的阶级实质和对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分析和论述。较钱亦石的分析 and 论述更为全面，更为准确了。平心认为：“七月王朝推翻后，革命的胜利成果又落入资产阶级之手。而路易·柏郎（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之所以得加入政府，以及政府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完全是由于武装工人和广大的下层群众强硬要挟的结果。”^③平心还明确地指出：“他们（指工人阶级——引者）所要求的共和国不是简单的去掉君主就算数为少数人所有的共和国，而是废除剥削的社会共和国。……要求将三色国旗改为社会主义红旗。”^④平心的这些观点和对历史事实的论述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

① 钱亦石：《近代世界政治史》，第230页。

② 平心：《各国革命史》，上海光明书局1949年版，第109页。

③ 平心：《各国革命史》，上海光明书局1949年版，第110页。

④ 平心：《各国革命史》，上海光明书局1949年版，第110—111页。

平心着重分析了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原因。他认为,临时政府为限制工人运动而设立的国家工场,“表面上是收容失业工人,实际是要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并消灭工人群众中的社会主义影响。”为了达到孤立工人和消除社会主义影响的目的,“反动派就成天在国立工厂中的工人群众中宣传反社会主义,反路易·柏郎的思想,不但如此,政府为使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仇视工人,便一面增加平民的捐税,作为维持国立工厂的经费,一面宣传工人依赖政府而生活,只吃饭不会做事,于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对工人抱一种恶感,认为工人是吸吮他们脂血的寄生虫。由此工人阶级陷于孤立地位。”平心认为,在临时政府施展阴谋,陷工人阶级于孤立的情况下,工人决定再发动新的斗争。5月15日举行了15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但遭到失败。平心说:“五月十五日的事变说明,孤立的工人阶级无力冲破反动势力的压迫,资产阶级就更进一步对工人采取攻势。六月二十一日下令解散国立工厂,就是资产阶级最恶毒的挑战。”于是“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不能自由宁愿战死’,‘不得面包宁吃枪弹’的口号之下,举行绝望起义”^①。在这里,平心虽然没有明确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但是,他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论述了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原因,明确地论证了这场起义是资产阶级逼迫无产阶级发动的。

程浩在其《近代世界史简编》中设专章评介了1848年欧洲革命。这部著作的第四章是评介1848年法国革命的。

程浩在这一章的研究提要中,首先介绍了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特点。程浩指出:“自《共产党宣言》公布之后,法国的二月革命就爆发了。”他认为:“这次革命的爆发,仍然是工业资产阶级领导,亦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他却认为这次革命与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他指出:“由于

^① 以上引文见平心:《各国革命史》,第111—114页。

法国无产阶级之形成与发展,他不仅出现于历史舞台与资产阶级一块共同担负革命的使命,而且还站在革命的最前线来负担这一革命的事业。”因此,他认为,这次革命的主要特点是:“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的进程中,走上与资产阶级作第一次互争统治之伟大斗争,开辟了无产阶级斗争史上一个新的时代。”^①而且这次革命“异常急速的波动到全欧陆”,促进了各国革命运动,特别是奥、普、意诸国革命运动的爆发。

程浩以丰富的史料,具体的数字论述了1848年革命前夕法国的经济状况,并从经济发展入手,阐明了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与七月王朝的腐败统治之间的矛盾和不可调和性,以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化。指出这些矛盾和斗争即是法国革命发生的原因。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全面论述法国革命爆发的经济和政治原因,这在当时我国史学界还是第一次。

程浩根据马克思对1848年法国革命3个阶段的划分,较详尽地论述了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论述法国革命的第一时期(1848年2月24日至5月4日)时,程浩对“卢森堡委员会”和“真正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的论述是特别值得提出的。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示了“卢森堡委员会”的实质和资产阶级的阴谋。认为:“‘卢森堡委员会’无非是政府中资产阶级耍的一套妙把戏,目的在于把工人阶级的代表从政府中驱逐出去,藉以完成自己清一色的统治地位而已。同时,还在工人中可以散布这样的烟幕,仿佛政府是代表工人的,藉以缓和工人的斗争。工人阶级之受到这样的欺骗,也就刚刚证明路易勃朗主义——所谓‘劳动组织’学说的破产。”^②

同时,程浩还揭示了工人对社会共和国的模糊的认识。他说:

① 程浩:《近代世界史简编》,第211页。

② 程浩:《近代世界史简编》,第221页。

“工人所急切要求于共和国的什么呢？就是‘劳动权’，他们在路易勃朗主义的影响之下，以为政府能够保障劳动的权利，则工人生活地位就可以改善，在政府内部只要有劳动机关，则劳动权利然后才有保障。这大概就是‘社会’共和国吧！”^①

程浩认为，当法国无产阶级幻想成立“社会”共和国时，资产阶级已经在竭力巩固其统治，成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了。在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上，临时政府宣布解散，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式成立。程浩说，这个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清一色的政府，也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成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进到公开的斗争，同时这两个主要阶级的斗争也就真正走上法国历史的首位”。^②

程浩在阐述第二时期(1848年5月4日至1849年5月29日)时，重点论述了巴黎资产阶级六月起义的伟大意义。程浩认为：“六月暴动是失败了，然而它在革命史上，在工人阶级解放的运动史上，却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③在程浩看来，巴黎六月起义的历史意义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它是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着企图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第一次大流血的战争”；“第二，它打破了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以来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梦与幻想，使劳动者真正去了解：要解放工人阶级，只有靠工人阶级自身的斗争”；“第三，它又暴露了当时路易勃朗及其他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之破产”；“第四，六月暴动的失败，正是树下法国的以至欧洲的无产阶级将来胜利的基础”。^④

在阐述第三时期(1849年5月29日到1851年12月2日)时，程浩揭示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等各个派别

① 程浩：《近代世界史简编》，第220页。

② 程浩：《近代世界史简编》，第225—226页。

③ 程浩：《近代世界史简编》，第225—226页。

④ 程浩：《近代世界史简编》，第229—230页。

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着重论述了路易·波拿巴胜利的原因。程浩说，为什么1848年法国革命的结局是路易拿破仑政变与拿破仑帝国的成立呢？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第一，路易拿破仑的胜利是一切有产阶级联合起来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结果；第二，路易拿破仑的胜利是法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管理法国，至少在那个时候不能管理法国的结果；第三，路易拿破仑的胜利是资产阶级固然已经失去了统治权力，而无产阶级亦尚未得到这种统治权力的结果；第四，路易拿破仑的胜利也与拿破仑第一相仿，是法国保守的农民支持他的结果；第五，路易拿破仑的胜利是他那个国家统治权力强于革命势力的结果；第六，路易拿破仑的胜利，也是由于一八四九年，特别是一八五〇年，法国工业繁荣的结果。”^①程浩的这些分析和论述是深刻的、正确的。他不仅揭示了路易·波拿巴胜利的经济原因、政治原因，而且还指出了他取胜的历史因素。

程浩这部著作的第五章，专门论述和评价了1848年德国革命。他对1848年德国革命爆发的原因、革命的进程、革命的失败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的论述是非常详尽的。程浩根据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的观点，分析了1848年德国各个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阶级特征以及各阶级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历史地揭示了1848年德国革命的必然性，阐明了1848年德国革命的爆发是德国政治、经济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这一章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程浩对维也纳三月革命的特点和柏林三月革命的结果的论述；对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德国反动的揭露和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革命中的活动与策略的赞颂。

程浩认为维也纳三月革命的特点，第一，这次革命是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全民革命。第二，这种各阶级联合的革命内部是有斗争

^① 程浩：《近代世界史简编》，第241—247页。

的,同时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持久的。如果没有这种持久的各阶级的联盟,那么,奥国反动势力早已在五月就胜利了。第三,维也纳革命,充分证明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奥国在革命之前是如何的陈旧落后,反动统治是如何的顽强凶横,奥国在欧洲是如何被人视为野蛮无理,可是,由于各阶级联合而爆发了革命,由联合的相当持久而支持了革命,短短的时期内,就把奥国推到历史的前面。第四,维也纳革命中真正得到利益的是农民。根据普选制所召集的奥地利议会,农民代表占100席。会议上批准了农民已经获得的利益,宣布无偿的取消一切个人的及封建地主的特权;只有工役和什一税须以代价赎回^①。

在阐明柏林三月革命的影响时,程浩指出,柏林三月革命的影响,“第一,柏林革命是在资产阶级临阵脱逃与无产阶级平民坚决斗争的结果。第二,柏林革命的胜利迫使国王与资产阶级弃仇修好。第三,民众在革命之后,企图努力推进革命前进。”^②程浩认为,柏林三月革命的结局说明“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现时并未完全胜利,其应完成的任务,还差得太远。”^③

程浩认为,维也纳十月起义是奥地利革命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革命事变。它的被镇压就意味着德国反动势力的胜利与革命的失败。程浩把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点:“第一,敌强——六七万的正式军队,配有优势的武器,在相当的统一指挥下,向着一个小的城市作主动的阵地的进攻,自然胜负可操。第二,我弱——城内无坚固的团结,与行动的统一,而且混乱无组织。国民军的一部分动摇,一部分完全不准备斗争,只有少数作战。第三,没有匈牙利打到维也纳附近的胜利军配合。”^④

① 程浩:《近代世界史简编》,第287—289页。

② 程浩:《近代世界史简编》,第291—292页。

③ 程浩:《近代世界史简编》,新知书店1949年版,第293页。

④ 程浩:《近代世界史简编》,新知书店1949年版,第300—301页。

程浩以极其敬仰的心情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革命中的活动,特别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新莱茵报》的革命作用。程浩写道:“这个报纸不仅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具有政治上独一无二的至高权威,成为推动当时民主革命的政治火车头,而且,特别在指导德国及他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理论与策略上,在组织与训练工人阶级上,都具有无上伟大的历史意义。”^①

总之,从平心到程浩,特别是程浩,对1848年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评介来看,他们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述了这次革命的原因、性质、任务和意义;揭示了各个革命事件的内在联系和各革命事件外部因素的作用,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痛斥了资产阶级的叛变行为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活动;赞扬了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中的作用,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主动性。

刘镜园等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848年 欧洲革命著作的翻译和介绍

在30年代初,当国民党用特务手段把持文化领域、迫害和摧毁进步著作和革命著作的翻译工作者时,刘镜园却以抗暴的无畏精神翻译了恩格斯的《革命与反革命》(又名《1848年的德国》即《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并写了《译者序言》。

刘镜园在《译者序言》中首先评价了恩格斯这本著作的价值,说明了他翻译这本著作的目的。他认为,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一部用辩证的唯物论解释历史的杰作”。他说:“我们读这本书不唯可了解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之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可以

^① 程浩:《世界近代史简编》,第316页。

获得许多方法，去研究别的革命。”^①

同时，他还认为，1848年德国革命没有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至于这种任务在德国是怎样解决的，我们今日中国的读者也有知道的必要。”^②

刘镜园在介绍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内容时，概括为：“它叙述了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的经过，其失败的原因，和分析当时各阶级在斗争中的相互关系。在这本书中，恩格斯又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策略，武装暴动的条件，民族问题与革命战争等之关系。……本书的前四篇论文，简括的叙述革命以前的德国，其阶级、政治组织与运动，革命爆发之征兆等等。为以后研究和著作革命史的人的典范。以后的几章则叙述革命的历史，以革命的眼光和热情批评当时的政党和领袖。”^③

刘镜园着重介绍了德国统一任务的完成。他非常重视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关于德国统一的三条道路。即恩格斯所说的：“国家的统一的完成，在一八四八年模糊的努力差不多到处失败以后，很明了的，只有三条道路存在。”“第一条道路是推翻一切分立的国家，实现真正的统一，换言之，即公开革命的道路。”但是，恩格斯认为，“假若拿破仑第三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对德人宣战，莱茵疆界问题尖锐的提了出来，那时德国人民或者要走这一条路。但是这件事没有发生，由此这一可能就延续下去。……这就给别的两种可能开辟了道路。”“第二条道路是在奥地利领导之下的统一。”恩格斯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① 刘镜园译：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新生命书店1930年版，《译者序言》，第1—4页。

② 刘镜园译：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新生命书店1930年版，《译者序言》，第5页。

③ 刘镜园译：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新生命书店1930年版，《译者序言》，第4页。

后,认为“奥地利领导之下的统一,这只是梦想”。于是,恩格斯指出:“现在只有第三条道路:德国在普鲁士领导之下统一。这是由上层统一的道路,因为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已成为历史的不可能。”^①后来的历史证明,1848年德国革命未解决的民主革命任务,即建立民族统一的国家,则由三次对外战争完成了。由此,刘镜园认为:“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及以后的战争,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凡受民族压迫的国家,统一与独立的道路,或者经过革命,或者经过对外的战争,假如不能经过‘上层的革命’来统一的,将来必然要经过下层革命来统一。”^②

在40年代,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由解放社出版了柯柏年翻译的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这两本著作在后来曾多次再版。

柯柏年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译校者关于本书内容的一点说明”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并且简要地介绍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至1848年革命前夕的历史。柯柏年认为:“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这本书中,马克思如此英明地深刻地分析了法国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变,如此具体地光辉地运用唯物史观的伟大理论,使得这一著作(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一样)虽然到现在差不多经过了九十年,还不仅没有丝毫丧失而反日益显示其内容的正确与意义的伟大。这真是一部万古不朽的,百读不厌的名著。”^③

当时,刘镜园、柯柏年把马克思、恩格斯论述1848年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十分重要的、十分卓越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毫无疑问,这将大大有助于中国人民进一步深入地了解1848年法国革命

① 刘镜园译: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译者序言》,第9—11页。

② 刘镜园译: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译者序言》,第15页。

③ 柯柏年译: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解放社1940年版,第4—5页。

和德国革命；吸取其十分宝贵的经验教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和考察革命事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提高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解决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可将马克思、恩格斯所总结的关于 1848 年革命的经验教训作为中国革命的借鉴。

第三节 建国以来研究和评介 1848 年 欧洲革命的概况

建国 40 多年以来，我国的史学工作者、翻译工作者为研究和评介 1848 年欧洲革命以及翻译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上，作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而且，这个时期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的研究和评介，要比以往广泛得多，深刻得多了。据不完全统计，自建国以来 30 多年间，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关于 1848 年欧洲革命的文章为 73 篇；介绍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历史知识读物 5 种；在世界通史和世界近代史著作中辟专章论述 1848 年欧洲革命的有 5 部；1848 年欧洲革命史专著 1 部。翻译工作者翻译了有关 1848 年欧洲革命论文、著作和史料 50 余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关 1848 年欧洲革命的论著除外）。建国以来，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我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50—70 年代研究的新进展

在这一时期中，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翻译和出版，为史学工作者深入了解和研究 1848 年欧洲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它不仅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

50 年代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和第 5 卷，大多为论述 1848 年欧洲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欧洲的政治、经济状况。第四卷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论波兰问题》、《拉马丁和共

产主义》、《一八四七年的运动》、《奥地利末日的开端》等文章，对于我们研究 1848 年革命前夕欧洲的状况十分重要。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它对于史学工作者了解 1848 年欧洲革命前夕，欧洲社会思想的发展，研究各社会主义流派及其思想实质和阶级实质以及这些政治流派在 1848 年欧洲革命中的作用，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第五卷中全部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 1848 年 3 月至 11 月的著作。它们都是论述和介绍 1848 年欧洲各个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其中《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法兰克福激进民主派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维也纳革命》、《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最后消息》、《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目前失败的原因》、《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等重要文章都是研究 1848 年欧洲革命必读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于我们了解 1848 年革命的进程、重大事件、各国革命间的联系、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与变化、革命的失败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60 年代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7 卷，第 8 卷，第 14 卷等，其中第 6 卷包括他们在 1848 年 11 月至 1849 年 7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第 6 卷也同第 5 卷一样，其中的大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民主运动中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唯一报纸，即《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第 6 卷中的《卡芬雅克和六月革命》、《意大利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匈牙利的斗争》、《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维也纳和法兰克福》等，都是从不同方面论述和介绍了 1848 年欧洲革命。而第 7 卷中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 8 卷中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 1848 年欧洲革命和总结这次革命经验教训的经典著作。第 14 卷中的《福格特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第一次完整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早期阶段。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用犀利的笔锋巧妙地勾画了福格特这位德国庸人和流亡小市

民人士中间的这位英雄的令人厌恶的整个面目。马克思揭示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福格特在流亡瑞士的人士中间所扮演的那种不光彩的角色。在第6章“福格特和‘新莱茵报’”中，马克思披露了福格特在1848—1849年的活动实际上带有反革命的性质。同时，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评介了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的科苏特、马志尼、谢米尔等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波拿巴主义和波拿巴制度，沙皇俄国的对外侵略与扩张以及国际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是对那些采用诽谤和捏造事实等卑鄙手段攻击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的致命反击。这部著作不仅内容深刻而丰富，而且其语言出色，就艺术价值而言，这一著作是属于世界讽刺文学优秀典范之例。这部著作对于史学工作者进一步了解1848年革命对以后欧洲政治、经济和思想发展的巨大影响和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推动了我国史学工作者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研究。史学工作者非常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评述以及他们通过这次革命的失败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以及他们在革命中的活动。在这个时期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论述1848年革命的著作和他们在1848年革命中活动的文章有：《一八四八年革命斗争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①等5篇论文；译文有《马克思主义与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运动的教训》^②等8篇；论述1848年欧洲革命的论文有《一八四八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等30余篇。

在60年代出版的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和北大历史系编写的《简明世界史》均辟有专章论述了1848年欧洲革命。

① 作者林举岱，《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5期。

② 作者捷尔—阿科波扬，《史学译丛》，1965年4期。

在70年代还出版了一批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知识丛书。它们是《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①、《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②、《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③、《十九世纪波兰人民的抗俄独立斗争》^④等。这些小册子都对一个国家的革命作了较为全面、较为详尽的论述。作者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此外,在这个时期,史学翻译工作者还翻译了一批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史的论文和资料,如《法国二月革命前的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⑤、《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夕普鲁士的下层市民运动》^⑥、《关于一八四八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几个问题》^⑦、《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革命头几个月的匈牙利农民运动》^⑧等文章,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有关1848年欧洲革命的辞条选译。这些译文对于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起了有益的作用。

总之,在50—70年代,我国在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和翻译有关这方面的外交资料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和建国以前的研究情况相比,我们取得的成绩就更加突出和明显了。尽管如此,我们在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史的工作中,还存在着深度不够,范围不够广泛的缺点。

7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概况

1978年以后,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研究,逐渐形成为高潮,至目前为止,在不到20年的短短时间里,就发表了52篇论文。它

-
- ① 作者韩承文,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 ② 作者韩承文,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 ③ 作者华中师院历史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 ④ 作者程人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 ⑤ 作者宾德列科娃,《甘肃师大学报》,1959年5期。
 - ⑥ 作者纳尼塔施维里,《史学译丛》,1956年5期。
 - ⑦ 作者莫洛克,《史学译丛》,1954年2期。
 - ⑧ 作者奥尔里克,《史学译文》(陕西师大),1960年1期。

比50年代至1978年以前二十余年所发表的论文总数还要多。除论文外,还出版了历史知识丛书和专著。同时,在新出版的《简明世界通史》^①、《世界史·近代史》^②、《世界近代史》^③等著作中,都列专章论述了1848年欧洲革命。这些都是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新成果。

在这个时期所发表的论文,无论在深度,或者在广度上,和以前的论文相比,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论文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

这些论文的特点是:选题新、史料新、观点新。一般说来,不再是泛泛地论述1848年革命的原因、进程、失败原因及历史意义,而是对革命中的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和论述。

在这一时期中,令人鼓舞的是,一批史学工作者在深入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史,取得上述成绩的基础上,召开了我国第一次关于1848年革命的学术讨论会。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1848年欧洲革命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围绕着这个中心议题,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一、1848年革命的主要任务。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

大部分同志认为,这次革命的任务,总的说来,是消灭封建制度、铲除封建残余、推翻异族压迫,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同时大家还着重讨论了过去被忽视的、革命的另一中心任务,即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各国革命的共同任务:打击沙皇俄国。大家认为,应深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把打击沙皇俄国作为这次革命的共同的中心任务。

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的观念:

① 编著者李纯武、寿纪瑜,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刘祚昌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林举岱、陈崇武、艾周昌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王荣堂、姜德昌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两个阶级的决战已经开始；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是欧洲几个国家的共同胜利；就一个国家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是两次革命论和沙皇俄国是革命的主要敌人等观点来看，这次革命除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也应完成本阶级的任务。

二、1848年欧洲革命的成果问题。对此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1848年欧洲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不能认为失败了革命就毫无革命成果而言。1848年欧洲革命既有物质方面的成果，也有精神方面的成果，而且成果包含在影响之中，没有革命成果，就不会有革命影响。这次革命的成果主要表现在：1. 它动摇了欧洲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欧洲大陆的经济革命；2. 它摧毁了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体系，打击了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沙皇俄国；3. 它使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些成果为后来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60年代波兰的农奴解放、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多瑙河诸公国的民族解放和奥匈协定奠定了基础。所以恩格斯说：“一八四八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①正是1848年的改造力量迫使后来各国的统治阶级不得不违背自身的利益，去完成革命所提出的任务。使欧洲出现了“一八四八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的历史画面。

另一种意见认为，讨论1848年革命的成果必须与革命任务结合起来。革命既然失败了，革命任务就没有完成。既然没有完成革命任务，就不能说革命取得了成果。而前一种意见所谈的成果只是革命的影响，革命成果和革命影响并不是一回事。

^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30页。

三、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在讨论资产阶级的作用时,有的同志认为,应当正确地评价资产阶级,不应笼统的说它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而应根据其不同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对革命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来评价它们。如匈牙利的科苏特、裴多菲;罗马尼亚的伯尔切斯库;波兰的贝姆将军等都对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背叛革命的只是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派。

在谈到小资产阶级时,一些同志认为^①,对小资产阶级的评价也不应过分强调其妥协、动摇,甚至背叛革命的一面,而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他们,既要看到他们的妥协性和动摇性,也应充分肯定他们革命的积极性和在革命中的作用。

对于农民的评价,大多数同志认为,农民是1848年各国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对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必须指出,法国农民与其他国家的农民不同。他们在革命中表现出了极大的保守性和对革命的冷淡态度。在一个时期内,由于受资产阶级的挑拨,非常仇视巴黎工人。

除讨论上述三个主要问题外,与会者还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特点,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英国、俄国等一些国家为什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为什么1848年革命在各个国家普遍遭到了失败以及研究1848年革命史的方法论等发表了意见,建议在这些方面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使1848年欧洲革命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①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9页。

结 束 语

一、革命的任务与性质

1848年欧洲革命的任务,总的来说是消灭封建制度,铲除封建残余,推翻异族压迫,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它们所处的政治和历史地位不同,所以,各个国家所面临的革命任务也不尽相同。有的国家是要求铲除封建残余,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如法国,它的革命任务是推翻代表金融贵族集团的路易·菲力浦王朝,把金融贵族集团的统治扩展为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有的国家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消除国家的分裂状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德国的革命任务主要是打破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割据局面,完成国家的统一,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意大利的革命任务则主要是驱逐奥地利统治者,消除国家的分裂状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有的国家是反对异族压迫,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如罗马尼亚、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等,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本国的封建统治和外国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至于奥地利,它的革命任务则是消灭奥地利本土和它所统治的各地区的封建关系,摧毁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解放被压迫民族,并使之建立起独立的资

产阶级的民族国家。

在1848年革命中,各国除了各自的国内革命任务外,在国际关系中,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革命任务,那就是打击欧洲宪兵沙皇俄国。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沙皇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不仅未被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起来。特别是维也纳会议以后,沙皇俄国成了欧洲大陆的霸主。直至19世纪中叶以前,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在这个时期,俄国虽然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但并没有爆发较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俄国的贵族地主阶级便力图把反动的农奴制扩展到国外,并极力维护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因此,沙皇俄国便同欧洲的反动势力结成神圣同盟,四出镇压革命起义和革命运动。同时,沙皇俄国还利用“泛斯拉夫主义”挑起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纠纷,分裂欧洲革命人民之间的团结,从而把东南欧控制在自己的魔掌之中,使之成为它向整个欧洲进行侵略的前哨阵地。

19世纪初,特别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1825—1855年),沙皇俄国侵略欧洲的计划特别明显地表现为:在东南部不断地向巴尔干扩张,继续控制黑海的出海口,入地中海至西欧;在中部则是占领波兰和控制德国,进而控制整个欧洲。而要实现这个计划,就必须把握两点:一是吞并波兰,一是阻挠德国的统一。沙皇俄国为了实现这一侵略计划,不仅镇压波兰的革命运动,破坏和帮助镇压德国争取统一的革命斗争,而且还竭力镇压或帮助他国镇压一切可能引起波兰革命和促进德国统一的活动。这也是沙皇俄国为什么四出镇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沙皇俄国拼命维护俄国和欧洲的摇摇欲坠的封建农奴制度,疯狂地镇压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所以整个欧洲的反动势力都把沙皇视为自己的靠山,因而,沙皇俄国便成为欧洲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敌人。所以,各国革命人民在完成本

国革命任务的同时,还必须把俄国作为革命打击的重点。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1848年欧洲各国的革命有着共同的任
务,也有着各不相同的具体任务。尽管各个国家的具体的革命任务
不同,但就其性质来说,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在我国已
出版的世界近代史著述中,对革命的民主性质论述的比较充分,而
对于革命的民族性质重视和论述不足。其实,民族问题并不亚于民
主问题,它更为普遍和尖锐,是制约欧洲革命全局和全部发展进程
的一个主要问题,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根本特征。

解决民族问题,即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在当时已成为欧洲
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欧洲经过16、17世纪的早
期资产阶级革命,经过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革命运动,已使英、
法、荷、比等民族完成了由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在
更广泛的地区和国家,封建制度受到相当大的破坏和日益削弱。但
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东、南欧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和
民族分裂的状况依然存在,德、波、意、匈、捷、罗等国仍处于被分裂
和受大国奴役的地位。随着大工业和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这
些国家的人民觉醒了,民族运动不仅和民主运动同时发展,甚至更
为广泛。20年代以后,到处涌现出民族团体,展开了争取民族独立
和统一的活动。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有不少模仿者,泛斯拉夫主
义开始传播,波兰人组织了“民主协会”和许多秘密革命团体,德意
志的民族主义者在汉巴哈举行了强大的示威,匈牙利反对哈布斯
堡王朝统治的斗争日益激烈。可见,在1848年欧洲革命高潮来临
之际,摆脱民族压迫,结束民族分裂,争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到处
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普遍提上了各民族的历史日程。在这些
国家虽然也存在着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存在着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民族矛盾
日益尖锐,争取民族解放已成为东南欧诸国革命的重要任务。

在东南欧,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是1848年革命的普遍动力。

在革命一开始，民族运动就席卷欧洲，组成了革命高潮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掀起的民族统一运动，使整个半岛沸腾起来了。伦巴底和威尼斯的起义“敲响了意大利复兴的时钟”，成千上万的志愿军奔赴北部的反奥战场，撒丁王国向奥地利宣战，争取统一和独立成了全半岛斗争的中心。在中欧、匈牙利革命也取得重大胜利。继意大利和匈牙利之后，民族革命接连不断，波希米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克、波兰一些地区、多瑙河诸公国，都先后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在德意志，三月革命风暴不仅使各邦颁布了宪法和召开了国会，而且把拖延了约3个世纪之久的统一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全德国民议会召开，法兰克福成了全德瞩目的中心。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把1848年欧洲革命推向了新的高峰。

纵观1848年欧洲革命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解放运动是这次欧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相结合，使这次革命规模广阔、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在世界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二、革命的动力

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虽然资产阶级仍旧充当了革命的领导，但是，革命的动力是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工人和农民阶级。由于1848年欧洲革命是在英、法、德、俄、意先后进入工业革命，无产阶级迅速壮大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奥、匈、捷、波、罗等国的反封建斗争普遍高涨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所以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和农民阶级成为革命的动力这一点就表现得尤其明显与突出。从各个国家革命斗争的实践来看，这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发动的，革命的成果是广大人民群众争得的，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又是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的，

捍卫革命成果的功绩也是他们建树的。历史事实证明，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便没有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历史。

在意大利革命中，意大利人民不仅将奥地利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解放了米兰和威尼斯，而且推翻了教皇的世俗政权，宣布了共和国，在罗马上空升起了迎风飘扬的三色旗。在奥地利，维也纳人民不仅以革命的威力将自命为欧洲首相的梅特涅赶下了政治舞台，迫使他男扮女妆逃亡到英国，而且为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和支持匈牙利革命掀起了三月、五月和十月维也纳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奥地利的统治阶级。倍受压迫的罗马尼亚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抗强大的沙皇俄国和土耳其的统治，他们在革命中烧毁了“组织规程”和“贵族谱”，成立了罗马尼亚临时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粉碎反革命暴乱，并且写下了永垂史册的一页——“布加勒斯特的血浴”。英勇的捷克人民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不断叛变的艰苦条件下，仍然继续顽强地战斗，并且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对抗文迪施格雷茨的强大炮火与兵力；布拉格的街垒战士，在资产阶级已经出卖了他们的情况下，仍然勇敢地捍卫着布拉格，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匈牙利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迫使奥皇斐迪南一世颁布宪法，承认匈牙利独立内阁；英勇善战的匈牙利人民把奥地利侵略军打得望风而逃，并追赶着奥军残部，直至奥地利边境；在打败奥军的同时，他们庄严地发布了“独立宣言”。波兰人民这个欧洲不死的勇士又高擎起民族复兴的大旗，他们不仅在波兰的土地上举行起义，而且还以国际主义的精神投入了欧洲各国的革命斗争，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波兰人的足迹。他们在各国的革命斗争中谱写了一页又一页可歌可泣的篇章，立下了一个又一个惊天动地的战功。他们在革命中所表现的团结战斗、互相支援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各国革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法国的无产阶级，他们在斗争中不仅创造了武装斗争的新形式，不仅要推翻旧制度，而且还要建立一个给人民以政治自由，把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

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社会共和国。法国无产阶级的这种要求不仅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而且影响了整个革命进程,丰富了革命内容,使革命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并且第一次在那么广阔的领域里表明自己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不仅仇视封建制度,而且深恶痛绝资本主义制度。1848年革命的全部历史事实证明,世界近代史上这一重要而光辉的一页正是用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血写成的。

三、资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

1848年欧洲革命的重要历史特点之一是当时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迅速形成和发展,并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各国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面前显得惊恐万状,他们惧怕无产阶级比惧怕封建势力更甚。因而各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得软弱、动摇和妥协,有的甚至反对革命、背叛革命。有的著作依此得出结论说:“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是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活动家背叛革命的历史”,“德国资产阶级比法国资产者更为害怕革命”,“资产阶级及自由主义的贵族则采取了反革命的立场”^①。有的著作也持有这样的观点:“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不仅不敢坚决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彻底消灭封建残余,而且在形势不利时就向封建势力妥协,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结成联盟,镇压群众,反对革命”。“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总是认敌为友,背叛人民,断送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斗争中往往表现出软弱和动摇”,“有时还站在剥削阶级方面来反对无产阶

^① 特·伊·奥则尔曼:《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二版,第16、17、18页。

级。”^①

我认为以上论著的观点与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还不能说已经是一个反革命阶级了。走上反革命的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资产阶级自由派。

在1848年革命的过程中，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都为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匈牙利，敢于代表本民族人民接受敌人挑战的科苏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率领人民同异族压迫者和本国的封建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当奥皇宣布处死拉姆堡事件为叛乱事件，并任命耶拉契奇为匈牙利总督时，科苏特针锋相对，宣布奥皇的声明无效。当奥地利的反革命武装向匈牙利发动进攻时，以科苏特为首的匈牙利国防政府不仅动员国民自卫军为保卫匈牙利的自由和独立而战，而且组织民兵，在敌后展开了活跃的游击战。配合国民自卫军沉重地打击了奥地利入侵军。当匈牙利面临着奥俄联军入侵时，科苏特率领着匈牙利军队、游击队和革命的指挥官同奥俄联军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虽然匈牙利革命被奥俄联军扼杀了，但是科苏特为匈牙利革命所建树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对于匈牙利革命，对于马扎尔民族来说，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在罗马尼亚，革命民主主义者伯尔切斯库，在瓦拉几亚掀起革命风暴时，便立即从巴黎返回罗马尼亚。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他始终把罗马尼亚的独立与统一看作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同时他十分重视农民问题，一贯主张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把土地分给他们。在反对异族压迫和争取罗马尼亚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伯尔切斯库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罗马尼亚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波兰的贝姆在匈牙利革命处境困难时，辗转来到匈牙利，率领一支匈牙利军队进入特兰西瓦尼亚，有力地阻击了奥地利军队的进攻。进而收复了特兰西瓦尼亚的重要城市布鲁日。在这里，贝姆宣布了对起义者大赦。并号召特兰西瓦尼亚人民与匈牙利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异族压迫。此后，贝姆还以最大的精力组织特兰西瓦尼亚的管理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对贝姆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写道：“当特兰西瓦尼亚为他控制的时候，他防止了马扎尔人特派员打算采取的毫无意义和不讲策略的残酷手段，因而受到人们尊敬。”^①

在资产阶级中也确有背叛革命的，这些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大资产阶级、大金融家的代表。如德国的汉塞曼，匈牙利的戈尔盖等。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派在革命中的活动和表现也要作具体的分析。我认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在革命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反对和阻碍革命的群众运动；稍后是参加运动以便掌握领导权，并使革命半途而废；最后是向大资产阶级或贵族地主投降，叛变革命。这种情况无论在德国还是意大利，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明显，而以奥地利最为典型。在奥地利革命过程中，特别是维也纳十月六日事件以后，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背叛革命的历史。

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像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一样，都是在不断背叛中窒息了自己的国家的革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这种背叛，并不是他们当中个别人物的罪过。而是与当时各国的社会状况、各国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及各国的生活条件分不开的。

总之，从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的表现及其作用来看，从它渴望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确立、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来看，资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贝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34—135页。

级作为一个阶级，它仍然是革命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各阶层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从而形成的政治观点的差异，致使它们分裂为各种不同的派别。而这些代表各阶层利益的派别，从其自身利益考虑，有的赞成革命，积极拥护革命，它们的代表人物多为革命的领导者，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而有的则从赞成革命逐渐转变成反对革命、乃至背叛革命。因此我们在评价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时，要分析资产阶级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对于各不同阶层作出不同的评价，而不能笼统地得出结论，认为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阶级。

四、革命失败的原因

波澜壮阔、历时年余的 1848 年欧洲各国革命，虽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斗争道路，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了。各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虽不尽相同，并各具特殊性，不过，除法国以外，其他各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各个国家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毫无例外地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是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革命过程中，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并领导了革命。但是，在他们参与和领导革命时，他们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决定他们只希望革命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力图将革命限制在与自己的利益相一致的范围内。尽管他们希望借助群众的发动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们却非常惧怕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旦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并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他们便脱离革命，甘愿向贵族地主投降并与其结成同盟。在维也纳三月革命事件中，在奥皇答应制定宪法后，资产阶级自由派便感到满足，并立即平静下来了。维也纳五月革命事件被镇压后，资产阶级自由派开始转入反革命阵营，与封建统治集团站在一起。维也纳八月流血事件后，他们更加接近和靠拢贵族地主，

并于9月15日成立了“君主立宪同盟”，以巩固大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的联合，开始了反对民主、反对革命的活动。在议会中他们公开反对支援革命的匈牙利，竭力主张与耶拉契奇联合，支援耶拉契奇武装入侵匈牙利。10月6日，塔包尔桥战斗发生后，资产阶级自由派便躲进深宅大院，隐藏起来。在拉图尔被人民镇压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议员便追随奥皇逃到阿罗木茨，麇集在这个反革命中心，以表示他们对皇室的赤胆忠心。在维也纳激烈战斗的日子里，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违背起义人民的意志，主张与文迪施格雷茨进行投降谈判，最后，竟无条件地将维也纳拱手交给了文迪施格雷茨。正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不断背叛断送了奥地利革命。

波兰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参加革命时，就企图通过部分的改良来避免社会革命，乃至革命爆发，他们不是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而是忙于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因而使1846—1848年的波兰革命起义未能发展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结果断送了人民的革命起义。特别是当革命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时，他们便不惜屈膝投降，卖身投靠，与俄、奥、普侵略者狼狈为奸，充当扼杀革命的鹰犬，沦为民族的叛徒。其他如以帕拉茨基为代表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塔维尔和马来阿尼为代表的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和以谢米尔为代表的匈牙利资产阶级自由派也都是在不断背叛中断送了自己国家的革命。

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动摇和妥协是革命遭到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1848年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各国的小资产阶级软弱、动摇和妥协的特点都表现了出来，其中尤以德国和奥地利的小资产阶级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德国，1849年3月，革命进入到以维护帝国宪法为特征的第三阶段。5月初，在德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如德累斯顿、普法尔茨、莱茵省的部分地区和巴登都爆发了起义。由于这些城市和地区小资产阶级占优势，所以他们很快便掌握了起义的领导权，并参加了各起义地区所成立的临时政府。但是，

在起义过程中他们畏首畏尾，不敢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在德累斯顿的4天巷战中，小资产阶级、“市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战斗，而且在许多场合支持军队镇压起义者。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小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尤其是巴登以布伦坦诺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的地位和特权，是一种叛逆行为。因此，他们便坐在阁员的安乐椅上忏悔自己的“罪行”，不仅不去领导运动，而且竭力压制运动。所以，恩格斯在批评德国小资产阶级时指出：“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励起义的；一旦起义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起来，它就急于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①在奥地利，他们的这一特点就表现得更为明显。维也纳十月六日事件发生后，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主张干涉这一事件，促使议会行动起来，但是，他们所说的行动起来，并不是坚决支持起义人民，而是企图在敌对双方之间进行调停，劝其停止流血战斗。就连最激进的库德利赫也称10月6日为“可怕的革命”。在国防部长拉图尔被处死后，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代表也和贵族、资产阶级一样，惊慌失措，他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对战斗双方的调解上。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他们也同样采取了摇摆不定的立场。在革命过程中，他们曾为解放农民、取消农民徭役而发出了响亮的呼吁，但是，当维也纳处于紧急关头，面临着反革命的进攻，需要组织革命力量时，他们却惧怕动员农民武装起来，成立自卫军，支援维也纳革命。在革命维也纳陷落的前夕，无论议会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或大学生委员会的委员，很少有人具有那种宁死不屈，直至战斗到最后一息仍不屈膝投降的崇高精神和政治信仰。所以，小资产阶级这种软弱、动摇、妥协的弱点既不能将其他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更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07页。

革命未能解决农民的解放与土地问题、未能充分激发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遭到失败的第三个重要原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解决农民的解放和土地问题。这一革命任务解决得好坏,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曾明确地指出,中东欧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根本出路在于土地制度的革命,即把劳役制的农民变为自由的农民,争取和依靠农民群众完成推翻封建制度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双重任务。当时,东欧各国土地革命的客观形势已趋于成熟,在广大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不仅渴望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摆脱贵族地主的束缚与剥削,而且极力要求推翻异族的统治,从民族压迫与奴役下解放出来。但是,在整个革命过程中,由于各国的资产阶级领导人对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看不到在农民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因而,他们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农民,甚至惧怕农民大规模的革命发动。这样一来,就不可能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而农民的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起来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各个国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都缺乏一个能够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明确的土地纲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革命领导人同封建专制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愿意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农奴制度,不愿失去他们在这个制度下所享有的特权。所以,在革命中,解放农民和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的问题,均迟迟不能解决,甚至有些地区的农民运动还受到革命领导人的限制以至镇压。这样一来,革命便失掉了农民这支强有力的主力军。民族革命运动一旦失去了农民的支持,也就不可能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也就不可能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

国际反动派的反革命武装镇压和革命的孤立无援是革命遭到失败的第四个原因。1848年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对于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各国反动势力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胜利必将促进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以及波兰的复兴,

必将摧毁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从而建立起一系列独立的民族国家，最后必然导致神圣同盟的彻底瓦解和“一八一五年体系”的最终崩溃。因此，俄、奥、普以及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英国，尤其是俄国，是不能容忍1848年欧洲革命取得胜利的。沙皇俄国是镇压这次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当意大利一月革命爆发时，沙皇俄国便以600万卢布支援奥地利反动统治者镇压了刚刚兴起的意大利革命。到了1849年7、8月间，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又组成反革命联军，颠覆了罗马共和国，从而彻底镇压了意大利革命。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沙皇尼古拉一世便试图以武力平息这一革命运动，因此他呼吁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动员全德的军事力量，将其配置在与法国接壤的边境线上，并答应以30万大军援助普鲁士。在巴黎二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运动迅速席卷欧洲，各国普遍爆发革命，这时各国反动派便开始聚集力量，准备镇压革命。俄国首先将大批军队集结在波兰王国、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立陶宛、白俄罗斯和第聂伯西岸乌克兰地区，以便随时镇压各地区的革命运动，同时还可以随时越过边境，镇压他国革命运动。与此同时，沙皇尼古拉一世支持德国各邦的统治者反对德国革命，公开干涉德国的统一，支援奥地利镇压了维也纳起义，伙同土耳其绞杀了罗马尼亚革命，最后以14万大军入侵匈牙利，伙同奥地利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因此，“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①当欧洲各国的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革命的时候，各国革命虽然还能得到国外革命人民道义上的支援，但这种支援是有局限的，因而，总的说来，各国革命均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特别是在1848年夏，巴黎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产阶级六月起义被镇压后，欧洲反革命势力转入进攻，国际形势对各国革命更为不利，并使革命陷于更加孤立的状态。这种国际形势的出现更加速了各国反动势力对革命的镇压。

至于法国革命的失败则主要是指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失败。巴黎六月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法国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和无产阶级准备的不够成熟。19世纪20年代，法国虽然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是，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小生产仍占优势；在农业中小农经济分化的过程比较缓慢；在资本的发展中，高利贷资本明显地超过了工业资本。所以，这个时期仍然是资本主义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有待于更大规模地和迅速地展开的时期，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仍然是法国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时期。

无产阶级准备的不够成熟，首先表现在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不够壮大。在工业生产中，由于小生产仍占优势，所以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占优势的便是手工业工人。据1846年统计，巴黎44.2万工人里在大企业中做工的只有5万人。所以在革命发生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不够壮大。其次表现在思想上。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它在法国工人运动中还没有占统治地位，而在无产阶级中占优势的是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机会主义学说。许多工人群众还相信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认为在1848年法国革命中有可能用“和平方法”来实现社会革命，幻想建立“社会共和国”就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而这种共和国可以同资产阶级合作去实现。结果，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给工人带来的不是胜利的欢乐，而是流血的失败。最后，表现在无产阶级的孤立无援上。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第一，在二月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广泛进行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和临时政府的挑

拔政策，特别是实行45生丁附加税，促使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起来反对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后备力量。第二，资产阶级和富农对农民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法国的农民群众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性，不了解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袖。第三，当时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宣传、恐吓和欺骗下，害怕“红色怪影”，不敢轻信无产阶级的领导，自己在政治上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因此，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不仅不给起义者以任何援助，反而痛恨他们，诅咒他们，希望巴黎起义立即全部毁灭。这样一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把无产阶级孤立起来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①

五、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成果

轰轰烈烈的1848年欧洲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对于当代社会生活以及后来社会发展形式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历来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他们看来，无论胜利了的革命或者失败了的革命，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谈到失败了的1848年欧洲革命时，马克思指出：“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的传统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2页。

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①恩格斯也曾阐明了同样的思想。他认为：“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②

1848年欧洲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动摇了封建农奴制的基础，加速了它的崩溃，并从根本上摧毁了神圣同盟，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使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赢得了新的阵地。在革命失败以后，虽然各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企图完全恢复革命前的旧制度，贵族与教士们都希望时间倒流到古老的时代，并猖獗一时，重新剥夺人民群众在革命中所争得的民主权利。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由于各国革命和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沉重打击，他们那种完全恢复旧制度的企图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他们既无力改变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无力改变反映这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

1848年欧洲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成果在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中都非常明显地表露了出来。革命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沉重打击和对俄、奥、普统治力量的削弱，为后来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60年代初波兰的农奴解放、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多瑙河两公国等的民族解放和奥匈协定的签订奠定了基础。同时，1848年欧洲革命为后来欧洲资本主义较迅速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推动了欧洲各国(除英、法外)的工业革命，并加速了这一革命的进程。而不容忽视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各个革命阶级在整个革命斗争中都受到了直接的教育，并从传统观念、过时的纲领、不切实际的幻想等政治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对于一次大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页。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82页。

规模的、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说,其改造力量不仅会在革命时期表现出来,而且在以后很长时期,甚至在反动时期也同样会表现出来;同时这种改造力量迫使后来反动统治者不得不违背自身的利益、违背封建制度的利益,去完成革命所提出的许多任务。因而在1848年革命以后便出现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①这一历史画面。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历史意义。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是世界近代史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伟大的决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尝试。马克思指出:“在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②

六月起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失败证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两者的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要想真正改善自己的地位,就不能把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而必须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工人阶级专政,才能使本阶级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因而,他们丢掉了对资产阶级的幻想,进行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初步尝试。这对于后来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六月起义的失败也宣布了蒲鲁东无政府主义和路易·勃朗劳动组织学说的彻底破产。

六月起义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它向全世界证明,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并“最终地证明了只有无产阶

^①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9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6页。

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①。在整个起义过程中,无论在街垒的战斗中,还是在敌人的法庭上,巴黎无产阶级都表现了坚贞不屈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监狱和流放中,无论是沉重的镣铐,折磨人的劳动和侮辱性的毒打,还是褴褛的衣衫、吃不饱饿不死的饮食和污浊而寒冷的营棚,都不能挫折他们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例如,在资产阶级的法庭上,一位领导起义的工人拉卡利就信心百倍地高呼:“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民主与社会的共和国万岁!”六月起义的另一位领袖爱曼纽·巴尔特勒米当着法官们骄傲地宣布:“我是一个争取建立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的战士。随你们怎样处置我都好,……哪怕我有捣成肉末之险,我也决不放弃我自己行动所负的责任……我在街垒中不发抖,我在这里也不会发抖。”^② 巴黎工人所表现的这种坚强精神,不仅为国际无产阶级作出了榜样,而且向全世界证明,他们能够肩负起历史所赋予他们的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使命。

①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2页。

② 鲍爵姆金主编:《1848—1849年革命》第1卷,第548页。

大事年表

1845年

- 2月3日 马克思到达布鲁塞尔。
1845年 捷克萨宾纳、弗利奇等成立“里皮尔协会”。

1846年

- 2月19日—3月3日 波兰克拉科夫起义。
2月19日—7月 波兰加里西亚地区农民起义。
2月27日 波兰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哲学家邓波夫斯基英勇牺牲。

1847年

- 1847年春 摩尔多瓦农业普遍歉收，农民暴动频繁。
3月22日 第一届瓦拉几亚国民议会召开。
4月 裴多菲领导的革命组织“青年匈牙利”成立。
4月21—22日 柏林饥民暴动。
4月—6月 普鲁士联合议会在柏林开会。
6月5日 波桑议会反对派要求在哈布斯堡帝国领域内实行匈牙利的改革和独立。
6月初 “正义者同盟”举行伦敦代表大会。
“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7月9日 巴黎(在沙托—卢日)举行选举改革拥护者第一次

- 宴会。
- 1847—1848年 欧洲经济危机。
- 11月29日 马克思恩格斯在纪念波兰革命的国际大会上发表演说。
- 12月28日—1848年 法国众议院和贵族院召开立法议会。
- 2月24日

1848年

- 1月12—27日 西西里岛首府巴勒摩群众举行起义。
- 2月22日 巴黎二月革命开始。
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纪念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的国际大会上就波兰问题发表演说。
- 2月23日 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罢免基佐的内阁总理的职务，授权莫尔组阁。
- 2月24日 巴黎二月革命取得胜利，七月王朝被推翻。路易·菲力浦逃出巴黎，流亡到英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 2月25日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
- 2月28日 巴黎工人举行要求成立劳动部的示威游行。颁布成立“研究工人问题政府委员会”（即卢森堡宫委员会）的法令。
- 2月29日 巴登首府斯图加特、库尔黑森首府卡塞尔举行示威游行。
- 3月2日 法国国家工场开始接收工人。
- 3月3日 巴登议会通过决议：武装人民、出版自由、陪审制、召开全德议会、成立责任内阁。下奥地利议会的33名左翼代表起草了为“拯救专制制度”的请愿书。
法国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俄国。
科苏特在下议院提出废除农奴制，建立人民代表制度，在匈牙利实行自治等要求。

- 3月5日 马克思到达巴黎。
- 3月6日 普占西里西亚地区弗罗茨瓦夫市波兰人民与普鲁士占领军首次发生武装冲突。
- 3月初 维也纳大学生成立“争取自由斗争同盟”。
- 3月 捷克“里皮尔协会”拟定请愿书草案。
斯洛伐克爆发农民运动。扬科·克拉尔和罗塔里杰斯被捕。
- 3月 雅西出现要求撤换大会的革命宣言。
- 3月10日 彼得堡成立定期检查出版的非常委员会。
- 3月10日左右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巴黎改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主席。
- 3月11日 布拉格召开圣瓦茨拉夫群众大会，会上成立圣瓦茨拉夫委员会。
- 3月12日 维也纳大学生集会通过请愿书，2000多名大学生在请愿书上签名。
- 3月13日 柏林人民举行示威游行，同军队发生冲突。
奥地利议会在维也纳开幕。
维也纳革命开始。梅特涅辞职。
- 3月14日 政府发布将维也纳交给文迪施格雷茨管理的命令。
- 3月15日 维也纳工人，手工业者和大学生包围高夫堡宫。政府被迫同意召开各省议会及资产阶级代表会议讨论宪法。
佩斯革命者在裴多菲的领导下通过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纲领《十二条》。
- 3月17日 布朗基领导的“中央共和社”组织群众示威游行，抵制制宪议会的选举。
奥地利新内阁成立。
以巴蒂亚尼为首的第一个匈牙利责任内阁成立。
- 3月17—22日 威尼斯起义。威尼斯共和国成立。

- 3月18日 柏林爆发革命。
匈牙利议会通过取消农奴制、什一税、实行普遍课税等法令。
- 3月19日 捷克圣瓦茨拉夫委员会派代表团至维也纳递交请愿书。
- 3月20日 普占波兹南地区爆发波兰人民起义,以革命派斯泰凡斯基为首的民族委员会成立。
- 3月21—29日 马克思恩格斯写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 3月22日 特兰西瓦尼亚召开国民议会。
奥军退出威尼斯。曼宁宣布成立马可共和国。
- 3月23日 撒丁王国查理—阿尔伯特对奥地利宣战。
- 3月26日 沙皇尼古拉一世发表关于西欧革命事件的宣言。
- 3月27日 奥皇斐迪南一世颁布敕令,规定匈牙利政府无权处理国家的军事和财政。
- 3月28日 捷克圣瓦茨拉夫委员会制定第二次请愿书。
摩尔多瓦斯图尔扎大公派雇佣军镇压革命。
- 3月29日 柏林成立工人组织——临时中央俱乐部。
波兰革命诗人民主革命家密茨凯维支在意大利正式组建波兰义勇兵团,与意大利革命者并肩抗击奥、意反动派。
雅西三月革命被镇压。
- 3月31日 德意志预备国会在法兰克福市圣保罗大教堂开幕。
奥皇斐迪南一世被迫取消以前颁布的敕令。
- 3月末 科隆民主协会成立。
俄国西部(边境)各省农民运动高潮的消息不断传到彼得堡。
- 4月1日 俄国内务部通令各总督镇压农民暴动。
- 4月2日 坦契奇主编的《工人报》创刊。
- 4月3日 德意志预备国会选举五十人委员会,筹备全德国

- 民议会。
- 4月7日 马克思恩格斯到达美因兹。
- 4月8日 普鲁士联合议会通过选举法。
- 4月11日 马克思恩格斯到达科隆。
捷克向奥皇递交第二次请愿书的代表团回到布拉格。
- 4月12--27日 巴登共和党人起义。
- 4月13日 捷克民族委员会正式开始工作。
匈牙利议会由波桑迁回佩斯。
维也纳成立国民自卫军“中央政治委员会”。
- 4月14日 彼得堡建立以布图林为首的书报检查委员会。
- 4月16日 巴黎工人在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集会。
- 4月19日 捷克的“制宪同盟”成立。
- 4月20日 奥地利政府成立附属于市政府的安全委员会。
柏林示威失败。
- 4月22日 在波兰农民运动高涨的压力下，奥占加里西亚地区宣布废除农奴制。
- 4月23日 法国举行制宪议会选举。
- 4月25日 奥地利政府颁布新宪法。
- 4月26--27日 奥占加里西亚地区克拉科夫市爆发波兰人民起义，在奥军猛烈炮击下起义归于失败。
- 4月29日 庇护九世呼吁停止对奥作战，并召回前线的军队。
- 4月30日 斯拉夫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 4月30日—5月2日 波兹南地区的波兰起义军在米洛斯拉夫战役、符热希尼亚战役中两次战胜普鲁士侵略军。
- 4月末 斯洛伐克的赫麦尔、兹沃伦、特林琴等地爆发农民起义。
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成立。
- 5月1日和8日 普鲁士议会选举。
- 5月3日 布拉日人民大会开幕。

- 5月4日 特兰西瓦尼亚以国民请愿书的形式提出十六条纲领。
- 5月10日 法国制宪议会在巴黎开幕。
法国五人执行委员会成立,取代临时政府。
全德国民议会选举。
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在利普托夫—米库拉什召开斯洛伐克民族会议,通过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斯洛伐克人民的要求》。
- 5月11日 奥地利政府公布财产资格选举法。
- 5月12日 流亡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摩尔多瓦革命者在布拉索夫拟定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即《布拉索夫纲领》)。
- 5月15日 斐迪南二世在那不勒斯举行反革命政变。巴黎人民发动15万人的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反革命措施,声援波兰革命。
- 5月17日 五人执行委员会任命屠杀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刽子手卡芬雅克为陆军部长。
奥皇斐迪南一世逃往因斯布鲁克。
- 5月18日 全德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市开幕。
维也纳成立资产阶级“社会安全委员会”。
- 5月21日 斐迪南一世在因斯布鲁克发表威胁维也纳的宣言。
- 5月22日 普鲁士议会开幕。
- 5月26—28日 维也纳革命起义。“社会安全委员会”改组。
- 5月29日 特兰西瓦尼亚国民议会在克鲁日召开。
- 5月末 捷克激进派在圣瓦茨拉夫游泳场召开国民议会。
- 5月30日 捷克临时政府成立。
- 6月1日 《新莱茵报》正式创刊。
- 6月2日 布拉格斯拉夫代表大会开幕。
- 6月9日 瓦拉几亚的伊兹拉兹爆发革命,发表《伊兹拉兹宣言》。

- 6月12日 布拉格斯拉夫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致欧洲各民族宣言》。
- 6月13日 瓦拉儿亚比贝斯库大公逃亡国外。
- 6月14日 瓦拉儿亚临时政府成立,并完全接管了政权。
- 6月17日 布拉格起义被镇压。
- 6月19日 瓦拉儿亚的反动军官奥多贝斯库与索洛蒙发动叛乱,试图推翻临时政府。
- 6月19—21日 捷克议会进行选举。
- 6月20日 康普浩森—汉塞曼内阁辞职。
- 6月21日 法国临时政府颁布凡18岁到25岁的国家工场的独身男工均编入军队,其余人员均遣返各省的命令。
- 6月22日 国家工场工人举行抗议将工人编入军队的示威游行。
捷克议会开幕。
- 6月23日 普鲁士组成奥尔斯瓦德—汉塞曼内阁。
巴黎六月起义开始。
- 6月26日 在圣安东郊区进行激战。起义的工人被政府军镇压下去,六月起义失败。
彼得堡人民暴动。
- 6月26—30日 《新莱茵报》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论巴黎六月起义的文章。
- 6月28日 法国议会选举卡芬雅克为法兰西共和国行政首脑。
匈牙利议会选举。
俄国军队占领雅西。
- 6月29日 法兰克福议会选举约翰大公为帝国执政。
瓦拉儿亚临时政府逃跑后,大主教内奥菲特接管政权。
- 7月5日 匈牙利议会开幕。

- 7月初 沙皇尼古拉一世发布重新占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敕令。
- 7月6日—7日 俄国报纸发表巴黎六月起义及其被镇压的消息。
- 7月9日 瓦拉几亚成立“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
- 7月11日 德意志帝国政府成立。
- 7月 波兹南地区的波兰人起义在普军镇压下最后失败。
- 7月19日 土耳其侵略军在俄国外交压力下侵入罗马尼亚。
- 7月20日 罗马尼亚人民集会，抗议土耳其军队入侵。
- 7月22日 奥地利议会在维也纳开幕。
- 7月23日 瓦拉几亚临时政府解散。
- 7月25日 皮蒙特军队在库斯托查会战中被奥军打败。
- 8月8日 捷克议会通过以赎买方式废除封建义务的决议。
- 8月9日 瓦拉几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正式开始工作。
查理—阿尔伯特同奥地利签订停战协定。
- 8月11日 威尼斯人民举行起义，宣布退出皮蒙特。
- 8月12日 奥皇斐迪南一世及其宫廷迁回维也纳。
- 8月19日 瓦拉几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被解散。
- 8月23日 托斯克纳利伏诺城人民举行起义。
- 8月27日 马克思到达维也纳。
- 9月2日 法国制宪议会颁布实行45生丁税的法令。
- 9月4日 奥皇斐迪南一世正式任命耶拉契奇为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总司令。
- 9月6日 马克思离开维也纳。
- 9月 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什图尔和古尔邦在维也纳成立志愿军，并再次成立民族委员会。
- 9月9日 奥尔斯瓦德—汉塞曼内阁辞职。
- 9月11日 耶拉契奇进攻匈牙利。
- 9月13日 土耳其任命康塔库齐诺为瓦拉几亚总督。

- 9月15日 瓦拉几亚再次召开布拉日大会。
俄国侵略军侵入瓦拉几亚。
- 9月17日 《新莱茵报》编辑部和科隆工人同盟在沃林根村召开群众大会。
斯洛伐克志愿军从维也纳到达边境布津策。
- 9月18日 法兰克福起义。
- 9月21日 巴登起义。
- 9月22日 巴登共和派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
奥皇斐迪南一世发表声明，宣布匈牙利政府所颁布的法令一概无效。
以科苏特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成立。
- 9月25日 科隆暴动。
- 9月28日 斯洛伐克军团被匈牙利军队击溃。
布达人民处死拉姆堡。
- 10月1日 巴蒂安尼政府辞职，政权转交给以科苏特为首的国防委员会。
- 10月3日 斐迪南一世颁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和任命耶拉契奇为匈牙利总督的敕令。
奥地利政府对匈牙利正式宣战。
- 10月5日 奥地利政府发布由利赫杰尔与拉德茨基率军进攻匈牙利的命令。
- 10月6日 维也纳起义开始。维也纳塔包尔桥战斗。
- 10月7日 匈牙利自卫军包围支援耶拉契奇的罗特指挥的军队，并迫使其投降。
斐迪南一世及皇室从维也纳逃至摩拉维亚的阿罗木茨。
- 10月16日 为保卫维也纳，贝姆组织了一支由工人和技工参加的志愿军。
- 10月23日 文迪施格雷茨发出要求维也纳投降的最后通牒。
文迪施格雷茨军队占领维也纳的主要据点。

- 10月29—30日 匈牙利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在施韦哈特激战，匈牙利军队失败，退回匈牙利。
- 11月1日 维也纳陷落。
- 11月1—2日 奥占加里西亚地区利沃夫市波兰人民起义，最后在奥军镇压下归于失败。
- 11月4日 法国制宪议会通过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
- 11月9日 布兰登堡—曼推菲尔内阁组成。
- 11月12日 以施瓦尔岑贝格为首的新内阁成立。
- 12月2日 弗兰茨·约瑟夫即奥地利皇位。
- 12月5日 普鲁士国王下令解散普鲁士议会，公布新宪法。
- 12月10日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 12月20日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就任法国总统。卡芬雅克内阁辞职。
- 12月21日 巴罗组阁。
- 12月中旬 奥地利军队围攻匈牙利。
- 12月31日 匈牙利议会开幕。科苏特建议将国防委员会和国民议会迁至德布勒森。

1849年

- 1月5日 匈牙利首都佩斯陷落。
- 1月9日 匈牙利国民议会在德布勒森开幕。
- 1月 彼得拉舍夫斯基和斯别什尼夫讨论在俄国成立革命组织的问题。
- 1月27日 法国山岳党和社会主义者和解。
- 2月5日 罗马制宪议会决定推翻教皇世俗政权。
- 2月26—27日 匈牙利军队在科马罗姆战役中失败。
- 1849年春 伯尔切斯库到达特兰西瓦尼亚，商讨匈牙利与罗马尼亚联合问题。
- 3月4日 奥地利政府颁布新宪法。
- 3月7日 奥地利议会被解散。

- 捷克议会被解散。
- 3月20日 贝姆占领布拉索夫。
意大利查理—阿尔伯特第二次宣布对奥战争开始。
- 3月27日 法兰克福议会选举普王威廉四世为“德意志人的皇帝”。
- 3月28日
- 4月15日 奥地利政府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召回驻法兰克福议会代表。
- 4月19日 匈牙利军队在纳迪沙罗粉碎奥军。
- 4月中旬 德国29个邦承认帝国宪法。
- 4月26日 匈牙利军队解放科马罗姆要塞。
沙皇尼古拉一世将干涉匈牙利革命的决定通知帕斯凯维奇。
- 4月28日 普王威廉四世正式宣布拒绝承认帝国宪法。
- 5月1日 普法尔茨暴动。
- 5月3—9日 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起义。
- 5月6—7日 普占西里西亚地区弗罗茨瓦夫市波兰人民起义，与普军激战，在普军镇压下起义失败。
- 5月8日 尼古拉一世发表干涉匈牙利革命的宣言。
- 5月9日 爱北斐特和杜塞尔夫起义。
- 5月10—15日 恩格斯参加爱北斐特起义。
- 5月13日 法国立法议会举行选举。
- 5月21日 匈牙利军队攻克佩斯，首都光复。
- 5月26日 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结成“三王同盟”，共同镇压南德革命。
- 5月27日 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俄军进攻匈牙利。
- 5月28日 法国立法议会开幕。
- 5月30日 法兰克福议会迁往斯图加特。
- 6月7日 匈牙利军队与俄奥联军在瓦格河左岸彼列特村交锋。

- 6月12日 普军进攻普法尔茨和巴登。
- 6月13日 巴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举行示威游行，尚加尔涅指挥的军队驱散了示威游行队伍。
- 6月19日 法国立法议会通过封闭俱乐部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法令。
恩格斯参加巴登起义。
- 6月28日 匈牙利军队在腊布遭到失败。
- 7月3日 法军攻入罗马，共和国被扼杀。
- 7月7—11日 匈牙利军队与俄奥联军在科马罗姆进行决战，匈牙利军队失败。
- 7月14日 在塞格德签订罗马尼亚人与匈牙利人媾和草案。
- 7月31日 裴多菲在吉格尔什瓦尔战斗中英勇牺牲。
- 8月6日 贝姆指挥的匈牙利军同俄军在西比乌战斗，贝姆军队失败。
- 8月11日 科苏特被迫交出政权，离开匈牙利前往土耳其。
- 8月 斯洛伐克革命失败。
- 8月22日 威尼斯向奥军投降，革命结束。
- 9月27日 守卫在科马罗姆要塞的匈牙利军队投降，匈牙利革命失败。

1850年

- 3月10日 法国立法议会进行补充选举，山岳党人获胜。
- 5月31日 法国通过新选举法，废除普选制。

1851年

- 1月3日 巴黎驻军司令尚加尔涅被免职。
- 12月1日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立法议会，大肆逮捕。
- 12月2日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表《致人民书》，废止1850年5月31日颁布的限制选举权的法令，恢复

普选制。

12月3—4日

巴黎共和派反对路易·波拿巴政变。

1852年

1月4日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公布新宪法,把总统任期改为10年。

12月2日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正式宣布法兰西为帝国。
路易·波拿巴即帝位,称拿破仑第三。

主要参考书目

1848年法国革命主要参考书目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马克思:《拉马丁和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马克思:《卡芬雅克和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马克思:《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恩格斯:《6月23日事件的详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恩格斯:《6月23日》。

恩格斯:《6月24日》。

恩格斯:《6月25日》。

以上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恩格斯:《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恩格斯:《巴黎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恩格斯:《法国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恩格斯:《〈革命的两年〉1848年和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法]埃蒂纳·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法]狄·德萨米:《公有法典》,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 [法]皮佑:《皮佑选集》,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 [法]路易·勃朗:《劳动组织》,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 J. 多特里:《1848年法国革命史》,巴黎,1948年版。
- L. 布朗:《1848年革命史》,1—2卷,巴黎,1870年版。
- G. 布尔金:《1848年共和国的诞生与消亡》,巴黎,1948年版。
- F. 特瓦莱特:《1848年劳动法》,巴黎,1921年版。
- Ch. 施米特:《1848年6月的日子》,巴黎,1925年版。
- L. 吉拉尔德《第二共和国》,卡尔芒—莱维,1968年版。
- J. 戈德肖特:《1848年革命》,阿尔班·米舍尔,1971年版。
- R. 普赖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社会史》,伦敦,巴尔斯福德,1972年版。
- Ф. В. 鲍爵姆金, А. И. 莫洛克主编:《1848—1849年革命》,莫斯科,1952年版。
- 《纪念1848年革命一百周年论文集》,国立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
- H. E. 扎斯金克尔:《1848年法国革命》,莫斯科,1948年版。

1848年德国革命主要参考书目

- 恩格斯:《普鲁士宪法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 恩格斯:《普鲁士宪法》,同上书。
- 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同上书。
- 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同上书。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同上书。
- 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同上书。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 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有关德国革命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第6卷。
- 恩格斯:《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恩格斯:《德国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恩格斯:《革命的两年。1848年和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恩格斯:《德国来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列宁:《国家与革命》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6卷。北京,1965年版。

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

丁建弘、陆世澄主编:《德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姜德昌编译:《德国史文献的资料译丛》(近代部分)中国德国史研究会,1989年版。

平森著:《德国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博恩等著:《德意志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梅林:《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56年版。

奥则尔曼:《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Ф. B. 鲍爵姆金, A. И. 莫洛克:《1848—1849年革命》,莫斯科,1952年版。

C. B. 卡恩:《1848年—1849年德国革命的历史编纂学》,莫斯科,1962年版。

B. H. 别尔采夫:《十八世纪德国简史》,明斯克,1959年版。

科珀斯·派因松:《近代德国的历史与文明》,纽约,1955年版。

乔治·古奇:《近代世界。德国》,纽约,1927年版。

J. A. A. 莫罗特:《普鲁士革命》,牛津,1917年版。

A. Z. P. 泰勒:《德国历史的发展》,牛津,1946年版。

莱茵哈德·鲁占普等:《德国史》第3卷,哥根廷,1985年德文版。

霍尔伯恩:《近代德国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英文版。

1848年奥地利革命主要参考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法兰克福委员会关于奥地利事件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马克思恩格斯:《维也纳和法兰克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马克思:《维也纳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马克思:《〈法兰克福总邮报〉和维也纳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马克思:《维也纳革命和“科伦日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马克思:《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最后消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马克思:《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恩格斯:《奥地利末日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恩格斯:《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的第一件事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恩格斯:《三个新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恩格斯:《〈科伦日报〉驻维也纳记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列宁:《论革命临时政府》,《列宁全集》第28卷。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2卷。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

W. 奥克斯尔霍泽尔:《1848—1850年回忆录》,柏林,1892年版。

《1848年4月2日在柏林召开的第二次邦联议会协商》,柏林,1948年版。

A. 赫尔曼:《柏林文献。一本回忆1848年的书》第17卷,柏林,1948年版。

V. 瓦伦丁:《1848—1849年德国革命史》,1—2卷,柏林,1931年版。

K. 奥伯曼:《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德国工人》,柏林,1950年版。

J. 雷德利希:《奥地利国家问题. 1848年至帝国衰落期间的哈布斯堡王

朝内政史略》，莱比锡，1920年版。

斯克得·阿兰：《哈布斯堡帝国的兴亡。拉德茨基。1848年帝国的军队和阶级战争》，伦敦，朗曼，1979年版。

约瑟夫·波利森斯屈：《1848年革命中的贵族和群众》，纽约，1980年版。

Ф. В. 鲍爵姆金，А. И. 莫洛克：《1848—1849年革命》，莫斯科，1952年版。

С. Б. 卡恩：《1848年奥地利和德国革命》，莫斯科，1948年版。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莫斯科，1959年版。

И. 特拉伊宁：《奥匈的民族矛盾及其衰落》，莫斯科—列宁格勒，1947年版。

《纪念1848年革命一百周年论文集》，国立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

1848年意大利革命主要参考书目

马克思：《英法在意大利的调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马克思：《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马克思：《马志尼的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马克思：《马志尼的新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马克思：《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马克思：《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波拿巴的联盟。——帕麦斯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恩格斯：《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目前失败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恩格斯：《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 恩格斯:《皮蒙特军队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专集第4册,上海中华书局。
- 周传儒:《意大利现代史》,商务印书馆。
- [苏]弗叶·涅夫列尔:《朱塞普·加里波的》,三联书店。
-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意大利》,三联书店。
- [英]赫·赫德 德·普·韦利编:《意大利简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 亚·大仲马:《加里波的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 Ф. В. 鲍爵姆金, А. И. 莫洛克:《1848—1849年革命》,莫斯科,1952年版。
- 占科夫斯基:《意大利史纲》(1476—1918年),莫斯科,1959年版。
- E. B. 塔列列:《意大利近代史》,圣彼得堡,1901年版。
- G. F. H. 伯克利, J·伯克利:《1846年6月至1848年1月1日意大利的发展》,剑桥,1936年版。
- B. 金:《意大利统一史,1814至1871年意大利政治史》第1卷,1899年版。

1848年罗马尼亚革命主要参考书目

- 马克思:《关于罗马尼亚人的札记》,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 马克思:《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俄国的纵容。——予莫。——报纸附刊税。——议会的舞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 马克思恩格斯:《贝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 马克思:《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 马克思:《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与诡辩。——涅谢尔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 马克思:《英国特别的陆军部的成立。——多脑河上的军事行动。——经济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
- 马克思:《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

公债。——瓦拉几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

马克思：《马志尼被捕的传说。——奥地利的强制公债。——西班牙——瓦拉几亚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

马克思：《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马克思：《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沙皇宣言——丹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马克思：《土耳其问题在下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

斯大林：《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卷。

米·康斯坦丁内斯库等主编：《罗马尼亚通史简编》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维诺格拉多夫等主编：《罗马尼亚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安德烈·奥尔特亚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康·康·朱雷斯库：《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丹·贝林戴：《独立的罗马尼亚》，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M. 罗列尔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史》，布加勒斯特，1952年版。

N. 约尔加：《罗马尼亚商业史。近代》，布加勒斯特，1925年。

《罗马尼亚诸公国的1848年。文件和文献集》，由扬·康·布勒蒂亚努纪念碑与建设委员会协助出版。布加勒斯特，1948年版。

亚·迪·克塞诺波尔：《罗马尼亚政党史》，布加勒斯特，1911年版。

G. 乔尔杰斯库—布泽乌：《蒙特尼亚1848年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布加勒斯特，1948年版。

Ф. B. 鲍爵姆金，A. И. 莫洛克主编：《1848—1849年革命》，莫斯科，1952年版。

H. B. 别列兹尼亚科夫：《1848—1849年多瑙河两公国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基什尼奥夫，1955年版。

鲍迪埃，科尔尼科亚：《罗马尼亚争取统一的斗争》，布加勒斯特，1970年版。

1848年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主要参考书目

- 马克思:《新年贺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 马克思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 恩格斯:《布拉格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 恩格斯:《起义的民主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 恩格斯:《德国战争短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
- 列宁:《民族平等》,《列宁全集》第20卷。
- 列宁:《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1卷。
-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
- A. 克利马:《捷克的1848年》,布拉格,1948年版。
- K. 卡兹邦达:《1848年捷克运动》,布拉格,1929年版。
- O. 日哈:《1790—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布拉格,1949年版。
- K. 斯拉维切克:《捷克的秘密政治协会里皮尔》,布拉格,1947年版。
- У. А. 舒斯杰尔:《1848年波兹南起义》,载《历史问题》,1948年第三期。
- C. A. 尼基京:《1848年革命中的斯拉夫民族》,莫斯科,1948年版。
- A. C. 布吉洛维奇:《论帕拉茨基的特性》,尤里耶夫,1889年版。
- П. 拉弗洛夫:《沙法里克的生平与学术活动》,莫斯科,1898年版。
- И. 列文:《1848年奥地利的社会与民族斗争》,莫斯科,1913年版。
- A. 吉利费尔金格:《捷克简史》,圣彼得堡,1893年版。
- A. П. 波戈金:《斯拉夫世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斯拉夫民族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莫斯科,1915年版。
- Ф. B. 鲍爵姆金, A. И. 莫洛克主编:《1848—1849年革命》,莫斯科,1952年版。
- N. N. 乌达里卓夫:《1848年捷克民族政治斗争简史》,莫斯科,1951年版。

C. A. 尼基京,《捷克斯洛伐克通史》第2卷。

1848年波兰革命主要参考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马克思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恩格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恩格斯:《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人民之春一百周年祭》,1—5卷,华沙,1948—1953年版。

《1795—1864年波兰史料选编》,华沙,1956年版。

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波兰史》第二卷,第三分册,华沙,1956年版。

S. 鲍宾斯卡:《马克思恩格斯与波兰问题》,华沙,1955年版。

1848年匈牙利革命主要参考书目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马克思:《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恩格斯:《〈科伦日报〉论马札尔人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恩格斯:《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恩格斯:《匈牙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

恩格斯:《布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恩格斯:《同盟中的第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恩格斯:《俄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马克思恩格斯:《贝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

恩格斯：《匈牙利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

恩格斯：《匈牙利的战事报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

温盖尔·马加什、萨博尔奇·奥托：《匈牙利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梅雷·久拉：《1790—1848年马扎尔工业的发展》，布达佩斯，1951年版。

恩拜尔·哲译：《1848年匈牙利的农民运动》，布达佩斯，1949年版。

什皮劳·哲尔吉：《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布达佩斯，1959年版。

奈迈什·代舍：《革命与解放战争》，布达佩斯，1948年版。

奥劳托·恩德赖：《匈牙利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史》，第二卷（1840—1848年），布达佩斯，1960年版。

奇兹马迪亚·翁多尔：《匈牙利1848—1849年的选举制度》，布达佩斯，1963年版。

Ф. В. 鲍爵姆金, А. И. 莫洛克：《1848—1849年革命》，莫斯科，1952年版。

P. A. 阿维尔布赫：《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莫斯科，1965年版。

《纪念1848年革命一百周年论文集》，国立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

M. 坦契奇：《我的生活道路》，莫斯科，1952年版。

《山多尔·裴多菲全集》。

T. M. 伊斯拉托夫, А. И. 普代卡什, B. И. 舒沙林：《匈牙利通史》第二卷，莫斯科，1972年版。

沙皇俄国与1848年欧洲革命主要参考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新神圣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马克思：《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恩格斯：《〈论俄国社会问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

恩格斯：《在1862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

恩格斯：《俄国人在特兰西瓦尼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

恩格斯：《俄国人入侵。——塞尔维亚人。——奥地利人的前途。——战地新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

列宁：《纪念赫尔岑》，《列宁全集》第18卷。

列宁：《民族问题提纲》，《列宁全集》第19卷。

列宁：《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列宁全集》第15卷。

涅奇金娜主编：《苏联史》第2卷，第一、二分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

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2卷，三联书店，1978年版。

北大历史系编：《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吴春秋编著：《俄国军事史略》，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

唐纳德·W·米切尔：《俄国与苏联海上力量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A. C. 尼方托夫：《1848年的俄国》，莫斯科，1949年版。

谢尔巴托夫：《元帅帕斯凯维奇公爵》第6卷，圣彼得堡，1899年版。

P. 阿维尔布赫：《沙皇对匈牙利革命的干涉》，莫斯科，1935年版。

C. C. 塔吉谢夫：《尼古拉一世皇帝的对外政策》，圣彼得堡，1887年版。

《赫尔岑全集》第13卷，第4—5册，彼得格勒，1919年版。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莫斯科，1939年版。

B. A. 吉拉维奇：《1814—1914，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纽约，1965年版。

C. 巴尔利特：《1815—1853年大不列颠和海上霸权》，牛津，1963年版。

增订版后记

1978年河南大学历史系决定开设1848年欧洲革命史这门选修课。我为了讲授这门课程，邀请了四位同志：徐云霞、姜德昌、赵克毅、程人乾编写了《1848年欧洲革命史》。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将《1848年欧洲革命史》列入出版计划，并于1983年正式出版。198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办公室在制定高等学校历史专业教材编选计划时，将《1848年欧洲革命史》选定为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用书，并列入了1985年至1990年出版计划。1985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室同意出版《1848年欧洲革命史》的增补版。增补的主要内容是两点：（一）1848年欧洲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编纂学；（二）1848年欧洲革命在中国的反响。我们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意见，由徐云霞撰写了第十一章 1848年欧洲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编纂学；韩承文撰写了第十二章 1848年欧洲革命在中国的反响。我们把书稿写好后，经责任编辑汤中仁同志审读，经三审后认为可以出增补版，书稿已送出版科，此时正逢学术著作出版难，经济效益不佳等情况，拖了一年多也未出版。于是我将书稿要回，准备与其他出版社联系出版。经河南大学出版社同意，给出增订版。为了提高此书的质量，决定对全书进行修改，将老化的材料及观点删去，吸收和补充新的材料和观点，对原章只作修改，不增加字数。修改后的增补版，增加了三章，即第十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的活动及其理论总结；第十一章 1848年欧洲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编纂

学；第十二章 1848年欧洲革命在中国的反响。对其它各章都经作者认真进行了修改、补充，甚至重写。

在增订、修改过程中，承蒙河南大学出版社朱绍侯总编辑、河南大学教务处李公健处长及责任编辑刘小敏、侯惠娟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拍照插图方面曾得到了开封博物馆张继中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绘制地图方面得到了河南大学历史系绘图室冯爱华同志的帮助，在此也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著者的理论水平及业务水平都很有有限，书中可能存在不妥之处，欢迎广大读者和专业工作者批评指正。

韩 承 文

1991年12月于河南大学